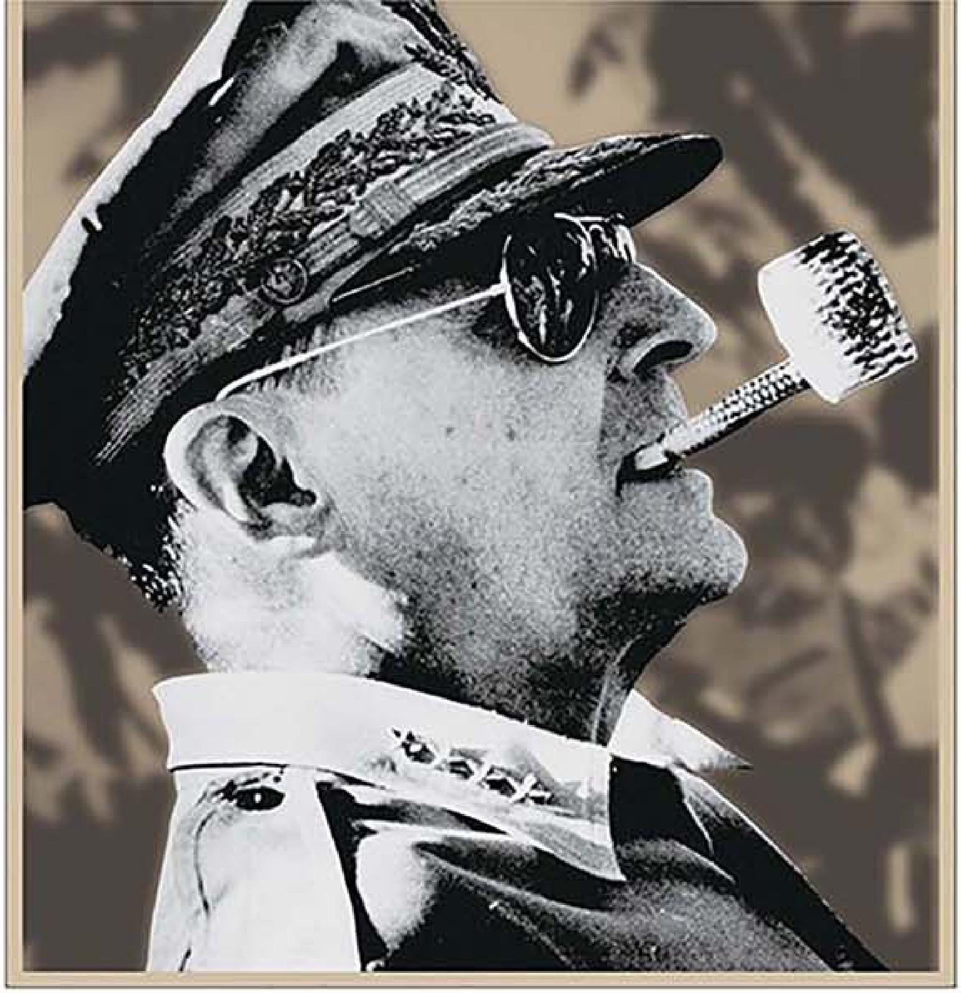
THE GLORY AND THE
DREAM
光荣与梦想·人物卷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美国的恺撒大帝

麦克阿瑟 上

[美] 威廉·曼彻斯特◎著
黄瑶◎译

William Manchester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美国的恺撒大帝：麦克阿瑟（上）

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译者:黄瑶

ISBN:9787508681047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萨拉·巴尼·贝尔彻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温斯顿·丘吉尔的共同祖先。



老阿瑟·麦克阿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祖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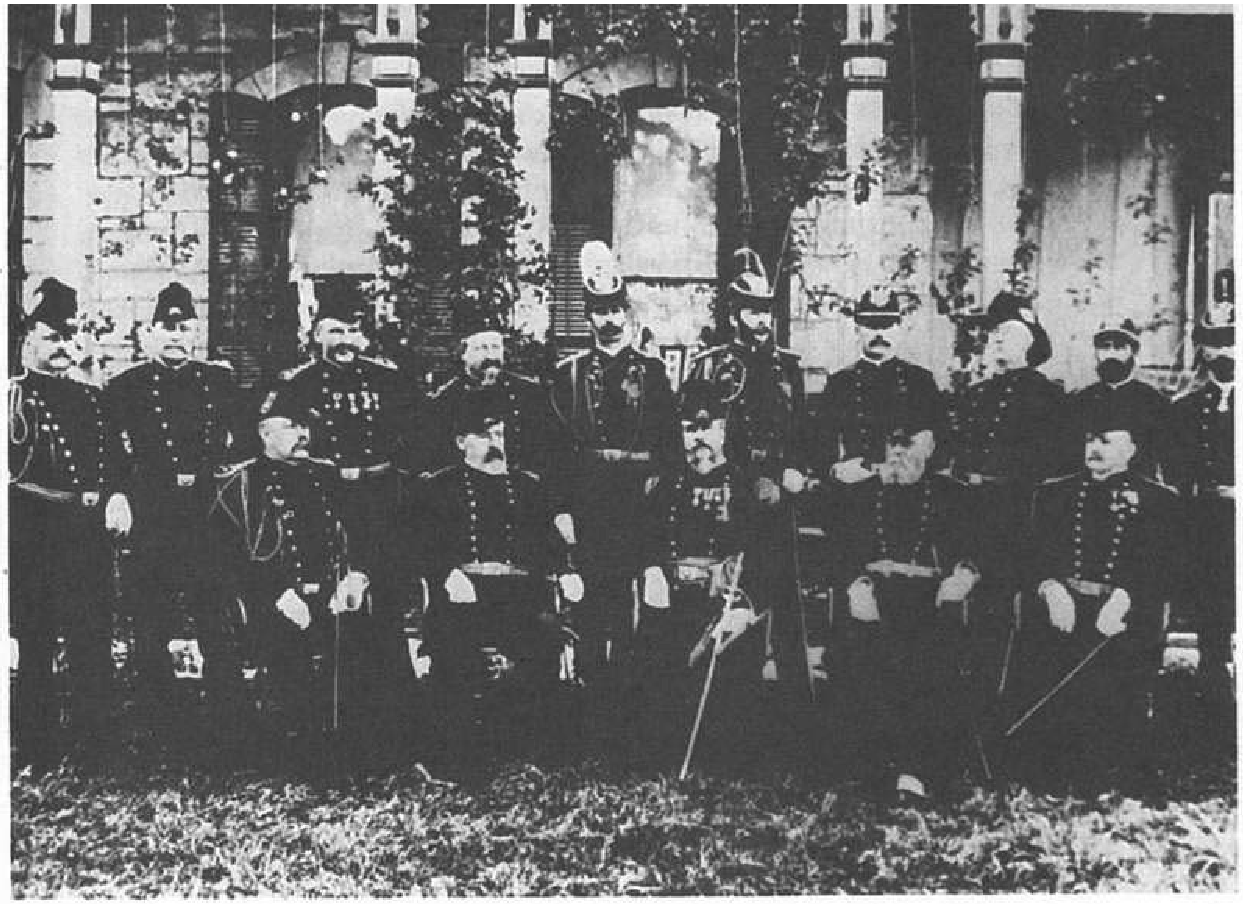
美国内战结束时期的小阿瑟·麦克阿瑟上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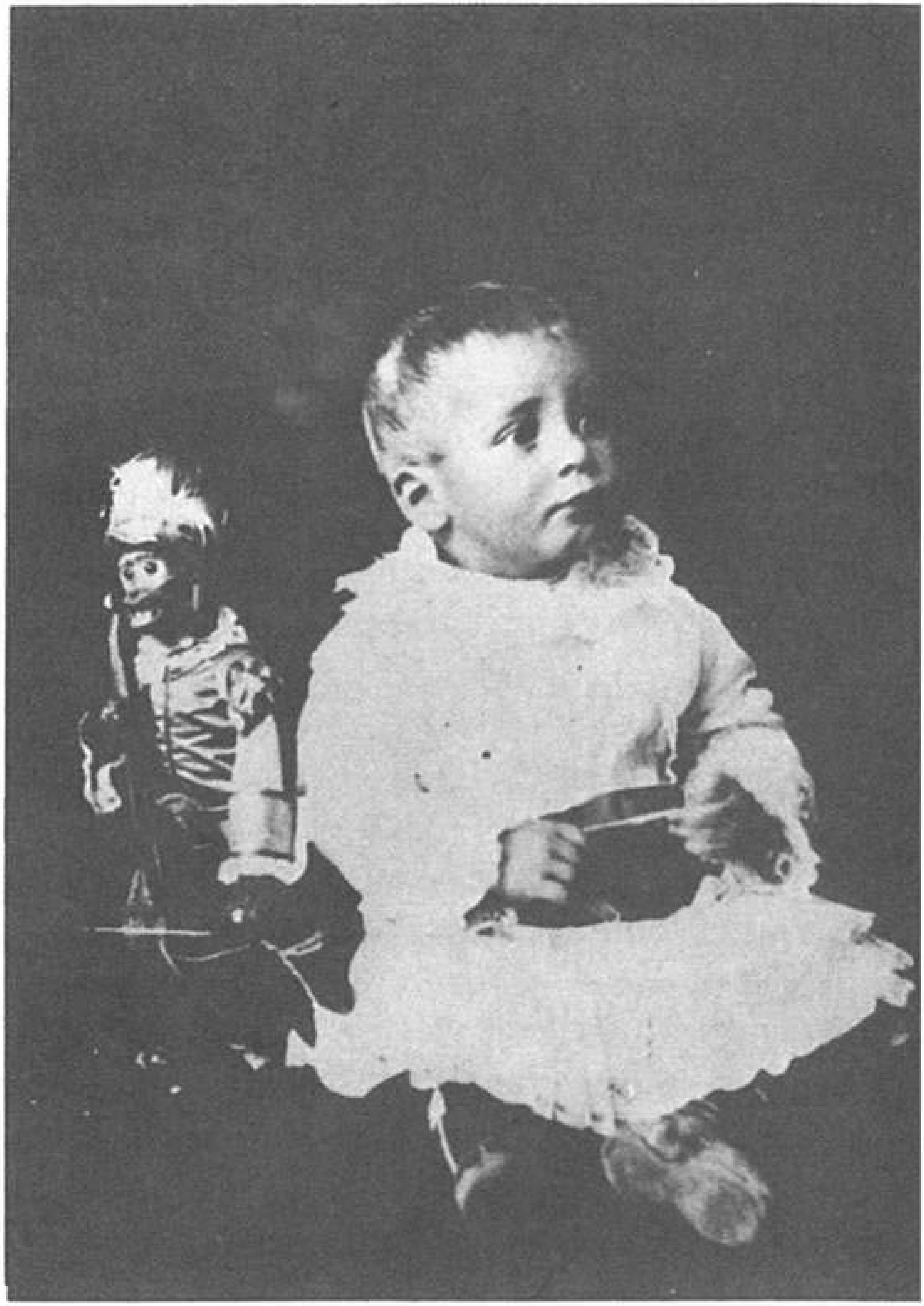
平克妮·麦克阿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母亲）结婚时的照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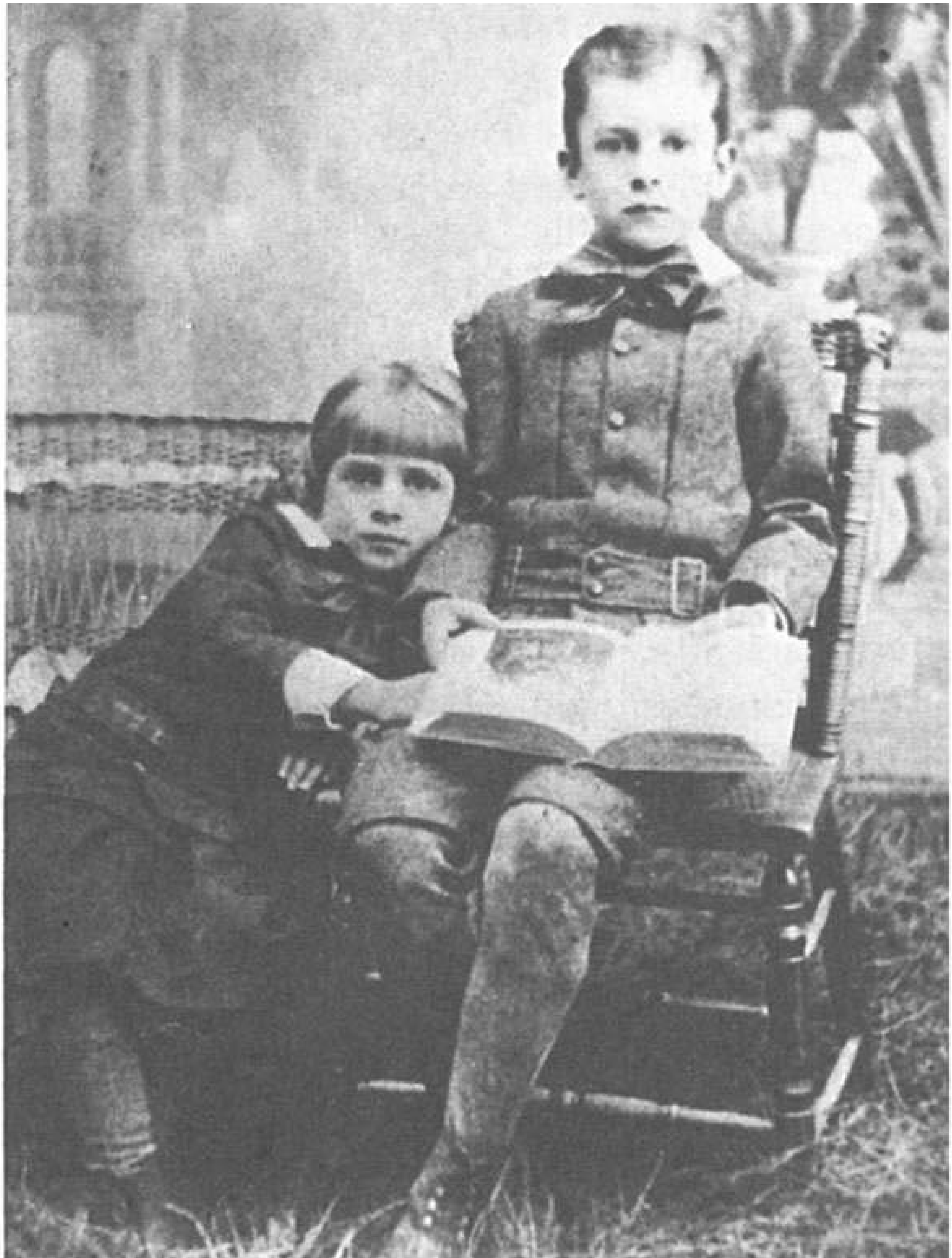
小阿瑟、平克妮和他们的孩子，摄于1885年。



小阿瑟·麦克阿瑟少校（最左）与其他军官的合影，摄于1894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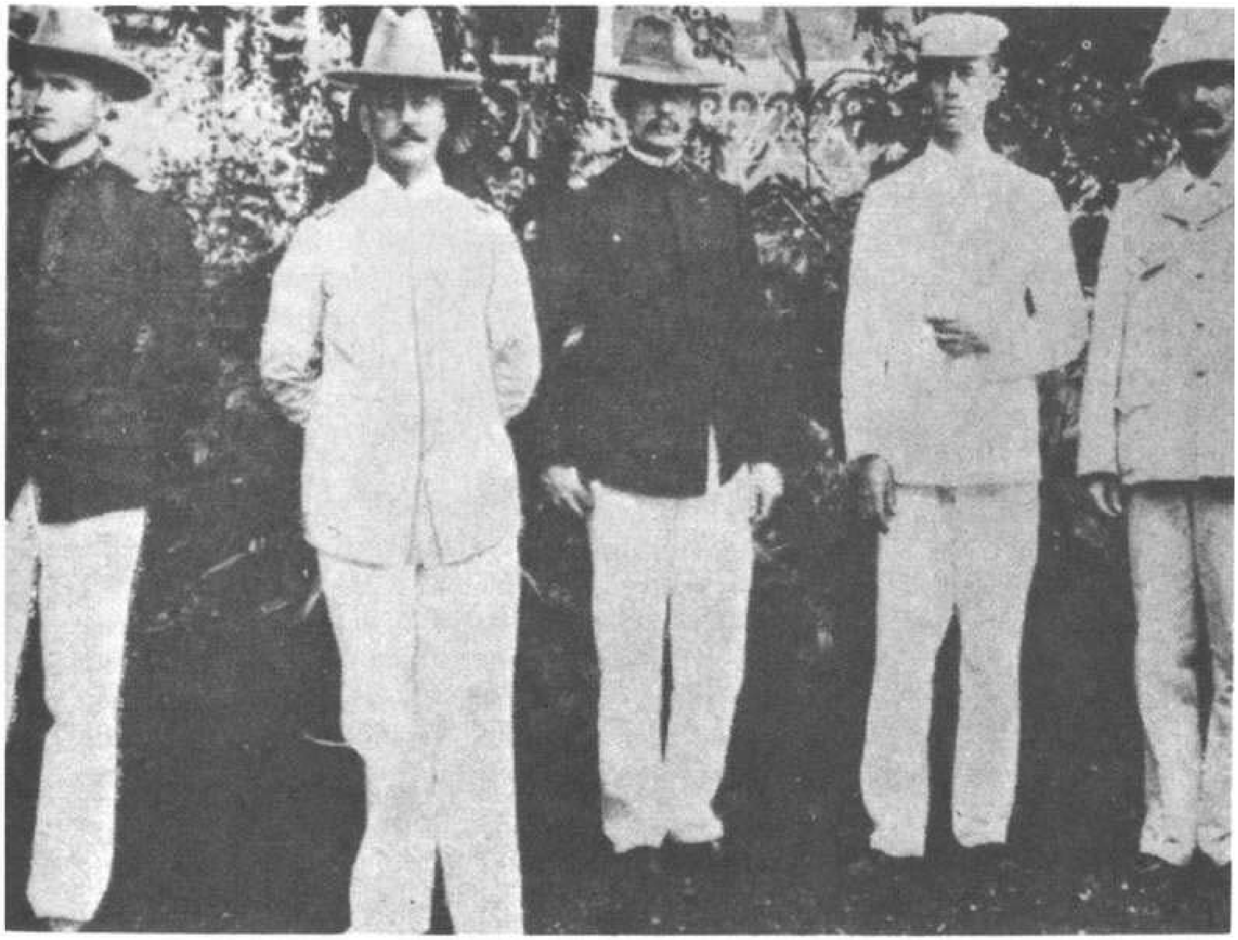
婴儿时期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左）和他的哥哥阿瑟三世，摄于1884年。



小阿瑟·麦克阿瑟少将，摄于1899年的菲律宾。



小阿瑟·麦克阿瑟少将（左二），摄于1905年。



儿时的麦克阿瑟。



少年麦克阿瑟。



十六岁的麦克阿瑟，摄于西得克萨斯军校。

麦克阿瑟的哥哥阿瑟三世出任海军军官。



麦克阿瑟的哥哥阿瑟三世出任海军军官。

年轻的麦克阿瑟（后排最右）和他的家人（阿瑟三世、阿瑟三世之妻玛丽及他们的儿子小道格拉斯；平克妮和小阿瑟·麦克阿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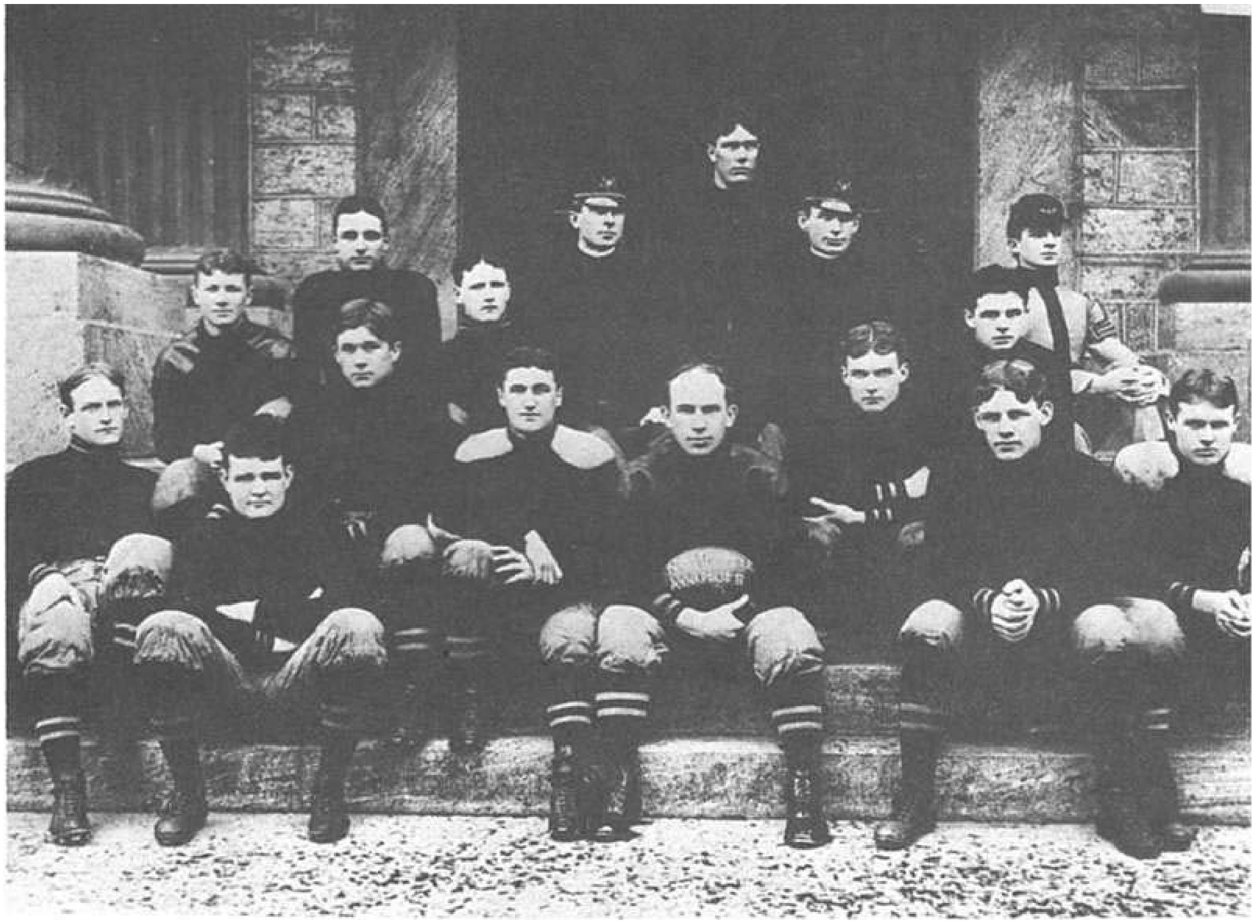
年轻的麦克阿瑟（后排最右）和他的家人（阿瑟三世、阿瑟三世之妻玛丽及他们的儿子小道格拉斯；平克妮和小阿瑟·麦克阿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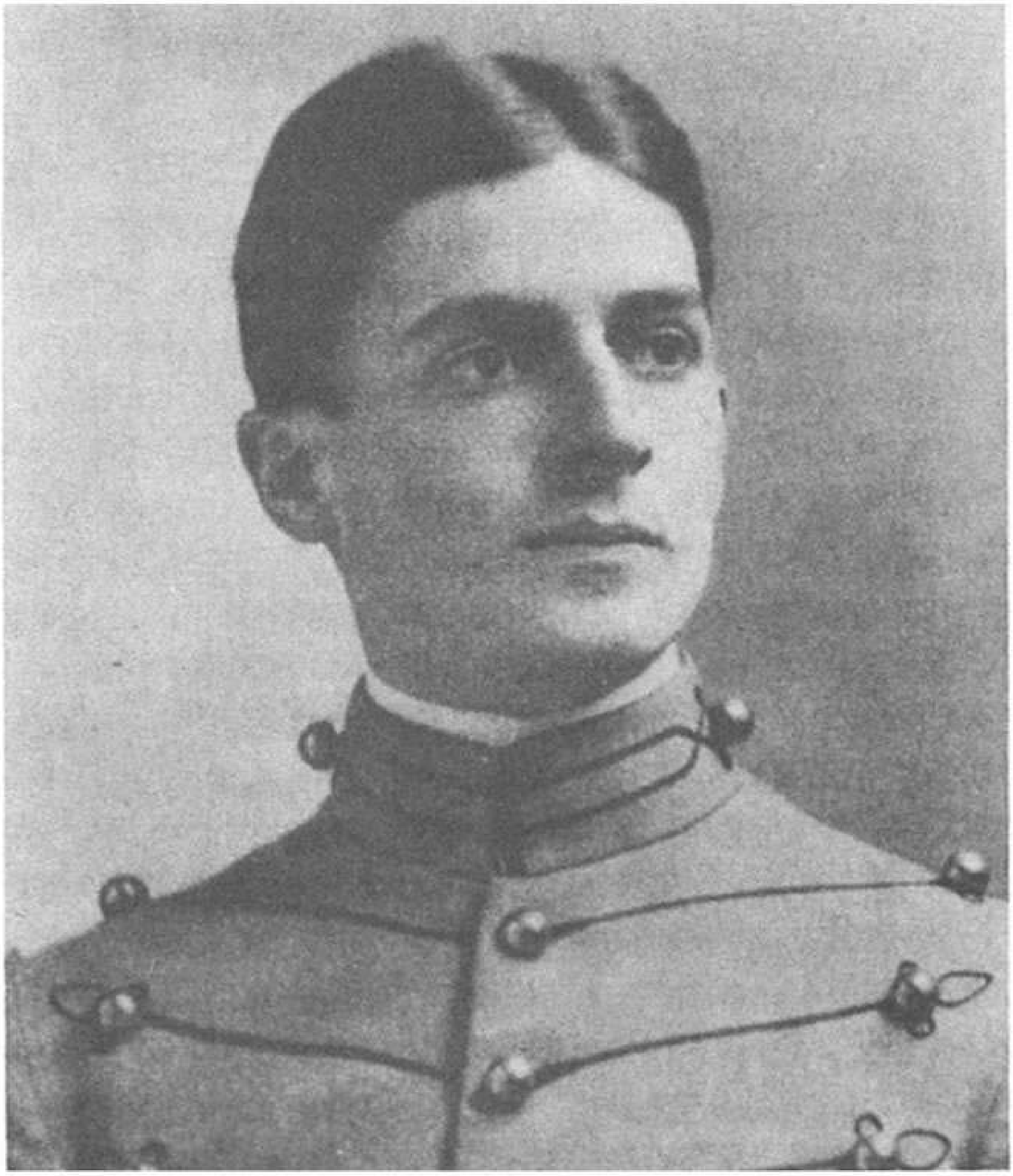
西点军校新生麦克阿瑟及其母亲，摄于1899年。



麦克阿瑟（第二排最右）及西点军校棒球队的其他队员。



麦克阿瑟（身穿军校学员制服）出任西点军校橄榄球队经理。



西点军校四年级学生麦克阿瑟，摄于1902年。

身穿西点军校学员制服、摆出夸张姿势的麦克阿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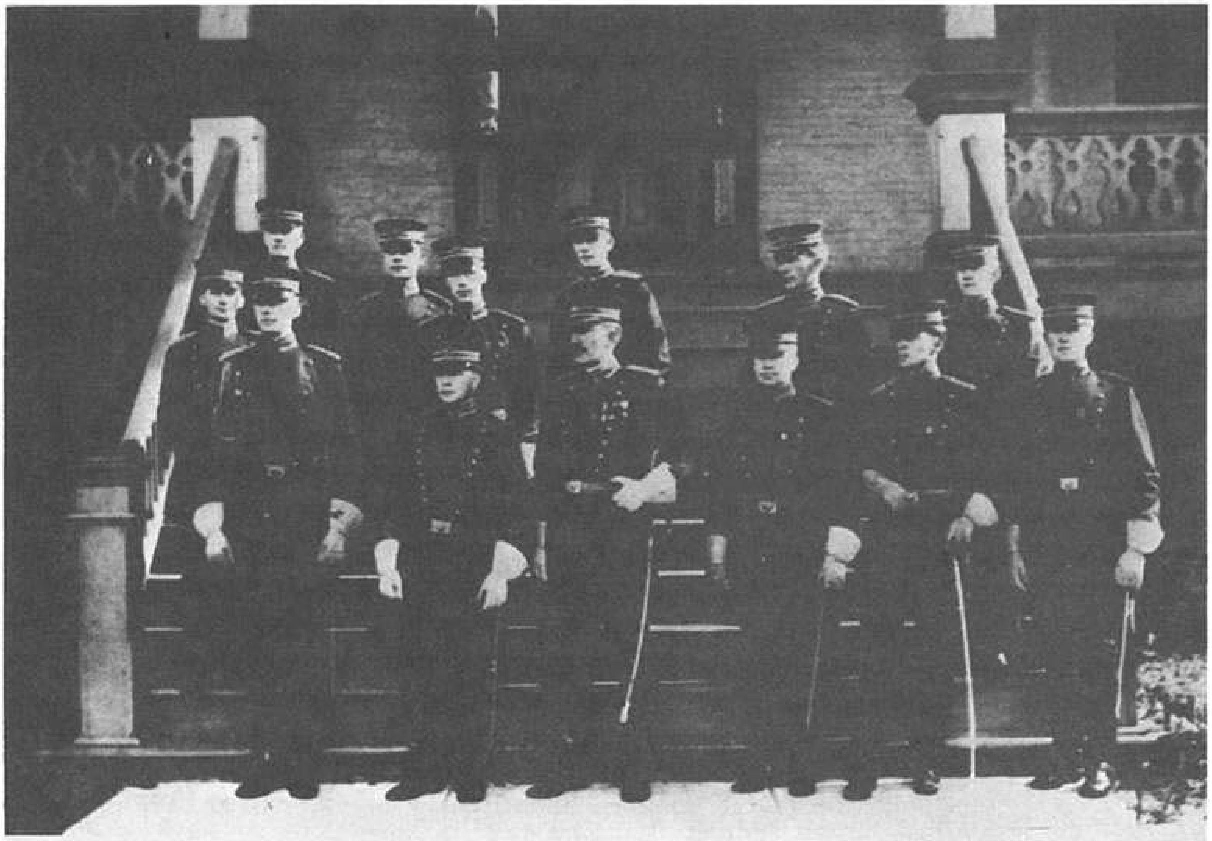
身穿西点军校学员制服、摆出夸张姿势的麦克阿瑟。



出任少尉的麦克阿瑟。

出任中尉的麦克阿瑟，摄于1906年。





身着盛装的麦克阿瑟中尉（前排右二）与其他军官，摄于1909年。



身处维拉克鲁斯的麦克阿瑟上尉，摄于1914年。



出任战争部“公关主任”的麦克阿瑟少校，摄于1916年。



麦克阿瑟上校与查尔斯·T. 梅诺尔少将在法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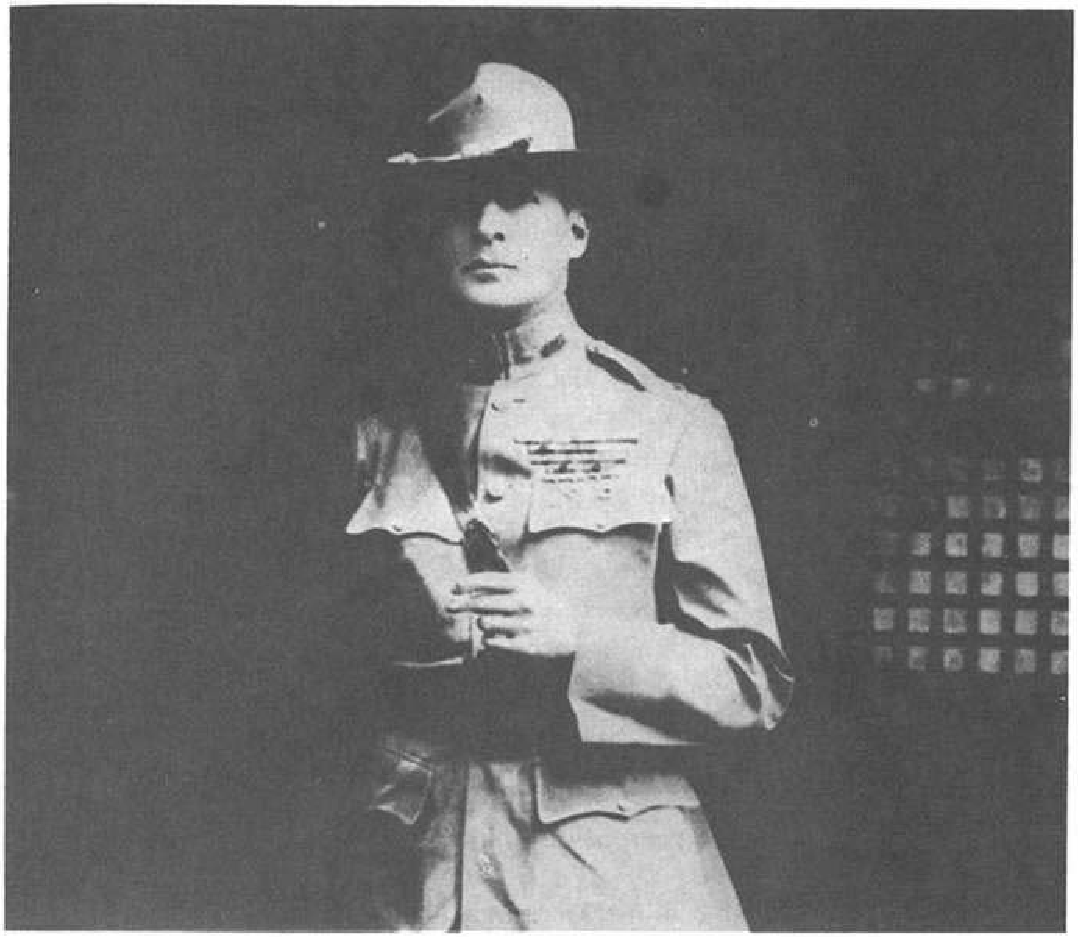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上校与乔治·德巴泽莱尔将军在法国。



约翰•J. 潘兴将军在法国授予麦克阿瑟上校服役优异十字勋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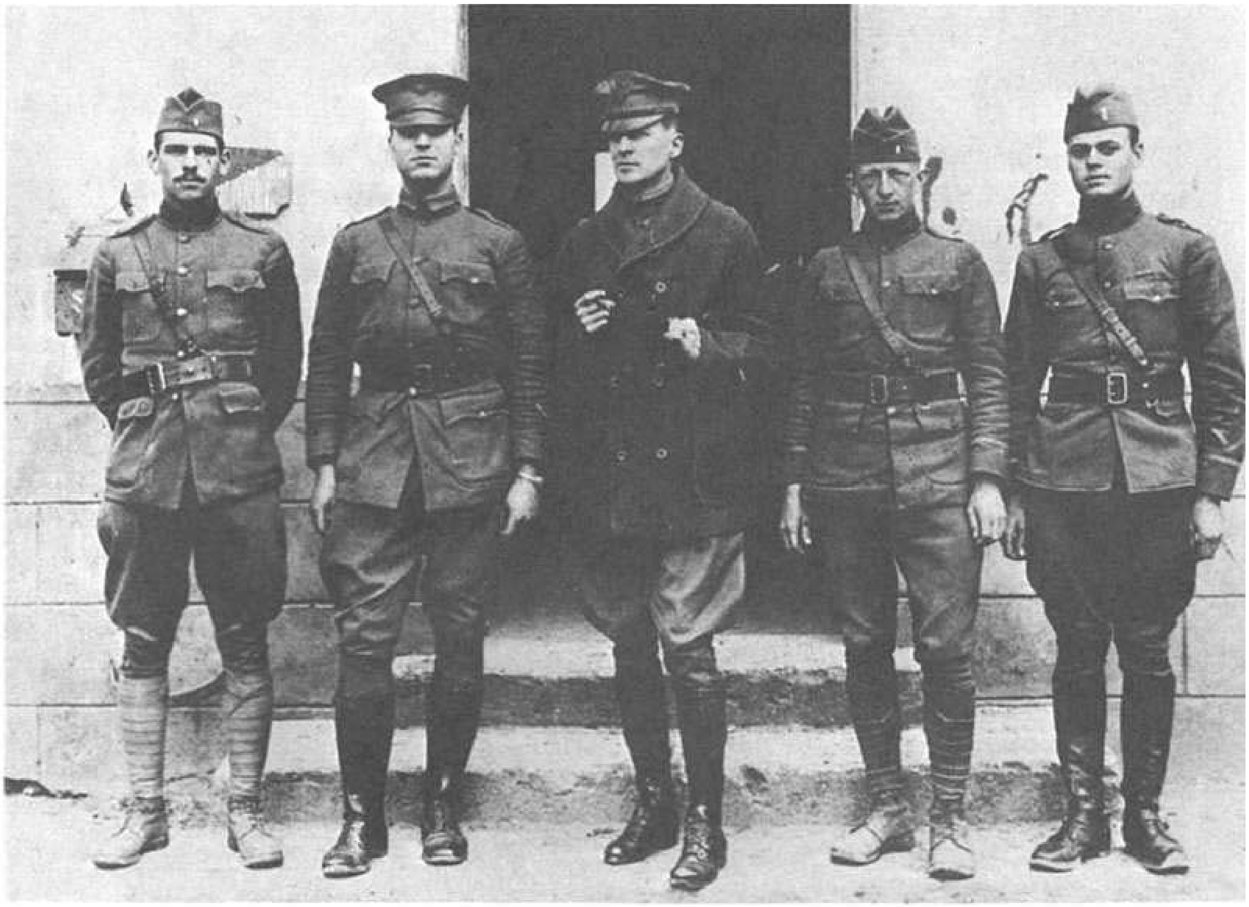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上校观摩演习。



出任准将的麦克阿瑟。



头戴软顶帽的麦克阿瑟准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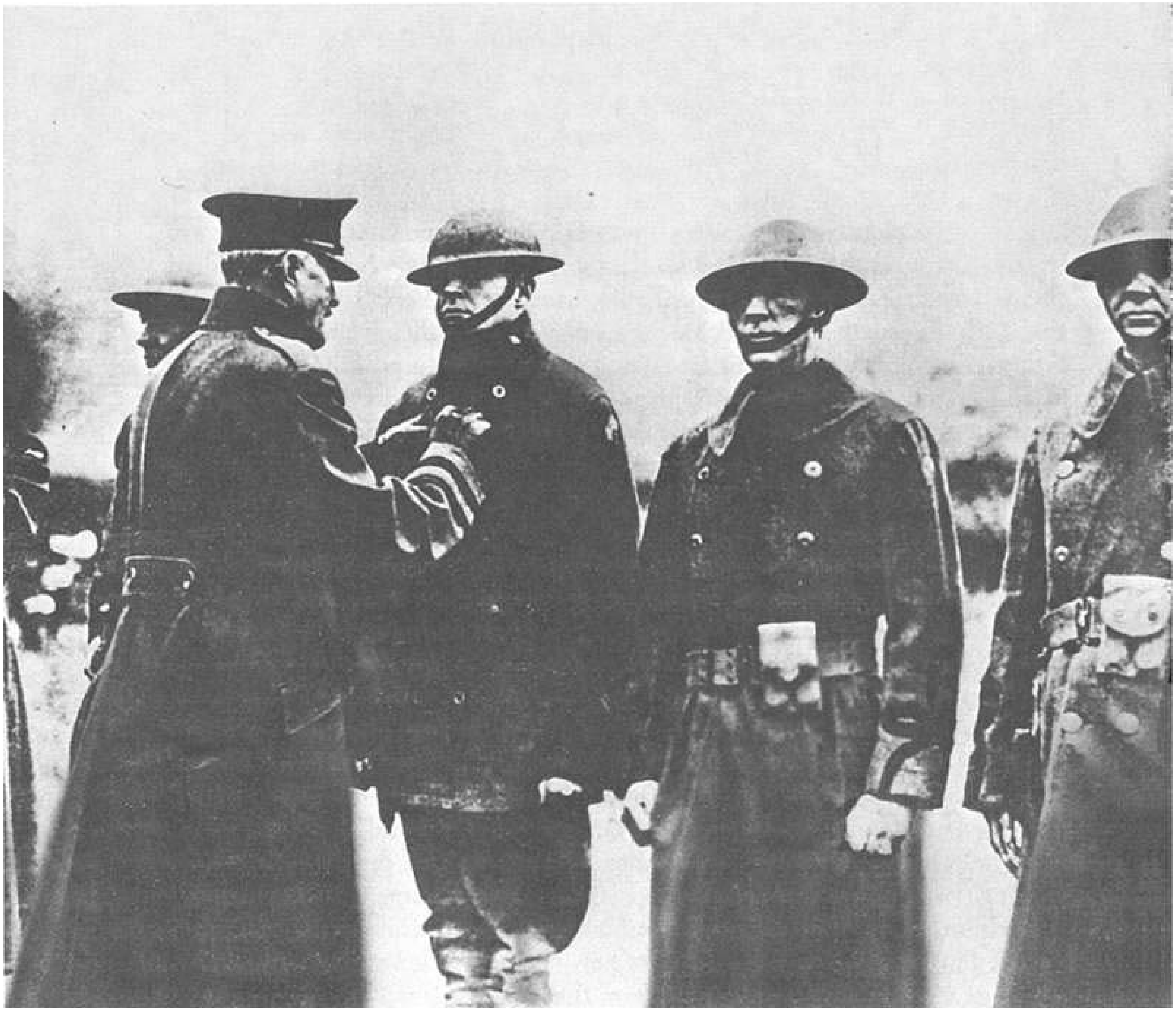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准将与第84师成员。



停战协议签署前的麦克阿瑟准将。



“一战”临近结束时的麦克阿瑟准将。



潘兴将军授予麦克阿瑟准将服役优异勋章。



出任西点军校校长的麦克阿瑟与威尔士王子，摄于1919年。

身穿浣熊皮大衣的麦克阿瑟在返家途中，摄于1919年。



身穿浣熊皮大衣的麦克阿瑟在返家途中，摄于1919年。



西点军校校长麦克阿瑟。



麦克阿瑟校长与纽约市市长黑仑，摄于1920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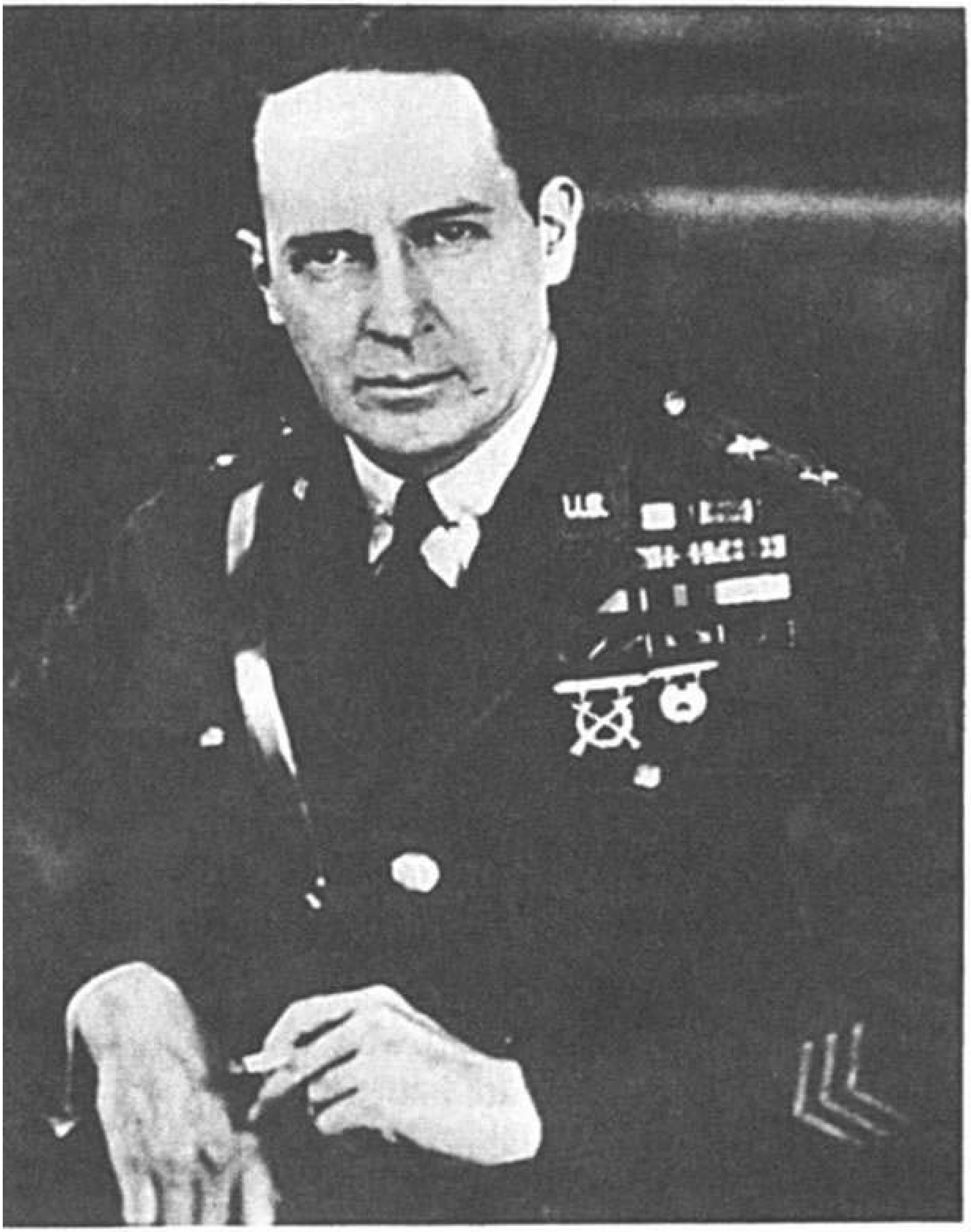
麦克阿瑟的第一任妻子路易丝·克伦威尔·布鲁克斯。



麦克阿瑟与路易丝，摄于1925年3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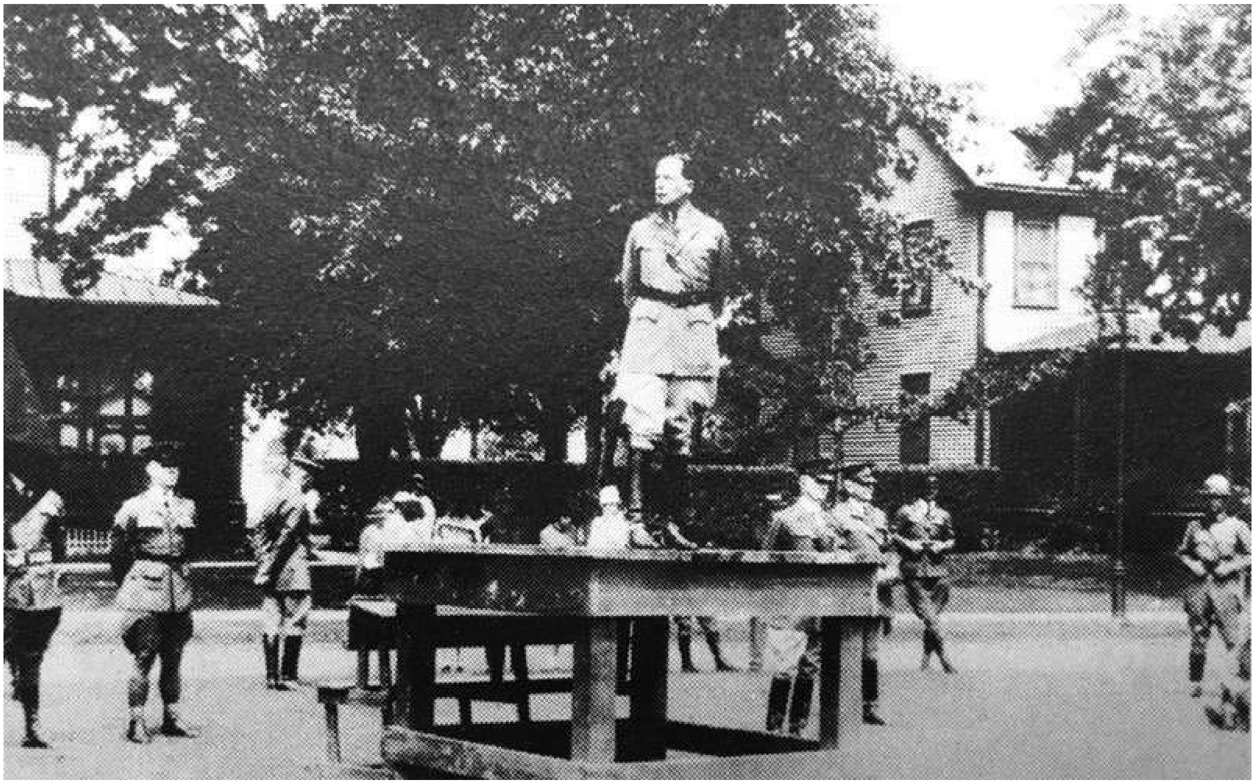
手捧儿子道格拉斯照片的平克妮•麦克阿瑟，摄于1925年前后。



麦克阿瑟少将，摄于1926年。



麦克阿瑟出任美国奥运队领队，摄于1928年。



麦克阿瑟少将在马里兰州国民军事训练营中。



身穿便服的麦克阿瑟受命出任参谋长。



麦克阿瑟与潘兴将军。



佩戴着勋章的麦克阿瑟，摄于1930年12月。



麦克阿瑟观摩法国演习，摄于1931年。



麦克阿瑟观摩奥地利军事演习，摄于1932年。



麦克阿瑟与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少校就驱逐补偿金远征军一事进行协商。

麦克阿瑟监督补偿金远征军的驱逐行动，摄于1932年。





补偿金远征军驱逐行动间隙的麦克阿瑟。

献给
第29海军陆战队

1945年4月1日

3 512人登陆冲绳

82天内损失2 821人

为美国海军陆战队单次战役中付出过的最高昂代价

“过客啊，去告诉斯巴达人，我们是遵从他们的命令长眠在这里的。”

——西蒙尼戴斯于塞莫皮莱

作者按

军官在其军旅生涯中的军衔变化以及试图记录他们晋升情况的努力只会让读者感到困惑。因此，在这部作品中，我省略了有关军衔的内容，除非其对段落意义的理解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与此相反，在缺乏称呼的情况下，书中单独提及“将军”时指代的都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乔治·C.　马歇尔的教名的用处是将其与麦克阿瑟“二战”时的副参谋长理查德·J. 马歇尔区分开来。

为了表述内容的清晰，我在时态方面也遇到了类似的问题。为避免过去完成时给读者带来的折磨，文中偶尔会出现“他回忆”和“他记得”之类的短语来援引某段几年之前被提及的回忆——通常源自出版的回忆录。现在时能够提高行文的明晰度、增强现场感。

“恺撒从来都不是一个讨人喜欢的人。尽管他对战败对手的宽容显示了他的雅量，却并没有赢得他们的喜爱。他之所以能够赢得麾下士兵的忠心，是因为他的军事天分能够给他们带来胜利。然而，即便不讨人喜欢，恺撒一直都是个充满魅力、着实会令人着迷的人。他在政治方面的成就要求他拥有几种不同领域所需的能力——实际上相当于天分——包括管理才华和将才智略，此外还有牵线搭桥、发动宣传之类的小伎俩。在这些方面，恺撒都是杰出的大师。”

——阿诺德·汤因比

“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1950年，一位日本政治家向约翰·冈瑟提及麦克阿瑟时这样说道

开场白
起床号



他是一个极其矛盾的男人，既高尚尊贵又龌龊卑贱，既令人振奋又使人震惊，既狂傲自大又腼腆羞怯。他堪称人中豪杰，同时又是一个卑鄙小人。他两面三刀、荒唐至极，却又卓越超群。没有哪个军人能比他更令人捉摸不透、让人生气。他浮夸、专横、决绝，如同羽翼鲜亮的火烈鸟一般顽固不化，还试图用诡谲而幼稚的把戏来掩盖自己的错误。然而，他超凡的个人魅力、钢铁般的意志和过人的智慧无疑成就了这个国家最具天赋的军人。万夫莫敌的他拥有22枚奖章（其中有13枚都是为了表彰他的英雄事迹），大概足以超越美国历史上的任何一位大人物。在战场上，他是视死如归的铁血男儿，屡次将自己故意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20世纪初，刚刚晋升为中尉的他便奔赴菲律宾，而后又作为上尉征战于墨西哥，最终以将军的身份参加了三次大型战争。尽管如此，他的部下依旧轻蔑地称他为“防空洞里的道格”。

虽然他笃信仁慈的上帝，却似乎只崇拜自己。他从未去过教堂，不过每天都会研读《圣经》，并将自己视为基督教世界中最伟大的两大捍

卫者之一（另一位是教皇）。然而，每一个写着“麦克阿瑟”名字的闪光点背后都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弱点。在他英勇无畏、坚定刚毅的硬汉外表之下，其实还隐藏着桀骜不驯、急躁敏感、常常泣下沾襟的一面。他渴望公众的赞誉，却因得罪新闻界而不得人心。“二战”结束之后，他对于战败的日本表现得十分宽容，却因两位日本将军与他作对而处决了他们。20世纪40年代，他凭借在堪培拉、马尼拉和东京的战役东山再起，成为民族英雄，但从未在华盛顿政坛中出人头地。他厌恶不公，却释放了与敌军沆瀣一气的菲律宾贵族。他不但拒绝派兵讨伐在战场上起义的“虎克党”，还表示自己若是菲律宾农民，肯定也会参加“虎克党”起义军。任盟军驻日最高统帅期间，他延续了亲日路线，将公民自由、工会、女权平等概念引入了日本，并选取埃德温·赖肖尔的理念，在日本推行更加彻底的土地改革。与此同时，他还成了美国反动派的傀儡。尽管他将整个人生都献给了军队，却在临终之前坦言：“我百分之百不相信战争。”在他领导的战役中，他格外珍惜士兵的生命（从澳大利亚战役到日本宣布投降日，他的部队伤亡总数还不及阿登战役一战多），可他麾下的士兵却丝毫不为之所动，仍在无情地嘲笑着他。

他肯定是一个偏执狂，心中憎恨着这一整块大陆：欧洲。然而，欧洲人却并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只知道他为自己的苏格兰血统感到无比自豪。1918年，作为将军的他因在法国战场上英勇善战而一举成名。他在政治方面的才能颇有俾斯麦的风范，战斗风格却不似西点军校，倒是更像英国桑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法国圣西尔军校。夏尔·戴高乐比任何一个美国人都了解他，而英国人则被他弄得眼花缭乱。在丘吉尔眼中，他是一名“战果辉煌的指挥官”；在蒙哥马利看来，他是“二战”时期美国“最好的战士”；对于阿兰·布鲁克子爵来说，他可谓是“战争催生出来的最伟大的将军和最卓越的军事家”。然而，对于亚洲的沉迷（他认为亚洲是他的天下）却令他几近病态地妒忌美国政府对于欧洲大陆的偏袒。也正因如此，本性多疑的他坚信所有的欧洲国家，尤其是英国，都想要密谋反对他。就连五角大楼也参与其中，成了这个阴谋中的一分子，而乔治·马歇尔（尽管他私下里并不喜欢麦克阿瑟，但仍称他是“我

们最杰出的将军”）似乎就是主要嫌疑犯。不过，麦克阿瑟总是深不可测。也许他这一刻还满怀恶意，不一会儿便又会变得宽宏大度。除了其他一些方面之外，他这个人可以说是极端狡诈的。

他似乎和别人需要朋友一样需要敌人，而他的行为也确保他总是不乏足够的敌人。另一方面，他对于爱的需求也是十分强烈的。自从年少时起，他就十分崇拜自己的父亲。和后来的他一样，父亲也曾经是一名将军，还曾荣获国会荣誉勋章。相比之下，他与自己那位专横的南方母亲之间的关系则更为复杂。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以及阿德莱·史蒂文森相似，他也出身名门，却是专横式母爱的受害者。他过分依赖母亲，并在母亲的要求下长成了一个毫无怜悯之情、满怀野心壮志的人。在他考上西点军校之后，平克妮·麦克阿瑟也跟着搬去了西点军校——从柯蕾妮酒店向外望去，她可以看到自己儿子房间里的灯光，从而知道他是否仍在学习。后来，她还给他的长官写过不少荒诞滑稽的书信，要求对方提拔他，这着实伤害了他的自尊心。

他的第一段婚姻是对母亲的一次公开反抗：他迎娶了一位性感的离异女子。平克妮拒绝出席婚礼，而这段姻缘也不出所料地以分手告终。再婚之前，他包养了一位长相精致的欧亚混血情妇，并先后将她安置在了菲律宾以及华盛顿第16街上的一处酒店公寓中，还送了她不少礼物和大量蕾丝礼服裙。不过，他从未给她买过雨衣，因为他告诉她，她不需要雨衣，她的责任就是躺在床上。最后，她还是背叛了他。由于害怕母亲发现这个情妇的存在（那时候的他已经54岁了，而且已然成为一名四星上将），他于1934年的平安夜委派另一名军官到威拉德酒店的夹楼中用一捆百元美钞收买了那个姑娘。在两段惊天动地的浪漫爱情受挫之后（也就是他的母亲去世后不久），他开始大张旗鼓地追求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成就了一段富有诗意的佳话。她和他们唯一的孩子成了他无与伦比的幸福之源。就这样，他成了一位全力以赴的父亲，却依旧和麦克阿瑟家族里的其他人一样不懂得放手。最终，他那令人窒息的父爱给儿子的灵魂蒙上了一层阴影。

“很少有人真的了解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乔治·C. 肯尼说，“那些了解他或自以为了解他的人要么就很崇拜他，要么就不喜欢他。在这件事情上他们绝不会表现得模棱两可。”当然，没有哪个美国指挥官或是哪个美国人能够比麦克阿瑟更喜欢抬杠。在还是西点军校的学员时，他就曾初次在国会委员会面前做过证。他是一个不羁的初级军官，早年间三次走上军事法庭时举止都十分轻浮。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在他获得莱文沃思部队的指挥权后，一切都变得不一样了。高大纤瘦、健壮风雅同时又在危难之中表现得坚毅冷静的他，无论是体力还是精力都无比充沛，因而也就成了备受尊崇的领导者。从那以后，大部分与他亲近的人都对他钦佩有加，有些人还将他与亚历山大大帝相提并论（甚至认为亚历山大与他相比应该屈居第二），或如同乔治·E. 斯特拉特迈耶那样，奉他为“最伟大的领导者，最伟大的指挥官，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英雄”。有关他超凡魅力的最有力证言也许来源于乔纳森·M. 温赖特。麦克阿瑟从菲律宾撤退之后，温赖特在战俘营中痛苦地挨过了四年的光阴。然而，重获自由后的温赖特却是这样评价麦克阿瑟的：“我愿意蒙上双眼跟随这个男——无论去哪里。”后来，他将自己的余生都投入到支持麦克阿瑟竞选总统的事业之中。

凡事都有例外。在某些人眼中，麦克阿瑟看上去似乎有些过于冷漠，在下属面前显得高高在上、无法亲近。“二战”时期曾在他手下任两栖部队指挥官的丹尼尔·E. 巴贝司令如此写道：“麦克阿瑟从来都没有办法与周围的人产生温暖、友爱的感觉。他们尊敬他，却无法同情他理解他或是喜爱他……他的言行和衣着都过于冷淡和端正。”科雷希多岛上的一名海岸炮兵军官史蒂夫·M. 梅尔尼克很厌恶这位将军，因为他总是“将自己包裹在用高贵的淡漠做成的大衣里”，并且“从未试图成为‘士兵中的一员’”。（菲利普·拉福莱特认为自己知道这其中的缘由——他表示，麦克阿瑟的头脑是“一件几近完美的机械装置中的一个杰出的零件”，大概只能“在阅读中获取快感”，因而永远也无法“在日常交际中遇

到与自己的智慧旗鼓相当的——就更别说比他更出色的人了”。）对这样的人来说，他是缺乏人性的。罗伯特·L.　艾克尔伯格曾在自己从前线寄给妻子的书信中这样冷嘲热讽地写道：“我们很难跟上麦克阿瑟的卫星，就像在木星光辉的遮蔽下很难看到它的卫星一样……就连神明也会有自己的弱点。”

然而这样的感觉实属罕见。实际上，艾克尔伯格对于自己这位长官的看法非常矛盾，时而幻灭，时而称羡，但最引人注意的是他在做出此番批判之后，竟然还能留任在这颗“木星”的麾下。待他成为星级上将之后（那时的他还只有30多岁），几乎所有留在他身边的人都对他盲目屈从起来，甚至开始奉承谄媚。敢于忤逆他的人为数不多，其中之一说道：“麦克阿瑟手下的人都不敢冒险让自己显得卓尔不群。”他们满足他的虚荣，逢迎他称王的幻想，并和他一样坚信有人在背后图谋暗算他。有些奉承他的人本身也是怪人。在“二战”时期，他的参谋长就认为美国应该由一位右翼的独裁者来统领，而他手下的一名情报人员则异常仰慕佛朗哥。麦克阿瑟1/3的下属都像检察官一样暗中监视着彼此，搜寻着离经叛道者的蛛丝马迹。据克莱尔·布思·卢斯回忆：“麦克阿瑟的性格缺陷就在于他的自负。他不仅要求别人顺从他的命令，而且还要求他们屈服于他的想法以及他本人。他显然很享受被作为偶像崇拜的那种感觉。”

另一方面，那些远离他司令部的人则对他的一切都表示不屑：他的宗教信仰，他的豪言壮语，甚至是他的帽子（喻指军衔）。他们怀疑他的真诚、他的动机和他的勇气，并坚信任何不利于他的言论，不管有多荒谬。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写就一本有关麦克阿瑟逸事的伪书。他们说，他涂口红、染头发，还会穿束身衣、戴假发。流言甚至传说他将自己第一任妻子的情夫淹死在了菲律宾的一个游泳池里，还在1942年逃离战火纷飞、满目疮痍的科雷希多岛时带上了自己的家具：一个冰箱和一个塞满了金币的床垫。就因为他是马尼拉酒店的主人，所以他下令禁止手下的炮兵轰炸酒店建筑。更有传闻说，他涉水登陆莱特岛的那张

照片是伪造的，而他还在军队牛奶匮乏的时期私自饲养了一头奶牛，并在荷兰迪亚（查亚普拉）挥霍百万美元修筑了一座宅邸。有关他的谣言似乎无穷无尽。那些曾在太平洋上奋战过或是对于任何话题都持怀疑态度的人似乎都能发誓这些故事中的一部分或是全部都属实，然而调查结果却证明其中没有一句实话。

他所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他并不是一个时髦的人。和他的远房表兄弟丘吉尔以及罗斯福一样，他是个因循守旧的人物，一个属于19世纪、会用高高在上的语气说话却从未学会用智慧与优雅的方式来掩盖自己热情的人。高尚的品德已经过时好一阵子了。“可叹，”卡莱尔写道，“往昔的英雄不得不将自己束缚在异乡：这个世界对他无所适从，所以异乡便成了他在这世上的归属。”平等主义直到20世纪中叶才成为西方社会津津乐道的话题。经历过“一战”和“二战”的老兵们对于麦克阿瑟的看法褒贬不一。步兵们都为自己曾在将军的麾下战斗而感到无比骄傲，而退伍军人则不然；20世纪40年代，反权威主义思想成为主流。麦克阿瑟浮夸的官报以及他对于军阶饰带与典礼仪式的热衷引来了整个太平洋军区恶意的嘲笑。相比之下，和他同时代的人反而对当时任其副官的艾森豪威尔的印象更加深刻——他那亲切的昵称，颇具感染力的露齿微笑以及如加油站服务员一般的束腰外衣。艾森豪威尔想要招人喜欢便可以得偿所愿，而麦克阿瑟需要被人尊敬却总是事与愿违。他没有昵称。就连他的妻子都称呼他为“将军”。20世纪30年代赴菲律宾任职的高级专员保罗·V. 麦克纳特曾经这样说过：“我会毫不犹豫地直呼奎松总统为‘曼努埃尔’，但永远也不会称呼将军为‘道格’。”如果有人胆敢这样做，得到的回应无疑会是一段冷言冷语。一位在他担任西点军校校长时曾在军校里学习的学员回忆道：“他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一个一踏进满是醉汉的房间里就能在五分钟之内吓得所有人都异常清醒的人。”不过，只有平等主义者才会对此表示鄙夷。约翰·冈瑟就对他的“高傲与正义感”印象深刻：“他是现代世界中少有的真正高高在上的人。”

麦克阿瑟心目中的英雄是林肯和华盛顿。在某些方面，他和他们也

有不少相似之处。和他们一样，他也遭到了诽谤和误解。林肯至今仍被错看。埃德蒙·威尔逊指出，这位在卡尔·桑德堡作品中永存的、所有美国人从小就熟知的内战人物，与那位冷酷无情地统治着美国的第16任独裁总统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麦克阿瑟好胜的坚定意志与林肯很像，而另一方面，他又更像华盛顿。人人都说，美国国父是一位傲慢自大的军官。戴维·米德就曾写到过麦克阿瑟缺乏“个人趣味”，“个性阴沉……冷淡、苛刻，秉性习惯更像是一位东方君主而不是一位共和党的将军”。阿克塞尔·费尔森伯爵说：“他看上去像是一位英雄，话很少，但很礼貌、很诚实，脸上总是笼罩着一层不太顺眼的悲伤的阴影。”和麦克阿瑟一样，华盛顿也带着妻子一起奔赴战场，丝毫不顾忌敌人的狙击手。华盛顿麾下的一员曾经这样写道：“在任何行动中，他都很少顾及自己的安危。”华盛顿和麦克阿瑟都如潘兴将军一样受人尊重，但又像罗伯特·李将军一样不被爱戴。

不过，要想找到可以与麦克阿瑟并驾齐驱之人，就必须放眼望向大西洋的彼岸——尽管这样做会让他感到恐惧。他与爱尔兰的另一位总督埃塞克斯伯爵一样自以为是、惹人注目，又和被查塔姆伯爵称为“上帝派来的将军”的普拉西的克莱武一样是位会使用深奥措辞的神秘演说家。也许杜兰特曾经用来形容拿破仑的一段话也同样适用于麦克阿瑟：“他的身上拥有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留下的所有特质：艺术家与战士，哲学家与独裁者；结合他的天资与意志，这些特质迅速渗透进了他的思维，直截了当、势不可当地体现在了他的行动中，欲罢不能……托克维尔说得好：他是一个没有美德的伟人，一个毫不谦逊的智者。”然而，最重要的是，麦克阿瑟就像尤利乌斯·恺撒一样：大胆、超然、苛刻、自私而又任性。这两位将军的身边都围绕着卑躬屈膝的副官；长期驻守异乡，一个是地方总督，一个是远征大将军，麾下聚集着前所未有的一派随从；他们都喜欢历史，做人极其浮夸卖弄，却又无畏无惧，统领军队时便成了恪守王道的独裁君主。

他们也都拥有一流的头脑。20世纪最后25年中的通达之人多蔑视军

事人才，但只有伟大的领袖才是才华卓越之人，而被人们广为认可。歌德认为，拿破仑的头脑是世界上最杰出的，阿克顿勋爵对此表示赞同。在那个年代，战士的地位比现在要高。沃尔特·惠特曼这样写道：“难道你不知道不朽的诗人，只吟唱唯一的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就是战争，战斗中的命运，完美战士们的成长。”在他所生活的那个年代里，波拿巴的分析天赋和他不寻常的记忆力曾被认为是他超凡脑力的象征。麦克阿瑟与之功力悉敌。和《拿破仑法典》的创作者一样，这个书写了日本宪法的人显然也是个奇才。麦克阿瑟在历史和法律方面的知识令人惊叹，而且他从来都是过目不忘。一次，他甚至和一位47年未见的访客追忆起了当年一起看过的拳击比赛的每一个细节。1950年，他与约翰·冈瑟见面时还重新拾起了两人在1938年最后一次见面时中断的话题。他了解自己在战场上面对的每一支日本部队：20世纪30年代在中国战场上这支部队曾在哪里作战，日本入侵马来半岛时它又曾充当过什么角色，它的指挥官声誉如何以及它的士气风纪评价怎样。1945年，在一次针对本州岛的进攻部署会议上，一位简报员提到在某片海滩附近行船是十分危险的。“没错。”将军说道，“我还记得1905年父亲带我去日本时曾经到过那里。”接着，他还流畅地讲出了那里的潮汐细节。一位满腹怀疑的军官核实了当时的情况，发现他提到的所有细节几乎都是正确的。

哈里·杜鲁门称麦克阿瑟为“冒牌货”，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在听了他有关威廉·詹宁斯·布赖恩的演讲之后都认为他是个拙劣的演员。事实的确如此。除了偶然几次颇具丘吉尔雄辩之风的演讲之外，他平日里口才平平，似乎在进行两人对话时更为高效。然而，那些因为他的措辞而认为他肤浅的人就大错特错了。因为那些人没能透过他的外在伪装看到他的内在本质。如果你向那些人提问就会发觉，他们大多对于他装腔作势的言行举止感到十分厌恶。不可否认，他有着西拉诺式的天赋，能够把握观众们的脉搏；华丽的帽子、墨镜和玉米烟斗都是他的道具；而且他也知道该如何利用自己的侧脸、双手和洪亮的声音。人们几乎找不到任

何一张有关他的不造作的照片。和大卫王、亚历山大大帝以及圣女贞德一样（事实上，和历史上所有不朽的领导者一样），他永远都在演出。

然而，麦克阿瑟的戏剧化作风也有恼人之处。或许没有哪个总指挥官会像他一样如此享受聚光灯与掌声。总之，他是自负的。和其他自负的生物一样，他相信自己的欲望实际上是无私的。有人问过他，最让他坚信不疑的是什么。他厉声回答了一句："保卫美国。"某些精明的观察家听信了他的话。文森特·希恩如此写道："我从与他的对话中得出了结论，毫不动摇的爱国精神就是他性格的关键。"然而，这并非其中最主要的元素。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坚信不疑的其实就是他自己。他甚至比纳尔逊勋爵还喜欢追逐荣誉（勋爵本人在这一方面可谓开诚布公）。然而，将军对此却只承认过一次。1935年，在"彩虹师"的一次聚会上，他在发言中引用了狄奥尼西奥斯的一句话："这是全人类共有的自然法则，就算是时间也不得将它废除和破坏：相比那些弱者，拥有更强大力量与权力的人应该占领统治地位。"他拥有力量与权力，他就应该统治别人，并且期待他们的供奉，否则便会愤怒不已。马歇尔形容他"对于任何东西都过度敏感"，肯尼迪则评论他"对于批评尤为敏感"。对于阿谀奉承的渴望就是他最大的缺陷。而在他的其他缺陷之中，要数虚伪和过分乐观这两点最为显著。由于坚信自己就是可以支配命运的人，他屡次在战斗胜利之前就下达了"肃清残敌"的行动命令。就像威灵顿形容小皮特时所说的那样，他"太过于乐观……在构思好一项计划之后就想象出了它完成时的样子"。然而，也正是他这份显而易见的自爱以及彻底缺乏人性的特质在他的内心留下了一道深深的裂隙。这道裂隙越裂越大，并最终摧毁了他。

对于张扬的卫道者，人们的态度总是反复无常。在埃斯库罗斯的戏剧中，狂妄自大往往是那些在劫难逃的角色身上最经典的缺陷，而在亚里士多德的理想人格中，傲慢不逊却是其中最基本的元素。中世纪基督教教义将自傲列为七宗不可饶恕的罪行之首，但骑士精神若不属于自傲便一无是处了。麦克阿瑟的骄傲在治理日本时可谓是他巨大的财富。从

某种程度上来说，他与他的臣民之间的关系是一种虐待与被虐的情调：一部分日本人想要尝试一下被他这种人鞭打的感觉，就像他有时候也很享受手握皮鞭的感觉一样。不过，他的极端利己主义反倒毒害了他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关系。在他一手制造战场上一环扣一环的事件的同时，他也葬送了自己。如同真实的悲剧中必需的情节那样，神明总是要让受害者自掘坟墓。希腊人对麦克阿瑟的理解似乎比他对狄奥尼西奥斯的认识更为深刻。

人们也会理解和麦克阿瑟一样忠于自己主角地位的杜鲁门。在两人充满戏剧性的对抗落下帷幕之后，麦克阿瑟宠爱尽失。杜鲁门之所以名誉受损，是因为另一项不可饶恕的罪行：愤怒。除了公开羞辱麦克阿瑟将军之外，1952年11月4日，他心中那贪婪的复仇之神还让他将怒火发泄在了大选的继任者身上。除了这段针锋相对的往事，两人还代表联合国怀疑彼此对这个刚刚成立不久的国际组织（而不是对美国）的忠诚度。他们都认为，在全球各民族迁移愈演愈烈的境况下，爱国主义的美德并没有变得越来越狭隘，也没有堕落和消失的趋势。汤因比认为，单一民族国家的概念从19世纪70年代起就已经开始产生了变化。那时候，杜鲁门和麦克阿瑟都还没有出生。在汤因比看来，民族主义是“装在部落意识的瓶子里发酵民主主义新酒的酸酵素”。朝鲜战争以来，人类已经慢慢变得节制了不少。比方说，德国人变得不再那么具有日耳曼特色，英国人也不再那么坚守不列颠个性，而法国人也不再那么维护高卢情怀——沙文主义行将灭亡，只有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仍将其视为不成熟的象征。

朝鲜一役跨越了两个不同的时代，当时令人感到高深莫测，事后很长时间才被人理解。20世纪50年代初，这场战争的结果被视为是集体安全的胜利。奥马尔·布莱德雷向一个参议院委员会保证，朝鲜一役意味着同盟国将参与美军在未来插手的任何一场亚洲地面战争。事实上（麦克阿瑟早就看到了这一点），这场战役是传统联合作战的一场冒险，而美军则是这个联盟的主导者。躺在沃尔特·里德陆军医疗中心的病床

上，将军还曾恳请林登·约翰逊不要介入越南战场。

那是他最后一次为公务发声。他已经生活和战斗过了。正如H·H.弗罗斯特的名言所说的那样："在战场上，一切错误都是可以被原谅的，除了止步不前和拒绝冒险。"但他只需看上一眼便能分辨出什么样的风险是凶多吉少的。从他童年时期住过的边境要塞算起，他已经走了太远。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的整个人生就是军队之间战乱冲突的轨迹，而他从军的经历则概括了美军的发展历程。在他还是个襁褓婴儿时，印第安人就背着弓箭袭击过他父亲的部队；在他步入晚年之后（当他提议停战时），超级大国则在用核武器耀武扬威。他觉察到即将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于是选择了与时俱进，因为即便他不是同行中脾气最暴躁的一个，也应该是最睿智的一个。不过我们对他的评判还不止如此。他不仅仅是一个士兵。从一些民间传说来看，他为美国人展示了一个佼佼者的生活应该是什么样的，并为荣誉、无畏和理想主义这些概念灌注了新的意义。正如很多人奋战过的"绿色地狱"（热带雨林）上空的南十字星座一样，他肩上的五星勋章所见证的伟绩足以让他那些卑劣自私的缺点都变得无关紧要。在最好的年华里，他为我们描述了一段跨越了整个世纪的传奇，而那才是他应该被我们铭记的模样。这段传奇开篇于血雨腥风的1863年，萌芽在田纳西州一座战火纷飞的山坡上。17年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第一次睁眼看到这个世界，开始了他在军旗下征战的84个年头——从崛起的起床号到葬礼的安息号。

序幕
集合预备号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俯瞰着查塔努加市的传教士山景色平淡无奇。尽管地平线上宽广的新月形山峰足够壮阔，从山脊上眺望这座城市却让人感觉一成不变、了无生气。被污染的田纳西河河道呆滞地蜿蜒流淌在市中心区域，河面上横亘着一座又一座大桥。调车机车在铁路调车场来回穿梭，切断一节节车厢，再将它们连接到机车上。查塔努加市是重要的工业中心，高大的烟囱全都吐着浓烟；站在弯曲的山脊上，你能够看到高耸入云的国际青年商会大厦、桂格燕麦和中心大豆的制造厂、三家银行、一家为核反应系统制造电子零件的工厂以及众多丑陋的水塔。放眼下望，视野所及的居民区全都破旧不堪，因为那些有钱购置豪宅的人全都将自己的家安在了包括传教士山在内的高地上。尽管被六车道的75号州际公路一分为二，那里仍算得上是一片平静宜居的区域。

1863年11月24日星期二那个下着毛毛雨的晚上，这里的景致却截然不同。那时的传教士山还是一片乱石岗，山上粗壮的葡萄藤、松树和橡树都归属布拉克斯顿·布雷格麾下兵力超过46 165人的南军田纳西军团所

有。一连串头戴军便帽、身穿灰色军服的士兵从山顶上走过；在两排兵将的守卫下，几门青铜大炮对准了正在山下扎营、兵力为59 359人的北军坎伯兰军团。尽管北军由林肯最出色的将军（格兰特、谢尔曼、谢里登、胡克、托马斯）率领，但仍陷入了敌人的包围圈，似乎只能任由布雷格宰割。在饥饿的威胁下，受困军队因粮草不足失去了许多马匹，因而也就无力采取反击。心灰意冷的格兰特所能做的也只是命令自己的士兵第二天一早前去“试探”南军的位置。

午夜时分，天气放晴，明月当空，预示着黎明的光辉即将照亮星期三的清晨。谢尔曼调兵遣将，最终止步于布雷格军队右翼的山涧之中。进攻受阻的谢尔曼要求在别处采取战略佯动以缓解自己的部队所面临的压力。唯一没有参战的一支北军部队一早便隐蔽在城中的矮防护墙内，等待行动命令。下午3点30分，格兰特传令命他们从查塔努加出发，采取线形进攻的方式攻占南军设于山脊之上的总部步兵射击掩体——布雷格防御阵地的核心。而接受这次任务部署的分队之一就是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来自密尔沃基、年仅18岁的副官阿瑟·麦克阿瑟恰好就在这支部队中服役。

下午4点15分，部队整装待发。4点20分，信号枪响起，六门大炮以每两秒钟一发的速度开火——进攻开始了。这本来不过是一次佯攻，目的是分散与谢尔曼部队正面迎战的敌军火力。然而，战局的迅速扭转使得他们不得不单独应战；在武力夺取射击掩体之后，战场上出现了事后被詹姆斯·M. 梅里尔称为“整个内战中最富戏剧性的一场战役”中的一幕。盘踞在悬崖上的敌军总部战势越发严峻。暴露在山上敌人的枪口之下，佯攻部队陷入了困境，情况之紧急令部队指挥官也感到始料未及。此时合理的应对措施应该是立即撤离；毕竟他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相反，部队却继续向前挺进。据说，菲利普·谢里登当场喝光了一瓶半品脱[注]的威士忌酒，用力将酒瓶丢向了山坡，嘴里还大喊着“就是这样！”，然后奋力向山上爬去。还有人说，他摘下了自己的帽子，示意自己的部下向前冲锋。不过，当一位参谋爬上山脊看清眼前到底发生

了什么时，谢里登却说自己什么也没有做，是有人误解了他。事实上，展现在他们面前的是一场气势恢宏的反攻局面：18 000名身穿蓝色军装的北军步兵奋起直追，主动反扑上了高地。

望着北军步兵的白色战线向前挺进，站在果园小丘上的格兰特系上马鞍、恼羞成怒地问道："托马斯，是谁下令让这些人攻上山顶的？"托马斯表示自己并不知情，他当然不知道了。紧接着，格兰特又转过来质问戈登·格兰杰将军："是你下令让他们上去的吗？"格兰杰答道："不，他们没有接到指令就自行发起了进攻。"怒火攻心的格兰特喃喃自语道："如果结果是好的，我就不追究了。"

那时，山脊上已经升起了60面北军的战旗，其中就有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的旗帜。与此同时，山峰上的南军守军正面临被屠杀的局面。一名被炮弹炸断了一条腿、坐在裸露的岩石上的北军号手直到昏厥前还在吹奏着冲锋号，而另一个步兵团则先后丧失了6名旗手。第24步兵团中的第一名旗手在刺刀下丢掉了自己的性命；第二名旗手则被飞来的炮弹炸断了头颅；紧接着，年轻的麦克阿瑟抓住旗杆一跃向前，口中大喊着："冲啊，威斯康星！"他的脸庞被战火熏得黝黑，破烂不堪的污浊军装上沾满了血迹。他站到悬崖上并将战旗插在了山巅上，整个步兵团都能够看到他那映衬在天空中的剪影。与此同时，另一批攻上山顶的蓝装北军部队也赶来与他们会合，从而取得了战役的胜利，为谢尔曼的部队攻入佐治亚州扫清了障碍。参战的所有士兵都得到了奖赏；然而，就像卡尔·冯·鲍姆巴赫少校事后所说的那样："我确信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是第一个将战旗插上山顶的。"这一壮举主要归功于一个年轻人。麦克阿瑟的指挥官在自己的报告中是这样描述他的："我认为，没有人会否认他战场上的壮举在本团的众多英勇之士中是最出类拔萃的。他值得获得最高的奖赏。"

如今，在距离75号州际公路几百英尺[注]、与布雷格当年的驻军总部相隔仅65英尺的地方依旧矗立着一块不起眼的石碑，上面铭刻着这片土

地上曾经发生过的一段往事：

威斯康星

第24步兵团

第2师

第4战队

1863年11月25日

下午5点

5点刚过，谢尔曼便来到了现场。一个世纪以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回忆起这段故事时提到，将军拥抱了这位年仅十几岁的副官，然后用沙哑的嗓音对同伴说道："照顾好他。他刚刚为自己赢得了荣誉勋章。"不过，即便此话当真，也只不过是一纸空头支票，因为这枚奖章在各种繁文缛节的搁置之下直到27年之后才被送到他的手中。尽管如此，一切都是值得的。这个男孩的勇气是发自内心的，而那次冲锋也不是他在战争年代里唯一的英勇表现。早在内战刚刚爆发时，年仅17岁的阿瑟就曾第一时间想要报名参军。作为麦克阿瑟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一位法官，因而他觉得自己理应投身战场。阿瑟的父亲给林肯写了一封信，要求将儿子派往西点军校。就这样，年轻的阿瑟被参议员詹姆斯·R. 杜立特尔带进了白宫。在那里，总统遗憾地告诉他，西点军校里目前没有空缺的学员名额。于是这位法官又灵活运用自己在密尔沃基的政治手腕，于1862年8月4日将阿瑟安排到这支后来被他统领的部队中任中尉和副官。

阿瑟的仕途一开始时并不顺利。这个脸色苍白的小个子男孩在第一次列队时便三番两次地暴露了自己公鸡般的嗓音，因而很快就被冠以"小副官"的称谓。他的指挥官对此感到十分愤怒，吼叫着说道："我要给州长写信，让他给我派一个男子汉副官过来，而不是一个小男

孩！”然而，上了战场的他简直就是判若两人。在佩里维尔，谢里登为了奖赏他的英勇作为，将他晋升为名誉上尉。在给第24步兵团带来严峻考验的默夫里斯伯勒，伊莱沙·C. 希巴德少校在报告中称阿瑟“很快把握了战局，是视野内唯一一个冲锋陷阵的军官。坐镇指挥时，他能够冷静地下达指令、审时度势，在恐慌情绪抬头时重振军心，将部队团结起来”。紧接着就是传教士山一役。战后，埃德温·B. 帕森斯上尉在给这位副官的父亲写信时提到：“阿瑟很杰出。他似乎无畏无惧，可以在丛林中与一群老虎搏斗。他已经成了部队中的英雄。正如你所知道的，现在的军官空缺候补人选都是大家投票选举出来的，而阿瑟在全票通过的情况下被晋升为少校。”

在肯纳索山，阿瑟开展的战前侦察工作得到了A. L. 瓦格纳上校的赏识。上校称他的工作完成得“很出彩”，打破了“特种侦察任务中总是损失惨重的通则”。阿瑟在那场战斗中先后两次受伤（另一位受伤的是安布罗斯·比尔斯中尉），但他第二周便返回了战场。在跟随谢尔曼征战亚特兰大的4个月中，这位年轻的少校参与了13场战役。在佐治亚州的首府沦陷之后，谢尔曼派遣第24步兵团参加了富兰克林战役。尽管麦克阿瑟少校在那里又两度受伤，但据他的准将写给战争部部长埃德温·M. 斯坦顿的信的内容显示，他“表现得很英勇……展现出了无畏无惧的精神”。步兵团的指挥官（某高级军官）也在报告中提到：“史上很少有人敢说某一支部队能够扭转战局。但在富兰克林一役中，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在没有上级命令的情况下，用一系列的自发行动击退了敌军，整顿了我们的战线。而这支英勇之师的领导者就是……阿瑟·麦克阿瑟。”为了表彰他在“富兰克林战役、田纳西州战役和亚特兰大战役之中的勇敢表现以及卓越战功”，他再一次被晋升，这一次荣获上校军衔。19岁的阿瑟成了北军中最年轻的上校级军官。从此以后，“娃娃上校”的名声便传遍了整个威斯康星州。

即便身处动荡年代，阿瑟的经历也应该算得上是超凡脱俗。不过这其中最重要的历史意义还是在于他从中吸取的那些教训。战争结束之

后，阿瑟仍把站上高地、俯瞰查塔努加的那40分钟当作是自己最主要的成就——无视军令。后来，在向爱子道格拉斯讲述这段经历时，他是这样总结其中的寓意的：有时候，一位真正出色的士兵必须另辟蹊径，违背上级命令，以追求更大的荣誉。

这位“娃娃上校”的全名其实是小阿瑟·麦克阿瑟。话说回来，这个家庭的成员的教名着实让人感到有些困惑。阿瑟三世的儿子是出任外交官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而阿瑟四世则是家族中第一位道格拉斯的儿子，也就是这个家族赫赫有名的麦克阿瑟将军的儿子。换种方法来说，这个家族中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祖父、父亲、兄弟以及儿子的教名都叫作阿瑟。麦克阿瑟家族的这支血脉十分受人尊敬——某苏格兰格言就曾提到，“没有什么能比山脉、麦克阿瑟家族和魔鬼更加古老”。这个家族目前的这个分支应该是1825年开始落地生根的。那一年，家族中第一位名叫阿瑟的10岁男孩跟随寡居的母亲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奇科皮瀑布。他原本出生在雾霭弥漫的格拉斯哥，移居之后便将有关自己家族的那些神秘苏格兰传说抛在了身后，但其中的一些内容还是流传至今。

一种说法认为，作为不列颠人，麦克阿瑟家族是阿瑟王传奇中的一部分，起源自公元6世纪。他们虽然没有称王也没有出任过圆桌骑士，但曾率领基督教战士抵挡过撒克逊人的入侵。另一则民间故事将他们的家族历史追溯到了另一位阿瑟的身上，也就是阿盖尔的埃丹·麦克格拉布汉国王和他的王后（中世纪凯尔特斯特拉斯克莱德王国的公主）之子身上。这就将麦克阿瑟家族的起源归结为公元8~9世纪之间。与之相反，第三种最不可信的传言则将查理曼大帝视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祖先。

这些自然都是虚构的故事，但几块半掩在泥土中的石碑确实记载了类似的故事。碑文上祭奠的是在公元11~12世纪之间死于十字军中的麦

克阿瑟族人。众所周知，一部分族人后来返回了苏格兰，因为麦克阿瑟家族在13世纪时曾拥有老贾默兰伯爵留下的大片领土。直到如今，他们仍然保留着一款由绿色阴影和细窄的黄色条纹组合而成的苏格兰花呢格纹团、一块盘绕着野生桃金娘枝叶的徽章、一句纹章箴言“Fide et Opera”（信仰与勤奋），以及一句在苏格兰歌曲中常听到的战斗口号“Eisd O Eisd”（听啊，哦，听啊）：

> 哦，他们在奥湖岸边吹奏着风笛，从克鲁阿乔山上传来的声音呼喊着奥湖的领主；“最崇高的麦克阿瑟，野生桃金娘闪光的地方，来吧，系上佩剑腰带，听啊，哦，听啊！”

奥湖岸边是麦克阿瑟家族在跟随十字军东征的年代里居住的大本营。起初，这是个欣欣向荣的大家庭。作为罗伯特·布鲁斯的盟友，他们的领主在13~14世纪一直高居大坎贝尔家族的首领地位，相比其敌对势力阿盖尔人处于支配地位。1427年，麦克阿瑟家族的好运耗尽，麾下管理着1 000名族人的约翰·麦克阿瑟被苏格兰国王詹姆士一世认定为忤逆之徒，在被召至因弗内斯后遭人斩首。阿盖尔人夺取了坎贝尔的首领地位。约翰死后，悲痛欲绝的族人只得移居到了43英里[注]之外的格拉斯哥，而其中一些心灰意冷的族人最终移居去了美国。尽管如此，如果血统真的能够代表什么的话，那么麦克阿瑟一族可谓是血统优良。它推动了新大陆的发展：来自马萨诸塞州汤顿的萨拉·巴尼·贝尔彻不仅是“娃娃上校”的外曾祖母，还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温斯顿·丘吉尔以及富兰克林·D. 罗斯福的共同祖先——道格拉斯和丘吉尔是八代以内的堂表兄弟，和罗斯福则是六代之内的隔辈堂表兄弟。“二战”时期的三位伟大领袖就这样因为美国人的联姻而与彼此联系在了一起。

在奇科皮瀑布长大后，老阿瑟·麦克阿瑟考入了卫斯理大学和阿默斯特学院，后在纽约进修法律，并于1840年取得马萨诸塞州律师从业资格。1844年，他迎娶了萨拉·贝尔彻的孙女奥里莉亚；第二年6月，小阿

瑟出生在斯普林菲尔德。与此同时，老阿瑟的律师职业生涯也正在蒸蒸日上。他曾与丹尼尔·韦伯斯特以及鲁弗斯·乔特对簿公堂，做过汉普登县的公共行政官员和马萨诸塞州西部军区的军法检察官。在他的长子4岁那一年，他带着全家人搬去了密尔沃基，并于1851年当选了地方检察官。成为民主党的“明星”之后，他在40岁那一年被选为了威斯康星州副州长。那是一次不太规矩的选举，州长被判选举舞弊，而他作为副州长在麦迪逊州议会大厦中主持了5天大局——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晚年时回顾起祖父的这段经历时说道：“这可能是有史以来最短暂的州长任期。”不过，它依旧延续了麦克阿瑟家族一贯的极致作风。

说来倒也奇怪，选举丑闻并没有抹杀老阿瑟的光彩。在美国南北战争开战前4年，他当选了威斯康星州第二巡回法院的法官；葛底斯堡战役打响那一年，他又再次当选。罗伯特·李投降之后，安德鲁·约翰逊选派他于1868年率领美国代表团赴巴黎参加路易·拿破仑的博览会。普法战争爆发那一年，格兰特总统认命他为哥伦比亚特区最高法院的法官。就这样，他在首都任职18年，退休后仍是一位活跃的学者，去世之前出版了10本有关法律、语言学、历史、唯心论和教育的书籍，其中包括一本为苏格兰玛丽女王辩护的作品以及《英语传记》一书。除此之外，他还担任了法学院的评议员，并目睹了自己的次子弗兰克从哈佛大学毕业（1976年）、跟随他的脚步成为一名律师的过程。

在孙辈眼中，老阿瑟是个留着大胡子的英雄人物。“（他是）一个身材魁梧的英俊男人。”道格拉斯后来回忆道，“性情明朗温柔，总是有用不完的精力和出了名的冷幽默。我愿意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听他讲述那些奇闻逸事。”尽管他愿意聆听祖父口中的故事，却从没有这么做过；即便是未来的五星上将也会忘记自己族人古时候用过的作战口号，因而这位老人总是告诫自己这个早熟的孙子：“没必要的时候不要多言。”一次，他还给孙子提了一条建议。他们正在玩扑克（正是老法官教会这个孩子如何打牌的），道格拉斯把自己所有的赌注都押在了四张Q上面。放下手中的四张K后，他的祖父念叨了一句：“我亲爱的孩子，

生活中没有什么是确定的。一切都是相对的。”

除了在佛罗里达州洛克雷治的印第安河酒店过冬、在大西洋城度夏之外，老法官和奥里莉亚·麦克阿瑟一年中最忙碌的岁月都是在华盛顿N街1201号里度过的。在那里，尚未成年而又十分敏感的道格拉斯见过无数有权有势、身披大衣的人前来向祖父求教：实业家、教授、众议员、参议员、内阁成员、最高法院法官。镶嵌着桃红心木、铺着红色棱纹平布的墙壁环绕着闪亮的古旧银器、金子表链和高度抛光的黄铜家具；屋子里飘荡着昂贵香烟的气息和统治阶级充满自信的男中音；餐厅里铺设着洁净无瑕的亚麻布艺品，摆设着皮垫座椅；从蕨类盆栽和大理石桌旁经过的女子顶着精心梳理过的发型互相传递着雕花玻璃的白兰地醒酒器，看上去个个都气质高贵，身上穿着的华服也颇有《戈迪》杂志里的时尚风度。只要法官清一清嗓子，现场的来宾便会肃静下来。这时候这个男孩才明白这些坐在餐桌旁的高贵宾客们是如何对待麦克阿瑟家的主人的。1896年8月24日，望着大西洋城的海浪，依旧健在的老阿瑟教导自己的孙辈，尽管生命中的一切都是相对的，世代交替的家庭成员却是忠贞不变的。这也是老阿瑟希望这些孩子在童年时期从他的“娃娃上校”儿子这个榜样身上学到的经验，只不过那时候的“娃娃上校”早就不是一个娃娃，也不再只是上校了。

老法官去世20年之后，道格拉斯的兄弟阿瑟三世给父亲同侪的女儿写了一封信：“他面对万事都无所畏惧，在宏伟的革命史诗中尽职尽责演出，永远都是足以让你自豪的那个人。对我们这一辈从他们身上获益的人来说，他们总是令人感到羡慕。”那是1916年，正值日德兰海战爆发。阿瑟三世已经成了美国海军的一位军官，而整个世界都在见证军事史上面临的最大挑战。然而，对于这封信的作者来说，1861~1865年的那段峥嵘岁月却仍是战争的典范，并被赋予不可名状的色彩与浪漫。毫无疑问，阿瑟三世心中的画面就是他父亲眼中当年反射出来的风景。

对于小阿瑟来说，阿波马托克斯代表了一段令人肝肠寸断的调整期。1865年6月，他率领英勇的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余部返回了密尔沃基市区，并试图安定下来研读法律。但他无法平静。和平对他来说是枯燥乏味的。8个月之后，他又套上了蓝色的粗绒布制服——这一次是出任常规陆军的少尉。他很快便晋升为中尉，并于1866年7月28日接受了上尉的头衔。然而，接下来的23年对他来说却十分恼人，因为他一直都无法超越内战时期的晋升记录，而他的敌人也早就不是与他旗鼓相当、训练有素的南方劲敌了。一个世纪之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在回顾这段故事时提到，他“忙于将印第安人推向干旱的西南深处，把白人的法律和秩序引入西部边界”。

在粉饰太平的年代里，军队的作用便是充当专业警队，解决牛羊牧场主之间有关放牧地的争端，保护移民免受心怀怨恨的纳瓦霍人、普韦布洛人、波尼人、克劳人、黑脚族人、切延内人、科曼奇人和阿帕切人的骚扰。在糟糕的年代里，军队还参与了19世纪的殖民战争，与那些入侵亚非地区、谋求扩张疆域的欧洲人没什么两样。那是卡斯特将军、比利小子、野姑娘杰恩、野牛比尔和野蛮的比尔·希科克的年代。尽管小阿瑟与后两者相识，但那段岁月并没有大量的民间英雄传奇中所描绘的那样精彩：就连弗雷德里克·雷明顿的作品也曲解了当时的真相。在格兰特大将军（至1869年）、谢尔曼将军（至1883年）、谢里登将军（至1888年）的带领下，军队每年都要与印第安人交战至少30回合，但所有要塞的作用都很消极被动，战功也无人赞颂。就像威廉·A. 加诺在《美国军队史》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东部的军队“无处可寻、默默无名、不得人心，即便是最普通的募兵也征召不到人手……而国家也很少关心密西西比河对岸的那些军队是如何徒劳地试图抑制和镇压屠杀与掠夺的不祥声音的”。正如我们看到，1880年11月出版的《拉斯韦加斯公报》上刊出题为“新墨西哥多年来已成为亡命之徒的避难所”的文章，内容讲述了“我们与杀人犯、银行抢劫犯、造假贩子以及盘踞在邮局和仓库平台上的逃犯做斗争”的故事。这对于军官们年幼的儿子们来说也许是极大的乐趣，但对于他们满怀雄心壮志的父亲们来说是莫大的挫折。战争

刚刚结束后的那几年中，除了在军事法庭短暂任职之外，麦克阿瑟上尉大部分时间都待在被人迹罕至的大平原或落基山脉分割开来的长满山艾的寂寥军队驻地中，驻守着一个又一个偏远的居民区，温格特堡、罗林斯堡、桑德斯堡、布里杰堡、卡尼堡、赛尔登堡、斯坦博、弗雷德斯蒂尔堡、布利斯堡和罗宾逊。当金色的尖头火车沿着满载盛誉的银色铁轨穿过犹他州的海角点，将联合太平洋和中央太平洋两家铁路公司的线路连通之际，麦克阿瑟上尉就驻守在布里杰堡以东几英里的地方，但并没有目睹庆典的盛况。杰罗尼莫率领奇里卡华的阿帕切人在距离赛尔登堡不远的地方为非作歹，但麦克阿瑟率领的第13步兵团K连并没有在镇压行动中充当主要角色。他从未踏足过弗吉尼亚城、戴德伍德和汤姆斯通的任何一家舞厅。他幸运地看过一场讲述大峡谷探险的幻灯表演，也曾渴望回顾在密尔沃基研读法律时的那份兴奋。1889年，拓荒前线的消失引发了美国其他地区的哀叹。尽管阿瑟也为此而感到悲哀，却没有把情绪写在脸上。

我们想象他居住在一间两居室的平顶土坯房中，脚下是光秃秃的黏土硬地。身边只有一扇方形的窗户、一张床和一张用厚木板支成的桌子。烛光是屋子里入夜后的唯一光源。白天，阳光无情地炙烤着这里，有指挥官的住处才有带顶的门廊。练兵场的另一边是士兵们居住的一长串单层营房。除了日常检阅之外，定期还会安排横笛手和军鼓手在尘土飞扬中带领纵队行军。偶尔会有骑着车的邮差送来书信，或是有骑兵在这里歇脚，检查维护自己的皮带扣、打包带、水壶以及克拉格来复枪。总之，他们每天主要的任务就是静养，日子过得平淡无奇。在规模较大的驻军军营中，军官们会佩戴肩章、携带佩剑；野战军乐队队员的制服是白色的灯笼裤、鹿皮手套和深蓝色的束腰外衣；巨型的黄铜色榴弹炮被当作日落时鸣放的礼炮。这里只有孤独的号兵和托着12磅[注]重炮弹的陈旧炮架。鸣炮，敬礼，降旗，紧接着便是熄灯号响起之前那段黑暗而又漫长的时光。

他是如何挨过这样的日子的呢？他酗酒——他们都是酒鬼，大喝特

喝，一直喝到起床号响起。他吃得也不少，毕竟粮食补给是足够的。那些年，大平原上共有上千只水牛被宰杀，而冷饼干、冰培根和灌装杏子也从不会缺货。阿瑟发福了。（他还留起了小胡子，19世纪末，戴上夹鼻眼镜的他看上去和年轻的西奥多·罗斯福离奇地相似。）军官们的妻子到访时，她们还会劝诱那些男人玩模仿的游戏、组织大家唱歌（《伴着月光的夜晚》和《哦，金色的拖鞋》是最受欢迎的曲子），或是玩“活人静画”的游戏，让参与游戏的人以雕塑群的模式来模仿例如约翰·罗杰斯批量制作的石膏作品《士兵的归来》和《受伤的侦察兵》里的场景，抑或是召集精通牌技的中士过来打牌。不过，大部分时间里，卫戍部队的军官都得自己想办法取乐。这对于阿瑟来说是相当重要的。他虽不像圣菲的卢·华莱士少将那样富有创意，能够利用这些年的光阴写出《公正的上帝》《宾虚》和《印度王子》等作品，但他是个很爱读书的人，常派人为他一箱一箱地取书。他并不像是在消遣度日。拓荒前线消失一年之后，陆军副官长办公室里收录的一份勤务评定报告书显示，麦克阿瑟致力于“钻研政治经济学”，研习“美国历史中的殖民和革命时期”，“比较美英两国宪法”，还“对中国的文化和体系进行了广泛的调查”。除此之外，他还研读了吉本、麦考莱、塞缪尔·约翰逊、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亨利·凯里、白哲特、托马斯·莱斯利和威廉·杰文斯的作品。那年春天，他即将获得华盛顿国家法律学校的法律博士学位。尽管老法官阿瑟作为大学董事会里颇具影响力的董事将儿子置于不利的地位，但丝毫没有阻碍他获得卓越的自修成就。

要想理解阿瑟给儿子带来了怎样巨大的影响，了解他的知识范围和在拓荒前线多年与世隔绝的经历是至关重要的。后来，道格拉斯从父亲那里继承了4 000多册藏书，并通过父亲的言传身教和阅读那些藏书积累了惊人的词汇量。他熟读维多利亚时期的散文，热爱新奥古斯都时期的修辞方法，并且精通各种理论，唯一欠缺的就是与那个年代中心时事的直接接触。驻守西南的军官过着如隐士一般的生活。举个例子来说，除了执行过一次破坏罢工的短暂任务之外，阿瑟对于古尔德、菲斯克、

普尔曼罢工、秣市惨案、科克西失业请愿军以及标准石油公司一无所知。他甚至没有亲身体验过正在改变其他美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技术工业和技术革命产物：伊莱莎·奥的斯的电梯、乔治·普尔曼的卧铺车厢、乔治·威斯汀豪斯的气闸、艾伯特·波普的自行车、乔治·伊士曼的简易相机、本特利和奈特的电动有轨电车、克里斯托弗·肖尔斯的打字机和托马斯·爱迪生的白炽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与世隔绝的环境里，最熟悉的事物无非就是岗哨管辖区、公共马车、得克萨斯州骑警队、平板四轮马车和奇泽姆小道。如此单纯的氛围强化了理想的重要性，使得19世纪的美国人比现代的美国人更加看重理想。对于麦克阿瑟家的男孩来说，理想的地位是支配性和压倒性的。从他们的父亲身上，他们学会了如何为责任献身；而从他们信奉主教制度的母亲身上，他们学会了虔诚与热爱。这对父母都相信困难是一定会被击败的。和今时今日相比，这个理念在那个年代似乎更加实事求是。

阿瑟上尉比老法官阿瑟更加严于律己（老实说，他这个人甚是有几分妄自尊大），但偶尔也会随机应变。道格拉斯晚年时曾经回忆起这么一个故事。他的父亲在新奥尔良的一个军事法庭里工作时曾经遇到过一位棉花商人，对方想要通过收买他来租借军队的运输工具，好处包括摆在他书桌上的一大笔现金以及与一个精致的南方姑娘共度一夜春宵的机会。阿瑟把这些细节悉数记录在了发往华盛顿的电报里，还总结道："我将现金上交给了美国财政部，并要求立马离开这个岗位。他们已经快要接近我的价码了。"

他并没有屈从，却在下一次进城时爱上了22岁的美女玛丽·平克妮·哈迪（弗吉尼亚州诺福克一位棉花商人的女儿）。在驻守了鲍尔杰斯特堡8年之后，第13步兵团被派往了新奥尔良的杰克逊军营保护那些以权谋私的立法议员。这对恋人就相识于新奥尔良狂欢节的舞会上，尔后一年间一直通过书信传情，最终于1875年5月在新娘家位于诺福克伊丽莎

白河旁的宅邸河畔大厦举办了婚礼。新娘的两个毕业于弗吉尼亚军事学校的兄弟因为曾在罗伯特·李麾下作战而拒绝参加婚礼。

尽管“平克妮”·哈迪（大家都这么叫她）是个很有主见的姑娘，但是面对自己的新生活，她仍旧需要付出不屈不挠的勇气。她在成长的过程中做好了当一位贤妻良母的准备，却没有预料到自己会成为一名军人的妻子。除了美丽的外表之外，她身上最值得注意的成就便是精通交谊舞、刺绣、水彩绘画和陶瓷装饰，而这些技能对于她丈夫的几个职位来说都没有多大的用处。一次，他们还不得不坐着军用卡车长途跋涉300英里，穿越新墨西哥州的高原沙漠——挨过了8个酷热的白天和阴冷的夜晚。当阿瑟申请调任到一个安逸一些的驻地担任武官时，格兰特总统虽然满怀体恤之情，但还是对他解释道：“国会和报刊中总是有些病态敏感的人反对信任士兵，除非他们面对的是大炮和步枪。”平克妮每次生产时都会尽可能地返回河畔大厦。她的前两个儿子阿瑟三世和马尔科姆就是在那里出生的。在那个年代，母亲的生育环境与孩子的成长环境往往都比较恶劣：马尔科姆5岁那年便罹患风疹夭折了。1880年1月26日，她的第三个儿子在她打包准备返回弗吉尼亚的时候早产了。于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便出生在了K连当时驻扎在道奇堡（后来并入阿肯色州小石城）的军营里。他的出生地位于一个军官联排住宅中，原先是一座带塔楼的军械库，后被改建为两个家庭的住宅。平克妮的家乡当地报纸说这个孩子是“父母在外”的时候出生的，显然诺福克和任何军事驻地一样，只不过是个小地方而已。

如果平克妮后来的言行需要有人来帮她辩护的话（事实确实如此），我们就必须体谅她刚刚结婚那几年的艰辛。温格特堡和谢尔登堡这样对于男人们来说都算艰苦的驻地对于女人们来说简直就是蒙难之地。那里不仅炎热、落后，而且一到夏天便疾病横行，冬天则寒冷刺骨，还总是面临着被印第安人突袭的危险。这和她为自己，尤其是孩子们所设想的生活大相径庭。事实上，她之所以能够忍耐下来，也许正是出于她勇敢坚毅的品格，抑或有可能是受当时社会风纪的约束。很久以

后，一个认识平克妮很长时间的女子这样写道：“每当想起她，我的脑海中都会出现一条沙沙作响的白色平纹细布连衣裙和一道新墨西哥州的白色阳光，而这个让我永远也无法忘怀的充满活力的苗条女孩就站在画面的中间。”不过，这显然是一种颇具浪漫色彩的回忆，平纹细布不可能永远都是白色的。生活在那种条件下，她身上的活力也终有一天会消逝。充满绝望的十年过去了，她一直坚忍地辛勤工作着，眼看着自己的美貌慢慢逝去，皮肤也越来越粗糙。然而她的这位朋友在回忆起她的时候依旧将她比作一只“傲慢地抬着头、灵敏地滑翔着的年轻猎鹰”。

1885年秋，她那位不得志的丈夫终于迎来了仕途上的一丝微弱的希望之光。在结束了对谢尔登堡的例行检查之后，一位分部巡视员在提交给自己上司的报告中写道：“麦克阿瑟上尉出色的能力和积极的工作表现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番认可也帮助K连有了被调赴莱文沃思步兵和骑兵学校的机会。那里不仅为军官的家属们营建了相当不错的居住区，还为他们的孩子配备了老师。更重要的是，那里的司令官正是曾于23年前在默夫里斯伯勒战役中夸赞过上尉“冷静和镇定过人”的少将。至此，阿瑟有了一位身居高位的朋友。实际上，他还有一位这样的“朋友”——准备从法官席上退下来的麦克阿瑟法官已经决定亲自出马，干预儿子的仕途。

一天晚上，上尉心烦意乱地回到了家中。当平克妮问起出了什么事情时，他答道：“我刚刚被委派在下周的学会上主持讨论。”一脸疑惑的平克妮觉得这应该是一种荣誉，于是便追问讨论的主题是什么。“问题就在这儿。”他回答道，“主题是‘这个时代的精神是什么’。”尽管那一次会议的记录没能被保留下来，但19世纪80年的时代精神之一无非就是恬不知耻地利用政治门路。平克妮对此心知肚明，而她之所以永生难忘且一生坚信这条出路的原因之一便是因为它拯救了自己默默无闻地在军队中服役的丈夫。在他调赴莱文沃思堡的那些年中，麦克阿瑟法官一直都在默默恳求那些到访自己N街住宅的访客能够帮帮他的儿子，提拔他跟随军队监察长工作或是到副官长办公室去任职。终于，一份表彰上尉工

作能力的保密信函被寄到了莱文沃思堡。司令官在回信中提到，阿瑟"拥有勇敢的作风和上佳的品德，无疑是美国军队中最杰出的上尉……他既是一位学生，也是一位专家……没有不良嗜好；凡事都颇有节制，且十分谦虚。"法官索取了这封信的复印件，印制了一份引用了这篇报告的材料，并交由自己的朋友轮流阅读。1889年7月1日，阿瑟被晋升为上少校，并被派往华盛顿任助理副官长。

在首都生活了四年之后，一家人的幸福生活因为副官长写给麦克阿瑟少校的一封信而达到了高潮。信中这样写道："我希望告诉你，我很尊重你的工作……你的到来对于整个机关和整个军队来说都是一种幸运。你能够彻底而细致地完成交给你的每一项任务，提出的每一项建议也都十分中肯、不带任何偏见色彩或喜好，仅仅是为了军队的利益考虑。"阿瑟少校提出的建议之中，唯一一条遭到否决的便是要求将17岁的儿子阿瑟三世分配到西点军校去。然而，这件事情的结果却并不糟糕。在西点军校拒收阿瑟三世之后，位于安纳波利斯的海军军官学校录取了他。如今，这家人头顶上的天空似乎格外湛蓝。1893年秋，阿瑟少校又被调任去了圣安东尼奥的桑姆休斯敦堡，而那里正好是得克萨斯州分部下属最安逸的驻地。平克妮有了可供自己使唤的女佣，阿瑟少校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书房，而13岁的道格拉斯也得以进入军事学院学习。那时候，道格拉斯是留在父母身边的唯一一个孩子。在麦克阿瑟法官去世三个月前，阿瑟少校被晋升为了中校。1897年10月，如日中天的他又被派往了位于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负责达科他军区的工作。随着阿瑟三世和道格拉斯分别从海军学院和预科学校毕业，阿瑟和平克妮的家变得空荡荡的。如今，这位刚刚晋升为中校的52岁灰发军官已经准备好了要迎接新的挑战。6个月后，美西战争的爆发时机对他来说简直是再合适不过了。

在回绝了小儿子贸然报名参军的提议之后，阿瑟中校的第一个想法就是，自己还是有可能晋升为朝思暮想了33年的上校军衔的。当这一天真的到来时，他直接跳过上校军衔，成为一名准将。1898年6月1日，他

收到了从华盛顿发来的一封电报："经批准，总统和战争部部长已签字派遣你赴旧金山梅里特将军处报到，执行远征菲律宾的任务。"阿瑟读了一遍又一遍，心中感到无比的困惑。他本以为自己会被派去领导驻古巴的军队，而且他甚至都不知道菲律宾在哪里。一万英里之外，杜威准将在马尼拉湾一役中的完胜以及已然开战的局面在他看来似乎毫不关己。阿瑟叫来了自己的勤务兵，要了一张地图。

1898年7月，古巴被攻陷。8月4日，麦克阿瑟准将率领4 800名志愿兵在马尼拉南部港市甲米地登陆。他们是韦斯利·梅里特少将指挥的1.1万远征军的前锋部队。在盟友埃米利奥·阿奎纳多率领的菲律宾起义军的帮助下，美军很快便包围了首都。9天后，西班牙海军上校投降——美军伤亡情况仅为13死57伤——梅里特表彰了部队的"出色"表现和准将的"勇气和杰出判断力"。后来，他还任命阿瑟为宪兵司令和马尼拉军事总督。麦克阿瑟家族的这位勇士带着无比骄傲的心情接受了这个任命。而曾在"雎狐"号炮舰上征战圣地亚哥的海军少尉阿瑟三世如今也被派驻在吕宋岛附近的一艘军舰上。

马尼拉的新总督上任后的第一个举措便是宣布："美国军队誓用信念和荣誉捍卫这座城市以及它的居民、教堂、宗教信仰和各种私有财产。"当然，这其中故意没有提及菲律宾军队。来自美国的指挥官们已然发现自己正在参与一场奇怪的战争，因为他们的盟友其实也是他们的潜在敌人，而他们的敌人其实又是他们的半个盟友。被失败主义困扰的西班牙人只不过想要以最低限度的伤亡退出战争。西班牙海军上校的投降条件是，美国人必须在前任殖民长官离开之前防止起义军进入马尼拉。阿奎纳多听说之后很是生气，就连接收麦克阿瑟寄去恳请他保持耐心的书信时，态度也很冷淡。

那时，起义军已经趁西班牙人逃窜之际迅速占领了群岛上的多个要塞和城市。一位西班牙将军在指挥部队从三宝颜市撤退时被杀害，杜威

出动炮艇介入才阻止了进一步的屠杀。1898年12月10日，当西班牙和美国在巴黎签订和平条约时，阿奎纳多开始动员大家反抗解放他们的这群新来的外国佬。麦克阿瑟现在只好恳请他的新指挥官尤厄尔·S.　奥蒂斯少将采取宽容忍让的态度，但奥蒂斯坚称在起义军放下武器之前，双方没什么好商量的。一场“讨厌鬼”（当时的美军对自己的称呼）与“亚洲佬”（他们对于当地人的蔑称）之间更加血腥的全新战役已经剑拔弩张。

1899年2月4日，起义军进攻了马尼拉。如今已升任少将的麦克阿瑟打得他们节节败退。作为一名战地指挥官，他的战术堪称典范。他不仅在数十场激战中击退了起义军，还亲自带领下属冲锋陷阵，多次与死神擦肩而过。早春时节，他已经扫平了吕宋岛中央平原以南一半区域里的起义军，并成了家乡报纸上的英雄人物。那年夏天，阿奎纳多躲进了打拉省。麦克阿瑟与从林加延湾登陆的美军协同作战，于11月攻占了对方的大本营，并向坐镇马尼拉的奥蒂斯示意“所谓的菲律宾共和国已经被摧毁”。他建议对所有起义军实行大赦，且给每一位上缴来复枪的人发放30比索。奥蒂斯再一次忽视了他的提议，而阿奎纳多则逃往了一个名为巴丹的半岛。

奥蒂斯是个不受欢迎、优柔寡断的人。他在马尼拉的日子过得十分舒适，以至于拒绝离开驻地进行野外视察。一次，在接到奥蒂斯发来的模糊不清的指令时，麦克阿瑟甩掉自己的宽边毡帽大喊了一句：“奥蒂斯简直就是一个底朝天的火车头，车轮还在全速转动！”但麦克阿瑟本人也并非无人非议。他的副官伊诺克·H.　克劳德事后说道：“阿瑟·麦克阿瑟是我见过最招摇自负的男人，直到我遇到了他的儿子。”不过，阿瑟在面对战火时的勇气、从谢尔曼那里学来的进攻策略和绝妙的梯队进军方法——两个侧面交替前进——却为他赢得了尉官们的崇敬。除此之外，他在晋升和勋章授予方面也表现得十分慷慨。新近崛起的这一代军队领导人中很多都受过他的恩惠。也正是因为如此，他们在成长为将官之后便更容易对他儿子的抱负产生共鸣。世纪之交，佩顿·C.　马奇、查

尔斯·P. 萨默罗尔和弗雷德里克·芬斯顿等几位中尉以及约翰·J. 潘兴上尉被派往吕宋岛。让阿瑟最感兴趣的一位信号军中尉便是来自密尔沃基的“比利”·米切尔，因为他的父亲约翰·伦德拉姆·米切尔参议员曾在阿瑟的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中服过役。

1900年5月6日，奥蒂斯被解除职务，麦克阿瑟接任他的职位，同时还被授予菲律宾军事总督的头衔。战火依旧在蔓延。菲律宾人都是出色的游击战士——15万美军士兵花了28个月的时间才擒获阿奎纳多，而当麦克阿瑟提出赦免他时，却被他一口拒绝了。不过，富于想象力的麦克阿瑟还是完成了自己的任务。严酷的西班牙法典得到了修改，人身保护法被引入，关税制度也被组建起来。到处都在修建医院、学校和挖掘自流井。那些实行种族界限的美国军官及其配偶受到了谴责。阿奎纳多和他的副官曼努埃尔·L.　奎松和麦克阿瑟成了朋友。曼努埃尔是个年仅19岁的西班牙、马来混血儿。当初，麦克阿瑟亲自接受了他的投降。将军将菲律宾侦察兵编入了美军编制，还鼓励反游击的菲律宾人参军。他允许菲律宾社团进行集会，只要他们向他保证不会成为“反叛的中心”，并向香港一家名为“凯莉”的书店下了一份长期订单，订购所有关于“远东事务，尤其是殖民制度”的书籍。

然而一切都是徒劳。12月，阿瑟提出“明确执行战争法”，对帮助游击队的菲律宾人实行严厉的处罚。私下里，他开始相信自己面对的不只是山里的敌人，而是一整个全副武装的国家。早在一年前的秋天，他便给华盛顿寄去了一封邮件，在信中汇报了自己的看法。麦金莱总统对此表示怀疑，其中一部分原因便是顾问们向他保证菲律宾群岛渴望美国的引导，而另一部分原因则是麦克阿瑟那令人难以置信的行文。多年以来在驻扎前线岗哨过程中累计起来的词汇量如同满载华丽辞藻的冲天火箭般喷薄而出。在其中一段文章中，他告诫总统：“附着原则来源于民族同质性，会导致人们在一段时间内响应同族领导人的号召。”另一段中，将军还指责菲律宾人“强词夺理得令人发疯”。在总统看来，这句话若是被用在这个试图征服他们的男人身上似乎才算是恰到好处。

如此高调的言论所产生的效果是阿瑟始料未及的。麦金莱总统身边的人推断，如果岛上的居民已经被策反了，那么他们反对的对象应该就是美国军队。因此，马尼拉需要的是一个明智博学的军外人物，一个能够理解人民的渴望，同时还能将执政者的利益铭记在心的人。碰巧，菲律宾正好就有这样的一位地方总督。他前一年6月便以美国菲律宾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到达了马尼拉，今年9月还将加入群岛政府。拥有高达326磅体重的他很难被人忽视，而且大部分时间都在抱怨当地酷热的天气。这个即将成为阿瑟·麦克阿瑟少将劲敌的人就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

“菲律宾人的菲律宾。”塔夫脱如是说。他喜欢称当地人为他“棕色皮肤的小个子兄弟”。然而他并没有因此受到美军的爱戴，反倒被编排进了一首低俗的民谣之中。民谣这样形容：“他也许是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兄弟，但不是我的兄弟。”麦克阿瑟的心总是和自己的士兵在一起。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安抚菲律宾人。然而，每当读到美军的每日伤亡报告时，他却还是无法对那些罪魁祸首产生任何兄弟般的情谊。他不喜欢爱管闲事的外人，不仅查到了通讯员批判他管理工作的信件，还惊讶地发现原来麦金莱总统在委派塔夫脱时赋予他“违宪干预群岛军事总督”的特权。

这并不是他的第一反应。塔夫脱和他的同事们乘坐的“汉考克”号轮船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曾停靠在香港，并收到过麦克阿瑟的贺电：“（我们）向委员会致以亲切的问候和热情的欢迎。”而“汉考克”号停靠马尼拉海港时，一切便早有预兆：麦克阿瑟并没有亲自前去迎接这些专员，而是派一位军官乘汽艇前去，最后才在被称为“菲律宾白宫”的马拉卡南宫接见了他们。这位军外人士注意到将军的手如同“坠着的冰柱”一般，以至于自己的手也一时间停止了流汗。尽管如此，这位来自俄亥俄的和蔼可亲的法官还是愿意忽略这一小小的怠慢的。他觉得接待自己的这位主人是个“亲切的人，十分沉默寡言”。在写给自己兄弟的信

中，他还提到：“我觉得他会是个令人满意的合作伙伴。”

慢慢地，塔夫脱开始重新考量自己的上述印象了。首先，将军丝毫没有考虑到法官的“庞大体型”。他给专员和他们的5位秘书让出了一个狭小的房间，以至于塔夫脱很难在办公桌间穿行。其次就是他的措辞。麦克阿瑟说，他感觉委员会“将他从直接附庸降到了间接附庸的地位”，而从耶鲁大学毕业的塔夫脱在取来一本字典之后才明白麦克阿瑟的意思是说自己将他当作了封臣。这只不过是些琐碎的小事，却无一不显露出了某种征兆：麦克阿瑟对于塔夫脱的特权极其眼红，因而只要他反对在未来的10年中将菲律宾置于军事管辖之下，便定会对他大为光火。结束了在吕宋岛上的首月任职之后，塔夫脱在给妻子的信中提到，自己怀疑将军在政治上不是“很精明”或者“头脑不太清楚”。塔夫脱表示，麦克阿瑟无疑是“一个亲切有礼的人”，但他也“缺乏几分幽默感；很喜欢深入概括别人的心理状况；对一个来到这里时间相对较短的人如何考量现状缺乏考虑，并坚信有必要对民事案件和公民政府实行军事化管理”。

在给战争部部长伊莱休·鲁特的信中，塔夫脱提到，麦克阿瑟只信任“军队的实力”，视自己的任务为“对抗800万起义军、奸臣和暴民”。他不和自己的军外对手深交，并把这当作是自己的职责之一。不久，塔夫脱又抱怨起了自己与将军联络还要“通过正式书信”。尽管好几位委员都曾邀请麦克阿瑟前去共进晚餐，但据塔夫脱所说，阿瑟只在马拉卡南宫里招待“一个经过精挑细选的军人圈子”，不禁让军外人士感觉遭到了冒犯。在他们看来，将军的所作所为就像是一个军事独裁者，甚至是一位小小的君主；当他因为收到维多利亚女王去世的消息而推迟宫廷舞会时，专员L. E. 赖特冷冰冰地说了一句：“鉴于皇家姐妹离世，他必然要在缅怀她的时候表示出应有的尊敬。”

对于发生在马尼拉的这些摩擦，美国政府也脱不了干系。战争部部长鲁特并没有划清麦克阿瑟与塔夫脱之间的职责界限。比方说，将军拥有行政权，委员会却把握着钱袋子。两方都找鲁特寻求指引，却都空手

而归。问题的另一部分原因出自麦克阿瑟在之前服役过程中养成的性格。他的表现更像是一位总督而不是一个士兵，因为他已经习惯了官气十足的威风角色。早在19世纪七八十年代时，军官们都很喜欢他，因为他并不像罗伊·比恩法官那样喜欢叛人死刑，堪称现实版的“佩科斯西部执法者”。在新奥尔良重建时期以及1877年的宾州暴力镇压劳工事件中，麦克阿瑟上尉解决过好几十桩民事纠纷案件。他似乎将来到菲律宾的这些专员们视为和边境贸易商、棉花交易商以及莫利·马圭尔斯秘密组织一样非法入侵军事设施的人。

但马尼拉最主要的摩擦还是在于一个平庸的俄亥俄政客和一个跋扈自大的职业军人之间不可调和的差异性——他们是决然没有办法紧密配合的。塔夫脱付出的努力看上去要更多一些。在写给鲁特、查尔斯·P.塔夫脱和海伦·塔夫脱的信中，他大方地承认将军十分渴望培养菲律宾人民的善意，心中显然不存在半点儿种族偏见，并且还提到了他的军事技能。尽管如此，塔夫脱对于麦克阿瑟的敌意也是发自内心、与日俱增的。他认为阿瑟是个“十足的伪君子”和“军队的老古板”，并且“对自己的观点十分固执”；经阿瑟之手修改过的记者报道全都“糟糕透顶”，“完全不合美国风俗习惯”。在给海伦的信中，塔夫脱还提到“我和麦克阿瑟打交道的次数越多，就越觉得他是个没见过大世面的人。他没有任何做政治家的经验和能力，生硬地固守着军队的规矩和纪律，还格外看重自己。”在写给鲁特的一封言辞尖锐的信中，塔夫特是这样抱怨的：

> 毫不夸张地说，他对于我们的到来十分反感，对我们降低了他的权威性而感到愤怒……他的神经实在是太紧绷了，委员会中的任何一个人稍有怠慢便会招来一封字字珠玑的信函……麦克阿瑟将军觉得自己一有机会就必须向我们宣讲军事的必要性，还打算要我们明白，要求他出于礼貌与我们交流这件事实属时间和精力上的巨大浪费……看起来，对于明确保持与委员会之间沟通的界限，对他来说，和打一场胜仗或镇压一场起义是同样敏感的。

显而易见，这样的局面不能再持续下去了，而麦克阿瑟似乎是第一个意识到这个问题的人。他告诉自己的下属，他觉得自己受到了羞辱，因而不能再拼命忍受下去了。义和团起义暂时为他提供了一条出路，在听说美国要派驻远征军前往北京时，他给华盛顿发去了一封电报："鉴于中国的战势正处于至关重要的阶段，我愿自请亲自前往那里指挥现场作战，直至渡过危机。"然而，鲁特部长委派了阿德纳·R. 查菲少将前去参与镇压义和团，并且全然不顾麦克阿瑟怒不可遏的抗议，增加了从菲律宾调派前去参与远征的美军人数。在经历了一整年的纷扰之后，鲁特终于在马尼拉事务方面采取了唯一可行的一个解决方案。鲁特解除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所有指挥权，安排查菲前去代替他的职务，还强调新任将军将成为塔夫脱的下属。"（他是）一位同时履行着政权与军权的军官。"鲁特是这样评价麦克阿瑟的，"当有人要求他将一部分权力移交给别人时，他却怎么也不愿意拱手相让，也不乐意看到自己的权力被人削减。不过这都是人之常情。"1901年7月4日，塔夫脱入主马拉卡南宫，而麦克阿瑟则踏上了回家的邮轮。"我们与麦克阿瑟将军之间经历了漫长而又艰辛的一年。"塔夫脱在给约翰·沃林顿的信中写道。作为众多报刊的代表，纽约的《太阳报》第一个站出来为将军的解职愤怒发声："如今，在被剥夺了一切他的军衔与履历所应有的特权之后，麦克阿瑟就这样消失在了冷待与轻视的灌木丛中。"

然而，这位老兵还没有注定隐去。一场不可避免的参议院调查开始了。塔夫脱和麦克阿瑟以及驻菲美军的管理都受到了审查，结果证明将军行政作风端正。在面对调查委员会的这段时间里，阿瑟展示了自己全球化的战略眼光。那些泛黄的文字记录上的某些内容在他的儿子于1951年被免职的证词中得到了印证。阿瑟·麦克阿瑟表明，群岛是：

> 世界上最精妙的一组岛屿。它的战略地位是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都无法匹敌的。中国海将它与大陆隔开了750英里，不多不少正好构成了一条护城河。它坐落在绵延几千英里的海岸线一侧，位置居中，地理条件相比处于左右夹击之中的日本更加优越，且远离其他

险境；同样，印度位于另一侧的相对位置上。菲律宾处于该位置点的中央，为保护美国利益、最大程度节约体力提供了途径，是一个居高临下、能够发挥拖延敌军行动影响力的地点。

阿瑟将自己近期对菲律宾的管辖视为美国未来的支点："按照逻辑次序来讲，美国在这些岛屿上驻军是国家富强的成果之一，但从长远的结果来看则可能是除美洲大发现之后史上记载的最重要的事件。怀疑美国留在群岛上是否明智就是在怀疑共和制度的稳定性，等同于宣告处于如此统治之下的国家没有能力成功抵御源自自身的自由与活力所产生的压力。"尽管他与阿奎纳多和奎松是好友，并且不赞同马尼拉的种族隔离制度，但他的结论中还是流露出了几分种族主义的色彩。他觉得自己对于菲律宾人的了解已经到达了"心理学"和"人种学"的层面，还预言后世会视他在那里的管理工作为"雅利安"历史进程中的最高峰，因为他将"共和制"和"美国精神"都介绍给了那里落后的人民。简而言之，他相信自己为美国打开了一片前所未闻的国境。

塔夫脱的看法则不同。回顾过去，他对于未来的预期显然比他的对手更加清晰。在他看来，关于谁该入主马拉卡南宫的冲突已经在政权与军权之间埋下了"争议的种子"。这颗种子要花很长时间——半个世纪——才能够开花，但其最终的果实肯定会是不同寻常的。

达古潘市是阿瑟·麦克阿瑟夺取的最后一个菲律宾战略据点。他也许想过一旦自己向参议员解释清楚情况便还有可能回到那里，不料，麦克阿瑟家族的成员再一次听到这座城市的枪声却已经是1944年的事情了。达古潘成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解放的第一座吕宋岛城市。阿瑟的希望之所以会破灭是因为他的财富在他被解除职务后急剧地下降，而这可能又归咎于威廉·麦金莱被利昂·乔尔戈什刺杀事件。新总统西奥多·罗斯福是塔夫脱的朋友和同盟。罗斯福将他任命为战争部部长，尔后又选

定他为入主白宫的继任者。在马尼拉时，麦克阿瑟可能以为自己只不过是在和一个无名的俄亥俄公务员交战，结果却发现和自己作对的正是那个阻碍他登上事业巅峰的人。

在接下来的八年时间里，我们眼中的阿瑟又变回了那个熟悉的、沮丧的身影：一个才华出众的男人却被大材小用。他先后在科罗拉多、五大湖和东部军区任司令，后来又出任太平洋军区司令。日俄战争爆发了，他请求政府派他前往中国东北任观察员，在经历了众多繁文缛节之后，他的请求被批准了，但就在他动身前往亚洲之前，日本军队在奉天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一场起伏的战斗就这样结束了。朴次茅斯和会之后，他被派往东京任陆军武官——平克妮也随任前往——于是，阿瑟、平克妮以及当时已是中尉的年轻的道格拉斯作为父亲的副手开始了一段长达8个月、被战争部含糊其词地形容为大范围“侦察”的旅程，陆续踏上了中国、“法属印度支那”、马来半岛、“暹罗”（泰国）、缅甸、“锡兰”和印度的土地。对国会来说，麦克阿瑟将军依然是一位英雄，因而被晋升为中将，属陆军中军衔最高的——他是第12个被授此军衔的美国人。国会规定，在他退休之后军衔便会被取消，但没有人知道该怎么安置他，于是他便返回了密尔沃基的家乡。

阿瑟率直和浮夸的个性在他职业生涯的最后时期开始变得愈加明显。不过，在旧金山参加一项令他备感羞辱的活动（欢迎塔夫脱从马尼拉归来）时，他努力控制住了自己的脾气。他为洛杉矶设计的人造海港实在是过于成功，以至于负责保护这座海港的要塞后来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然而，他浪费了这般声誉，跑去干涉当地政府的工作。加利福尼亚的商人向塔夫脱抗议，说阿瑟“在市政事务中承担起了管理责任”。可他只不过是无法克制住自己鲁莽的讲话方式而已。尴尬的是，他经常公然批评战争部和白宫，还预言美国会和其他国家开战，着实令人无法忍受。1908年2月22日，在密尔沃基的老移民俱乐部演讲时，他提出了警告：“如果美国不能不顾一切地迎头痛击正在组织反美海上势力的日本，那么我们就不可能保住这片大洋。”还有一次，他言辞激烈地反对

美国军队招募德裔美国士兵，并声辩美德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次，西奥多·罗斯福介入了。总统在给塔夫脱寄去的信中这样写道："最近我不得不制止麦克阿瑟再说德国人的坏话了。我需要一份有关这件事情的声明，禁止陆军和海军军官针对外国军事力量发表任何有可能会引发矛盾的评论。"

纵然已经跻身陆军高级上将之列，麦克阿瑟却从未担任过参谋长。在写给塔夫脱的信中，他说自己"有时候会痛苦地意识到现在的职位还不如过去的中将"。他认为自己如今的军衔"太过于低下，实际上只不过是个头衔而已，并且在一系列的国内外大事中都处于附庸地位（又是这个词），被剥夺了特权、尊严和支配力"。塔夫脱离开战争部、入主白宫之后，麦克阿瑟知道自己输了。三个月后，1909年6月2日，64岁的他辞去了自己的军衔和职务。《纽约邮报》盛赞他是"一位功成名就的绅士，一位受人尊敬的军官，一位光芒四射的将军"。其他的媒体也同样在为他歌功颂德。然而，他的心里是苦涩的。他告诉平克妮，自己死后不想穿着军装下葬，也不想被葬进阿灵顿国家公墓。老实说，他不想要任何的军事荣誉。

尽管如此，他外出时依旧十分气派，而最具戏剧性的竟然是他离世的场面，要不是有记者在场做证，整件事情简直令人难以置信。麦克阿瑟常说，尽管他十分珍视荣誉勋章，但他真正想要的其实是在带领团队冲锋陷阵时牺牲。1912年9月5日星期四的晚上，威斯康星第24步兵团的年度聚会即将在密尔沃基举行。当年在传教士山一役中幸存下来的士兵如今只有90人还健在。当听说州长弗朗西斯·E. 麦戈文无法前来致辞时，他们的指挥官麦克阿瑟拖着病躯坐了起来。虽然医生和妻子极力反对（那是那一年夏天最热的一天），但他还是去了，步履艰难地走上了讲台，和大家一同追忆19世纪60年代初的那段峥嵘岁月。他是这样开始自己的总结的："你们这支不屈不挠的军队……"然后他便摇摆着倒在了地板上。第24步兵团的军医威廉·J. 克罗宁飞奔上去为他做检查。"同志们，"他说道，"将军快不行了。"在曾任步兵团牧师的保罗·B. 詹金斯的

带领下，90名退伍老兵跪坐在了麦克阿瑟的身旁，诵起了主祷文。待祷告声落下，医生才宣告他们的领袖已经离世。埃德温·帕森斯上尉缓缓地站起身来，从墙上摘下了阿瑟当年带上查塔努加高地的那面残缺不堪的军旗，包裹住了阿瑟的遗体。紧接着，帕森斯也蹒跚着倒在了将军的对面，两周后便离世了。

平克妮受到了打击，只好召回两个儿子赶来安排葬礼事宜。就在他们满腔悲痛地为父亲料理后事时，阿瑟三世却听闻他所在的驱逐舰被授予了海军卓越奖旗。“太晚了。”他难过地告诉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明白，不能与父亲分享的荣誉是没有意义的。从悲伤的情绪中恢复过来的平克妮有了新的认识。她期望自己的儿子能够忠于丈夫的回忆，同时也能让她感到骄傲。从那以后，她就是他们的主心骨，时刻提醒着他们，只要她还活着，他们就必须为父亲的荣誉增光添彩。两个儿子并没有让她失望。留着一脸大胡子的英俊的阿瑟三世赢得了一枚海军十字勋章和一枚服役优异勋章，任上尉和战舰指挥官，但于1923年12月2日因患阑尾炎英年早逝。道格拉斯无疑注定要成为家族中的明星，不过他似乎永远也不愿接受父亲离世的事实。在他也步入晚年之后，尽管很容易受到各种奉承谄媚的影响，但只要一有人提到他的成就超越了第一位麦克阿瑟将军（事实的确如此），他便会大发雷霆。提起父亲在老兵聚会上倒地身亡的事情，他是这样说的：“我的整个世界都在那一晚改变了，心里的伤痕永远也无法愈合。”

---

1. 1品脱≈473毫升（美制湿量）。——编者注
2. 1英尺= 0.304 8米。——编者注
3. 1英里≈1.609千米。——编者注
4. 1磅≈0.454千克。——编者注

第一章
崭露头角、享誉盛名
1880~1917

“我的第一段记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喜欢这样说，“是一阵冲锋号的声音。”多么令人感到好奇啊。这段最初的记忆竟会如此恰如其分、毫厘不爽。不过，这与他在回忆录中提到的却截然相反。他在书中写道，自己的“第一段记忆”是在赛尔登堡到温格特堡之间长达300英里的行军路上与“老兵彼得·里普利”一起“带领纵队跋涉”——尽管这不太可能，因为他那时候只有4岁。然而，他对于自己童年的那段不太可靠的记忆并不是没有价值的。恰恰相反，这些记忆完美地阐释了他对于军队——特别是对于19世纪80年代的边防军——充满乐观色彩的记忆。这些边防军的身上拥有令他毕生珍视的价值和标准。在他看来，条件艰苦的西南边防站里永远都驻守着身穿满是尘土的蓝色军服的瘦削哨兵、留着大胡子的侦察员和散发着刺激性体味的汗血宝马、喊着行军口号的军士以及正在进行密集队形操练的士兵。步枪的声音、沉重的马蹄声、喇叭声、轰隆的野炮声和月光照耀下的“死亡之旅”传来的悸动的印第安手鼓

声；背景是宏伟壮阔的沙漠；画面中，“骡队”和骑手们驰骋在壮美的山川之间，而麦克阿瑟家族的两个小男孩则笔直立正着站在暮色中的降旗仪式上。难怪他晚年最喜欢的娱乐节目便是西部的电影。

当然了，这其中也不缺乏真实的浪漫色彩。对于一个小男孩来说——K连驻扎在莱文沃思时，他已经快要满7岁了，因而可以说他学龄前的那段童年时光都是在边防站里度过的——生活在许多方面都质朴宜人。在他父亲的眼中，这也许是军旅生涯的停滞；在他母亲看来，这是一段充满了幼儿疾病的清苦日子。但其他的印象自然而然地在道格拉斯（上尉称他为“道格”，平克妮则唤他为“道基”）的身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除了缺少玩伴以外——K连中尉的儿子比利·休斯是唯一一个与道格拉斯同龄的男孩——道格和他的哥哥阿瑟过着其他孩子们只能从故事书里读到的那种生活。住在赛尔登堡时，他们在学会读写之前就先学会了骑马和射击。两个孩子都拥有自己的纳瓦霍斑点小马，还经常光着脚、裸着身体、裹着头巾、绑着带流苏的深褐色兽皮裹腿，骑马奔驰在开阔的乡野间乱射野兔。有一次，他们还曾遇到过一只孤零零的骆驼（那是战争部部长杰斐逊·戴维斯于1855年租船从埃及运回来的驼群中存活下来的一只），但他们并没有开枪射杀它。如果没有骑马，他们便会搭乘骡子拉的送水车回家。在边防站，他们喜欢和日光反射信号器玩，看父亲指挥军队的日常操练，晚些时候坐在大沙漠的星空下听士兵们讲故事。

对于具有无限想象力的孩子们来说，听故事是至关重要的。不过故事只不过是别人的经历，两个孩子最切身的一次体会是一场虚惊。侦察兵报告，印第安骑兵正朝温格特堡袭来。平克妮和一位中士一把抓起正在栅栏边玩耍的道格，将他拉回了军营里。虽说这对于K连来说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但当一队符合侦察兵描述的人马（其实是来自附近边防站的骑兵中队）第二天到访时，这个孩子却感觉自己刚刚从一场大冒险中幸存下来。（他还从故事里得知，杰罗尼莫凭借自己维持阿帕切部队低伤亡率的成就勉强赢得了美军的敬佩之情。）边防站里的每一个士兵差

不多都对血雨腥风的内战有一段回忆。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回忆都被镀上了一层演绎的色彩，但他最喜欢的自然还是自己父亲的故事。“给他们看看那些信！”每当有陌生人来访时，他都会这样恳求父亲，而麦克阿瑟上校便会取来一卷自己从密尔沃基带来的信封。当年，阿瑟把这卷信封塞在了自己的衬衣口袋里，而南军的一颗子弹就正好打在了这个地方。信封卷上那个被烧焦了的黑洞正是那颗差一点儿射进他心脏的子弹穿过的位置，而这份至今仍被信纸包裹的证据恰好就证明了他的生命在那一天得到了魔法的保护。

平克妮也认为阿瑟那一天如有神助。作为一名骄傲的南方军后裔，每每听到这些故事中的南方军总是输家，她的心中难免会感到有些失望。但是作为一位维多利亚时期的淑女，她似乎天生就具备一种能够将所有勇士都描述成神圣战士的天赋。和虔诚一样，爱国之心本身就是一种美德。这和动机几乎没有什么关系，重要的是毫不畏缩的忠诚。她坚持让麦克阿瑟家的孩子行军礼。场合并不重要（升降旗仪式、成年人到访甚至是自由女神像落成），只要军礼行得好就行。上床睡觉的时候，她对道格拉斯说的最后一句话总是“你长大以后一定要做一个伟大的人”，有时候还会加上一句“像你父亲一样”或是“像罗伯特·E. 李一样”。所以说，他的父亲和李将军曾经是势不两立的敌人这件事对他来说算不了什么。两个人都是叱咤沙场的英雄，这才是最重要的。

晚年时，回忆起自己在赛尔登堡的生活，他说是母亲教会了他“尊敬自己、尊敬别人、为自己的行为负责”的原则，同时还逐渐向他灌输了一种“责任感”。他记得：“无论个人需要做出什么样的牺牲，我们都必须要做对的事情。国家永远是第一位的。有两件事情是我们永远也不能做的：永远不要撒谎，永远不要告状。”她还教会了他阅读。虽说他的父亲堪称“活百科全书”，精通政治、军事和经济学知识，但一个小男孩是无论如何也搞不清楚命定扩张论是什么，也不知道克劳塞维茨和约翰·斯图尔特·穆勒是谁的。不过，他倒是很早就理解了英雄主义是什么意思，于是平克妮便总是留心确保儿子们能够随时读到描述战斗英雄事

迹的书籍。他们坐在她的腿上，学到了勇气可贵和懦弱可耻的品德。一次，她给道格讲述了“男儿有泪不轻弹”的道理。他反驳说父亲每一次参加降旗仪式时都会眼眶湿润。那是不一样的，她赶紧解释道，那是出于对国家的爱，所以才是可以被允许的，但恐惧的泪水是绝对不可以的。

虽说他直到五十几岁时依旧和母亲保持亲密的关系，但她对他产生的影响还是童年时最为深刻。如果说父亲为他树立了男子气概的榜样，并将自己对于语言的热爱传承给了他的话，那么平克妮则帮助塑造了他出类拔萃的人生中的其他所有品格。这些品格有的是浅显的，比如彬彬有礼的言行举止以及一丝不苟的行事风格（母亲后来告诉他，这全都是从移民祖先那里继承而来的），而其他的品格则比较微妙，因为她本身也是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女子，既温顺又坚毅，既任性又多情，既迷人又情绪化。在中规中矩的美丽外表下，她有着一颗冷静、务实而又坚定的心，决意要让自己的孩子比肩甚至是超越她的公公和丈夫。下一代美国人可能很难彻底理解一个女人为什么要通过利用她身边的男人来实现自己的野心，特别是他们还穿着她年轻时最憎恨的敌军的那身军装。尽管如此，玛丽·平克妮·麦克阿瑟还是站在一面只有她能够看得到的旗帜下，决心用自己复杂的方式、在自己选择的战场上、用自己的武器打败“北军”。

道格8岁以前，平克妮一直让他穿裙子、留长卷发，好让他多享受一下自己的童年生活，也让他更加依赖自己。然而，这样的日子还是提早两年结束了。随着父亲被调驻莱文沃思，道格也在那里开始了自己小学二年级的生活。入学之初，他是个劣等生。尽管周围围绕着不少同龄人，但他还是怀念着在沙漠中无忧无虑的日子。他后来写道，自己当时唯一的慰藉便是观摩大规模边防站阅兵，看着“骑兵驾驭着光彩夺目的骏马，炮兵推着长管大炮和弹药车，步兵举着闪闪发光的刺刀”时那种“无限的激动”。可即便是这样的日子也不太多。在道格9岁半的时

候，麦克阿瑟一家迁到了华盛顿，在罗德岛大街买下了一座房子，而他也被送进了军队的公立学校。在那里，他的学习成绩依旧很差，还戴上了增强视力的眼镜；除了祖父家之外，没有什么能够引起他的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华盛顿和我所知道的任何地方都不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识到了浮夸的政治家和他们的阴谋诡计。相比之下，西部边境的色彩与刺激是城市所无法取代的。"

1893年秋天的一个下午，13岁的他偶然偷听到父亲对母亲说道："我觉得那孩子是块当兵的料。"这话是否真的是从阿瑟嘴里说出来的其实并不重要，上百万个男人都梦想着自己的儿子能够追随他们的步伐。重要的是，阿瑟的儿子发誓自己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句话——而他也真的做到了。他没有过青春期的叛逆，一生都在追寻如何成为一位能让父亲感到欣慰的士兵。"二战"结束之后，在将"人身保护法"引入日本时，他曾告诉下属自己此举是受父亲在菲律宾时的案例所启发。70岁时，他对一位东京的朋友说道："无论我何时完成了一个还不错的任务，都感觉自己可以笔直地站起来问上一句：'总督，你觉得怎么样？'"

同一年秋天，阿瑟带回了一个消息：在阔别部队4年之后，他们终于又要朝着西部的圣安东尼奥出发了。这个消息在他年幼的儿子听来格外欢欣鼓舞，却令他的妻子不太高兴。在那里，道格拉斯进入了日后被称为得克萨斯军事学院的地方学习。10月的一天早上8点，皮肤黝黑、瘦长结实、长相英俊的道格拉斯穿过山姆堡低洼的操场，来到了学校里一片其貌不扬的场地上。用那个时代的话来说，那里"天气好的时候一半是草皮一半是尘土，雨天的时候就全都是泥巴"。他穿着价值13.5美元、带有饰带缀饰的军校学员制服，手里还按要求捧着一本圣经、一本祈祷书以及一本赞美诗集。这所学校是由一名圣公会的主教创立的，所以正合平克妮的心意。礼拜仪式每天早上8点23分都会在石墙上挂满常青藤的圣保罗教堂内举行。第二年的4月，道格拉斯和同学们的坚信礼便是在这里举行的。用他的话来说："圣经课程打开了通往越加坚定的信仰的精神大门。"

许多年后，每当他提起西得克萨斯军校时，总是会说：“这里便是我的起点。”这并非是一个轻松的起点。和大部分类似的学校一样，这里有相当一部分年轻学生是因为在家中品行不端而被送进来读书的。“（有些人是）这个世界上最卑鄙的男孩。”一位男校友后来承认。作为少校的儿子，小麦克阿瑟招来了那些人的反感。他们不仅嘲笑他是个走读生，还嫉妒他终于开始突飞猛进的优异成绩。正如他所说，他在那里产生了“求知的渴望，想要寻找理由、追寻真相”。“深奥的数学看上去就像是艰巨的分析挑战，乏味的拉丁语和希腊语就像通往历史领袖感人话语的通道，晦涩难读的历史资料则能将你引向那些惊天动地的战场上的伟大将领……我的学业包围了我。”除此之外，他对外交事务也萌发了浓厚的兴趣——古巴、埃塞俄比亚以及法国的德雷福斯事件——不过这并没能让那些小流氓对他刮目相看。

三年级的那一年，他终于在运动场上赢得了同龄人的接纳。在某种程度上，他在这里的功绩比他在教室里的成就还要令人印象深刻。虽然他拥有一流的头脑，但并不是天生的运动员，他在运动方面获得的成就全部都是靠耐力拼得的。尽管处于弱势，他还是成了军校里的网球赛冠军。棒球场上的他并不是力量型选手，于是他将自己培养成了灵敏的轻击型选手、迅捷的游击手和球队的经理。在橄榄球场上，据他的同学贾哈尔·沃克回忆：“他们让他做四分卫，因为这个位置不要求体重，却要求大脑和魄力。他做得很好。混战对他来说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你可以看到他的嘴唇变成了青色，但他还是要站起来再一次加入搏斗。”

在军校的最后一年，他获得了完胜的战绩，所参加的橄榄球队和棒球队也都保持着不败的战绩。此外，他还被选为A连的军士长，获得了走读学生所能得到的最高军衔。他组织并领导着一个获奖操练班组，同时还是仪态分数最高的四位士官之一。通过朗诵J. J. 罗奇的《武装民船船长阿姆斯特朗的战斗》，他获得了洛克伍德朗诵银质奖章。此外，他还凭借97.33的平均成绩荣获了学术金奖，并成为1897年致毕业告别辞的毕业生代表。在同年春天的圣安东尼奥慈善舞会上，他担任了开场仪

式队伍的领头人，臂弯里挽着的那位仪态翩翩的姑娘正是当年的“休斯敦小姐”。一段有关他是如何战无不胜的传奇就此传播开来。现在，他已经为进入西点军校做好了准备——或者应该说，他自己是这么想的。

然而，他没有获得提名。早在一年前，麦克阿瑟法官就将自己生命中的最后几个礼拜都投入了为孙子搜集推荐信这件事情上，道格拉斯的父亲也是一样。他们的努力换来的是一堆令人叹为观止的书信：13份来自州长、参议员、众议员以及主教的荐言函。然而，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并没有推荐他，他的4份总统提名全都给了其他几位申请人。第二年，威廉·麦金莱总统的提名也一样。更糟糕的是，道格拉斯的初步体检结果竟然不合格，显示他脊椎弯曲。命运似乎在和他作对。但他的母亲在支持着他，而她正好是一个狡猾的竞争者。1897年10月，当她的丈夫被派驻圣保罗时，她带着道格拉斯搬去了330英里以外的密尔沃基普朗金顿酒店。平克妮打算紧紧地包围西点军校的招生办公室。首先，她在麦克阿瑟法官的密友（国会议员西奥博尔德·奥德江）的辖区内购得了一处合法的住所。其次，她请来了密尔沃基著名的专家弗朗兹·菲斯特医生为她的儿子治疗脊椎缺陷。

据年逾八十的菲斯特医生回忆，自己和这位病人“并肩奋斗了一年。他是我治疗过的病人中遵循医嘱最迅速的一个，且对于解剖学、生物学、生理学等一切有关健康与医药科学的内容十分感兴趣”。在摆脱自身缺陷方面，他的决心十分坚定。就这样，平克妮又朝着自己的目标迈进了一步。然而，余下的路途依旧困难重重。作为想要进入西点军校的众多年轻人之一，要想获得奥德江的提名，他就必须参加在市政厅举办的一场竞争激烈的考试。这位国会议员任命了三位密尔沃基的大学校长来监督这场考试，于是平克妮又雇用了第四位——西区高中的“麦克”·麦克兰纳根——作为儿子的家教。道格拉斯回忆：“每次上下学，我都要辗转两英里往返于酒店和学校之间。我此生再没有比那时候更加努力学习过。”他在学校的实验室里学习化学和物理，回家后还要和自己的第二位家教（他母亲）一起学习代数、英语和历史。

考试前夜，道格拉斯此生第一次失眠了。早饭过后，他甚至感到有些反胃。平克妮陪着他来到了市政厅，还站在台阶上对他说了些鼓舞士气的话——虽说这些话听上去很像伯特·L.　斯坦迪什笔下的“弗兰克·梅里威尔”廉价畅销小说中会写到的话：“道格，只要你不害怕，就一定会赢。你必须要相信自己，我的儿子，否则别人是不会相信你的。要自信，要依靠自己的力量。即便你没有成功，也知道自己尽力了。好了，去吧。”“母亲冷静的话语，”道格拉斯回忆道，“让我缓过神来。”他冲进考场，打破了又一项纪录。1898年6月7日的密尔沃基《日报》黄刊上刊登了一则标题为“他注定要进西点”的文章，称他在13名候选人中拔得头筹。“年轻的麦克阿瑟是一个智慧超群、聪明伶俐、果断坚决的孩子。他的等级分超过了99.33分，而第二名仅为77.9分。在总分750分中，他考得了700分的高分。18岁的他和母亲一起住在普朗金顿酒店里，抱着在考试中必胜的决心而来，以最严谨的态度来面对功课，像杜威和霍布森一样，不允许半点儿失败的可能性。最终，他以绰绰有余的成绩达成了自己的目标。”这位赢家也从中得出了一个梅里威尔式的结论：“这是令我终生难忘的一课。作战准备是成功与胜利的关键。”

体育锻炼也是治疗脊椎弯曲的关键。这个障碍困扰了他一年的时间，不过还是被他清除了。据菲斯特医生回忆：“最后一次参加西点军校的体检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成绩几近完美。那是1899年的事情——那一年他19岁。你再也找不到比他更健康的美国男子了。”当然，菲斯特的观点纯粹是从医学角度出发的。参议员约翰·伦德拉姆·米切尔的一个女儿评判他的角度就截然不同，她觉得这个年轻人不够格。麦克阿瑟经常在这位参议员的家中出入，想要赢得她的芳心却总是徒劳而归。他在一首诗中写道：

美丽的西部姑娘，

在爱情和自由的想象中旋转。

我爱的是你，

然而，

你为什么就不爱我呢？

这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尽管一场大战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但道格拉斯的父亲不允许他参军，因而他也就没有披上军装。他的这一劣势在包括米切尔的儿子比利在内的年轻军官们放假回来时更是变得格外明显。姑娘们全都围在军官们的身旁，而这个穿着夹克和法兰绒的可怜年轻人只能像斯坦迪什笔下的人一样偷偷摸摸地在他们的背后晃来晃去，用手指拨弄着自己的草帽，发誓这将是最后一场自己无法冲锋陷阵的战争。他是个说到做到的男人。

1899年6月13日星期四的那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一列西岸铁路公司的火车停在了距离威豪肯还有3个小时车程的西点火车站。一个戴着浅灰色斯特森毡帽的年轻人和他那位身材瘦小、衣着简朴的母亲走下了火车。西点火车站（至今仍然存在）是一座棕褐色的砖石建筑，有着滑稽的高坡屋顶，看上去似乎有些不合时宜。然而，当母子俩喘着粗气步行盘上一段几乎垂直的小径、穿过一座石头拱门时，眼前却出现了美国最壮观的自然景观。他们的脚下正踩着西点军校的“平原”（一片架在哈德孙河旁的宽阔土地），而头顶上则是高耸入云、植被茂密的高山：安东尼鼻尖山、斯特姆国王山、布拉克阿纳克山和熊山。正对着平原的地方耸立着各式各样的建筑和纪念碑。主楼闪烁着白色的光芒。兵营四周的哥特风格墙壁全都用灰色花岗岩砌成，看上去和监狱一样冰冷阴森。通往河岸边的“调情步道”附近的“战利品角”旁（那里如今被改建成了一座停车场），矗立着柯蕾妮酒店，一座带有宽敞绿色木质阳台的黄砖战前建筑。在这里，麦克阿瑟太太将度过四年的时光。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入读哈佛大学以及阿德莱·史蒂文森入读普林斯顿大学时的经历一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大学时光也是和对自己耳提面命的母亲一起度过

的。

除了平克妮之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军校同学比任何人都有机会好好地观察他。那时候的他和同学的关系很冷淡，但世纪之交的大学生活其实是格外融洽的。军校学员平日里只有两个场合可以放假，一个是陆海军足球赛，另一个则是学期末的暑假——没有圣诞假期。若是他们骑马去了平原以外的地方，也必须承诺不会下马。此外，他们的身上甚至不许带钱。第四骠骑兵团的温斯顿·丘吉尔中尉曾经提到过，他们“过着修道士般与世隔绝的生活”。在前往古巴观察军事行动的路上，丘吉尔在给他的兄弟寄去的书信中提到，桑赫斯特的毕业生都很“害怕”学校里的规矩：“19~22岁的学员们要在这里待上四年的时间……学校不允许他们抽烟……事实上，他们比国内任何一所公立学校的学生都更不自由……二十四五岁就如此放弃个人自由的年轻人是永远也做不成好公民或是好士兵的。”

那年6月入学西点军校的共有332名学员，其中许多人英勇善战的品质日后都会得到丘吉尔的赏识。虽然当时的学员总人数还不到如今的1/10，但其校园同样与世隔绝，不仅拥有自己的传统与仪式，还创造出了自己的语言。除了一二年级学员拥有自己特有的称谓之外，三年级学员将被称为“二等生”，尔后一年再成长为“一等生”。全校学员都由一名最符合军人典型模范形象的“一等队长”来领导。宿舍里的室友互称“妻子”。和别人一起到“调情步道”上散步被称为“拉练”。过失的代名词是“鹅毛”，因为鹅毛钢笔曾经被用来记过；包含走步的惩罚被称为一枚“子弹”。“咆哮”指的是番茄酱，“奶牛”指的是牛奶，“小牛”指的是奶油，而“萨米”指的则是糖浆［因为曾有一位名为塞缪尔（萨米）·迈尔斯的老军官认为面包和糖浆对于长身体的男孩子来说是健康的食品］。被派去切肉的新生被称为“枪手”，而负责倒咖啡的则是“咖啡下士”。

学员们戴着“柏油桶”（礼帽），穿着系有44颗纽扣的灰色礼服束腰外衣，迈着令人叹为观止的壮观脚步穿过平原上的练兵场，白色的腿整

齐划一地发出嗖嗖的响声。围绕在他们四周的地标包括与拉斐德齐名的波兰人塔德乌什·柯斯丘什科建造的花园；横亘在“战利品角”附近、曾在美国独立战争中发挥要塞作用的河流与山脉网络；还有一块黑色的礼拜堂纪念碑，上面刻着曾试图将这片地区出卖给英国人的贝内迪克特·阿诺德的名字。这些知识都是学员们在兵营里、在帐篷下、在马背上、在朗诵中、在大树的耳语中、在盥洗台的木盆旁共用陈旧的椰子壳长柄勺时学来的——每天上千次的频繁接触。由于学员的规模很小，所以每个人都认识彼此。又因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是在菲律宾战场上作过战的著名将军，所以从他作为新生入学后的第一天起，便被人紧紧盯上了。

那他的同学们都看到了些什么呢？

据那年6月升入四年级的罗伯特·E. 伍德事后回忆，部队里的高年级学员“一眼就看出麦克阿瑟天生是位将才”。这话虽然是马后炮，但无疑表明这个新人的外形的确非常引人注目。伍德认为，他“无疑是有史以来学校里最英俊的学员，6英尺高，身材苗条，体形健美，有一对闪烁着光芒的深色眼睛”。绰号叫作“赛普”的休·S. 约翰逊是一位来自俄克拉何马的魁梧新生——20世纪30年代时在华盛顿以“铁裤子”的名号著称——他认为这位同学“才华横溢，无所畏惧”。昌西·L. 芬顿记忆中的道格拉斯是“一个典型的西部人”，有着“户外的红润肤色”。“（他）像个王子一样英俊——6英尺的身高，160磅的体重，深色的头发，有着喜欢户外活动的人那种红润的肤色。”卫戍部队的马蒂·马厄中士后来在描述麦克阿瑟时也如是写道：“就算是穿着泳裤，你也一眼就能看出他是个军人。”另外一个没有那么崇拜他的军人说他肯定“从8岁起便如此狂妄自大”。还有一些学员认为他看起来“像狮子一样勇猛，像魔鬼一样聪明”，是个“拥有海绵一样的大脑”的年轻人，而且一旦下定决心，“宁愿被活活打死也不会改变心意”。其中有两个人的看法格外深切。第一个人提到：“了解麦克阿瑟的方法要么是爱他，要么是恨他——你不能只是喜欢他。”第二个人罗伯特·C. 理查森写道：“他有他的风格。没有哪

个学员能够像他一样。”

有些人的回忆已经在时光的棱镜中被扭曲了——这个新人的体重其实只有133磅，身高5英尺11英寸[注]——但他同样是不可忽略的。即便是那个时候，当其他新生都在学长们的注视下瑟瑟发抖时，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外表依旧是那样与众不同。父亲的声誉和母亲的陪读让他成为众矢之的。结果，等待他的是即便在西点军校这种地方也实属罕见的严峻考验，让他一辈子都将怀着敬畏的心回忆那个地方。

“野兽营”（新生们在“平原”上度过的前三个星期）是他最艰难的一段时光。新生们居住在“克林顿平原”上的帐篷里，操场对面便是“战利品角”。在那里，他们忍受着无情的戏弄。体罚措施经常是十分危险的，但他们又不能回避；任何拒绝配合的新生都会被叫出来，任由高年级学长中最壮实的职业拳手赤手空拳地殴打一番。学长们在这些新生的身上用过上百种折磨手段，其中最普遍的包括滚烫的蒸气浴、“爬行”（一位学长会用下巴抵着新生鼻子上方一英寸的地方）、“站军姿”（长时间僵硬地立正站直）、“下沉”（俯卧撑）、“鹰式”（在碎玻璃上深蹲）、“担架倒挂”（被人用手从帐篷柱上倒挂下来）、强制进食、走步、裸体在碎木板上滑行以及从一排抱着冷水桶往下倒的学长中间跑过等。

第一个折磨麦克阿瑟的是个南方人。他命令麦克阿瑟在站军姿的同时一遍又一遍地背诵他父亲在内战时的战绩。后来，他又让麦克阿瑟站在那里一个小时都不许动。马厄告诉我们：“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像具雕塑一样在那里一直站到了第60分钟。”不久，更多样的体罚开始轮番上阵。据伍德回忆，道格拉斯在面对这些体罚时“不屈不挠、颇有尊严”，即便他的精神已经屈服了，但肉体也绝不会低头；在被三波学长轮流折磨过后，他昏倒了。回到帐篷中，他的身体出现了痉挛的症状，可心高气傲的他决心不让任何人知道。一阵痉挛过后，他请自己的室友，新生弗雷德里克·H. 坎宁安在他的脚下垫了一床毯子，以免他们听到自己在

地板上颤抖的声音，然后又让人往他的嘴里塞了一角毯子，好把尖叫声都吞进自己的肚子里。

当另一个新生因此而送命时，西点军校学员捉弄新生的事情就成了闻名全国的丑闻。为此，还是军校学生的麦克阿瑟第一次站到了某国会委员会的面前。满怀厌恶地从军校退学的坎宁安说出了痉挛的事情，所以这个事件的受害者便接受了召见。和那一年在密尔沃基应试并感到反胃时一样，他的母亲这一次也在一旁帮助他。听证会休会的间隙，她派人给他送来一首诗。诗的结尾这样写道：

> 记得这个世界在惩恶时不会心软，
>
> 如果阴影或耻辱玷污了你的名字。
>
> 有其母必有其子，此话不假。
>
> 这个世界评判你母亲时大部分的依据就是你……
>
> 要确保在裁决书中获胜。
>
> 她的付出会有回报：“这个男人是她的儿子！”

紧接着，她又在附言中提醒他：“永远不要撒谎，永远不要谈论别人的秘密。”他照做了。然而，他在回忆录中承认，自己当时并非没有供出任何一个人的名字。被他指认出来的人要么认了罪，要么从西点军校退了学。据《纽约时报》报道，他的泰然自若令委员会成员无不感到“惊叹”。他还一度熟练地搪塞了纽约国会议员埃德蒙·H. 德里格斯：

> 德里格斯：你来到西点军校时是否料到过自己会遭受如此待遇？
>
> 麦克阿瑟：没有料到，阁下。
>
> 德里格斯：你当时不认为这很残暴吗？

麦克阿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可能有些吃惊。

德里格斯：我希望你可以回答我的问题，你当时有没有觉得这很残暴？

麦克阿瑟：我希望你能定义一下残暴这个词。

德里格斯：好吧，先生。乐于施暴；对别人的苦难表现冷淡；铁石心肠；强加精神折磨在他人身上；造成他人的痛苦。

麦克阿瑟：那我也许应该说这很残暴。

德里格斯：你必须明确自己的答案。这种行为到底是否残暴？

麦克阿瑟：是的，阁下。

麦克阿瑟在“野兽营”的作为为他赢得了整个部队所谓的“巴结奉承”——大家纷纷对他的镇静和勇气表示赞赏。这件事也启发了一位后来成为主教派牧师的四年级学生，鼓励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举动。在克林顿平原上，麦克阿瑟的“责任感与立志做一名好军官的行为”给这位名叫阿瑟·P. S. 海德的学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海德表示：“我邀请他来与我同住。这个邀请自然令他感到十分惊讶。”让海德感到很有意思的是，麦克阿瑟竟然“要求我给他点儿时间跑回酒店去问问他母亲的意思。”30分钟后，这个新生回来了，平克妮应允了他的请求，于是他在一年级这一年就做了海德的“妻子”。

对麦克阿瑟来说，海德此举相当于是在助他一臂之力。作为1900届的毕业生，高级尉官海德有资格住在古老的甲级兵营里一间位于三层的塔楼房中，坐拥可以俯瞰操场的美景。而住在四年级学生房间里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好处，那就是可以在夜里11点时再熄灯。其他的新生在听到10点钟的熄灯号之后就必须就寝。这样一来，他又多一个小时可以学习。为了能再多学一个小时，他常常会赶在起床号响起之前便起身。据马蒂·马厄回忆，有些夜晚，他还会“用毯子遮住窗户，一直学习到黎明时分”。马厄说：“他时常在想自己能否成为和父亲一样伟大的人，还对

我说，如果勤奋与父亲的成功有任何关系的话，那么他还有一次机会。”海德在回忆起自己的“妻子”时也曾提到，他在说起阿瑟·麦克阿瑟时总是“充满了仰慕与骄傲之情”，感觉自己作为孝子有责任成为“配得上父亲名誉的继承人”。

他之所以会这样想，也是因为母亲每日的鼓励。自从发现新生尤利西斯·S.　格兰特三世的母亲也住在同一家酒店里之后，平克妮的野心更是有增无减。虽然这两个女人对待彼此都是一副恭敬有加的模样——柯蕾妮酒店那些玩世不恭的雇员称她们之间和颜悦色的对话暗地里充满了“互相撕扯对方头发”的火药味儿——但她们的儿子对于那两双天鹅绒手套里的手指是如何紧握着的一点儿都不知情。道格拉斯平日里与平克妮相处的时间不过晚饭前的那半个小时。天气晴好的时候，他们会沿着“调情步道”散步。而平克妮则会利用这段时间来细细询问他一天的经历。碰上雨天，她会带他回酒店房间；若是他的功课做得不错，便奖励他水果，通常是橘子。柯蕾妮酒店是个“有伤风化的”公共场所，没有特殊通行证的士兵是没有权限进入那里的，所以他也不常进去。然而，作为从边防站退下来的老兵家属，拥有众多人脉关系的平克妮还是十分足智多谋的。一次，当她正在招待道格拉斯和他后来的室友乔治·W. 科修时，忽然听闻一位军官正朝他们的方向走来。她整了整自己的半身裙，带着两个孩子来到了地下室。据科修回忆，他们就是从那里“顺着输煤管爬出去”逃跑的。

让她备感愤慨的是，某雕塑家在为一座英雄士兵雕塑挑选模特时竟然选中了格兰特家的那位年轻人。事后，两位母亲每每见到彼此总是会紧皱眉头。当天晚些时候，有人还看到平克妮和道格拉斯正紧张地谈着话。不过，那也是麦克阿瑟的对手最后一次胜过他。第一学年结束之后，年轻的格兰特成绩排名全班第二，远远落后于第一名的麦克阿瑟。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还获得了一项又一项的荣誉。一张母子两人于第一学年时拍摄的合影被保留下来。一脸肃穆的平克妮穿着黑色的缎子衣服和白色蕾丝衬衣式连衣裙，头发高高地梳了一个复杂的“蓬巴杜夫人发

式”。她的眼睛平视着镜头，双手僵硬地放在体侧，似乎想要快一点儿了事。站在他身旁的道格拉斯戴着一顶草帽，穿着休闲的军校校服。他的站姿很放松，身体的重心自然而然地放在了左胯上，手里还拿着一个卷轴。他的眼神望向了哈德孙河，脸上的表情充满了责任感和自信心，似乎有些心不在焉——看上去就像是一位正在征服一座山峰、同时还信心满满地望着另一座山峰的登山者。

毫无疑问，他已经征服了这所军校。我们很难将西点军校与普通学院和大学相比，因为西点军校直到1933年才开始为毕业生授予学位。不过，麦克阿瑟在那里所学的课程包括射击练习和骑术，这在其他学校里的课程表里倒是没有的。不管怎样，他的学术成就十分惊人。按照科修的话来说：“他看上去并不是很用功，但注意力非常集中。”显而易见，他是这片平原上迎来的最富才华的青年才俊之一。这不仅是因为他在第一学年时就以第一名的成绩领衔全班的94名新生，还因为他在四年间修完了2 470学分中的2 424.2分，也就是总学分的98.14%。自从1802年西点军校建校以来，这个分数仅仅低于两名毕业生——其中一位是修完了99.78%学分的1884年毕业生，另一位则是于1829年修完98.33%学分毕业的罗伯特·E. 李。麦克阿瑟在法律、历史和英语方面都获得了满分的完美成绩，在数学、训练规章、军械和射击学方面也在班里名列前茅。他分数最低的科目是绘画和军事工程学。这两门学科虽然不是他的强项，却为我们更多地展示了那个年代里西点军校的教学概况。处在世纪之交的军校在供暖和供电方面做得都很差，由于无处安置学员，学校只好在漫长的冬日里安排他们坐在教室里绘制桥梁。麦克阿瑟也许只不过是感到有些无聊而已。

学业上的成就只是西点军校评估这些年轻人的两个方法之一。另一个方法便是对于军人风范的考察。在这一点上，他又一次在1903届毕业生中拔得头筹。不过，他也曾因为敬礼姿势不标准、在数学试卷上留下不适当的空白、未能按时归还图书，以及最有趣的“在阅兵队伍前列行进时过度摆臂”而被记过，还曾因为没有穿军装而被两次扣分。但据威

廉·A. 加诺观察，他大部分时间里都“像服装店里的假人一样拘谨，系着红色的腰带，裤子上的褶皱看上去就像刀刃一样”。加诺形容，轮到麦克阿瑟喊行军口号的时候，他总是会“飞快地比着奇怪的手势，脚步轻盈，心情格外愉快”；看着他指挥一列笨拙的新生操练，A连的战术教官埃德蒙·A.　　布莱克上尉做出了这样的评价：“他是我见过最优秀的教官。”每一年，麦克阿瑟都能够取得自己所能取得的最高军衔——二年级时他升任一级下士，三年级时升任高级一级军士长，四年级时还获得了至高无上的荣耀：第一上尉，和前辈李以及潘兴两位将军一样。

佩戴着第一上尉的金色军阶，他充当起了军校负责人的代表，负责每日检查食堂，每晚还要用尖锐刺耳的命令声“驱赶部队”回营。科修说，第一上尉“实际上只不过就是个虚名”。一天中午，食堂的工作人员趁着午饭上桌之前罢工。于是，骑兵们被从学校马厩里拽到了食堂来顶替工作。事情的结果简直是一塌糊涂。校长查尔斯·G.　特里特上校恳请学员们耐心配合，直到他们雇来新的工作人员。就在这时，麦克阿瑟张嘴说话了。“他没有要求学员们做任何的事情。”科修回忆道，“他只不过是用平时的话语告诉他们该怎么做，他们就悉数照做了。特里特上校是在恳请大家，而麦克阿瑟则是在命令大家。”

他担任第一上尉时居住过的那间八角形的塔楼房（拥有120年历史的甲级营房1123号房间），被西点军校保留至今。房间里装着一个壁炉。那个时候，学员坐在窗台上便能够清楚地看到一个身穿黑色缎子衣裳、体态健硕的女子出现在柯蕾妮酒店房间的窗前，不耐烦地等待着儿子每天前来探望她。此刻的她心中是无比骄傲的，即便这一路上也曾遇到过不少挫折。三年级那一年，麦克阿瑟对于棒球的热爱威胁到了他的课业成绩。赛普·约翰逊事后回忆起这段时光时还曾称他为“一流的棒球手”——虽然事实并非如此。他在击球方面一直很弱，在右翼外场的表现也乏善可陈。然而他依旧十分热爱打棒球。“无畏的道格”，其他的学员们直截了当地如此称呼他。半个世纪以后，他的球队队长在回想起这位队员时，说他是个“急脾气的运动员，虽然算不上机灵，但总是能莫

名其妙地冲在第一个。他会在计谋上超越投手，引得对方在四坏球后保送他上垒……或跑过触击球——他永远都冲在前头。”

1901年5月18日，他的体育生涯达到了巅峰。那个星期六是陆军与海军军校之间的第一次棒球竞技赛。当“一流的棒球手”道格上场击球时，那些熟知麦克阿瑟将军在菲律宾的战绩的海军军校学员们高唱道：

你是总督还是流浪汉？

谁是这场比赛的领袖？

是你，还是埃米利奥·阿奎纳多？

令他们欣喜的是，他被三振出局了。第二次上场时，他又因为犯规次数过多而被罚出场。不过第三次时他被保送上垒了。后来，一个名叫约翰·赫尔的学员给了他一次大显身手的机会。他以决定性的一次奔跑回到了本垒：陆军军校以4∶3获胜。四年级那一年，麦克阿瑟为了用功读书而放弃了打棒球，但那一年秋天仍留任橄榄球队经理。他一生都为自己所在的“A队”颇感自豪。仁川登陆的前一夜，70岁的麦克阿瑟还将队徽佩戴在了自己的睡衣上。退伍入住华尔道夫酒店之后，队徽已经变得破烂不堪，于是一队军校学员代表还特意从西点军校赶来，送了一个新队徽给他。后来，军校派了一批高校运动员到访华尔道夫，聆听这位已是暮年的五星上将讲述成为一流的哈德孙黑骑士是怎样一种美妙的感受。

尽管他获奖无数，却似乎并不会感到自命不凡或是一板一眼。跟随学员们被调往华盛顿参加麦金莱总统的连任就职演讲时，麦克阿瑟与赛普·约翰逊一同入住了艾伯特公寓的顶层。阅兵的前一晚，赛普趁道格拉斯外出的时候为一些朋友布置了《麦克白》中的一个战斗场景，还用某位学员的军刀将自己这位室友的帽子钉在了门上。麦克阿瑟什么也没说，还是戴着这顶有洞的军帽参加了阅兵。还有一次，他发现赛普和密

友在学员舞会的时候躲在男厕所里吹牛闲聊。作为第一上尉，他本应将他们的行为上报，但他只是嘟囔了一句"我看你们这些人好像更喜欢读书，不喜欢跳舞"，然后便走开了。

除了在没有通行证的情况下出入柯蕾妮酒店之外，麦克阿瑟还不止一次地违反过校规。一次，艾伯特·L.　米尔斯校长批准军校学员去参加一个纽约的马展，道格拉斯和两位同学趁机溜出去跑到了百老汇大街上的雷克托酒吧，见到了"钻石吉姆"·布雷迪，还每人喝下了三杯马天尼酒。"后来……"他晚年时回忆，"我们大摇大摆地跑去看了一场歌舞杂耍表演，开心极了！"马蒂·马厄一直都相信（尽管他无法证明），麦克阿瑟就是西点军校一场著名恶作剧背后的始作俑者：一天晚上，熄灯号响过之后，一群捣蛋的学员将起床炮推过平原，吊在了西教学楼的楼顶上。一队军官花了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才把这些大炮放下来，却一直都没有抓到过罪魁祸首。麦克阿瑟二年级的时候也曾因为一起与起床炮有关的恶作剧而被叫去审问过。1901年4月16日，几个学员将大炮挪到了校长家的草坪上，将炮口对准了大门。不过，并没有证据证明这件事是道格拉斯所为，因此他也就逃脱了责罚。

让他差一点儿就早早结束自己军旅生涯的事件和恶作剧没有半点儿关系。在他来看，这件事情事关他的个人荣耀，而在别人眼中，这也许败露了他性格中的缺陷。按照传统，科目分数最高的学生不需要参加本科目的期末考试。麦克阿瑟的数学平均成绩是全班最高的，但他的名字依旧出现在了数学期末考试的名单上。他怒不可遏地冲进了数学教官赖特·P.　埃杰顿中校的办公室里。教官冷静地告诉他，他曾经由于病假缺考过好几次，因此不能免考。麦克阿瑟带着满腔的怒火回到了房间里。当科修问起他打算怎么办时，道格拉斯回答："如果我的名字在早上9点之前还没有从那份名单上消失的话，我就退学！"包括他的母亲在内，没人能劝得动他。科修一夜没睡，他的室友却睡得很香。早上8点50分，一位勤务兵前来转达埃杰顿中校的口信，通知他不必前去参加考试。当然，中校因此而颜面尽失，但这并不是他的错；未来，麦克阿瑟

毫不退让的毛病还会挫败很多比他更加显赫的人。

夜晚，四年级的学生和着《奥拉·李》的调子唱起了歌：

> 6月来到的姑娘们，
> 我们将温柔地告别，
> 期待他们很快就能结婚，
> 也来到这军队。
>
> 蓝军服！蓝军服！
> 蓝军服万岁！
> 我们将告别灰色的学员制服，
> 穿上这蓝军服。

虽说平克妮在处理数学考试事件时不是很成功，但在为道格拉斯“挡桃花”这件事上，她的手段倒是颇为有效。凭借道格拉斯的长相、风度以及成就，他不可避免地吸引了不少在旅途中下榻柯蕾妮酒店的佯作端庄的姑娘们青睐的目光。这其中颇具代表性的便是一位名叫贝丝·福兰斯比的布鲁克林女孩。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太喜欢他了，觉得他是一位出色的舞者。他个子很高，身材苗条，深色的皮肤看上去很阳光、很养眼。”而更加大胆直接的女孩则会单独约他出去。为此，他还创造出了一个聊天的套路。如果一个女孩开口说道：“哦，你是菲律宾总督的儿子。”那么他就会回答：“是的，女士，麦克阿瑟将军确实获得过这项殊荣。”尽管如此，他的艳福依旧不浅，他知道“调情步道”不只是和母亲一起散步的地方。多年之后，他承认自己曾经在和一位姑娘如胶似漆时刚好被一位战术教官撞了个正着。他记得那是一个“尴尬的瞬间”，但教官只是露齿笑了笑，说了一句：“恭喜你，麦克

阿瑟先生。”科修说，麦克阿瑟从不会和自己讨论他的情史，但后来有传言说他曾在1903年因为和8个姑娘同时订婚而创下了军校纪录。别人向他提起这件事时，他的回答充满了沙文主义色彩：“我不记得自己曾经在敌人之中如此抢手。”不管道格拉斯有过多少段感情，平克妮每一次都会出现，斩断他的情丝。她会邀请那些认为自己已经和道格拉斯私定终身的姑娘到柯蕾妮酒店来喝茶，向对方解释这一切都是一场误会，因为他已经将自己的终身奉献给了事业。这番话无疑引来了不少的眼泪与抗议，但道格拉斯直到那时都没有忤逆过自己的母亲。

1903年6月11日星期四，毕业班的学员们终于获准成为“西点军魂”中的一员——加入了西点军校自1802年创办以来积累的校友队伍。“麦克阿瑟！”一位副官大声喊出了他的名字，这位被同学们认为最有可能成功的23岁毕业生站在队伍前面第一个接过了自己的毕业证书。他转过身后就将证书递到了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参加他毕业典礼的父亲手中，然后又朝着正在台下微笑的母亲露出了笑容。紧接着，乐队接连演奏起了《我离开的那个女孩》《友谊地久天长》《甜美的家》和《今晚老镇里的快乐时光》。

作为一名少尉，他希望能够被分配到骑兵营去，但是按照他在军校里的成绩来看，他应该会被自动分配到陆军工兵团中，因为那里的军阶晋升速度更快。这其实并不重要，无论他在哪个部队中服役，最终都一定会被晋升。从职业的角度来讲，他并没有做好准备面对20世纪的战争。他从没有用过机关枪，也丝毫不了解倒挂铁丝网、坦克或是水陆两栖战。西点军校教给他的是一个指导原则，一句校训：“责任，荣誉，国家。”但这对他来说已是意义非凡。他曾对同学C. F. 西弗森坦言：“除了我的家庭，我最爱的就是西点军校。”换句话说，他一直都在努力，希望自己无愧于麦克阿瑟家族和“西点军魂”的标准。西弗森对于自己这位同学的看法没有那么浪漫。他发现，学员中对于第一上尉的看法主要分为两派：那些讨厌他的人都十分厌恶他的自大，而那些支持他的人则认为这样的青年才俊若是过于谦逊反而显得有些伪善。这样的意见分歧

将一直延续到下一代人身上，最终将美国分裂成两个历史派系。

人们也许很难想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甘愿做一个小小少尉的样子。事实上，他也的确不是一个平凡的少尉。20多岁的他已然成长为一个高傲自大、朝气蓬勃、无畏无惧的年轻人，满怀父母传承给他的雄心壮志。重要的是，借由政治上的便利，他毕业头两个月便随着政途多舛的父母去了旧金山担任陆军军官。一段时间里，他还曾自娱自乐地追踪过一个越狱的军事囚犯。“（他是）一个手持长柄大镰刀的壮汉。”事后，他是这样形容那个人的，“他躲在一个很容易被找到的地方……在他伺机转移之前我便监视住了他。当我把他移交给狱警时，他朝我吐了一口唾沫，破口大骂道：‘你这个该死的西点人！’”看来他那个时候就很爱作秀。

在旧金山的那段时光里，他大部分时间都在试图赶上这个世界进化的速度，弥补自己在4年哈德孙河畔遁隐生活中落下的“功课”。要想深入地了解麦克阿瑟，就一定要了解1903年的思想氛围，因为这其中的一部分思想也成了他日后衡量各项大事件的标准。从某些角度来讲，那是属于技术先驱的一年。这一年，第一部电影《火车大劫案》问世；阿瑟·D. 利特尔发明了第一种合成纤维“人造丝”；无线通信第一次联通了弗吉尼亚的老波因特康弗特和开普查尔斯；巴拿马运河区被交由美国永久占领和控制；莱特兄弟于12月在基蒂霍克上空驾驶飞行器完成了历史性的59秒飞行。在其他地方，社会责任感的浪潮也初见端倪——揭发各类丑闻的报道开始出现在《大都会》《科利尔》《人人》《麦克卢尔》和《美国人》等杂志上。艾达·M. 塔贝尔发表文章揭露了标准石油公司的恶行，林肯·斯蒂芬斯出版了文集《城市之耻》，而戴维·格雷厄姆·菲利普斯则发表了系列调查文章《参议院的叛国罪》。

这些无疑都有助于麦克阿瑟培养自己宽容、进步的一面，并为他于20世纪40年代末任日本总督时期提出各项改革建议奠定了基石。然而，

1903年对于麦克阿瑟的意义并不仅仅如此。从人文学角度来讲，这个国家仍禁锢在19世纪多愁善感的骑手文化之中。西奥多·德莱塞的兄弟——歌曲《沃巴什河岸边》和《我的萨尔姑娘》的作曲家保罗正接近知名度的巅峰。那也是《星条旗永不落》的年代。小男孩们的身上都会戴着印有电影中军队英雄、战舰和军旗的图片或是写有极端爱国主义标语的小徽章。吊床、折叠式躺椅、曼陀铃和印第安雪茄店都成了那个年代的象征，而那年夏天美国知识分子读的书则是吉卜林的《原来如此》、乔治·巴尔·麦卡琴的《酿酒师的百万横财》、汉弗莱·沃德太太的《罗丝太太的女儿》以及哈罗德·贝尔·赖特的《尤德尔的打字机》。富裕家庭的女子也开始大量地读书，其中一部分原因可能是因为她们除了打网球或练习两步舞与华尔兹之外，实在是没有什么事情好做。如果尚未婚嫁，她们无论去哪儿，身边都会有随从或侍女同行。如果已经丧偶，她们就必须服丧一年。若是已经成家，她们的身上则必须套上紧身胸衣、贴身背心、无袖衬衫、内裤、女式衬衫、衬裙和两件式的连衣裙，最后再加上一顶镶有从鸟儿翅膀上拔下来的美丽羽毛的帽子。平克妮·麦克阿瑟一年四季就都是这副打扮——就连被派驻亚洲热带地区时也一样。

社会地位低下的女性只能做苦工。她们之中，只有1/5的人能够找到工作（每周只能赚6~8美元，却要在磨坊或办公室的打字机前工作60个小时），然而，家庭主妇身上的任务更加沉重。和今时今日不同，那时候并不存在什么“家用小工具”。电力的到来只照亮了那些富人的生活，其他的美国人依旧生活在靠煤气灯照明的阶段。打电话聊天还不现实，全国只安装了1 335 911部电话，而且大部分都被安装在了办公室、公共场所以及富裕人家。没有好用的肥皂能够帮助家庭主妇清洗丈夫的痰盂或家里的铸铁浴缸。话说回来，能够拥有一个需要清洗的浴缸，就说明她已经足够幸运了。城外，在没有通水和通下水管道的地方，浴室和室内厕所同汽车一样，都是十分奢侈且罕见的。人口普查显示，只有13　824户人家拥有这样的设施。那时候的交通工具主要是铁路、有轨电车和缆车，而最普遍的还是马车。1903年时，马匹和现代的内燃机一样常见。它们可以被用来拖拽四人座四轮轻便马车、四轮单马马车、运货

马车和雪橇。就连消防车也是由三匹马的马队来拉动的。马路尚未铺设，用后世的标准来评价，行进起来十分缓慢。一次5英里的购物之旅往往要跋涉一整天。要想彻底了解麦克阿瑟那一辈人孤立主义的心态，就一定要理解他们眼中当时所认识的美国有多么狭隘。对麦克阿瑟来说，从适应那样的生活环境到指挥第一支联合国军队之间要跨越巨大的障碍——即便是用一生来调整和改变。这样看来，即便他没有完全扫清这个障碍，也没有什么值得惊讶的了。

和他们的妻子一样，生活在1903年的丈夫们也长时间地劳作在田间、店铺和办公室里。鉴于他们的年平均工资只有500美元，而像安德鲁·卡内基这样的企业界大亨每年的税后收入则高达2 800万美元——有人可能会期待一大批人聚集到尤金·德布兹的大旗下。然而事与愿违。典型的美国男人对于这个国家的那些“自食其力的人”和“工业界巨头”都感到十分骄傲，他们相信，只要有勇气与魄力，他们也能够成为像J. P.摩根那样的人，坐在自己位于曼哈顿麦迪逊大道和第36大街交汇处的褐砂石豪宅中的红木镶板装饰的书房里，数着上百万的收入。早在埃尔斯沃斯·M. 斯塔特勒还是个小男孩的时候，他可能已经在计划着要建造一座酒店，让里面的每一个房间都拥有一间私人浴室。而另一个小男孩可能正在设计一座可以匹敌纽约艾文斯·辛迪加大厦那样的美国第一摩天大楼，搭建令人头晕眼花的29层楼。这些梦想在霍雷肖·阿尔杰以及W. H. 麦古菲的作品的推动下进入了巅峰期。生活在那个年代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分享了上述所有特质，并将它们永久地保留和延续了下去。半个世纪之后，虽然他发表了对于自由企业的热情赞颂，却只有在人们想起他的心中还有一丝的浪漫情怀和怀旧情结时才有意义。在那段永远属于1903年的记忆中，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的老兵会举着爱国的火炬走在阅兵队伍的前列；一份午餐25美分，一份晚餐50美分，而一杯啤酒则只需要5美分；男人们戴着圆顶高帽，用直形剃刀刮胡子——他的父亲就曾经送过他一把这样的刮胡刀作为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礼物——那一年，少尉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从旧金山登上了“谢尔曼”号邮轮，和第三工兵营的战士们开始了为期38天的航程，准备踏上那片让他的父亲心碎

不已，却会让他名声大震的土地——菲律宾。

登陆马尼拉之后，麦克阿瑟视察了陈旧的大炮、古老防御工事的残垣断壁以及甲米地海军基地生锈的西班牙舰船残骸。站在甲米地，他可以越过深邃的蓝灰色海港，望向蝌蚪形状的深绿色火山岛屿、马尼拉的防御重点——科雷希多岛。他已经爱上了菲律宾群岛的这7 083座岛屿："那种能让最常规的生活琐事、爱好玩乐的男人以及如月光一样清秀可爱的女人都变得更加理想化的慵懒瞌睡感紧紧抓住了我，似乎永远都不打算放手。"

麦克阿瑟先是被派驻在了班乃岛的伊洛伊洛港，后来又被改派到了莱特岛的塔克洛班市，负责监督那里的码头建设并领导巡逻工作。一天下午，他发现那些曾经告诫他当地人不全爱好玩乐的人说的是对的。米沙鄢部落有些人就格外憎恨"美国佬"。那年11月，他无视那些人的威胁，带领一个分遣队进入了雨林，为了获取打桩工程所需的木材铤而走险，结果遇到了埋伏在附近的两个游击队员。一颗子弹穿过了他的宽边毡帽顶端，射中了他身后的树苗。他拔出一把点38口径的手枪，击倒了那两个游击队员。一位爱尔兰中士上前检查了尸体，回来后朝着这位23岁的军官敬了一个军礼后说道："请少尉原谅，不过少尉的生命应该是没有危险了。"在给母亲的书信中，麦克阿瑟像前辈乔治·华盛顿一样写道："我听到了子弹呼啸的声音。相信我，那声音中有种魔力。"不过，他事后也承认自己在那次枪林弹雨的严峻考验之中曾经吓得脸色惨白、浑身发抖。

感染疟疾之后，麦克阿瑟被送回了马尼拉。1904年3月，他在马尼拉参加了中尉军阶的考试。考试的其中一个环节是口试，由一位上校口述一个假设性的问题。麦克阿瑟被问到，在军队人数有限的情况下，他会如何保卫海港。在他作答之后，考官又换了一个问题。如果撤军了他又该怎么办呢？麦克阿瑟答道："首先，我会召集附近社区里所有绘制

广告牌的人，命他们制作写有‘小心——海港有雷’的指示牌，然后将这些指示牌全部漂放到海港的河口处。之后，我会跪下来祈祷，最后冲出去浴血奋战。”很显然，这个答案十分具有说服力，因为他第二个月便戴上了中尉的银色肩章。留在首都的他肩负起了出纳方面的工作，并担任驻菲律宾部队总工程师的助手。烧退痊愈之后，他接受了前去位于巴丹半岛顶部的马里韦莱斯调研的工作——在那里，他发现阿奎纳多将自己最后的据点放在错综复杂的半岛上的选择十分明智——回到马尼拉后，他某天晚上在陆海军俱乐部里与詹姆斯·G. 哈博德上尉吃了一顿晚饭，并在饭桌上认识了两位菲律宾年轻人，曼努埃尔·奎松和塞尔希奥·奥斯梅尼亚。

10月，麦克阿瑟乘坐“托马斯”号返回了旧金山。在那里，自他在西点军校与数学教官起冲突以来，他又一次出言冒犯了一位高级军官。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倒是情有可原。在反反复复的疟疾折磨之下，他已经在病床上躺了两个月，之后的身体状况有时会不太稳定。更重要的是，他的父亲当时正在中国东北观摩日俄战争，而母亲又过分地要求他抽时间陪她。在此期间，一位名叫威廉·W. 哈茨的少校派他去监督加利福尼亚山谷附近的一处开凿工作。“麦克阿瑟中尉……”少校向工程兵主任报告说，“……说他无法离开这么长时间，因为他的父亲不在，所以他必须替父亲打理一些事情。”哈茨注意到，尽管这位中尉“平时在遵从命令方面反应很迅速”，但还是无法预见“他将会以怎么样的热情来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不管热情与否，他完成的每一项任务都可做鉴戒。尽管少校对麦克阿瑟有保留意见，却还是委派他于1905年7月赴太平洋分区任代理总工程师。虽然这项指令看起来和麦克阿瑟父亲的职位并无关联，但3个月后下发到旧金山的另一项指令道出了其中的真相：

特别指令 战争部

第222号 华盛顿特区

1905年10月3日

陆军工程兵部队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中尉被解除当前职务，前往日本东京，向阿瑟·麦克阿瑟少将报道，任其副官。

战争部部长任命

J. C. 贝茨少将

代理参谋长

那时候，阿瑟即将开始自己对于东方的广泛考察，因而希望自己的妻子和小儿子能够陪伴左右。这对于一个年轻人来说简直是一次无与伦比的机会。10月29日，在一个下着雨的星期日，他跟随父母住进了横滨东方皇宫大酒店，并从星期三开始出发考察。他们先是参观了日本军队在长崎、神户和京都的军事基地，然后又乘船前往上海、香港和爪哇。圣诞节时，他们到达了新加坡，尔后的新年那一天是在缅甸度过的。1906年1月14日，他们停靠在了加尔各答的港口上。在随后为期两个月的印度之旅中，他们参观了英王爱德华时代的各大主要景点：马德拉斯、杜蒂戈林、奎达、卡拉奇、西北边境、开伯尔山口和大吉岭。4月，一行人又来到了曼谷，有幸与拉玛五世国王共进了一顿晚宴。紧接着，他们朝着“西贡”（胡志明市）进发，然后经由广东、青岛、北京、天津、汉口穿越中国大陆，最后再次回到上海，并于当年6月下旬返回了日本。

我们可以想象，道格拉斯戴着遮阳帽、身穿白色亚麻套装的模样应该像极了查尔斯·达纳·吉布森画报上年轻军官穿便服时应有的样子。他用美国显贵敏锐的眼神低头凝视着战火纷飞的亚洲。作为父亲的副官，他保管着一行人的旅行收据，计算着他们在旅途的前20周之内便已游历了19 949英里的距离。在曼谷享用晚宴时，灯光突然灭了，他很爽快地帮忙换了一根保险丝，给暹罗国王陛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提议为他出色的勇气而授勋给他。令他的母亲备感惶恐的是，这个年轻人居然彬彬有礼地拒绝了这项荣誉。英国殖民者在接待麦克阿瑟一家时所表现出来的“温暖而又专业的热情款待”给道格拉斯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相

比那些殖民统治者，他对于亚洲民众是否有足够的食物来防止饥饿、是否有充足的衣服来抵御寒冷或者是否有足够大的房子来供全家遮风挡雨这些事情更感兴趣。在离开加利福尼亚之前，他读到了参议员艾伯特·J.贝弗里奇于1900年发表的一篇演讲（其中讲了“统治太平洋的能力……就是统治世界的能力”），而他自己也通过观察肯定了这一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他在描写这趟旅程时还提到：“（这）无疑是为我的整个人生做准备的一个重要因素……我清楚地知道，美国的未来与现在的生存都将不可避免地与亚洲及其岛屿基地交织在一起。虽然我16年后才重回远东，但它的神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

7月17日乘船回家之前，麦克阿瑟父子和日本将军们谈了一次话，总结了他们对于新兴世界强国的印象。阿瑟·麦克阿瑟相信，日本的帝国主义野心彰显了“亚洲问题”的核心；他警示战争部部长要加强菲律宾的防御，以防止群岛的“战略位置从美国的有利条件变成一种负担”。对日本“普通百姓的节俭、礼貌和友好印象深刻”的麦克阿瑟中尉也不信任“封建制度下的武士阶级”。他着重强调了日本士兵的“大胆与勇气”以及他们的指挥官“钢铁般的性格和不可动摇的目的性”。

他还注意到了一些其他的东西。霍乱正在削弱日本军队。一位困惑的日本将军告诉这位美国中尉，他们给每个士兵都发了大量的胶囊药丸，并嘱咐他们每4小时服用一次，但这些药似乎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道格拉斯·麦克阿斯突然大笑起来。愤怒的将军要求他给自己一个解释。

“我并没有要冒犯你的意思。”麦克阿瑟答道，“我只不过在想，如果美国士兵拿到这些药丸，而且还得每4个小时就服用一次的话，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会怎么做？”

“好吧，他们会把这些药丸扔在出门后看到的第一个臭水沟里，然

后把吃药的事情忘得干干净净。”

“我的士兵是不会做出那种事情来的！”将军说道，“你等着瞧吧！我的命令是一定会被执行的！”

几天之后，几箱药品被贴上了这样的标签：“天皇要求每个士兵每4小时服用一粒胶囊。”问题就此结束了。霍乱传染病消失了。麦克阿瑟下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不管天皇的命令在这些军人看来有多么荒谬，他们都会盲目地遵从。

那时候，这句话中的含义似乎还有些遥不可及，但美国人霍默·李于1909年出版的一本内容深奥的预言书《无知之勇》再一次让麦克阿瑟想起了自己曾经做出的这番评论。“征服古巴的战役随着登陆部队远离任何要塞港口而结束。菲律宾的沦陷也一样。吕宋岛北部海岸的林加延湾或东部海岸的波利略湾会成为日本人的关塔那摩湾……如果美军仍旧留在马尼拉防线内的话，开战两星期后，他们就会被不计其数的敌人包围。”中尉在自己手中的这本书上重重地画下了几道横线，将它放在一边以备未来参考。

在麦克阿瑟的职业生涯中，恶心反胃的毛病持续在关键的时刻困扰着他。在结束了东方考察之旅后的两年中，他的病症发作得更加严重了——尽管一切从表面上看都很顺利。1906年秋，他被选送进了华盛顿营的高级工程学校——那里如今已更名为麦克奈尔堡。12月4日，他又因为西奥多·罗斯福想要征求他对于远东事务的意见而被任命为罗斯福的副官——这对于一个初级军官来说无疑如同一杯易醉的美酒。身处白宫觥筹交错的官场之中，他的仕途并非一帆风顺。（“议长先生，总统现在可以接见你了。”他碰了碰乔·坎农的袖子，低声对他说道。“浑蛋，他当然会见我了。”坎农怒吼了一声，在麦克阿瑟的脸上吐了一团烟气。）尽管如此，他还是从学校里顺利毕了业，并于1907年8月10日被

派往密尔沃基的工程办公室里负责河流与港口方面的工作。在那里，他与父母同住在北马歇尔大街575号的一座温馨的三层小楼里。那时的他还没有当上上尉，但晋升似乎是指日可待的事情，而他戴上星级军衔的可能性仿佛也在升高。

实际上，这样的可能性正面临消失的危险。沉迷于宾州大道1600号浮华的官场之中，他对待华盛顿营课程的态度有些漫不经心，以至于学校校长E·埃弗利思·温斯洛在1908年8月7日写给工程部主任的信中提到："我很抱歉地向您报告，麦克阿瑟中尉对于学校的课程似乎不太感兴趣，交由他完成的工程的品质和其他大部分学生的不相符，只能勉强通过最低标准……实际上，从整体上来说，麦克阿瑟中尉在我的监管下工作的这些日子里职业热情不高，和他在西点军校履历上记载的能力不符。"

除了这个被记入他档案之中的污点，更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在密尔沃基听命于威廉·V. 贾德森少校的那段时间里，他收到了互相抵触的命令。他那已没有具体职务的父亲想要多花些时间与儿子探讨菲律宾政治、神秘的东方以及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的罪行，而平克妮也想在参加密尔沃基的各项社交活动时将儿子带在身边。每一次解决实际冲突时，道格拉斯都会选择偏向自己的家人。贾德森为此颇为恼火，好几次找到麦克阿瑟，质问他为何长时间不到绘图室来工作或是缺席实地考察活动。第三个月月末，少校安排他前往60英里以外的北部密歇根湖港口进行重建工作。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贾德森写道，中尉"对这项工作提出了抗议，因为这将导致他长时间离开密尔沃基"。麦克阿瑟说自己"希望能在八个月之内不被打扰"。

尽管他苦苦抱怨，但还是在北部驻守了一个月的时间。重建工作因为寒冷的天气而被迫停工。他丢下工作返回密尔沃基，一直待到了第二年春天。按照少校的话来说，一想到融雪之后便要回到港口工作，他的"言语行动中便透露出了不满的情绪"。很显然，他对于自己的岗位并

不是很满意。尽管他这是在忤逆自己的上司，心里却似乎是在压抑对于父母的敌意，并试图想要逃离他们的管制；在拒绝了一个返回西点军校教书的教官职位后，他向父亲在战争部里的老朋友提出了申请，恳请他给自己安排一个远离威斯康星的岗位。与此同时，贾德森还起草了一份言辞苛刻的勤务评定报告书，并在结尾总结道："我认为麦克阿瑟在我的指挥下任职时并没有表现得可圈可点，完成任务的方式也不尽如人意。"收到这份报告书的副本，麦克阿瑟书写了一份言辞激烈的否认函，抗议"贾德森少校在我的从军履历上画下了不可磨灭的污点"，并声辩说"我在大部分时间里都没有工作，因而感觉自己在这个办公室里的存在实际上是并没有被当作有任何实用意义的"。他绕过少校，直接将自己的这份鲁莽之作寄给了任工程部主任的准将那里，不可避免地招来了准将的非难。他冷冰冰地表示，麦克阿瑟中尉的反驳正好"印证了贾德森少校的说辞，展示了麦克阿瑟先生显然不愿意接受外派任务的倾向"。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所有军官都应该"乐意立即遵从命令，忠心不二地完成分配给自己的任务"。

这次的训诫让中尉无力反驳，却激怒了他的母亲。而她的这份愤怒也是最有可能解释她后来古怪行为的理由。1909年春，她试图让道格拉斯退伍，并打算给他谋求一份有利可图的平民工作。4月17日，她给铁路大亨E. H. 哈里曼写了一封信：

> 亲爱的哈里曼先生：
>
> 3年前，在格里斯科姆大使驻东京的府邸中，我有幸在午宴上坐在了您的旁边。您当时和蔼可亲的谈吐，让我有勇气代表我即将退伍的儿子道格拉斯提笔写信给您。而且，我记得您提到过自己总是缺乏一流的人才，经常一有机会便外出寻觅这样的人。
>
> 我在此信中提到的这个儿子今年29岁……

平克妮暗示哈里曼在自己"庞大的企业"中给儿子找一个职位，并解

释说自己之所以如此上心完全是出于“母亲的关怀之心，想要尽一切可能努力寻找一份自己能够认可的、对他未来财富有利的工作”。然而，她并不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一计划告知自己的儿子。当哈里曼派一位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的代理商来面试麦克阿瑟时（那时的他已经被调往莱文沃思堡），他感到自己很狼狈。这位代理商在汇报中提到：“麦克阿瑟中尉对于进入铁路行业的计划丝毫不知情，为我们不辞辛苦地前来找他的事情感到十分惊讶，也有些恼怒。显然是他的母亲想要他退伍，而不是他自己有意要脱身。用麦克阿瑟中尉自己的话来说，他没有想要改行并接受我们提出来的任何一个职位的欲望。”

道格拉斯父亲的朋友J·富兰克林·贝尔少校将他改派去了堪萨斯。如果幕后操纵可以算作一个正当理由的话，这就是一个例子，贾德森摆脱了一个不听话的副官，而麦克阿瑟也第一次在指挥部队的过程中找寻到了自己的天职。他被任命为K连的指挥官，是边防站21个连中军阶最低的。他每天都要率领自己的士兵拉练25英里，向他们展示如何在修建浮桥时打破速度纪录，还要教他们射击术、骑术和炸弹的用法。在后来的检查中，他们连的成绩名列前茅。“即便他们让我做了将军，我也不可能这么高兴。”如今的他一鼓作气参与了许多活动，不仅书写了一本爆破战地手册，还担任了驻地的军官、军需官、食堂负责人、工程官和出纳官。在下一份勤务评定报告书里，他被赞是“一位最出色、最高效的军官”。看着他走过练兵场，一位名叫科比特的军士长告诉他的部下：“小伙子们，这才是军人。”

罗伯特·L. 艾克尔伯格中尉对他的表现印象深刻。和沃尔特·克鲁格以及乔治·C. 马歇尔中尉一样，艾克尔伯格也是麦克阿瑟在莱文沃思时的同僚。多年后，他生动地回忆起了自己某天晚上看到麦克阿瑟站在杂货店门口时的样子。他“和我们其他人之间都保持着一点儿距离，那姿态从远处看很像是拿破仑”。唯一一个和麦克阿瑟保持很大距离的军官便是马歇尔，这两位未来的五星上将早在那时便惹怒过对方。艾克尔伯格认为，这个来自密尔沃基的花花公子是个“长相俊朗、正直挺拔的军

人”，在大家眼中颇有大将之风。其他人记忆中的他还是个爱好交际的扑克玩家以及驻地马球和棒球队里热情洋溢的表演者（虽然他依旧不擅长击球，但还是被选为球队经理）。除此之外，他还十分热衷于在军营里搞恶作剧。一天早上，他出现在了伤病员医务室里，在被军医诊断为左手骨折时解释自己是“在营房里掰手腕时意外扭伤的”。他喜欢在部队聚会上出风头，虽然喝得不多，但最爱带领合唱团演唱《老兵不死》的歌谣。另一位在未来会晋升上将的军官约翰·C. H. 李随部队加入了麦克阿瑟所在的营区。回忆起麦克阿瑟，他提到了这位球队经理为了打败莱文沃思的棒球劲敌——堪萨斯城乡村俱乐部——而想出的那些独具创意的策略。一次，麦克阿瑟慷慨地为来此客场作战的对手设下了一场盛宴，害得他们在大快朵颐之后输掉了比赛。还有一次，他将两位身材魁梧的球员介绍给对方，说他们是刚从西点军校毕业的明星球员。实际上，这两个人是他从得克萨斯州花20美元雇来的职业球员。堪萨斯城队被打了个落花流水。

麦克阿瑟在莱文沃思驻守了4年。1911年2月11日，他被升任为上尉（中尉一职他已经做了将近7年的时间），被军队派到各处执行各种为期3~6个月的驻外任务。在其中一项任务中，他受罗伯特·E. 伍德之邀来到了巴拿马，研习了运河区的工程、供给和环境卫生问题。1911年年中，他与艾克尔伯格率领士兵们参加了得克萨斯军事演习。在圣安东尼奥扎好营棚之后，麦克阿瑟很快便赶回了西得克萨斯军校，希望能够重温自己的青年时代。然而，他的宽边毡帽受到了军校学员的嘲笑。根据新规，毡帽的上缘已经摒弃了皱皱巴巴的牛仔风，而是采用金字塔形状。“你是从哪儿弄到的那顶帽子？你是从哪儿弄到的那顶帽子？”他们用单调的语气追问着他，直到他仓皇逃跑。那一天晚上，他还回去看了自己的旧宅。按照他的话来形容，那是“一个月光照耀下的美好夜晚，空气中飘荡着吉他和曼陀铃久久不散的旋律，让人听了血脉贲张”。一个金发的女子走出来与他说话。“你在这里做什么？”她语气尖锐地问道，“我相信你一定是醉了。滚开，不然我就叫守卫过来。”上尉再一次退却了。尽管他在那里的帆布大营中住了四个多月的时间，却再也没有

回过学校：“我学到了人生中苦涩的一课：永远也不要试着回到过去，烈火会把一切都化为灰烬。”

第二年，一个更加令他感到心痛的事件再一次将他与童年的记忆分割开来：他的父亲去世了。一个当时还不算太大的问题因为这件事而急剧恶化起来：她母亲的需求。葬礼之后，道格拉斯和哥哥留在了密尔沃基，试图安抚她的情绪，但都失败了。她不仅展现出了丧失亲友的人身上会出现的各种悲痛神情，还坚称自己已经病入膏肓了——这是她第一次称病，但并不意味着是最后一次。这样一来，兄弟二人中就必须有一个留下来照顾她。鉴于阿瑟三世在舰船上服役，这个重任自然而然地就落到了道格拉斯的身上。他要求战争部将自己重新分配回密尔沃基，并解释说自己母亲患上了“严重的病症”，情况“令人担忧”，因而“害怕”母亲“会因此而丧命”。但华盛顿方面并没有忘记温斯洛和贾德森两位少校提交的报告：他的要求被拒绝了，因而道格拉斯只得将平克妮带回了莱文沃思，并提出了一个新的请求，说自己发现“我的军阶有资格居住的营房完全无法满足一位病人的要求”。显然，母亲的抱怨分散了他的注意力。边防站的军医注意到，他连着两周都在忍受失眠的痛苦，脾气也变得焦虑、压抑，而且无法进食。他如此两难的境地似乎得不到解决。C·范恩·伍德沃德写道，他当时的处境和罗伯特·E. 李十分相近。后者也曾因为“重病的母亲而变成了一个乐意献身、充满爱意的奴隶”。

最后，还是他死去的父亲“伸手”帮了他一把。虽然这位老兵已经去世，但有关他的回忆还依旧萦绕在同僚们的心头。时任参谋长的伦纳德·伍德将军曾经和麦克阿瑟总督一起在温格特堡服过役。伍德记得平克妮和小道格拉斯，也对他们的不满有所耳闻——他得知这一消息的来源无人知晓，也许就是平克妮自己透露给他的——于是便说服了战争部部长亨利·L. 史汀生，让他为此做些什么。史汀生催促军务局局长“看在阿瑟·麦克阿瑟将军出色的功绩上”出面解决此事。于是，在父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被调往华盛顿，直接在伍德的手下工作。那年圣诞节前，他带着奇迹般康复的母亲住进了位于第6街和U街上的

哈多利公寓。这也是麦克阿瑟第二次到首都赴任。这一次，他在父亲友人的担保之下被安置在了军事力量的核心部门里。

不出一个月的工夫，麦克阿瑟已经被委派随参谋部外出执行临时任务了。1913年5月3日，他被任命为老国务、战争与海军大楼的负责人——如今的行政办公室大楼就在白宫对面的行政西大道上。9月25日，他又被提名为参谋部的正式一员。33岁都还没有结婚的他气质优雅、体态苗条，体重140磅，是首都条件最好的单身汉之一。然而，他下班后很少离开哈多利公寓。如果母亲明确告诉他，他应该拾起父亲倒下的旗帜，他无疑会一直这样下去，直到终老：他心中热诚的火焰比任何时候都要明亮，他正等待着一个机会，让他能够证明自己也可以成为传教士山一役中那样的英雄人物。1914年春，机会来了。美国与墨西哥眼看就要开战，反动的维多利亚诺·韦尔塔将军攻击了美国军队。4月22日，战争部部长令伍德待命，一旦两国爆发战争，便“指挥一支远征军”应战。那天正好是星期三。第二天，迫切需要情报的伍德决定委派一名间谍，而麦克阿瑟上尉就是他的不二人选，奉命“通过侦察以及与现状相符的其他方式搜集一切对于未来战事有价值的信息”。当时，上尉的急性扁桃体炎刚刚痊愈，但他的母亲很快便将他从床上拽了起来，让他穿好了军装。坐上美国军舰“内布拉斯加”号，他于5月1日星期五到达了韦拉克鲁斯。

面对当地的情形，他发现自己既需要付出勇气，也需要用到技巧。威尔逊总统下令命海军控制了韦拉克鲁斯，因此城中驻扎的全都是准将弗雷德里克·芬斯顿指挥的部队，而他曾是阿瑟·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时的下属。被包围的芬斯顿部队面对的是1.1万韦尔塔军。如果墨西哥指挥官知道美国人正在盘算着前进，就一定会热血沸腾地发起进攻。一个“闲逛”到他们战线里的美国二等兵已经被他们处决了，这无疑是在警示麦克阿瑟，如果他前去搜集情报，很有可能也会将自己送进敌人的手

中。从另一方面来讲，如果战争真的爆发了，那么伍德肯定需要知道在郊外还能使用什么交通工具。出于更加复杂的原因，芬斯顿对于麦克阿瑟的任务还一无所知。但他的所作所为其实是在保护芬斯顿自身的安全。准将在自己6月3日的日记里提到，他是“不允许属下越过前哨前去侦察的……如果这样的状况引发了一场灾难，那么我肯定责无旁贷”。麦克阿瑟只听命于华盛顿，不需要服从任何人的指令。然而，在他估算了问题的严重性、决定单枪匹马深入墨西哥领土之后，还是很快就向芬斯顿的几位部下吐露了自己的计划。这其中就包括了第4步兵团的上尉康斯坦特·科迪埃。

韦拉克鲁斯当地很少能够见到马匹、骡子和卡车，铁路上停满了火车车厢，却没有火车车头。沿着当年44岁的工程上尉罗伯特·E.　李在77年前走过的路线，麦克阿瑟决定到内陆去寻找车头。在叫醒了一位工程师，又找来了两名铁路消防员之后，他承诺付给这三个墨西哥人价值150美元的黄金，条件就是带他去找火车头。他让两个消防员先行出发，然后搜了搜工程师的随身物品，没收了一把点38口径的左轮手枪和一把小刀，还允许工程师搜了他的身，以证明自己身上没有带任何的现金——除了麦克阿瑟的身份铭牌和一把小手枪之外，墨西哥人什么也没有找到。日落时分，一行人离开了第7步兵团的前哨，用手摇车朝着东南方向行进。那辆手摇车应该是被人抛弃在了哈马帕河岸边的，旁边还支着一座垮塌了的铁路桥。在给手摇车做好伪装之后，麦克阿瑟和工程师坐着独木舟过了河，骑着他们在一个小棚屋附近找到的小马绕过了居民区，按照预定计划与带着另一辆手摇车等候他们的两位消防员会合。

他们一步步深入了韦尔塔统治的城市。鉴于麦克阿瑟身上穿的是军服，长相又明显是盎格鲁–撒克逊人，他每到一个村落便会丢下车子，让其中的一个人来给他做向导，围着村子转过一圈之后再在村子的另一头与另外两个守着手摇车的人会合。凌晨1点钟，他们到达了阿尔瓦拉多，距离芬斯顿的前哨已有35英里之遥。他们总共找到了5个火车头，其中2个是无用的调车机车，而剩下的3个则“正好是我们需要的——车

况良好的大型火车头，上面只有几处小零件丢失了。我仔细地检查了这些机器，然后开始往回走”。

据他所说（他报告中的大部分内容在科迪埃的后续调查中得到了印证），回程一路都是血雨腥风。在萨利纳斯，5个全副武装的人朝着他们开了火。麦克阿瑟用自己的大口径短筒手枪击倒了其中的两个人。到达彼得拉时，他们的视线被飘来的浓雾遮挡住了，结果撞见了15个带枪的骑兵。骑兵的子弹中有三颗都射穿了麦克阿瑟的衣服，还打伤了同行的一个墨西哥人，而他则还手打死了4个骑兵。快到拉古娜时，又有3个骑兵朝着他们开枪射击，并再一次射穿了麦克阿瑟的军装，这一次，麦克阿瑟干掉了其中的一个敌人。过哈马帕河时，独木舟沉了，他拽着受伤的墨西哥人躲到了安全的地方。天亮以后，他们找回了之前伪装好的手摇车，赶在早晨晚些时候返回了美国的防线之内。当天下午，麦克阿瑟给伍德写去了一封简信，汇报他此次的暗访情况，并加了一句：“芬斯顿将军将大局把握得很好，几乎没什么可以挑剔的。但是，我敬爱的将军，我还是想念您分明决绝的思维所带给我的启发。我真诚地希望这里的事情能够水落石出，让您可以立刻上阵作战。这样一来，如果死神没有向您招手，那么您就只有一个去向了——那就是白宫。”

战争并没有打响，伍德也没有出征，所以他应该是永远也不能入主白宫了。然而，韦拉克鲁斯事件揭示了麦克阿瑟身上的许多特质：机敏的反应、对地形的掌控、英勇的气魄以及对上司的谄媚。未来，他还将借用“明日总统”的由头向另一个助他一臂之力的人表达自己的感谢。这个插曲的后果是以另一种方式显现出来的。伍德推荐他获得荣誉勋章，指出他的这一次探险是“冒着生命危险”并“出于自己主动”，展示了“值得高度赞扬的进取心和勇气”。评奖委员会当场拒绝了这项推荐，因为芬斯顿对于此次的侦察并不知情，所以授勋给麦克阿瑟上尉“可能会鼓励其他参谋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无视当地指挥官的命令，扰乱指挥官对抗敌军的计划”。面对如此荒谬的理由，上尉当然有理由表示自己的反感，但他并不满足于此，而是进一步提交了一份官方备忘录，抗议评奖

委员会“死板的狭隘思维和想象力的缺乏”。不过此举对他来说显然是无益的，只能让那些认为他喜怒无常、特别爱告状的人更加笃信自己的看法。

他永远都是自己最大的敌人。只不过他的天赋强大到足以让他反复战胜自己。从墨西哥返回之后，他被重新任命为参谋，并于1915年12月11日被晋升为少校。在美军极有可能参与欧洲战争的情况下，他和海军部副部长富兰克林·D. 罗斯福一起负责国防和经济动员方面的任务。陆军新参谋长休·L. 斯科特在一份勤务评定报告中提到，“麦克阿瑟少校是一位品格高尚、尽职尽责、效率颇高的军官，十分符合其所在岗位对于外交能力和高智商的要求”。虽然只要他愿意，他可以在任何其他场合下表现得目空一切、刚愎自用，但在那段和平年代的最后几个月中，帮助他崛起的还是他和蔼亲切的品质。他被委派接待各国访问官员的频率越来越高。1916年，国防法案通过之后成立了40万人的国民警卫队，战争部部长牛顿·D. 贝克准将任命麦克阿瑟作为自己的军事副官，并将新建的新闻办公室交由他特别管理。7月，他被任命为新闻检察官，并按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成了“战争部与新闻工作者之间的联络人”——换句话说，也就是公关主任。

作为新闻检察官，他的职责便是安排各种采访，发布战争部针对军事政策、国会议案以及潘兴将军在墨西哥追击潘乔·比利亚等内容的新闻稿。9个月后，当美国正式对德宣战时，29名记者公开对这位联络官“这几个月来所付出的努力”提出了赞扬，还表示“我们对于麦克阿瑟少校的光明前途毫不怀疑。功绩面前人人平等，他一定会获得属于自己的军衔和荣誉；但我们希望对他在过去的那段困难时期中长时间面对我们时所表现出来的和蔼、耐心以及提出的明智建议表示感谢……如果这些明智的决定最终也能影响我们国家的军事政策，那么少校无疑通过我们的帮助塑造了民心”。

这其中的第一个重要决定便是通过抽签来征召年轻人入伍。在这件

事情上，麦克阿瑟担任了关键的角色。R·欧内斯特·迪普伊上校事后表示：“麦克阿瑟的行为成功地让国家和国会做出了一个看起来不太可能的决定：征兵法。没错，就是那时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校……说服美国人民于1917年5月18日通过了义务兵役法案。”

第二个问题就是国民警卫队编制的人是否应该参战。战争部的一份研究报告力劝绕过这一编制的人，转而将50万人编入常规军的阵容之中。拿到这份报告的麦克阿瑟表示：“我已经厌倦了过度工作，也厌倦了直言不讳地表示自己完全不赞同报告中的结论，更不想试图详述我的理由。因为我觉得根本就没有人会在乎我说了些什么。”他猜对了参谋长的想法，却没有猜中贝克部长竟然如此相信国民警卫队的士兵。贝克在召见他时对他说道：“拿上你的帽子。我们要把整个问题都拿到总统的面前，让他来决定。”两人在威尔逊总统面前讲了两个多小时，建议“最大限度地发挥国民警卫队的作用”。最后，总统终于开口了：“我大致同意你们的看法。贝克，去执行吧。还有，少校，谢谢你的直言不讳。”

不过，警卫队是由各州政府组织起来的，因此需要格外谨慎对待。贝克事后表示，自己也意识到了“公众的心理仍旧是一个不能确定的神秘因素”。应该先送哪个州的警卫队前往法国参战呢？战争部在这件事情上似乎没有什么胜算，因为被派遣的警卫队队员的家长肯定会抗议，质问为什么要先将他们的儿子送出去牺牲。另一方面，其他州未被派出作为先遣部队的警卫队队员又可能为自己没能第一个迎战德国人而所有怨言。战争部部长将这个难题摆在了麦克阿瑟和负责国民警卫队的准将威廉·A.　曼将军面前。麦克阿瑟建议同时从几个州的警卫队中抽调人选。准将对此表示赞同，并进一步提议将抽调范围扩大到26个州。据贝克描述：“站在一旁的麦克阿瑟少校说道：‘好的，这就好像是一条伸展在整个国家上空的彩虹一样。’”这支队伍因此便被称为“彩虹师”。

曼将军被选为“彩虹师”（正式名称为第42师）的指挥官。鉴于准将

已经邻近退休年龄，麦克阿瑟提议选派参谋中最优秀的一名上校作为准将的参谋长。贝克对他说道：“我已经为这个职位选定了人选。那就是你。”麦克阿瑟犹豫了一下，指出自己只不过是一个少校，因此没有资格担任此职。贝克将一只手臂搭在他的肩膀上答道：“你错了。你现在就是上校了。我马上就签署你的任命书。我猜你应该想要参加工程兵团。”麦克阿瑟回答：“不，我想要进步兵团。”后来，他解释说自己一直深受父亲过去在第24步兵团的战绩的鼓舞。而其他人则推测他可能知道战时冲在前线的军官晋升速度往往更快。无论如何，工程兵主任威廉·M. 布莱克上校对此很是不满。他把麦克阿瑟叫了过去，告诉他这样的职位调换是不合适的，还警告他：“小心点儿，年轻人。你很快就会回来找我的。”麦克阿瑟笑着摇了摇头答道：“错的是你，上校。我永远也不会回到你这里来了。”

---

1. 1英寸=2.54厘米。——编者注
2. 宾州大道1600号，即白宫。——译者注

第二章
冲锋陷阵
1917~1918

1917年时，法国最明显的地理特征便是西起英吉利海峡，东至瑞士边境466英里处的一条蛇形双链战壕。隔着荒无人烟的土木工事，协约国的士兵们蹲守在西部前线与敌人对峙，周围被散发着恶臭的排泄物以及腐烂的尸体所包围，在点着蜡烛的战壕和堆满沙袋的沟壑里过着隐士般的生活，眼前要么是弗里库尔的白垩土地和拉巴赛的黏土地，要么是佛兰德的沼泽泥潭。他们自1914年夏天起便一直驻守在那里。那个时候，灰衣的德国军队刚刚横扫了比利时，包围了凡尔登的防浪堤，退出巴黎城门口的马恩河并撤回了埃纳省。在协约国发起猛烈回击时，高效的“普鲁士人”已然定居下来，开始教起了法国孩子说德语。

在接下来艰苦卓绝的挣扎之中，尽管协约国发起了大规模的进攻，但鉴于他们在凡尔登和索姆河的会战中已经丧失了近200万兵力，从战略上讲仅能算是包围袭击。每一次进攻都只会凸显德国皇帝的军队防线

是多么牢固。英法士兵爬过护墙，匍匐在进攻起点线上，等待着上司吹响进攻的号角，不料面对的却是十几扇挂着拇指般粗壮倒钩的铁丝网和网后密密麻麻的德国士兵。为了攻陷战壕，协约国军队付出了令人震惊的代价（每向前推进700码[注]的距离就要丧失2.6万兵力），然后再重新开始包围进攻。伦敦和巴黎的报纸一直在宣扬“锤头战”和“大推进”，但军队的士兵心知肚明。他们中间流传着一句名言，说战争会持续100年，其中5年是在打仗，而剩下的95年则是在铰倒钩铁丝网。

那是一段诡异而又污秽的人生，显然和他们备受呵护的童年生活截然不同，不过倒是和儒勒·凡尔纳的小说有些相似。有人心酸地想起了战前的日子——细雨纷飞的黎明，小鸟唱着歌在洒满月光的田野上飞过，高大的黄色杨树林矗立在远处的天际线上——然而边境上的声音和颜色如今都已变得格外可怖。四处都是子弹爆裂弹动的金属声；头顶上炮弹的声音无止境地低鸣着；榴霰弹的橙黄色气体和飘散着蛇形黄色烟雾的芥子气在农田里散发着酸臭的气味；信号弹则闪耀着各种耀眼的光芒。只有小型的植物能够在此存活。低矮的天空映衬着残破树木的剪影。刚刚应征入伍的士兵坐着可以容纳40个人或是8匹马的火车车厢来到这里，踏着挡泥板走向他们围绕着战壕修建的新家——每个人都会领到一把双刃短刀、一根拐杖和一根杆状潜望镜。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还会得上名为“战壕足病”“战壕口腔牙龈炎”和“战壕热”的疾病。

即便是在没有战事的区域里，也会有一定的伤亡比例——讲究条理的英国人称之为“正常流失”。幸存者往往都是些身临险境却依旧反应敏捷的人。一个警觉的年轻士兵能够学会分辨哪些机器的声音对他是有威胁的。几声过后，他的耳边开始嗡嗡作响，眼前的一切都变成了猩红色。他意识到光是蹲下身子已经无济于事了。如果他是个机枪手，那么他就会知道自己在战斗中的预期寿命就只有30分钟，迟早都会面对死亡，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了。他会从机枪弹链上适合的位置拆下弹匣，好让武器能够敲击出熟悉的节奏，例如“理发修面，两角五分”这样的小调。向敌人的战线扫射一带又一带的子弹，而水冷枪管蒸腾的热气简直

可以煮开一碗汤。如果发现德军用尽了榴霰弹，只好随机应变，一阵狂轰滥炸之后，便会迫不及待地在战壕里搜寻任何敌人丢下的有用物件。有时候你能找到好用的螺丝、钟表的齿轮甚至是一套合适的假牙。这种轰炸只不过是整场战争的象征——荒诞、无情、可憎、阴森。战争说起来很简单，就是世界上发生过的最可怕的事情。

然而……

除了带来无可比拟的恐惧之外——第二次世界大战、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的疯狂程度永远无法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比——总有些弦外之音将1914~1918年之间发生的那些令人震惊的事件归结为在劫难逃的厄运。即便是19世纪临终时的丑陋哀鸣也保持着某种神秘的特质，而最为淋漓尽致表现这一特质的还要数那些绝望岁月里流行的音乐。应该没有其他战争能够启迪人们写出这么多深刻的旋律了，单看歌名就能引发人们的情感共鸣：《蒂珀雷里》《让家里的炉火燃烧》《一条漫长的小径》《那时那地》《收起你的烦恼》《直到我们再次相见》。1919年，待硝烟飘散，一位没有过海出征的上校描写麦克阿瑟时提到："我很难想象这个敏感焦躁的大人物在泥巴里跋涉、忍受肮脏污秽的条件、穿着发臭的衣服、爬过倒钩铁丝网下纵横交错凹凸不平的土地，只为了和野蛮的敌人殊死搏斗的情景。"唯一的解释就是，像麦克阿瑟这样的人是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雄主义思想教育下长大的，因而在面对噩梦般的阵地战时也带着对无上荣誉的过度妄想。

夺取凡尔登失败之后，德军很少再进犯法国边境，日常战报显示西线的战事相对平静了许多。从其他地方传回来的也几乎都是利好消息。有了内部战线的庇佑，协约国军队不再需要冒险两栖作战，而英军也得以从达达尼尔海峡战中恢复元气。只要重新安排几趟火车，他们就可以向任何地方出击。趁着西线持续僵持的工夫，他们每年秋天都可以击败一个羸弱的东部同盟国，从而将部队解放到法国来。

1914年，德军在东普鲁士痛击了俄国军队。1915年，保加利亚加入

了战局，打算和他们并肩作战将塞尔维亚踢出战场。1916年，看到俄国人暂时得志，又出于对领土的渴望，罗马尼亚加入了协约国，结果却以惨败结束。尽管罗马尼亚军方在这两年内增加了一倍的兵力，但在战略上仍是孤立的。军官们在布加勒斯特的街头征兵时，间谍将城外的一座装有900万发弹药的兵工厂炸成了平地。此外，从西线调来的12支德军部队蜂拥而至，占领了喀尔巴阡山，趁冬季封山之前攻陷了罗马尼亚。

中东的故事也一样——只有由英国考古学家T．E．劳伦斯率领的一个骑着骆驼的突击小组带来了一线希望——1917年，趁俄国内部出现革命浪潮，德军派了一支精英部队前去增援奥德联军在意大利的兵力。10月24日，他们冒着浓雾在尤利安阿尔卑斯山脉附近作战。不出12个小时，守军便逃跑了。到了11月，惊慌失措的威尼斯人早已藏好了圣马可教堂的铜奔马，做好了逃走的准备。等意大利军队重整旗鼓时，他们已经丧失了60万兵力，撤向了皮亚韦河。

这还不是最糟糕的。1917年的法国已经陷入了恐慌。早在春天时，英法两国还自信满满，各自盘算着要让这一年成为西线的决战年，并集结了规模最大的兵力，准备突破敌军的防线。法军用罗贝尔·乔治·尼韦勒替换掉了慢热的约瑟夫·雅克·霞飞，准备在彪悍的新统帅的指挥下展开“势不可当的攻势”。就连英国将军们也对尼韦勒青睐有加。在他的战斗口号带动下，协约国的首都沸腾了：“150万法国人是不会失败的。”

不幸的是，这份欣喜、呼号，甚至是进攻计划全都传到了德军首领保罗·冯·兴登堡和埃里希·鲁登道夫的耳朵里。换句话说，进攻计划早已被法国报纸披露，而军事命令也下达到了以连为单位的底层机构中，德军只要抓住几个俘虏便可以收到情报。尼韦勒对此心知肚明。他也清楚鲁登道夫会以战略撤退的方法来还击，并在他发起进攻时弄脏水井、设下饵雷陷阱。但尼韦勒坚持不愿做出任何的改动。实际上，这一决定让一切都毁于一旦。新的兴登堡防线堪称防御者的梦想，让尼韦勒的进攻演变成了一场混乱的大屠杀。他没有收获任何实际利益，攻势一停便引

发了法军的强烈不满。在军队内部叛乱的顶峰时期，16支军队中有14支都宣布罢工。法军在无形中被击败了。在1914年的撤军过程中法国已经丧失了近100万名士兵。因此，面临新的损失，法国人已经没有人力再去组建全新的战斗力量了。幸存下来的士兵们闷闷不乐地蜷缩在战壕里。为了抚慰他们的伤口，政府任命了一位冷静的新元帅，亨利·菲利普·贝当。

如今，绝望的协约国把希望寄托在了英国陆军元帅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身上，而爵士则以艰苦卓绝的佛兰德战役回应了他们。从伊普尔进发，英军迅速朝着德军在比利时的潜艇港口跃进，却没有抓住机会。原来德军并没有对他们的到来感到惊讶。一场事先准备好的轰炸差一点儿就摧毁了佛兰德人的排水系统。淤堵的水流如洪水般涌入了战壕，而一场三十年不遇的大雨更是将一切都浸泡在了水中。在这个凄凉的污水井里徘徊了三个月之后，黑格勉强攻下了帕斯尚尔村，可他的部队已经筋疲力尽。在伦敦，救护列车每晚都会悄悄将伤病员运回，再偷偷将他们送回家去，以免打击士气。在佛兰德的田野里，罂粟花在一排排的十字架间绽放，簇拥着15万名刚刚为国捐躯的英国士兵的英灵。“我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美国的后备军。”大英帝国总参谋部参谋长威廉·罗伯逊爵士说。贝当也表示：“我要等待美军和坦克。”

美国多多少少是无意中被卷入这场灾难的。当时，德国皇帝决心切断英国的粮食和物资供应，并宣布对中立国的海运船舶发起不受限制的潜艇战。他的海军顾问们向他保证，这样的孤注一掷是稳赢的，因为英国人等不到美军大规模登陆法国便会被饿死。他们的推测几乎是对的。但在美国国会正式对德宣战以后，海军上将威廉·S.　西姆斯立刻就动身前去评估协约国的战势。在伦敦，英方的约翰·杰利科爵士告诉他，德国人的U型潜艇将英国打得毫无回击之力，而口粮的补给量也越来越紧缩了。英国政府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就连那些残疾人、疯子甚至是一些死人都收到了征兵通知——但还是远远不够。每4艘货船中就有一艘会被击沉。现在国内只有6周的粮食补给了。杰利科预计，协约国11月1

日之前就会投降。与此同时，身在巴黎的潘兴也被法国将军们告知，法军已经快要弹尽粮绝了。

最终，英国海军发现自己的护航舰是可以抵御潜艇袭击的。1918年仲夏到来之前，在几艘经过伪装的护航舰的运送下，30万名美国步兵将在一个月的旅程中跨过大西洋。不过，1917年10月19日，当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校在霍博肯与第42师的其他成员一同登上“卡温顿”号时，他绝没有想到自己还能够再看到陆地。实际上，船在距离圣纳泽尔港口40英里的时候就搁浅了。那里正是U型潜艇徘徊潜行的地方，而且“卡温顿”号在回程经过那里的时候被击沉了。不过那时候麦克阿瑟已经带领自己的部队迎着冷冷的细雨登上了海岸。虽然他名义上只是“彩虹师”的总参谋，但实际上就是临时指挥官；威廉·曼上了年纪，又体弱多病，一直卧床不起。12月19日，潘兴任命自己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查尔斯·T.梅诺尔少将作为部队新的指挥官。在麦克阿瑟看来，这个任命是十分理想的，并且他成了梅诺尔最热心的仰慕者，不仅甘愿为其肝脑涂地，还与其一样热爱“彩虹师”。

麦克阿瑟对第42师的忠诚早就历经了考验。11月，他的部队在南锡扎营时，团里的33名精英军官受命转去了其他的部队。麦克阿瑟来到潘兴位于肖蒙的总部进行抗议，但他的反对意见被忽视了。11月20日，他在还没有来得及赶回去时，便接到通知说肖蒙的高级官员们决定让第42师的士兵来替换其他的部队。当时，部队里还没有设立审查制度，因此麦克阿瑟给华盛顿发去了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不久，一些颇有影响力的参议员以及派驻了代表参加“彩虹师”的各州国会议员便回电要求保持部队的一体性。再次到访肖蒙，麦克阿瑟又力劝自己的老友詹姆斯·G.哈博德——如今的准将以及潘兴的参谋长——出面介入。哈博德照做了，而潘兴最后也屈服了，又任命了另一支部队作为替补。在麦克阿瑟的回忆录中，他承认自己的政治活动“可能并没有严格遵循正常的程

序，因而引起了潘兴下属中某些成员的反感”。这话的确不假，但也是十分重要且可以理解的。后续事件表明，一个对麦克阿瑟充满了敌意的小集团已经开始在肖蒙成型。对于别人的轻视一向十分敏感的麦克阿瑟将这群人与评奖委员会的人归为一类，因为他们都否认自己具有获得荣誉勋章的资格。他开始相信，军队里有人想要试图伤害他——也许是某些埋头案头工作的人在嫉妒和厌烦征战沙场的军官。这就是他妄想症的开端，让他在未来的岁月中对自己和他人都充满了愤怒。值得注意的是，肖蒙最机敏的年轻上校正是乔治·C. 马歇尔。在法期间，两人之间的对立状况与日俱增，从而以另外的方式给两人效忠的国家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不过，在“彩虹师”的队伍中，麦克阿瑟身边围绕的都是朋友。被调走的33名军官中，有好几位都是他的追随者——其中之一便是准将查尔斯·P. 萨默罗尔，一位和潘兴及麦克阿瑟一样从西点军校毕业的第一上尉，并且和潘兴一样曾是阿瑟·麦克阿瑟的属下——但大部分人都留了下来，其中最著名的包括罗伯特·伍德上校和威廉·N. 休斯少校（麦克阿瑟兄弟在赛尔登堡时的军队子女玩伴）。每一天，第42师这位雄赳赳气昂昂的参谋长都会结交到足以让他在停战期至珍珠港战役之间那段平静的日子里倍加珍视的朋友，而这些朋友的名单读起来就像是“一战名人”的名录。来自纽约的“野蛮比尔”·多诺万曾在他的麾下战斗过，还有来自密苏里的炮兵上尉哈里·S. 杜鲁门。埃尔西·贾尼斯为他唱过歌。埃迪·里肯巴克给他讲过笑话。弗朗西斯·P. 达菲神父为他念过祷文。曼费雷德·冯·里希特霍芬男爵的空军中队曾经试图从低空扫射他，却在只有100码的上空被他认出了飞行员黄色围巾。此外，威廉·米切尔还学着麦克阿瑟的方法将军帽里的金属帽顶圈拆了下来，从而造就了“二战”美国飞行员军帽俏皮轻巧的外形。

虽然对于在太平洋上战斗过的老兵来说，信任别人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于1918年跟随麦克阿瑟征战过的士兵却十分崇拜他。和其他的高级军官相比，麦克阿瑟与他们年龄相仿，还鼓励他们称呼自己为“兄

弟”，甘愿与他们同甘共苦，并对他们关爱有加。停战协议签署17年之后，他在一次“彩虹师”聚会上说道：“世界大战中美军士兵不朽的坚毅态度、爱国的自我牺牲精神以及无法被超越的军事天才将永远绽放光芒；通过青春与力量、热爱与忠诚，每一位士兵都付出了人类所能给予的一切。他们不需要我或任何人来歌功颂德，他们已经写下了自己的历史，并将其用鲜血铭刻在了敌人的胸膛上。可每当我想起他们面对逆境时的隐忍、面对炮火时的勇气，以及面对胜利时的谦逊，心中总是充满了一种难以名状的情感。”他还说道：“我的思绪回到了跟随我们一起出征却再也没有回来的人身上。透过回忆的眼睛，我依旧可以看到他们——面容冷峻地面对着敌人的攻势，嘴唇铁青，身上满是污泥与尘土，在避弹坑里忍受着冰冷的风雨，向着他们的目标以及上帝的审判椅进发。我虽不知道他们出生时是否尊贵，但我知道他们死得光荣。”

麦克阿瑟指挥的部队之一是美军第168步兵团。这支队伍源自艾奥瓦第51步兵团，也就是阿瑟·麦克阿瑟在菲律宾时统领过的队伍。当一位法国少校夸赞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手下的战士颇具军人风度时，麦克阿瑟当着队伍的面答道：“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就连我的父亲都为他们感到骄傲。”队伍解散之后，每个士兵都听到了他刚才的评语，而这也让他的声誉更上一层楼。同样地，他也夸奖了由来自亚拉巴马、俄亥俄和纽约州的士兵组成的美军第165步兵团，也就是老的“第69战团”。事实上，他实在是太受欢迎了，以至于某些步兵都准备好将第42师的所有吉兆全都归功在他身上。这其中就包括他们在途中看到的两道壮观彩虹：一道在他们结束了4周的阵地战集训后离开巴卡拉时横亘在天空中，另一道则是在他们进攻乌尔克河时出现的。乔治·肯尼讲述了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时认识的同学想要寻找麦克阿瑟的故事。那位同学询问戴着红色、黄色、绿色和蓝色臂章的士兵见到他们的参谋长时是否会认出他。其中一个士兵理直气壮地告诉他，“第42师的每一个士兵”都认识麦克阿瑟。

将“彩虹师”部署在潘兴总部附近的郊野外之后，麦克阿瑟接到了通

知，说一些经验丰富的法国退伍军官将作为指导员前来辅助他度过战时最后一个严冬。“尽管我们的战术具有自己的独特性，但在阵地战方面若是不听取他们的长期实践经验就太不明智了。”麦克阿瑟对自己的下属们这样说道。他满怀敬意地接待了法国人。要知道，他在对待美国远征军总司令部的同胞时可就没有这么尊敬了。12月26日，“彩虹师”开始了为期三天的急行军，从里莫库尔赶到了罗朗蓬，途中经过了肖蒙，并恰逢美国远征军监察长的下属在那里进行详细的视察。天空中飞舞着暴风雪，很多士兵都没有足够厚实的鞋子，于是在雪地上留下了些许的血迹。监察员用一张便条作为备忘录记下了这个有失军体的现象，并将它递送给了麦克阿瑟，气得麦克阿瑟恼羞成怒。更令他恼火的是，七周之后，另一队监察员来到了罗朗蓬，考察“彩虹师”是否做好了参与阵地战的准备，尔后提交了一份言辞激烈的报告，挑剔部队中的一些小事。然而，他们多管闲事、吹毛求疵的行为根本就是无关紧要的。所有人都知道德国人正在计划利用俄国停战后得以撤出的兵力发起一场春季攻势。也就是说，西线急需美军的加入。潘兴下令第42师深入洛林平原上的吕内维尔地区进行上前线之前的最后一个月训练。

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上校一直埋首忙于繁重的文书工作。据他当时的副官沃尔特·B. 沃尔夫上尉说：“上校每天清晨都在辛苦制订战地计划。一个人的时候，他会在卡片上记笔记，等到我们开会讨论的时候，他就已经把计划做好了。他也会询问我们的意见，不过我们大多数情况下都会认同他的构想。他的计划总是既能够考虑到最理想的情况，也能够顾及最糟糕的情况。他的组织工作一丝不苟，计划也完美无缺。”他接到了越来越多指挥作战、搜集情报的工作，还被安排管理少校和中校。他的方法有些疯狂：希望自己的下属都能够做到自给自足，这样他就能毫无负担地带着突击部队穿过无人之境了。

麦克阿瑟的第一次机遇发生在1918年2月26日。法国军队准备夜袭德国战线。麦克阿瑟向乔治·德·巴泽莱尔请缨参加夜袭行动，却遭到了拒绝。麦克阿瑟争辩道：“如果我都没有见识过他们的话，又怎么和他

们作战呢？”这番话果真让将军妥协了。不过，如果他预料到麦克阿瑟那晚会贸然做出什么惊人之举，想必就不会这么容易被说服了。那天晚上，上校甚至都没有穿戴适合夜袭的制服。他没有戴上钢盔，而是戴着一顶软帽，身上的其他服饰在西部前线上的人看来也十分的怪异：一条他母亲亲自编织的4英尺长的围巾，一件高领毛衣，一条整洁如新的马裤和一双镜面抛光的骑士靴。他得意扬扬地叼着烟斗，手上唯一的武器便是一根短马鞭。他对梅诺尔将军的一个副官托马斯·T. 汉迪说道：“是的，我也要跟着去野餐。”汉迪自愿跟他一起去，却没有提到梅诺尔将军将各位旅长召集到了一座小山上观摩夜袭进展的事情。想起自己的父亲，麦克阿瑟曾经对一位质疑自己奇装异服的军官提到过，“真正让你出名的正是那些被你违背的命令”，给自己招来否定也没有意义。看起来，他似乎是想让“彩虹师”的指挥官接受这样的既成事实。

法国士兵在自己的脸上涂抹黏糊糊的黑色泥巴。于是麦克阿瑟和汉迪也跟着如法炮制，还从一位法国中卫那里借了铁丝钳和双刃短刀，和其他人一起爬过了护墙。照明弹在他们的头顶爆开了花，眼前出现了《旅程终点》里的画面：造型诡异的弯曲网柱上挂着螺旋状的倒钩铁丝网，弹坑里填满了厚厚的泥巴，一个个人影不声不响地在风中蜷缩着。终于，一个脖子后面飘扬着如旗帜一样的围巾的人出现了。事后谈起这两个死里逃生的人，梅诺尔说道：“我看到他们时，他们正潜入山顶，但我什么也没有说。直到第二天早上，我才再一次见到他们。”

发动夜袭进攻的信号是由一个法国士兵抛下一枚手榴弹。麦克阿瑟后来写道，那枚手榴弹爆炸的时候，一个德国哨兵的“枪在夜色中扫射了起来。火光飞溅，机关枪的声音不绝于耳。敌人的大炮发起了齐射攻击……整个队伍都陷入了困境。但夜袭并没有终止……只不过战况异常残酷无情”。黎明时分，夜袭部队带回了一大群俘虏，其中一位德国上校还是被麦克阿瑟用马鞭制伏的。在他身后，第42师的这位参谋长将自己马裤的后裆挂在了铁丝网上。用麦克阿瑟的话来说，法国人“围了过来，握着我的手、拍着我的背，还要请我喝白兰地和苦艾酒”。德巴泽

莱尔将军把一枚法国英勇十字章戴在了他的胸前，还吻了他的双颊。梅诺尔将军事后也用一枚银星勋章奖励了他，还对《纽约时报》的记者说道：“麦克阿瑟上校是美国陆军中天资最高的一位军官，同时也是最受欢迎的一位军官。”

为了报仇，德军发起了更加残暴的反扑攻势。如今已经全力进军前线的“彩虹师”出击应战，准备于3月9日晚发动三次突袭。在梅诺尔的授意之下，麦克阿瑟决定率领来自艾奥瓦州的部队前往一个叫作费斯角的地方阻击德军。随着零点的临近，敌人在等待他们到来时拉响了40门重型火炮，造成美军的伤亡人数在开战之前便直线上升。为了稳定军心，麦克阿瑟一身“奇装异服”地走到了队伍前面，身上还套了一件他在西点军校时赢来的绣着黑色字母“A”的肥大毛衣。一个艾奥瓦士兵说道：“我本来不知道一个穿成这副德行的人跑来这里做什么。当我发现他是谁之后，你用一根羽毛就可以把我打晕。”

夜里11点55分，60门法军火炮开始发动密集的火力攻击，掩护夜袭行动。就在匍匐的士兵们起身冲锋之际，麦克阿瑟爬上了一架云梯，“他尽可能飞快地向顶上爬去”。“猛攻下的战场如同燃烧着炽焰的火炉一般。有那么几秒钟，我惊恐地以为他们全都躲在我的后面。不过我不用转头便意识到了自己不该有丝毫的质疑。转瞬间，他们全都围在了我的周边，或是冲在了我的前面，看上去就像是一场夹杂着闪光的铁制兵器和呼号的人群的雪崩。我们占领了敌人的位置。”梅诺尔将军在报告中写道，“麦克阿瑟率领参战的美军连队亲自突袭。只要看到他的出现，那些还不适应如此苦战的美军士兵便会感到心安。在这种情况下，面对警惕的敌人决绝而又凶残的抵抗，他将实权现场下放给了部队指挥官，自己则负责监督。这样的做法不仅保证了战斗的胜利，还让下属们知道自己的将领明白他们在战场上的难处，并能让连队士兵在他的英明领导之下获得安全感。”这一次，麦克阿瑟再一次凭借自己的“冷静和出色的勇气”获得了服役优异十字勋章。

麦克阿瑟的传奇还在继续。步兵们称他为“美国远征军的达达尼昂”“美国远征军的花花公子”以及“战斗狂”，还有人夸奖他拥有第六感——给他的人生蒙上了一层神秘的面纱。当然，这些都是子虚乌有的。他也曾不负责任地拒绝佩戴防毒面具（不过他倒是严厉处罚了效仿他的那些下属），因而在3月11日那天中了毒气。据美国记者报道，他当时“严重受伤”。他的母亲那时正在圣巴巴拉看望大儿媳。在从加州的报纸上读到这则消息之后，她立即给潘兴将军发去一封言辞激烈的电报。收到将军提到上校的伤势已经渐愈的回电，她又追拍了一封电报发往肖蒙：“只有上帝知道你的消息在我听来有多么安慰，我从心底里感谢你及时、和蔼的回复。我祈祷上帝在我们的国家正经历严重危机的时候能够保佑你——保佑你的安康。我们知道你的勇气和能力——也知道你就是那个能够胜任此职的正确人选。”

不过这并不是潘兴最后一次收到自己曾经效命过的指挥官的妻子发来的电报。有时候她也会质疑自己38岁的儿子为何还只是个上校。

月底之前，平克妮又听说了麦克阿瑟的一项新的英雄事迹。中毒8天之后，他摘下了眼罩——毒气一度威胁到了他的视力——跟随战争部部长牛顿·贝克前往战地视察，并将自己缴获的一顶巴伐利亚头盔送给了贝克。部长后来将这顶头盔转交给了麦克阿瑟太太，并向记者解释说自己之所以“决定不保留这顶头盔”是因为它对“上校的母亲来说意义更加重大”。他还补充说，“彩虹师”的参谋长是美国远征军“最伟大的前线战士”。然而此番赞扬在肖蒙却引发了不少人心中的复杂感想。总参谋部的休·A.　德拉姆中校是潘兴指派的第42师联络员。他相信麦克阿瑟是“一个聪明的年轻人”，“大有前途”并且“很快就能稳定下来，并声名远扬”。而远征军总部的其他人则认为他早已经“声名狼藉”，还称他是“炫耀鬼”。

然而，对于麦克阿瑟来说，炫耀是每个具有超凡魅力的领导人必备

的品质。他评论说，“干掉”一个高级军官将会大大地提升士气。当《芝加哥论坛报》的弗雷泽·亨特注意到他身上那件西点军校毛衣左边袖子上别着一枚机关枪子弹，问起他是如何适应危险时，麦克阿瑟答道：“好吧，有些时候就连将军也不得不牺牲。”在他的心目中，理想的指挥官应该是法军的亨利·古罗那样的人：“在丢掉了一只手臂和一条腿之后，他还能迎着阳光抬起被鲜血染红了的鬓髯，得意扬扬地挥舞歪斜的帽子，用充满雄辩才华的洪亮嗓音给战士们带来势不可当的影响力。他简直就是在战争与浪漫故事中充满传奇色彩的纳瓦拉的亨利投胎转世。”古罗也回敬了麦克阿瑟对自己的这番称赞，并在事后称他是“与我共赴沙场的军官中最优秀、最英勇的一位”。

毋庸置疑，麦克阿瑟也是西线战场上最常徘徊于生死边缘的一个人。就在跟随贝克结束视察的两天后，他的生命再一次受到了威胁。鲁登道夫在美军大规模赶赴战场之前便对协约国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第一战打响在英法军队最薄弱的接合处：索姆河河谷。敌人的眼前目标是亚眠，因为城中穿过的正是两国军队之间唯一的联络线。炮火狂轰滥炸之后，倾巢而出的敌军兵力多达凡尔登战役时的5倍。入夜后，英法军队的防线已经被敌军攻陷了好几处。第二天，在帕斯尚尔战役中元气受损的英军向后撤退了10英里，战线的缺口每个小时都在逐渐扩大；克虏伯大炮已经轰向了巴黎。第六天时，沟通亚眠与首都之间的一条铁路线被切断了。到了第八天，潘兴在斐迪南·福煦的恳求下派“彩虹师”前往巴卡拉地区，为奔赴那里守护首都的三支法国部队解了围。

“整整82天，”麦克阿瑟写道，“部队一直处于不间断的战斗之中。当我们终于在6月21日那天得到解围时，我们师所属的法国军团将军皮埃尔–乔治·迪波尔表彰了第42师的‘进攻热情、思想风气以及所有军官与士兵所表现出来的纪律性’。”迪波尔还提到了这些人的“英明领导麦克阿瑟上校”。梅诺尔形容麦克阿瑟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军官”，而达菲神父也在自己的日记里写道：“我们的参谋长会为了自己的领兵方法而感到焦躁，而不是为了战争本身而感到烦恼。他还强迫自己参加各种在某

些前辈长官看来和他没有半点儿关系的突袭战。他的仰慕者都说他的个人胆识在鼓舞军心方面很有价值。”

6月中旬，德军已经攻占了蒂耶里堡，与巴黎近在咫尺。肖蒙总部命第42师进军兰斯东面的香槟地区，加入古罗的第四军。6月21日，麦克阿瑟在沙尔姆仓库里监督部队的人员和设备装车时，意外地遇到了潘兴将军及随从军官的来访。在那段艰苦的岁月里，电话是很难打通的，铁轨上也是一片混乱。麦克阿瑟对将军喜欢通过训斥战地军官来保持他们警惕性的作风毫不知情。站在一群“彩虹师”士兵中间，多疑的麦克阿瑟听到潘兴将军对自己喊道：“这支部队简直就是耻辱，士兵不仅缺乏纪律性而且还没有经过适当的训练。所有人的军容是我见过最差的，真是一群肮脏的乌合之众。”备感震惊的麦克阿瑟结结巴巴地答道：“将军，这些士兵刚刚从战场上回来。”潘兴咆哮着：“年轻人，我不喜欢你的态度！”“请接受我谦卑的歉意，阁下。”上校答道，“但我讲的只是事实。”将军暴跳如雷：“麦克阿瑟，我要你个人为了这支部队的纪律和收到的命令负责——不然你就等着上帝来帮你吧。”

“遵命，长官。”麦克阿瑟气喘吁吁地应道。在这位高贵的来客离开之后，他在沃尔夫上尉的陪同下走出了仓库，漫步到村子的广场上。他沉默地坐在一张长椅上，感觉自己被人迫害了。这种情绪一直笼罩在他的心头，好几天都不曾散去。从总司令部下来视察“彩虹师”的军官们用黑色的小笔记本记下了一些微不足道的缺陷，并将它们悉数汇报给了肖蒙总部。这位恼羞成怒的第42师参谋长终于发话了，扬言要开枪杀了下一个从监察长办公室过来的使者。他闷闷不乐地告诉沃尔夫，自己在总司令部里有敌人，围绕在潘兴周围的那个小圈子里的人想要伤害他。

不过麦克阿瑟似乎从未想过潘兴将军本人对他也许也有敌意。许多年后，麦克阿瑟还很爱讲述这位将军在一次下前线视察时曾经对他说过：“道格拉斯，我们这些老的第一上尉必须永远都不退缩。”在他的回忆录中，他还提到过潘兴将军在肖蒙的其他军官指责他时曾经出面维护

过他：“别再说这些没有意义的话了。麦克阿瑟是我们的军队中最伟大的领袖。我还打算让他做师长呢。”支持这一论点最有力的证据在他申斥麦克阿瑟的5天后得到了应验：他晋升了麦克阿瑟。但他的心意并非是决定性的。战争部里的那些人也许才是这位才华横溢的年轻上校真实的守护者，而身居肖蒙的潘兴将军可能只是勉强接受了他们的授意而已。相比之下，那些人更加赞同麦克阿瑟的计划，并且从不吝于公开颂扬他。

不管怎样，平克妮都是儿子最热情的支持者。从1917年10月6日起——也就是他启程离开美国的两周之前——她便开始为他的未来开展了一系列的活动。在长岛的花园城市酒店里“监督”麦克阿瑟管理“彩虹师”的同时，她给战争部的贝克寄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直截了当地表明：“我冒昧地代表我的儿子——道格拉斯写信给您叙说一件挂在我心头的事……我对于麦克阿瑟上校是否有可能被升为准将的事情感到十分地焦虑，而您就是他晋升的唯一寄托。所有人——即便是最有能力的人——在有所成就之前都必须先得到机会，而我写信给您就是为了从您那里为他讨来一个机会。”在洋洋洒洒地用了5段话来概述儿子的履历之后（“他如今全心全意扑在了第42师的事务上”），她总结道：“这位可造之才已经做好了接受重任的准备，如果您觉得任用他是适宜的。他是一位忠诚而又有奉献精神的军人。我之所以将他的名字提出来供您参考，是因为我相信他一定会不负众望——这不仅有益于他个人的利益，从更广泛的意义上来讲，更有益于我们挚爱的、正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祖国。您最诚挚的、满怀敬意的阿瑟·麦克阿瑟夫人。”

贝克并没有回复，但她也没有气馁，反而寄去了更多的书信。8个月后，当她从圣巴巴拉回来时，又在华盛顿加州大街的布莱顿酒店公寓里给他写了一封信：“我贸然继续给您寄去这几行文字，延续我在加州时与您推心置腹地书信交流。关于我的儿子道格拉斯——我心里最大的愿望就是您能够授予他一枚星章……考虑到他付出如此多的气力与热情完满完成了任务，又在真枪实弹的战场上表现得如此卓越，我相信全军

上下，除了个别的几个人之外，都会鼓掌支持您晋升他为将军的。我已经返回华盛顿，在‘布莱顿酒店公寓’安了家，希望能够在不久的将来见到您和亲爱的贝克夫人。”

贝克感觉到平克妮就快要站到自己的家门口来了，他灵活地采取了逃避措施。他在第二天的回信中写道：“有关美国远征军内部的各种推荐晋升问题，我都要依赖潘兴将军。如果我介入了他所指挥和管理的人员的选拔工作，不知道会引起怎样的纷争与不和谐。”出于自己对她儿子的“个人偏爱”，贝克向她保证，“但凡我能够自由听从自己的心声”，是绝对不会回避这个问题的。“事实上，等到他晋升的时刻到来——我毫不怀疑他肯定会受到提拔——他会心满意足地知道这是自己成就的结果，同时也是那些有机会在他身边观察和赏识他的战绩的人力荐他的成果。”

贝克的话让上校的母亲有了新的目标。当天下午——在麦克阿瑟被晋升的两周之前——她给潘兴写了一封信，说“贸然给你写去如此推心置腹的一封信，斗胆利用你和我亡夫之间的友情以及他对你深深的敬仰之情”。在向潘兴重申自己的儿子“对于这封信和信中的意图毫不知情”之后，她解释说自己知道在潘兴的推荐下，“不久的将来将晋升大约100名将军”。“我很焦虑，不知道我的儿子是否足够幸运，能得到这样的提拔，因为他是最有能力也最勤奋的一位军官。”她在信中说道。

但她并没有就此罢笔。凭借她对于贝克回信的单方面理解，她告诉潘兴：“我和战争部部长及其家庭很是熟悉，而部长也非常挂念麦克阿瑟上校，并且十分地了解他……我从权威人士那里得知，如果我儿子的名字能够出现在你推荐的准将名单中，他一定会被晋升。虽然我也对这次晋升全心全意地寄予了自己的抱负，但若没有您的首肯和推荐，我和我的儿子都不会在乎那枚星章。我们愿意效忠于您和您所捍卫的事业……我相信您是高瞻远瞩的——亲爱的潘兴将军——因此一定会推荐他晋升准将。”她在这封意味深长的信件结尾签上了这样一行字：“献上

最美好的祝愿，发自心底尊重您的玛丽·P. 麦克阿瑟。”

在宣布完晋升结果之后，潘兴在回信中对平克妮写道：“关于你的儿子晋升为准将的事情，我愿表达我最诚挚的祝贺。愿你永葆健康，请永远相信我，约翰·J.　潘兴谨上。”从《纽约时报》上读到任命消息时——文中还大致引用了贝克办公室对此做出的回应，说新准将是“很多位高级军官选出的心目中最优秀的年轻军人”——平克妮动笔给美国远征军的主将写去了一封信：“我要在回信中向您表达我满心谦卑而又溢于言表的感谢与赞赏之情……我的儿子肯定不会让你失望的！玛丽·P. 麦克阿瑟（阿瑟·麦克阿瑟夫人）谨上。”他的儿子也给潘兴寄去了一封亲笔信，告知他自己获得了新的军衔，并表达了“我父母长期以来对您热情的景仰和喜爱之情，以及对于您未来伟大前程的信心。这也将引导我在他们的认可之下，更加甘愿地在您的指挥下建功立业。愿您对国家的伟大贡献能够让您得偿所愿、步步高升。”

这些往来书信无一不体现了母子俩最令人厌烦的某些品质：卑躬屈膝、追逐私利、阿谀奉承以及利用上级领导的斡旋进行的赤裸裸的威胁。只要潘兴的身上还有利可图，这位老指挥官的遗孀便会一直对他献殷勤——可一旦他失势，便会立刻被抛之脑后。当然，此番结论也有可能是对这些事件的过度解读。和今日相比，如此不经雕琢的政治活动在那个年代实属常见；我们很快就会见识到，和自己的婆婆截然不同的第一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太太在调动影响力时也同样是坚决而又彻底的，而且这两个女人做决定时都没有知会道格拉斯。不过，麦克阿瑟也是个精明的军事政治家，从自己的父亲和祖父身上学到了不少巧妙诡计，在运用这些诡计时总是格外谨慎。相比敲诈勒索，他更喜欢运用自己溜须拍马的能力，并坚信自己是一个勇气与天赋兼备的军人，因而值得被赋予更重的责任，成就他报效祖国的事业。就像即将到来的法国之役所昭示的那样，他的想法是完全正确的。

未能成功攻破亚眠与佛兰德之间的协约国战线，鲁登道夫在毒气和榴霰弹的掩护下率军扑向了埃纳河北部一个名叫“贵妇小径”的地方，并在贝洛森林偶遇了美国海军陆战队，发起了被其称之为“胜利一击”的毁灭性进攻。德军在战线后方建造了一座木制瞭望塔，打算在7月15日发起进一步攻击。古罗预料到这一点并提示自己的第四军：“我们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攻打……你们的胸腔里跳动着的是向往自由者勇敢而又坚强的心。谁都不许回头，谁都不许让步。每一颗心都必须想着：杀，杀，直到把他们杀个精光。”

7月5日，“彩虹师”已经埋伏进了在松软的白垩土平原上挖掘出来的战壕，负责守卫兰斯以东25英里处的埃斯佩朗斯和苏安地区。麦克阿瑟准将把自己的总部建在了后方远处的瓦德奈农场上，却亲自与士兵们一同潜入了防空战壕中，监督战术的实施——他打算把前线的堑壕拱手让给德国人，让他们误以为自己已经取得了胜利——用他的话来说：“7月15日凌晨0点15分，鲁登道夫的枪打响了世界上前所未见的集中攻势，就连远在100英里以外的巴黎都能够听到炮火的轰鸣声。法国再一次陷入危机之中。我站在主要防线上瞭望。凌晨4点15分，在破晓血红色天空的映衬下，我方孤零零的岗哨被警示的炸弹炸得粉碎。就在敌人涌进我们新挖掘出来的、空无一人的堑壕里时，我方的炮弹像密集的暴雨砸在了他们的头顶。他们的步兵团很轻易地就跨过了警戒线，这显然使一心想要追击我们的敢死队产生了成功进军的幻觉。然而，当他们真正抵达我方战壕时，却已经筋疲力尽、军心大乱，于是只能四散逃开，在既无组织又无增援的情况下很难再向前迈进。”

身穿土灰色军装的敌军部队花了三天的时间猛攻，穿过无人之境。为了阻截他们，“彩虹师”采取了被麦克阿瑟用“激励人心”这个词来形容的防御战术，展现了“堪称我军最高传统的坚毅品质”。古罗也对此役表达了赞扬之情：“德军显然已经在我们的战线上遭到了挫败。无论他们将来打算怎么做，都无法逾越这条战线。”麦克阿瑟事后写道：“他们攻破了几个点，但从大体上来看还是被驱逐了回去。我们发起了反攻……

成果很明显——德国人在此次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规模进攻失败了。巴黎又能得以喘息了。”

这就是麦克阿瑟的第一场大战。无论用何种标准来检验，他的表现都令人钦佩。他本可以和其他高官一起留在瓦德奈农场上——肖蒙那些恼怒的参谋都说那里才是他应该去的地方——他的师长却不那么认为。在熟练地事先准备好文书、分配好职权之后，新准将选择给白垩土战壕里的步兵们树立一个领导的典范。梅诺尔说道：“麦克阿瑟是这支军队里最嗜血的战士。我有时候也会害怕我们会失去他，因为在麦克阿瑟指挥的每一场战斗中，士兵们都能在身边看到梅诺尔的身影。”在他的力荐之下，准将又获得了一枚银星奖章。

那个周末，麦克阿瑟和将士兄弟们一同在沙隆欢庆胜利，一边搂抱着法国酒吧女招待一边高唱着歌曲《阿尔芒蒂耶尔小姐》。然而，他“感到怅然若失。也许是那些悬挂在倒钩铁丝网上扭曲的尸体，也许是仍旧飘荡在我鼻翼间的腐尸的臭味。也许我已经老了，莫名其妙地忘记了该如何玩乐”。可能他这才开始察觉父亲对于传教士山一役也有无法言说的话语。

福煦计划用一次反攻来消灭盘踞在马恩河突出部的敌军，可就在协约国驱逐战结束后的第二天，鲁登道夫决定放弃自己的战果，退回韦勒河和乌尔克河一线。出于对第26军团（纽约军团）追击撤退德军行动的不满，肖蒙总部将还未缓过劲儿来的“彩虹师”替换上阵。麦克阿瑟随军潜入了充满但丁笔下作品风格、满目疮痍的费尔丛林战壕之中。但是敌军也正从丛林里撤兵，在乌尔克河另一头海拔200英尺的高地上挖起了战壕。第42师向前推进的速度极其缓慢，每向前迈出一步都要与德军的飞机、毒气以及架在高地上的机关枪做斗争。除此之外，正如麦克阿瑟于7月27日那个星期六半夜向总司令部的使者解释的那样，第42师的进展已经超越了友军炮兵部队和支援部队的范围。那一晚，他彻夜未眠，在一个又一个战壕里穿梭，协调第二天的进攻行动。仅星期一一天，战

略重镇塞尔吉的所有权就在敌我双方手中转换了11次。麦克阿瑟把童年时在边防站里听来的印度故事中的军事策略引入了此次作战当中："我们三两成群地匍匐着朝敌军储存枪支的坚固掩体爬去，在刺刀和手榴弹的掩护下进行包抄。战况异常残酷，可没有人求饶也没有人放弃。这看上去似乎是一场永无止境的挣扎。残忍、野蛮，战事如跷跷板般交替起伏。一个据点被占领以后，便会从某个未知的方向突然射来一阵炮火，紧接着便是一次致命的反击……没有间歇也没有怜悯。"第二天的曙光降临之前，他们终于从敌人手中夺回了重镇，开始在悬崖边掘壕固守。麦克阿瑟因为此役而获得了自己的第三枚银星奖章。

星期三，麦克阿瑟又接到了新的命令。"彩虹师"的步兵团包括两个部分——第83和第84步兵旅。考虑到第83步兵旅的准将已经"不再胜任"，梅诺尔将他撤职后把指挥权交给了麦克阿瑟。此外，麦克阿瑟还延任了一周的参谋长——后来，大家赠予他一个刻着"勇者中的勇者"字样的金色烟盒——卸任后他将自己的工作转交给了自己童年时的玩伴比利·休斯。与此同时，第42师还在试图从乌尔克河向北边几乎与之平行的韦勒河推进，并小有成就。据一个德军逃兵交代，敌人已经撤退，却消失得无影无踪。星期五的午夜至清晨这段时间里，麦克阿瑟带着一位副官潜入了无人之境："尸体黑压压地互相堆叠着，我们只得跌跌撞撞地绕着尸体行进。那里至少应该散落着2 000具尸体，恶臭熏得人无法呼吸。放眼望去看不到一棵还直立着的树木。到处都是伤兵的哀号和尖叫声。狙击兵的子弹发出的声音就像是愤怒的蜜蜂在嗡嗡地鸣叫……我估算了一下，那里大约有100多把不同尺寸的报废枪支和几百把被人遗弃的机关枪。"

突然间，他们的头顶上出现了一道火光。麦克阿瑟和副官在躲避中迅速卧倒。借着忽明忽暗的光线，麦克阿瑟看到正前方有"三个德国人——一个伸手指向这边的中尉，一个蜷伏着抱着一挺机关枪的中士，还有一个看上去在给武器换弹药带的下士。我屏住呼吸等待着他们冲过来，但是什么也没有发生。时间一秒一秒地过去了，周围还是悄无声

息。我们等得有些忍无可忍了”。为了看清德国人的位置，副官“将手榴弹换到了另一只手上，然后伸手拿出了手电筒。他们没有移动，而且永远也不会移动了。他们死了，全都死了——中尉的胸口已被榴霰弹打穿，中士的腹部也已被射出一个大洞，而下士脑袋的位置上只顶着一截空空的脊椎骨。麦克阿瑟和副官趁着黎明返回了军营。他直接找到了正在和军团指挥官亨特·利格特少将开会的梅诺尔。麦克阿瑟提到，除了几个狙击兵以外，大部分的敌人都已经朝着北边逃走了。梅诺尔和利格特让他坐在一旁，打开地图聚精会神地研究起来，不料却被一阵呼噜声吓了一跳。原来已经四天四夜没有合眼的麦克阿瑟终于忍不住睡着了。利格特说：“真见鬼！梅诺尔，你最好表彰他一下。”就这样，麦克阿瑟得到了自己的第四枚银星奖章。

正午时分，麦克阿瑟醒来后又回到了指挥岗位上，率领第83旅穿越丛林。德国人如今已经落荒而逃了。12点10分，麦克阿瑟派了一支小队给梅诺尔送去一个令他兴奋不已的消息：“我已亲自承担起战线的指挥工作，攻破了右翼敌人的抵抗，现在正全速全线向前推进。敌人就在前方，不过我已调遣一个营的兵力前去扰乱他们的准备工作……我打算把他们压制到韦勒河去。我将队伍分成了几支小巡查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追击，并持续骚扰对方，导致其无法形成抵抗队列。一切都在我的掌控之中，伤亡率极低。”梅诺尔称这次进击是“领导的典范，指挥的高品质在我看来十分独特”。

当天晚上，筋疲力尽的队伍解散时比开战时减少了44%的兵力。“彩虹师”静养了一周的时间，而德军则死死地把守住了韦勒河，直到协约国占领了西北部的苏瓦松，德军的计划才遭到挫败。鲁登道夫盘踞的马恩河突出部早已因蒂耶里堡的水位大幅上升而消失了。满怀感激之情的法国人十分赏识麦克阿瑟所做的贡献，授予他一枚二等英勇十字勋章，并任命他为荣誉军团的指挥官之一。美国政府对他也早有安排。8月3日，《纽约时报》在报道中提到，“官方今日公布”麦克阿瑟准将将凯旋，前往马里兰训练一支新的部队。不过麦克阿瑟本人对此向肖蒙总

部提出了抗议。梅诺尔指出，准将对于自己的士兵来说是“最大的灵感来源”，这些人“愿意为他奉献”。于是，这条命令被撤回了。8月11日，第42师的指挥官接到指示，要求他“保留麦克阿瑟准将在师中的职责”。一周之后，麦克阿瑟又被授予第84旅的永久指挥权。

如今，麦克阿瑟已经成了美国远征军中人尽皆知的人物。他为自己添置了一条紫红色的缎子领带，使得他怪异的穿衣风格也成了率领远征军深入令人毛骨悚然的无人之地时所散发的感召力之一——除此之外，还有他对待肖蒙总部的那种傲慢无礼的态度。麦克阿瑟接到命令，被要求率领“彩虹师”的老兵们前去潘兴总部东北地区参加一场为期10天的演习训练。对于他看待此事的反应，大家早就见怪不怪了。他决定，自己的属下值得留在巴黎。就连他自己都从没有见识过这座首都——战争期间从没有放过一天假，除了那两次毒气中毒——现在，他擅用职权给部队中10%的人批了48小时的假期，并放话出去告知其他人，说他们在第一批士兵休假结束后便可以得到准假。实际上，第一批获得准假的人很快便被赶回了军营，后续也没有人获批假期。麦克阿瑟越权了。那些人刚一离开军区就被宪兵们抓了回来。不过，他的好意还是得到了下属们的感激——也加剧了他们对于总司令部的敌意。

值得怀疑的是，潘兴本人也许并没有听说这一事件，因为他的脑子里还在盘算着更大的一盘棋。如今，潘兴已经在法国拥有了100万名步兵，并打算挑选其中的精英参与美军主动发起的第一场攻势。协约国新的作战策略是沉重打击所有的敌军突出部，改善交通，从而为最终的决战做准备。一座切断了巴黎和南锡之间主要铁路线的山丘早在战争开始时便已是德军的据点。1915年，法军在试图夺回这个据点的过程中丧失了6万兵力。从那时起，这个据点便被称为“圣米耶勒的突出部”。如今，美军指挥官已经潜入了这一地区，计划是佯攻贝尔福，然后在9月12日那天派出9支精锐部队发起致命一击。这9支精锐部队中就包括

了“彩虹师”。

麦克阿瑟花了两周的时间才把补充新兵的重建工作做好，但这些从霍博肯启程的新兵中有些人根本就没有做好参战的准备。一次，他注意到一百多人正挤在一位中士的身旁。他正打算开口训斥，中士却上前解释道：“长官，我正在教他们如何给步枪装子弹。”麦克阿瑟一脸嘲讽地走开了，似乎是在说：“对于我们这样陷入困境的军队来说，给步枪装子弹和射击还不是最基本的常识吗？”梅诺尔知道潘兴不想让手下的士兵在没有接受过完整的训练之前就奔赴战场，所以根本就不想启用这9 000名新兵。听到麦克阿瑟说自己保证会让这些人在跳出战壕、发起进攻之前做好准备，梅诺尔这才扭转心意。

9月9日早晨，“彩虹师”冒着倾盆大雨步履艰难地朝着突出部所在的南部山巅进发，并于第二天晚上潜入了战壕。破晓时分，1 400架飞机在比利·米切尔的带领下侦察到了敌人的位置，而由乔治·S. 巴顿率领的坦克梯队也已经就位。麦克阿瑟告诉麾下士兵，按照西部前线的标准，自己对他们期许良多：第一天推进5英里，第二天推进4英里。第二天凌晨5点，麦克阿瑟第一个跃出护墙，率领第84旅对敌人工厂的驻军发动了攻势。然而，对德国人来说，是否要进行防守似乎本来就是有争议的；事后，德军表示自己本来就准备撤军，但又收到命令让他们尽心防守。无论如何，麦克阿瑟手下的艾奥瓦和亚拉巴马士兵很快便超越了目标。按麦克阿瑟的话来说，只有巴顿少校的坦克“很快陷入了泥潭之中”。换句话来说，麦克阿瑟和巴顿两个男子汉之间不可避免地要展开一场决斗了。而这场决斗正好就发生在敌人的炮火之中。两人都站得笔直，在炮弹一步步逼近时仍然直勾勾地盯着对方。据巴顿回忆：“我们站在那里说话，但谁也不是特别感兴趣对方说了些什么，因为我们满脑子都在想炸弹的事情。”而据麦克阿瑟回忆，巴顿在某个时刻抽搐了一下，看上去对自己十分恼怒。于是准将干巴巴地开口说了一句：“别担心，少校。你是永远也听不到炸在你身上那颗炮弹的声音的。”

凭借自己的英明领导，麦克阿瑟在埃塞得到了第五颗银星奖章。到达被攻陷的这座重镇之后，他在一座城堡附近发现了“一位德国军官的马正背着马鞍和装备站在一个谷仓里，旁边还有一堆完好无损的枪支和一整套军乐队的乐器和乐谱”。这个突出部就这样被彻底摧毁了。整个莱尔军、“萨克森军”和后备军部队全都被赶进了囚犯的围栏里。狼狈不堪的步兵们在圣米耶勒受到了法国老人们的热情欢迎。他们拿出了储藏多年的樱桃白兰地，还挂上了从照片中临摹下来的美国国旗（上面的条纹全都是黑色的）。这是一次伟大的胜利，因此麦克阿瑟应该显得得意扬扬才对。可他的脸上却并没有出现这样的表情：“在埃塞，我看到了让自己永远也无法忘怀的一幕……男人、女人和孩子在埋没了膝盖的泥潭里迈着沉重的步伐，身上还背着家里仅有的几样家具……在其他战争的战场上，这样的画面还要在我酸痛的眼睛前面重演多少次呢？”正是这份怜悯之心让他与巴顿的部队分道扬镳了。麦克阿瑟可以既招摇又无情。从他在米沙鄢和墨西哥时的言行来看，他也是个杀手。但他对待战争的态度永远都是高度矛盾的，既会为了胜利而欢欣鼓舞，也会在遇见战争的受害者时心生怜悯。很难想象，如果他的父母没有把他培养成一个战士，他将会变成什么样的一个人。

攻下圣米耶勒的第二天，麦克阿瑟便在副官的陪同下偷偷穿过了无人之境，越过了敌人的封锁线以及普法战争的古战场马斯拉图尔，爬上了一处山坡。站在山顶上，他举起了自己的双筒望远镜，向东眺望起了梅斯大本营。他在堡垒的入口和周围看到了代表着拥挤车流的灯光。德国人不在乎灯火管制的行为恰好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据我猜测，梅斯当下应该是毫无防备，因为战斗部队都被临时调派去支援其他地区的战役了。现在正是从关键点下手攻破兴登堡防线的无与伦比的好时机。我们攻城成功的奖励就那么大大方方地摆在那里。拿下它，我们就能处于绝对优势，切断德国南部与其他国家之间的联系。从这里出发，长驱直入无人防守的摩泽尔谷地，我们就可以攻入德国的中央。总之，梅斯战役的胜利能够切断德军前线的几条大型联络和军需供给线，也就有可能快速地完结这场战争。”

麦克阿瑟穿过铁丝网返回美军驻地，争辩说这个机会需要尽快把握。战后，潘兴对此表示了赞同："无疑，立即继续向前推进可以让我们长驱直入地攻进兴登堡防线，还有可能进入梅斯。"然而当时没有人同意他的意见。他的上司们犯了被拿破仑称为军事指挥过程中无法饶恕的一项大忌："先入为主"地假定敌人会在某既定情境内采取某种特定的战术，而实际情况却与之大相径庭。休斯告诉这位年轻的准将，肖蒙总部给"彩虹师"下达的命令是"明确而且来自最高权威的"，第42师除了按兵不动之外别无选择。就像德国人在伊普尔一役中引入毒气、英国人在圣米耶勒之役一个月前将集结的坦克用在了亚眠一样，美国人似乎缺乏突破所需的想象力和逻辑思考能力。晚年的麦克阿瑟仍坚称："若是我们当初能够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也许就能挽救在昏暗的阿戈讷森林中丧生的几千个美军士兵的生命。这就是在面对既定战术时不懂得灵活变通的例子。不幸的是，这种思维在现代战争中十分常见。"他可能还补充了一句，在从中得到教训之后，他将它们运用在了下一次战役中，以保护这些跟随他征战法国的士兵的下一代。

麦克阿瑟说，德军很快就会"从斯特拉斯堡等地调来几千兵力，不出一周，协约国军队就无法猛攻梅斯了"。他度过了不同寻常的奢华一周。在攻打突出部的过程中，美军获得的一件战利品便是圣伯努瓦城堡，也就是德国第19军团的总部。敌人撤离得太过匆忙，以至于步兵团在里面还发现了一张已经布置好的晚餐餐桌，上面摆满了食物。虽然敌军的炮火每天都在朝着这座城堡逼近，但准将坚持要住在里面。据传，某天他和他的属下正在用餐时突然听到一枚飞弹在城堡院子里爆炸的声音。当所有人都趴在地板上时，只有麦克阿瑟笔直地坐在那里，嘴里还念叨着："德国人还没有制造出能够杀死麦克阿瑟的炸弹呢。回来和我一起坐好，先生们。"他的勇气异于常人，却并非是有勇无谋。当一个战俘透露了敌军带了重型火炮准备要摧毁城堡的消息时，麦克阿瑟很快便转移了阵地。第二天，9月24日，几枚直径280毫米的炮弹将这座建筑夷为平地。

如今，麦克阿瑟手头的文书工作越来越繁重了。福煦策划了针对兴登堡防线的一次联军“急攻”，准备在第二天夜里行动。“每个人都要尽快出击，铆足火力猛攻，并且尽可能地撑下去。”麦克阿瑟说，“建筑正摇摇欲坠，所有人都进入了战斗状态！”这个计划的支点便是美军。潘兴的部队坚守在协约国战线的最右翼，中间是法军，英军在左翼，而比利时阿尔贝国王的军队则驻守海上。在这几支部队中，大家在阿尔贝国王军身上寄予的希望最为殷切，而潘兴率领美军驻守的则是协约国防线上的要害阵地。潘兴将身经百战的精锐部队安插在圣米耶勒，以便他们有时间进行重整。除此之外，他所面对的还是兴登堡防线上最牢固的一环，也是德军最不可能屈服、寄希望于获胜的一环。

潘兴部署下一条24英里长的防线，中间是牢不可破的蒙福孔山——1916年，王储曾站在这里的高地看过凡尔登战役——右翼是固若金汤的默兹河高地，左翼是茂密的阿戈讷森林，安徒生童话中才有的如织密林中巧妙地布满了机关枪。德国的军事家们在宽度为14英里的广阔防线内设置了双倍兵力卫戍部队的4道防御阵地，只为了守护后方的色当—梅济耶尔铁路，也就是唯一可供他们逃亡比利时列日或德国的通路。一旦这条通路被打断，他们的军队就无法撤离，只能任由协约国军队宰割。福煦知道鲁登道夫在这里设下了重重障碍，而这也正是美国军队坐镇此处的主要原因。虽说美国人也会参与整体战斗，但他们的主要任务还是趁比利时人从旁大举进攻时对德军进行要挟。对于此次进攻计划信心满满的潘兴急匆匆地用军用卡车将所有可以参战的部队都送上了前线，并于9月26日那个雾气迷蒙的早晨率领9支新组建的部队与德军开战。敌人被美军来势汹汹的气焰吓傻了。他们从未想过竟会有人胆敢前来进犯此地。美军步兵们将敌人的前线蹂躏殆尽之后，如浪涌般冲上了蒙福孔山，占据了高地。紧接着，德国人加强了中心防线的防御，将兵力后撤到了以《尼伯龙根之歌》中的女英雄命名的第三道防线“克里姆希尔特阵地”上。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荣获了自己的第六枚银星奖章。“彩虹师”并不是突击师之中的一员，梅诺尔被授命“通过参与炮火袭击行动以及在进攻开始时采取深入突袭来支援默兹河以西的第一军团”。作为第84旅的准将，麦克阿瑟针对一处设防的农场以及一处石质建筑的小镇发起了复杂的双重突袭。在他的带领下，全师的伤亡人数还不到20人。因此，他在凯旋的路上便得到了表彰。9月的最后一个夜晚，“彩虹师”又移师硝烟弥漫的默兹—阿戈讷地区，进驻了蒙福孔森林。整片森林都笼罩在厚重的迷雾之中。据“彩虹师”里的一位军官描述：“毫不夸张地说，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炸弹炸得四分五裂。随处可见直径和深度都在15英尺左右的弹坑。我们的周围满是枯槁的树枝。原先的参天大树和树下茂密的植被如今只剩下了一片残缺的树枝和四分五裂的树桩。”这片战场就是美国远征军的受难地。

第42师为受到连续猛攻的第一军团解围之后，攻下了一段3英里长的防线，而84旅则埋伏在右翼密林的战壕之中。在战壕后方2英里处一座被伪装成农场样子的总部中，麦克阿瑟研究起了克里姆希尔特阵地的两座山丘的设防情况：288号山和沙蒂永山。他似乎不太可能亲眼见证这两座山丘被攻下的那一天。在德军炮弹的狂轰滥炸之下，他于10月11日夜里及第二天接连两次遭遇了芥子气以及催泪弹的袭击。就因为不肯佩戴防毒面具，中毒后的他身体极度虚弱，以至于他的副官只得建议将他疏散出去，然而他拒绝入院治疗。第二天，萨默罗尔前来农场探望他时曾对他说：“快拿下沙蒂永山，不然就给我一份5 000人的死亡名单。”麦克阿瑟答道：“如果我的旅拿不下沙蒂永山，你可以把全体将士的名字一起写进那份名单里，并把我的名字写在第一个。”萨默罗尔将军十分感动，再没有说一句便离开了。

然而，麦克阿瑟心里清楚，面对这一次的挑战，光会虚张声势是不够的。早些时候，梅诺尔就曾经问过他84旅能否拿下沙蒂永山。“我在严加保密的条件下告诉他，我也不确定。”1918年10月14日那个漆黑潮湿的早上，“彩虹师”的两个旅一举攻下了兴登堡防线上的高地。第84旅

从2 000名德国士兵的手中夺下了288号山，而沙蒂永山就是另一幅画面了。正午刚过，麦克阿瑟便给梅诺尔送去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以下是下午2点钟时我所在战线的战况……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我不得不在右翼沿路设下防线，抵御德军密集的火炮、机关枪和步兵袭击……就此，在右翼被暴露的情况下，我已经将战线向前推进了4公里左右。据第167步兵团回报，敌人在沙蒂永山一带布下了重兵……在我看来，在未能谨慎部署炮火的情况下是很难攻下这个位置的。"步兵们除了能够在沙蒂永山的南坡上勉强建立一个据点之外，已经别无他法。

第二天的战况更加糟糕。丧心病狂的德军反攻过来强迫第83旅的部队撤退。当天晚上萨默罗尔将军便撤掉了第83旅的指挥官，并致电麦克阿瑟："沙蒂永山是整个战局的关键。我要你在明天晚上6点之前拿下这块阵地。"麦克阿瑟再一次向他保证，自己肯定会使命必达，"否则就上交一份6 000人的死亡名单，其中也包括自己的名字"。第二天早上，在第83旅仍受制约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包围了沙蒂永山，在上山发起正面攻击的同时委派劳埃德·罗斯少校从后方包抄，采取迂回战术各个击破敌人卫戍的山谷和机关枪掩体。这是一场血战。按照麦克阿瑟的话来说："看到军官们倒下，士兵们便会跳起来接过指挥棒。连缩减成了排，排又缩成了班。最后，罗斯少校率领的1 450名士兵与25名军官只剩下了300名士兵和6名军官。沙蒂永山就是这样被攻陷的。"

最终，美军攻下了克里姆希尔特阵地。潘兴称这一战是"决定性的一击"，并提到："这些战役的重要性是不可估量的。"步兵如今已经开始从埃纳河和默兹高地侧面攻打德军。麦克阿瑟将这一仗称之为"通往最后胜利的道路"，并说道："我们打破了德国防线中如此精密而又重要的一环，因而他们会撤退到默兹河对岸也是我们早就料想到的情况。"萨默罗尔将军推荐晋升他为少将，并授予他荣誉勋章。麦克阿瑟还凭借自己"亲自上阵"时"为了重整部队、再次发起进攻（保证了获胜的可能性）所表现出来的不屈不挠的决心与伟大的勇气"荣获了第二枚服役优异十字勋章。颁奖词中这样写道："在勇气所统领的战场上，他

的勇气是主要因素。”后来，每当谈起沙蒂永山一役，他的脸上总是会出现眉飞色舞的表情。

值此之际，麦克阿瑟给其他部队的战地记者和军官都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弗洛伊德·吉本斯说，麦克阿瑟头上那顶俏皮地倾斜着的帽子仿佛代表了“他在不违反军规的条件下展现出来的潇洒个性”。当然，从围巾到短马鞭，他所有的服饰无一不是对军规军纪的藐视。麦克阿瑟对此心知肚明，却还义正词严地表示“高级军官应该被允许在个人细节之类的事情上做出自己的判断”。“那是谁？”准将趾高气扬地走过时，一位步兵中尉向乔治·肯尼上尉问道。“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上尉答道，“他就是‘彩虹师’第84旅的指挥官。如果他没有丢掉性命的话……他就要飞黄腾达了。他很信赖自己的装扮，似乎总觉得自己能够长生不老。他从不会像其他人一样戴上钢盔，就算是阵地突袭时也一样戴着帽子——而且还要提着短马鞭上阵。他已经几度受伤，但也凭借这些惨痛的经历获得了一大堆的勋章。”

农场里，那间位于楼下的办公室墙壁上挂满了地图，上面遍布着麦克阿瑟的副官帮他按下的不同颜色的标示钉。楼上摆放着供准将休息用的一张典型的法式藏壁床。卧室的中间立着一个烧木炭的金属炉子，在寒风彻骨的夜里总是被烧得滚烫。房间的地板是用粗糙的板材铺就的。床对面立着一张桌子和三把椅子，光线从两扇脏兮兮的窗户里透了进来。这就是那年10月末“彩虹师”委员会召开会议的地方。主持会议的梅诺尔询问两名旅长，在“彩虹师”深入兴登堡防线并损失了4 000精兵的情况下，还能否在美军11月1日重新向前推进时参与战斗。两位旅长都点头表示肯定。据这支军队的史料记载：“麦克阿瑟从自己的椅子上跳了起来，开始来回踱步。每一次他谈到让自己很感兴趣的话题时都会做出这样的举动。机敏的他很快便表示自己已经从各个角度深入思索过所有的可能性，并进行了全面而完整的战略分析。他的两位听众事后甚至有些后悔当时没有请速记员过来把他的见解一一记录在案。”

然而，毫不为之所动的潘兴还是把兵力不足的第42师编入了预备役中。梅诺尔给他写了一封2 000字的书信，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和麦克阿瑟有关。在给老同学的这封信中，“彩虹师”的指挥官提到第84旅的准将“和我们军队中的其他军官相比，还指挥过更大规模的部队……并且每一次都取得了显著的胜利”。梅诺尔赞扬这位“才华横溢、天赋异禀的军官在法国服役的这一年时间里一天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部队和指挥岗位，尽管两次受伤却仍然恪尽职守，在战场上和其他战友一同冲锋陷阵，因而是军队中无可匹敌的人物”。梅诺尔也将这封信的副本寄给了平克妮。

天气突然放晴。树木绽放出秋天夺目的光彩——铜色、金色、紫色、深红色。就在潘兴重新规划进攻策略之际，敌人的最后一座潦草挖掘的战壕被攻陷了。四天之后，德军全线溃败。除了冷冰冰的机枪手还举着枪管奋战到最后，其他的德国士兵全都变成了一群四处逃窜的难民。从他们的祖国传来的消息让他们军心大乱。鲁登道夫被卸任，街上到处都在革命暴动。有的德军部队接到撤离命令时还与英军发起了“成王败寇”的兵变。

在写给《星条旗报》的一篇文章中，亚历山大·伍尔科特提到，在法国垂死挣扎的德军后卫部队就像是一个在逃跑过程中“猛地把身后的椅子拽下来好阻挡追兵”的人。每个刺骨的清晨，步兵都会扛着枪咆哮着冲上山头，将那些身穿灰色军服的逃兵从铁路上赶走或是驱赶至比利时和卢森堡的山上。这是一场追逐，而并非是一次战役。疾驰的战马和沉重的弹药箱几乎赶不上部队的行军速度。“彩虹师”于11月4日加入进来，在色当南部12英里处替第78师解围。接下来便是“一战”中美军最大的一次“论战”——这也是麦克阿瑟的军旅生涯中唯一一次没有招人非议的“论战”。

每个人都想攻下色当。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这个地方其实无关紧

要，但是从历史的角度来看，这里却闪耀着璀璨的光芒。潘兴决意要赶在从左翼进攻的法军前面占领这个地方。11月5日星期二的正午，他将这个想法告诉了自己的下属福克斯·康纳准将。康纳、休·德拉姆和乔治·马歇尔随即起草了命令，并将其下达给了两位指挥官，指示他们“潘兴将军希望美国第一军团能够有幸第一个进驻色当……现在提请你们连夜奋进寻找合适的机会。不用考虑联合战线的问题”。

上述的最后一句话无疑充满了恶意。“如同重磅炸弹一般，”麦克阿瑟表示，“差一点儿就酿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大的悲剧。”色当位于“彩虹师”进军路线前方3英里处。在顽固的德军死守默兹河沿岸的情况下，麦克阿瑟本可以在24小时之内攻陷此地。然而，当晚7点，当萨默罗尔将军接到了潘兴、康纳、德拉姆和马歇尔联合批准的电话命令时，他只得让准将指挥第1师“立即启程前往色当，配合攻下小镇”。与此同时，另一名指挥官则告诉梅诺尔，“追击战必须日夜兼程，不得停顿”，而且“即便全军将士都倒下了，也必须在今晚就拿下色当”。简而言之，第1师和第42师正处在互相冲突的路线上。

虽然麦克阿瑟并不知道美军将穿过他设立的防线，但还是对“彩虹师”必须在黎明之前启程行军的事情心存疑虑。站在绝境边缘上的他眺望默兹河之后提出要延迟战斗。“早晨时在不熟悉的崎岖地区突进比连夜进发的成功率要大得多。”梅诺尔同意了。当年轻的准将麦克阿瑟准备躺上藏壁床休息时，却听闻一队陌生部队正朝“彩虹师”的营地涌来的消息。两支军队随即展开真枪实战的交火。据麦克阿瑟后来回忆，他起身后“亲自走到了前线想要避免双方进一步交火”。然而，他古怪的穿着差点儿成了他“失败”的原因。率领第16步兵团巡逻队的布莱克中尉在遇到这个戴着宽檐帽和围巾，穿着马裤、亮皮靴的人时误认为他一定是个德国人。布莱克用枪指着他，把他当作俘虏带了过去。虽然他很快就被对方满怀歉意地释放了，但整个过程回忆起来还是充满了千钧一发的意味。第1师就这样困惑不解地从第42师所在的地方撤了出去，不过两方的反唇相讥却持续了很长时间。虽然麦克阿瑟将这个意外看作一个笑

话，但他的部队本可以在第二天早上攻下色当的。事实上，他们的任务就这样在混乱之中被解除了。麦克阿瑟凭借在夺取默兹河高地时的英勇表现荣获了自己的第七枚银星奖章。这是他在“一战”中获得的最后一枚奖章。休战协议签署之后，“彩虹师”便成了预备役。

当麦克阿瑟听说一位来自肖蒙总部的军官正在“彩虹师”的司令部里四处闲逛并询问大家对于自己的领导有什么看法时，他的妄想症又犯了。想到自己莫名被擒的那场闹剧——潘兴和他的属下努力将这件事情掩盖了起来——麦克阿瑟打断了对方的来访，问他是不是想要因为“我没有遵照军队的相关规定，或是没有戴头盔、没有戴防毒面具、没有带武器，手里还总是握着一根马鞭，而且拒绝留在后方指挥”而想要制裁自己。实际上，总部并没有打算申斥他。相反，梅诺尔被晋升为军团指挥官之后，麦克阿瑟被任命为他的继任者。38岁那一年，麦克阿瑟成了统领2.6万雄师的领导者——也是战时最年轻的师长。与此同时，潘兴还写信通知他：“我很荣幸地通知你，鉴于你在美国远征军中的工作效率，我已于10月17日力荐你升任少将。”

然而，停战协议签署之后，所有的晋升都停滞了，因此麦克阿瑟没能戴上自己的第二颗星（也就是少将军衔），但还是在“彩虹师”部队中一直留任到了11月22日，直到一位新的两星少将前来接任。（麦克阿瑟向肖蒙总部申请准许自己继续留在第84旅，因为“第84旅的士兵都是麦克阿瑟将军的老部下，也是随他征战了许多个月的一支队伍”。这也是他第一次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尔后，这个颇具恺撒风格的怪癖便成了他的习惯。）杰出的历史学家D. 克莱顿·詹姆斯认为，他之所以被临时授予了师长的头衔完全是“为了让他在色当事件之后保持安静”。这当然不无可能，但无疑也是他争取来的。除了美国政府发给他的12枚奖章（其中包括两枚紫心勋章和一枚他在担任第42师参谋长时获得的服役优异勋章）之外，他还从协约国手中接过了19枚荣誉勋章。当然，这对他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他永远都不会满足。当一个评奖委员会于1月判定他没有获得荣誉勋章的入选资格时，他还痛斥这个决定肯定是受制

于“潘兴总司令部中某些对他怀恨在心的高级官员”。

第42师在指挥权被让渡之后便跨过卢森堡前去占领战败的德意志帝国了。1918年12月1日，麦克阿瑟率领第84旅进入了德国。在这段长达155英里的路途中，他们经过了被炸得满目疮痍的道路。一路上，他都在满腹狐疑地盯着肖蒙将军办公室派来的那些穿着笔挺军装的随行观察员。那些观察员一直都在冷冰冰地看着不辞辛苦的步兵们，还不时地在小本子上鬼鬼祟祟地记录着些什么。实际上，这些备受冷遇的观察员认为第84旅看上去“很优秀，行军途中秩序井然”。可准将对此并不知情，一心以为这些人是来给自己找麻烦的。

到达莱茵兰之后，麦克阿瑟占领了位于波恩南部25英里处的小镇辛齐希的一座壮观城堡。这段时间对他而言十分的古怪。在“彩虹师”执行占领任务的4个月里，他病了两次，一次是咽喉感染——病因是“在战斗中吸入了过量的毒气”——另一次则是白喉。除此之外，由于将士们在战争结束后一直都未能离开欧洲、踏上回家的旅程，他十分担忧自己的部队会因为思乡而出现士气低落的问题。不过他也很喜欢辛齐希，称它是“一个蕴含了几个世纪传奇与浪漫的美丽地方”，并对“当地人的热情好客、秩序井然的生活方式以及节俭和亲切的态度”印象深刻。除此之外，麦克阿瑟显然很喜欢招待尊贵的客人。

在这些客人中，身份最为显赫的非威尔士亲王莫属。亲王悲观地认为德国人的复仇行动是不可避免的。麦克阿瑟欢欣鼓舞地向他保证：“我们这一次打败了德国人，下一次也同样不会失败。”《恩波里亚公报》的威廉·艾伦·怀特在城堡里参加午宴的时候也曾深深地被这里的主人所吸引。怀特在自传中写道：“我从来没有见到过如此活跃、如此迷人、如此具有吸引力的男人。他就是巴里莫尔和约翰·德鲁希望成为的那种人，而且口才极佳！”怀特形容麦克阿瑟的“眼神里透露着一种‘诱惑力’，一定伤过不少女孩子的心”，还指出“他的下属对他都很尊

敬，士兵对他也充满了敬仰之情”。他穿着“破烂的棕色毛衣和休闲裤——身上没有半点儿花哨的地方”，还“十分反对部队下达的不允许与被占领国居民保持友好亲密关系的命令”。怀特提到，麦克阿瑟“认为贝克和伍德会成为总统候选人……对美国的激进运动抱有浓厚的兴趣”。

第三位颇具洞察力的客人便是约瑟夫·C. 蔡斯，一位游历莱茵兰、为在法国战场上做出卓越贡献的美国人画像的肖像艺术家。在1919年4月出版的《世界的使命》杂志中，他撰文提到自己“在德国最有趣的一座建筑里映着烛光为麦克阿瑟将军绘制了一幅画像；这座建筑建在一座古老的女子修道院基础上，查理曼大帝曾和自己的一位妻子在这里生活过，后来又将她抛弃”。蔡斯指出：“年轻的麦克阿瑟看上去就像是历史演义小说中典型的英雄，仿佛轻易便能从《赞达的囚徒》或是《鲁珀特》的书页里走出来似的。他看起来还不到30岁的样子……身材修长，肤色白皙，手指纤长并且修剪得十分整齐，总是梳洗得干净利落。他是个成熟聪慧的年轻人，一看就是城里人，十分健谈但也善于倾听，对于有关‘第42师’的事情总是格外疯狂。当然了，他对于第42师能够打赢‘一战’的态度也很积极。他的动作很快，无论是肢体还是反应；还有些喜怒无常，一会儿眉头紧锁，一会儿又发自内心地大笑，有时候同一个句子甚至能够同时引发他的这两种情绪。”

1919年3月16日，潘兴在雷马根附近的一处平原上检阅了“彩虹师”，并将服役优异勋章戴在了麦克阿瑟的胸前。这也是麦克阿瑟唯一一次佩戴钢盔。两周之后，部队的将士们开始登船返家。有报道称，第84旅的准将会留在那里。这个消息传回美国时，平克妮正疾病缠身。麦克阿瑟给美国远征军的军务局局长发了一封电报：“流言说，我已被选派为法国机枪局的成员。我急切渴望和我的战友一同返回美国。他们中有一半的人已经离开，其余的也将在36个小时内启程。我母亲的健康状况十分危急，因而我担心自己不能按计划回国可能会产生不好的后果。非常感谢您的帮助。”出于对阿瑟·麦克阿瑟夫人身体情况的关怀——她如今不仅是一位英勇战士的遗孀，还是另一位无畏勇士的母亲——对方

很快便做出了回应。4月14日，她的准将儿子在暴风雨中登上了停靠在布雷斯特、将前往纽约的“利维坦”号，准备回到这位已经66岁高龄、被家里人称为“老婆婆”的女人热情的怀抱中。

5月13日，麦克阿瑟给自己的一位前任副官写去了一封信，并在信中提到：“我（在船上）欣然住进了一套价值5 000美元的套房中，拥有4个房间和3个浴室。我每晚都会睡在不同的床铺上，都会享用不同的浴室，心情格外舒畅。”可返回美国时展现在他眼前的就是另一番景象了。4月25日，“利维坦”号靠岸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准将第一个跳下了踏板。他在束腰外衣外面套了一件大大的浣熊皮大衣，脖子上系上了“老婆婆”为他新织的一条围巾。港口上唯一的旁观者是个穿着破旧的小男孩。当小男孩开口问这是哪支部队时，准将怒吼了一句：“我们就是著名的第42师。”男孩一脸无趣地询问他们是否去过法国。麦克阿瑟在信中对自己的副官写道：“没有人前来探望我们，就连孩子们也没有来。在令人心痛的宁静之中，我们走下了码头，在四面八方吹来的风中解散开来。这对‘彩虹师’来说无疑是一个悲哀而又暗淡的结尾。没有人前来欢迎他们的战士……甚至似乎都没有人听说过战争。还有那些奸商！我的天哪，那些奸商！那些没有一辆劳斯莱斯的人肯定就只不过是投机的小商人。还有昂贵的物价！看来巴黎绝对是个便宜的小地方。”他评论“衣服的价格肯定非常非常高昂”，因为他看见的女孩“绝大部分都穿得很少”。此外，他还颇具延展性地补充了一句：“我们回来后也在猜想有关和平条约的事情。那些条款设立得都太极端了，在我看来更像是一纸会挑起无休止战争的条约，而不是维护和平的条约。我为自己在辛齐希的那些朋友们感到很抱歉。他们肯定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在莱茵兰时，第42师的步兵们曾经投票反对过一场在第五大道上举行的游行。不过，就在他们在纽约登陆的那天晚上，有人以为麦克阿瑟庆功的名义在华尔道夫酒店举办了一场舞会。“我是穿着全套军礼服出席的。”30年后，麦克阿瑟在日本时告诉自己的一位副官，“在那个年代，穿着全套军礼服一般都意味着要佩戴马刺等其他装备。就在我跳舞

的时候，一位酒店领班走过来告诉我，舞池里是不允许佩戴马刺的。我问了一句，‘你知道我是谁吗？’他回答，‘是的，将军。’然后我便拉着我的舞伴走出了舞池，从此再也没有踏足过那个地方。”

麦克阿瑟毕生都在追求极致，但事实总是让他不得不让步。他的晚年岁月是在纽约度过的，但他也夸大了曼哈顿人对第42师的冷漠。当然，他的际遇与他对这身倍加珍视的军装以及战友们的热情是不相符的。肩膀上佩戴着第42师肩章的老兵无论什么时候遇到他，与他打招呼时，都会得到他热情的回应。若是他们身无分文，他便会塞上一张5美元的纸币。有一次，他甚至还原谅了一个威胁到他性命的老兵。20世纪20年代初的某一天，他的司机载着他沿哈德孙河西岸行驶时，路中间突然蹦出了一个手持手电筒的男子，朝他们挥手，示意他们停下。那名男子拿出一把手枪，让准将把钱包交出来。“你是不能轻易拿到这些钱的。”麦克阿瑟说道，“我这里有大约40美元，但是你得打败我才能拿走它们。我现在就要下车和你争个高下。”那个暴徒威胁他，说自己会要了他的命。麦克阿瑟回答：“当然，你可以朝我开枪，但是如果你这么做了，他们肯定会把你抓起来，关进监狱里处以电刑。放下那把枪，让我出来和你公平地决斗，胜了的话你就可以拿走我的钱。我的名字叫麦克阿瑟，我住在……”

只见那个男人放下了手枪，开口说道：“我的上帝，你为什么不早说？嗨，我曾经在‘彩虹师’里当过兵，是‘野蛮比尔’·多诺万手下的一个中士。我的上帝，将军，对不起。我向您道歉。”

麦克阿瑟示意司机继续向前开，直到最后，他也没有打算报警。

---

1. 1码=0.914 4米。——编者注

第三章
重返校园
1919~1935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战争对于西点军校来说无疑是最严峻的考验。内战时期，军校学员被分成了几个部分，将近四分之一的人都被分配去了南方。在美西战争及战后的那段时光中，也就是麦克阿瑟考入西点军校的时候，学校的课程一直处于剧变之中。“一战”结束之后，军校再次陷入一片混乱。1917年，在美国正式对德宣战之后，在校的三、四年级学员很快便提前毕了业。其他的学员也于1918年加入了现役，但工程兵主任拒绝接收这些只受过粗浅训练的士官。于是，大部分新近毕业的军校生在停战协议签署后又返回了校园。由于他们头上佩戴的宽边毡帽上都绑着黄色的带子，因此又被称为“金莺队”。在这种环境下，军校校风急转直下。1919年新年那一天，一位新生不堪受辱，开枪自杀。国会一片哗然，立即出面要求军校进行改革。

坐镇华盛顿的陆军总参谋佩顿·C.　马奇是一个说话尖酸刻薄、长着

一对薄嘴唇的知识分子。他在菲律宾时曾在阿瑟·麦克阿瑟手下服役，后来赴法国参战期间又长期与潘兴不和。1919年春天，马奇将军决心一定要让西点军校“恢复生机”，压制校园霸凌，改革课程大纲，为军事教育注入现代化的活力。他表示自己需要寻找一位新校长，一位聪慧过人、魅力四射的军官，“可以深入理解自己的学生，全面把握国内外大事的脉搏，拥有自由的观念，及有能力改变指挥的心理”。出于对潘兴的反感，他想要找一个和肖蒙总部的作风不一样的人选。想起自己的老指挥官，他找来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5月12日，麦克阿瑟的第84旅已经在道奇营被遣散。于是马奇命令麦克阿瑟下个月就接手校长一职。

“西点军校已经落伍40年了。”马奇将军说道，故意不提自己在缩短学制方面所做的决定正是让这座哈德孙河畔名校陷入混乱的原因。麦克阿瑟对此表示了抗议：“我不是一个教育家。我是个战地军人……我做不到。”他还指出，自己的年龄对于这份重任也十分不利，军校里有5位教授早在他还是新生的时候就在那里任教了，而现任校长（也就是即将被他所替代的那一位）也已是72岁高龄了。但马奇仍旧十分坚持：“不……你做得到。”无须多问，麦克阿瑟接下来肯定还要苦苦声辩。他爱西点军校。更重要的是，这是军队中最受人尊敬的一项职务。如果他接受了此项任命，就能堂堂正正地继续做他的陆军准将，否则将会被降为战前的少校军衔——最终他还是接受了。6月12日，他和母亲搬进了用铁丝格子围起来的砖石结构的校长宅邸中。第二天早上，学员们看到了一个孤独冷漠的人影漫不经心地在“对角线步道”上散着步。他头上戴着一顶没有金属扣眼的帽子，身上穿着没系腰带的短上衣，腿上包着一对皮质的军用绑腿，上面的皮带因为过于陈旧而打着卷。他的一只手臂下面还夹着一根短马鞭。据副官威廉·A. 加诺少校回忆：“他的打扮将将能够通过检查。”

西点军校的教官们对此反应相当消极。“太好了。”一个男子说道，“看上去这又是让军校自取灭亡的一步。究竟谁能有这么大本事可以坐上这个位置？”加诺坐在这座中世纪风格的行政办公楼的办公桌

前，听到铺着空心砖的走廊里传来一阵轻快的脚步声。门被推开了，迎接他的是麦克阿瑟热情的招呼声。只见他用左手握了握加诺的手，然后又轻轻拥抱了加诺一下。准将的眼神向下扫视时正好看到加诺刚刚写好的辞职信，于是一脸和蔼地将信撕掉了。紧接着，他又拆掉了前任校长呼唤加诺时所使用的蜂鸣器。“副官又不是我的仆人。”麦克阿瑟这样说道。实际上，“副官”这个称谓对于麦克阿瑟的助理来说是远远不够的——“办公室主任”还差不多。自此以后，他便一直称加诺为“主任”。

这位副官问麦克阿瑟打算什么时候检阅军校的学员。麦克阿瑟的眉毛一下子就挑了起来。他问道：“我为什么要检阅他们，主任？”加诺回答：“让他们表达对于新校长的欢迎和尊敬。”新校长说道：“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我们做学员的时候就没少参加这种仪式。学校隔三岔五便会找些借口让学员出来作秀。专门为我办一场这样的活动对我又能有什么好处呢？他们很快就会见到我的，而且有的是机会和我打交道。某些场合中的仪式真的很恼人，这种事情我在国外见多了。”厄尔·H. 布莱克当时正好是军校里的一名学员。他回忆说：“我们很快便了解到他不是那种会在学生面前装腔作势的人。”

加诺成了第一个归顺麦克阿瑟的人。后来，指挥官罗伯特·M. 丹福德和校长助理路易斯·E. 希布斯上尉也都站到了麦克阿瑟这一边。对校长崇敬有加的加诺还经常详细地记录校长的穿着和举止。由于麦克阿瑟做事一向有条不紊——每一个决定都是当下立断的，每一封信或每一份备忘录都会在当天回复——所以，从传记作家的角度来看，他在1919~1922年留下的档案文件简直少得令人恼火。加诺的回忆录便成了回顾那段日子时最好的记录。

从副官的角度来看，麦克阿瑟是一个异常另类的指挥官。他会倚靠在下属的办公桌上，或是把穿着袜子的脚放在自己的桌子上，还经常用法语中的“bon（好）”这个字作为自己的通用插入语，并且不顾校方禁止本科生吸烟的传统邀请学员从他的金色烟盒里取根烟“抽上一口”。

（加诺说：“他坚信‘规矩就是用来被打破的’以及‘规矩是给那些怠惰地躲在后面的人设立的’之类的理念。”）他不喜欢通过书信甚至是电话来训斥别人，“他和别人交流时都是面对面的”。他在接待来访者时一律一视同仁，无论对方是中士还是少将。“他习惯触碰你的手肘或是肩膀，还会微微扬起下巴，眼神里充满了赞同的温暖神情，让你感觉自己好像造福了全人类一般。”但他不鼓励别人也用同样亲密的方式来回报他：“虽然你可以无所畏惧地在他面前放松自己，但绝不要想拍拍他的后背以示回敬。”

在麦克阿瑟的所有品质之中，加诺觉得“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毫不动摇的冷静与沉着，以及他惊人的自制力。我曾经见过不少人因为过于沉静古板而变得冷漠起来。但麦克阿瑟绝不是那样的人。他的每一个音调、每一个眼神或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朝气蓬勃的活力……他说话和走路的时候都颇有绅士风度，丝毫不会显得过于张扬。他的步态和表情看上去都是那样的无忧无虑但又不会显得漠不关心”。加诺相信麦克阿瑟拥有“与生俱来的领导能力，能让别人出于尊重而与他保持距离，但同时又能让人感觉自己也得到了他的尊重，被他当作是自己人。很快，你就会发现自己比从前工作起来更加努力，而这完全是源自你对他的忠诚、敬仰和尊敬之情。虽然顺从是一个领导者通过下达命令就能够得到的，但是忠诚这种难以言表的东西就是必须要去赢得的了。麦克阿瑟天生就知道该如何去赢得别人的忠诚”。这位副官最后还总结道：“他是个很矛盾的人，不用下达命令却同样可以统领四方，既有贵族气质又有平民作风。我闭上眼睛就能看到他穿着战袍、狂妄地踏上战车的画面，而他下一秒钟就有可能换上土布衣服，坐在庞贝城中狭窄的人行道旁随意地和一个奴隶聊天。”

话说回来，最适合麦克阿瑟的还是战袍。“对他来说，‘绅士’这个词具有某种神圣意味，比任何一种称谓、职务甚至是美国国会法案都要高级。它是一种生活态度，需要用每一个行动和每一句话语来呵护，执行起来容不得半点儿放松和托词……愤怒、严责或是训斥都是头等大忌。

他从没有触犯过这其中的任何一条。每当面临压力或是烦躁不堪时，他的声音就会变得低沉起来，像是低频的贝斯和低吟的声音，其中蕴含着某种强大的控制力，让每个听到的人都不由得静下来。”遭到反对时，他拒绝当众大吵大闹。“虽然他的性格容易变得暴躁，但他总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情绪……而且他还能用不到10个字来名正言顺、完美熟练地表达出自己的厌恶感。即便是说出谴责与拒绝的话语，他也能维持高傲的绅士风度。”

麦克阿瑟的敏捷思维也给加诺和其他教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提出一个问题之后，“在我回答的时候，另一个问题便会接踵而至，快得我来不及反应。更多的问题接二连三地从他口中加速蹦出，甚至都淹没了我的答案。从他的眼神中我能够看出，他早在我完成作答之前便全都明白了”。在办公室里接待访客时，他总是会递上一支烟，然后一边在两面墙之间来回走动，一边倾听来者的意图。紧接着，随着一声带有疑问性质的“好了吗？”，他会把自己刚才听到的内容再叙述一遍。在观察了好几次这样的“仪式”之后，加诺在校长视线之外的隔壁办公室里安排了手下最好的一名速记员。“就算是来访的人讲了一段长达5分钟的故事，校长也能从容地把它复述出来”，逐字逐句，“就好像他听到的是一篇命题演讲似的”。在针对几个问题交换了意见之后，校长会把自己的手放在对方的肩膀上，下达指令，最后打趣地做个结论：“开始干吧，孩子！”

按照麦克阿瑟的指示，西点军校的起床号吹响时间被提前了一个小时。虽然他和其他人起得一样早，但上午大部分时间都会在自己的宅邸里办公，好让教官们能够先行开工。他会在10点半到11点半之间来到办公室，花上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阅读信件。根据他的要求，所有的信封都会被撕开一半，这样一来就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读到信中的内容；他一般会先将回信内容潦草地写在信封的背面，然后再打印成稿，签字署名。正午到下午1点是他与别人约见的时间，而接下来他还要花两个小时在宅邸里陪伴母亲。军校里的会议一般在下午4点半到5点之间结束，

然后他会在晚饭之前去观摩一会儿学员们的体育课。入夜后，他多半都会待在书房阅读历史、文学和军事科学方面的书籍。和父亲一样，他也会选择钻研一些晦涩难懂的书籍。战争让他清醒了不少，飞行员米切尔的妹妹哈丽雅特·米切尔在过来吃午饭时就发现他和自己曾经在密尔沃基时认识的那个男孩“有些不太一样了”，变得“有些严肃和保守，不再整天只想着寻欢作乐”，和年轻时会在她的舞伴卡上写十四行诗的小伙子俨然成了两个人。同时，他也因为自己的军衔而感到有些寂寞。“等你做了将军，路易，”他对自己的助手说道，“你就没有朋友了。”

但他还有自己的母亲。随着岁月的流逝，她早已成为他的知心女友，他的女监护人，他的“比阿特丽斯”。对她来说，这是一段风和日丽的幸福时光，她支持他，为他守护着肩膀上的那枚星章和一抽屉的荣誉勋章。虽然他除了最正式的场合之外从不愿意把它们戴在身上，但它们还是证明了他是值得父亲以及前辈西点军校校长罗伯特·E.　李感到骄傲的继承人。作为军校正式的女主人，她运用自己在弗吉尼亚时学到的各种社交技巧接待过哈定总统、威尔士亲王、比利时国王、福煦元帅等人。除此之外，她还备受军校学员们的欢迎。一天晚上，一群三年级的学员派了两个新生出来买冰激凌。在回来的路上，那群三年级的学员路过了校长的宅邸，正好碰到麦克阿瑟在草坪上踱步，于是便被拦下训斥了一番。突然间，他们头顶上的一扇窗户被猛地推开了。只见老婆婆探出头来喊道：“道格拉斯！别再说了，让孩子们走吧。你没有看到他们的冰激凌已经开始化了吗？”他这才注意到学员们手中的纸袋底部已经有些潮湿了，于是便顺从地对他们说道：“我猜你们最好赶紧跑远点儿。”

如今的学员之所以买得起冰激凌，完全是因为麦克阿瑟破天荒地允许他们每个月领取5美元的零花钱。每周末，军校还准予他们6个小时的外出假。适逢夏天的那两个月，他们还可以获准两天的假期。此外，他

们可以单独外出旅行，最远可以去纽约市。在橄榄球赛季期间，他们还获准可以跟随黑骑士队前往哈佛、耶鲁和圣母大学比赛。他们的书信不再受到监视，四年级的学生也被允许组建自己的俱乐部、拜访军官甚至和军官们打牌。校园霸凌现象受到了严厉的遏制，并改由教官而不是高年级的学生来负责“野兽营”期间的新生训练工作。当丹福德提议用口头批评的方法来替代“体罚”时——也就是让学员把对自己不良行为的解释落在笔头上，顺便让他们练字——麦克阿瑟马上就回答：“就这么做！”记过的事情仍旧交由战术教官来负责，但学员之间也要根据彼此的军人风度和领导能力来打分。军校要求所有的学员每天都要阅读两份报纸，并做好参与时事讨论的准备。在得知学员们曾于1916年自发组织过一个“警戒委员会”来调查本科生的作弊问题时，新校长以校方的名义对这个组织予以认可，并从此引入了学术方面的荣誉制度，要求学员对自己的诚信负责。

固执保守的校友——加诺称他们为“爱闹情绪的老毕业生”或是“老狗”——对麦克阿瑟放任自流的管理方式表示反对，认为他的做法会让西点军校从此堕落。事实上，麦克阿瑟从不会放纵自己的学生。当学员创办的报纸《布雷报》刊文对校方的管理冷嘲热讽时，他压下了那篇文章，还将负责监督报纸编辑的战术教官解了职。不过，和“彩虹师”并肩作战的经验教会了麦克阿瑟，这些参军的士兵需要的是被说服，因此不能像对待机器人一样对待他们。他相信，未来的军官都应该学到这一点，也都应该逐渐认清20世纪的现实。为此，他邀请比利·米切尔针对防空作战进行了一次演讲，还鼓励学员们培养对于机械学的兴趣，将内战战役的图解换成了“一战”战役的图解，同时（颇有先见之明地）订购了一批可供永久展示的远东地图。

9月，他询问加诺：“主任，我们还要继续为1812年的战争准备多长时间？夏令营有什么可能的用途？”加诺回忆：“如果他问我的是‘调情步道有什么好处’的话，我可能还不会被难倒。”按照传统，每逢夏季，学员们都会在“战利品角”东边的帆布帐篷下扎营，穿着19世纪的军装参

加舞会，在短笛和军鼓的伴奏下行军，听着哨兵喊着“平安无事”的口号入睡。尽管“老狗们”极力反对，麦克阿瑟还是取消了这些活动，转而安排学员们前往新泽西的迪克斯堡，在常规军士官的教导下练习使用现代化的武器，之后再背上全套的野战装备步行返回哈德孙河畔。

麦克阿瑟十分相信运动。他曾经读到过并且很喜欢引用约翰·杜威的一句话：“不能让身体与心灵互相教导的体系是不可能保证一般智力的。”作为校长，他不仅将体育课设为全校学员的必修课，还下令在学校体育馆的石门上刻下了一首四行诗：

在友好竞技的战场上，

播下种子，

某天在另一个战场上，

它必将结出胜利的果实。

麦克阿瑟留下了这样的一首诗，并将西点军校的运动课程交给了1917年毕业后担任体育部主任的马修·B.　李奇微上尉。麦克阿瑟对于西点军校体育教育的贡献可能并没有显现出来，但他从不会半途而废，而且他在每个竞技场上追求胜利的巨大动力也引领着他不断超越自己。他力劝国会议员保送有天赋的运动员进入军校，还要求政府出资在军校里修建一座拥有5万个座位的体育馆。每逢秋季，他都会赋予自己的橄榄球队队员一定的特权。训练时，他经常穿着短大衣（这是战争部明令禁止的）、腋下夹着那条无所不在的短马鞭在运动场边偷偷地溜达。不过，令人感到惋惜的是，在他担任校长期间，陆军学员的球队在和海军学员对抗时连着输掉了三场比赛。

在橄榄球场上失意的麦克阿瑟又将目光转向了棒球场。据当年的西点军校明星运动员厄尔·布莱克回忆：“在一次击球训练中，我在练习曲线球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和往常一样，麦克阿瑟正在一旁观看球队的

训练。我知道他原来曾是一名出色的球员，于是便决定就击球问题找他取取经。看到将军解开紧绷的领口、摘下自己的山姆布朗腰带、迈上了击球位置时，我并没有感到很惊讶，但那也是我唯一一次看到他没能完成自己决心要做到的事情。换我再次上场击球时，我不仅打不出曲线球，就连直线球也打不好了。”尽管如此，陆军棒球队还是在1921年战胜了自己的海军对手。那天半夜，学员们无视校规在校长宅邸的门前欢呼游行，还在平原边燃起了一大堆篝火。第二天早上，麦克阿瑟一脸严肃地看着丹福德说道：“哦，指挥官，你昨晚还真是办了一场盛大的派对啊。”指挥官紧张地承认了事实。紧接着，他又问起：“你惩罚了几个学员？”当指挥官回答“一个也没有”的时候，麦克阿瑟一拳敲在了办公桌上。“很好！”他说道，“你知道吗，指挥官，我差一点儿就忍不住冲出去加入他们。”

麦克阿瑟对于运动的热忱还为他赢得了一位意想不到的盟友——克莱顿·E. “巴克”·惠特，也就是西点军校的牧师。这位牧师建议取消军校里已有百年历史的安息日仪式，以便允许学生们进行星期日训练。“我百分之百批准这条建议！”麦克阿瑟兴奋地表示，“就这么办！”不久，军校里每个连队的学员都加入了橄榄球、棒球、足球、长曲棍球、网球、篮球、高尔夫球和马球队伍，而旧日里的夏令营场地上也建起了一条跑道。在另一个领域里坚定支持麦克阿瑟的是语文与历史部主任、耶鲁大学博士卢修斯·E. 霍尔特上校。和新校长一样，霍尔特也坚信学员们不应该只研习有关军事科学和策略的知识，而是同样应该对政府、经济、心理和社会学有所涉猎。在麦克阿瑟的倡议下，霍尔特在自己的课堂上着重强调公开演讲的重要性，还要求学生们每天早上都对国内外新闻进行10分钟的评述。

惠特和霍尔特显然是两个特例。教官队伍中的其他人就没有这么热情了。总的来说，学员们都十分仰慕他们的新领袖，不过也有几个特例——当时的一名本科生就曾回忆说：“我和我班上的大部分人从没见过将军，除非是他在对角线步道上散步的时候。那时候的他显然若有所

思，鼻子高高地翘向空中，眼睛凝视着远处的地平线，和他在宣传照片里的样子一样。”不过，抱有这种思想的人只是屈指可数的少数派。另一方面，在由教官们组成的学术委员会中，大部分人都会批评麦克阿瑟的教学理念。他们不喜欢他不请自来地就出现在自己的课堂上，这在历任校长中都是史无前例的。此外，他随意地挥动短马鞭来回敬别人敬礼的习惯也被他们视为对军队礼仪的不敬，而他邋遢的帽子和短大衣更是给人留下了“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印象。

大部分教授都不赞同麦克阿瑟对于学术改革的建议。虽然他们无权干预他在学员生活方面放宽限制的做法（当然了，他们对此肯定也是心怀不满的），但利用校长在学术委员会中只有一票的劣势，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否决了他的建议。加诺形容，如果说“老狗们”固执得就像“拴马桩一样”，那么学术委员会的那些老顽固就更难对付了。不过，他们偶尔也会稍稍松口。经济学和政治学被引进了教学大纲，学员们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计算尺、无线电通信，且地质学和矿物学的课程也被换成了西班牙语教学。每一位教授每年都要去至少三所普通高校进行访学；学校还邀请了像米切尔这样的人出任讲师。然而，面对麦克阿瑟提出的拓宽人文学科的恳求，教官们依旧不为所动。与他的意见大相径庭，学术委员会并不认为社会科学的时代已经到来，也不觉得闭门造车是教不出什么知识来的（麦克阿瑟在评论西点军校的教学大纲时曾指出：“这就像是一堆没有水泥浆黏合的松垮砖头”），还要坚守军校里“板前背诵”的传统——根据这项传统的要求，一位学员必须站在黑板前面，面对着教授和11位其他学员逐字逐句地背诵课本上的段落。

1920年的春天，在查尔斯·W. 埃利奥特博士的引领之下，军校成了历史上不时爆发的野蛮民间抨击言论的诋毁对象。这位从哈佛荣誉退休的校长在哈佛教师协会的面前指责“西点军校是教育机构的反例”。为了表示抗议，一位少将公开要求埃利奥特代表广大教员对此做出详细说明。埃利奥特是这样回复的：“在我看来，任何一所美国院校首先都不应该像西点军校一样接受一些准备不足的素材。其次，任何一所院校都

不应该缺乏事先完整规划好的教学大纲。再次，任何一所院校都不应该让刚刚毕业的同门前辈来完成大部分的执教任务。”战争部的一位发言人通过《纽约时报》对此做出了回应：“我们承认西点军校的校风很苛刻，课程也很有限。我们认为，美国理应至少有一所学校还能做到让学生视责任高于自己的其他权利。”这也反映了那些在华盛顿任职的保守“肖蒙党”上校的观点。令他们感到懊恼的是，麦克阿瑟竟然在出任校长后提交的第一份报告中对埃利奥特的观点表示了赞同。他提到，美军赴法作战的经历彰显了对于“能够理解人类情感机制”的新型士兵的需求。他认为，“在全民武装的时代”，随机应变“将成为一句格言”，需要“指挥心理做出改变”。因此，西点军校的结构调整应该是“从客观纪律性到主观纪律性的转变，逐渐增加学员在培养首创精神和人格力量方面而不是在固有作用方面进行自动化表演的责任心”。

此番言论让潘兴的党羽们认定这位“彩虹师”的英雄仍旧是一个好大喜功的人。这也说明了一个让麦克阿瑟苦恼终身的弱点：爱打如意算盘。“枢密院”——他就是这样在手下面前冷嘲热讽地形容学术委员会的——对于他想要对学校进行结构调整的事情一直没有与他达成共识。加诺表示，自己从未见到过“如此有权有势又顽固不化的团体”。恼羞成怒的麦克阿瑟也试过要拆他们的台。一天，吉布斯问他是否应该和往常一样把委员会会议安排在上午11点。“不！”校长怒不可遏地回答，“下午4点30分开会。我要让他们饿着肚子来——直到他们答应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再放他们走。”

然而，麦克阿瑟的心愿并没有达成。昏暗的会议室里，隔着两旁立着伟大战士雕塑并饰有金银丝细工的壁炉、深色的皮椅和巨大的中世纪会议桌，麦克阿瑟声讨他们的声音变得愈加高亢。据丹福德回忆，在某一次的会议中，他在争辩时甚至不惜戳破了礼数、礼仪的那层薄膜。正如埃利奥特所言，军校里的教官们都具有排外的小团体性质。认识到了这一点，校长提议邀请更多的其他高校校友前来西点军校教课，特别是教授英语课程。一位年长的上校站起身来言语辛辣地指出，士兵们应该

学习如何使用武器而不是用词。正当麦克阿瑟试图予以还击时，这位上校又用更快的语速继续说教起来。麦克阿瑟用拳头重重地砸了一下桌子，终于打断了对方的话。他怒吼道："坐下，先生！我才是校长！"环顾四周之后，他又补充道："即便我不是校长，你们也应该用对待绅士的方法来对待我。"

从此以后，虽然不太甘心，但他们对麦克阿瑟说话的方式的确谦逊了不少。对比麦克阿瑟上任前后军校的四年课程体系就会发现，他为学员们增加了389.75个学时的课程，其中大部分都与人文学科有关，而相应削减了524个学时的数学、绘画和军事技巧课程。在评价由他担任校长的这段西点军校历史时，史蒂芬·E. 安布罗斯指出，麦克阿瑟的改革"只能用'最小限度'这个词来形容"。很久之后，麦克阿瑟才承认："（改革）取得的成就和我想象的相距甚远。"他上任后的第二年，局面似乎越来越令人感到沮丧。不仅他手下教官的想法没有得到扭转，就连他申请建造体育馆的计划和扩招双倍学员的计划也遭到了国会的拒绝。也许他最大的成就便是鼓舞了那个年代的西点军校学员。其中的两名学员——莱曼·雷姆尼策和马克斯韦尔·泰勒——在未来都成了陆军参谋长，而霍伊特·范登堡和托马斯·D. 怀特则成了空军参谋长。国会无视《纽约时报》嘲笑西点军校"过于苛刻"的反对声音，同意维持西点军校目前的四年制课程。虽然麦克阿瑟在其中的角色有些模糊，但无论如何反对三年制课程计划的主要见证人便是潘兴将军。

1921年，沃伦·哈定当选总统，约翰·W. 威克斯继牛顿·贝克之后成为战争部部长——作为麦克阿瑟一直以来的仰慕者，贝克在离职前确保了他永久准将的身份——而如今继任参谋长的潘兴却开始仔细审视西点军校。这位将军支持意在给新入学的学员一个下马威的夏令营，也十分怀念哈德孙河畔宁静的星期日，更喜欢不抽烟、爱读报、手头没有一分零花钱，也没有6小时假期去享受纽约奢侈生活的学员。因此，他和周围的人决意要让西点军校回到过去。在愤愤不平的"老狗"以及满腔牢骚的教官的鼓励下，他们给麦克阿瑟选好了一位继任者：弗雷德·W. 斯莱

登准将，西点军校1890届的毕业生。斯莱登既不爱带短马鞭，也不会把帽子里的铁丝拆掉，更不爱读约翰·杜威的作品。他已经准备好了要重新实施被麦克阿瑟废除的那些限制，包括实行禁烟令。潘兴迫切地希望他能够入住校长宅邸，唯一需要的就是找个借口让麦克阿瑟卸任。

可潘兴找不到这样的一个借口。他知道麦克阿瑟手下的一批军官认为西点军校的纪律性已经受到了严重的损害，但他们的报告还未成型。此外，报告的作者也不过是些外行的军校毕业生，权衡麦克阿瑟的光辉战绩，大众必然是不会采信这些人的结论的。一般来说，校长的任期是四年，而麦克阿瑟看上去注定要踏踏实实留任到任期结束。然而，1922年1月30日——在麦克阿瑟上任不到三年之际——潘兴却意外地宣布将这位校长调往菲律宾。同一天，这位参谋长还给麦克阿瑟寄去了一封书信，信中提到自己最近非常诧异地听说校长在国会山某委员会面前就西点军校的预算问题做了证。“听到这个消息，我很震惊。”他继续写道，“因为你在来访期间显然并没有联系我的办公室，也没有到过战争部。暂且不提军中的规矩和习惯，我觉得凭借你的经验和军衔，至少应该知道自己应向我们通报你来华盛顿的行程和目的，并且和部里的人一起探讨一下你即将在军事委员会面前提及的问题。”

2月2日，麦克阿瑟在回信中表达了自己的困惑。他是在出发的“几小时前”才匆匆收到华盛顿的召见通知的，“根本就没有时间安排火车线路”。一到华盛顿，尽管“没有规定军校的校长在被国会委员会召见时必须立即向自己的军事上司报告”，他还是将自己已经到达的消息通知了陆军副官长。做证结束之后，他还给潘兴的办公室打了个电话，询问参谋长是否想要见他。一位助理给了他否定的答复。麦克阿瑟总结道：“我很遗憾这件事让我在自己最敬重的两位上级军官那里留下了不知礼节的印象。就像我上述所说的那样，我的所作所为并不是故意的。”

至于他的道歉是否被接纳了，史料并没有记载。而麦克阿瑟也不应

该期待自己会被原谅，毕竟潘兴的怒火和这位校长来访华盛顿的事情并没有丝毫的关系。就像派驻他开赴菲律宾的指令一样，此举显然是对他冷漠的有意冒犯。而就在这段日子里，麦克阿瑟准将犯下了一个可以扭转他一生的“古老错误”。这位将军那时爱上了一个女子，迫不及待地想要占有她。

事实上，谁也不知道他们二人是谁先偷走了谁的心——是不可一世、英俊迷人的西点军校校长迷惑了参谋长潘兴手下最得意的离异女雇员，还是世故老练、风情万种的轻佻女子趁那位关怀备至的母亲偶尔走神时抓住了她最心爱的儿子的心。两人之间并没有书信往来。和麦克阿瑟在自己的戎马生涯中追求过的几段婚姻经历一样，这一段感情进展得十分顺利。他们相识于一场在塔克西多公园举办的晚会派对——那里是离军校20英里的一个度假胜地。夜晚还没有结束，这两人就已经如胶似漆了。“如果他没有在我们刚认识的时候就向我求婚，我想我可能会孤独终老。”麦克阿瑟的未婚妻这样告诉记者。

1922年1月15日，这对情侣在《纽约时报》上公布了订婚的消息，使得潘兴与平克妮的计划毁于一旦。平克妮是最大的输家。虽然这位准将母亲拒绝了儿子的恳求，但也随之失去了内心的渴望。也许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儿子。然而，这位新娘却是她最不可能应允的儿媳。要是平克妮的丈夫或罗伯特·E.　李还在世的话，一定也会感到十分震惊。阿瑟·麦克阿瑟夫人简直就快要发狂了。卧病在床的她对一位前来慰问自己的朋友说道：“当然了，他们对于彼此的吸引纯粹是肉体上的。”她是对的。事实的确如此。但对于那两个人来说，这种肉体上的吸引力是高水准的。

和麦克阿瑟的浣熊皮外套一样，亨丽埃特·路易丝·克伦威尔·布鲁克斯是个属于20世纪20年代的人。她厌恶自己名字中的第一个词，因此更喜欢别人叫她路易丝。即将成为新郎的麦克阿瑟那时候显然有些不太自

在。他不懂股票市场，不喜欢爵士音乐，更不懂品味家酿的杜松子酒。然而，路易丝很喜欢这三样东西，对于让他感到反感和困惑的很多东西更是爱不释手，早就做好了享受那个年代纸醉金迷生活的准备。她的养父是费城的爱德华·T. 斯托茨伯里，兄弟詹姆斯·克伦威尔的妻子则是多丽丝·杜克。她曾经上过最好的女子精修学校，在华盛顿的初次露面成了当季热议的社会事件：为了此次婚礼，位于康涅狄格大街和L大街交汇处的劳舍尔餐厅被改造成了一座花园，其中遍植雪松、文竹、棕榈树和玫瑰，还有几只活泼的黄色金丝雀。她一生总共会有4段婚姻（麦克阿瑟是她的第二任丈夫），第一任丈夫名叫沃尔特·布鲁克斯，是巴尔的摩的一位社会名流和承包商，同时也是她两个孩子的父亲。1919年离异之后，她便剪短了头发，穿上了短裙，在巴黎过上了国际化的生活。

在专栏作家的笔下，路易丝在巴黎时曾和许多人都有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这其中就包括了同样离异的潘兴、单身的约翰·G. 奎克梅尔上校以及已婚的英国上将戴维·比提爵士。后来有传言说路易丝正是导致比提上将离婚的罪魁祸首，但埃塞尔·比提在她的离婚诉讼里并没有提到这一点。而且，美国远征军司令潘兴在此之前也从没有注意过她。返回华盛顿以后，路易丝做了潘兴的办公室办事员，还有人传言说她会成为第二位潘兴太太。据报纸内容记载，那一年她25岁。不过鉴于她早在1908年时便嫁给了布鲁克斯，因此报纸的内容显然是无稽之谈。实际上，她已经30多岁了，只不过看上去很年轻，和爵士年代的“假小子”（塞尔达·菲茨杰拉德以及克拉拉·鲍）有些神似。她留着一头蓬乱的短发，眉目流转间还不忘淘气地露齿微笑，似乎永远都在徘徊寻找《了不起的盖茨比》中“戴着一顶金帽子、跳得高高的爱人”。而她正好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身上找到了这样的影子。

“她的声音里充满了纸醉金迷的感觉。”《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作者这样形容书中的一位女主角。路易丝的银行账户里就从来不缺钱（她养父的资产价值超过了1亿美元），因此她觉得自己可以用钱买来麦克阿瑟的心。但是，她直到婚礼当天才意识到事情和自己想象的正好相反。

1922年情人节那天下午4点，他们的结婚典礼即将于半小时后在斯托茨伯里的埃尔米拉索尔别墅——一座西班牙风格的棕榈海滩建筑内举行。身着华丽的白色礼服、胸前佩戴着绶带的新郎提早30分钟出现在了装饰着西点军校和“彩虹师”旗帜的那条通往圣坛的步道上。他惊恐地发现，自己的新娘正踩在一部梯子上重新整理着婚礼的装饰物，不仅没有穿戴好杏黄色的雪纺绸礼服裙和钻石项链，就连这些东西在哪里都不知道。他语气严厉地就准时问题训斥了她一番，害得自己的未婚妻噘起了嘴巴。除了这个征兆以外，婚礼的宾客名单也隐含着不祥的意味。在200人的名单中，只有巴克·惠特一人是麦克阿瑟的朋友。平克妮直截了当地拒绝出席婚礼。第二天，报纸还以“战神与百万富婆的婚姻”为题报道了这一事件。

在“战神”和他的“百万富婆”妻子从佛罗里达蜜月归来返回西点军校后，路易丝的新婆婆便搬出了校长宅邸，住进了华盛顿的沃德曼公园酒店。从平克妮在沃德曼公园酒店草草书写下的笔记中可以看出，再次患病的平克妮决定大部分时间和自己的另一个儿媳——海军少将的妻子玛丽·麦卡拉·麦克阿瑟——共同生活。准将并没有太多的时间来安抚这位老太太的心情。他甚至没有时间给自己的学员们送去一小块儿结婚蛋糕，而是一门心思投入了即将来临的赴任马尼拉的事务之中。纽约的记者们预感到有事可写，纷纷赶往军校。而正在为自己向潘兴伸出橄榄枝却没有得到回应的事情感到懊恼的路易丝（她邀请潘兴来宅邸共进晚餐）则向他们吐露了自己的心声。她对其中一位记者说道：“杰克（潘兴的昵称）想让我嫁给他……我是不会那么做的——所以我收拾好行李来到了这里。”在面对另一位记者时，她指责潘兴将她和她的新丈夫“流放”到了菲律宾，还说参谋长曾经警告过她，“如果我嫁给麦克阿瑟，他就会把我的丈夫送到一个我不喜欢的、天气极端恶劣的岛屿上去”。很快，《纽约时报》上刊登了一封反对将麦克阿瑟调离西点军校、改赴菲律宾任职的书信。不久，报纸的第3版上又刊登了一篇名为“潘兴否认签署流放命令”的文章。文中，参谋长无礼地评论道：“这些完全是胡说八道，没有半点儿依据，都是些没有意义的八卦。如果我打算和所有与我

传过绯闻的女子结婚，我早就成了‘杨百翰’了。”他草率地表示，麦克阿瑟之所以被重新委派就是因为现在正是他驻外工作的时机。

6月下旬，卸任后的校长将军校的命运交给了反对改革的斯莱登。长假之后，麦克阿瑟、路易丝以及路易丝的两个孩子小沃尔特和小路易丝登上了停靠在旧金山的班轮“托马斯”号。麦克阿瑟事后写道，当他们停靠在马尼拉的第五码头时，“眼前再一次出现了巴丹半岛巨大的悬崖和科雷希多岛贫乏的灰色岩石，身体被热带恒久不变的酷热紧紧地包裹住了”。在当时已经是菲律宾参议院主席的曼努埃尔·奎松的帮助下，他们搬进了位于维多利亚大街1号的新家“墙上屋”。这是一座菲律宾人众所周知的18世纪美丽建筑，拥有精美绝伦的花园，栖息在拥有350年历史、环绕马尼拉古城市中心高耸的石墙之上。不管路易丝对于丈夫的新岗位有何看法，他本人感觉格外兴奋：“能在18年后再次目睹这里的进步，感觉真好……到处都是新修的道路、新建的码头和新落成的建筑。”

起初，麦克阿瑟先后被委派前去指挥马尼拉军区和侦察大队。为了将他和他那位被当地人所熟知的父亲区分开来，人们称他为“小麦克阿瑟将军”。和老麦克阿瑟将军一样，小麦克阿瑟将军也很蔑视种族隔离；他与奎松及其朋友培养了深厚的友谊，与本地军队相处得也其乐融融，每一次执行任务时他都是热情充沛，就连受命前去调研多山的整个巴丹地区时也不例外——这座丛林茂密的半岛坐落在距离科雷希多岛3英里处的马尼拉湾河口处。“这应该是年轻工程官的工作，完全不是准将应该做的事情。”他在西点军校上二年级时的室友、如今在他手下任少校的乔治·科修义愤填膺地问道，“你打算怎么办？”准将回答：“当然是服从命令了。我还能怎么办？”于是，他离开凉爽的宅邸，只身前往疟疾肆虐的海岬地区，绘制了覆盖40平方英里地域的地图。事后在书中提到这些图纸时，他表示其中涵盖了“每一寸崎岖的土地、每一条小径、每一座急剧升降的山坡和遍布其中的竹林”。

和路易丝猜测的不尽相同，这并非是对麦克阿瑟满怀仇恨的潘兴想出来羞辱他的新招数。巴丹的调研工作虽说是个苦差事，事实上却十分值得这位将军出马。这一年的年底，一批陆海军上将在华盛顿召开会议，起草战略应对方案，以便未来应对日本帝国军队针对菲律宾群岛发起突如其来的攻势。会议决定，如有意外事件发生，守军撤离后应转移至半岛，在科雷希多岛上坚守6个月的时间，直到援军到达。这一蓝图被命名为橙色战争计划（WPO），后续草案相继被命名为WPO–1，WPO–2和WPO–3。麦克阿瑟对于上述所有计划都持保留意见。这不仅是因为在他看来它们不够健全，也是因为可实施这项计划的部队兵力过于薄弱。岛上唯一的美国驻军（第31步兵团）是由一名参与过印第安苏族战争的年迈指挥官领导的，而加强这支步兵团兵力的提议又遭到了华盛顿方面的拒绝，因为政府认为增加驻军有可能会影响美国与日本之间的关系。要知道，日本政府此前已经对美国国会决意进一步禁止日本人移民美国的事情而大为光火了。

由于橙色战争计划属于最高机密，因此麦克阿瑟不能够将自己的忧虑说出来与妻子分享。就这样，路易丝很快便对马尼拉的生活产生了厌倦。不过，这样的日子有时候也会出现一抹色彩。比方说，比利·米切尔就曾带着自己的新婚妻子前来进行过一次为期两周的旅行。当一架机身上草草书写着“欢迎米切尔将军”字样的飞机在圣贝纳迪诺海峡上空盘旋时，道格拉斯和路易丝正在码头上迎接这对新婚夫妇。然而，这样的日子并不常见。而路易丝对热带地区军旅生活的不耐烦情绪也在与日俱增，她的心情变得越发烦闷。小沃尔特从马背上摔了下来，而小路易丝也因感染疟疾而病倒了。虽说本该逐渐回归家庭的准将夫人也许可以在照顾孩子的过程中找到些许安慰，但她的两个孩子平日里见到最多的却是那位从心底里溺爱他们的继父。相反，他们的母亲总是在艳阳高照的日子里外出寻欢作乐。不顾一切的她甚至还宣誓就职当上了马尼拉的女警，逮捕了一个“虐待马匹”的男子。这份解闷的工作尽管很有趣味，但是很快就失去了吸引力。她在给国内的朋友写去的信件中提到，菲律宾的生活“无趣至极”。她也曾试图引导自己的丈夫离开军队改行做一个股

票经纪人——在她的引荐之下，J. P. 摩根真的前来和麦克阿瑟接洽过——但准将并不感兴趣。

结果，路易丝开始越来越沉溺于参加驻马尼拉的美国上层人士组织的各种活动。这显然是一个不明智的选择。“此前，我与菲律宾人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麦克阿瑟后来在书中写道，“但后来越发感觉到别人对我充满了敌意和怨恨。”这种感觉的来源便是仿效英国殖民主义最糟糕特质建设的白人社区。路易丝已经开始认同这种微妙的种族主义。偶尔参加派对时，她甚至会以取笑自己不在场的丈夫、稍稍嘲讽一下他的虚荣和自尊心来取悦主人。“‘加拉哈德爵士’求爱的方法就像是在阅兵一样。”她说道。在面对另一群人时，她还透露自己加入了一个骑行俱乐部，但是麦克阿瑟不肯和她一起骑车出行。“为什么不呢？”有人调皮地追问道。她笑着回答：“老天啊！你们能想象道格拉斯坐在自行车上的样子吗？”

尽管身居1.1万英里之外，老麦克阿瑟将军的遗孀那令人敬畏的形象总是以精神存在的方式徘徊在背景之中。准将在给居住在华盛顿的一位朋友的信中嘱托道：“去看看我妈妈，然后写信告诉我她的情况到底如何。”这样的防备是没有必要的，因为平克妮在寄来的每一封信中都会如实汇报自己的近况，直到1923年2月道格拉斯的嫂子站出来为她代笔。“母亲病重——即刻回家。”读到玛丽发来的这封电报，麦克阿瑟带着路易丝和她的两个孩子立即登上了下一班回家的邮轮。尽管母亲的病情恢复得很快，但麦克阿瑟在收到电报后的返家速度足以证明他与母亲之间有多亲近，而这一份亲近又因为他的兄长于12月患阑尾炎去世而变得更加紧密。能够下地走动之后，老婆婆将自己那股令人敬畏的力量全都投入到帮助剩下的这个儿子升迁的事业之中。她认为，到了战争部晋升他为少将的时候了。碰巧的是，他的背后不止站着一个支持他的女人。就连他的妻子也出于希望升迁能够帮助他被调派到更加适意的岗位上去而加入了这条战线。

先下手的人是路易丝。在他们到访华盛顿的两个月时间里，她趁丈夫守候在婆婆位于沃德曼公园酒店的病榻旁的机会，找来了曾经服役于“彩虹师”的一位老兵M.　曼宁·马库斯——华盛顿如今颇具影响力的大律师。她对马库斯说道：“我希望你忙碌起来，帮我的丈夫获得晋升。他做准将已经有5年时间了。”游说过程中产生的任何花销都由她来负担。“我不在乎付出任何代价，你只要亲自把账单送来给我就好。不要告诉道格拉斯。”马库斯联系了两位第42师的上校，三人一同前去拜访了战争部部长威克斯。威克斯简洁地回复了一句：“他现在还太年轻。”当这支“代表团”跳过路易丝、直接将此话汇报给麦克阿瑟时，准将暴跳如雷：“太年轻？成吉思汗13岁就统一了自己的部落，48岁就成了世界上最大规模军队的指挥官。拿破仑年仅26岁就成了世界上最著名的军事将领。穆斯塔法·凯末尔38岁就当上了全国军队的指挥官！”尽管如此，这条路最终还是没有成功。而这一次尝试之所以值得纪念，是因为它显示了路易丝当时对他的用心以及他面临重压时的反应。看上去他并不是那么义愤填膺。

面对军队政治的暗斗，平克妮的经验显然更加丰富。手握钢笔，她给自己的老朋友约翰·J.　潘兴写去了一封信，谈论了一个两人都很熟悉的话题：潘兴那前任指挥官留下的唯一一个儿子的才华与壮志。她在信的开头这样写道：“很高兴在星期六那天再次看到你还是那样的年轻和英俊！我想你应该永远都不会老吧。”紧接着，她迅速切入了正题，“窃以为我们之间的友情是长久而又忠诚的——所以才敞开心扉就我儿子的事情向你表达我的恳求——不知你是否方便在担任参谋长期间帮他晋升？”她继续写道：“你在所有军队事务方面都拥有无上的权力，甚至动一动笔就能让他升迁！你从未让我失望过——不知为何，我感觉你这一次也不会让我失望……你不还是那个善良而又贴心的朋友‘亲爱的老杰克’吗？向我保证你会在离开军队之前让我的儿子得到他应得的军衔，好吗？”信件的结尾处，她学着儿子经常用到的政治口吻写道：“愿上帝保佑你——为你可贵的生活加冕——将你送入白宫。你忠实的朋友——玛丽·P. 麦克阿瑟。”

谁也不知道这封信对于“亲爱的老杰克”来说到底起了多大作用，因为还有很多因素都在为道格拉斯的晋升搭桥铺路：他那堪称典范的赫赫战功、颇具影响力的“彩虹师”旧部、M. 曼宁·马库斯的不懈努力以及他的岳父斯托茨伯里对于民主党战争基金的大力支持。无论如何，潘兴在卸任参谋长一职的10天前还是授予了麦克阿瑟少将军衔。《纽约时报》评论认为，“麦克阿瑟将成为陆军现役名册中最年轻的少将”，同时也被认为是“常规军中最能干、最聪慧的年轻军官之一”，而且“凭借良好的身体状况很有可能某天将会成为陆军的统帅”。然而，他的母亲和妻子为此做出的努力却无人提及。

1925年1月17日，麦克阿瑟的星章加上了第二颗星。令他身后的两个女人都感到无比欣喜的是，这次的晋升正应了她们心中的如意算盘。如今，在马尼拉的职务中，以他的军衔，除了菲律宾军事部的指挥官以外，做任何官职都绰绰有余，而指挥官一职已由另一位少将担任。于是他被调回了国内，先是在父亲曾经奋战过的亚特兰大肯纳索山和桃树溪任职，尔后又被改派到巴尔的摩。

路易丝在巴尔的摩县拥有一处如今被改名为“彩虹山”的地产。从那里出发，她的丈夫既可以开车前往自己的第三军区办公室，也可以前去沃德曼公园酒店探望母亲，或是参加无穷无尽的晚宴派对、沙龙舞会、越野赛马以及她最喜欢的打猎活动。不过，这些对麦克阿瑟来说都无足轻重。拘谨简朴、不善社交的他宁愿加入人人都趋炎附势、毫无放松意味可言的“绿春谷俱乐部”，也不愿意去挽救他的婚姻，并且至今仍在回避路易丝让他退伍后去华尔街上班的建议——路易丝的哥哥和养父一直都在给他施加压力——但他还是不顾一切地留在她和那两个与他感情日益深厚的孩子身边。他发现，自己所担任的职位越高，孤独感也就越强。尽管他无比的利己思想让他比别人更能耐得住寂寞，但他也需要一些人类的温情。因此，就算自己的枕边人再轻佻花心，他也不会轻易放

手。

对于职业军人来说，那是一个格外凄凉惨淡的年代：《巴黎非战公约》、微薄的军费预算、陈旧过时的武器和单调乏味的洪灾矿难救援任务。在彩虹山的那些漫漫长夜里，将军读到了许多有关和平主义运动的文章，并认定这项运动是有害的，还在纽约的士兵与水手俱乐部里猛烈抨击了运动中的某些言论——“没有人会重视这种为了制止犯罪而解散消防队和警察局的不合逻辑的计划”——不过，这段演讲倒是吸引了一小部分人的注意。麦克阿瑟将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宣传和鼓吹后备军官训练队以及国民军事训练营这两个项目上——不仅亲自书写传单、在“扶轮社”和“吉瓦尼俱乐部”的会议上演示幻灯片、为集训营制作电影新闻短片、设计国民军事训练营的圣诞贺卡，还在公交站和火车站发放颂扬军备事业的传单。在写给战争部的报告中，他称自己制作的传单强调了“年轻男子（通过参军）能够强身健体、增强纪律性和工作协调性、增加责任感与团队意识，同时也能够回报军队”。在得知“从所有军区的报纸到美国革命女儿会都（为他）做了宣传，且为推动国民军事训练营获得更大利益做出了值得赞赏的计划”时，他感到十分欣喜。

虽然这样的日子有些沉闷，但麦克阿瑟在巴尔的摩的这三年中最糟糕的时光才刚刚开始。在华盛顿政府的安排下，他收到了被他称为“我接到过的最令人不快的任务之一”——对比利·米切尔进行军事审判。1925年10月28日，军事法庭在国会山脚下的埃默里老红砖楼中开庭。米切尔和坐在审判席上的11位法官中的大多数人都相识（其中一些人还与他认识超过20年），但让他感觉最亲近的还是法庭上这位最年轻的法官。他的祖父是麦克阿瑟法官在密尔沃基时的密友，而他的父亲在内战时期则是“娃娃上校”的战友。他本人也曾经在老麦克阿瑟将军的麾下战斗过，和小麦克阿瑟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朋友。有人在庭审间隙听到米切尔对自己的一位支持者说“麦克阿瑟看上去就像是被人生生拽过了木板上的节孔一样”——想来也不足为奇。

当时的报纸将米切尔塑造成了空军改革运动的殉道者，针对他的起诉书内容却十分狭隘。他之所以站上法庭并不是因为在军事演习期间击沉了退役的战舰——他曾经两次做出过这样的举动，只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是可行的——而是由于他“有碍于良好秩序和军事纪律的行为让军队蒙羞”。有人怀疑，他之所以会落得这般下场也是因为他在前往菲律宾度蜜月的途中曾公开嘲笑过瓦胡岛的防空作战，从而让夏威夷指挥官萨默罗尔将军感到十分难堪。后来，在圣安东尼奥的一场新闻发布会上，他又在记者面前指责海军上将们应该为海军飞艇的损毁事件负责，并指出在海军军费方面态度格外小气的总参谋部也有过失。麦克阿瑟认为，自己的朋友“在言语暴力方面的确有错”。就连空军方面对此也只能赞同。支持米切尔的人之中就有后来在“二战”中成为空军司令的亨利·H.阿诺德。他对军事法庭的法官们这样说道：“一场好的演出（对于他来说）就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米切尔之所以有罪恰恰是因为想要争取某种东西，除了比利之外，每个人都知道那是什么，也都知道它意味着什么。”

那么这一次的庭审对于麦克阿瑟来说又意味着什么呢？庭审的那段日子里，一位专栏作家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指责他纵容别人“迫害”米切尔，还说他这样的行为会困扰他一生；西南太平洋空军的领袖乔治·肯尼后来也发现，飞行员们对于这位战区司令并不是十分信任。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米切尔的“论点是正确的”，但在事后才得到印证，之前则是无可争议的；而且，拥有如此惊人远见的米切尔居然在珍珠港事件爆发20年前便预见到“对日本发起的任何进攻都必须在空军势力的掩护下进行……未来，跨海作战的发动将从地面基地转变为有空军掩护的地面基地”。麦克阿瑟事后成了这些观点的拥护者，但没有记录证明他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便认同了这种观点。

从另一方面来讲，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理记录也没有显示麦克阿瑟对此表示了否决。麦克阿瑟既没有表达自己的观点，也没有流露出任何的感情，更没有询问任何一位证人。用比利的话来说，他的这位朋友大

部分时间都是“表情冷若石雕”般地坐在法庭上。麦克阿瑟的名字曾经被提起过一次，随即又被撇开了。国会议员菲奥雷洛·H. 拉瓜迪亚曾是一位“一战”飞行员。作为米切尔的党羽之一，他做证自己曾经对报纸记者说过这样的话：“我相信军队里的高级官员的背景、经历和态度都传达了总参谋部的希望和要求。”如今他又补充道：“我想说我当时并不知道麦克阿瑟将军也会出庭。”这话激起了包括几位法官在内的众人的一阵大笑。

米切尔最终是通过单独投票被定罪的。而麦克阿瑟投了怎样的一票至今还是一个谜。宣读判决书之后，一位颇有胆魄的记者翻了翻法官接待室的废纸篓，找到了用麦克阿瑟的笔迹书写着“无罪”两个字的皱巴巴的纸团。对此，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简略地写道：“我做了自己所能为他做的一切，帮助他免于被解职。”然而，在米切尔去世9年之后，他又在写给威斯康星州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的信中坦白自己是唯一一个投票认定米切尔无罪的人。他还表示，米切尔对此心知肚明，并且“从没有停止表达对自己的感激之情”。肯尼也记得米切尔曾经这样说过：“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一个伟人，一个真正的朋友。我很喜欢他。总有一天，人们会知道他在1925年时对我来说曾经是怎样忠心的一位朋友。”然而，在一本于庭审10年后写就的手写稿中，他却又提到麦克阿瑟“对于自己在我的军事法庭审判过程中充当的角色感到十分后悔。希望他能够勇敢地把话公开说出来”。另据贝蒂·米切尔回忆，她的丈夫从来就不知道这些法官们当初是怎样投票的。

伯克·戴维斯在自己的历史作品《比利·米切尔事件》中提到，在庭审的那段日子里，“麦克阿瑟将军特别心不在焉。他和他的妻子就像新婚夫妇一样，彼此暗送秋波——麦克阿瑟夫人每日都会捧着一捧紫罗兰对他微笑，而将军的目光也舍不得离开她”。不到两年之后，他无论是上班还是下班都看不到路易丝了，因为她搬去了纽约第50大街东段125号，留下他一个人孤零零地住在彩虹山上。思念她和两个孩子的麦克阿瑟厌倦了书写宣传单、参加应酬午宴的日子，陷入了军旅生涯悲惨的状

态之中。和夏尔·戴高乐以及温斯顿·丘吉尔一样，他也将20世纪20年代视为精神生活的荒漠。他需要一些东西来吸引他的注意力、燃起他的热情。1927年9月中旬，一个意外的机会降临了。美国奥委会主席突然去世后，考虑到将军对西点军校体育事业的大力支持，奥委会的其他成员决定请他来担任主席的职位。他立即就答应了这项邀约。

出于某些原因，美国人之所以参加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1928年奥运会完全是麦克阿瑟的成果。那里的每一个人都很喜欢他。据当时巴黎《论坛报》年轻开明的体育新闻记者威廉·L. 夏勒回忆，在与麦克阿瑟喝过一杯酒之后，他对将军印象深刻："他似乎比我想象中的职业军人还要高尚。他坚毅、雄辩、体贴、豁达，而且饱读诗书。只不过他的自负让我感到有些不耐烦。"作为美国代表团的领军人物，他风度翩翩地接过了来自东道国荷兰的礼物：一束由园艺专家路德·伯班克培育、用将军父亲的名字命名的"麦克阿瑟红玫瑰"。在德国游泳名将希尔达·施拉德尔的肩带断掉时，麦克阿瑟的眼神故意躲开了摄影机；当美国拳击队教练认为裁判判决不公而愤怒地扬言要退出比赛时，麦克阿瑟高扬着下巴咆哮了一句："美国人是从来不会退缩的。"他在美国运动员们的面前来回踱着大步说道："我们代表的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不是为了优雅地输掉比赛才来到这里的。我们是来取胜的——而且要胜得漂亮。"在他的敦促之下，美国队一共了创造了17项纪录，所获奖牌总数比后两名的国家加起来还要多，以131分的成绩战胜了62分的芬兰队和59分的德国队。[注]

在"罗斯福"号蒸汽船准备起航驶离码头时，两名美国偷渡者被官员拦在了踏板处。美国代表队认识这两个人，也十分同情他们的境况。麦克阿瑟一时心血来潮，大喊了一句"这就是我一直在等的那两个孩子！"，然后把他们拽上了船。公然藐视规则似乎才是麦克阿瑟的本性，于是他又安排这两个偷渡者去做刮油漆的工作。可悲的是，他写给柯立芝总统的奥运会报告也预示着他在后来的"二战"官报中会用成熟的散文来写作。他在报告的开头这样写道：

> 在执行这项困难任务的过程中，我想起了普鲁塔克书中的一段文字。当有人问起地米斯托克利是更想成为阿喀琉斯还是荷马时，他答道："你是想做奥运会的胜利者，还是想做宣布胜利者名字的人呢？"恐怕只有荷马的笔触才能够描绘出如此生动而又壮观的景象。我的词汇远远不能描写出加利福尼亚的8名无敌赛艇选手是如何在斯洛滕平静的河水中滑动船桨、奋勇向前的；战绩不朽的雷·巴布蒂又是怎样彰显他追求胜利的不懈意志的，以及连奥林匹斯山上的阿耳忒弥斯女神都无法匹敌的、兼具速度与优雅的明星伊丽莎白·鲁滨逊。我只能记录下一些简单坦率的事实，相信想象的魔力能让这些画面在没能到现场观战的人心中永存……

报纸的八卦专栏中也同样记录了一些"坦率的事实"：没有随丈夫前往荷兰而是留守曼哈顿的麦克阿瑟太太总是挽着不同的男伴出入。有关她在非法经营的小酒馆和韦斯特切斯特的周末聚会上各种不羁行为的风言风语更是被传得有声有色。她这是在弥补自己"浪费"在维多利亚大街1号和彩虹山上的那些时光。麦克阿瑟在向总统汇报完奥运会的工作之后便接到了重返马尼拉并继续担任菲律宾全军司令的任务。"没有哪项任务能比这更让我开心了。"他说道。但这恰好是他的妻子最不想要的生活，于是他只好从西雅图出发，只身踏上了旅程。

回到自己位于马尼拉的宅邸，麦克阿瑟很快便收到了妻子的律师发来的信函：她想要离婚。在麦克阿瑟看来，只要离婚的理由"不会玷污我的名誉"，就不成问题。最后，对方找到了一个十分荒谬的原因——无法给数百万美元资产继承人"提供支持"。1929年6月18日，这对夫妇最终劳燕分飞。一位局促不安的马尼拉编辑给麦克阿瑟送来了一份美联社的通稿。将军没有阻止他发稿，但也没有就此做出任何评论。后来，路易丝这样说道："是我那爱管闲事的婆婆最终成功破坏了我们的婚姻生活。"他荣升为四星上将时，她嫁给了电影明星莱昂内尔·阿特威尔。面对记者的采访，她不满地回答了一句："看上去我似乎放弃了四颗星，却只换来了一颗星。"麦克阿瑟去世时，再次改嫁的她已经成了路

易丝·海伯格夫人。她差人送了一个白色的大理石瓮到他的葬礼现场，瓮中还插满了点缀着蓝色勿忘我的白色玫瑰花蕾。这些言论、姿态和他的人生并没有什么关系。路易丝只不过是无法与他分享他对军旗和责任感的热爱以及对名利的渴望罢了。甚至可以说，她从来都不曾理解过他。

麦克阿瑟在追求荣誉的路上从不谨小慎微。就像沃尔特·米利斯说的那样：“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一位‘政治军人’——一个在美国历史上相对少见的现象……一个军队政治家。他很早就开始密切关注党派政治，准备利用自己的军人威望来影响政策决定。将军要让自己的言论凌驾于军队编制以外的上级们所提出的外交或政治目标。”早在1929年，他的名字就曾出现在那些有权支配总统候选人的政界要人的观察名单之中。按照塞缪尔·P. 亨廷顿的话来说，他是“一个出色的军人，但又不只是一个军人，而是一个备受争议、满怀雄心而且出类拔萃的人。他过于能干自信、天赋异禀，完全超出了他的职能和责任所限”。

道格拉斯继承了阿瑟·麦克阿瑟频获嘉奖、饱读诗书、足智多谋的优点，也学到了平克妮不知羞耻地操纵他人的本领——这些都在他第三次前往菲律宾赴任的这两年时间里得到了彰显。一方面，他苦思冥想出了一套回避日军入侵的战术。在他看来，群岛地区迟早是要面临这样的威胁的。另一方面，他又在力争成为陆军历史上最年轻的参谋长。勇猛、狡猾、军事天赋与对上级的谄媚——直到走到军旅生涯的尾声，他也依旧是个能屈能伸的人。他在马尼拉时招来的贴身男仆路易斯·多明戈认为将军是个狂热的信徒，总是在为即将到来的事情保持身体健康：他每天都会做健美体操，从不饮酒，参加任何派对都会在晚上11点之前回家，并且总是在自己的营房附近长时间地“走来走去”，几乎像是在逃避自童年以来便一直都在鞭策他的动力一样。

刚到马尼拉就任总司令的一个清晨，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就被副官抱

来的厚厚一摞油印文件给占据了，里面全都是前几任将军在职期间书写的文献资料。“烧了它们，”麦克阿瑟吩咐道，“我不需要先例来束缚我。出现任何问题我都可以当机立断。”和他的许多命令一样，这件逸事不真实得有几分戏剧化的色彩。但无论如何，作为统一体中的一部分，他的管理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处于前任总司令的应变计划指导之下，包括准备应对菲律宾时而爆发的自然灾害和最近的橙色战争计划的改良。将军本人对于橙色战争计划兴趣浓厚，因为近些年来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日本制糖工人和企业正在涌进菲律宾社会，其中最引人注意的便是棉兰老岛的达沃市。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到，自己和曼努埃尔·奎松“畅谈了日益增长的日本扩张威胁”。然而，这话并不坦诚。他们之间的确谈论过这个话题，但在如何应对方面产生了巨大的分歧。将军和他的部下对日渐发展起来的移民殖民地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但奎松和菲律宾的商人对这些新到的移民表示热烈欢迎。在后者的眼中，移民给群岛落后的经济带来了新的资本和企业。而对那些军人来说，他们却存在不小的威胁。

《华盛顿海军条约》的签署将这一威胁又推上了新的高度。条约不仅禁止在群岛地区建设新的永久驻地，还要求进一步缩减群岛的国防经费。就在麦克阿瑟从西雅图启程的前几周，一个陆海军联合委员会还重申必须加强巴丹半岛的防御，“以抵抗旷日持久的围攻，特别是要让科雷希多岛能够撑到最后”。不过，与此同时，该委员会经过妥协又只留下了1.7万名美菲士兵和18架飞机来对抗开战第一个月便能派驻30万兵力登陆的日军。这份草案中并没有任何条款提及如何解救被围困的美军卫戍部队。麦克阿瑟对此表示了抗议，认为自己的部队兵力对于这项任务来说“少得可怜”，但与菲律宾前总督W. 卡梅伦·福布斯的意见并不相同。这位前总督曾在前一年写道：“我十分怀疑是否有人真的会为保卫菲律宾群岛而付出实实在在的努力。群岛很难防御，且从军事的角度来说是不值得进行防御的。最主要的是要尽可能地提高入侵者的入侵成本。”事实上，美国官员们预计美日两国因菲律宾群岛问题开战的可能性实际上微乎其微。麦克阿瑟从不接受偷偷摸摸的牺牲，从1928年起，

日本进攻菲律宾最主要的障碍便是麦克阿瑟无情的决心。

奎松很欣赏他这一点。尽管两人在达沃市的问题上存在意见分歧，这位菲律宾爱国者和他的老对手的儿子之间的友谊却在萌芽，并将为后世带来历史性的后果。再一次远离了家庭关爱的麦克阿瑟开始转而追求更大的权力，并开始四处结交朋友。其中一个朋友便是亨利·L.　史汀生总督。1929年，史汀生返回美国就任胡佛总统的国务卿。将军在给他的贺信中这样写道："没有人比你更值得获得这个职位，也没有人能比你更加珍惜它。我希望、也相信这将是你迈向最崇高的美国总统职位的晋身之阶。"将军希望自己能够被任命为史汀生的接班人，奎松也大力举荐了他，但最后获得这一任命的是另一个人。然而，无畏的麦克阿瑟对华盛顿政坛依旧抱着高昂的兴趣，时刻等待着一个能够让他采取新动作的机遇。

这个机遇终于在1930年降临了。时任参谋长的萨默罗尔发来电报转告他，胡佛总统"十分希望能够任命你为工程兵主任……他相信你的组织能力和专业资格"。麦克阿瑟知道工程兵主任是无法升任参谋长的，因而礼貌地拒绝了。他一直都在小心翼翼地奉承新总统的战争部部长帕特里克·J.　赫尔利。看准时机，他趁赫尔利向参议院递交有关菲律宾问题例行报告时寄去了一封谄媚的公函：

> 我刚刚在当地报纸上读到了您的文章……无法抑制自己想要向您表达无限敬意的心情。这篇文章内容全面而广泛，颇具政治家风度，其中涉及不少纷繁复杂的问题，并澄清了很多在过去30年内让政治家们困惑不已的疑问。无须多言，其中的论述为上百万深陷混乱与不解的人带来了自信与希望，堪称美国政府几十年来发表的最具政治才能的文件，重振了我们许多人心中对于美国原则和理想的信念。您完成了一件伟大而又富有勇气的作品，相信美国未来一定会对您委以重任。请接受我最热诚的祝贺，不仅为您本人，也为我们共有的这个伟大的国度。

很长一段时间里麦克阿瑟都没有收到任何回音。心灰意冷的他请求军务局局长调派他回乡，借口说自己的母亲需要人照料。但管理部门正在为即将于1930年秋天退休的萨默罗尔慎重挑选继任者，而麦克阿瑟的名字已经被正式提及了好几次。赫尔利起初有些犹豫，认为一个“连自己的女人都管不住”的男人是无法胜任参谋长一职的。不过从那以后，麦克阿瑟那封展现了自己的智慧与洞察力的了不起的书信给战争部部长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于是，麦克阿瑟就这样被部长举荐给了胡佛总统，并于8月6日正式走马上任。总统表示，自己“在军队中寻找新鲜血液时，最终认定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他出众的能力和优秀的品格无须我多言”。一直力荐自己肖蒙党羽的一分子出任此职的潘兴对此也只好勉强认可。据传，他在评价麦克阿瑟时是这样表述的：“好吧，总统先生。他是我手下的小伙子之一，我没有什么好说的。”

如今已经稳操胜券的麦克阿瑟却在接任之前产生了一丝犹豫：“我很清楚新参谋长要面对哪些可怕的折磨，感到有些畏缩……不过我的母亲……感应到了我的想法，发电报来要我接受这份工作。她说我的父亲若是知道我心生胆怯，一定会备感羞愧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菲律宾领导人为答谢他为群岛所做的贡献，在马尼拉酒店设宴款待了他。之后，他便于1930年9月19日踏上了归国的旅程。11月21日，他宣誓就职，成了美国历史上第8位保住了自己崇高新军衔的人，并带着母亲搬进了参谋长宅邸——位于梅尔堡1号、坐落在波托马克河南岸的一座砖石建筑。为了方便母亲，麦克阿瑟还下令安装了一部电梯和一个阳台。她用手指抚摸着他肩膀上的四颗星低声说道：“要是你的父亲现在能够看到你该有多好啊！道格拉斯，你实现了他所有的愿望。”

然而平克妮并不知情的是，她的儿子做了一件她最不愿意看到的事情：偷养情妇。在离开吕宋岛的5个月前，麦克阿瑟结识了欧亚混血儿伊莎贝尔·罗萨里奥·库珀——她的母亲是亚洲人，父亲则是生活在菲律宾的苏格兰商人。据一位后来曾见过她的华盛顿说客多萝西·德策尔回忆：“我觉得我从没有见过这么精致的人儿。她穿着一条显然十分昂贵

的可爱雪纺礼服裙，看上去就像是刚刚从最精美的蛋白石里刻出来的一样，背后披着一条长长的辫子。”在马尼拉码头与将军分手后，伊莎贝尔本应在一个月内追随他的脚步前往加利福尼亚。不过，在他横跨太平洋之后，她的心里似乎产生了些许犹豫，直到收到将军从旧金山发来的一封署名为“老爹”的感人肺腑的电报后才回转了心意。

到了华盛顿，伊莎贝尔被“老爹”安顿在了第17街上的一间公寓中，后来又搬去了位于西北区第16街1701号的查斯尔顿酒店公寓中。麦克阿瑟给她买了一只贵宾犬，还给她买了一柜子的礼服裙、和服和黑色蕾丝内衣，填满了她的巨型衣柜。这些衣服中很少有可供她上街穿着的休闲服装，因为他觉得她不需要到户外去走动，而是希望她永远都在那里等着自己。和所有的情人一样，他将自己的情妇束之高阁，并且希望她永远都不要离开。在从马尼拉返乡的旅途中，麦克阿瑟先后到访了香港的一座赌场和上海的一家夜店，看到不少上了年纪、体态臃肿的主顾怀里都搂抱着身材苗条的中国女孩。在从旧金山给伊莎贝尔写去的信中，他向她一一描述了这些场景，并表达了自己的厌恶之情，希望自己的话没有吓到她。但她对此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因为她在遇见麦克阿瑟之前曾经在上海的歌舞团中做过演员，其他的就不必多说了。

作为参谋长，麦克阿瑟不得不经常出差，于是总是给伊莎贝尔寄来明信片。然而，在伊莎贝尔看来，这些远不及陪伴来得重要。厌倦了与狗相伴的日子，她开始变得有些躁动不安。将军不情愿地给她配备了一辆带专职司机的豪华轿车。坐着这辆轿车，她夜夜出没于华盛顿和巴尔的摩的夜总会之中，受到了不少男子的诱惑。这其中就包括《巴尔的摩太阳报》创始人的后裔乔治·S.　埃布尔。她用甜言蜜语从麦克阿瑟那里骗来一大笔现金，然后将它们挥霍一空，全都用在了购买古巴雪茄上。一些流言蜚语终于传到了麦克阿瑟的耳朵里。若是八卦小报也听到了风声，一定会形容“两人之间的激情就这样冷了下来”。她求他给自己的哥哥在华盛顿找份工作。他拒绝了，还粗鲁地给她送来了从报纸上撕下来的一份“急聘”专栏，暗示她去投靠父兄，为自己的未来找个依靠。终

于，1934年9月1日，麦克阿瑟结束了他们之间的关系——或者应该说是自认为这一切已经结束了——他通过书信给她寄去了前往西海岸的火车票以及搭乘越洋邮轮返回马尼拉的路费。但伊莎贝尔并不打算离开华盛顿，而是搬进了距离麦克阿瑟在国务、战争与海军大楼的办公室仅有几个街区的一座公寓里，开始为自己谋求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时候，她听说一位名叫德鲁·皮尔逊的专栏作家对于将军的过去很感兴趣。

麦克阿瑟的这段风流韵事是情有可原的，如果非要找个借口的话，和陈腐的华盛顿应该脱不了干系。作为胡佛政府的几位风云人物之一，他很早便被孤立了。在麦克阿瑟刚刚走马上任的那几个月里，他还曾经真心诚意地努力低调行事，身穿便服出入国务、战争与海军大楼，接受了几次采访并回避了各种鸡尾酒会和晚宴派对，并且很少出现在报纸的八卦专栏之中。晚上，他也总是窝在父亲留给自己的一堆藏书中。他下定决心要回避别人关注的眼神。首都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对自己的母亲格外孝顺——不仅每天从华盛顿坐车回家和她一起吃午饭，而且每每坐飞机出行时都会在落地后给她发去电报报平安。很快，大家便都知道了他会穿着日式典礼和服坐在书桌前，用东方的扇子来扇风，吸戴有珠宝烟嘴的香烟，越来越频繁地用第三人称来称呼自己（“麦克阿瑟现在要离开梅尔堡了”），还在自己的办公椅后面立起了一面15英尺高的镜子来凸显自己的形象。能够彰显他虚荣心的例子还不止这些。在巴尔干半岛旅行时，他还曾坚持要乘坐带有私人车厢的火车出行。一位朋友勉强替他解释道：“道格拉斯如果是以个人身份前往的话，穿着溜冰鞋出行都没关系。但是美军参谋长的尊严让他不得不要求拥有私人车厢。所以他才一直大声地抱怨，直到他们给他弄来了一节车厢——他这么做不是为了他自己，而是为了美军参谋长一职。”

这样的行为也发生在麦克阿瑟为胡佛效命时前往欧洲的两次旅行途中。1931年秋，麦克阿瑟前往法国兰斯市附近观察法军演习。法国国防

部部长安德烈·马其诺将荣誉军团勋章中的大十字勋章作为礼物赠送给了他（和相信刚性防守方案的马其诺不同，麦克阿瑟在向赫尔利汇报时提到："下一场战争必然是机动战和运动战中的一种……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将面临致命的风险。"）。在紧接着的南斯拉夫之行中，他受到了亚历山大国王的接见，成为当年唯一一位观看了国王军队演习的外国军官。他本打算在贝尔格莱德停留几日，却因日本入侵中国东北而不得不缩短了行程。回到华盛顿后，他支持史汀生的看法，建议美国利用经济制裁"冒预期的风险与日本开战"。胡佛不愿激怒日本政府，最终拒绝了他们的提议。

将军很欣赏这位共和党的总统，认为他的国内政策值得赞扬，但对于他削弱军队的做法很是鄙夷，并拒绝了胡佛让其去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五十一国裁军会议的建议。相反，麦克阿瑟再次启程，前往土耳其、罗马尼亚、匈牙利、波兰和奥地利视察别国的军队。希特勒夺取政权之后，纳粹邀请他参加德军的演习，但当时正值美国总统换届，将军便拒绝了对方的邀请，并解释自己正专注于"民间资源保护队等有可能会于今年夏天影响美军的不寻常活动"。他的回绝反映出的并非是对柏林新政权的不认可，而是对希特勒款待外国资本的屈辱解释的逐渐领悟。在承认美国的战争潜力、急不可耐地向美国示好的同时，其他国家也知道无须畏惧美国的军事力量。麦克阿瑟统领的军队规模在全世界排名仅为第16位，在编士兵132　069人，比葡萄牙和希腊还要少，且战斗装备差得令人震惊。《财富》杂志就曾写道，美军大兵"在宽阔的土地上行进时总是张着大嘴、身后还歪七扭八地扛着一把过时的来复枪"。在将军担任参谋长的那两年，政府分别划拨了2.84亿和3.47亿美元的军费——要知道，20世纪70年代末的国防支出总数高达800亿美元。

为了保护自己这支小小的军队，麦克阿瑟将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抗争方面。股票市场崩溃后，由于战争部的开销是国家预算里最大的一部分，国会决意对军队进行裁员。麦克阿瑟无力阻止这一进程，所能做的最多也就是分出轻重缓急。他试图做到不偏袒任何一个军官，并将自己

拿到的大部分资金都用于军官的工资而不是军备方面，理由是领导力和军备相比是永远也不会过时的。结果，他于1931年报废了小阿德纳·R.查菲坦克少校的坦克，却挡住了国会试图在第二年春天之前将1.2万军官裁减至1万人的举措。7月16日，《陆海军日报》刊发社论指出："在这漫长沉闷的7个月中，麦克阿瑟将军一直都在与国会里的破坏势力做斗争，同意削减出行、衣食、补助等方面的支出。'是的'，麦克阿瑟将军说道，'我们不会裁员，绝对不会！'"

麦克阿瑟的各项策略——包括义愤填膺地在民众面前呼吁——为他引来了更多的关注，使他的形象也开始变得逐渐高大起来。用德怀特·艾森豪威尔的一位传记作家的话来说："麦克阿瑟身负英勇善战、才华横溢、气质高贵、心怀朝野却又刚愎自用的名声。许多了解民众情绪的政治家都不太信任他。很难否认的是，他似乎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反击别人的批判，反而使尽浑身解数引起敌意。作为参谋长，他最需要的就是公众言论方面的支持。仿佛他更关心自己给别人留下的印象（特别是'更高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的成就。"

时为少校军衔的艾森豪威尔成了参谋长的助理。晚年时他回忆道："我的办公室就在他的隔壁，中间只隔了一扇板条门。他只要提高嗓门喊一句就能把我叫过去。"艾森豪威尔认为，将军在很多方面都是"一位令人满意的上司"。麦克阿瑟在下达了一项任务之后，从不在乎别人什么时候去做，也从不会提任何的问题，"唯一的要求便是把任务完成"。艾森豪威尔发现："不管选择什么讨论主题，将军在这一方面的知识总是惊人的全面，而且大部分都是准确的，还总是能够滔滔不绝、大讲特讲。'讨论'这个词其实并不准确，因为讨论应该是双向的对话，而和将军的对话往往都是他的独白……毋庸置疑，将军流利的口才和丰富的知识都来源于他不寻常的记忆力，而我的知识储备显然是无法和他匹敌的。任何演讲稿或文件，他只要读上一遍就能立刻逐字逐句地背出里面的大部分内容。"米利斯与艾森豪威尔也有同样的感触："我认识的大部分高级军官都会在军队和政治之间画上一条泾渭分明的界线。下班

后，在他们自己的小群体和一些亲近的平民朋友面前，他们也许会丢下一些爆炸性的言论，谴责华盛顿和整个世界的不道德，然后才论证自己抵御邪恶的良方。上班时，什么事情也无法引诱他们跨越军队的老传统和他们自己画出的这条界线。不过，就算麦克阿瑟将军知道这条界线的存在，通常也会选择忽视它。”

和战争部里大部分保守的人一样，麦克阿瑟将“共产主义者”和“和平主义者”视为国家安全的威胁，认为他们是没有区别的——在他眼中，“和平主义和它的同伴共产主义”应该受到同样的谴责。其他人虽然也同样一视同仁地批判它们，但还没有准备好和平民作对。将军无法抗拒挑战。1931年5月，教会周报《明日世界》刊登了哈里·埃默生·福斯迪克和几位同事在19 372名新教徒牧师中进行的民意投票结果。当牧师们被问及“你是否相信美国的教会现在应该公开表示不支持或不鼓励未来的战争？”这个问题时，62%的人给予了肯定的答案。编辑就此询问了参谋长的评论。在6月2日刊发的报纸中，参谋长给出了这样的答案：“我认为，没有哪种原则能比我们的民族在过去所做出的牺牲更加高尚和神圣。历史教会了我们，宗教信仰与爱国精神是紧密相关的，而无神论总是与‘激进主义’‘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主义’以及其他自由政治的敌人形影不离……我坚信，倾注自己全部精力去一心热爱和平并也愿意为了捍卫和平而献出自己生命的人，才是能够一如既往地主导未来的彻头彻尾的基督教徒。”

福斯迪克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自己的反对言论：“难道国家……可以替代全能的上帝来征召我们的良心吗？”《明日世界》的撰稿人哈罗德·E. 法伊也在自己的文章中形容麦克阿瑟“（的话）听上去就像是威廉大帝在谈论宗教”。这些评论还只不过是冰山一角。1932年，将军受邀在匹兹堡大学的毕业典礼上演讲。他抓紧时机辩称那些抗议政府应对蔓延的经济大萧条所做的无用之功的示威者实则是在“集结不安势力，动摇工人的道德”。言论一出，现场大约有300多名学生开始起哄，导致其中的三名学生领袖被捕并遭到了罚款。大学的业务经理对记

者表示，“我们这里需要的是正直的学生”，并宣布即将入学的新生都必须在效忠宣誓书上签字。看起来麦克阿瑟赢了，但结果恰恰相反。上诉法院为三名被捕学生翻了案，而媒体也将犀利的批判矛头指向了将军。将军回答：“我现在如同喝了胆汁般苦涩，而且我也知道这种苦涩将会永远伴随着我。”

然而，这并没有改变麦克阿瑟的心意。从匹兹堡返回后，他要求统帅美国九大军区的军官将任何“冒充”老兵参与的煽动游说活动信息都上报给他。在1932年的夏天，这一命令似乎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超过2.5万名老兵拖家带口地聚集在了华盛顿，还有更多的老兵正在赶来的路上。这些在困难时期身无分文的老兵要求政府以现金的形式给他们发放“退伍补偿金”，并称自己为“补偿金远征军（BEF）”。后来的美国退伍军人管理局调查显示，参与游说的老兵中的94%都拥有陆军或海军服役记录，67%的人曾经赴海外执行任务，更有20%的人属于残疾退伍军人。但麦克阿瑟拒绝相信这些事实，认为他们中的90%都是假冒军人的骗子，反而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很久以后，他手下最臭名昭著的支持者考特尼·惠特尼在回忆将军对待此事的看法时写道，将军认为“补偿金远征军”中充斥着“很大一部分罪犯，且都是些曾因谋杀、过失杀人、强奸、抢劫、盗窃、敲诈和骚扰而有犯罪记录的人”。惠特尼还指出：“后来缴获的一份机密文件泄露了共产主义者的计划，其中提及了对政府高官进行公开审理并对他们在国会门口实施绞刑的内容，而名单中首当其冲的便是陆军参谋长麦克阿瑟。”

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机密文件，只有饥饿的美国人。但在艾森豪威尔看来，参谋长“心怀执念，认为最高指挥官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的形象，永远也不能低头认错”。除此之外，麦克阿瑟还总是觉得自己与胡佛之间心有戚戚焉。7月28日，当赫尔利告诉他总统希望驱逐“补偿金远征军”时，他满怀激情地领命出征。他真正需要的只不过是世故和老练。一天早晨，警方与聚集在国会山脚下的老兵之间产生了冲突，并开枪射杀了其中的两名老兵。比麦克阿瑟更会处理公共关系的艾森豪

威尔恳求将军不要亲自出面指挥驱逐行动，因为他认为这样只会冒犯国会议员，从而让军事预算的审批变得难上加难。但参谋长认为自己有个更好的主意。“麦克阿瑟决定高调地出面指挥。”他告诉少校，“一场革命正在萌芽”。他派了一名勤务兵赶去梅尔堡为他取来军装，然后命小乔治·S. 巴顿少校率领步兵团、坦克团和骑兵团包围华盛顿纪念碑。他说：“我们要一举击垮‘补偿金远征军’。”当有记者问到他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在自己的束腰外衣上戴上各式勋章时，他答道：“难道我应该为这些勋章而感到耻辱吗？它们都是我从战场上一枚一枚赢回来的。”

艾森豪威尔对此感到十分错愕，但依旧有不少人支持将军的决定。时任本宁堡中尉的自由派人士詹姆斯·M. 加文说：“我从没有在任何地方读到过尉官们对于麦克阿瑟参与驱逐行动的感受。我们都感觉这是他个人责任感的体现，并为此感到由衷地赞赏。”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将军的行动表现了他的伟大，因为他拒绝将这种惹人厌恶的任务分配给下属来执行。在他们看来，将军之所以戴上绶带和勋章出征是一种引发退伍军人——特别是那些曾经跟随他一起征战的人——心中敬意的策略。换句话说，他如此小题大做就是试图让那些为了补偿金四处游行的人感觉胆战心惊，从而削弱抵抗力量。

如果这就是将军的计划的话，那么它的效果实在是令人不敢恭维。聚集在国会山脚下的人奋力回击，直到军方丢下了催泪弹才四散开来。在一阵呵斥和起哄声中，老兵们撤退到了宾州大道上。麦克阿瑟手下的一名年轻士兵从一名前任美国远征军中士的手中夺下了一条横幅。“你这个寒酸的老头！”那个士兵吐了一口口水。一个旁观者大叫起来：“从此以后美国国旗在我眼中再也没有任何意义了。”将军听了暴跳如雷：“如果那个人还敢信口开河，就把他给我抓起来。”这还不是最坏的情况。更糟糕、更让人不可原谅的是麦克阿瑟的下一步行动。“补偿金远征军”的大本营驻扎在阿纳卡斯蒂亚河的对岸。胡佛虽然算不上是最精明的总统，却也清楚地知道，如果武装驱赶游行者大本营的行为见了报，肯定不会好看。于是，他派了两名官员先后下达了两次同样的命

令，禁止部队跨越第11街大桥。但麦克阿瑟全然不予理会。令艾森豪威尔颇感震惊的是，参谋长竟敢断然宣称自己和属下的军官全都“忙得焦头烂额”，因而“没有时间接待那些政府派来传达假命令的人”。紧接着，他命属下跨过大桥，将老兵及其家属们暂居的帐篷、棚屋、披屋和大板条箱全都付之一炬。有两名婴儿在催泪弹攻势中死亡，另有一名11岁的男孩在试图挽救自己的宠物兔子时被刺伤了腿。麦克阿瑟本应服从总统的命令，他的这一举动可谓是忤逆上级。但在胡佛采取行动之前，麦克阿瑟便用计谋胜过了他。麦克阿瑟知道，宣扬法治的共和党人会认同自己强势的做法。于是，他在半夜召开了一次新闻发布会，将责任全都推卸到了胡佛的身上。“如果总统没有在24小时之内采取行动，他将面临十分严峻的状况，并有可能引发真枪实弹的战争。”他说，“如果总统等待超过一个礼拜的时间，我相信我们的政府就要面临危机了。”与他一同出场的战争部部长赫尔利还补充道：“这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麦克阿瑟的表现十分出色，无疑是当下的风云人物。”赫尔利若有所思地停顿了一下，继续说道：“不过我眼下还不能造就英雄。”

比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更能够体察公众情绪的是时任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D. 罗斯福。领会到事件中的政治深意，他的心中备感忧虑。不久之后，也就是在他参与总统竞选并成为胡佛的对手之前，在自己位于海德公园村的宅邸中，罗斯福接到了修伊·朗的电话。放下听筒，他对顾问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说，朗是“这个国家最危险的两个人之一”。特格韦尔追问第二个人是不是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哦，不。”罗斯福回答，“另一个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罗斯福也曾当着参谋长本人的面说过类似的话：“道格拉斯，我认为你是我们最优秀的将军，但我也相信你会是我们最糟糕的政客。”入主白宫之后，罗斯福心里清楚，摆在他面前最具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在利用麦克阿瑟的军事才华的同时削弱其政治活动能力。

麦克阿瑟已经意识到了摆在自己面前的将是萧条的几年——而处于历史上最萧条时期的政府是不会放下削减军事成本的利刃的，毕竟这是联邦预算中最大的一笔开销。他大张旗鼓地加入了罗斯福政府，骑着高大的雄马走在总统就职游行队伍的最前面——20世纪20年代期间一直担任游行领头人的潘兴如今已经虚弱得无法为自己备马了——但他已经敏锐地察觉到自己的共和党伙伴们在华盛顿大势已去，而新上任的一批人马则视他为在国会山提出要进行军需品调查的杰拉尔德·奈的走狗。作为麦克阿瑟实质上的新闻发布官，艾森豪威尔说将军“完全沉浸在了工作中……他的大多数朋友都是战争部里的军官，除了照顾母亲之外，麦克阿瑟将军在华盛顿的生活全都是围绕着自己热爱的军队”。

作为参谋长，麦克阿瑟自然无法回避白宫举办的各种盛大集会，但他每一次出席这种活动都显得格外敷衍了事。到场后，他往往会飞快地穿过迎宾队列，和埃莉诺·罗斯福夫人打声招呼——他从来都是一位彬彬有礼的绅士——然后便火速返回自己位于行政西大道的办公室。他知道新政拥护者称他为“好斗的流氓”和“衣着鲜亮的花花公子”，还喜欢引用新内务部部长哈罗德·伊克斯的话：“麦克阿瑟这种人相信自己上天堂时，就连上帝都得从白色大宝座上走下来，恭敬地欢迎他坐上空出来的位置。”在国会山上，将军曾经恳求扩大征兵规模、增加现代武器储备，但怎么说也是徒劳枉然。他的部队配备的依旧是“一战”时的迫击炮、破旧的法国75毫米野战炮以及防御坦克和空袭的点50口径机关枪。只有12台现役的坦克是战后生产的，而新式的加仑德式半自动步枪也因为军械库中还囤积着大量1903式斯普林菲尔德步枪而未能投入生产。据当时在总参谋部担任书记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回忆，麦克阿瑟在国会时态度“非常友好，格外谦逊”。“他拥有才华横溢的头脑，偶尔还会展示一下自己的戏剧才能。”但参谋长也会有走投无路的时候。杰拉尔德·奈称他为战争贩子，而另一位国会议员则在提及军队的厕纸预算时故意用嘲讽的语气问道：“将军，你觉得美军之中会不会正在流行严重的痢疾传染病？”麦克阿瑟怒不可遏地站起身来。“我已经够丢脸的了。”他怨恨地说道，“为了实现军队的机动化和机械化，我就差给在座的某些

先生舔靴子了。现在，先生们，你们侮辱了我。我在自己行业里的地位和在座的一样崇高。等你们做好了道歉的准备我再回来。”在他还没有昂首阔步地走出房间时，那群人便赶紧低头认错了。

相比之下，同样自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没那么容易对付了。和将军一样，总统也是一位实力派演员。当战争部的预算从3.04亿美元降为2.77亿美元时，麦克阿瑟开始怀疑自己最大的敌人其实就栖身在白宫之中。许多年之后，他可能会说，罗斯福与他之间的关系自从“一战”以来“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也成熟了不少”。“无论我们两人之间有多少分歧，却一点儿也不会玷污……我与他的私交。”不过事实远比他所说的要复杂得多。他与总统之间的交往总让他感觉格外受挫。谈及麦克阿瑟等人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曾经说过：“（他们）所有人都被罗斯福令人生畏的专注、狡猾的才干以及强大的力量所挫败。没有人能够成功战胜他。就像威尔基所说的那样，他才是‘冠军’。”

约翰·冈瑟指出，总统和将军在很多方面都很相似。两人都保有高涨的爱国热情，且都出身贵族，而且总是备受瞩目。他们都拥有胸怀雄心壮志的高龄母亲，也都在各自的领域占据了显要的地位。罗斯福是个敏感狡诈的人，善于解决问题，但他和麦克阿瑟之间最大的不同还是在于政治观点。富兰克林·罗斯福坚守自由主义的原则。而不管新政拥护者们如何谣传，麦克阿瑟其实并不是库格林神父派系的反动派分子。在后来赴东京担任总督期间，他也证明了自己同样是个珍视自由主义目标的人。然而，20世纪30年代时，他依旧还是和赫伯特·胡佛一样属于保守派，并与西点军校毕业生罗伯特·伍德是很好的朋友。当时，可能正是时任西尔斯罗巴克公司总经理的伍德介绍他结识了雷明顿兰德公司的詹姆斯·H. 兰德。和他们一样，麦克阿瑟对于胡佛继任者的社会项目竟然能在国会获得通过感到十分惊讶，同时也对这位新总统的手腕技巧感到十分困惑。罗斯福取悦任何人，就连麦克阿瑟也不例外。在一次白宫晚宴上，将军开口问道：“总统先生，你为什么总是询问我有关当下社会改革的观点……却很少注意我在军事方面的意见？”罗斯福答道：“道

格拉斯，我之所以提起这些问题并不是想要问你的意见，而是想要看你的反应。对我来说，你就是美国人民道德意识的象征。”麦克阿瑟事后提到，这话“一下子就让我无言以对”。当然了，这个答案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意义。

据詹姆斯·A. 法利晚年回忆，将军经常绕过战争部部长乔治·德恩，溜进白宫的后门，恳求罗斯福能够多划拨一些经费用于军队建设。不过，在总统与将军之间最令人难忘的那次对质过程中，德恩倒是在场。为了下决心解决政府的赤字问题，预算办公室宣布战争部的预算将在下一个财政年度中减少8 000万美元。德恩要求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开会商讨此事，并带上麦克阿瑟。罗斯福的态度很坚定：常规军的经费将被削减51%；预备役和国民警卫队的经费也将有所减少。将军用愤怒的声音颤抖着说道：“等我们输掉了下一场战役，当一个美国男孩的肚子被敌人的刺刀戳穿、喉咙被敌人的脚扼住时，我希望他临死前最后咒骂的名字不会是麦克阿瑟，而是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也铁青着脸答道：“你不能这么对总统说话！”麦克阿瑟记得自己过了很久才道歉。“当时我觉得我的军旅生涯就此结束了，于是告诉他我打算辞去参谋长一职。”他转身朝门外走去，身后却传来了罗斯福平静的声音：“别傻了，道格拉斯。你和你的预算都不会变。”离开白宫之后，德恩欢欣鼓舞地说道：“你拯救了军队。”但将军回忆起这一段时却说：“我差点儿吐在了白宫的台阶上。”

1934年（对于麦克阿瑟来说，那是他命途多舛的一年）的春天，在没有咨询他的情况下，总统终止了和商业航空公司之间的航空信件运输合同，下令由陆军航空兵团接手这份工作。不到一周的时间，8架飞机坠毁。尽管亨利·阿诺德相信从中学到的经验有利于重型轰炸机的发展，参谋长当时却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批判。同一个月，将军又十分不明智地起诉了《华盛顿旋转木马》的作者德鲁·皮尔逊和罗伯特·S. 艾伦，索赔175万美元，指控对方诋毁自己，指责自己处理“补偿金远征军”的方法是“无依据和不必要的，而且极其武断苛刻，手段粗暴”，并且笼统

地将他刻画成了“一个独裁傲慢、忤逆反抗、背信弃义、意图造反并对战争部的上司极其不尊重的人”。

遭到起诉的两位专栏作家心急如焚，却从密西西比国会议员罗斯·柯林斯那里听说他所居住的查斯尔顿酒店同一楼层内最近住下了一位可爱的欧亚混血女孩，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曾经是她的常客。皮尔逊找到了她，并花钱买下了麦克阿瑟给她寄去的情书。在开庭前的听证会上，皮尔逊的律师莫里斯·欧内斯特透露他将参考一位名叫伊莎贝尔·罗萨里奥·库珀的证人的证词。麦克阿瑟的律师困惑不解地将这件事转告给了将军，将军当即便派艾森豪威尔少校前去寻找被他抛弃的这位情人的下落。不料，艾森豪威尔根本就找不到她，因为皮尔逊让自己的兄弟利昂把她藏在了巴尔的摩的一处隐蔽的地方，直到麦克阿瑟撤诉为止。皮尔逊和艾伦告诉他们的读者：“我们没有付给将军一分钱，也没有向他道歉，因为他并没有要求我们道歉。”

这两位专栏作家没有透露的是，一位军官曾经代表麦克阿瑟给皮尔逊的一位代理人送去了5万美元。这笔钱被送到了伊莎贝尔的手中。在利昂的护送下，她搬去了中西部的一座城市，并买下了一间理发店。后来她又再次搬家去了洛杉矶。1960年6月29日，她因过量服用巴比妥类药物自杀身亡，死亡证明上写的职业是自由契约“演员”。在她去世很久以后，威廉·D. 莱希上将在华盛顿听说了事情的原委，并告诉一位朋友：“麦克阿瑟本可以赢得这场官司，因为他当时是个单身汉。他所需要做的就是说上一句：‘那又怎么样？’……你知道他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吗？就是因为和他一同住在梅尔堡的那个老太太。他不想让母亲知道那个欧亚混血女孩的事情！”

麦克阿瑟对新政最大的贡献便是贯彻落实了美国民间资源保护队（CCC）的项目，让失业的年轻人们走进森林里工作。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他就为保护队招募了27.5万人。在对他们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培

训之后，麦克阿瑟将这些年轻人送往美国林务署分设在47个州的营地。他对于这个项目是持保留意见的——相比军队士兵18美元的月收入，受雇的这些年轻男子每个月能拿到30美元的薪水；而且当他提议将他们用作士兵预备役的核心时，约翰·杜威和莱因霍尔德·尼布尔领导了一场和平主义抗议，破坏了他的计划——但他的组织能力使得保护队项目成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最伟大的成就之一。麦克阿瑟的另一善举便是将一张记录了保护队队员在加利福尼亚某讲堂内祈祷的照片送去了白宫。罗斯福的一位助手写信告诉麦克阿瑟："我把照片转交给了总统，他看了以后非常高兴。让他尤其感到欢喜的是照片正好证明了队员们的用心。他命人把照片装裱了起来，挂在白宫里，还让我转告他对您的体贴的赞赏。"

在帮助保护队获得成功方面表现最积极的便是在南方建设了17座营地的乔治·C.　马歇尔上校。这对他来说并没有什么好处。和往常一样，麦克阿瑟坚信敌人一直都在密谋反对他，当他告诉艾克尔伯格，对方的重点是海军和国民警卫队时，他并没有忘记肖蒙。潘兴打电话给麦克阿瑟，希望他能够看在自己的面子上将马歇尔晋升为准将。结果麦克阿瑟却将这位上校派去了伊利诺伊州的国民警卫队做教官。后来，马歇尔的妻子在回忆起早期在芝加哥度过的那些日子时，形容她的丈夫"面如土色、形容枯槁的样子是她前所未见的"。后来，当马歇尔成为他的上司时，麦克阿瑟说道："我最坏的敌人原来一直都在我的身后。"当听说潘兴拒绝参加俄亥俄"彩虹师"公墓落成典礼时，麦克阿瑟猜测潘兴是在报复他。规划师告诉已经退休的美国远征军指挥官，这个主意是麦克阿瑟批准的。"这就是你们犯下大错的原因所在，孩子们。"听完他们复述潘兴回绝邀约的过程，麦克阿瑟说道："你们应该对我的名字闭口不谈。"

1935年夏，在"彩虹师"的一场聚会上，麦克阿瑟为那些在法国牺牲的士兵们献上了一段激昂的悼词："他们死得毫不犹豫、毫无怨言，胸中怀抱着信仰，口中呐喊着走向胜利的希望……他们越过了蒙蔽我们的迷雾，成了我们所说的无名战士美丽的灵魂。在宁静的棺木中，他们英

勇无畏的遗骸在那里安息、等待，等待着天堂的法庭打响审判日的最后一枪。‘只有不怕死的人才配活着。’”紧接着他朗诵起了自己书写的诗篇：

他们述说永恒的和平，

而我们则祝他们一切安好。

他们蔑视战争那愤怒的红色道路，

给它铭刻上了地狱之路的名字。

他们放下了勇士的骄傲，

还有对儿子们的热爱。

但他们最终还会卷土重来，

带着马匹，迈开双脚，手握钢枪。

他们述说永恒的和平，

正如亚述的梦想家一样。

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

奔流过战乱的土地，

在无望的嘈杂声中，

他们大声地哭泣，呼喊着天之骄子

救他们于水火之中，

带着马匹，迈开双脚，手握钢枪。

他们述说永恒的和平，

祝愿和平能够胜利。

有敌人潜伏着随时准备发起进攻又有什么关系？

国家的需要又有什么关系？

历史的篇章上熠熠生辉的字母，

无穷无尽地续写着

上帝、荣誉和故土，

还有马匹、双脚和钢枪。

在别的地方，麦克阿瑟总是会对那些愿意倾听的人述说军事防御的需求，但只有在返回西点军校参加30周年同学聚会时才找到了真正能够接受自己观点的听众。这段演讲是通过广播播放出来的。通过收音机收听演讲内容的艾克尔伯格事后提到，“麦克阿瑟那天所做的事情是需要勇气去面对事实的”。然而，麦克阿瑟的警告却被忽略了。用一位官方军队历史学家的话来说：“军队的装备、人力以及经费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任参谋长时都降到了最低点。”国会拒绝了他囤积战略物资的申请以及有关工业流通方面的计划。这些在珍珠港事件后显得极其珍贵的东西在当时看来甚是荒谬。他每天都被各种琐事缠身，比方说：他要求恢复紫心勋章的颁发，还要设计配有宽松上衣和软领的新军装。

麦克阿瑟把自己最宝贵的时间都花在了梅尔堡1号的书房里，沉思着未来的战事。从20世纪40年代早期爆发的几场战役来看，他的预测是非常有先见之明的。他预言了坦克、飞机和潜艇这几样“决定性武器”参与的“全面战争”——这种战争的名字正是以他的预言命名的。他还曾对战争部部长说过，接下来的激烈冲突“必然是机动战和运动战中的一种……没有制空权的国家将面临致命的风险。陆军和海军要想成功就必须得到空军的掩护”。在担任参谋长时提交的最后一份年度报告中，他这样写道：“如果在所有的战争故事中只留下成吉思汗的战役，将其他的故事都从历史的书卷中抹去，就保存那些详细描述他的战役的史实，士兵们仍能从中获取可用在未来铸就军队的无尽知识。除了让历史上大

部分领袖的胜利与成吉思汗相比都相形见绌之外，这位神奇领袖的成功恰好证明了他对于一支军队应有的基本先决条件拥有足够可靠的直觉。”简而言之，麦克阿瑟预见到了德国的闪电战，而意识到这一点儿竟然是一名英国读者。在1935年11月22日的伦敦《泰晤士报》上，B. H. 利德尔撰文指出，虽然美国军队自停战协议签署以来便被视为是落后的，“但其近期发生了一个变化”。麦克阿瑟的报告正好证明了这一点，“在他作为指挥官一举成名的历史传统战役中，他必须要身先士卒才能够把握战场的脉搏、抓住机遇。麦克阿瑟将军当前的报告显示，在军事理论方面，他依旧在发展自己的理念。没有对现在军事情况的激进总结，发展中的变化正出现在任何军队的权威部门中”。

1934年，麦克阿瑟结束了作为参谋长的4年任期，本应于当年秋天卸任，总统却对此含糊其词。在新闻发布会上，他要么回避这个问题，要么就说自己尚未考虑清楚。事实上，将军的反对者和仰慕者都给了总统很大的压力。前任海军部部长约瑟夫斯·丹尼尔斯在给总统的信中提到，鉴于“补偿金远征军”事件，让麦克阿瑟留任将会引发退伍军人协会会员的“强烈反感”：“我诚挚的建议便是不要留下他。”潘兴也赞同他的看法，一部分原因是记恨麦克阿瑟因为马歇尔的事情羞辱了他，同时也是因为麦克阿瑟为佩顿·马奇提供了一间办公室和一个工作人员，以帮助他著述回忆录来批判潘兴。相反，位高权重的国会议员们——尽管参谋长在国会山上曾经出言不逊——却依旧希望他留任。

富兰克林·罗斯福想出了一招狡猾的两全之计。11月15日，他宣布麦克阿瑟将暂时留任，直到他找到新的替代人选。这一决定让所有人都感到心满意足，但和罗斯福的众多计谋一样，这其中也隐藏着一个“倒钩”。麦克阿瑟希望乔治·S. 西蒙兹少校能够继承他的衣钵。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法利解释道，通过让麦克阿瑟连任，可以摆脱在还没服满任期便会到达退休年龄的西蒙兹。总统打算选择马林·克雷格少将——潘兴的门徒，也是肖蒙党羽中最得宠的一位——作为继任者。收到宣布克雷格的任命以及降麦克阿瑟为两星军衔的通知时，将军正和艾森豪威尔坐在

一辆西行的火车上。艾森豪威尔是这样形容将军的反应的："他突然开始痛斥政治，指责他们没有礼貌、缺乏判断、背信弃义、刚愎自用，还说这样的决定不合宪法，麻木不仁，好像全世界都要毁灭了似的。"

然而，麦克阿瑟的华盛顿告别仪式却格外令他欢心。他被授予了另一枚服役优异勋章，而潘兴也送来了一张亲自题写的照片。富兰克林·罗斯福对他说道："道格拉斯，如果战争突然爆发，不要等我的命令，赶上你能够找到的第一个交通工具，马上回家来。我想让你指挥我的军队。"华盛顿《先驱报》的乔治·R.　布朗撰文写道："杰出的魅力领袖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带着耀眼的荣誉光辉卸任了参谋长一职，成了全军的偶像。他在华盛顿的职责已经结束。一年前，军队一度经济拮据、士气低落、气馁沮丧、装备过时。麦克阿瑟将军挽救了它，让国会通过了世界大战以来最具建设性的陆地防御项目。"

不过，还有一件事没有让麦克阿瑟满意。橙色战争计划依旧是菲律宾防御的基本蓝图。麦克阿瑟为此总结道："幸运的话，那时候负责统领大局的人将是能够决定战争主要形势的人。如果他是个大人物，就不会在乎战争部的嘉奖令，更不会注意那些尘封在接收箱里的老套计划。"收到那封激起他内心怒火的电报时，他已经知道那个人确实是一个大人物了。因为新的菲律宾指挥官就是他自己，而他也已经踏上了前往马尼拉的旅程。

---

1. 1928奥运会上，美国队共计获得56枚奖牌，德国队共获得31枚奖牌，芬兰队25枚。——编者注

第四章
肩扛旗帜
1935~1941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卸任参谋长一职之后，麦克阿瑟曾经考虑过要去学习法律，但远东局势的发展显然更加引人注目。他卸任前一年，日本人完成了对中国东北的侵占，而美国国会则通过了《泰丁斯–麦克达菲法案》，赋予菲律宾联邦共和国的地位，作为该国1946年完全独立的前奏。虽然选举还未在群岛拉开序幕，但派头十足、雄辩机智的总统候选人曼努埃尔·奎松已经获得了压倒性的优势。作为强大的菲律宾国民党领袖，年轻的奎松曾在游击队中担任少校，后在巴丹半岛向阿瑟·麦克阿瑟上校投降。1934年秋，奎松抵达华盛顿，与美国政府讨论建设群岛军事防御事宜。据奎松的回忆录记载，他当时询问麦克阿瑟：“将军，你认为菲律宾独立之后能否做到自我保护？”麦克阿瑟答道：“这不用我‘认为’，因为我‘知道’它能够保护自己。”

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没决定要延长麦克阿瑟的参谋长任期，但

已经同意了奎松的要求，一旦将军离开战争部，便会让他启程前往吕宋岛。但这样的程序还需要立法的保障。于是国会通过了一项法案，将菲律宾列入了有资格接受美国驻军的名单中——其他几个国家都是南美洲的共和国。1934年12月27日，麦克阿瑟致信奎松："我已经制订了明确的计划，即将于6月10日左右结束参谋长任期，尔后即刻启程前往菲律宾，预计于7月上旬到达马尼拉。"

对于未来，麦克阿瑟感到十分激动，这其中的原因之一便是收入。除了作为现役少将的工资之外，他每年还能从共和国获得3.3万美元的薪金和补贴。1935年之后，一个更具有诱惑力的可能性从天而降。目前，在菲律宾职务最高的美国人依旧是总督。塔夫脱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人，而现任的菲律宾总督名叫弗兰克·墨菲。不过，一旦菲律宾采用联邦共和国体制，担任这一最高职务的美国人就会成为高级专员。美国政府的一些官员希望墨菲能够留任，无非就是给他换个称谓而已。而麦克阿瑟则认为自己更有资格担此重任，恰巧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正在认真地考虑指派他来接任。6月1日，将军再次致信奎松，将事情的进展通报给他，并向他保证："相比专业军事职务，我充分认识到了高级专员一职的无限吸引力和潜在的政治可能性。但在这件事情上，没有什么能够诱使我背弃我们之间的约定……如果有人找我交涉此事——对此我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但我……在与你商议之前是不会贸然同意的。"

麦克阿瑟此招着实狡猾，因为他实际上正在为这份工作给自己大张旗鼓地拉票，同时诋毁墨菲，动用一切关系来确保自己获得此职。劳动节之后的那一天，他单独与罗斯福在海德公园镇吃了一顿饭，得到了总统为他提名的承诺。不料，意外的障碍紧接着出现了。根据法律的规定，他在从军队卸任之前是无法获得提名的。9月9日，他给罗斯福写去了一封信，说自己对此感到"有些失望和为难"，并建议再立一条特别的法律来移除这个障碍。然而，总统却在担心一旦麦克阿瑟通过诋毁的手段参与竞争的事情传到墨菲的耳朵里，便会招来针对白宫的反对声音。于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两手一摊，决定顺其自然——墨菲成了高级专

员，而麦克阿瑟则只能担任奎松的军事顾问。

还有一个问题：将军的母亲。平克妮如今已经84岁高龄了，年老体衰。将军拒绝丢下她一个人，而她也毫不示弱地表示愿意与他一同出海，并带上她的儿媳妇玛丽随行。当年10月，一行人在旧金山登上了“哈定总统”号，同行的还有三位少校：负责照顾平克妮的军医霍华德·J. 赫特、麦克阿瑟在菲律宾的首席助理艾森豪威尔和詹姆斯·B. 奥德。艾森豪威尔并不想去菲律宾。他感觉：“麦克阿瑟将军此举是在压制我……而我没有办法与参谋长理论。”作为安慰，将军允许艾森豪威尔选择了一位老朋友奥德来分担助理的职责。玛米·艾森豪威尔留在了华盛顿，准备等到儿子约翰结束八年级学业后再去马尼拉与艾森豪威尔团聚。

在整个航行过程中，将军的母亲都没有离开过船舱。玛丽和赫特医生负责照料她，而麦克阿瑟则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与一位名叫琼·玛丽·费尔克洛思的女子共进早餐和在甲板上散步之类的事情上。琼·费尔克洛思来自田纳西州的默夫里斯伯勒，是一个身材娇小（她身高1.57米左右，体重100磅）、个性活泼、长着一对淡褐色眸子的37岁未婚女子。她曾经在波士顿詹姆斯·柯利少校的游艇派对上见到过将军。刚刚从养父那里继承了20万美元遗产的她计划与一位名叫斯莱克的朋友到上海去住一段时间，然后继续自己环游世界的航程。她十分喜欢当兵的人（“每一次琼·玛丽听说哪里会有国庆烟火表演……”一位默夫里斯伯勒的朋友说，“她的注意力马上就会转移过来。”），同时也是美国革命女儿会和同盟军女儿联合会（UDC）的成员。后者对她来说意义更加重大。她的一位祖先，理查德·比尔德，曾经在同盟军中担任上尉。实际上，他还曾经与阿瑟·麦克阿瑟在传教士山上正面交锋过。和平克妮一样，她也没有让自己对南方军的偏袒阻碍她与麦克阿瑟之间的情谊。在麦克阿瑟的嫂子玛丽的提议下，琼缩短了她在上海的旅程，继续乘船前往马尼拉观摩奎松于11月15日举行的就职典礼。

与此同时，平克妮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到达香港时，由于她的病情实在是太严重，麦克阿瑟不得不推掉了与某英国将军的会面。到达菲律宾之后，麦克阿瑟将她安置在了自己位于马尼拉酒店中的隔壁套房里，但情况已经十分不乐观了。她正经受着脑血栓的折磨。一个月后，即便药品已经离开加利福尼亚、由“中国快马”号飞机运往马尼拉，她还是陷入了昏迷，最终去世了。马尼拉的报纸在对她表示哀悼时称她为“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位战士”。她被葬在了马尼拉，后被回国的儿子带回阿灵顿国家公墓再次安葬。接下来的一整年中，麦克阿瑟都命人锁住了母亲的套房，不许别人居住。艾森豪威尔表示，她的去世“让将军精神恍惚了好几个月”。

除了奥德夫妇与两个孩子住进了马尼拉城里的一座宅邸之外，其他人都搬进了杜威大道上的一座白墙红瓦的酒店里。后来，艾森豪威尔在与家人团聚后也搬进了新的厢房中，留下麦克阿瑟将军独享装有空调的顶层六居室。他会在一间名为“金色大厅”的正式会客厅中接见客人——屋子里挂着红色窗帘和法式镜子。他父亲留下的藏书都被放进了一间装饰着有菲律宾红木镶板的书房中，屋里还摆放着几张栗色的皮椅。房间中央的一张4.5米长的奈良桌上摆放着几个镶着银边的相框，里面放着福煦、潘兴和其他一些军界名人的照片。公寓的两座巨大的阳台坐拥马尼拉城市景观和可爱的海湾美景。其中最受将军偏爱的阳台位于餐厅旁边，可以眺望远处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每逢“蓝色时刻”——也就是战前马尼拉的“鸡尾酒时间”——将军喜欢在阳台上来回踱步，身上穿着西点军校蓝金相间的便服，手里挥着拐杖，凝视着明亮的海水、壮观的日落、浓绿的雨林和带有茅草顶的当地民宅。

麦克阿瑟一直都很喜欢踱步。自从他到莱文沃思任上尉以来，除了清早的健身操之外，就再没有参加过任何的运动了。琼·费尔克洛思在“哈定总统”号上发现，他甚至不怎么跳舞。但他每天都会在他的阳台

和维多利亚大街上的旧办公室里来回走上几英里的距离。前来拜访他的人发现，只要对话超过一分钟的时间，他就会站起身来迈着大步、围着房间里的各种物品溜达起来：摆着他父母和祖父母照片以及旗子的巨大齐本德尔式书桌、漂亮的中国屏风，还有西班牙占领时期的嵌花东方橱柜。和顶层公寓不同，他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安装空调，只有头顶上的风扇在慵懒地旋转着。很快，前来拜访的宾客便会开始擦拭他们的眉毛，将军却依旧正襟危坐，一点儿汗也没有流。这就是他领袖魅力的一部分，他很清楚这一点，并通过时常更换装扮来强化它。陆军航空兵团的路易斯·H. 布里尔顿少校在自己的日记里这样评价道："麦克阿瑟将军的外表总是完美无缺。他是世界上着装最得体的军人之一。就算是身处热带气候的马尼拉，当我们身上的棉质衬衫和裤子不出一个小时就变得又湿又皱时，他却从来都像是刚刚换上一身新军装一样。"布里尔顿可能并不了解其中的真相，但麦克阿瑟的衣柜里真的挂着23套军装和套装——穿着便服时他一般会选择一套灰格花纹的热带西装、一件丝绸衬衫、一双白褐相间的鞋和一个领结——这些衣服全都是一位中国裁缝为他量身定做的。他一天要换三套衣服，午饭和晚饭时各换一套。

和其他人一样，布里尔顿也发现将军"不能坐着说话"。他补充道："似乎是这样的，他阐述自己想法时发音越清晰，走起路来脚步就会越有力。他是我见过最优雅的健谈者。虽然他的举止让人感觉有些戏剧化，但这正好是他个性的一部分，因而展现了他的性格。从不会有人对他的话产生任何的疑问或是不明白他想要什么。"同时期在菲律宾任职的詹姆斯·加文记得："麦克阿瑟曾到吕宋岛的麦金莱堡视察，观摩81毫米口径的新式迫击炮的试发射过程。当我们站上高地观看迫击炮发射时，他突然迫不及待地迈起了大步。他的身上仿佛围绕着某种光环，在我们这些初级军官与他之间营造出某些距离感。他是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人，用自己的方式鼓舞着我们的信心，同时也引发了周围人对他的崇敬。我们都听说他是个很勇敢的人。作为一个军人，他也是个很有远见和谋略、不乏道德和勇气的人。"

时任麦克阿瑟海军顾问的悉尼·L. 赫夫中尉是在1935年10月与麦克阿瑟相识的。他至今仍记得将军是如何点燃一根香烟——“那时候他还没有开始抽烟斗，紧接着又把它放在了书桌上，开始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他走动的时候会把双手插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下巴微微抬起，开始说话时声音低沉而又洪亮——好像是在自言自语。他不时地停在宽大的红木书桌旁边，熟练地在烟灰缸的边缘按一按香烟，然后抬起眼睛看着我。‘你在听我说吗，赫夫？’或者他有时候会停在书桌旁，把一堆已经摆放得十分整齐的铅笔重新排列一遍——或是把它们转过来，笔尖对齐地排成一列。不过他最后总是会回到踱步和自言自语这两个动作上来。”其他访客还记得麦克阿瑟书桌一角摆放着的那个细长的马尼拉雪茄盒。他会伸手翻开它，从里面取出一支雪茄递给客人，然后再给自己也点上一支，紧接着便迈开大步，只有在弹烟灰的时候才会暂停一下。所有人都会记得他总是房间里的主导人物。如果他停下脚步来遣词造句，那么四周便只有头顶上风扇的声音和隔壁那些穿着卡其制服的菲律宾员工敲打打字机的声音。没有人会打断麦克阿瑟。和罗斯福不同，他在任何一段对话中都要占主导地位。

虽然麦克阿瑟如今已经年近六十，但看上去不过四十多岁而已，虽然一头乌发发量有些减少，但仍旧目光如炬、身材高挑瘦削——某记者写道，他的将军肚里“似乎装满了军事秘密”——他成了马尼拉宽阔林荫大道上一个令人敬畏的人物。他缺乏艾森豪威尔那般开放、民主的作风，在美国社会并不是很受欢迎，但受到了菲律宾人的喜爱。他的超然离群与深不可测引发了他们由衷的敬意。和他们说话时，他不会使用军事术语，而是会选择一些精神方面的话语，将爱国主义等同于道德、自由和基督教信仰。总的来说，他在他们心目中树立起了值得珍爱的、谜一般的父亲形象，从不会和他们打牌或是互相讲笑话，也很少喝酒。“相信我，我会喝杯鸡尾酒的。”在盛大的社交场合中他常会这么说，却从没有喝完过完整的一杯酒。和父亲一样，他成了共济会的成员，并于1936年8月10日在马尼拉的尼罗神庙正式入会。此举让他进一步融入了菲律宾上层社会。和很多共济会成员一样，他也成了马尼拉酒

店的董事之一。虽然后来并没有传闻说麦克阿瑟还进一步投资了首都的其他地方，但他和这座城市的菲律宾房产商关系的确十分紧密。

麦克阿瑟依旧相信，自己所珍视的所有东西都面临着来自“美国共产党人”“自由党人”和“和平主义者”的威胁，而且他们全都是一丘之貉。（反复试图说服罗斯福将麦克阿瑟召回国的墨菲就是一个自由党人，同时也是一个和平主义者。）然而，将军又意识到，“极权主义”才是当时最大的威胁。能够不让单纯的政治观点蒙蔽他在新岗位上的军事判断就是他对自己专业性的赞颂。作为指挥官，他总是一位模范军官。非常值得注意的事实就是，麦克阿瑟从没有批评过和自己一同工作的人。后来，很多人都在传闻他与艾森豪威尔在奎松面前争宠的事情。“（他是）我最好的员工。”将军是这样评价自己的首席助理的。而艾森豪威尔在被一个女子问及他是否见过麦克阿瑟时，这样答道：“夫人，我不仅见过他，还分别在华盛顿和菲律宾从他那里获益良多。”除此之外，艾森豪威尔晚年的时候还在称颂他的这位前任上司英勇的品质。

1936年间，将军越来越频繁地陪同费尔克洛思小姐出席各种盛大的社交集会。那时候，这位小姐已经成了马尼拉酒店里的美国籍永久居民。最华美的聚会都在马拉卡南宫举行。树枝上悬挂着彩灯和日式灯笼，帕西格河畔的舞池里涌动着股股热浪，通往舞池的那条60码长的小径两旁则排列着齐肩高的冰块。晚上8点45分，麦克阿瑟会准时与她耳语一句：“准备好了吗，琼？”然后带着她朝自己的车子和司机走去，出发去看电影。不管有没有人招待，他们每周都会看6场电影。位于艾斯克尔塔大街（马尼拉的主要商业街）的理想剧院、情诗剧院和大都会剧院的经理都会在8点50分时期待他们的到来。20世纪30年代时，马尼拉所有的剧院都实行分区制度，菲律宾人坐在主楼层上，而美国人则可以坐在阳台包厢里。将军总是会带着女伴坐进第一间包厢里，还喜欢用手撑着头。他们看过《歌舞大王齐格飞》《迪兹先生进城》《淘气的玛丽达》《双城记》等商业影片，但他们只中途离场过一两次。麦克阿瑟尤

其喜欢英雄和恶人形象区分得十分鲜明的影片。这也是因为它们印证了他的人生观。偶尔，他也会在包厢里睡着。但这并没有什么关系，醒来时他总是会感到神清气爽、心态安详。

一天晚上，琼在酒店里办了一场鸡尾酒会。在邀请函中，她清清楚楚地标明了酒会将在晚上7点开始，并于8点30分结束。将军无法出席，但还是约定像往常一样准时去看电影。酒会很成功——以至于很多宾客在他们应该离开时仍滞留在会场里。女主人开始焦虑地不停偷瞥着时钟。她小声对赫夫说道："赫夫，我该怎么办？将军说他8点45分的时候会过来接我去看电影，但大家还在这里。"赫夫回答："那你就去吧。"她说："我不能丢下自己的客人！还是说我可以这么做？"赫夫告诉她："当然，这是马尼拉的老传统了。"于是她偷偷溜了出去，钻进了麦克阿瑟等在门外的豪华轿车里。赫夫事后表示："那个时候，我的心里丝毫不怀疑将军和琼之间的友谊对于他们两人来说都很重要。"

赫夫还有一项能力对麦克阿瑟来说十分重要。将军计划把菲律宾变成所谓的"太平洋中的瑞士"，而这个计划中的一部分则要靠购买50艘近20米长的鱼雷快艇（或者用他的话来说，应该叫作"伪装猎潜船"）来实现。麦克阿瑟表示："一支由这种船组成的规模相对较小的舰队交由熟悉海岸线上每一寸土地、每一片海域的船员来控制，再加之船身所携带的鱼雷的火力，足以对任何前来进犯的军队产生明显的震慑效果，强迫他们谨慎地分批前进。"华盛顿的海军上将们认为这种做法荒唐可笑——拥有7 083座火山的群岛地区海岸比美国还要长，而且日军的驱逐舰数量也远远超过麦克阿瑟的鱼雷快艇。此外，和菲律宾人一样，日本的渔民对于菲律宾海域同样算得上是了若指掌。然而，这些快艇却正是麦克阿瑟防御计划的核心。他告诉赫夫："我想要建设一支菲律宾机动鱼雷快艇舰队。如果我给你资金，你在10年之内能够建立起几支这样的舰队？"

赫夫目瞪口呆。他还从没有见过一艘鱼雷快艇。不过，经过一番调查，麦克阿瑟认定英国的桑尼克罗夫特型号的船是“最符合目的的鱼雷快艇，而且价钱也很合适”。令他没有想到的是，由于英国突然被卷入了与希特勒的战争之中，船只制造商不得不取消了大量快艇订单，以至于在1941年12月7日之前他们只收到了3艘快艇。战事来袭时，麦克阿瑟手中可供支配的就只有这些船，再加上美国的6艘鱼雷快艇。而其他原先被标记要运往太平洋的鱼雷快艇作为租借项目中的一部分全都被送回了英国。因此，他的海军理论——连同其他打算在1946年之前实现的设想——便再也没有机会接受检验了。如果说他的计划看上去似乎不足以迎接挑战的话（事实的确如此），那么奎松政府和美国政府同样拥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克莱尔·布思·卢斯到马尼拉拜访了麦克阿瑟，向他询问打进攻战的方法。他回答：“你有没有听说过一个棒球名言‘攻其不备’？这就是我的方法。”紧接着，她又问了打防御战的方法，而他只回答了一个坚定的字眼：“挫败。”这就是麦克阿瑟喜欢强有力的快艇、拒绝战略撤退到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原因。他喜欢将科雷希多岛形容为“世界上最坚固的单一据点”，认为它固若金汤，并相信关键岛屿吕宋（菲律宾一半人口的聚居地）只有在鱼雷快艇、250架军用飞机和拥有40万兵力的半游击军队的保卫下才能够经受住“无情的消磨战”。这些士兵将被分成40个师，以一支小型的常规军（930名军官和1万名现役士兵）为核心，由西点在菲律宾夏都碧瑶设立的军校毕业生来带队。在麦克阿瑟前来赴任军事顾问之前，奎松曾经告诉过一位上海朋友，菲律宾军事防御事业的发展要“仰仗和平的世界局势”，而且至少要50年才能够建设起足够的国防力量。麦克阿瑟劝他，只要好好利用这410 930人的军队，最大限度地利用岛上的山峰和雨林地貌，便能让入侵者在高昂的攻打成本面前望而生畏——也就是说，日本人要出动50万兵力、花费3年时间、耗资50亿美元才能征服菲律宾。而这个代价并不是他们愿意支付的。

艾森豪威尔后来表示，他们的“主要敌人”是“资金，或者应该说是

资金的匮乏”。艾森豪威尔和奥德起草了一份2 500万美元的国防预算。奎松和麦克阿瑟让他们把这个数字减到了800万美元。后来，这一预算又逐年下降，直到珍珠港事件爆发前一年竟降低到了100万美元。“尽管我们坚持不懈地努力……”艾森豪威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等待我们的都是毫无希望的冒险。坦白地说，菲律宾政府根本无力支付建设真正防御工事的费用。”然而，资金还不是唯一的问题。尽管奎松的国防法案是他递交给立法机构的第一份措施，并于1935年12月21日通过，但首批2万人的现役士兵直到1937年年初的时候才被送至训练营，而且这些士兵还说着8种不同的语言和87种迥异的方言。其中，20%的士兵——包括许多军士长和连队办事员——都是文盲。当地人的文化水平落后并不是麦克阿瑟的责任（尽管他早就应该料到会出现这种问题），但他还是应该考虑到群岛在海战方面的薄弱之处。到任之初，他和艾森豪威尔之所以认为日本人不太可能轻易进犯，有两个原因：首先，按照将军的话来说，占领群岛将“给日本帝国带来一个致命的弱点”，也就是将“日军兵力一分为二”；其次，他们认为1915年的英军加里波利之战（麦克阿瑟将其称为“一场夭折的行动”）证明两栖作战风险太大，不值得冒险。当然，麦克阿瑟和艾森豪威尔注定将实施多次成功的两栖战，使得加里波利之役看上去无足轻重。此外，正如艾伯特·M. 琼斯准将在战争前夜指出的那样，吕宋“拥有250英里可能被登陆海岸线”。不过，由于季风因素，琼斯并没有在意拉蒙海湾地区，导致那里成为敌人的主要登陆地点。

麦克阿瑟很鄙夷那些认为群岛“无法防御”的人。他说：“没有什么地方是无法防御或是无法攻破的。只要集中优势兵力，任何地方都既可攻也可守。说菲律宾无法防御的意思只是在说它不容易防守而已。”1936年9月5日出版的《科利尔百科全书》援引了他的这样一句话：“我们会让入侵群岛变成一件花销高昂的事情，以至于任何国家都不会想去尝试。”诚然，这份自负和罗斯福于1932年参与竞选时扬言要实现收支平衡时的信誓旦旦有些相似。将军这番虚张声势的话语显然是说给日本和菲律宾政府听的。而奎松已经承诺了要将第一笔预算中的

22%都划拨给联邦共和国的国防事业。麦克阿瑟似乎意在做到两全其美。一方面，他宣称日本不需要菲律宾；另一方面，由于菲律宾“位于日本的海陆生命线上”，因而应当与新加坡一同设立起一道屏障，保护“荷属东印度群岛”至南海一带的原油、橡胶、金鸡纳碱、柚木和锡矿资源。

这些假设中的第二条是正确的——“没有菲律宾……”霍默·李写道，“日本对于亚洲海域的统辖只不过是试验性的。而它是否能够破坏性地最终统辖这一地区就要看它是否能够征服菲律宾。”——对于这一点，就连日本人自己也表示赞同。美国政府看上去似乎有些犹豫不决。这一决定是至关重要的，毕竟菲律宾不能总是靠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快艇、文盲游击队员和形单影只的军用飞机来保卫自己。真正有用的只有美国军队的意图。在麦克阿瑟接手共和国的国防事务之前，陆军将军和海军上将们对此一致持消极看法，而他们的理由大多与地理位置有关。从航程上来看，马尼拉距离旧金山8 004英里，而货船从纽约出发、经巴拿马运河到达马尼拉的总航程为13 088英里。相较之下，长崎距离菲律宾首府仅有1 006英里。而且日本在台湾岛附近的外岛上建设的空军基地距离最近的菲律宾岛屿仅有40英里——天气晴好时肉眼便可以眺望。麦克阿瑟很喜欢提醒自己的下属，拿破仑在手握七成胜算之前是从不会轻举妄动的，他补充道，在日本与菲律宾的斗争中，“是不存在这么高的获胜希望的”。实际上，若是没有美国海军的介入，菲律宾必输无疑。就连麦克阿瑟都嫌保守的橙色战争计划中提到的战舰要花6个月的时间才能够为吕宋岛解围。20世纪30年代末期，海军部痛苦地意识到自己的亚洲分舰队人员不足，且舰船超龄，预计增强菲律宾卫戍部队要花上2~3年的时间。实际上，海军宁愿弃权，将群岛拱手相让。

其实，早在1909年的时候，美军就已经通过不再在群岛建设大型军事基地的决定了。20世纪20年代末，时任美军驻马尼拉指挥官约翰逊·哈古德少将就曾向胡佛总统汇报：“在菲律宾维护或培养一支足以抵御任何可能敌人入侵的军队的可行性为零。”1933年，负责科雷希多岛防

御工作的斯坦利·D. 恩比克准将这样写道："即便提早派遣我们的舰队前往菲律宾海域，要想实施橙色战争计划也实属疯狂之举。"恩比克建议撤退到阿拉斯加—夏威夷—巴拿马一线，遭到了上级的回绝，但他的继任者E. E. 布思少将对此表示强烈赞同，声辩能供自己调遣的兵力在遇到敌人来犯时只能进行象征性的抵抗。

如今，麦克阿瑟坚持要在吃水线位置与敌军正面交战，迫使对方退回海中。正如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就连他的老对手乔治·马歇尔也站到了他那一边。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便是马歇尔对美军日渐增强的空军的信心，而另一部分原因则在于他对麦克阿瑟个人判断力的信任以及对不足取信的日本人的鄙夷。如今，我们已经很难再现20世纪40年代早期席卷了大部分亚洲地区的那股骇人的毁灭力量在战前的形象了，但当时曾经出现过不少不为人所信的预言家。1934年，时任菲律宾指挥官的弗兰克·帕克少将曾向华盛顿汇报，日本移民的数量正在以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且大多分布在沿海地区，其中绝大部分都是兵役年龄的男子——还有些身负日军的秘密任务。战争部对此并没有在意，而奎松也再次一笑而过。这些移民十分勤勉，他们是有用的自行车销售员、街头画家和仆人，似乎为提高菲律宾人的生活质量贡献良多。"我后来才发现我的园丁竟然是一位日本少校，而我的按摩师则是一位日本上校。"卡洛斯·罗慕洛回忆道。

麦克阿瑟与此相反——他的公开宣言也许不过就是外交手段——随着20世纪30年代渐近尾声，驻菲律宾的大部分美国军官都认为美国与大日本帝国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但没几个人怀疑美国做不到速战速决。就连麦克阿瑟也被极端的沙文主义所误导——目睹了日本战机在战争初期的飞行技巧之后，他认定那些飞行员肯定是白人。在美国人眼中，日本人是个十分滑稽好笑的民族。他们倒着写字、倒着阅读，盖房子时从房顶开始，锯东西时还只会拉不会推。他们的棒球解说员称"满球"为"两击三球"。百货商店的地下廉价商品部被设在了顶层。情人节的时候，日本女人要给男人送礼。订书钉总是被订在文件的右上角。要

想打开他们的锁，必须向左边拧转钥匙。如果陷入泥潭，他们会大笑；向你讲述沉重的个人不幸经历时，他们会露齿微笑。日本杀人犯会为弄乱了被害人的家而道歉。在家中彬彬有礼地接待过你的主人若是在街上碰到你，说不定会粗鲁地把你推到排水沟里去。他们身材矮壮，长着罗圈腿和一口龅牙。上街时，他们的老百姓总是带着皱皱巴巴的帽子，穿着深色的羊驼毛套装，戴着有色的眼镜。他们的士兵穿着的军装看上去就像是一堆包得乱七八糟的棕色纸袋。那些传言他们能够准确射击的话——更不要提痛打美国人——在马尼拉驻军看来简直就是荒谬可笑。

实际上，美国人才真的应该被称作是可笑的，或者，鉴于局势的后续发展，应该说是悲喜交加才对。他们给菲律宾新兵发放的廉价遮阳帽和橡胶鞋实在是太过老旧，以至于第一次演习时便四分五裂了。菲律宾士兵手中的那些陈旧的恩菲尔德步枪也是从美国陆军那里买来的（每支枪还多收了菲律宾人10%的费用），而支在通往菲律宾内海海峡处的则是一批19世纪的8英寸炮。麦克阿瑟将内海称为“我们的海”——北部是吕宋岛，南部是棉兰老岛，东边是萨马岛和莱特岛，西边则是民都洛岛和班乃岛——好像空军力量并不存在。最后，麦克阿瑟还获得了全美军官前所未有的一个军衔。1936年8月24日，在马拉卡南宫举行的一场隆重的仪式中，菲律宾第一夫人奥罗拉·奎松将一支金司令棒递到了他的手上。他现在是一位陆军元帅了。

为了这场仪式，新的陆军元帅设计了一套理想王国的军装：黑色的裤子，以勋章、星章和金链为装饰的白色束腰外衣以及一顶带有饰带镶缀的帽子。在后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顶帽子曾与乔治·巴顿那把镶有象牙的手杖齐名。站在宫殿的露台上，麦克阿瑟一边向身穿橡胶鞋、头戴廉价遮阳帽的军队敬礼，一边仔细地审视着每一个士兵，进行了一场令人振奋的演讲。他说，“早在骑士和骑士精神时代之前便形成并传承至今的军法”只有在军人的身上才能得到淋漓尽致的表达。“作为

高高在上的军人，他们必须要展现宗教的最高教义——牺牲。在战场和面临危险与死亡时，展现出了造物主按照自己的形象塑造的神圣属性。不管战事多么可怕，军人的职责便是为自己的祖国献出生命，而这才是人类最崇高的发展。”

正如林登·约翰逊所说的那样，麦克阿瑟的表现似乎有几分获得了嘉德勋章意味。也许他说的没错。此话并不是对美国人说的，而是对菲律宾人说的，而他们喜欢自己的所见所闻。评论这一场景时，马尼拉的一位编辑文森特·阿尔瓦诺·帕西斯赞许地写道：“在现实生活中，每一项伟大的事业都是从信仰开始迈出第一步的。”就连麦克阿瑟的批评者也承认他用对了措辞。“他引人注目的天分强烈地感染了菲律宾人的想象力。”戴维·乔尔·斯坦伯格、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写道：“麦克阿瑟认识到他面对的是菲律宾士气低落的问题。只要菲律宾人无法积极且毫不动摇地信任他的才智，他的防御项目便永远也成功不了。于是，即便不能证明自己一贯正确，他也不得不在他们的面前树立起自己的威信。那些华丽的辞藻、军事上的虚张声势以及他身上的穗带，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演员成为一个政策的一部分时天生性格的响应。”

不过，那时的美国人却不这么认为。自由主义者对此尤其一笑了之。在那些年，他们是和平主义者和孤立主义者——几个月后，要求在宣战前进行全民公投的勒德洛决议在国会勉强通过——如今已经是全世界身价最高军人的麦克阿瑟成了对他们来说极具诱惑力的目标。他们称他为“吕宋的拿破仑”和“菲律宾的花花公子”。用约翰·赫西的话来说，他们中的一些人“害怕自己看到的是一场帝国主义的欺骗阴谋”。哈罗德·E. 法伊在《国家》中撰文怒斥征兵制度。法伊担心这将影响“我们与日本之间的关系”，并指出这个项目“受到麦克阿瑟将军的影响将使菲律宾人民无法获得自由”。此外，他还要求美国将麦克阿瑟立即召回。有些保守党人对此也很不满。一个月前刚刚升任中校的艾森豪威尔认为局势“十分不可思议”。事后，他表示自己也曾试图劝说过麦克阿瑟不要接

受这个头衔，毕竟出任一支子虚乌有的军队的元帅未免有些太过浮夸和荒谬了。

那时候，艾森豪威尔以为这个新头衔是奎松的主意。后来，在与菲律宾总统的对话中，他才发现这实际上竟然是麦克阿瑟自己一手策划的。也正是这个时候，爱作秀的将军和他最得力的干将之间的关系开始冷却下来。这其中的原因似乎扑朔迷离。据艾森豪威尔说，麦克阿瑟想要举办一场盛大的阅兵式，好向马尼拉人民展示他们的钱都被用到了哪里。奎松认为这个方案的开销过于昂贵，将军便把罪过都安在了艾森豪威尔和奥德的身上。曾出现在这个紧要关头的邦纳·费勒上尉对此却有不同的说辞。据费勒回忆，是这两位助理试图绕过麦克阿瑟向奎松献计献策，以借此提高自己的威望。在这个版本的故事中，将军对艾森豪威尔和奥德说道："要不是这么做会毁了你们俩的仕途，我早就把你们给开除了。不过，尽管你们可以留下来，我永远也不会再相信你们了。"

也许麦克阿瑟的宽厚之举并非出于他的仁慈之心，而是完全为了讲求务实。他需要这两个人。在奥德因乘坐菲律宾新手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而在空难中去世后，将军开始更加器重艾森豪威尔。奎松也希望这位新中校能够留任；艾森豪威尔表示，由于元帅古怪的工作时间——他从没有在上午11点之前到过办公室，而且还要花上很长时间吃午饭——情绪反复无常的奎松总统"似乎越来越喜欢询问我的意见"。艾森豪威尔感到有些受宠若惊、不知所措。"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他后来说道，"是个很有说服力的人——有些人甚至认为他势不可当。他天生就具有灵巧敏捷的思维，对军事和政治都很感兴趣。"艾森豪威尔并不想冒犯敏感的将军。除此之外，他这些年来对权术已经感到有些厌倦，而奎松在某些事情上也激怒了他。这其中一件几乎惹怒了除奎松和麦克阿瑟以外所有人的事情便与菲律宾总统有权享受的仪式规格有关。

事情发生于1937年年初。保罗·V. 麦克纳特被选中接替墨菲担任高级专员一职。奎松和麦克阿瑟受邀到华盛顿参加就职仪式，而这位菲律

宾总统也计划顺便进行一次全世界范围的访问，到访包括中国、日本、墨西哥和欧洲在内的地方。每到一站，奎松都觉得自己有资格享受国家元首规格的21响礼炮欢迎仪式。将军对此表示同意："拒绝向菲律宾人选举出来的领袖致以至高无上的敬意是对这些人民的侮辱，会引发他们胸中的怒火。"美国国务院却认为应该按照州总督的仪制鸣19响礼炮才对。就这样，这个冗长乏味的问题困扰了马拉卡南宫两个月的时间，一直没有得出一个让所有人都满意的答案。其他国家都给了奎松最高规格的欢迎礼仪。只有美国没有那么好客，特别是在他告诉洛杉矶记者自己想要让菲律宾在1938年——而不是等到1946年——就独立的事情之后。满腔怒火的罗斯福先是拒绝接见他，后来经麦克阿瑟坐在总统办公室里苦苦哀求了两个小时才不情愿地改变了心意。

当奎松坐在国会山上强拉着国会议员们听他演讲、争取让菲律宾早日获得自由时，麦克阿瑟则在购买军需用品。然而，这两件事进行得都不怎么顺利：国会议员劝菲律宾总统保持耐心——这对于他的脾气秉性来说显然是不可能的——而将军则灰心丧气地表示自己"购买必需品和设备的要求被战争部忽略了"。陆军担心下发武器会鼓励当地人起义。只有海军表现出了一丝同情。海军上将十分赞赏麦克阿瑟的鱼雷快艇策略。与此同时，纽约在奎松的心里也留下了十分糟糕的印象。在外交政策协会的一场午宴上，自由主义的记者们指责奎松模糊了军队权威与政治权威之间的区别，企图通过耗尽菲律宾的经济收入来购买枪支，激怒日本。《国家》杂志的奥斯瓦尔德·加里森·维拉德质问奎松，为什么不能教给群岛的孩子们更好的生活方式而非要教他们杀戮。奎松情绪激动地回答："如果我都不相信菲律宾人能保护自己，那么我还不如今天下午就自杀。"

在曼哈顿，奎松和麦克阿瑟便分道扬镳了。奎松总统坐船前往欧洲大陆，而将军则返回吕宋岛监督第一次的征兵工作。与奎松不同，纽约在他眼中似乎显得格外宜人。1937年4月30日星期五上午10点，他出现在了市政大楼里，在副书记官菲利普·A. 海因斯的主持下迎娶了琼·玛丽

·费尔克洛思。

没有人知道他们到底是何时订婚的。那也许是在马尼拉时候的事，就发生在琼前去陪他趁着“蓝色时刻”、面对着科雷希多岛在宽阔阳台上散步的时候。事情应该是在1月25日那一天决定的，那时候奎松等人正准备登上“加拿大女皇号”开始此次的航程。几天之后，琼戴着自己的三角帽预订了泛美航空公司的一架飞机前往檀香山（即火奴鲁鲁），然后转乘“乐林”号船前往旧金山。面对朋友的询问，她只是解释说自己“决定要回家”“我想去田纳西”，或者“我要去探望亲戚”。她前往瓦胡岛的那段旅程可谓惊心动魄——一路上她都在晕机——到达夏威夷看到前来接机的麦克阿瑟时，她着实吃了一惊（她事后公开表示）。没有人为她解释菲律宾总统一行人用了什么花招放弃了“加拿大女皇”号改乘“乐林”号。在这段前往加利福尼亚的旅程中，琼显然要比从甲米地出发时玩得尽兴得多。

在麦克阿瑟前往华盛顿时，琼确实前去探望了几位住在默夫里斯伯勒的朋友。尽管她并没有把自己的计划告诉其中任何一个人，但还是犯了个有趣的小错误。一天晚上，他们一群人围坐在一起玩着挑棍的室内游戏。游戏中，玩家要在不碰到其他小棍的情况下挑起其中的一根，挑出来的小棍总数越多越好。有些小棍的分值比其他的高，其中最有价值的一根叫作“将军”。当琼挑到这一根的时候，她激动地尖叫了一声：“哦，将军是我的了！”她把将军会在纽约等待自己的这个消息第一个透露给了住在路易斯维尔的玛丽·格伦·比尔德太太——她最喜欢的姨妈。比尔德太太表示，美国人民一定都会感到很吃惊的。准备启程前往曼哈顿的琼回答：“不过马尼拉人可一点儿也不吃惊。”

回想起自己为第一任妻子举办的那场令人尴尬的华而不实的婚礼，将军的这一次婚礼办得十分低调。他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这件事情，而是在没有说明理由的情况下向当地的一位陆军指挥官借了一辆军车和一名

司机。他穿着保守的棕色西装，琼则戴了一顶棕色的小草帽、穿了一件镶着红狐狸毛领的大衣。婚礼的见证人是赫特少校和将军的一位副官。在阿斯特酒店用过一顿火腿鸡蛋婚礼早餐后，麦克阿瑟告诉记者们："这份工作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曾经对路易斯·吉布斯说过："将军的生活是孤独的。"虽然这话显然已经不再适用于他了，但他们在恋爱时的传统礼节还是会贯穿他们的婚姻。在别人面前——即便在最亲密的朋友面前——她也会称呼他为"将军"（这个词从她的口中说出来时还会带点儿口音）。两人单独在一起或是互通书信时，她则会称呼他为"老板先生"——那是马克·吐温的《误闯亚瑟王宫》中的一个角色。平日里，他总是呼唤她为"夫人"。

短暂的蜜月过后，他们乘坐"柯立芝总统"号返回了马尼拉。鉴于两人在14年之后才会重回故土，我们不妨回顾一下他们启程之前的那个月里美国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以便理解他们在移居海外的这段漫长岁月中为什么形成那些观念。就在他们举办婚礼的当天，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禁止美国公民向战争中的任何一方售卖军备武器。（参议院的阿瑟·H. 范登堡对此提出了反对意见，认为这一法案的力度还不够大。）罗斯福总统试图重组最高法院。底特律的汽车工人掀起了罢工。经济大萧条的氛围依然没有散去，在纽约隆尚餐厅吃上一顿烤牛肉晚餐只需要花费95美分。纳粹的"兴登堡"号飞艇在新泽西州的莱克赫斯特上空爆炸。《飘》获得了普利策奖。约翰·D. 洛克菲勒在佛罗里达州的奥蒙德比奇去世，享年97岁。在曼哈顿，罗纳德·科尔曼出演了《消失的地平线》，而珍妮·盖诺则出演了《一个明星的诞生》。圣路易斯红雀队的迪奇·迪安收获了非同寻常的一个赛季。海外，佛朗哥将军在西班牙大获全胜。内维尔·张伯伦接替斯坦利·鲍德温成为英国首相。乔治六世加冕国王，使得他的哥哥温莎公爵得以与爱人终成眷属。琼和将军还没有登陆马尼拉，日军就已经攻到了北京卢沟桥。

麦克阿瑟夫妇在酒店的顶层套房中举办了一场招待会，宴请了几百名宾客。不过，这也是他们在菲律宾参加的最后一场主要社会活动了。

大多数夜晚，他们都像以往一样去看电影或是在书房里读书。（和麦克阿瑟的母亲一样，琼也是一个很有心机的女人，总是给他看些同盟军将军的传记，其中就包括道格拉斯·S. 弗里曼的四卷李将军传记、G. F. R. 亨德森的两卷“石墙”托马斯·乔纳森·杰克逊传记以及J. A. 韦思的《内森·贝德福德·弗里斯特》。）一目十行的麦克阿瑟一天就能读完三本书；他有时也会坐在自己最喜欢的摇椅上全神贯注地读读杂志、看看报纸；每逢橄榄球赛季，他还会喋喋不休地劝勉和激励一番西点军校的教练。尽管他的办公时间很古怪，但他一周7天都在工作，午夜时分才上床休息，8小时后又会准时起床。早上8点，他的早餐包括果汁、两个溏心水煮蛋、一片吐司面包和一杯热巧克力。下午2点，他午餐时会吃上一个水果杯、若干海鲜或是一个蛋饼，还有杧果冰激凌。迎着落日嘬上一口琴蕾酒或是“螺丝起子”。晚上8点整的时候会坐下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不过从不碰点心或蛋糕。规律的生活有助于他维持身体健康——他的心率和血压都与年轻人差不多，除了偶尔的伤风感冒之外很少得病——但他很担心自己会让琼感到无聊。他晚年时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真的无法理解这么多年来她是如何忍受我的这些怪癖的。”

实际上，她很享受和他在一起的平淡日子——据说，她也格外地喜欢马尼拉。她发自内心的温暖和南方姑娘的魅力弥补了他冷淡的态度。每天早上9点钟，她会和其他军人的妻子一样出现在军队的杂货店里。出于对田纳西州的忠诚，她预定的化妆品和服装全都是从那里邮购过来的——她的衣服号码是不大不小的12号；白天时她会穿着白色的连衣裙，晚上则会选择软薄绸或是淡色的衣服——但菲律宾人最喜欢看到她穿着拖鞋或是轻便的当地凉鞋。化装舞会上，她会身着复古的金边礼服裙出场，接见丈夫在菲律宾的那些仰慕者。自从那次盛大的招待会之后，麦克阿瑟夫妇举办的小型晚宴派对便很少出现美国人的面孔。宾客名单上的名字——奎松、曼努埃尔·罗哈斯、华金·M. “麦克”·埃利萨尔德、卡洛斯·罗慕洛和埃米利奥·阿奎纳多——都是菲律宾上层社会的名人。当然，这也是他们会收到邀请的原因。

琼似乎从没有想过自己会在任何事情上与丈夫产生分歧。麦克阿瑟从没有去过教堂，但琼还是为了他放弃了自己的长老会，改信圣公会，以免他某天改变主意。若是购物的时候有他同行，她无论买什么都会当下立断，以防让他久等。她把他母亲早年收藏的那些美式或乔治王时代风格的银器全都摆放在顶层公寓里做展示。到了虫子滋生的春季——菲律宾从不匮乏蚊子、会飞的蟑螂和不下56种蝙蝠——她会在“蓝色时刻”到来之前在露台上烧些干燥的木头。他喜欢花，于是她便会花上数小时的时间照料散发着浓郁香气的白绿相间的香水树花和拥有类似茉莉香气的奶白色姜花。

最重要的是，她知道麦克阿瑟想要一个儿子。1938年2月21日，她在马尼拉的斯滕伯格医院生下了一个男孩。那是大男子主义的黄金年代。一位朋友在给将军的信中写道：“我不知道你竟然是个有性别歧视的人。”而他则欢欣鼓舞地回复道：“你知道吗，连我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由于她娇小的身材，产科医师还曾焦虑过一阵子，担心这次的生产需要剖宫才可以完成。不过，这个体重7磅的男孩还是顺利来到了人世，并且毫无悬念地被起名为阿瑟·麦克阿瑟四世。马尼拉的圣公会主教于6月2日在顶层公寓里主持了孩子的洗礼，而那一天正好也是阿瑟·麦克阿瑟法官诞辰123周年的日子。有人问琼，她的儿子会不会也要上西点军校。“有这样的一位父亲，他又能怎么办呢？”她回答。一位田纳西的亲戚给这个3个月大的孩子送来了一本李将军的传记；看来，责任的重担已经开始压在这个婴儿的身上了。不过，他的父亲在洗礼仪式的讲话中并没有提到家里的从军传统。（毫无疑问，麦克阿瑟自然是要利用这个机会演讲一番的。）相反，他倒是提到了自己希望小阿瑟能够秉承三位伟大女性（小阿瑟的母亲、奶奶和教母）身上的品质。他的教父和教母是曼努埃尔和奥罗拉·奎松夫妇。这也使得将军与共和国总统成了“至交”（compadres）——这个单词在西班牙语里是专门用来形容孩子的父亲与教父之间的关系的。不久之后，一位美国的高官向奎松夫人表达了自己对将军和奎松家庭之间关系的嫉妒之情。“你难道不明白吗？”奎松夫人回答，“道格拉斯是我们的兄弟。”

麦克阿瑟并不是一个以幽默见长的人，但现在的他能带着轻松愉悦的心情给自己的两个已婚的侄子写信。他说，他曾经“命令并规定”他们“生一个必定名叫阿瑟·麦克阿瑟的儿子”，但他们两人膝下都只有女儿。既然他们“完全无法”履行他的“命令”，他只好“亲自接手这个任务”。现在，他通知他们，“这项任务”已经“完成了”。显然，正如他后来庄重地谈起过的那样，这个男孩很快便成了麦克阿瑟“思想和感情的完全核心”。“我觉得自己能够在暮年拥有他简直是太幸运了。”然而，小阿瑟能够蒙受如此宠爱、又是否算得上幸运就另当别论了。孩子得喉头炎时，将军会彻夜不眠地看护他固然是件好事，但这份爱逐渐发展为将军从不会拒绝阿瑟的任何要求。琼也同样十分宠爱他们的儿子——午饭时总是急匆匆地赶回家给他喂奶粉（岛上没有鲜牛奶）——但她在管教儿子方面十分敏感。小阿瑟只有4天大的时候，她便雇用了脸庞瘦削、肤色淡棕的广东女子罗秋当奶妈。将军后来给她改名叫阿秋（或译阿秀、阿朱）。琼会研读一些养育孩子方面的现代理论书籍，然后把它们解释给奶妈听。一天晚上，孩子开始大哭。琼曾经在书中读到过有关类似情况的严格规定，于是便告知阿秋：“让他哭吧。没有人注意他的时候他自然就不会再哭了。”10秒钟之后，书房的门猛地打开了，那位菲律宾陆军元帅冲了出来。“这里出了什么事情？”他质问道，“我的孩子在哭，两个铁石心肠的女人却坐在这里什么也不做！”说罢他飞奔进了育婴房，一把抱起了孩子。琼第二天早上便把那些书全都丢掉了。

等到小阿瑟开始学会走路和说话，父子俩还开发出了一套清早起床的仪式。大约早上7点半左右，将军卧室的门打开后，小阿瑟便会迈着蹒跚的步伐、夹着自己最喜欢的玩具（一只长着凌乱小胡子的兔子娃娃“老朋友”）走进来。麦克阿瑟见到儿子后，一下子就会从床上跳下来立正站好，然后在儿子的口令下快速在屋里迈起正步：“嘭！嘭！嘭嘭！”在床边绕过几圈之后，孩子会用双手捂住自己的眼睛，而麦克阿瑟则会趁机拿出今天的礼物：也许是一根棒棒糖、一支蜡笔或是一本涂色书。这个仪式最终会在浴室里结束：麦克阿瑟刮胡子的时候，小阿瑟便会在一旁边和他唱二重唱边看着他——《甜美的露丝奥加》《漫游在

黄昏》——那时的他还发不清“漫”这个音，或者是《蓝色军装》：

我们在这里的时间所剩无几，

一个月两个月后，

我们就要告别灰色的学员装，

穿上蓝色的军装……

“事实上——”将军告诉自己的朋友们，“唯一赞赏我歌声的人是阿瑟。”他错了。他身边的每个人都很赞赏他的歌声，因为他们看到了这个男孩给他带来的变化。《时代周刊》的约翰·赫西曾说：“麦克阿瑟现在腰板挺得像旗杆一样直，神采飞扬……整个人都意气风发。他的眼神清澈犀利，思维敏捷，记忆量惊人，说话字字珠玑、一针见血。虽然他的形象依旧给人十分严厉的印象，脸上却时常浮现温暖的笑容，比公开打哈欠还容易传染。”小阿瑟3岁生日那天的一张快照记录下了麦克阿瑟一家三口当时的样子。小阿瑟穿着一身水手装，他的母亲则穿着花朵图案的连衣裙，父亲穿着卡其西装。将军脸上的表情只能用“慈爱”这个词来形容。他很早就为自己赢得了赞赏、成就、勋章和高贵的军衔，却在60岁时才找到平静和安详。作为家长，他唯一的遗憾就是自己的儿子身边没有任何一个美国小伙伴。鉴于远东局势的恶化，所有美军人员的妻子和儿女都受命返回了美国。麦克阿瑟一家之所以没有被拆散是因为将军已经退出了美国陆军。尽管他仍旧是美国军队顾问团的领袖，但他的唯一雇主是菲律宾政府。无论未来怎样，他和他的家人都将共同面对。

与此同时，日本自行车销售员、街头画家、游客和各行各业的商人们正在将菲律宾的国防情报一一发回东京政府。在东京市谷台，大日本帝国军队的神经中枢正欢欣鼓舞地接收着来自各方的信息。市谷台情报部门和麦克阿瑟的看法一样，认为菲律宾群岛是“打开通向太平洋大门

的钥匙”，因此一直满怀期待地蹲守在“钥匙孔”那里偷窥着。

战后，麦克阿瑟坚称正是自己大胆的防御计划减弱了敌人的攻势。他引用裕仁天皇的参谋部次长河边虎四郎战后对一位询问者所说的话：“日本决心入侵菲律宾的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日本参谋部害怕菲律宾的十年国防计划。这个计划已经进展到了第六年，对日本的野心存在威胁，所以日本人才不得不趁早介入。”事实上，菲律宾的备战情况直到1941年为止仍惨不忍睹。这并不是因为准备的时间不够，而是因为他们没有好好利用自己的时间，而其中的罪魁祸首之一便是麦克阿瑟，但他还有不少的“同党”。

自从将军于1937年12月31日从美国陆军现役军人的名单中退出后，麻烦便接踵而至。在9月16日写给参谋长马林·克雷格的信中，他解释自己正在阻挡“中级军官们的晋升之路”，并相信“罗斯福总统的伟大领导”能够保证“美国在我有生之年不再卷入战事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通过电报发去了同意他辞职的信函，盛赞麦克阿瑟的军旅生涯堪称“美国历史上的宏伟篇章”，并表达了“希望他能够安享晚年”的祝愿。这些场面话显然都是些无稽之谈。将军在华盛顿拥有不少强大的敌手。克雷格就是其中之一，希望美国能够从西太平洋抽身的参议员米勒德·泰丁斯则是另一个。更不要忘了哈罗德·伊克斯，以及重返故土后接任密歇根州州长、在治国问题上颇具影响力的弗兰克·墨菲。墨菲同意撤销夏威夷—阿拉斯加防御带。话说回来，作为一个和平主义者，他对任何防御带都持反对态度。正如墨菲在传记中写的那样，他对菲律宾在麦克阿瑟的带领下“实行军事化”感到恐惧。出于上述种种原因，克雷格通知麦克阿瑟：“完成两年的驻外任务之后，你将被调遣回乡为美国服务。”将军见状便提出了辞职。

充满讽刺意味的是，全力支持墨菲的人竟然是奎松。在给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电报中，奎松对自己即将失去陆军元帅这件事感到“十分不安”。既然将军已经不再代表美国了——他现在只不过是共和国的一名

雇员——奎松对他的敬意也就随之减少了不少。虽然他们还是至交，但将军和这个脾气火爆的混血儿已经快要分道扬镳了。这一点几个月之后便会得到印证。菲律宾总统梦想着像中国领导者一样把握军权，并认为蒋介石的防御很强大。如今，令他感到恐惧的是，日本人正在蹂躏中国。预见到他深爱的故土即将成为美日两国冲突的战场，同时也对麦克阿瑟无力从华盛顿购得军备的情况感到厌倦，奎松开始考虑中立的可能性。1938年7月，他起航前往东京，故意把将军抛在身后，和日本的外交官们谈判。回来后，他又开始要求美国加速实施菲律宾独立的计划，赶在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把自由归还给群岛。面对美国政府的冷漠，他开始大幅削减国防预算，还说要终止麦克阿瑟的十年计划，认为扩大菲律宾军队的规模只会引起日本的敌对情绪。一位驻马尼拉的美国记者甚至在报道中提到奎松“正考虑完全放弃国防计划”。

不出所料，奎松此举大大打击了菲律宾军队的士气。早已对薪酬待遇心怀不满、正处于征兵年纪的菲律宾男孩们开始逃避兵役——和美国士兵30美元的月工资相比，他们每个月只能领到7美元。1936~1940年，征兵率下降了42%，而陆军元帅的常规军规模也缩小到了468名军官和3 697名士兵。尽管麦克阿瑟还在坚称为战争做准备是抵御日本侵略的最好方法，但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已经日渐疏远。奎松还曾公开对高级专员麦克纳特的继任者弗朗西斯·B. 塞尔提起过自己想要解雇将军。塞尔的心里也认同群岛是无法进行防御的，可当他听到奎松在马尼拉的黎刹体育馆对别人说起“能够听到别人说菲律宾可以反抗入侵固然很好，但人民应该知道这并非事实”这样的话时，还是和麦克阿瑟一样感到十分震惊。奎松还补充道：“即便给剩下的每一个菲律宾人都配备上现代武器，也无法保卫群岛。”将军要求总统秘书豪尔赫·B. 巴尔加斯替他安排和总统见面的时间，却被对方告知总统很忙。麦克阿瑟说道：“豪尔赫，终有一天你的老板想要见我的心情会比我现在还要迫切。”

走投无路的将军给威廉·艾伦·怀特写去了一封信：“历史上失败的战争可以被总结为一个词：为时已晚。要么就是太晚理解潜在敌人的致命

意图，要么就是太晚意识到自己已有生命危险，或者是太晚动手准备、太晚集结所有可能的抵抗力量、太晚和自己的盟友站到一起。”对此，他认为美国政府和菲律宾政府都难辞其咎。1938年，他派艾森豪威尔回美国去为他竭力争取一些支持。回到首都的艾森豪威尔发现那些人全都“没有丝毫的同情心，只要菲律宾坚持要独立，战争部就断然不会支持他们的国防事业”。“为了能够从下层终结这种永无止境的挫折，我一直冲上了顶峰。”克雷格对此稍能表示理解，但艾森豪威尔仍旧感觉自己的话有些微不足道：“在逐个哀求完通信处、军需处、军械署和医务署之后，我去威奇托买了几架飞机，然后又去了康涅狄格州的温切斯特军火公司。带着‘顺手牵羊’和花钱购买回来的东西，我返回了马尼拉。”

第二年，麦克阿瑟询问自己能否从美国借用一些武器，对方却表示“向菲律宾出借额外武器”是毫无意义的，“除非弹尽其用”——这显然是无法实现的。正如艾森豪威尔所说：“美军自己还在为缺乏拨款的事情发愁……因而无力从自己的军备中分出一些支援菲律宾。”这也情有可原；而华盛顿左右摇摆的菲律宾政策则不然。在分配国防重点时，战争部将群岛的地位置于夏威夷（有时甚至是巴拿马）之下。尽管亨利·L.史汀生部长和乔治·马歇尔参谋长带着一批新的人马进驻战争部，如此优柔寡断的作风依旧没有得到改善。当富兰克林·罗斯福问马歇尔为什么不能匀出一些枪支送到麦克阿瑟那里时，对方表示这样做只会把保护美国本土所需的“宝贵资源”拱手让给马尼拉。1940年7月下旬，麦克阿瑟恳请美国政府拨给菲律宾现役军人每年50美元的薪酬，结果被拒。（当年国会拨给美国国民警卫队的年薪为每人220美元。）之后，尽管菲律宾驻华盛顿的属地居民代表麦克·埃利萨尔德也极力进言，国会还是拒绝将菲律宾纳入租借法案之中，认为伦敦比马尼拉更有价值。

太平洋战争的脚步临近之际，麦克阿瑟最不想看到的就是下属的骚动，但又不得不忍耐。1939年9月1日，当纳粹的国防军铁骑冲向华沙时，艾森豪威尔正蹲守在马尼拉酒店的收音机旁。他立即箭步冲进顶层套房，告诉麦克阿瑟：“将军，依我的愚见，美国在这场战争中是不可

能长时间袖手旁观的。我想要尽快回家，在紧张局势到来之前参与准备工作。”艾森豪威尔事后回忆：“麦克阿瑟说我犯了一个大错误。他说我在菲律宾所能做的远比我在美军当一个中校所能做的更加重要。”(注)作为马尼拉的参谋长，艾森豪威尔是将军身边最亲近的军官。不过，麦克阿瑟还是大度地接受了艾森豪威尔的决定，并和琼一起到码头参加了他在邮轮特等舱里举办的欢送派对。直到船员催促大家下船，他们才离开，还一直站在码头上朝着离岸的邮轮挥手。玛米对此感到很欣慰，因为她此前只看到过麦克阿瑟为一位军官送行。

在过去风平浪静的几年中，麦克阿瑟为自己集结了一个和“肖蒙党”一样团结的小团体。1935年，悉尼·赫夫是第一个入列的成员。1941年，将军将赫夫调往军中，任他为中校，并让他担任自己的高级助理。1937年，工程师休·J. 凯西上校和防空部队军官威廉·M. 马夸特少校也加入了他们的队伍。在随后的两年中，麦克阿瑟的副参谋长理查德·J. 马歇尔中校和首席情报官查尔斯·威洛比也投身其中。威洛比是个非常能干的小伙子，被其他人称为“查尔斯爵士”。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德国人——他的本名叫作卡尔·魏登巴赫——他说话时带有浓重的日耳曼口音，仰慕佛朗哥将军，而且按照另外一位军官的话来说似乎“永远都在张望木栅栏的另一头”。

在其他人的眼中，查尔斯爵士也许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但他因为常和麦克阿瑟身边的一个最招人记恨的人起冲突而博得了大家的同情。那个人就是艾森豪威尔的继任者——参谋长理查德·K. 萨瑟兰中校。萨瑟兰是在奥德突然过世之后加入麦克阿瑟的团队的。他个子高挑，身材瘦削，性格阴沉严厉，毕业于耶鲁大学。作为西弗吉尼亚州一位参议员兼最高法院法官的儿子，萨瑟兰是个很能干也很无情的人。经常用代号给妻子写信的罗伯特·艾克尔伯格（麦克阿瑟就常被他称为“萨拉”，即法国女演员萨拉·贝纳尔的名字）就在信中称萨瑟兰为“老滑头”，还说自己不得不“在对付他的时候让自己也变得油嘴滑舌起来”。其他人都认为这位新上任的（菲律宾军队的）参谋长很难对付。某报记

者克拉克·里认为他是个“无礼、暴躁、专横并且对谁都充满了敌意的人”。在卡洛斯·罗慕洛眼中，他是个“恪守细枝末节的人”。而乔治·肯尼则认为他任性又傲慢，是个“总是会惹毛别人”的人。

萨瑟兰的政治观点比威洛比还要古怪。一天晚饭时，这位参谋长指出美国在战时应该抛开民主，因为国会已经在辩论上浪费了太多的时间。此外，他还认为美国应该废弃选举制度，实行独裁专制。据另一位军官回忆：

> 麦克阿瑟将军停了一会儿，然后告诉萨瑟兰他错了。民主是有效的，而且是永远都有效的，因为民主制度下的人民可以思考，可以表达，可以保持自由、开放、灵活的思想。他还说，虽然独裁状态有利于策划战争，将所有事情巨细靡遗地安排好后发动进攻，但即便战争初期进展顺利，计划最终也将趋于破败。有些东西妨碍了计划。如今，独裁者受限的指挥思维已经不足以灵活应对变幻莫测的局势。他们试图让战争变成一种科学，但战争实际上是一门艺术。他继续说道，从另一方面来讲，在民主的制度下产生的成百上千个思维灵活、天马行空的领袖可以利用独裁者的问题和弊病，想出几十种方法来超越和击败他。只要民主能够抵挡得住最初的猛攻，就能够找到反击的方法，最终取得胜利。虽然这种制度会消耗金钱，有时看起来也不够高效，但是从最终的分析来看，我们美国现在所拥有的民主是政府所能进化出的最佳形式。他停顿了一下说道：“迪克（理查德的昵称），你的问题恐怕就在于你是个天生的独裁者。”

当然，麦克阿瑟自己也是个天生的独裁者，但他了解美国的历史，也理解它的重要性。

1940年时，中南半岛是法国的殖民地。那一年春天，法国的沦陷给

亚洲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实际上，日军已经占领了中国整个东部海岸，如今又入侵了越南北部，包抄了菲律宾。9月27日，日本签署了《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加入了轴心国。三国保证，如果缔约国中的一方受到未参战国——也就是美国——进攻时，其他几国都将会出手援助，而奎松只能孤立无援地在一旁旁观。菲律宾全国陷入了紧急状态，可年度国防拨款还不到1935年向麦克阿瑟承诺数额的1/8。麦克阿瑟考虑辞职，但颇有先见之明的奎松恳求他留下。将军同意了，说道："我无法忽视这样的使命召唤。"

如果说奎松这个人不切实际的话，那么，在某种程度上，麦克阿瑟也是个理想化的人物。在那个狼烟四起的年代，他对世界大事的公开反应都是希望战事能够自生自灭，或是假装它们根本就不存在。汉森·鲍德温、弗莱彻·普拉特和乔治·菲尔丁·埃利奥特都认为他的国防计划有着致命的缺点，但将军自信满满。在1938年11月2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将军曾经撰文声称："吕宋岛只有两片海岸地区是任何规模的敌军都可以登陆的。只要人员安排得当、准备充分，任何敌军都休想入侵这两片防御阵地。"欧洲战事爆发后，他又再次断言自己"严重怀疑敌人能否在菲律宾的任何一块战略要地上集中优势兵力"，也就是说，"日军在没有得到环太平洋其他国家的默许之前是不可能实施封锁的"。即便他们有能力征服菲律宾群岛，也会在战略上被削弱。

在这件事上给麦克阿瑟带来很大压力的一位记者就是赫西。将军向这位记者保证，德国已经指示日本不要在太平洋地区惹是生非。他站起身来一边踱步一边指出，如果日本参战，美国、英国和荷兰只需要动用部署在太平洋上的一半兵力便可以制服它。"日本海军要么就会被摧毁，要么就会被紧紧地遏制住。"停下脚步，麦克阿瑟用力地握了握这位访客的手，和他道别。"我走出去的时候，"赫西写道，"心中感到一丝轻松和雀跃，对事情又有了信心。毕竟你听到的这些话出自一个拥有出色军事天赋的人之口。"

随着时局的恶化——日本这只八爪鱼的触角已经慢慢地伸向了南亚地区——麦克阿瑟依旧保持着平静安详的心态，只不过又给自己的乐观心态找了一个新的假设。他还是坚称菲律宾“在面对来势汹汹、目的明确的进攻时，只要做好准备、下定决心全力抵抗，便能筑起有效的防御阵线，合理地保证自身安全”。此外，他依旧相信海外侵略存在战略困难——“缺乏进攻的合理理由”——然而现在，他第一次强调起了美国确保群岛安全的“最终责任”，形容自己的小规模菲军只不过是“美军在群岛设立的一支小型分遣队的后备部队”。

如今，球又被踢回了华盛顿。这一次，华盛顿终于准备给予回应了。早在1938年秋天举行的慕尼黑会议期间，战争部的战争计划处便打起了在菲律宾增兵的主意，而在场的麦克阿瑟却毫不知情，因为直到1937年年底才知道自己只不过受雇于美国的“一个联邦共和国”，因此无权接触机密信息。这种说法显然是荒谬的。检讨过去，在菲律宾人坐等日军宰杀的过程中，美国所铸下的头等大错便是出手太晚。一方面是陆军元帅麦克阿瑟和他的当地部队，另一方面是菲律宾驻军：美军士兵以及被当作美军成员的菲律宾侦察员。在这种情况下，事情的进展大部分就要仰仗共和国陆军元帅与驻菲美军指挥官之间的关系，而麦克阿瑟在分权方面的事迹可并不那么鼓舞人心。

1940年春天，一件幸事降临在了麦克阿瑟的头上。他在驻菲美军中的新对手变成了他的老朋友乔治·格鲁纳特。那年夏末，格鲁纳特劝告乔治·马歇尔，美军应该拒绝“对日本采取绥靖和奉迎的态度”，并在汇报中提到菲律宾之所以存在消极情绪只不过是因为美国“没有公布以国防手段和策略为依托的政策”。他催促美国军官训练更多的菲律宾人，并在群岛地区加派驻军、“建设强有力的空军和潜艇部队”。在他和麦克阿瑟的合力劝说下，奎松摒弃了失败主义的思想，于当年10月提笔给华盛顿写信要求美军扩大在菲律宾的驻军规模。一个月后，另一封出自格鲁纳特之手的警示信也被递交到了美国政府。相比菲律宾人士气低沉的问题，格鲁纳特现在更担心的是战争部会在菲律宾军队的战备问题上被

误导。他给马歇尔寄去了一张剪报，上面报道了菲律宾已经拥有12支战备部队的消息。格鲁纳特指出，距离麦克阿瑟的国防计划预定日期还剩下6年的时间，而出于他所不能控制的原因，该计划的进展可谓有气无力。

如今的战争部办公室夜夜都是灯火通明。10月10日，战争计划处建议撤出太平洋上东经180度以东的所有美军。这意味着美国不仅要牺牲菲律宾，还要牺牲关岛和威克岛上的驻军，失去马尼拉湾，把西太平洋上沟通日本与中国南海的南北向航线拱手让人。然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样做并非是没有意义的。橙色战争计划假设的是两个大国之间——也就是美国和日本之间的冲突。但当前的战争是全球性的。美英两国已经开始了秘密谈判，其结果就是《美英联合基本战争计划》，即后来闻名于世的“彩虹5号计划”。1941年6月2日，罗斯福的陆海军联合委员会采用了这一计划，基本前提就是万一美国与轴心国之间发生战争，同盟国会先进攻意大利和德国。对于日本，同盟国的“战略将是防守”，因为“美国不打算把当前的兵力用在那里”。简单地说，菲律宾在开战之前就已经被抛弃了。虽然没有人那么说，但是美方不打算计划疏散岛上美国人的意图不言而喻。

孤立主义的情绪越来越强烈，包括麦克阿瑟在内的少数美国人知道了谈判正在进行中。幸好如此。他对此表示很气馁。每天深夜，他都会在顶层套房的书房地板上来回踱步。（有一次，楼下的房客还曾在凌晨2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酒店前台抗议：“那个家伙知不知道现在几点了？”）他在权衡未来，同时也在思考自己将扮演什么角色。格鲁纳特认同他的看法，认为整个群岛是可以防御的，并将自己的想法上报给了战争部。这固然很好，可一旦冲突爆发，战争部必然会把防御群岛的任务交到格鲁纳特手里——这一点在麦克阿瑟看来就不是那么理想了。格鲁纳特无疑是一位好军官，但即将到来的苦战需要的是一位军事天才，而身居顶层套房的将军心里对那位天才的身份没有半点儿疑惑。

自从麦克阿瑟退出美军以来，已经过去了三年多的时间，因而他如今在战争部的眼中不过是一个局外人。曾经被他流放到伊利诺伊州国民警卫队去的参谋长马歇尔是马林·克雷格的门徒，而克雷格又是潘兴的门徒——他再一次遭遇了“肖蒙党”。不过，麦克阿瑟是绝不可能接受一群在他当参谋长时还只是上校（甚至是上尉）的人对他指手画脚的。尽管如此，1941年2月1日，他还是选择了和他们重新建立关系。在写给乔治·马歇尔的信中，他指出自己面对的任务不仅仅是“为1946年共和国的独立做好国防准备，也是完成罗斯福总统的指示，在美国尽主权义务的同时最大限度地利用过渡期来协调（菲律宾的）发展”。他表示，橙色战争计划已经终结。他们现在应该把菲律宾的国防视为与自己“同仇敌忾的势力”。他概述自己充满雄心壮志的项目，估计自己很快就可以集结12.5万备战兵力，加之空军和“以30~50艘高速机动鱼雷快艇为主要攻击力”的海军部队，相信他能够“在海岸线提供足够的防御力量，阻止最强大的潜在敌人可能采取的最大规模为10万人的初期登陆行动”。而这其中的关键就在于他打算拦阻所有通往菲律宾内海的海峡，便于友方的船只自由活动。但他需要更多的设备，包括几批地雷、7门12英寸大炮、25门155毫米榴弹炮、海防大炮所需弹药以及32盏移动式雷达探照灯。

什么动静也没有。局势的走向不妙。麦克阿瑟需要一个位高权重的朋友，而他恰好就有这样一个理想人选：史蒂夫·厄尔利（罗斯福的新闻秘书）。两人是在“一战”前夕认识的。那时的厄尔利还是一个专门报道战争部题材的美联社年轻记者，而麦克阿瑟则是战争部的发言人。1941年4月，将军给厄尔利送去了一封简信，暗示他去试探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口风，看看总统有没有可能任命麦克阿瑟为菲律宾美军与当地部队的总指挥官。不过，虽然总统对于这个想法有些兴趣，但在当时似乎也是徒劳无功的。5月21日，格鲁纳特邀请麦克阿瑟参加了几场战略会议。同一天，史汀生如约与一位菲律宾的电话执行总监约瑟夫·史蒂夫诺特见了面，力劝马尼拉的两位将军之间能够建立更加紧密的联系。更重要的是，史汀生在自己那晚的日记中写道：“马歇尔偶然告诉我，如

果那里有了麻烦，他们打算返聘麦克阿瑟将军作为指挥官。”但这些风言风语并没有传到维多利亚大街或马尼拉饭店去。相反，将军听到的全都是些非正式的、令人泄气的消息。美国州际商务委员会的特派员J. M.约翰逊在给将军的信中提到，自己在华盛顿某高尔夫球俱乐部与厄尔利聊天时曾催促他在远东给麦克阿瑟分配一个更大的角色。按照约翰逊的话来说，新闻秘书给出的答案是：“他自己也提出了要效忠的愿望，我们也为他找了一些职位，但没有找到适合他的。”发现自己所做的一切不过都是徒劳之后，麦克阿瑟5月29日写信给马歇尔，说自己已经预订了下一班邮轮的特等舱准备回家。他打算放下自己在马尼拉的事业，搬去圣安东尼奥。他还给厄尔利寄去了这封信的副本，但这一次收到了回信。

“是上帝注定带我来到这里的。”再一次回归指挥官地位的将军肯定会这样说。然而，这一切实际上都是政治运作的结果。虽然军事史学家马克·S. 沃森无法追溯让麦克阿瑟回归美国陆军的准确续发事件，但我们大致可以了解到底发生了些什么。通过厄尔利，麦克阿瑟拥有了一个直接与总统沟通的管道。正如沃森在书中写到的那样，麦克阿瑟在5月29日那天写给马歇尔的信“（语气）异常权威……其中透露了不少连马歇尔将军自己都还没有掌握的‘先见之明’”。克拉克·李提到，远在菲律宾的将军“越过马歇尔，操纵了自己的这一次返聘与菲律宾总指挥官的任命。马歇尔只不过是在考虑这一方案，但麦克阿瑟强迫他做了决定”。

马尼拉方面再次恢复了积极性，而总统办公室如今也回敬了相同的热情。虽然战争部里的某些人也许更希望格鲁纳特能够掌控全局，但总司令希望麦克阿瑟能够在东方做他的高级将领。和麦克阿瑟一样，总统也习惯随心所欲。如此一来，战争部与驻菲美军之间的大门敞开了。6月20日[注]，马歇尔致信麦克阿瑟，说：“我自己和史汀生认定，你出色

的资历和在菲律宾事务方面的丰富经验使你成为美军在面临可能到来的远东危机时理想的人选。部长压下了自己对你的任命推荐，认为现在还不是采取行动的时候。不过，他授权我转告你，他会在适当的时机推荐总统任命你担当此职。”马歇尔还冷淡地加了一句：“在我的印象里，总统会批准他的建议。”

但麦克阿瑟已经越来越焦躁了。美军的飞机在中国南海上空反复侦察的过程中发现日军的运输车正在南下。7月7日，他再次致信华盛顿，敦促政府尽快统一远东指挥权，并收到了总统的军事助理、人称“老爹”的埃德温·M. 沃森准将发来的一封只有两行、内容简洁扼要的电报。电报内容指示他留守马尼拉，直到美国政府下达进一步指令。此刻，罗斯福正忙着小心翼翼地观察日本政府的动向：在裕仁天皇新的陆军大臣、外号“剃刀”的东条英机的带领下，日军掌控了除英国割据的香港之外的中国所有港口。7月23日，他们又说服软弱的维希政权将中南半岛的南部基地拱手让出。第二天，日军的舰队便开进了越南的金兰湾——东方条件最好的自然港口。第三天，3万名日军在西贡登陆。史汀生催促总统尽快采取行动，声称“在此等情势下，应该采取一切可行措施增加菲律宾群岛的防御力量”。

7月26日，罗斯福终于开始分批采取行动。驻菲美军和菲律宾本土部队被合为一支部队，而其指挥官麦克阿瑟则被重新任命为少将。不出24小时，他即将升为中将，尔后一跃成为四星上将。与此同时，总统还下发了几条其他的行政命令，使得美日之战成为必然。日本和中国在美国的所有资产都遭到了冻结，而巴拿马运河也不再对日本的货船开放。美国人不得向日本出口原油、钢铁或橡胶。在总统的要求下，英国和荷兰也宣布执行同样的限制贸易规定。鉴于日本本身没有上述资源——而大日本帝国的战舰在没有外国原油的情况下甚至都无法离开母港——摆在他们面前的就只有一个生硬的选择：要么从中国大陆撤军，要么入侵原材料丰富的马来半岛和“荷属东印度群岛”。面对罗斯福的动作，东京的反应很迅速，也很决绝。同一天，美国的密码破译员截取了裕仁天皇

的外交部发给日本驻柏林大使馆的一封密函。密函中提到，美国总统的决定营造了“让我们无法长时间忍受下去的十分紧张的局面”，大日本帝国“必须采取紧急行动，彻底粉碎英美两国如假寐的龙一般编织的日渐加强的包围链”。日本人将菲律宾视为“指向日本心脏的一把手枪”。随着麦克阿瑟走马上任，这把手枪如今已经上好了膛。为了增加赌注，东京政府勒令暹罗（泰国）的军事基地全面控制该国的橡胶、锡和大米资源。日本想要传达的信息很明确：他们并没有因此而放弃自己的所得，而是进一步将触角伸向了亚洲深处。

麦克阿瑟是从报纸上得知自己被任命为新指挥官的事情的。7月27日星期日早上7点30分——也就是华盛顿的7月26日——将军拿着一份马尼拉的《论坛报》早报坐在了早餐桌前。在读完日本占领西贡的头条新闻后，他得知东条英机已经召集了上百万名后备军人。就在这时，他瞟到了报纸头版左下角的一个小格子，里面登载了华盛顿发出的一条未经核实的快报，宣称美国总统准备调集群岛部队，并安排麦克阿瑟担任指挥官。正当他在思忖这条消息是否属实时，顶层公寓的门铃响了。一位男仆为他送来了战争部发来的两封电报，印证了《论坛报》上的这条简讯，并授权他使用1 000万美元来加强菲律宾的国防。将军找来了萨瑟兰和理查德·马歇尔，邀请他们到自己的书房里来，向他们展示了这两份电报。“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穿上了新制服的老家伙一样。”他说道。他已经在自己的奈良桌上铺开了一张地图。萨瑟兰说：“你知道的，将军，这摆明是一个几乎无法应付的任务。”将军抬起头来瞥了他一眼答道：“我们必须也肯定要守护好这些岛屿。我只能尽我所能。”就在此时，有人前来通报，奎松总统正在从马拉卡南宫过来的路上。进门后，总统拥抱了麦克阿瑟，说道：“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全都由你调遣。”奎松一扫前段时间的失败主义心态，在发给美国的一段无线电广播中表示“菲律宾人民的立场是清晰而明了的。我们怀着无尽的感激之情愿意对美国效忠。一旦美国参战，菲律宾将紧跟其后、与它并肩作战”。

但萨瑟兰说的是对的：挑战是难以应对的。日军有600万人的武装力量，其精锐部队全都由在中国战斗过4年的老兵组成。麦克阿瑟的手下只有2.2万名美军和菲律宾侦察员，还有他的共和国军——到12月中旬为止，这支部队可能才能召集8万人，而其中的大部分人还从没有见过来复枪，或是除了敬礼之外不了解任何军队知识。就连英国驻马来半岛的兵力都比他的要强悍许多。当奎松警告在校大学生“炸弹很快便有可能落在校园里”时，学生们竟然一笑了之。对于他们和他们的长辈来说，未来的战争似乎不太现实。马尼拉城中最具有战斗状态的象征便是戴着纸型头盔绕着古城墙操练的后备军官训练队——而据克拉克·李观察，他们看上去似乎“乐在其中”——还有在“墙上屋”中来回踱步的将军。

《时代周刊》撰文形容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慷慨激昂的演说使得空气都变成了紫色，话语中充满了对上帝的祷告以及军旗与爱国之类的词语，紧握的拳头敲击着掌心，手臂来回地挥舞扫荡，口中的主题总是如出一辙：菲律宾是可以被保卫的，且一定会以上帝的名义得到庇护”。这就是媒体眼中的麦克阿瑟，也正是他想让他们看到的样子。实际上，他的任务自然要比花言巧语复杂得多。他每天都会给华盛顿寄去一批军需采购的单据，还要监督1 000名工匠日夜兼工地修筑营地，给新到的军官开会。此外，他还要在格鲁纳特回国之前听取他的报告，在滩头安放障碍物，布置海岸炮——任务似乎没有尽头。然而，回顾往事，这一切似乎都有些徒劳无功的意味。早在许多年前，麦克阿瑟就曾经说过：“高效的陆军与海军能够为政治家呼吁和平的话语提供有力的支持，可在危机即将到来的时刻，狂热地备战只会引发冲突。”如今，他也被卷入了这样的一次尝试之中。他后来承认，那就是“危急关头的最后一搏”。

麦克阿瑟每天唯一能够放松的时刻便是收听广播新闻的时候。中午12点30分之前，他会提早几分钟离开办公室——那里如今已经被一张象征着“胜利”的V字印刷海报所占领——走下一层楼来到隔壁的一间拥有

低矮天花板的房间里。在那里，他会坐在一张矮脚的软扶手椅上，而萨瑟兰则会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由一名下士拧开摆在两人之间的一台新型菲律宾收音机。待播报员播报完毕，两人便会返回将军的办公室，简单地讨论一下广播的内容。然后麦克阿瑟就会迈开大步，一边来回走动一边用手摆弄着自己的领带，开始发号施令。

和美国政府一样，马尼拉方面也在密切关注日本的意图，双方还会通过电报互换消息、一同推论。乔治·马歇尔认为日本不敢轻举妄动，因为进攻群岛的风险实在太大。大部分人都不赞同他的看法。罗斯福、国务卿科德尔·赫尔以及史汀生相信入侵是不可避免的——史汀生认为日军会在1942年1月之前动手，威洛比认为是6月，而麦克阿瑟则认为是季风结束后的4月。和往常一样乐观的将军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军营的建设“进度飞快”，菲律宾人的士气也“异常高涨”，而训练进展也在学员们的学习热情推动下“超出了预期”。此外，机场仍在建设过程中，鱼雷快艇也很快就能到位——简单地说，一切都进展得十分顺利。

实际情况并非如此。7月26日，仍没有人考虑给驻菲部队增兵。5天之后，乔治·马歇尔又推翻了这一决定，告诉自己的下属“保卫菲律宾是美国的方针政策”。第二天，麦克阿瑟接到通知，说他的各项要求都将享受“最高优先待遇”。但准备工作的进展还是缓慢得让人十分苦恼。9月26日，“柯立芝总统”号停靠在了马尼拉港口。14个连的美军走下了船舶的踏板。6周之后，缺兵少将的第4海军陆战队也从上海赶来。战争部向麦克阿瑟保证，他们会在1942年2月之前为他补充5万兵力以及可供他们使用7个月的武器弹药。然而，从他7月底走马上任一直到12月7日为止，他手下才增加了6 083名美国常规军而已。除此之外，只有一半的菲律宾士兵驻扎在吕宋岛上，其他人全都毫无用武之地，因为岛内运输业的匮乏简直令人咋舌，而负责保护它的麦克阿瑟的同侪汤姆·哈特海军上将手下只有一支弱得可怜的部队：3艘巡洋舰、13艘驱逐舰、18艘潜艇以及约翰·D. 巴尔克利中尉的6艘鱼雷快艇。

将军自己的装备更是少得可怜。尽管美军国防工厂里悬挂着“只争朝夕”的标语，而且关键工厂还要三班倒地轮流生产，但随着武器精密程度的提升，订货时间也相应有所加长。即便运货的板条箱已经被送到了美国东海岸最大的几个工业港口，依然需要6周的航程才能够到达马尼拉。而且，第192坦克营要到11月1日以后才能起航。虽然一部分装甲车已经到达吕宋岛，但一直到11月底，麦克阿瑟手下近1/3的坦克驾驶员还从没有真正坐进过坦克里。10月下旬，一封战争部的新闻通讯稿这样写道：“按照常规，为了加强岛上驻军的实力，我们将菲律宾即将报废的飞机更换成了现代战斗机。”文中所指的这批飞机由于缺少备用零件而在加利福尼亚滞留了很长一段时间，而它们本应在12月7日那天在檀香山上空与日军的零式战斗机一决高下的。此外，赶在和平时光结束前最后几个月被运送到菲律宾的大部分弹药——包括70%的迫击炮弹——竟然都是哑弹。这些迫击炮本身就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就像即将报废的埃菲尔德式步枪和那些闪亮的廉价遮阳帽一样，它们都象征着麦克阿瑟在担任参谋长的那些年奋力反抗过，却最终让他落败而归的和平主义和孤立主义。

菲律宾唯一的顶级防御工事是位于科雷希多岛上的一条100英尺长的隧道。这条名为马林塔的隧道拥有排水沟、通风设备、电车路线、战地救护站和钢筋混凝土铸成的墙壁。然而，即便是这座被当地人称为“磐石”的工事也难敌从吕宋岛上齐发过来的炮弹和空袭轰炸。整个群岛只有两座雷达站。为了提早预见到靠近马尼拉的轰炸机，麦克阿瑟几乎只能依靠菲律宾人在靠近台湾岛的地方安置的仅仅配备了初级电报机的岗哨。如果马尼拉人能够理解如此粗陋的临时设备会给他们带来怎么样的灾难，全城肯定会陷入一片恐慌之中。实际上，一种不切实际的氛围已经蔓延开来。在得知将军无暇出席招待会时，女主人们个个都是一脸不满。美国人和菲律宾人都在嘲笑东京人建设防空洞的做法，而且似乎对于马尼拉没有任何防空洞的事实表示漠不关心。当上千名日本人在自己的资产被富兰克林·罗斯福下令冻结后离开时，菲律宾人都在拍手叫好。赫西写道：“日本人的疏散和他们当时所做的所有事情一样，都

十分可笑。”

华盛顿方面也同样充满了不切实际的空想。随着秋天渐入尾声，马克·沃森表示：“战争部还是没有意识到时间正在飞逝。”此外，也没有人认识到麦克阿瑟的肩上背着怎样沉重的负担。9月，华盛顿方面还颐指气使地命令他放下手头的一切事务，与英国和荷兰的指挥官商议如何将菲律宾、澳大利亚、新加坡、莫尔兹比港、拉包尔、“婆罗洲”、爪哇以及苏门答腊的防御整合起来——这整片区域加起来比美国大陆的面积还要大。然而，直到10月，战争部里才有人意识到让驻菲美军的新任远东指挥官看一看“彩虹5号计划”，即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争所设计的基本同盟战略。

从第一眼看到这个计划起，麦克阿瑟就对它嗤之以鼻。尽管计划在几经修改之后对菲律宾的一些战略要地——苏比克和马尼拉湾的入口处——提供了一定的防御，但麦克阿瑟还是觉得其中的“保护型”概念太过于“消极主义”。他相信自己有能力将日本人彻底拒之门外，把群岛作为一个大本营来威胁敌人的货运航线。将军准确地预言了日本人可能会试图在林加延海湾登陆、穿越吕宋岛平原中央入侵马尼拉的行动。邻近4月（他仍旧坚信日本人不会发起进攻），他在给马歇尔的信中写道，自己时刻都将处于抵御两栖战的状态。因此，他建议“守卫（整个）群岛及菲律宾沿海边疆”，以及几千英里长的海岸线。

马歇尔同意了，而令人十分惊奇的是，一向不太喜欢麦克阿瑟的哈特上将竟然也同意了。也许他和其他人一样，都深受麦克阿瑟乐观精神的感染。哈特从海军方面接到的指示是，一旦遭遇日军战舰前来进犯，便退往印度洋。如今，他却不顾手下人的建议，要求华盛顿准许他在菲律宾海域与日本舰队正面交锋。他的这一申请起初遭到了拒绝（史汀生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海军是“失败主义者”）。然而，10月18日，马歇尔却告诉麦克阿瑟，他们正在起草一项新的计划。11月，陆海军联合委员会通过了全面防守菲律宾疆域的计划。不过陆军和海军之间的关系至

此还不太明确，将军对此也是心知肚明。他向哈特表示："海陆两军都有各自的作战计划，同时也有着自己的战场。"话虽如此，他自己的战场如今已经很明确了。他吩咐自己的属下，"一定要不惜任何代价守住"滩头，并命令他们"阻止登陆"。一旦敌军抵达海岸，他们的部队就要"出击摧毁登陆部队"。注

这一命令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橙色战争计划以及修订后的"彩虹5号计划"中，军需官都要将补给储藏在巴丹半岛上。如今他们的仓库被建设在了中央平原的4个点上。这是出自麦克阿瑟之手的典型鲁莽策略之一，其缺点也是不言而喻的。通过选择在海岸线上与敌人一决雌雄，他便选择了将一切都赌在开战后的第一役上。如果他败在了战场上，撤退到巴丹半岛上的同盟军在被围攻期间将面临长时间供给不足的问题——也就会处于战争部自1909年以来便一直都在研究的那种被围攻的状态。麦克阿瑟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实不足为奇，令人感到困惑的反而是华盛顿的默许。乔治·马歇尔一向都是个谨小慎微的军人，本应对这样的行为进行更多的约束，但他有两个理由对此置之不理。首先便是麦克阿瑟的性格力量，他的自信蒙蔽了他的批评者——这其中就包括哈特；第二个理由则更加复杂，与那一代的军事领导人试图在空军上进行博弈不无关系。

要想理解这些人此时的想法，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比利·米切尔的军事法庭审判。没有哪个行业比军队更执着于传统。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黑格勋爵嘲笑机关枪是一种"被高估了的武器"，而基奇纳则称坦克是"玩具"。霞飞元帅拒绝让别人在他的总部里安装电话，而潜艇曾经一度被谴责是缺乏绅士风度的武器。毒气在被德国人使用后，也被英国人不情愿地用作了作战手段，并被优雅地称为"配饰"。英国战争办公室曾经两度拒绝使用迫击炮，最终是一位内阁大臣从某印度王公那里筹来款项才引进了这种武器。战争初期，英国的中尉们在跨

过海峡前往法国作战之前都会像亨利五世一样到武器制造商那里去磨剑，而直到1918年，潘兴的补给线上还堆着为无用的马匹准备的成山的饲料。将军本人也仍在梦想着卡斯特和谢里登以及弗吉尼亚的月光下斯图亚特骑士那闪光的马鞍。

从那以后，发明家们每天都会制造出一批叮当作响的致命武器，可那些顽固分子们从未改变过自己嫌恶的眼光。当然，对他们所珍视的传统习俗威胁最大的还是战斗机，因为它不仅改变了时间和空间的概念，还改变了他们的前辈经过几个世纪开发出来的战争策略。在他们的眼中，米切尔的头等罪行并不是不服从命令，而是坚持让他们考虑一种在他们看来无比粗暴的大规模战争。20世纪30年代末，尽管他们已经开始调整自己的心态，但仍对此感到困惑。在航空时代到来之前，科雷希多岛可谓是固若金汤，不然麦克阿瑟也不会如此信心满满。后来，当敌人占领了马尼拉，逼迫他退守科雷希多岛时，他会说“他们也许拿到了酒瓶，但我手里握着的才是瓶塞”，却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的空军正是开瓶器。日本军官们的头脑也不见得有多么清醒。1941年11月10日，海军中将南云忠一告诉自己手下的军官：“我们奇袭珍珠港的胜利将成为即将展开的大战中的滑铁卢。”人们应该很难想象出比这更加糊涂的军事比喻了。作为一个海军军官，南云忠一竟然引用了一场陆地战来形容一场空战。

海军上将是这种变化最大的反对者。他们正在为另一场如特拉法加战役或对马岛战役的海战备战。1905年，在对马岛战役中，东乡平八郎基本上横扫了沙皇的舰队，赢得了日俄战争。1941年，山本五十六大将就扮演了东乡平八郎的角色。他之所以计划突袭珍珠港是因为那里停靠着的94艘美国军舰，其中还包括8艘战列舰。当时，战列舰仍被视为是海上霸王。山本似乎从没有想过自己用来对付美军并带来毁灭性结果的航空武器后来在中途岛战役中会被反过来对付自己。双方都认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是一场海军的较量。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马尼拉湾和金兰湾的港口就完全没有用武之地了。实际上，起落跑道和航空母舰才是最关

键的，然而没有任何一位指挥官能够预见到这一点，包括麦克阿瑟自己。

回顾过去，美国对太平洋局势的战前估计简直令人不可思议。无论是陆军还是海军都没有想到珍珠港会受到威胁——他们认为，突袭珍珠港对于日本人来说太冒险了。和夏威夷相比，乔治·马歇尔反倒认为巴拿马运河的处境更加危险。至于菲律宾，D. 克莱顿·詹姆斯援引当局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之所以不着急为日本空袭做准备，一部分原因是我们的情报评估计算日军战机从台湾起飞后没有充足燃油前来轰炸马尼拉。"他们认为，日本战机只能通过航母到达菲律宾群岛。

然而，1941年间，美军内部开始将对于空军的重视提升到了最高水平。2月，战争部否决了陆军航空兵团用重型轰炸机来加强吕宋岛防御的建议。8月，在罗斯福与丘吉尔就《大西洋宪章》展开谈判期间，英军报告号称"空中堡垒"的波音B–17轰炸机在对德战争中取得了卓越战绩。两周之后，9架重型轰炸机从夏威夷飞往马尼拉，证明麦克阿瑟可以使用空军来加强自身的防御。战争部就此推论，如果能够将足够的B–17和P–40战斗机派往马尼拉，日军就会打消入侵群岛的念头。用陆军航空兵团领袖阿诺德的话来说："所有可供调遣的B–17轰炸机都将被派往马尼拉。"麦克阿瑟下令在马尼拉周边的尼科尔斯机场扩建飞机起落跑道，克拉克机场向北扩建65英里，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机场向南扩建50英里。12月第一周之前，将军将拥有207架飞机（比夏威夷还要多出76架），其中74架是轰炸机。阿诺德甚至准备好了要从夏威夷派12架B–17轰炸机给麦克阿瑟。现在，飞往吕宋岛的战斗机每天都会从加利福尼亚起飞。1942年年初，史汀生相信菲律宾的空中力量已经足够阻挡日本人了。他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他每晚都在祈祷"最大延迟"。

11月15日，欢欣鼓舞的乔治·马歇尔召开了一次特别的秘密会议，向7名华盛顿的通讯记者介绍战况。战争在即，他告诉他们，美军在菲律宾的局势喜人。坦克和枪支正频繁地被运往那里，最重要的是，麦克

阿瑟已经获得了“全世界最高度集中的重型轰炸机力量”。[注]马歇尔称不仅能够保卫群岛，还准备好了对日本本岛发动突然空袭，让那里“如纸片般”的城市陷入火海之中。一位记者指出，B–17轰炸机的飞行距离不足以在轰炸东京后返回克拉克机场。马歇尔声称那不是问题。完全误解了斯大林想法的参谋长表示，苏联人十分乐意准许美国飞行员将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作为基地。

不到两周前，麦克阿瑟接见了自己的空军司令刘易斯·H.　布里尔顿少将。艾利森·因德上校形容这位少将是个“在行动中拥有坚定意志的人”。和史汀生一样，布里尔顿也有记日记的习惯。他事后在日记中潦草地记录道，自己住进马尼拉酒店后便打电话向麦克阿瑟报到，并收到了“立刻上来”的指令。琼和3岁的阿瑟正在酒店的游泳池里嬉戏，而将军正穿着绣有代表陆军的首字母“A”的浴袍，准备为前往专员塞尔家享用晚餐更衣。布里尔顿写道，将军“就像个小男孩一样，急不可耐地想要知道所有的新闻”。他重重地拍了布里尔顿的后背一下，给了他一个热情的拥抱，说道：“好了，刘易斯，我一直都在等你。我知道你会过来，十分期待见到你。我、乔治·马歇尔以及阿诺德经常谈到你。你给我带来了什么？”

布里尔顿留给马尼拉陆军总部保管的公文包里有一封马歇尔的密函。麦克阿瑟本打算派人去取，随后又改变了主意。“明天早上8点钟到我的办公室来。”他吩咐道。第二天，当布里尔顿到场时，发现萨瑟兰也在那里等待。麦克阿瑟撕开了标注着“麦克阿瑟将军亲启”字样的信封。读过之后，布里尔顿记录道：“他就像个刚刚听说学校要放假的小男孩一样从办公桌后面跳了起来，抱着我说道：‘刘易斯，你就像5月的鲜花一样讨人喜欢。’　说罢，他又转过身去对自己的参谋长说道：‘迪克，他们愿意满足我们的一切需求。’”

可事实并非如此。在对他的滩头作战策略表示赞许之后，马歇尔在信中承诺为他提供坦克、飞机和步兵团——这似乎已经足够保证群岛的

安全——但一切的基础都是假设战争在明年4月之前不会爆发。这正是麦克阿瑟的预期，而马歇尔也表示赞同。负责空中防御的布里尔顿对此却不是那么乐观："麦克阿瑟将军的心里十分清楚应该怎么做。不过，事实上我们并没有组织实施项目所需的全部装备、资金和人力。整条战线都只能随机应变……我们既没有P–40的任何备用零件，也没有'空中堡垒'所需的多余垫圈和螺母，更没有适用于战斗机或轰炸机的备用马达。我们手头有的只不过是能供飞机开始初级维修与维护的少量工具而已。"

一周后，麦克阿瑟给布里尔顿下达了唯一的一项任务。作为一位关键军官，布里尔顿的时间是十分宝贵的。那么该如何充分地利用他的时间呢？考虑到菲律宾军用机场的状况，改善这些机场变成了他的首要任务。菲律宾只有两座机场能够起降重型轰炸机，而尼科尔斯机场的跑道还需要加长。吕宋岛北部的阿帕里和维甘海滩跑道以及南部的黎牙实比机场只能用于紧急降落。除了克拉克机场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拥有防空武器。布里尔顿陷入了麻烦："情形令人失望。即将到来的战争对于大部分人来说不过是件遥不可及的事情。工作时间、训练计划和操作模式还都是依据热带地区和平年代时的状况来运作的。尽管一套完整的机场扩建计划已经起草完毕，但不幸的是自我到来之前一直都没有到位。机场的建设必须通过菲律宾共和国的政府和民用机构才能够完成。"

然而，麦克阿瑟非但没有委派布里尔顿前去解决这些问题，反倒是在华盛顿的刺激之下让他长途跋涉展开了一段空中冒险之旅，前去与美国未来的盟友们建立联系。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布里尔顿往返于马尼拉、拉包尔、莫尔兹比港和澳大利亚汤斯维尔与墨尔本。在飞行了11 500英里之后，他在返回驻地时却得知不用收拾行李，而是直接准备于12月8日再次启程，飞行5 733英里访问雅加达、新加坡、仰光，并赴重庆与蒋介石的空军顾问克莱尔·L. 陈纳德进行协商。然而，这些长途跋涉对再次在日德兰战场上与敌军交锋的美国海军以及重温阿戈讷战役的

美国陆军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马尼拉或华盛顿方面似乎都没有人想到，如果美国飞行员能够飞越如此遥远的距离，那么日本飞行员也可以。

布里尔顿的缺席让美军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由于身处外地，他直到11月21日星期五那天才催促麦克阿瑟把他们的B–17轰炸机从克拉克机场转移到远离日军战斗机攻击范围的德尔蒙特机场去。将军委派萨瑟兰去查看这项任务的进展情况。正在准备第二次踏上旅程的布里尔顿没有意识到只有一半的“空中堡垒”被转移到了南边。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写道：“我永远也不知道这些命令为什么没有立即被执行。”当然，他的工作就是要掌控全局，因此他必须为自己的玩忽职守受到责罚。在他军旅生涯的这个阶段，他还没有意识到空中作战的可能性。但他到了这个年纪还能够温故而知新，不得不归功于他的天赋。

麦克阿瑟的顶层套房上飘扬着两面旗帜——美国国旗和菲律宾共和国国旗。随着冬日的临近，他也将自己的忠诚同时倾注在这两个国家之中。他是美国陆军的现役军人，是美国总统的远房表亲。与此同时，他还是菲律宾总统的至交和这个新兴国家武装部队的第一任元帅。作为世界大国，美国视遏制日本的侵略行为为己任。而菲律宾人与即将到来的战争之间的关系和瑞士与欧洲战争之间的关系差不多。西点军校的校训说得容易：责任、荣誉、国家。但是他应该效忠于哪个国家呢？他的处境和那些中世纪的德国人一样——在试图自杀后才恍然发现对于自杀者的处罚是死刑。自从宣誓效忠马尼拉之后，他便被困住了，无法脱身，也看不到尽头的光明，依然处于被“置于死地”的境地。

麦克阿瑟同时也被紧紧地包围着。日本人的枪从四面八方指向了他。他们控制了西边的中南半岛、《凡尔赛条约》给予他们的东部小岛、台湾岛以及中国大陆海岸和南海海域。麦克阿瑟并不担心自己的安危。他在法国的战绩已经彰显了他是一个无所畏惧的人。但他现在还要

对自己的妻儿、军队以及超过1 500万菲律宾平民负责。如果他不曾祈祷日本人向对待中立国那样绕过这些可爱的岛屿，那就未免太没有人性了。正如他事后向军事历史学家路易斯·莫顿博士以及菲律宾人民解释的那样：“尽管属于美国管辖范围内，但面对战争，菲律宾在许多人的心中——特别是菲律宾人和他们的政府的心中——还是处于含混不清的国际位置上。”乔治·马歇尔猜到了他当时的两难处境，警告他要在“实际的战争”开始时行动起来反抗敌人，而不是坐等宣战。马歇尔提醒道，日本就是在毫无预告的情况下挺进了中国，且东京方面历来就爱发动奇袭。为了赋予麦克阿瑟完整的自由，参谋长授权他乘机到菲律宾海域以外的地方进行侦察任务。然而，当英国要求将军派一架B–17战机侦察金兰湾时——他们怀疑日军正在那里集结军队准备进攻“暹罗”和马来半岛——麦克阿瑟却回复表示战争部禁止他应允这项要求。

这还没有关系。日本人庞大的护航队是无法逃避侦察的。不仅有商船发现了它们的行踪，在中国南海上空执行例行巡逻任务的P–40战斗机也看到了它们。未来看上去十分不明朗。在华盛顿，国务卿赫尔和两名日本外交官之间的和平谈判最终以失败告终。赫尔告诉他们，美国政府在日本撤出中国和中南半岛、退出《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签署多边互不侵犯条约之前是不会解冻日本人的资产的。日本则要求美国放弃中国，不再在西太平洋地区扩大海军势力，并敦促荷兰从东印度群岛为东京方面提供原材料。谈判进入了僵局。国务卿相信对方的使节不过是在拖延时间。他告诉史汀生：“我已经不想再管了，现在是交由你和诺克斯（海陆两军）负责的时候了。”11月24日，华盛顿方面通过无线电通知所有的太平洋司令，“一场突如其来的多方面进攻，包括针对菲律宾或关岛的攻势”可能随时都会爆发。

三天之后，史汀生在马歇尔外出时听闻一大批日本远征军已经从上海起航出发。他建议总统向麦克阿瑟发出“最后的警示”，告诉他“警惕任何袭击”。罗斯福同意了。于是，将军便收到了战争部发来的这样一封电报：

> 从所有产生的实际效果来看，与日本人的谈判似乎已经终结。日本政府应该不可能回头要求继续谈判。虽然日本未来的行动不可预测，但随时都有可能采取战略行动。如果战争不可避免——重申一次，不可避免——美国希望让日本先采取越轨行动。这一方针不应该——重申一次，不应该——被理解为将你限制在会危害防御计划的行动中。

电报中的指示似乎很清晰，但麦克阿瑟觉得其中的意思有些模棱两可。对什么有越轨行为？美国战舰？战斗机？还是任何一片美国领地？已经不再是殖民地且很快即将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能算是美国领土吗？绝望中的他似乎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但他并没有要求华盛顿方面澄清，而是回复“打好成功防御战的准备已经一切就绪”，与海军联手合作，采取措施保障地面安全和进行空中侦察。就在这时，他内心的钟摆又开始摇晃了。布里尔顿请求允许自己“前往台湾南部执行高空拍照任务”，特别是针对高雄地区，也就是第一个有可能发起进攻的日军大型基地。布里尔顿说：“麦克阿瑟表示，考虑到战争部要求他避免任何越轨行为，他不建议我们到台湾上空执行拍照任务，且与海军联手进行侦察时的活动范围也只限于‘吕宋岛北部与台湾南部之间2/3的距离’。”

11月27日，塞尔专员和哈特上将也从华盛顿方面收到了战争警告。当天下午，三个人在专员的办公室里召开了一次会议。塞尔事后回忆道，他们对于“进攻感到越来越不安”。将军和往常一样在屋子里来回踱着步，看上去就像是一只被困在囚笼中的野兽。按照塞尔的话来说：“麦克阿瑟快速地来来回回踱着步，嘴里叼着一根黑色的雪茄，用可靠的话语安慰我和哈特上将，说他相信日军按照目前的阵仗和动向是不太可能在春天到来之前发起进攻的。不过哈特上将的看法和他正好相反。”哈特是对的。一天之前，在高桥伊望中将的“足柄”号旗舰上，一群日本军官召开会议，为入侵菲律宾做足了最后的准备。本间雅晴将军受命在60天之内攻下群岛。就在哈特、塞尔和麦克阿瑟三人开会的时候，即将毁灭珍珠港的特遣队已经飞翔在了公海上空。

布里尔顿在日记里说，第二天，他收到了阿诺德发来的一封急报："当前的危急情况要求立即采取一切防范措施，抵御破坏性的活动。采取行动——保护你的人员不受破坏性宣传的干扰，防止一切间谍行动，预防有人破坏设备、财产和军备设施。"同样的指令也通过无线电被送往了夏威夷：华盛顿方面似乎更加担心间谍而不是日本的战斗机。约翰·托兰写道，"为了确保安全"，瓦胡岛上的飞机"全都机翼对着机翼紧紧地串在了一起，以防希卡姆、贝洛斯和惠勒机场遭人破坏"。在麦克阿瑟的首肯下，布里尔顿也如法炮制。第三天——也就是11月30日星期日——将军对于恶战即将展开的时机有了新的想法，下令让科雷希多岛上的军队进入戒备状态。一大堆写满不祥预兆的报告在他的办公桌上垒成了小山。他事后写道："我知道侵略者会从北方毫无征兆地迅猛南下，于是让我薄弱的军队做好了尽可能还击的准备。"

万事俱备。12月1日星期一，就在阿诺德将希卡姆机场里所有的B–17轰炸机都被派往菲律宾这一天，有人在克拉克机场附近发现了身份不明的战斗机。星期二黎明前后，一架日本侦察机飞越了克拉克机场上空，而麦克阿瑟的两套雷达设备之一——位于马尼拉西北85英里处伊巴机场内的雷达——还追踪到了吕宋海岸附近的其他一些陌生飞机。布里尔顿的拦截机指挥官哈罗德·H. 乔治说："我猜他们已经建立起了距离数据——也许是从台湾出发后的指定集合地点。"星期三，战机再一次在黎明时分出现。乔治闷闷不乐地表示："他们现在已经万事俱备了。下一次就不再花时间和我们兜圈子——直接就不请自来了。"

然而日军并没有采取行动。星期四，布里尔顿的P–40战机开始在吕宋岛上空进行夜巡，并侦察到了一个日本战机编队，由9~27架战斗机组成，所在位置距离林加延湾海岸不到20英里。布里尔顿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推断起来，他们应该是在试飞，以便熟悉空中路线。"星期五，当英国海军中将托马斯·菲利普爵士到达新加坡与麦克阿瑟和哈特就加强兵力一事进行磋商时，伊巴的雷达上又出现了几个物体光点。尔后，P–40战机在距离海岸55英里的地方遇到了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对方在察

觉自己已被美国飞行员发现之后扭转方向朝北飞去。

星期六，麦克阿瑟命护卫队加倍防守军用机场，并加强了驱逐机（歼击机）对于菲律宾沿岸的巡逻。所有的岗哨都必须有人24小时值守，并疏散了停放在地面上的飞机。（他们大大方方地保持着列队。）伊巴机场的雷达系统又捕捉到了新的物体光点。布里尔顿见状即刻召开了会议。一位观察员评论道："他的眼神坚毅固执，下巴上的肌肉在两腮的位置聚拢了起来。他只说了区区几个字——战争迫在眉睫。"当天下午，汤姆爵士（他在4天后遇难）启程前往马来半岛。他是空手离开的，美国人既没有富余的人手也没有多余的武器。麦克阿瑟召开了一次非正式的新闻发布会，并在会上向记者们宣布了战争即将到来的消息。但据当时在场的克拉克·李回忆，将军如今"认为战事将在1月1日之后展开"。

星期日，12月7日——也就是夏威夷的12月6日——黎明时分的天空澄净而又清凉。傍晚晚些时候，身份不明的战机再一次出现在克拉克机场上空。就在同一天的下午，罗斯福总统亲自出面呼吁裕仁天皇避免战争，却终究还是一场徒劳。布里尔顿潦草地在日记里写下了类似"无望"的字眼。身居华盛顿的乔治·马歇尔从被截取的信息中得知日本使者在几个小时之内即将向赫尔递交一份最后通牒。东京方面也已经下令让两名外交官销毁他们的编码机。马歇尔亲手写了一封急件，将这个消息告诉了麦克阿瑟和在夏威夷的司令沃特尔·肖特中将。也许是由于马歇尔和麦克阿瑟一向不和的缘故，这封急件"不幸地"被放错了地方，而参谋长在离开战争部办公室前又忘记确认这封急件的内容是否已被发出，而且与太平洋地区的无线电又中断了。当一位信号官终于通过西联公司将它发送出去时，一切都为时已晚了。

在欧洲人和美国人修建的老式热带住宅中，至今仍能够找到专门抵御台风的房子。这些房子在建筑应力原理广为应用之前修筑，一般拥有

厚厚的围墙，并建在围成的院子的中央，在暴风雨过去前，能够为里面的居民遮风挡雨。有人直观地将这种区隔的方法用在了思考的过程中，在危机中为自己的思绪寻找一处避风港。麦克阿瑟的头脑中就有这样的一个房子，而他现在正待在里面。萨瑟兰注意到了这一点，琼也有所察觉。小阿瑟却不然，因为他每天早晨依旧会摇摇摆摆地走进父亲的卧室里，看着将军在床边立正站好、迈开正步，然后等待他拿出一个玩具，并趁他刮胡子的工夫和他一起唱歌。然而，麦克阿瑟的眼中此时却有了一种疏离感。他看上去有些心不在焉。除了儿子之外，他在任何人面前都常常保持着沉默。而且，他还总是站在那里来回地踱步，双手插在裤子的背后口袋里，微微驼着背，齿间叼着的雪茄看上去就像一把武器。

我们可以想象，他在12月7日星期日那天傍晚迎着晚霞站在自己最喜欢的露台上的画面。又是“蓝色时刻”，但在准将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所在的9 000英里之外的休斯敦堡，时针才刚刚跨过凌晨3点。还在熟睡的他对于美国大众来说还只是个默默无闻的人。在当时出版的一份报纸的标题中，他的名字甚至被错印成了“D. D. 艾森比恩”。

麦克阿瑟走到露台的一角，转了个方向，又开始快步朝反方向走去。

在他脚下遍植棕榈树的宽敞酒店大堂里，记者们已经轮番询问过了维持和平的可能性。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人都相信战事已经一触即发。吧台旁，刚刚打完一轮高尔夫球的悉尼·赫夫心情不错。他有3艘鱼雷快艇已经下海了，还有两艘也基本上准备好可以命名下水。不久，约翰·巴尔克利还将和他共商联合鱼雷快艇部队的事宜。在附近酒店的凉亭里，流行乐队正在演奏音乐。酒店的宴会厅里则在准备接待为布里尔顿筹办派对的第27轰炸机兵团的1 200名飞行员。负责安排这场派对的委员会军官承诺这将是“这边最好的消遣”，而观众中还有克拉克机场的17名B–17轰炸机飞行员。他们已经两次接到飞往棉兰老岛的命令，以离开敌军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但他们的行程却因今晚的这场欢宴而拖延了

下来。这位贵宾将提早离开——他计划于明天一早飞往爪哇——但剩下的飞行员们，包括“空中堡垒”的机组成员，一直欢庆到马尼拉时间凌晨2点时才散场。那时夏威夷已经是12月7日早晨的8点了。

站在露台远端的将军又踱了一圈，转身走了回来。

位于马尼拉东部4 887英里外的凤凰群岛上，8艘满载着飞机、坦克和美军步兵团的美国舰船正乘风破浪地朝着马尼拉驶来，旁边还伴随着重型巡洋舰“彭萨科拉”号。

麦克阿瑟站住脚，转过身来。

在距离他1 300英里的西南方，3支大型的日本运兵护航队正载着山下奉文将军的第25军朝着马来半岛聚集。

将军还在踱步。

珍珠港以北200英里，航母机动部队正全速前进——24海里/小时——朝着登陆点进发。日本飞行员穿着兜裆布，戴着象征幸运的“千针带”。其他地方的日军也一举攻下了关岛、威克岛和香港。

将军依旧在踱步。

在台湾岛和澎湖列岛，本间雅晴将军率领第14军的43 110名士兵正准备登上85艘运输舰，起航前往吕宋岛。

踱步，踱步。

此时正是马尼拉闷热的黄昏时段。略带紫色的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在逐渐昏暗的光线笼罩下若隐若现。一阵颤抖声中，顶层套房里的仆人们降下了两面旗帜，并把它们一一卷好。

踱步，踱步，踱步。

套房的金色大厅里，琼听到时钟在5点30分时鸣响起来。“蓝色时刻”结束了。伴随着稍纵即逝的热带暮色，太阳躲进了甲米地的山峦之中，黑暗将城市和海湾全都笼罩在了一种原始的恐惧阴影之下。

---

1. 作为一个极端自负的人，麦克阿瑟一直认为任何人离开他的指挥都是个错误。1943年，当海军陆战队第1师从他的战区被调往尼米兹的战区时，他就曾经对师长说过：“你知道，第1师在中央太平洋上只不过是6支海军陆战队之一（1/6），（但是）如果你们留下来，它就是我的（整个）海军陆战队。”
2. 在回忆录中，麦克阿瑟误将自己的收信日期写成了5月29日。
3. 艾森豪威尔同意麦克阿瑟的看法。在离开马尼拉之前，他向奎松提交了一份军事评论，预言日本侵略军的“规模有限”，并下结论说“有且只有一条战线能够让守军在面对任何地面进攻时享有无尽的优势。这条战线就是海滩。在战争中要想成功地打入一片防御森严的海滩是最困难的……因此在海滩上一定能够挫败敌军”。
4. 事实上，光日本海军就有2 274架战斗机。

第五章
撤退
1941~1942

马尼拉，凌晨3点刚过几分，电话铃便响了起来。此时，日军的最后一个飞机编队刚刚离开美国亚洲分舰队的废墟上空。哈特上将是驻菲美国指挥官中第一个听闻这场灾难的；赫斯本德·E. 金梅尔上将从火奴鲁鲁给他发去了一封电报，其内容与他给华盛顿方面以及海上所有战舰所发报告一致：“珍珠港遭突袭。这不是演习。”出于海陆两军之间的典型关系，哈特并没有把这一重要信息通报给麦克阿瑟等陆军军官。[注]半小时之后，一名应征入伍的陆军信号兵在执勤时从加利福尼亚的广播中听到了通讯社发出的第一则简报。他冲出去找到执勤长官，而后者则赶紧通过电话把这一消息通报给了麦克阿瑟的信号兵主任斯潘塞·B. 埃金准将。埃金直接奔赴维多利亚大街1号，找到了正在帆布床上休息的萨瑟兰、萨瑟兰的助理理查德·J. 马歇尔准将以及工程兵主任休·“帕特”·凯西上校。“帕特，帕特——醒醒。”埃金小声叫醒了凯西，“日本人刚刚轰炸了珍珠港。”三个人全都从床上坐了起来。埃金把自己所知的仅有

一些信息悉数告诉了他们，萨瑟兰随即拨通了麦克阿瑟顶层套房的电话。

将军接起了摆放在床头柜上的电话。“珍珠港！”他震惊地喊出声来，“那里应该是我们最坚固的据点！”凌晨3点40分，就在他手忙脚乱地更衣时，床头柜上的电话再一次响了起来。这一次是华盛顿方面打来的。陆军战争计划处主任伦纳德·T. 杰罗准将向他证实了这个消息。将军事后表示，自己听说“日本在珍珠港遭遇了挫折”，但战争部对于这段对话的记录显示，杰罗在向将军汇报时提到夏威夷的飞机和军事设施遭到了“严重损毁”，并表示“你近期也有可能受到攻击”。这也许是由于当时的通信信号不好，但更有可能是由于将军和上百万其他美国人一样仍处于震惊之中。他让琼为他取来了《圣经》，读了一会儿，然后出发前往已经陷入混乱之中的“墙上屋”。

早已到达的哈特一脸愁容。塞尔也一样——他的行政助理克劳德·巴斯在接到萨瑟兰的电话后直接冲进了他的卧室。布里尔顿正在从尼尔森机场赶往位于维多利亚和圣卢西亚大街交会处的路上，准备前往坐落在一座古老建筑中的军事广场总部。那里距离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只有几步之遥。布里尔顿是在不到凌晨4点钟的时候被萨瑟兰的电话吵醒的，于是赶紧下令，警示自己手下的飞行员——他们中有不少人刚刚才从酒店的派对中返回。就在美国人开始整编集合后的一个小时，身处碧瑶市的奎松也被留守马尼拉的秘书豪尔赫·B. 巴尔加斯打来的电话叫醒了。透过无线电，奎松问道：“你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胡话？”巴尔加斯回答，美联社和合众社都收到了有关珍珠港事件的详细信息。奎松准备启程从碧瑶市返回马尼拉。就这样，所有的重要人物全都聚集在了一起，目睹了美国军事史上最奇怪的一章：就在噩耗从夏威夷传到麦克阿瑟耳边9小时之后，他的空军在地面上被敌军摧毁了。

鉴于解开这个谜题的关键全都在将军身上，我们可能永远也不会知道事情的真相。即便他身边的人形容他当时面如土灰、无精打采、筋疲

力尽，我们却还是无从得知他在那个可怖的早晨都做了些什么，又想了些什么。作为指挥官，他自然应该为所发生的一切负责。然而，厘清责任并不能澄清事实。作为一位颇具天赋的领袖，他在面对此等紧急事件时的失败自然令人感到困惑。批评他的人引用这场灾难来指责他的不完美。他们是对的，他并不完美。但他在这一方面也有不少的“榜样”。拿破仑在滑铁卢一役的当天早晨发作了紧张性头痛；道格拉斯·S. 弗里曼在书中提到，华盛顿在布兰迪万河战役过程中一直都“神情恍惚”；在白橡沼泽的关键交战过程中，伯克·戴维斯写道，“石墙”杰克逊“神情迟钝地坐在原木上，帽子盖在鼻子上，双眼紧闭……那一天是杰克逊军旅生涯中的低点，可没有人能够对将军那几个小时的行为做出彻底可信的解释”。与拿破仑以及华盛顿相似，“老杰克逊”也曾经错失下达命令的机会，甚至一度无法理解被送到自己手中的报告。1941年12月8日，上述情景似乎重现在了麦克阿瑟的身上。一个计算机术语也许可以解释这一谜团：输入超载。如果电子计算机接收了太多的数据，机器便会停止运转。发生在夏威夷的灾难以及马尼拉当前所需采取的行动决定已经超出了麦克阿瑟所能承受的负荷。哈特正在为自己的舰队发愁，布里尔顿也在烦恼如何让自己的飞机抵御威胁，奎松则在恳求他让菲律宾保持中立——这些急迫的要求全都在黎明到来之前于纷乱之中压在了他的身上，而本应成为他最得力助手的参谋长萨瑟兰却根本派不上用场。

在那些在黑夜中毫无目的地乱转、叫嚣着要尽快采取行动的所有军官之中，有一个人理应获得优先权——那就是布里尔顿。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事，麦克阿瑟的策略是在敌人到达菲律宾海滩之前摧毁他们的入侵驳船。凌晨5点钟，距离日出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布里尔顿来到了麦克阿瑟的办公室，向萨瑟兰求见麦克阿瑟。参谋长表示将军现在很忙，他正在和哈特交换意见。布里尔顿说：“我要进攻台湾岛。”他的这一番话引起了不小的争论。据萨瑟兰回忆，他当时反问布里尔顿：“好吧。你打算进攻哪里？那里又有什么？”参谋长描述，布里尔顿表示他也不太清楚，因此需要安排一次侦察，好一探究竟。萨瑟兰表示自己愿以麦克阿瑟的名义批准这一行动。布里尔顿对于此事的记忆却与他不尽相

同。据布里尔顿回忆，他要求获批立刻派遣B–17轰炸机袭击敌军有可能停靠在高雄港的运输船。克拉克机场的一批“空中堡垒”轰炸机起飞后，另一批同型号轰炸机可以从棉兰老岛起飞，进行第二次突袭。布里尔顿记得参谋长劝阻他在麦克阿瑟为他们开绿灯之前切不可轻举妄动，理由是华盛顿方面禁止他们采取任何“进攻行为”。

沃尔特·D. 埃德蒙兹相信，后来发生的事情全都源于“布里尔顿在与萨瑟兰进行第一次商讨时双方各执一词”。如果事情的前提是布里尔顿只能通过萨瑟兰才能与麦克阿瑟接触，那么事情就还说得通。4个月后，将军在一份澳大利亚的报纸上读到了一则消息，说他的菲律宾空军指挥官想要先发制人地使用B–17轰炸机突袭台湾岛南部。他表示，这是他第一次听说这件事情。也就是说，在毁灭性的12月8日那一天，将军甚至都没有见到布里尔顿。布里尔顿本应坚持要求和将军见面，在重要决定逼近时撇开想要热情地充当将军代理人的萨瑟兰。此外，需要侦察一事也并非情有可原。萨瑟兰本就不该提出“那里有什么”这样的问题。敌军对于菲律宾的机场具体在什么位置了解得一清二楚。麦克阿瑟事后承认：“日军知道该从哪里进攻……早在发起进攻前一年，他们就提前对吕宋岛北部进行了大面积的航空调查。”对于附近的日军基地，美军也本应掌握着类似的可靠情报。若不是麦克阿瑟否决了布里尔顿早先想要进行拍照勘察的申请，他们早就对敌情了如指掌了。路易·巴斯德说：“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在这个事例中，机会就没有青睐毫无准备的菲律宾守军们。后来，克莱尔·陈纳德在记录吕宋岛的溃败时写道：“如果我的飞机在还没有起飞前就在地面上被敌人摧毁了……我可能永远都无法直视自己下属的眼睛。”毋庸置疑，身处马尼拉的这些军官——尤其是麦克阿瑟——都应该为此受到谴责。但他们并不是唯一的罪人，毕竟是华盛顿方面将美国最强大的B–17轰炸机部队送往了缺乏兵力保护、雷达设施和防空火炮的菲律宾群岛地区的。

5点30分，就在麦克阿瑟坐在鹅颈式台灯下研究令人沮丧的情报报告时，战争部发来了一封无线电报，正式通知他美国和大日本帝国已经

开战，命他立即执行“彩虹5号计划”。然而，他还在犹豫。事后，他在和路易斯·莫顿提及此事时坚称：“我的指令很清楚，不能采取任何会挑起美日战争的行动。”不幸的是，他和奎松在那天早上的通话并没有被记录下来。虽然两人都没有承认过，但共和国总统对麦克阿瑟是颇有影响力的。据艾森豪威尔回忆，奎松1942年时曾经告诉过他：“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后，麦克阿瑟不知为何竟会相信只要菲律宾保持中立便不会再遭到日本的入侵。因此，他拒绝了布里尔顿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立即前往台湾岛轰炸日军基地的要求。”在大众面前，菲律宾领导人从一开始就表示会支持将军的决定。不过，约翰·巴尔克利认为：“奎松并不相信日本真的会挑起战争。在日本人空投炸弹之前，他一直都在坚守着沿岸3海里领海原则。是奎松加剧了事态的恶化。”

“整个星期一……”塞尔写道，“我们都在疯狂地工作。”尽管大家都热情高涨，但到底完成了多少任务就另当别论了。6点12分破晓前后，这些菲律宾的守护者仍处于混乱状态。美军的战舰仍没有起锚，部队也未收到任何的指令，而克拉克草地机场上那些喝得醉醺醺的飞行员头顶上连一座防空掩体都没有。布里尔顿早已下令B–17轰炸机做好战斗准备，但炸弹舱里连一颗炸弹都没有装。在第一束橄榄色的黎明之光照进马尼拉时，人们听闻达沃湾的马拉加遭到了敌军飞机的袭击。可“墙上屋”却没有做出任何回应。

实际上，这一次的突袭还算不上是什么重头戏，也许只是从航母起飞的飞机发起的，因为距离菲律宾北部500英里处的台湾岛正笼罩在一片浓雾之中。对于日本飞行员来说，这段时间着实令人感到焦虑。他们心里清楚，吕宋岛上的美军应该已经因突袭夏威夷的事情而提高了警惕，可浓雾却摧毁了他们奇袭菲律宾守军的最后一次机会；美国的轰炸机现在随时都有可能炸毁他们的运兵舰。战后，一位驻扎在台湾岛的日本高级军官在接受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委员会调查时表示：“我们很焦急，因为我们确信你们在听闻珍珠港事件之后便会采取分散计划或是袭击我们在台湾的基地。我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准备迎接美军战斗机的到

来。”

7点15分，布里尔顿再一次走进了萨瑟兰的办公室，不料对方依旧让他返回自己的办公室待命。布里尔顿断然遭拒后，两件重要的事情发生了：阿诺德从华盛顿给他打来电话，让他分散自己手下的战机，不要重蹈珍珠港事件的覆辙；而伊巴机场的雷达显示屏上也出现了飞往马尼拉和克拉克机场方向的不明身份的飞机。36架P–40战斗机仓皇起飞拦截敌机。布里尔顿还下令让停靠在克拉克机场的其他17架“空中堡垒”即刻升空——其中一架有发动机问题——漫无目的地在阿拉亚特山巡航，以逃避敌机的打击。杰罗从战争部发来第二封重要电报，询问麦克阿瑟是否察觉到了任何“袭击的征兆”。将军回信表示，“在过去的半个小时之内，我们的无线电探测器在距离海岸约30英里处发现了敌军的飞机”，美军的战斗机将与他们“正面交锋”，而且此刻“已经起飞”。

出现在伊巴机场显示屏上的物体光点消失了。日本海军飞行员突然掉转了方向。发现这只不过是虚惊一场之后，美军飞行员放松了警惕，其中有些人甚至以为珍珠港事件是一场骗局，意在测试他们是否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前去执行拦截任务的P–40战斗机降落之后，B–17轰炸机仍在按照原计划飞行。8点50分，萨瑟兰打电话通知布里尔顿，表示美军“目前”不会打击台湾——搅得局势更加混乱不堪。10分钟后，这位空军上将又把电话拨了回来，要求对方批准自己装备炸弹舱。事后，萨瑟兰否认自己曾经接受过这样的请求，可某空军士兵当天早上9点钟的日志内容却显示，“作为对布里尔顿将军所提要求的回应”，他接到“萨瑟兰将军的信息，建议此次不授权战斗机装备炸弹”。

此刻，距离珍珠港事件爆发已经过去了6个小时。麦克阿瑟的好运仍在持续，但他的不作为让人越来越困惑。9点25分，布里尔顿听说日军舰载战机已经轰炸了打拉、土格加劳和吕宋岛北部的海约翰军营，并认为这就是将军所说的“越轨行为”。在拨通萨瑟兰的电话后，他指出：“如果克拉克机场也遭到袭击，我们就无法发动反击了。”他提出，

自己的飞行员必须躲开即将到来的敌军进犯。参谋长拒绝了他的请求。10点10分，萨瑟兰打电话回来，批准他前往台湾进行拍照侦察工作。就在急忙为这次侦察做准备的过程中，布里尔顿接到了麦克阿瑟亲自打来的电话，批准他在获取图片信息并进行评估后于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打击日军基地。将军否认自己曾经和布里尔顿进行过这段对话，而萨瑟兰也说傍晚的这次袭击是布里尔顿在自作主张。虽然我们如今已经无法探知其中的真相，但考虑到这些将军的资格和经历，这话听起来实在是有些模棱两可，在这一关键时刻更是暗示着罪恶的冷漠。直到11点钟，萨瑟兰才再次打来电话，吩咐布里尔顿告知下属"轰炸任务"已经得到了授权。

隐藏在阿拉亚特山另一侧的"空中堡垒"机群接到了指挥密电，准备升空飞往克拉克机场。陆续降落之后，其中的3架战斗机被装上了照相机，而其余的则分别背上了重达100磅和300磅的炸弹。如今，危机已经到来。直到这一刻，布里尔顿的情绪一直都很振奋。然而，随着正午临近，他却开始变得愈加踌躇起来。11点55分，面对萨瑟兰要求他提交一份进度报告的要求，他只是简单地回复空军将于"下午派出机群执行任务"——好像他有的是时间似的。紧接着，他又错上加错地召集P–40返航回来加油，导致克拉克机场在最需要的时候却没有战斗机可以进行防备。唯一留守机场的美军飞机便是一架发动机正在接受维修的B–17轰炸机，而它的机组成员也是此刻处境最安全的驻菲飞行员。早在30分钟以前，台湾岛上空的浓雾便已散去。一大群日军战斗机（108架新型三菱轰炸机和84架零式战斗机）正呼啸着飞越分隔菲律宾最北部与台湾岛之间的巴士海峡。

尽管此刻的麦克阿瑟有些麻木，但他才是所有人中最应该意识到危险即将降临的人。他怎么可能没有想到呢？对此存在好几种解释，只不过没有一种能够解释得通。而其中之一便是将军根本就没有觉察到发生在吕宋岛北部的这次小型突袭。然而，布里尔顿、萨瑟兰、奎松和塞尔早在几个小时以前就已获知这一消息；作为他们的指挥官，麦克阿瑟肯

定第一时间就对此有所耳闻。一位熟知麦克阿瑟的历史学家表示，麦克阿瑟对菲律宾人希望日本能够放过他们的国家这一心愿的同情表明，他不想让他们对哪个大国才是侵略者这件事存在任何的疑问。“麦克阿瑟知道，如果他现在走错这一步，那么之前精心建立起来的本土自卫计划就土崩瓦解了。”然而，早上7点钟不到，奎松便将一篇手写的声明递给了菲律宾《先驱报》的一名女子：“关键时刻已经到来。我期待每一个菲律宾人——男人和女人——都能够担负起自己的职责。我们已经以名誉担保要站在美国这一边，无论发生任何事都不会辜负它。”这段话一遍又一遍地通过KMZH广播电台的电波播送出去。每一台收音机都能够收听到，包括将军办公室隔壁那间低矮天花板房间里的那一台。

政治家和将军这类伟大领袖是很少承认错误的。和大多数人相比，麦克阿瑟几乎就没有担心过自己的判断力。正如他后来所说的那样，他常有充足的理由相信自己。然而，那一天情况就有所不同了。一些正在维多利亚大街的官邸中劳碌的军官听说将军认为敌军会发动伞兵攻击。麦克阿瑟从未承认自己做出过如此古怪的推测，但直到暮年他都一直相信对他发起进攻的零式战斗机不是从台湾飞来的，而是从敌军的航母上起飞的。他脑海中有关那一天的记忆因为他对属下的保护欲而变得格外复杂，就连布里尔顿的回忆都与他的相去甚远。将军曾经告诉过自己战时的军医罗杰·O. 埃格伯格，说他相信一名士兵身上的品质按重要性排序依次是忠诚、勇气和智慧。他补充道：“我所说的忠诚，不仅是针对上司的，也是针对下属的。”对于下属的这份忠诚使得他委婉地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11点45分忽闻来报，日军战斗机编队正来势汹汹地接近克拉克机场。我们的战斗机升空与其正面交锋，无奈轰炸机动作较为迟缓，损失惨重。坦白而言，我军力量太过渺小，实在无力抵抗。”

然而，事实却远比这段描述更加耻辱。正午之前不久，伊巴机场唯一的雷达探测器开始捕捉到了一支庞大飞机编队的物体光点。据屏幕显示，这支编队正呈V字形朝克拉克机场靠近。很快，在吕宋海岸值守的菲律宾瞭望员便看到了敌机。据海岸瞭望员重新回报，有近200架日军

敌机正在2.5万英尺的高空飞行。这一警示消息通过电传打字机、无线电以及电话递往克拉克机场。然而，克拉克机场的电传打字机操作员和其他B–17及P–40飞行员一样正在吃午餐，因此并没有收到信息。而静电干扰（也许是日军的伎俩）也使得无线电信息成了乱码。一位空袭警报军官终于找到了克拉克机场的一名中尉。由于信号太微弱，中尉承诺“一有机会便尽快”将这个消息转发出去，却再也没有去理会它。而这也是雷达最后一次有机会提醒守军。伊巴机场上空，54架三菱轰炸机和56架零式战斗机离开了编队，向机场唯一的一条草地起落跑道以及旁边的小型无线电广播室发起了猛攻。星期一的厄运仍在继续。刚刚前往中国南海执行完巡逻任务的美军空中分遣队此时已经没有多少燃油。16架P–40战斗机要么停靠在草地上，要么正准备降落，因而全都被炸得粉身碎骨，连同雷达探测器一起化为灰烬。

位于伊巴机场以东40英里处的克拉克机场是日军此次的主要袭击目标。一架正在空中飞行的B–17轰炸机看到一股有如暴风雨般的敌机机群正朝机场方向逼近。当时正值中午12点10分至12点35分前后，地面人员刚刚吃过午饭，正在四处闲逛，要么在抽烟，要么在观看刚刚完成台湾侦察任务的3架B–17轰炸机停入指定位置。此时，调度室里传出一阵狂笑的声音，一名中尉冲到了门口。KMZH的广播员唐·贝尔刚刚宣布：“一则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日军正在轰炸克拉克机场。”一阵嘲笑和嘘声过后，飞行员们的耳边响起了被某幸存者事后形容为“低沉的咆哮”的声音。声音越来越大，引得他们纷纷抬头观看。“海军来了！”有人喊道。一位中士用小型照相机对准了第一支排列成V字形并且已经降至2.2万英尺高度的三菱轰炸机编队。一名飞行员问道：“他们为什么要往下扔锡箔？”紧接着，刺耳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一名领航员喊了起来：“那不是锡箔，是该死的日本鬼子！”听罢，所有人都四散开来寻找狭长掩体，可什么也找不到。高射炮炮兵朝着自己的武器飞奔过去，但勉强发射出来的几颗陈旧炮弹全都在2 000~4 000英尺的低空便炸开了，根本就没有击中目标。P–40战斗机的飞行员们也跳进了驾驶座舱，可只有4架得以成功升空。

正如日本人在战后对审讯者所坦白的那样，他们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竟会有如此好运。他们的猎物就那样静静地聚在一起，翼尖几乎彼此相碰。3架等待起飞的“空中堡垒”是最先被炸毁的，彼此之间相差不到几秒钟。敌军分三批进攻：重型轰炸机、俯冲轰炸机和战斗机。摆尾飞行的炸弹固然可怕，四处扫射的零式战斗机造成的破坏却更为严重。这些低飞的战斗机用曳光弹引爆了一个又一个燃料箱。而随着燃料箱的爆炸，调度室、机场总部和战斗机控制室也都被付之一炬。下午1点37分，当最后一架日军飞机呼啸而过时，克拉克机场已经面目全非了。所有的机棚全都被焚毁，停在地面上的飞机也都只剩下烧焦的骨架；燃烧的油料冒出的黑色浓烟直冲云霄，即便在远处的马尼拉也能看得一清二楚。此时，琼和3岁的阿瑟正站在杜威大道5层公寓里目瞪口呆地静静看着这一幕。

星期三这一天，这对母子站在顶层套房的另一座阳台上，目睹了位于马尼拉西南部8公里处的甲米地美国海军大型基地在80架三菱轰炸机和52架零式战斗机的狂轰滥炸之下被夷为平地。至此，美国飞行员只能象征性地反抗日本人的侵袭了。日军的飞机在吕宋岛上四处投射炸弹、扫射目标：尼科尔斯机场、尼尔森机场、圣费尔南多机场、拉乌尼翁、罗萨莱斯和维甘。美军的地勤人员士气极其低落，以至于最后的两架P–40战斗机试图在满目疮痍的克拉克机场降落时竟被美军自己的机关枪击落。用阿诺德的话来说，美军在“几个小时之内”就“损失了在菲的大部分飞机——几乎所有的B–17轰炸机和大部分的战斗机全都损失于地面上”。也就是说，日本仅付出了微不足道的代价（7架战斗机）便移除了向南扩张过程中的两大障碍，其中之一便是甲米地。星期三下午早些时候，日军的鱼雷轰炸机击沉了停靠在马来半岛的英格兰“威尔士王子”号和“驱逐”号舰船，印证了比利·米切尔的“空军”概念。

此举让汤姆·哈特下定了决心。站在距离琼和阿瑟附近不到400米的

圣卢西亚大街马尔斯曼大厦二楼，哈特抑制不住地气得浑身发抖。一个仆人前来报信，说汤姆·菲利普斯爵士和他的司令部已经沉入了水底。同盟国部署在夏威夷西部的两艘主力军舰就这样被摧毁了。哈特后来足足花费两周时间才得以将自己的总部搬到“荷属东印度群岛”，不过他当时便已告知弗朗西斯·W. 洛克威尔少将自己决心要走。

再一次手握全军指挥权的麦克阿瑟将军大惊失色。他本指望着哈特能够维护海上运输航线的畅通，方便他运输军队和补给，何况海军在战争爆发时派往夏威夷的“彭萨科拉”号巡洋舰被改道送往了他这里的消息早就让他兴奋不已了，而护航舰队也正按照罗斯福总统的指示途经澳大利亚的布里斯班赶往菲律宾。然而，哈特上将坦率地预言护航舰队永远也到不了马尼拉。哈特表示，日本人已经封锁了菲律宾。麦克阿瑟认为那只不过是“纸上封锁”。哈特并不同意他的看法，于是便被指责是在散布恐怖心理。将军还通过电报告知马歇尔，如果美军还打算挽救西太平洋的话，就必须拯救马尼拉，而且刻不容缓。在另一封发往华盛顿的电报中，他辩称，一旦菲律宾人发现自己被遗弃了，群岛的社会和政治体系便会崩溃。他在电报中写道：“菲律宾战场正是成败所在。”挽救群岛就能证明美国在“空军和其他资源方面的全部投入”都是合情合理的。然而，海军的支持对于这个策略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可海军作战部部长哈罗德·R.　斯塔克已经得出结论，认为菲律宾局势注定回天乏术。已然失去制空权的麦克阿瑟眼看就要丧失制海权。事后，他对此痛心疾首地写道：“海军被珍珠港事件吓破了胆。”他相信，在美国亚洲分舰队向西突围“抄近路来为被困的我军解围”时，海军上将们“根本就没有做出任何努力保障我方供给线的畅通”。

此情此景之下，他只不过是拒绝相信这一切而已。而就像我们即将看到的那样，华盛顿方面的高级官员也附和了他的这一错觉。他仍旧固守着乐观主义精神的本质，将克拉克和伊巴的悲剧抛在脑后。周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已经成功地压抑住了内心对于妻儿安危的重重顾虑。当然，他是从不会担心自己的。他顾不得戴上帽子，跨着大步站到了维

多利亚大街上，数起了飞翔在城市上空1.7万英尺的三菱战斗机机群。“55架。”他低声对悉尼·赫夫嘟囔了一句。约翰·赫西听一位副官说：“您不觉得自己还是最好找个地方掩护一下吗，将军？”仍在观察敌机的麦克阿瑟变换位置寻找着更好的角度，顺口说了一句：“给我一支烟，埃迪。”克拉克·李写道：“他那镶有金色穗带的帽子时髦地倾斜着，双肩挺得笔直，嘴里叼着一个长长的烟嘴，手里还挥舞着一支手杖。”另一个旁观者还听到将军说了一句：“你知道吗，我感觉父亲仿佛就在这里。”

重重危机之中，麦克阿瑟的每一次出现都会被报纸和新闻杂志的报道忠诚地记录下来、传回他的家乡。美国人民被珍珠港事件彻底激怒了，而他则被奉为这个国家奋起反抗的象征。由于德国和意大利已经在夏威夷遭袭4天前向美国宣战，而罗斯福也打算在全面攻打太平洋的敌人之前获得欧洲战争的胜利，华盛顿方面注定会遇到不少令人头疼的问题。全神贯注对付希特勒的总统不切实际地表示，自己将把“彭萨科拉”号巡洋舰借给丘吉尔，直到他的顾问提醒他这一消息肯定会传到公众耳朵里时他才退让。美国人都在为菲律宾人祈祷，而他们的眼睛也都盯在承诺过“我会带来充满十足把握的好消息”的麦克阿瑟身上。

心怀着航母会给自己带来更多飞机的信念，麦克阿瑟下令用推土机不分昼夜地在菲律宾中央新建了4条跑道，又在棉兰老岛上加建了9条跑道。（战争之初和他怀有同样信念的阿诺德告诉一位英国皇家空军指挥官，如果美军能够加派80架B–17轰炸机和200架P–40战斗机到菲律宾，他相信，“就可以重新夺回战区的制空权”。）如今，在“墙上屋”负责接听所有来电的接线员拿起听筒后已经不再以常规的“远东美军”作为答语，而是简单地使用一个词“战区”。当一位副官提醒麦克阿瑟楼顶上的星条旗有可能会遭到袭击（正在城市上空恣意飞过的敌机会将国旗辨别为地面目标）时，将军开口答道：“采取全套常规防范措施，但是把国旗留在那里。”马尼拉市民正在往郊区疏散。学校全面关闭，只留下大人们到关键建筑旁挖掘掩体、用沙袋搭建围墙，往垃圾桶里灌水，以防

管道被切断。

那些对麦克阿瑟后来以将军身份在韩国参政的行为感到迷惑不解的人应该好好思考一下他此时此刻的所作所为。和他的父亲一样，麦克阿瑟总是将自己视为一名军事政治家——他的这一自我认识也得到了其他人的鼓励，这其中就包括西奥多·罗斯福、伍德罗·威尔逊、赫伯特·胡佛、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奎松。如今，他已经开始成为一位全球地缘政治学家。担心马来半岛上的英军有可能无力阻止日本人的猛攻、意识到“荷属东印度群岛”已经几近孤立无援，澳大利亚人开始投靠美国、寻求帮助。中意于麦克阿瑟的才能，约翰·科廷总理宣布：“畅所欲言，我要说清楚的是，抛开我们与英国之间的传统联系，澳大利亚人依赖美国的帮助。”苦恼的丘吉尔在听说科廷和麦克阿瑟已经通过无线电建立了联系之后更是火冒三丈。看到华盛顿方面并没有发难于他，麦克阿瑟又开始思考如何让苏联也对他伸出援手。

麦克阿瑟在发给战争部的电报中指出，如果苏联也加入反抗日本的战争，对日本人发起“巧妙进攻”的“黄金时机”便会到来。对此表示赞许的杰罗推荐自己的上司“尽一切努力促使苏联加入（太平洋）战争”。富兰克林·罗斯福和乔治·马歇尔都认为这个提议十分具有说服力，一旦日本被清出战场，同盟国的军队便能合力解救被困的欧洲。罗斯福致电莫斯科方面，催促召集一次“联合规划”会议，商讨身处马尼拉的将军提出的各种可能性。斯大林对此反应十分冷淡，表示自己想要继续观望，等到春天时再下决断。认真阅读了他的回复之后，麦克阿瑟和斯塔克都觉得反复追问是不明智的。在该建议也遭到了丘吉尔的拒绝之后，这条路自此走到了尽头。不过，这个小插曲之所以值得我们铭记是因为没有人发现麦克阿瑟跨越了区分军队和政府之间的那条界线。

然而，麦克阿瑟还能否在开战头两周坐稳将军一职就是另一回事了。麦克阿瑟心里清楚，日本人在牢牢掌控了制空权和制海权之后，派遣大批步兵入侵便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了。他表示自己已经“时刻做好了

准备”。开战后的第三天，本间将军在没有敌手的情况下于吕宋岛东南的黎牙实比、北部的阿帕里和西部的维甘登陆。麦克阿瑟准确判断出这些突袭只是意在分散他的注意力、怂恿他分散兵力，从而达到削弱他的目的。他告诉一位战地记者，尽管他在和平年代曾信誓旦旦地表示自己能够在吃水线上反抗所有的两栖战，却无法在所有的海滩上同时作战。“指挥我军的基本原则就是在敌人大规模进犯之前保持军队的完整性。”他仍旧相信日军的主力突围部队会从林加延一带登陆——他并没有猜错，而是错在了在撤军至巴丹半岛之前一直按兵不动。

麦克阿瑟似乎早就知道事情最终将会如何结束。早在开战的第一天他就对萨瑟兰预言，他们最终将不得不“撤回……巴丹”。那一周晚些时候，他又对奎松和乔纳森·M. 温赖特少将说了同样的话。温赖特是他手下负责领导吕宋岛北部军的将领，也相信美军的唯一希望便是立刻撤入半岛。但将军犹豫了。在后来升任第57步兵团中尉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哈罗德·K. 约翰逊看来，麦克阿瑟决定在林加延抵抗敌军入侵的决定是个“悲剧性的错误”。在将军坐着落满尘土的帕卡德轿车在吕宋岛上四处奔走、鼓励菲律宾人坚守阵地时，他本可以坐镇指挥、向巴丹半岛运送补给——要知道，他们日后将迫切需要这些东西。光是位于吕宋中央平原的甲万那端的一个仓库里就储存了5 000万蒲式耳[注]的大米——足够美菲两军的士兵吃上4年多。未能转移这些粮食铸成了大错，而究其原因还是要归咎于麦克阿瑟的虚荣心。在痛斥橙色战争计划“刻板老套”、是“失败主义者”的策略之后，直到别无选择时，他才开始实施这一计划。只要还有一丝将入侵者阻挡在海面之上的希望，他便会安排手下的士兵们驻扎在马尼拉北边100英里处的林加延海岸，让他们彻夜蹲守在低矮倾斜的沙滩上。

华盛顿方面和将军一样不切实际地度过了关键的两周时间，庆幸敌军没有再度进犯，沉浸在日本人已经被打败了的虚妄谣言之中。紧接着，就在圣诞节前3天的那个早上——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那一天罗斯福正好恢复了麦克阿瑟的四星上将身份——一场突袭从天而降。早在48

小时之前，美军潜艇“魔鬼鱼”号就曾上报，吕宋岛北部55英里处的海上出现了大批日本运兵船的踪迹，旁边还有强大的重型巡洋舰护卫。布里尔顿留下的4架“空中堡垒”战斗机在这些敌军舰船上空投下了炸弹，却并没有击中目标，于是转而飞往了澳大利亚。12月22日凌晨2点，本间手下那些参加过侵华战争的老兵们开始下船，赶在黎明的第一缕曙光到来之前从3个地点登上了吕宋岛。在这3个登陆点之中，他们只在一个地方遭遇了抵抗，而其他地方那些未经训练、毫无纪律性的菲律宾人全都扔下了手中沉重的埃菲尔德式步枪仓皇而逃。于罗萨里奥经历了一次短暂的激战之后，入侵者接应上了驻扎在维甘滩头的日军。当天下午，他们便浩浩荡荡地踏上了3号公路——通往马尼拉、铺设着鹅卵石的军事专用公路。

此时的麦克阿瑟仍在犹豫。他花了40多个小时才煎熬地抛却了自己对于橙色战争计划的厌恶之情。他致电马歇尔，表示自己急切地需要P–40战斗机来炮轰敌人，并开口询问：“我能否指望（盟军）战线的援助？”马歇尔在回电中提到海军表示无能为力，而距离菲律宾最近的友军驱逐机又远在布里斯班。面对距离马尼拉只有100英里的日军，麦克阿瑟钻进自己的帕卡德轿车，赶往吕宋岛中央平原前线，想要亲眼看一看战事的进展。记者们得知将军和他的手下已经“披挂上阵”。新闻流言铺天盖地在首都传播开来。据说麦克阿瑟打算把兵力集中在首都北部，在那里与敌人进行殊死搏斗。战役的结果不能确定。报道中称此役的效果应该只是暂时性的。

实际的战况则更加复杂。尽管麦克阿瑟至死仍坚称自己当时寡不敌众、走投无路，但他的兵力从理论上讲应该比本间的多一倍。困难在于，大部分日军都藏匿在了山林里。与此同时，美国士兵、菲律宾侦察兵和分散在四处的菲律宾部队的战斗力足以减缓小心谨慎的日军指挥官本间的进攻脚步。温赖特请求麦克阿瑟批准他撤兵至阿格诺河。就在将军考量这项申请时，吕宋岛南部驻军指挥官乔治·M. 帕克准将发来报告称敌军又在距离马尼拉东南60英里处的拉蒙湾三处海滩上实施了大型登

陆行动。也就是说，1万名日军士兵已在吕宋岛上组成了三支纵队，正朝马尼拉进发。本间将军推测麦克阿瑟会像荷马李提议的那样守护首都，因此打算包围这座城市，直至美军饥肠辘辘、不得不投降。至此，麦克阿瑟将军已经动摇了，地图清清楚楚地显示了他的困境。除非他快速采取行动，否则将会被两只巨大的“钳子”束缚住手脚。他通过电报通知所有的指挥官：“实施橙色战争计划。”第二天下午4点30分，他再次下发通知：“为了避免马尼拉受到任何形式的空中或地面打击，军方考虑参照战时巴黎、布鲁塞尔和罗马的情况宣布马尼拉为不设防城市。”那是一个星期三。正式的宣告直到星期五时才公布。届时，马尼拉的两份报纸上全都刊出了同样的标题：“马尼拉成为不设防城市”。与此同时，返回维多利亚大街办公室后，将军迅速下达指令，销毁了所有的补给仓库和储藏罐。某一刻，萨瑟兰碰了碰他的手臂。附近的一处仓库内珍藏着4 000册书籍——其中大部分都是将军父亲书房里的藏书。或许是担心为自己破例会为难属下，又或许是因为时局已经足够混乱，麦克阿瑟小声应了一句：“全都炸掉。”

大街上，商人们用木板封住了店面。劫掠者早就躲进了海滨的那些穷街陋巷里，逃走时顺便带走了从避孕用具到新车之类的所有东西。《生活》的摄影师卡尔·迈登斯正准备上街拍照时，他和妻子谢利居住的湾景酒店收到了亨利·卢斯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的内容是这样写的：“再来一篇第一人称的目击者故事。不过这一周我们想要一篇有关美军进攻内容的稿件。”谢利替丈夫回复了这封电报：“非常遗憾，你的要求我们这里无法满足。”

军队术语称撤退为“机动防御”。即便是在最好的条件下，这也不是一件易事。深入俄国的拿破仑军团、葛底斯堡战役后李将军的北弗吉尼亚军团以及1940年被希特勒纵队击溃的甘末林法军——都是被敌人乘胜追击时士气低落的例子。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麦克阿瑟撤退巴丹半

岛的行动都可谓独树一帜。潘兴称它是“一项杰作，是整个军事史上最伟大的行动之一”。最近，D. 克莱顿·詹姆斯还在书中称这一次的撤退行动“比计划中的更加困难，或者应该说途中经历了更多罕见的、不可预见的灾难性意外”。战后，据日本俘虏的供述记录显示，裕仁天皇总参谋部视这次撤退为“一次重大的战略转移”，还指出他们“从未计划或想到驻菲美军会撤退到巴丹半岛。决定性的战役本应在马尼拉打响，以至于日军指挥官不知该如何适应新的情况”。

事实上，麦克阿瑟试图执行的是双重撤退策略，即同时撤回北部吕宋岛军队的2.8万名士兵和南部吕宋岛军队的1.5万名士兵，然后将他们集结在一起，从而粉碎敌军分散其兵力的企图。让部队进行交替式撤退要求在准确的时间将各个连续的地点守到最后一刻。与此同时，他还得阻止日军通过渗入侧翼来对他们进行双重包围。山下将军在对付马来半岛的英军中将阿瑟·E. 珀西瓦尔时就是这样做的。和麦克阿瑟不同，珀西瓦尔领导的是几支经验丰富的军队。而麦克阿瑟手下最得力的军队——包括精英军队第4海军陆战队——只是在科雷希多岛的防御阵地上做着备战准备。温赖特和接替帕克的艾伯特·M. 琼斯准将手下全都是一脸茫然的刚应征入伍的士兵。很多情况下，他们的中尉不得不通过即兴创作的手语来给他们下达命令，因为他们不会说英语，而他们的中尉又不懂得他加禄语。

鉴于两支美军之间相隔着160英里，将军不得不协调他们的行动，一边指挥北上的琼斯部队撤退，一边引导温赖特越过自己在地图上画出的5条阻滞线后退。在最后关头，共有184座重要桥梁先后被占领和炸毁。落伍的士兵也会被整编进新的连队。从日本人的阵前撤退必须把握好精准的时机。而那些至今为止还没有领导过一个军团——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没有领导过一个营——的疲倦不堪的师长也通过无线电收到了技术建议。事后麦克阿瑟写道：“一次又一次，这些战术被不断地重复。起立、战斗，倒退、爆破。这样的战斗是野蛮而又血腥的，却能为我们赢得时间。”在行动进行期间，他向战争部汇报自己的士兵“虽然疲

急但完全处于掌控之中”。他希望自己能在吕宋南部军队进入巴丹之前守住北方阵地，然后再将北部军队“转移”至半岛。

瘦削而又酗酒成瘾的温赖特是麦克阿瑟手下最得力的战地指挥官，因此也要承担最困难的任务——除非他的殿后抵挡行动能够成功地拖延本间的南下攻势，否则琼斯是无法穿越马尼拉撤退至半岛的。在横跨平原上许多条东西向的溪流后，在“帕特”·凯西的桥梁爆破工程师的帮助下，温赖特赶上了将军布置给他的严格的时间表。与此同时，琼斯遇上了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时机：本间正犹豫不决，是应该一举夺取马尼拉还是一路追击到巴丹半岛。趁他踌躇不定时，琼斯率领吕宋岛南部军队的一个师和一个团脱离了战斗，悄悄溜走了。

辗转难眠、神情憔悴的将军一手举着电话，另一只手的手指则在地图上的坐标间移动着。这张地图正是他作为一个初级军官赴任调查时所绘制的。他提醒两位将领，威胁正在逐渐增加，催促他们加快脚步，并告知他们应该在哪里固守，帮助他们坚定决心。他发现，战斗的关键点位于马尼拉西北部20英里处。这是一座名为卡伦皮特的双体拱形桥，横跨在波涛汹涌、无法横渡的邦板牙河上，附近的沼泽正好位于圣费尔南多铁路道岔的南边。一座桥搭载着铁轨，另一座桥的桥面上则铺设了一条双向车道。由于出入首都和平原的所有道路都汇聚于此，因而前往巴丹备战地点的军队和设备也必须穿过卡伦皮特河谷。温赖特此刻已经到达了距离桥梁10英里处的普拉里德尔。这里是他的最后一条阻滞线了。他手下的三个师和一支骑兵团必须要尽可能地阻挡日军，好让野战炮、逃散的平民和吕宋岛南部军能够穿过此地进入半岛。

他们成功了。第一批舰炮和长射程大型野战炮（155毫米口径大炮）被带了过来。紧接着，整整两天两夜，卡伦皮特地区排起了长达10英里的车队，挤满了被征用的出租车、矮胖的帕姆布斯克卡车、大巴车、菲律宾双轮小马车、豪华轿车和牛车——事实上，任何带轮子的交通工具都出现在这里——来回搭载着难民。最终，在12月31日黎明时

分，吕宋岛南部军开始渡河。只需一支三菱轰炸机编队便可以将他们赶赴安全地带的垫脚石摧毁。然而，不如对手熟悉地形的本间并没有出手摧毁大桥。麦克阿瑟下了最后通牒，要求在新年那一天的清晨6点钟之前拆除这座大桥。本间及其属下依旧相信首都才是这次战争的关键，因此前往巴丹半岛的大规模转移只不过是无序的逃难而已。然而，就在新年当天的下午，日军的一位战地指挥官终于开始对眼下的局势产生了怀疑，试图控制卡伦皮特上的岔路。麦克阿瑟对此早有预料。虽然他的轻型坦克在丛林和遍植水稻田的乡下派不上任何实际的用场，在这里却拥有无限的价值。而他之所以储备这些坦克也正是为了应对这种意外事件。面对他们的炮口，发起进攻的日本人只得撤退。第二天凌晨2点30分，坦克跨越铁路桥，安全渡河。最后一个步兵也于清晨5点钟平安踏过了公路桥。为了等待落伍士兵，温赖特将爆破的时间延迟至了6点15分。随着破晓时分的降临，日军的一支重型武器部队出现在远处的河岸边。“炸桥。”温赖特吩咐凯西。当着敌人的面，一阵如波浪般翻滚的迫击炮炸毁了这座“钢筋铁骨”。然而危险还没有过去——前方还有一条较小的拉亚克河在等待着他们去横渡——但麦克阿瑟已经留了5 000人坚守那里的阻滞线，直到半岛上的防御阵地人手全部齐备。1942年1月6日，随着拉亚克桥于清晨时分被炸毁，撤退行动全面结束。加上早已从吕宋岛其他地方撤退至此的部队，他在巴丹半岛上如今已经有了8万名士兵（1.5万名美军士兵和6.5万名菲律宾士兵），再加上2.6万名难民。眼前的问题并不是敌人，而是食物。混乱之中，一些卡车是空着车进入半岛的。挽救了自己军队的将军现在只能给士兵们下发一半的口粮——每天2 000卡路里，也就是30盎司[注]的食物。后来，这一标准又被降至原先配给的3/8。

看上去如同“一只筋疲力尽的老鹰”（这话出自卡洛斯·罗慕洛之口），麦克阿瑟坐镇指挥的科雷希多岛如今已经成为抵抗战线的中枢，也是他与华盛顿方面的唯一联系。第一个知道他有意撤退至科雷希多岛

的菲律宾人是奎松。早在12月12日，将军派赫夫找来了共和国总统奎松。据赫夫回忆，他和奎松一起钻进了总统的汽车里。“黑着车灯朝一片漆黑的城市驶去。桥上沿途都有菲律宾守卫把守，其中有些人没怎么经过训练，突然有人朝着总统的座驾胡乱开了几枪……到达马尼拉酒店时，我们似乎远离了战斗的迹象。窗帘后面没有灯光。屋子里……我们能够听到伴奏乐队的音乐声和舞者跳动的声音。”

赫夫给顶层套房打了个电话。为了躲避窥探的眼神和避免可能因此引发的恐慌流言，麦克阿瑟让他带着奎松去了后门的入口。踏上后楼梯，将军乘员工电梯前去与他们相会。他握了握奎松的手，搀着他的手肘来到了花园里河边的一个斜坡处。这里一片漆黑，远离冬日花园舞厅里喧哗的音乐。麦克阿瑟告诉总统，他（奎松）和他的家人必须准备好在接到命令后的几小时之内撤离马尼拉。他们也许不得不将军事总部、美国高级专员弗朗西斯·塞尔的办公室以及菲律宾政府全都搬到科雷希多岛上去。共和国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从没有想过……我有一天竟会不得不撤退到科雷希多岛上去。我不是美国总督，我是菲律宾共和国的总统……因此，我对麦克阿瑟将军提出的这个令人惊讶的消息毫无准备。”他对此表示抗议：“我的第一项职责就是在你与敌人作战的同时保护民众、维护公共秩序。”将军回答：“总统先生，我就知道我认识的这个勇敢的男人一定会说出这样的话来。”他安慰总统，他们只不过是在讨论一个应急方案。然而，将军还是指出，一旦事态一发不可收拾，总统的撤离将使日军无法在宣传方面获得胜利。在15分钟的激烈讨论之后，奎松走回了汽车，而麦克阿瑟也站回了赫夫的身旁。坐在台阶上，他如释重负地叹了一口气，开口说道：“你做得很好，赫夫。一切都会顺利的。”他们又在那里徘徊了几分钟，听了听舞厅里传来的低沉舞曲声。不一会儿，将军起身爬上了5层的楼梯，回到了自己的房间里。

第二天早上，塞尔给美国发去了一则电报：“我们正在战火纷飞的战线上与现实拼搏……为了留下而拼搏。战争责成我们所有人行动、行

动、行动。时间极其重要。来吧，美国！”然而，他们愈加清晰地看穿，美国是不会带着他们所需的力量和决心赶来了。赫夫已经开始搜寻多余的鱼雷头，以备时机到来之际炸掉自己的伪装猎潜船。正如麦克阿瑟和奎松之间的会面一样，这一行动也是秘密进行的。为了避免引起恐慌，处于焦急心境之中的美国领导人行事反而就像阴谋家一样。他们甚至会瞒着彼此，假装自己会像平常一样回家庆祝年末的假日。12月22日下午——也就是本间登陆林加延、威克岛沦陷的那一天——将军曾对赫夫说自己忘了给妻子买一份圣诞礼物，并且由于太忙，根本不知道她需要什么。他问赫夫能不能帮上他什么忙。赫夫答应了。于是，即便4万名日本士兵正手举刺刀横跨中央平原朝马尼拉攻来，悉尼·L. 赫夫中校仍旧出现在了百货商店的柜台前，询问女售货员店里有哪些女士内衣和12码的连衣裙。

琼已经为阿瑟布置好了一棵圣诞树，还吩咐孩子的广东保姆为他准备了一衣柜的礼物，其中就包括一辆崭新的三轮自行车。那天晚上，心里十分清楚一家人在圣诞节当天便会搬去别处的麦克阿瑟决定假装节日已经到来。阿瑟欣喜若狂地玩着玩具，一旁的琼也小心翼翼地打开了属于自己的那些绑着装饰缎带的礼盒，尖叫着拿起每一件衣服细细端详。然后，她又小心翼翼地把它们重新叠好、放到一旁，好像随时都会拿出来穿似的。她愉快地对丈夫说了一句：“老板先生，它们很漂亮。非常感谢你。”

城市沦陷之前的最后几天，琼总是紧紧地闭着嘴，而她如此紧张的行为也引起了别人的注意。她抿着嘴唇，若无其事地假装明天会和昨天一样。她当然知道轰炸行动即将到来。问题就是它何时才会到来。事实上，炸弹是在平安夜那天从天而降的。当天下午，萨瑟兰将关键的官员全都召集到了维多利亚大街1号，通知他们在4个小时之内撤离。每个人都可以携带一些野外设备、一个铺盖卷或是一只行李箱。与此同时，将军也吩咐赫夫：“赫夫，叫上琼、阿瑟和阿秋。我们要去科雷希多岛了。”

和其他人一样，他的妻子也在思索应该往自己的行李箱里装些什么。她是否应该带上那个写有“横滨新格兰酒店”标识的蜜月纪念品呢？上岛之后，这些军官都带了一些威士忌，只有琼几乎没有带上任何自己的东西。她从衣柜里拽出了自己度蜜月时穿过的一件带毛领的棕色大衣、几条棉质的水洗连衣裙、一双备用的鞋子、一个装着珠宝的小纸盒、几件盥洗用品和一些必需品，仅此而已。箱子里大部分的空间都装满了阿瑟的食物和衣服。不管怎样，她还是省出了些空间装上了丈夫的父母以及祖父母的照片。最后一刻，她在一个装满了他勋章的玻璃盒前面停下了脚步，里面放着他在西得克萨斯州军校时获得的小小金色勋章以及他的陆军元帅司令棒。她打开盒子，将它们一一捧出，放在了一条毛巾上，然后把毛巾卷成一团塞进了旅行袋里。赫夫提着阿瑟的三轮车，保姆阿秋则抱着孩子的兔子毛绒玩具“老朋友”。琼将自己的一些银器拿给了一些菲律宾朋友，还要求他们把这些东西藏起来。她一手提着行李箱，一手牵着儿子，最后望了望这间套房及屋里摆放的圣诞树。在一架大钢琴上，她看到了裕仁天皇的祖父送给她公公的两只花瓶。只见上面清晰地铭刻着“明治天皇”和“阿瑟·麦克阿瑟二世”这两个名字。她将手中的行李箱递给阿秋，将花瓶放在了入口的门厅处。“好了。”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也许当日本人看到它们的时候，会尊重我们的家。”她问儿子：“你准备好到科雷希多岛去了吗，阿瑟？”他点了点头。阿秋打开了门。就在他们踏进电梯的那一刻，鬼哭狼嚎般的空袭警报声响了起来。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三颗炸弹撼动了马尔斯曼大厦，而哈特上将正在里面和他的海军将官们召开最后一次菲律宾会议。他告诉他们，几个小时之内，除了洛克威尔上将之外，所有人都要起航前往爪哇，并带走美国海军大部分舰艇，只留下3艘炮艇、6艘鱼雷快艇以及几艘潜艇。洛克威尔将留下坐镇指挥。初级船员和水手将在麦克阿瑟的手下担任火枪手。哈特发自内心地疑惑将军是怎样说服他这些岛屿是可以防御的。珍珠港事件爆发至今已经将近三周了，日本人已经开始登陆棉兰老岛西南部的霍洛岛，给哈特上将的撤离路线带来了威胁。他现在就得

走。

接下来便是道别的时刻。维多利亚大街上，布里尔顿在与麦克阿瑟话别。除了科雷希多岛狭小的金德利机场上停靠着的4架打着补丁的P–40战斗机之外，布里尔顿将自己余下的飞机全都派往了位于澳大利亚西北部的达尔文市。如今，他也准备跟随战机离去。他在日记中写道：“愈加明显的是，残留下来的空军和哈特上将微不足道的海军是无法抵御敌人（更进一步）的登陆行动的。”任何留下的飞机都会很快被炸毁，日军舰载轰炸机正准备对棉兰老岛发起空袭。麦克阿瑟说他能够理解。分别时，他对布里尔顿说：“我希望你能够把我们的所作所为告诉外面的人，保护我们作为战士的声誉。”布里尔顿握着他的手回答：“将军，您的声誉是永远也不需要任何保护的。”

马拉卡南宫中，巴尔加斯和何塞·劳雷尔法官拥抱了奎松。总统双眼湿润、嗓音颤抖着说道：“无论发生了什么，都要坚守你们对于美国的信仰。”他还说：“你们两个人要好好对付日本人。”“墙上屋”中，尽管第二天早上还会回来，将军还是清理了自己的办公桌，并差人将一些私人物品提前送走。接下来，他坐着破损的帕卡德轿车接走了自己的家人以及赫夫。到达码头之后，麦克阿瑟一家、奎松一家以及其余的一百多人静候着登上小型汽轮“唐埃斯特万”号。那时，黄昏刚刚降临。远处愈加阴暗的暮色之中，一位海军军官正在朝他们的方向赶来。那时，哈特正要来与他们道别，在退居南方之前把自己手中剩下的最大一艘战舰（“鲨鱼”号潜艇）的指挥权正式移交到洛克威尔的手中。哈特和将军离开了人群，热烈交谈起来。轮船来了，人们纷纷走上了甲板。麦克阿瑟是最后一个踏上跳板的。不过他们还不能离开。一队戒备森严的卡车正载着菲律宾的金块和银块出现在了码头上。在这些板条箱被人工搬运上船的过程中，阿瑟在甲板上玩耍了起来，似乎有些无聊和困倦。他用力拽了拽琼的手，懒洋洋地说道：“妈妈，我讨厌科雷希多岛。我们回家吧。”尽管她告诉他船还没有到达岛屿，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地重复：“我想回家。”

船终于起航了。那是月光照耀下一个宜人的热带夜晚。通常，夜空中到处都会飞舞着萤火虫，空气中也会飘荡着赤素馨花醉人的浓香。可今晚他们却只能闻到无烟火药和燃烧着的汽油味道。波光粼粼的马尼拉海域对面，从遭炸弹袭击的潘达肯油田飘来的浓烟正笼罩着黑暗而又宁静的城市。30英里之外，灯火管制的科雷希多岛也同样了无踪影。站在船首左舷上眺望，他们能够看到甲米地的灯火仍在欢快地摇曳着。除了将军身上穿着一件轻便的皮夹克之外，其余所有人都穿着短袖衬衫，让人很难相信此刻已经是平安夜了。一位军官开始哼唱起了《寂静的夜》这首歌曲。没有人应和他的歌声。唱了几句之后，他的声音渐渐弱了下去。几个人把手伸向了自己的威士忌酒瓶。没有人说话，除了“唐埃斯特万”号发出的突突声和船头船尾传来的浪花声之外，几乎听不到任何声音。所有人都紧紧地挤在一起，甚至没有空间可供将军走动。

轮船摇摇晃晃地在小岛的北码头边靠了岸。一行人被带进了总长达1 400英尺的马林塔隧道中。在那里，所有的天主教徒刚刚举行过午夜弥撒的仪式。所有人都焦虑得不敢望向奎松。总统因结核引起的咳嗽毛病在潮湿而又陈腐的地下空气中越发严重起来，长长的咳嗽声听上去让人感觉他已经精疲力竭。后来，奎松睡在了隧道医院的床铺上。“我们为女士们分出了另一片区域。”卫戍部队的指挥官穆尔少将在护送麦克阿瑟一家前往他们的床铺时说，“我们这里从没有女士光临过，所以条件有些艰苦。”很快，将军表示自己不愿意住在阴湿的洞穴里。“你们的营地在哪里？”他问穆尔。“在顶层。”穆尔答道。“我们明天早上就搬过去。”麦克阿瑟说。穆尔指出，那里是暴露在空袭范围之内的。“没关系。”将军回答，“那正是我想要的。”

科雷希多岛上并非只有岩石。这座呈蝌蚪状的火山岛拥有三层深绿色的台地，每层台地根据其高度分别被命名为“顶层”“中层”和“底层”。科雷希多岛的大小和曼哈顿差不多。当时，一座小型的白色西班牙教堂

正好坐落在一座山峰的顶端，上面还飘扬着美国的星条旗。在麦克阿瑟撤退上岛的那段时间里，岛上除了守军之外还居住着一些猴子和几群小鹿。随着岛上的人变得越来越饥饿，连尚未成熟的麦子和骑兵团的马匹都被当成了食物，岛上的猴子和鹿也成了濒危物种，并最终灭绝了。巴丹半岛位于这座蝌蚪形小岛的尾部对面，饥荒灾情更为严重。那里的浅滩边缘遍植椰子树，是登陆艇理想的登陆地点。日军进犯的时候应该也会从那里上岸。

在与阿拉莫以及敦刻尔克齐名之前，科雷希多岛一直在和新加坡竞争“东方直布罗陀”的名号。如今，和新加坡一样，这座号称坚不可摧的小岛也成了先进科技的牺牲品。为了阻止入侵者，穆尔可谓费尽了心机。海岸边竖立起了长达20英里的倒钩铁丝网。海防炮、混凝土战壕、缆索护栏一应俱全。此外，他们还在岛上的小海港旁埋下了地雷，挖掘了散兵坑，并用大砍刀清理掉了茂密的雨林植被，在空地上搭建了坦克陷阱。然而，一切都是徒劳。即便1万名美、菲战士以及2 000名平民全都站起来勇敢抵抗，日本人的轰炸机还是在岛屿上空飞了300多个来回对他们进行狂轰滥炸。一次，敌军停止了指向甲米地的火力，运来加农炮以及直径为105毫米、150毫米和240毫米的榴弹炮，开始摧毁穆尔布置的防御阵线。每天，齐发的弹幕都会在上午8点30分至11点30分之间从天而降。迎着清晨的薄雾和初升的太阳，缺兵少将的美、菲炮兵根本无法认出敌人炮火的闪光。从甲米地飞来的榴霰弹在岛上炸出了一个又一个凹槽和沟壑。伤员的死亡进一步削弱了守军的兵力。隧道医院变得人满为患，温度计显示隧道里的气温停留在了35摄氏度。这座曾经美丽的小岛自此变得不再可爱了。

从马尼拉撤退至此的这一行人在这儿度过了第一个夜晚之后，麦克阿瑟对他们进行了分类，给每个难民安置了一处永久营舍。将军和萨瑟兰合用的办公桌位于隧道尽头灯光昏暗的第三支道中，因为岛上的通信中心恰好坐落在那里。不过，麦克阿瑟对卫戍部队指挥官所说的那些话全都是真心的。正如他所说的那样，除非房顶真的塌在了他的头上，否

则他是不会再睡到地下去的。他带着家人搬到了“顶层”，站在那里满腔热情地评述着远处的巴丹半岛。和穆尔一样，他的副官们也指出这座建筑很容易成为敌军飞机空袭的众矢之的。将军什么话也没有说，而琼也保持着沉默，心里却有些不安。事后她告诉一位朋友：“科雷希多岛上的那些日子对我来说是这场战争中最漫长的一段岁月。在那里住上三个月感觉比在澳大利亚住上三年还要漫长。”

赫夫还没有安顿好行囊就被将军叫了过去，受命返回马尼拉取回一些文件。将军补充道：“到了我家，翻一翻我床头柜的抽屉。你会找到我的科尔特点45手枪——也就是我在‘一战’时用过的那一把，带上它。再检查一下我的衣柜，里面放着我的宽边毡帽。我也需要那个。”停顿了一下之后，他继续说道：“你还会在餐厅里找到一瓶苏格兰威士忌。把它也带回来吧。这将是一个漫长、艰辛的冬季。”赫夫乘坐巴尔克利的一艘鱼雷快艇完成了任务，途中还不忘给阿瑟带了些橘子和麦片。他的焦虑并不是没有理由的。到处都是喝得醉醺醺的打劫者，而阿部弘毅少将的日军侦察队也已经接近了城市外围。两天之后，他们发现将军已经逃离了首都。他们的超级情报网把将军所在的准确方位告诉了他们。第二天早上8点，18架如飞蛾般的双引擎白色三菱轰炸机便出现在了湛蓝的天空中，径直朝着位于蝌蚪形科雷希多岛头部、海拔600英尺的“顶层”飞去。

琼飞快地抱起阿瑟，跑向了附近的掩体。这里算不上什么避难所；陈旧的铁门根本就关不上，且每逢一颗炸弹掉落便会来回摆动。“（铁门）叮当作响，”她事后回忆道，“就像是四级火灾警报。”空袭持续了3小时57分钟。每当爆炸声减弱，她都会让和他们一起躲在这间嘈杂避难所里的一名士兵——他原本在户外洗澡，浑身上下只裹着一条毯子——冲出去看看将军怎么样了。这名士兵每一次的报告都是一样的：麦克阿瑟正站在一处屏障旁，腋下夹着一支带有弯曲把手的胡桃木手杖、帽子高高抬起，烟嘴上插着一支好彩烟，用记号标记着来犯的敌机（72轮），“冷静得就像是在记录棒球赛的比分一样”，同时还观察着每一次

爆炸时溅起的水花和飞扬起来的泥土。一枚炸弹直接击中了小屋的卧室，炸坏了整座建筑。紧接着，另一枚炸弹又在距离他更近的地方爆开了花，弹片四散开来。将军蹲在一处屏障旁，而他的勤务兵多明戈·艾德福萨里奥中士伸手将自己的头盔摘了下来，准备把它戴在麦克阿瑟的头上。就在这时，一块弹片把头盔炸凹了一块，而另一块弹片则正好伤及了中士的手。三菱轰炸机呼啸着离开之后，琼飞奔着跑了出来，正巧看到丈夫正从沙发上站起身来，用手绢为勤务兵包扎伤口。他环顾了一下四周的碎片，漫不经心地说了一句："看看他们把花园糟蹋成什么样子了。"

紧接着，他去探望了奎松。总统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轰炸开始时，我对麦克阿瑟将军有说不出的担心……没有人知道将军会遭遇什么事情。"他责备了麦克阿瑟的鲁莽。将军笑了笑，轻描淡写地回答："哦，你是知道的，日本人还没有制造出能够炸死我的炸弹呢。"但他随即又严肃地接了一句："当然，我理解你的意思，我也知道自己没有权利赌上自己的性命，但指挥官是绝对有必要在适当的时机赌上一把的，因为全线的战士们看到站在山顶上的上司也不顾自己的安危时一定会说：'我猜如果那个老头儿能够做到，那么我也能够做到。'"

麦克阿瑟检视了一下炸弹轰炸后的受损情况。隧道的电力系统和水管都遭到了袭击。为此，他们连续好几天都只能饮用含盐的水，而被送到马林塔的伤员也只能在手电筒的照明下接受治疗。后来，隧道里的公共设施已经得到了修复，但室外的修复工作就不那么容易了。"顶层"的每一座建筑都被夷为平地，麦克阿瑟只好搬进了位于"底层"的一座灰色的小屋中。小屋坐落在隧道西面，距离入口处仅有400米。士兵们在隧道的一个分支里为麦克阿瑟一家搭设了几个床铺。遭遇空袭时，琼便会带着阿瑟和阿秋躲到那里去，可将军仍旧拒绝在马林塔隧道中过夜，除非炮火的猛烈程度实在令人无法忍受。这让他的妻子陷入了两难的境地。她决心保护好自己的儿子，却又不想丢下丈夫一个人。于是她在位于"底层"的家门口停放了一辆汽车，并安排一位名叫本尼的军士睡在旁

边的掩体中。每当警报响起，本尼便会驱车带着琼、阿瑟和保姆进入马林塔隧道避难。车程大约90秒钟。将阿瑟和阿秋安置在隧道中之后，本尼便会载着琼返回将军身旁。空袭结束之后，他们又会将孩子和保姆接回“底层”小屋中。有时候他们一个晚上就要重复三四次这套程序。一天晚上，她刚把孩子放到床铺上，从剩下的半瓶雪莉酒中倒出最后一杯，警报便刺耳地响了起来。“哦，天哪！”她抱怨道，“我是应该快点儿把它喝完，还是应该等回来再喝呢？”麦克阿瑟笑着暗示她等等再喝。完成隧道与小屋之间的这番旅程之后，她在空袭过程中慢慢地嘬完了杯中的酒。当晚晚些时候以及其他夜里，将军常会迈着大步在小屋门外的小路上来回踱步、自言自语。琼的鞋子都带着高跟，有时到了天亮，因为前夜的躲避，她甚至无法站起身来。但是她根本就不敢让他一个人在那里走动。

麦克阿瑟一家也常沉浸在世俗的家务琐事之中。将军之所以不喜欢马林塔隧道，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那里太过拥挤。隧道只有12英尺高、35英尺宽。每一个支道里都居住着28个人——大家共用一个浴室、一间厕所和一个洗脸池。每个人都在为食物发愁，除了偶尔的一顿水牛肉排或是骡肉排以及从海湾打来的新鲜鱼肉之外，他们的食物就只有三文鱼罐头和米饭。入夜后手动装载海防炮炮弹也成了问题，因为炮兵们全都因为缺乏维生素A而患上了夜盲症。上岛后的前八周，将军就瘦了25磅。没有人能够睡得安稳。马林塔隧道中，伤员们无时无刻不在呻吟。除了他们之外，岛上病情最重的便是奎松。尽管他已经戒掉了抽雪茄的习惯——麦克阿瑟如今倒是染上了这个毛病——但他的咳嗽声还是每晚都会响彻整条隧道。每逢这时，奥罗拉夫人便会起身离开自己与女儿们、伊丽莎白·塞尔还有几位美国护士同住的隧道分支，悄悄地走去照顾丈夫。有时候，若是没有医生为他注射吗啡，他甚至根本就无法入眠。

和岛上的其他人一样，当听到美国广播员安然地坐在加州演播室里对着1万英里外的东京方面挑战放话“我打赌你们不敢轰炸科雷希多岛”时，琼就会感到十分愤怒。相比之下，麦克阿瑟倒是对卡洛斯·罗慕

洛的信号兵在岛上建设的原始宣传广播十分骄傲，并为之命名“自由之声”。虽然麦克阿瑟在听到敌军广播中他的名字的发音时忍不住咯咯笑了起来——听上去很像是“孟加锡”——但他有充分的理由担忧那些留在马尼拉的菲律宾朋友的安危。即便时间已经模糊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参差不齐的轮廓，我们仍旧应该记得20世纪40年代初的日本是一个残酷的敌人。香港的修女们在街上被先奸后杀。欧洲殖民官员在被迫自掘坟墓后被开枪处决。马来半岛上的英军士兵被折磨致死，其生殖器官被阉割后，包皮还会被人缝在嘴唇上，脖子上则吊着“他们花了很长的时间才死去”的标语；之后，这些人的尸体会被绑在同盟国士兵巡逻路径边的树干上，好让巡逻兵发现他们。马尼拉一被宣布为不设防城市就立刻遭到了三菱轰炸机的轰炸。古老的圣多明戈教堂、圣胡安德拉特朗学院和奎松创立的菲律宾《先驱报》报社全部都被夷为平地。夺取首都之后，本间宣布，所有不支持日军占领的本地人都将被关进集中营或遭到斩首。这也印证了美国管理群岛地区40年以来得出的一条经验：这些在荷兰、法国和英国殖民地百试不爽的策略对于菲律宾来说并不怎么奏效。直到麦克阿瑟回归之前，入侵者们还在不断遭受游击队的骚扰。如果麦克阿瑟在美国人的心中还算不上是永恒的英雄，那么他对于菲律宾人来说就是如此。实际上，如果没有忠诚的菲律宾军团，他是不可能站上巴丹半岛的。

每一个上过战场的士兵都知道，越靠近战争的人越不愿去回忆战争。全世界都为麦克阿瑟保卫群岛的不屈精神以及他指挥手下那支贫弱不堪的乌合之众组成的军队时展现出来的能力而感到震惊。尽管远处的半岛上不时传来隆隆的炮声，地平线上也会偶尔闪着亮光，但科雷希多岛上的人们把这场战争视为将军在第三支道的办公桌上导演出来的东西。这座小岛存在的最高价值便是人们在岛上亲眼所见的众多事件。其中之一便是“鳟鱼”号潜艇载着20吨菲律宾金银离开——其他的金银已经全都沉入了海湾之中——而另一事件则是几百万美元纸币惨遭焚烧，以防它们落入敌军之手。在铁桶底部装油，然后点火，将纸币序列号文件通过电报发给华盛顿的财政部后，就把纸币撕成小片，丢入火中。悉尼

·赫夫还用一张1 000美元面值的纸币点燃了自己的香烟，而身处甲米地的一名日本炮手在看到铁桶里冒出的浓烟后还向他们开了火。

对于那些在科雷希多岛上幸存下来的人来说，最辛酸的回忆是奎松和副总统塞尔希奥·奥斯梅尼亚的连任就职仪式。11月，他们毫无悬念地再次当选。6年以前，他们的第一次就职典礼仪式场面可谓华丽壮观、多姿多彩；华盛顿方面还派来了一支由副总统约翰·加纳带队的大型高级代表团。如今，士兵们只能在隧道口附近的一处炊事休息点上搭建一座木质讲台，为总统和副总统准备两把椅子。观众们手中捧着油印出来的一小张程序表。下午4点30分，牧师用管风琴弹奏起了《向统帅致敬》的进行曲。宣誓完毕，奎松在讲话中表达了菲律宾人民建设独立国家的决心。他的音调很高，语气也很强，不时还会被一阵阵咳嗽声打断。他转身面对麦克阿瑟说："我找不到任何语言中的任何词汇来向你表达菲律宾人民和我个人对你为我们的事业（保卫我们的国家以及人民的安全）所做出贡献的深深谢意。"轮到将军发言时，他的语气既轻缓又低沉，以至于观众们不得不竖起耳朵努力聆听他的讲话。他说道："历史上再没有比这更加肃穆庄严的就职典礼了。它以一场突如其来的残酷战争为背景，是民主过程的象征。死亡和杀戮的威胁从天而降，就连身在远方的人都能够听得到。我们的耳朵几乎能够听到我们冲在前线的士兵发出的咆哮声。空气中回荡着爆开的炸弹低沉的轰鸣声。这就是这个新的政府、真的国家诞生的基础。"他总结道："通过令人喘不过气的艰难困苦……走出笼罩在冷酷阴影之下的死亡之谷，哦，仁慈的上帝，将会保护这个高尚的民族。"他转过身去，脸上满是斑驳的泪痕。

相比之下，他儿子的4岁生日派对则是一个稍显喜庆的场合。塞尔一家，包括伊丽莎白·塞尔的15岁继子比利负责筹划这一场派对。塞尔夫人找来了一些橘子罐头以及足够烘烤一枚小蛋糕的材料。尽管福利社已经先后两次遭到炸弹轰炸，琼还是设法替将军给阿瑟谋得了两份礼物：一个铁皮摩托车玩具和一个苍蝇拍。赫夫注意到这孩子喜欢模仿父

亲的模样把铅笔当作烟斗来抽，于是便用硬纸板给他做了一个烟斗。不过，这其中最有灵气的礼物还是保姆送给阿瑟的。阿秋发现岛上的另一个中国人正好是个裁缝，便说服他为这孩子做了一顶迷你的船形帽。一看到这顶帽子，阿瑟就爱不释手。第二天一早，一位士兵在隧道入口处碰见他，机灵地敬了一个礼说道："早上好，将军。"阿瑟皱了皱眉头，故意为难地答道："我不是将军。"士兵追问："不好意思。您的军衔是？"阿瑟回答："我是一个中士。"当对方问他为什么是中士时，男孩开口答道："嗯，因为中士可以开车。"从那以后，所有人都开始称他为"中士"，只有护士们会叫他"小家伙"。此外，护士之间还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只要'小家伙'还在，我们就会没事的。"那些日子里，她们从未想到过他还能去哪儿。

将军的儿子似乎是最快适应科雷希多岛生活的一个居民。他喜欢扯着嗓子唱着《共和国战歌》在隧道里跑来跑去。空袭警报响起的时候，他还会大喊："突袭！突袭！"一天，护士们在和他一起吃午饭的时候把他当作了吉祥物。她们的食堂里有一张连带着凳子的金属桌子，只要拽出枢轴便能拉出凳子，还能将其像小型旋转木马一样旋转起来。每次回到母亲身旁，这孩子都会喊叫着："妈妈，我饿了！我想去隧道！"琼后来才发现，他根本就不饿，而是想去和漂亮的女护士们一起玩"旋转木马"。

阿瑟的凳子、奥斯梅尼亚用来擦鞋的餐巾、奥罗拉夫人在自己简陋的寝室小教堂里点燃的蜡烛，就连麦克阿瑟都将自己的四星军衔挂在了汽车牌照上——岛上的每一个人都拥有自己倍加珍视的某些物件，提醒他们生活曾经是正常的，今后也终有一天会回归正常。琼无比珍视的是她的刺绣品。抱着一件棉质印花连衣裙和一条钩针织成的女用头巾，她可以花上好几个小时坐在马林塔隧道入口外的伪装网下，脚下踩着斑驳的光影，指尖却挥舞着针线。此外，她还养成了一个习惯，会在刺绣的

同时竖起耳朵聆听轰炸机靠近时发出的微弱轰鸣声。几个星期过去了，随着隧道中担架上收治的伤员越来越多，她和大眼睛的保姆都开始担心如此血腥的场面会给小阿瑟带来什么不良的影响，因而试图将他的注意力吸引到其他的地方。她们的努力并非每一次都能成功，毕竟岛上没有什么事情能被长时间保密。比方说，身处隧道中就不可能听不到日本的英语宣传广播，电台主播“东京玫瑰”预测麦克阿瑟会在东京的帝国广场上被处以公开绞刑。女主播描述得十分细致，还准确地说出了阿瑟父亲的名字。

科雷希多岛既激发了将军的优点，也暴露了他的弱点。和往常一样，和他亲近的人只会看到他鼓舞人心的那一面，但他在岛上的一些所作所为也令人感到汗颜。一方面，我们知道他在奎松的第二次就职仪式上发表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评论。另一方面，我们也发现他一直都在诱使这个病入膏肓的老人在战后重新雇用他为菲律宾陆军元帅，并支付给他同样的薪水和津贴。我们知道他十分关心巴丹半岛上的人民——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们肮脏、污秽、浑身臭气，但我爱他们。”然而，他也曾下令把留给饥肠辘辘的步兵团连队的食物转运到科雷希多岛上来，看着它们被一抢而空；在推荐守军获得总统集体嘉奖时，他还纵容萨瑟兰将萨姆·霍华德的第4海军陆战队排除在外，理由是“海军陆战队在‘一战’中已经获得了足够多的荣誉”。1月27日，罗斯福给他发来了电报：“祝贺你和你的士兵在抵抗战争中所获得的成果。我们带着骄傲之情和理解之心关注着你们，并在你生日之际惦念着你。”[注]麦克阿瑟用生动的语言回复道：“今天，1月30日，你的生日，笼罩在战争阴影中的灰头土脸的人们从巴丹半岛以及科雷希多岛的掩体中站起来，虔诚地祈祷上帝保佑不可估量的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与此同时，在战争爆发后的前三个月里，将军提交的142份官报中有109份都只提到了一位战士的名字：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这些消息都是在做自我推销，甚至应该说是在强买强卖。虽然在当时的情境之下，这些官报的表面价值被迫切渴望英雄出现的美国人通通

买账，但如今回顾起来，里面的内容不免显得有些呆板浮夸、不尽准确。官报中不仅虚报科林·P. 凯利上尉的“空中堡垒”炸沉了“榛名”号战舰，还谎称“麦克阿瑟的军队人数寡不敌众”。此外，其内容还提到：“迄今为止，据多方可靠来源称，麦克阿瑟将军已收到持续报告，称日军驻菲律宾指挥官本间雅晴中将已经切腹自杀……报告还称，这位已逝将军的葬礼将于2月26日在马尼拉举行……有趣而又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将军切腹的地点和葬礼的举办地都在马尼拉酒店，也就是麦克阿瑟将军在撤离马尼拉之前的居所。”事实上，本间在战争中幸存了下来，战后还被以战争罪起诉。

只有一个问题能让所有的旁观者都给出同样的答案：麦克阿瑟拥有无与伦比的个人勇气。当他的儿子喊叫着“突袭！”、防空炮手高喊着“肉丸！”或“煎蛋！”（形容的是敌军机尾上的旭日图案）时，争相朝隧道掩体跑去的人总是能够遇到与大家背道而驰的麦克阿瑟。据赫夫回忆：“所有参谋都试图劝说将军远离入口或是至少在空袭期间戴上一顶钢盔，但他丝毫不理会我们。我们将缠着电缆的电话线杆横在了通往隧道的路上，以防止自杀式飞机在入口处坠毁，还按照特定的角度竖立起了挡火墙，以免敌军将炮弹扔进来点燃我们的弹药库而将整条隧道炸毁。然而，麦克阿瑟却依旧不时走到外面观测头顶上飞过的敌机——有时一脸愤怒，有时轻蔑鄙视。”低飞扫射的零式战斗机机群袭来时，戈弗雷·R. 埃姆斯上尉在“顶层”的炮台掩体中看到将军“笔挺地站着，从不把双筒望远镜拿下来”。埃姆斯催促他找个地方隐蔽一下，他却不予理会，还冷静地预测“炮弹会在附近坠落”。不久，几枚炮弹果真就在距离他们步道100码的地方炸开了花。塞尔回忆：“将军不惧怕炮火，一直挺立在那里。任何人看到这幅画面都会捧腹大笑——将军站得笔挺，高级专员却匍匐着趴在尘土之中。我时常猜想他会不会也和我一样被这个念头逗乐。无论如何，他脸上的表情从没有改变过。”奎松写道：“在那些最令人焦虑的日子里，当日本人的炮火将他周围的一切都炸得粉碎时，所有看到他的人都会明白这个人的勇气已经超越了他的谨慎。就算是遭遇最严重的空袭，他也从不会找地方躲避或是戴上一个头盔。在科雷希

多岛的岩壁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就是与他并肩战斗的所有人力量的磐石和灵感的来源。”

我们可以想象，科雷希多岛平凡的一个清晨，将军在琼醒来之前便已起身，悄悄地穿上衣服。尽管艾德福萨里奥早已经帮他擦好了皮鞋、熨好了卡其军装，他的一头蓬松的乱发还是急需修剪，脸颊也因为常用盐水剃须而变得粗糙起来。他瘦了不少，土黄色军装松垮地挂在他的身上。卡洛斯·罗慕洛从隔壁房间的窗口向外瞥去，看到他胸口顶着闪亮的星形勋章，意味深长地迈着大步绕着小屋走了好几圈，然后甩开手臂、轻快地握着胡桃木手杖朝隧道里的办公室走去。在那里与萨瑟兰共进早餐之后，他会与奎松交换意见并研究昨晚的电报。某些电报的内容格外鼓舞人心。伦敦方面，温斯顿·丘吉尔向下议院宣布："我以议会的名义表达自己对麦克阿瑟将军麾下的小规模美军在长时间殊死抵抗大批精锐日本空军和海军的过程中所展现出来的无比勇气的敬意。"其他电报的内容也颇为有趣。听闻一艘日本潜艇袭击了圣巴巴拉市，麦克阿瑟说道："我觉得我应该给加利福尼亚指挥官发去一封电报，告诉他如果他能够撑过30天，我就能前去支援他。"在将自己每日亲手书写的官报递交到勒格朗德·A. 迪勒中校手中之后，将军还要去探望伤员，然后再返回第三支道的办公室里继续踱步。

要想在这间办公室里踱步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这里不仅空间狭小，而且随处摆放着缠结在一起的通信线。一名下士正在地图上挪动大头针。钉在石灰墙上的电话不时发出刺耳的铃声。只有那只悬挂着的没有灯罩的灯泡下方还留有可以走上5步左右的空间。麦克阿瑟耸着肩膀，在未经修整的混凝土地板上来回走动着。一位菲律宾军官注意到，他的双手"紧紧地交叉在身后，头微低，轮廓硬朗的脸上挂着坚毅的表情"。如果没有空袭轰炸——他在赶往隧道入口的时候总是拒绝戴上钢盔——他会在这里一直待到深夜。一天中最佳的工作时间是旧金山的下午6点，也就是菲律宾的上午10点。他会在这里收听短波新闻。点上一支"好彩烟"或是一支奎松馈赠的雪茄，他会和萨瑟兰一起收听KGEI的

广播员威廉·温特的每日短波摘要。和马林塔隧道外落下的炸弹一样，每天的广播内容似乎都比前一天的更加糟糕。

新闻的主旨十分简单，就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和他那支精疲力竭、饥饿难耐的军队被困在了一个巨大的陷阱之中——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陷阱。起源自柏林的闪电战得到了日本人的进一步完善。在首次大胆突袭珍珠港以后，日军接下来的侵略行动获得了全世界都从未见过的一系列胜利。一切都令人始料未及：同盟国的指挥官们也曾推测过日本人是否会对菲律宾、中国香港、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或夏威夷发起进攻，可没有人想到过他们会对这些地方同时发起猛攻，并在21周之内不计任何损失将它们全部攻下。伦敦方面曾经向美国政府保证，被称为“狮城”的新加坡绝对能够抵制住日军的入侵，而荷兰人也确信马来半岛屏障（从“暹罗”南部克拉地峡一直贯穿至澳大利亚北部帝汶岛的半岛、岛屿链）是坚不可摧的。考虑到自己的祖国应该是安全的，澳大利亚人和新西兰人将自己的军队全都派往了“西部沙漠”和隆美尔作战。

紧接着，画着一轮红日的日本国旗突然出现，让所有人都傻了眼。山下的精锐部队敏捷地穿越了马来半岛，流言甚至传说他们的士兵能像猿猴一样在树枝间摆动滑行。（实际上他们骑的是自行车。）当9万名同盟国士兵在新加坡缴枪投降时——日本人给新加坡改名为“昭南岛”，即“光明的南方岛屿”——英国新闻界起初还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丘吉尔在《命运的关键》一书中将新加坡与法国的沦陷做了比较。他提笔写道，这是“英国历史上最糟糕的一场灾难和最大规模的一次投降”。不到两周之后，74艘日本战舰便在历时7个小时的爪哇战役（自日德兰海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海战）中，消灭了美、英、荷、澳四国的联合舰队。同盟国唯一可圈可点的地方便是拖延了敌人24小时的进攻时间。虽然美国人的眼睛都在紧盯菲律宾，但裕仁天皇手下的军事领袖们更加看重的是爪哇，因为攻下那里便能获得石油、锡矿和钨等他们所需的全部原材料，同时也能够攻破马来半岛屏障上最坚固的一环。

就像不断转移的癌细胞一样，日本侵略军的魔爪也在不断地伸展。同盟军很难相信，一个亚洲国家的军队竟能在各个方面赶超他们。日本人不仅在战略上技高一筹，在战术上也更加灵活，而且拥有规模更大的高效海军和空军，以及接受过良好训练、经历过千锤百炼的陆军。正如加文·M. 朗指出的那样，在两栖战斗中，“他们在多浪海滩上实现全军登陆的壮举在西方人眼中仍然只是一个梦想”。截至1942年春，日军已经攻下了包括“暹罗”、缅甸、苏门答腊岛、婆罗洲、“西里伯斯岛”、帝汶岛、俾斯麦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威克岛、关岛和所罗门群岛在内的大部分地区。新几内亚已有一半区域陷入了敌军之手，另一半也几近失守。在一次大胆的日间突袭中，81架日军舰载轰炸机将澳大利亚的关键港口达尔文夷为平地。如今看来，日军入侵澳大利亚是在所难免的，而爪哇的沦陷更让澳大利亚陷入了毫无防备的境地。澳大利亚与外界之间的交通联络线被一条一条地切断了。墨尔本、布里斯班、悉尼，以及在新西兰，随处可见令人胆寒的海报，图画中咆哮着的野蛮日本士兵正横冲直撞地跨越海洋，手中握着澳大利亚地图，背后则是一轮升起的红日。海报的正中央赫然书写着这样一行字：“此刻的信号是‘必须’。”

随着德军纵队向苏伊士和斯大林格勒逼近，轴心国似乎已经胜券在握。如果说在埃及和伏尔加河上对抗希特勒的军队士气颓废，那么东条英机面前的路途则根本就无人抵挡。据华盛顿和伦敦方面的军事专家预测，日军最少要花上10年时间才能够征服太平洋。如今，大日本帝国已经将触角伸向了5 000英里以外的各个方向，从东部的威克岛到西部的印度，从北部西伯利亚海岸附近寒冷的千岛群岛到南部热带的珊瑚海。裕仁天皇统治着1/7个地球，是美国与欧洲面积之和的3倍，而其中大部分是海域的事实只能说明夺回行动可谓难上加难。距离麦克阿瑟最近的友军势力（位于西北1 000英里处的蒋介石部队）曾经零零散散地通过滇缅公路为麦克阿瑟提供过一些援助。随着该通路在4月于缅甸的腊戍被切断，援军只能够依赖更加支离破碎的跨喜马拉雅航线——“驼峰航线”来运送补给。

2月8日，东京方面给本间下达的征服菲律宾的大限已过。本间提出增兵要求，而麦克阿瑟的美军和菲律宾军队士兵仍在负隅顽抗，成了抗日战线上仍在有组织进行抵抗的唯一一处闪光点。克莱尔·布思·卢斯相信，将军“保卫菲律宾的行动是他最光荣的时刻”。乔治·肯尼说：“说到战斗……麦克阿瑟的防守……是太平洋战争的前5个月内最值得称颂的篇章。和新加坡的全面溃败、‘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沦陷和华盛顿方面的不知所措相比，吕宋岛之役如希望的灯塔般脱颖而出。难怪麦克阿瑟会骄傲地将自己的飞机命名为‘巴丹’号。”

虽然麦克阿瑟用“巴丹”号为自己的飞机命名，直到晚年每每谈起有关“巴丹”的话题仍会哽咽不已，但是事实上，在被困科雷希多岛77天的那段岁月中，他只去过巴丹半岛一次。“帕特”·凯西传话给他，请他到半岛上来“鼓舞低迷的士气”。1942年1月10日早上6点45分，将军、萨瑟兰、赫夫以及一位防空军官乘坐巴尔克利的一艘鱼雷快艇来到了马里韦莱斯。一辆落满灰尘的福特轿车载着他们视察了散兵掩体和战地医院。麦克阿瑟用轻快的语气亲切地向每一个人保证：“援兵正在路上，我们必须在援兵赶到之前守住阵地。”一位年轻的上尉提出了有关自己在马尼拉的菲律宾信托公司存款账户的问题，麦克阿瑟回答，他很快就能回到银行看到自己的存款了。将军向温赖特询问了火炮的情况，对方答复他，附近安置了两门15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正在等待检阅。将军高兴地答道：“乔纳森，我不想去看它们。我想要听见它们的声音！”回到科雷希多岛，他告诉奎松“目前没有理由担心”，士气其实“十分高昂”，而且“只要没有外界支援”，他有信心把本间拦截在“海湾里好几个月”。

巴丹半岛距离他们只有3英里——乘坐鱼雷快艇5分钟便能上岸——但他没有再去视察。自然，很多人都在猜测这其中的原因，但答案一直扑朔迷离。因德上尉听到半岛前线的守军之中流传着这样一则传闻，说麦克阿瑟“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实际上他并没有生病，而且比以往任

何时候都要健康。逃离菲律宾之后一直坚定支持着这位“至交”的奎松说自己曾劝将军不要再回巴丹半岛：“怀着极其胆怯的心情和运用我所拥有的社交手腕，我表达了岛上美菲两国士兵的感想，希望麦克阿瑟将军不要拿自己的生命去冒险，因为一旦没有他，战士们便会士气低落，后果无法估量。”但麦克阿瑟总是在冒无谓的风险，而他在岛上的每一天都不例外。诚然，他不得不坐镇隧道进行指挥，因为只有那里能够让他与华盛顿和群岛其他地方的卫戍部队保持联系，而巴丹半岛人迹罕至的丛林中地形崎岖、河流纵横的主阵地也使得现场指挥不太可行。然而，凭借“一战”中在法国作战的经验，麦克阿瑟本该是第一个意识到前线的战士们需要不时看到指挥官的身影，好让他们知道自己还没有被忘记。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在向他们承诺了援军很快就会赶到之后，将军在无人前来支援的情况下无颜再次面对他们。无论如何，他的缺席让他付出了无比惨痛的代价，并让他背上了一个有失公允的绰号“防空洞里的道格”——这是于绝望中在半岛上奋战的士兵们提出来的，尔后又在一代又一代的太平洋驻军之间流传。虽然他从来都不承认自己听说过这个绰号，但在战后谈及曾经伤害过将军们的无妄流言时，他告诉东京的法比昂·鲍尔斯少校：“一旦有人开始胡说八道，所有人就都会相信他们的话。这时候你就不得不改变自己的行动方针。就拿菲律宾那件事来说吧……”鲍尔斯问道：“哪件事？”麦克阿瑟回答：“就是你知道的那件事。”少校写道：“他就是不愿意重复‘防空洞里的道格’这个词。我也是后来联系起当时的语境才想起来的。”

如果他们之所以如此怨恨是在寻找推诿对象，那还情有可原。毕竟那一年除了斯大林格勒之外，没有哪里的战斗条件能比他们还要艰苦。至少斯大林格勒的士兵们手中的武器还能用。巴丹半岛上，5枚手榴弹中就有4枚是哑弹，而麦克阿瑟手下的同一个炮兵排发射出的17枚斯托克斯迫击炮炮弹中只有4枚能够顺利炸开。敌军士兵为了表示蔑视，在无人之境留下了他们缴获的一门迫击炮，并在上面插满了鲜花。在某些方面，战区地形比日本人更令人生畏。形状如同微缩版佛罗里达州的巴

丹半岛长25英里，最窄处宽20英里——差不多和大洛杉矶地区一般大。岛屿中央矗立着数座被雨林覆盖着的休眠火山，山顶足有5 000英尺高。岛上共有两条道路，一条由鹅卵石铺就，另一条则泥泞不堪，其间暗流纵横、绝壁丛生。高大的菲律宾红木、铁木、桉树以及扭曲的菩提树之间，生长着如屏障般不可穿透的热带蔓藤类植物、匍匐植物和竹林。再往下就是锋利的珊瑚尖、坚韧的林下植物以及栖息着大型蛇类（包括巨蟒）的阿兰草。年初的那几个月，这里大部分时间都阴雨连绵。缺乏蚊帐、双人帐篷的部队饱受疟疾、登革热、脚气、十二指肠病和糙皮病的困扰。饮水也受到了污染。士兵们依靠树根、树叶、木瓜、面包果、猴子肉、野鸡肉和野猪肉充饥。一向苗条的菲律宾士兵头戴着用椰壳做成的头盔，身材越来越干枯瘦削。入夜后，日本人还会用爆竹、炮火等打扰他们的睡眠，或是用扩音器无情地大声奚落他们。

下定决心要从敌军手中夺回半岛每一寸土地的麦克阿瑟在马林塔隧道里导演了一系列零零碎碎的反抗行动。就在他从巴丹半岛返回后的第二天，本间便发起了日军的第一次主要攻击，破坏了美、菲的防线。被分为两个军团的守军顽强抵抗，不肯把阵地拱手让给敌人，于是奋起反击。疾病也大规模地削弱了日军的实力。事实上，麦克阿瑟手下的有效兵力一度是敌军的3倍之多。一日之内，同盟军夺回了5英里的阵地；将军认真地考虑要发动大规模进攻夺回马尼拉，但在意识到自己会被逼回巴丹半岛之后放弃了这个想法。用他的话来说："正是日军能够不断召集援军而美军无人相助的原因导致我们最终落到了这般田地。"1月24日黎明前，他撤回了自己的最后一条防守阵线。在发给华盛顿的电报中他提到："随着这一次撤退，所有的对抗策略都结束了。我打算出击彻底毁灭敌军。"他的军队正在巴丹半岛的干线公路（将半岛一分为二的皮拉尔—巴加克公路）后方挖掘战壕。他在电报中告知马歇尔："这是我亲自选址准备的坚固战略要点。"

穿着蓝色斜纹粗棉布制服的菲律宾军队从未失去过对麦克阿瑟的信念，也从未叫过他"防空洞里的道格"，至今仍对他崇敬有加。相比之

下，美国步兵就没有那么尊敬他了。他们愤怒地调侃自己钢盔上刻着的字母“V”已经不再是“胜利”的标志，而成了“受害者”（Victims）的标志。厌倦了望眼欲穿地在天空中寻找B–17轰炸机和P–40战斗机或是随时都有可能出现在地平线上的、载着补给品和援军赶来的“足有一英里长”的护航队，他们用刻薄的言语写下了一首首打油诗（后来成了纪念他们英勇战绩的墓志铭）。其中一节诗文这样写道：

我们是在巴丹半岛上战斗的可怜虫：

没有妈妈，没有爸爸，没有“山姆叔叔”，

没有阿姨，没有叔叔，没有外甥，没有外甥女，

没有步枪，没有飞机，没有重炮群，

也没有人关心。

另一首针对将军的打油诗是配合着《共和国战歌》的曲调来哼唱的：

防空洞里的道格·麦克阿瑟摇摇晃晃地躺在岛上，

轰炸机炸不到，突袭吓不到。

防空洞里的道格吃着巴丹最好的食物，

而他的军队还在饿着肚子……

防空洞里的道格，出来吧，别躲了，

防空洞里的道格，出来吧，别躲了，

给富兰克林发去喜讯，

就说他的军队还在饿着肚子！

麦克阿瑟的确是这样给罗斯福和华盛顿那些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发去信息的。苦于敌军一直在分发宣扬美国已经放弃巴丹半岛的传单，因德上尉乘船来到了科雷希多岛，并将这些传单展示给萨瑟兰。参谋长将一大堆的无线电报推到了上尉的面前，一字一句、直截了当地对他说道："以防你觉得我们什么都没有尝试，自己看看这些吧——还有这些——还有这些——还有这些！"因德写道："每看到一份新的文件在我的眼前翻开，我的心就会随之沉下去一点。麦克阿瑟将军提交了一份又一份申诉……所有的可能性他都试过了。"将军已经看过日军分发的这些传单了，建议战争部做些什么来抑制"敌军日渐增强的宣传行动"，以防产生"毁灭性的后果"。他提出了警告："我在这里不便进行反抗。"

麦克阿瑟恳求过美军发起突袭、派出援兵、运送补给（"实际的吨位要求并不大"），并要求潜艇为他送来弹药，在荷属和英属基地陷入日本人手中之前将飞机转移至菲律宾。他恳求委派3架飞机过来："好让我能够去勘察。如果你连敌人都看不到，是无法与之抗衡的。我现在就是一个瞎子。"他对马歇尔说："我要求你与海军配合，下令让护航队通行。我将提供所有有关此地境况的可用信息，尤其着重于空中信息。"塞尔也和他站在了同一战线上，指出眼下战事不仅与军队有关——美国在政治上有义务拯救信任美国的人民。将军在后来发送的一条电报中提到："除非有人留心这些警告，否则我会毫不犹豫地预测战争定将被拖延下去，而且最终的结果定会将我们置于危难之中。"他催促有关人士将他的观点尽快呈交给"级别尽可能高的权威人士"——总统，并补充道："凭借目前的优势点，我比任何人都能更加清晰地看到整个太平洋的战略。"他感觉"同盟理事会对太平洋战争的时间要素缺乏充分的理解"，不明白他们没有"无限的时间来挫败日本"，一旦敌军巩固了在马来半岛和爪哇岛的所得，便有足够的原材料和基地来抵御"封锁战和消耗战"。

这些观点全都有待论证，而麦克阿瑟将会亲自证明它们不可能是错的。不料，华盛顿方面当时并没有针对上述的任何一点做出回应，反倒

是百般安慰将军和他身边的人，称援军就在路上。史汀生在电报中告诉奎松：“你们英勇捍卫国家的行为令美国人民动容。一旦我们集结好力量，就会立刻全面出动，将侵略者赶出你们的国家。”应政府的要求，麦克·埃利萨尔德从波托马克河畔通过电波给自己的家乡人民送去了好消息：“美国百分之百支持我们抵御侵略者的行动。这里的所有官员都在竭尽全力支援战线。我的同胞们，你们正在为了自由和独立而战。你们正在为了我们的未来而战。愿上帝保佑，援助即将到来。”

在麦克阿瑟收到的所有消息中，最振奋人心的那些全都来自乔治·马歇尔。按照马歇尔的传记作家的话来说，他在那些“使人充满希望的电报中……列举了打算送往菲律宾的各种武器和设备，重新燃起了麦克阿瑟和他的属下心中的希望”。这话说得还算委婉。将军注意到，125架P–40战斗机和15架B–24轰炸机都已登船向西边驶来；而且，他也没有收到舰船改道前往澳大利亚的通知。参谋长告诉他：“我们已经竭尽全力……催促空军前去支援你们……总统看过了你发来的所有消息，也指派了任何可能的力量前去支援你绝妙的战斗行动。”在1月的一封电报中，马歇尔通知麦克阿瑟：

> 我们（指罗斯福、丘吉尔和联军参谋部）做好准备快速发展远东实力，以突破敌人对菲律宾的控制……我们最大的希望是在马来半岛战线上发展势不可当的空军，从婆罗洲南部切断日军的运输路线，为在菲律宾南部发动进攻制造可能性。一批之前因天气原因延误起飞的四引擎轰炸机正在路上……另一批相似的轰炸机今天也已从夏威夷新建的机场起飞。两组火力强劲的远距离重载中型轰炸机下周也将启程。我们所能调遣的所有船只都将搭载驱逐机前来。我军指向明确的空中援军将与英军携手在西南太平洋地区构筑起先发优势。我们将可以集中兵力，对北方产生决定性影响……在集中呈压倒之势的兵力以达成我们的目的这一点上，你们争取来的每一点时间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目前正在华盛顿召开的会议……在加速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方面具有极其鼓舞人心的作用。

其余颇具说服力的话语则是从麦克阿瑟的总司令那里传到他耳边的。12月28日，在面向菲律宾人民的一次特别广播中，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大英帝国、‘荷属东印度群岛’和中国的资源都投入了彻底打败日军的事业中。”紧接着，他在电报中告诉奎松：“我可以肯定的是，每一艘可被调遣的舰船都全力以赴地装载着……能够最终打垮敌人、解放你们祖国的力量。”他接着提到：“美国人民永远也不会忘记菲律宾人民在这些日子里以及接下来的岁月里的所作所为。我向菲律宾人民郑重宣誓，你们将重获自由和独立，而美国也将倾尽人力、物力兑现这一诺言。”

麦克阿瑟和奎松备受鼓舞，不过电报中的“重获”一词却让他们有些困惑。他们判定，此处可能存在信息失实，而罗斯福想要表达的本意一定是“他们的自由和独立将受到保护”。修改了这一处措辞之后，他们将这封电报的内容公布了出去。华盛顿官方注意到了这处修改，但并没有出面纠正身处科雷希多岛上的这些人。事实上，美国报章媒体和岛上的人都把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这份电报内容理解成了很快就会有人来帮助奎松解围的意思。第二天早上，《纽约时报》在头版头条以8栏标题进行报道：《罗斯福向“英勇”的菲律宾人做出保证》，副标题为“承诺全面援助/总统表示菲律宾人民将‘重获’自由/承诺保护/海军表示我舰队并未被摧毁，将协防”。在采访过罗斯福的秘书威廉·D. 哈西特之后，《纽约时报》写道：“总统表示将帮助菲律宾人民‘重获’自由的措辞引起了一些人的非议。这个词似乎意味着菲律宾的暂时沦陷是不可避免的。然而哈西特先生当即否认了所有暗示这条信息应被视为是对菲律宾守军的告别的言论。”记者所指的是塞尔在同一天发表的一则广播：“援军一定会到来——其力量足以将入侵者从我们身边驱赶出去，并削弱他们的力量，让他们不敢再前来进犯。”第二天，《纽约时报》援引了史蒂夫·厄尔利的话，说他“没有从总统的声明中找到任何一个句子能够证明罗斯福正为放弃菲律宾做好准备”。厄尔利被再一次问起，“重获”一词是否是在暗示美军不会在菲律宾群岛沦陷之前出手相助。他答道：“不，我不这么认为。我在声明中没有找到能够证明这一点的内容。”

三年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去世之际，将军对自己手下的一位名叫邦纳·费勒斯的军官抱怨道："这么看来，罗斯福死了，这个能撒谎就永远不会说真话的男人死了。"虽说这样的评论有些不近人情，但还是表达出了他在与这位诡计大师斗智斗勇的过程中内心产生的强烈懊恼。罗斯福的乐观心态也带动了身处科雷希多岛的麦克阿瑟的乐观心态。然而，两人的乐观却产生了负面效果：这条向乞求解围的人们发誓援兵就要来了的消息，从科雷希多岛发往了巴丹半岛，后来却陷他们于痛苦之中。1月15日，将军给战士们写去了一封信，下令每个连的连长把这条信息念给自己的属下听。他声称："援兵正从美国赶来。成千上万的士兵和上百架飞机已经上路。虽然救援力量到达的具体时间尚不清楚，但他们一定会浴血奋战、冲破日军的封锁线……我们的部队必须在援兵到达之前坚守阵地。"第二天，他又进一步给部队指挥官们发去了指令，号召他们展现出"自信自恃的镇定风度，因为这是所有有教养的绅士与生俱来的权利和军官的特殊商标"。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他相信"勇敢的努力正在酝酿之中"。

开战三个月后，战争部再也没有提起过派遣护航舰前往马尼拉的事情。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汤姆·康纳利表示："从军事的角度来看，菲律宾早就被视为一处负担而不是什么有价值的领地了。"阿瑟·克罗克也在到访白宫后写道，吕宋岛在美军舰船穿过日军的封锁线、进驻马尼拉湾之前是不可能得到解围的。约翰·赫西也写道，菲律宾人民只获悉了"可怜的一点点真相"。战后，另一位记者曾问起过麦克阿瑟是否真的相信援军已出发来解救被困的科雷希多岛。他这样答道："对天发誓，我是真的相信！自那以后，我又翻阅了一遍那些信息，来思索我为什么这么相信。你知道吗——那些信息并没有答应我什么，但也没有拒绝我什么。里面满是正反都解释得通的语句。现在我才明白，我这是在自欺欺人。"

麦克阿瑟在回忆录中委婉地写道："由于菲律宾的无线电收信太差，导致罗斯福总统演说的意图被错误地理解成了即将派驻援兵。"将

军的宽容让人备感惊讶。事实上，他已经通过阅读丘吉尔的回忆录得知，早在1941年圣诞节前，也就是罗斯福向菲律宾人民保证“每一艘可被调遣的舰船”都在全力以赴地奔向群岛之前，总统和史汀生便私下告知英国首相，他们认为菲律宾败局已定，没有价值了。（“有时候。”史汀生说道，“人必须得死。”）事实上，麦克阿瑟对于这一无耻的勾当所持的态度并不宽容。多疑的火种仍在他心中燃烧，而这对他来说无疑是“火上浇油”。但他喜欢仔细挑选敌人，因而选择忽略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欺骗，将怒火全都发泄在了马歇尔和其余的“肖蒙党人”身上。肖蒙党人从来就不喜欢他。当他在法国的战场上冒着生命危险和战士们一起趴在战壕里奋战时，肖蒙党人全都躲在办公桌后。如今，他们又在远离“绿色地狱”的华盛顿办公室里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军官联手向他发起了新的战争。这个在“二战”时期的欧洲战区地位堪比“一战”潘兴的人正是麦克阿瑟曾经的副官，德怀特·D. 艾森豪威尔。

艾森豪威尔是前一年秋天在路易斯安那的军事演习中获得准将星章的。不过，引起乔治·马歇尔注意的还是他在菲律宾的经历。自从1915年以中尉身份离开马尼拉之后，马歇尔就再也没有回过菲律宾。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后，他需要一位最近曾在菲律宾驻扎过的高级军官为他建言献策。于是，艾森豪威尔便作为不二人选被一个电话召集到了萨姆休斯敦堡，并被任命为战争计划处的副处长。12月14日星期四，他到战争部报到，聆听了马歇尔对吕宋岛战况的简述。马歇尔问道：“我们的行动总路线应该是什么？”准将在获批回去思考了几个小时后在汇报中回答：“将军，主力增援部队需要很长的时间才能到达菲律宾。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敌军指派主力部队前去扫荡，缺兵少将的卫戍部队是很难进行抵抗的。”他说：“我们的基地应该设在澳大利亚，而且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扩张它的规模，保障我们与它之间的交通线路。”参谋长回答：“我同意你的观点。尽力保全他们吧。”艾森豪威尔决定从12月22日到达布里斯班的“彭萨科拉”号护航舰着手。

艾森豪威尔的话的确言之有理，而他的第二条建议也行之有效，那就是让麦克阿瑟留在科雷希多岛上与部队并肩作战。然而，他们两人都没有制定出什么好的策略。自从那些鼓舞人心的电报飞抵科雷希多岛之后，巴丹半岛军民英勇抵抗敌军的行为和将军富于激情的官报便激起了美国人民（包括他们的总统）心中的想象。尽管白宫和战争部这样点燃在劫难逃的菲律宾虚妄的希望，但他们并无恶意，他们也迫切地希望营救驻扎在那里的卫戍部队。尽管他们也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心里还是坚持认为他们会去尝试。同时，马歇尔一边下令让艾森豪威尔着手进行在澳大利亚的准备工作，一边又开口让他“尽力保全他们”——好像两者并不互相排斥似的。阿诺德说过，只需几支轰炸机和战斗机分遣队，麦克阿瑟便可以夺回菲律宾的制空权——仿佛不需要出动大量美军步兵力量去夺取和占领飞机跑道。12月30日，罗斯福给海军部部长诺克斯发去了一份备忘录：“我希望战争计划能够探索为菲律宾解围的每一种可能性。我明白这其中包含巨大的风险，但这个目标是重要的”——好像他从未考虑过要指派“彭萨科拉”号及所护航的运输船队改道前往英国港口。就连被畏缩情绪感染的史汀生也表示援军之所以没有被送到麦克阿瑟手中，是“因为海军在夏威夷遭遇重创之后，仍没有从震惊和恐慌的情绪中缓过劲儿来”——仿佛失去8艘战舰带来的唯一问题就是打压了海军上将们的进取精神。

斯塔克上将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涉及将航空母舰开往科雷希多岛小型机场的飞行距离范围之内的一切请求。金梅尔上将也采用了同样的托词，表示“战舰的损坏迫使我们进入了战略防御状态，我们需要重新积聚力量”。没有他们的帮助，行动很难进行，但马歇尔和他的属下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尝试。任何能够救麦克阿瑟于水火之中的尝试都必须选择三个相距甚远的基地中的一个作为出发点：夏威夷、印度或澳大利亚。海军的态度使得夏威夷已被排除在外。印度也不理想，从缅甸奔逃过去的英国人能够守住加尔各答就已经算是幸运的了。这样一来，艾森豪威尔的选项就只剩下澳大利亚了。共有两人被派驻到那里监督同盟国的工作成果：在管理和供需方面都有不凡功绩的陆军航空兵团中将乔治

·H. 布雷特，以及麦克阿瑟的老友、美国驻新西兰大使帕特·赫尔利。与此同时，罗斯福还授权已经被派驻澳大利亚的布里尔顿花费1 000万美元雇用那些愿意偷渡过日军封锁线执行不定期运输任务的货船。

路易斯·莫顿写道："试图偷渡过日军封锁线的故事充满了孤注一掷的努力，最后却以失败告终。"对一直被克拉克—伊巴机场的惨烈回忆所困扰的布里尔顿而言，这又将是一次令他备感羞辱的行动。只有少数几条货船的船长愿意不计任何代价地冒险航行。利用这些货船以及美国从联合水果公司雇来的几艘香蕉船和几艘改装后的"一战"驱逐舰，布里尔顿与后来参与行动的布雷特和赫尔利试图将堆放在布里斯班达拉加塔码头上成山的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全都运送出去。一些船出发后便失踪了，面对越聚越多的日本军舰，很多船长都懦弱地改道而行。相比之下，"彭萨科拉"号护航舰的命运就很特殊。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彭萨科拉"号安全抵达澳大利亚的消息是阴云密布的日子里的"一个亮点"。在它的护送下，两艘速度最快的舰船得以北上，其中一艘名为"海岸农夫"的船到达了棉兰老岛的欣奥奥格海湾。欣喜若狂的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表示，这证明了"敌人的（封锁线）覆盖范围十分稀疏，很多路径都可以长驱直入，包括从火奴鲁鲁出发直接向西航行的航线"。然而，欣奥奥格距离科雷希多岛有600多英里。船体太大的话很容易成为日军枪炮的目标，无法继续前进。因此，船上的货物不得不转载到岛际轮船"埃尔卡诺"号和"天兔座"号上，然后进一步转由其他当地船只进行运输。"海岸农夫"号上搭载的1万吨货物中只有1 000吨口粮（仅够麦克阿瑟的部队勒紧裤腰带维持4天），被顺利卸载在了科雷希多岛的南部码头上。其中一些口粮是由一名菲律宾志愿者、货船"黎牙实比"号的船长在两艘鱼雷快艇的引领下穿越小岛周围的雷区送过来的。他上岸的时候，麦克阿瑟和奎松都走上前去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事后这位船长提到，看到一位岛民"愿意为了自己的祖国而冒生命危险"，将军竟然"哭得像个孩子一样"。在返程的途中，"黎牙实比"号搁浅了，就此报废。

对于像海军作战部部长威廉·F. 哈尔西上将这样的勇猛之士来说，

有可能在这条封锁线上完成的事情是永远不可估量的。和后续发生的历史事件不同，同盟国在太平洋上的前哨基地于那年冬天全部沦陷的结局并非不可避免。比方说，人们普遍认为威克岛的困境是可以缓解的。海军少将弗兰克·杰克·弗莱彻被委派带领强大的特遣部队前去为威克岛解围。然而，胆小的弗莱彻在百般推辞之后带兵撤了回来。一旦日军在威克岛、关岛和吉尔伯特群岛上掘壕固守，就可以牢牢护住自己的东翼，从而进一步固守菲律宾。直到1月中旬，小型船只还能趁着夜色抵达科雷希多岛。然而，到了2月底，在海军仍旧不愿意牺牲护航舰上一兵一卒的情况下，只有潜艇、轻型飞机和偶然的一艘幸运的小船能为麦克阿瑟带来些许的补给。

在战火点燃吕宋岛的5个月中，没有任何一个美军士兵、一架战斗机或一艘战舰踏足过科雷希多岛。赫尔利雇用的6艘货轮没有一艘在宿务岛的北部停靠。将军在电报里告知布雷特，自己已经通过无线电与一个菲律宾承包商（阿纳根伐木公司）商议好要在欣奥奥格卸下一批货物。尽管这对于一位受困的指挥官来说已经是不小的成就了，但依旧是徒劳无益的。就连名字充满异国情调、准备发往吕宋岛的货船“唐伊西德罗”号和“纳蒂夫人”号装载着50万份军粮和近400万发子弹在码头旁整装待发，也只能干等。联络线始终没有被打通。也许它们无论如何也只能沉没。布雷特发回电报，称两艘冲破了封锁线的船只正在前往欣奥奥格的途中，但这两艘船的船长可能惧怕日本海军的淫威，从而掉转了船头。麦克阿瑟唯一可以依靠的船只便是潜艇了。那几个月中，共有5艘潜艇7次成功抵达了小岛。其中一艘名为“海狼”号的潜艇为他带来了37吨弹药。将军考虑过让“海狼”号在返航的时候装载上菲律宾的金条和银条，却最终决定让陆军和海军的飞行员先行上船。（他告诉他们，“毫不夸张地说”，他们的价值和“金子一样重要”。）后来，由于“鳟鱼”号的船长需要找些东西来压舱，一部分金条和银条便被装载到了这一艘潜艇上。

最后几艘向南偷越封锁线的船只中，有一艘搭载着一批战地记者到

达了布里斯班。在九死一生之中逃离烽火连天的群岛地区之前，他们一直都在报道当地军民反抗日军的战况。下船后，他们发现澳大利亚人和科雷希多岛上的居民一样惧怕日本人的屠杀。赫尔利觉得他们内心会感到恐惧也是人之常情，他在一封写给马歇尔的长篇电报备忘录中写道，鉴于“澳大利亚目前的国防准备情况”，这个国家“过于薄弱”的力量不足以驱赶敌人。尽管艾森豪威尔也认为在对日军发起强烈攻势之前应该先击败德国，但他相信一旦敌人夺取了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切断了美国与澳大利亚之间的补给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同样只有死路一条。为了应对这一威胁，装载着部队和飞机的运输船掉转了船头，但没有一艘驶向马尼拉。同盟国的基本策略保持不变：希特勒仍旧是首要目标。在科雷希多岛开始抵抗时，德国的U型潜艇就在美国东海岸击沉了206艘船只——沉船的总排水量达1 205 583吨。然而，运输船仍在每天不停地发往埃及和英国。轰炸机群就这样送过了整个大西洋，1月26日，美军士兵开始登陆北爱尔兰，尽管已经在摩尔曼斯克航线上损失了69艘舰船，同盟国仍在为了加速给苏联补充坦克和军火做着艰苦卓绝的努力。

这些对于曼努埃尔·奎松来说都不起作用。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平安夜那一天，在离开首都时，他和他的内阁“满心相信充足的援军会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被迫投降之前前来营救美、菲军队，并采取攻势将敌人驱赶出境”。此时此刻，他的疑虑正与日俱增。然而，每当他向麦克阿瑟提起这些疑虑时，将军都会安慰他：“我的刺刀刀尖直指马尼拉，定会将胜利带回你的身边。”奎松顺从地回答：“我什么都愿意做，只要美国政府认为这能有帮助。”然而此情此景之下他却萌生了谋反的想法。1月22日，正当他坐在隧道入口处的帆布帐篷里拍打着身边飞过的苍蝇时，广播里响起了罗斯福的一段“炉边谈话”。罗斯福总统首先言辞激烈地叙述了同盟国打败德、意两国的决心；日本被排在了后面，且后续的广播内容中并没有提及菲律宾。奎松总统的脸越来越红了。最终，他朝着所有能够听到他喊话的人怒吼道：“过来，听听这个恶棍说的话吧！简直就是恶魔！这就是美国的一贯作风，它可以为了远房表兄欧洲的命运愤怒地挣扎，却全然不顾自己的女儿菲律宾正在密室

里遭人强奸！”他召来麦克阿瑟，开口问道：“我为什么不能回到马尼拉，成为战俘？”

将军预言，日本人应该会把奎松作为傀儡软禁在马拉卡南宫，在各种声明中伪造他的名字。他还暗示奎松，这样做定会让在巴丹半岛上奋战的菲律宾人认定他们的总统是一个叛贼。奎松的怒火平息了下来，但还是在没有征询麦克阿瑟意见的情况下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发去了一封电报，提醒他：“这场战争并不是我们咎由自取的。”他表示，没有哪个政府“有权利在没有意愿或能力切实保护自己的人民时，还要求他们效忠自己”。他说：“华盛顿方面似乎没有彻底认清我们的情况，也没有充分了解到忽视我们的安全与幸福会让这里的人民做何感想。”他请求对方伸出援手。

面对这份意味深长的请求，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答复本身就让人很难理解，就更别说出手进行防御了。罗斯福说：“尽管我此时此刻很难说出援军可以到达菲律宾的日期……装满必要物资的……船只已经被派往马尼拉。我们的军队，以及我们同盟的军队沉重打击了敌军的运输船和海军军舰……源源不断的战斗机和驱逐机正穿越太平洋……大规模的军队登陆行动得到了兵力充足的海军护航队的保护。”很难捏造比这与事实更加不符或是更有可能自食其果的陈述了。10天之后，罗斯福总统通过电报通知卫戍部队，美国已经不能为他们再做更多了。在这则翻脸不认人的通知的结尾，他告诉麦克阿瑟：“我完全理解你很快即将陷入绝望的境地，因此把这个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你。”

火冒三丈的奎松还没来得及回应，另一则消息便又传到了他的耳边。这一次的发送电台距离他近了很多，就在海湾对面被日军占领的马尼拉。老将军埃米利奥·阿奎纳多在电报中催促他向占优势的日军屈服，放下手中的武器。他的话音刚落，一位日本军官就走上来用英语和他加禄语宣布，东条英机首相决定在不久的将来承认菲律宾独立。奎松总统口述了一则发送给罗斯福的信息，控告自己和自己的人民已经被美

国“抛弃”，宣告自己“有责任也有权利终止战争”。尽管在麦克阿瑟的劝阻下这条信息并未发送出去，但将军还是心急如焚，他通过电报告知马歇尔，美国的宣传策略应该以“赞颂菲律宾人民的忠诚与英勇”为目的，以抵消阿奎纳多的广播所带来的后果。

然而，奎松心中的怨恨仍在滋生。他对卡洛斯·罗慕洛说：“我们必须试图拯救自己，让美国见鬼去吧。我告诉你，我们……的国家正在被毁灭。美日之间的战争并不是我们的战争。”在沉思了两天之后，他将菲律宾内阁成员召集在了一起，询问他们是否愿意支持他要求华盛顿方面立即承认菲律宾独立并随即宣布中立，驱赶所有美、日军队。奥斯梅尼亚和总统最喜欢的菲律宾政客曼努埃尔·罗哈斯不堪其扰，只好不情愿地表示赞同。2月8日，通过战争部渠道，奎松的信件被递交到了罗斯福的手中。奎松在信中指出：“我们已经在没有得到美国一丝一毫援助的情况下奋战了9个月。援兵被送往了其他交战国……似乎并没有到这里来的打算……因此，美国实际上是在自己毫发无伤的情况下利用菲律宾的彻底灭亡来为自己谋求喘息的空间。”他表示：“鉴于这种行径，我们应该采取措施拯救菲律宾人民和国家，避免进一步的灾难。”而唯一的途径，他总结道，就是实现麦克阿瑟在1935年时的梦想——让菲律宾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

这条历史性的消息（第三世界的自由之钟发出的第一个声响）是伴随着科雷希多岛上的两名美国高官的电报一同被递交到富兰克林·罗斯福手中的。高级专员塞尔提到：“如果奎松总统所说的前提是对的，美国援军不可能或是不会及时赶到进行营救，那么我相信他对立刻获得独立和建设菲律宾中立地位的提议便是一项可以遵循的合理方针。”这封由政府高级要员书写的电报洋洋洒洒地叙述了群岛真实的权力结构是如何忽略华盛顿，只重视麦克阿瑟的判断的。这一次，麦克阿瑟对他的观点表示了理解。在谨慎描述了自己在吕宋岛上的不稳定地位之后，他提出了警告：

> 鉴于我既没有空中防护也没有海上防护，你肯定准备好要随时毁灭这里的司令部。你必须决定奎松的妥协计划和我的持久战哪个更有利于留守任务。菲律宾人的愤怒将是美国所遭遇的最暴力的不满情绪。他们每一个人都曾等待过帮助……因而认为自己的支持遭到了背叛……从军事角度来看，问题就在于奎松总统的计划是否就是解决即将到来的损失惨重的溃败最好的可能解决方案。这不会影响菲律宾的最终处境，因为那取决于其他战区的战果。如果日本当局拒绝奎松总统的提议，我们将从心理上加强控制力，因为他们的首相曾公开表示愿意赋予菲律宾独立的地位。如果他的提议被接受，我们也不会失去军事优势，因为我们至少能存活下来，相当于缓兵之计。请为我提出建议。

如果科雷希多岛上的人们此举是有意想要打击华盛顿方面的话，那他们成功了。艾森豪威尔将这一备忘录称为“一枚炸弹”。史汀生在日记中提到，自己在读到奎松密函第一段话的反应是这样的：“我不怪他，尽管他在电报中提及我方多次未能成功派出援兵的事例并不真实。”然而，他第二天却改口判定整篇电报“令人失望……没有一句实话”。他还写道，这其中更“糟糕”的是麦克阿瑟对“军队处境的严肃刻画”以及他“对奎松所表现姿态的部分支持”。史汀生、罗斯福和马歇尔在总统办公室里进行了协商，发现他们的想法完全一致。“这其中的中心问题是道德。”史汀生写道，“道德问题是战争必然悲剧的一部分。下令让别人去送死就必然会遇到这一问题。”他们一致认为，菲律宾是美国的“领地”。在这个节点上向奎松屈服就像是要法国放弃“中南半岛”，让荷兰舍弃“印度尼西亚”，让大英帝国解放“缅甸”和“印度”。

在由史汀生起草的回信中，罗斯福告诉奎松，此次从科雷希多岛上发来的提案是不被接受的。然而他补充道：“只要象征我们对菲律宾人民誓言的美国国旗仍飘扬在菲律宾的国土上，我们的士兵就会誓死保卫你们。无论如今的美国卫戍部队遭遇什么状况，我们也不会放松努力，我们不会停止在外围集结部队返回菲律宾，将侵略军一个不剩地从你们

的国土上驱赶出去。”身处马林塔隧道之外的奎松怒不可遏地从轮椅上站了起来，并告诉身边的人自己是“被误导了才会相信援军有望及时赶来拯救菲律宾”。他夸张地问道：“罗斯福和我，谁的位置更有利于判断什么才是对我的人民最好的？”他筋疲力尽地瘫坐在轮椅上，叫来自己的秘书，口述了宣布辞去共和国总统一职的声明，并表示第二天早上就会签字。不过，第二天破晓时分，他在前去上厕所时碰到了奥斯梅尼亚。奥斯梅尼亚说他正在犯一个错误。如果他坚持要辞职，历史会把他视为懦夫和叛徒。此外，奥斯梅尼亚还说，如果总统把自己的家人带回马尼拉，他的女儿有可能会遭到日本士兵的强奸。蹲在粗糙的木制马桶上，奎松陷入了沉思，最后开口说道：“朋友，也许你是对的。我得好好考虑一下。”几分钟后，罗慕洛也来解手。奥斯梅尼亚对他说：“我相信我们的总统已经改变了主意。”奥斯梅尼亚说的没错。奎松再也没有提起过辞职的事情，这位年迈的爱国者“如火的热情”已经被浇灭了。当得知自己和家人要被先后疏散到澳大利亚和美国去时，他几乎顺从地接受了。

写给麦克阿瑟的回信也是经富兰克林·罗斯福签署的，不过是由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起草的。麦克阿瑟得知，“只要还有任何一点儿抵抗的可能性”，他就要继续奋战。如果实在抵抗不了，投降也是可以被允许的，但让群岛中立是绝对不可能的。回信中接下来的内容如同死亡的丧钟：“至死抵御日军侵略的职责与必要性是我军在菲律宾面临的最至高无上的义务。我特此要求你火速赶往自己的部队和防御工事所在之处，在环境允许的情况下进行有效的抵抗，尽可能地拖延战事。”麦克阿瑟回复道：“我已经在之前的电报中概述了我的计划；这些计划主要在于誓死坚守我在巴丹半岛上目前的作战位置，而科雷希多岛的戍卫也采取相同的方式。我绝不打算让我的菲律宾部队投降或屈服……部队也绝对没有半点儿动摇的意思。我坚信他们会和我的美军士兵一样坚守到最后。”读过这些，史汀生在回电中写道：“总统和我们每一个人都充分认识到了你和奎松超凡的勇气与忠诚。”

就在此时，麦克阿瑟认为自己必死无疑，除此以外绝无出路。有那么疯狂的一瞬间，他再次以为斯大林会来拯救他，于是书写了一份言辞华丽的公报，宣称“目前的世界局势表明文明的希望有赖于英勇无畏的苏联军队可敬的旗帜”。他写道，苏联在自己的首都外围对纳粹发起的“恢宏壮阔的粉碎性反击标志着史上最伟大的军事成就”。公报发出之后，他一直等待着，等待着。塔斯社通过广播用欧亚所有语种播送了他的这一论断。罗伯特·E. 舍伍德指出，“从那时起，苏联宣传者更加倾向于美国军人了”，可苏联红军的运输船却并没有出现在吕宋岛海岸附近。斯大林觉得盟军应该为他创建第二条战线。

科雷希多岛上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谁都不许提及战败的可能性。自12月8日起便被困马尼拉的参谋部军官沃伦·克利尔上校打破了这个规定，向麦克阿瑟表示自己怀疑罗斯福和战争部一直都在撒谎。克利尔说，华盛顿方面从未考虑过要来支援科雷希多岛；他们只是希望麦克阿瑟能够尽可能拖延时间，束缚住本间的部队，延迟日军向南挺进的速度。克利尔相信，那些为麦克阿瑟和奎松提供救援的誓言以及富兰克林·罗斯福发给菲律宾人民的电报只不过意在鼓励他们继续进行顽强抵抗。沉默许久之后，将军言语犀利地答道：“如果你是对的，那么历史上绝不会再有第二支规模如此庞大的英勇之师能够被这般无情地消灭掉！”和他口中说出的许多夸大其词的话一样，这句话若是被细细审视也不牢靠——拿破仑曾在埃及和俄国丢下过同样英勇的军队。但在这种情况下，放任事实是可以理解的。他有理由感觉自己遭到了背叛。按照D. 克莱顿·詹姆斯的话来说：“和医生会给垂死的病人一些虚妄的鼓励一样，从罗斯福和马歇尔口中说出的那些充满希望的语句只不过是意在支持麦克阿瑟及其属下。否则，若是他们知道了事实的真相，也许就不会长时间地坚守下去了。假若事实真是如此，那么这些话对于卫戍部队的勇气与决心来说无疑是一种侮辱。”

尽管罗斯福已经批准了他们投降，但麦克阿瑟是绝不可能向本间低头的。一位历史学家曾称将军是“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战士”，而中世纪的骑士们都是宁可战死也不会投降的。在提到贝当元帅时，麦克阿瑟曾表示贝当“宁愿被砍掉一只手”，也不愿签署勒通德停战协议。他并不打算遵循元帅的先例。在与两位准备乘货船离开小岛的战地记者握手话别时，他说道：“即便你们没有逃出去，即便你们沉入了海里，或是在救生艇里被机关枪射中而死，或是饿死，也不要后悔自己试图离开。因为如果我们得不到救援，这里的结局将是残暴和血腥的。”他毫不怀疑这里也将流淌着自己的鲜血。他说他相信自己“已经走到了路的尽头”。唯一的问题就是他的妻子和儿子是否应该留在他的身边。马歇尔通过无线电转告他，自己会派出潜艇“剑鱼”号来迎接他们，而奥罗拉夫人也建议琼带着儿子和奎松一家一起乘“剑鱼”号离开。然而，琼甚至都没有和自己的丈夫讨论过这个问题。“我们是一根绳上的蚂蚱。”她告诉奎松太太，“我们三个要待在一起。”说罢，她草草给将军书写了一张字条解释自己的心意，然后嘱托艾德福萨里奥中士将它送到隧道里去。麦克阿瑟闻讯出来和她商议。那些受命不得前去打扰的人注意到，将军说话的态度十分诚恳，而琼则一直都在摇头。之后，将军返回了自己的办公室发了一封电报通知马歇尔，他的小家庭打算继续留守岛屿，“与我分担战争之苦”。他对自己的副官说道：“琼是我最好的战士。”另一位副官犹豫了一下，开口询问了小阿瑟的命运。将军斩钉截铁地答道：“他是战士的儿子。”

麦克阿瑟需要一样武器：他的点45口径手枪出了点儿问题，要么是太重，要么是丢失了，要么是放错在什么地方了——有关这方面的记载并不是很清晰。他把赫夫拽到一旁，从兜里掏出了一支小巧的老式大口径短筒手枪。只见手枪套着光亮的木托，带有两支枪管和两个扳机。“这支手枪属于我的父亲，是他在菲律宾驻守时用过的。”他说道，“我想让你找几发它能用的子弹。”手枪弹匣的尺寸很古怪，可据他回忆，赫夫还是想办法“搜罗”来了两枚子弹。将军打开弹匣，装上子弹，然后把枪塞回了口袋里。他凝视着对岸的巴丹半岛，压低了嗓门说

道："他们是永远也活捉不了我的，赫夫。"这也许就是西拉诺在麦克阿瑟身上的体现，但他此话无疑是认真的。很久之后，他告诉弗雷泽·亨特："我满心期待自己被杀。我是永远也不会投降的。如果有必要，我会在最后阶段自行了结。无论如何，我猜我的生命其实早就该结束了。我可能会在空袭或是炮火中丧命……而琼和儿子则可能会在军队最终的溃败中丧生。"

然而，乔治·马歇尔在面对可能失去远东指挥官的前景时改变了主意。麦克阿瑟是同盟国中唯一一位证明了自己知道该如何与日军作战的将军，同时也是公众的信心所在。他是远东地区见识最广博的军官，是美国自开战以来的英雄人物，更是在未来的太平洋战争中不可替代的领导与典范。除此之外，若是他被俘或被杀，将使日本人在心理上获得巨大的优势。马歇尔对于麦克阿瑟不抱任何的幻想，他告诉史汀生，自己预见麦克阿瑟和海军之间将会"同室操戈"，因为麦克阿瑟"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直都在悻悻地抱怨海军"。不过，和艾森豪威尔不同，他相信将军这一次的损失将是毁灭性的。

无论是从政治还是军事的角度来看，罗斯福和马歇尔的看法都很一致。每天都会有人发布营救麦克阿瑟的呼吁。共和党提出了救援的倡导；汉森·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中也推荐营救麦克阿瑟；华盛顿州的民主党国会议员克努特·希尔在议案中提出要任命麦克阿瑟为美国全军最高总指挥官。很多人都在推测麦克阿瑟到底会不会答应撤离。他在西点军校时的同班同学休·约翰逊在自己的报刊专栏中提到，将军是绝不会遵从命令、丢下自己的士兵的，"不管他对于军队的至高权威有多么遵从"。曾在法国与麦克阿瑟并肩奋战过的J·门罗·约翰逊的一席话引起了史汀生的忧虑。他担心除非由总统直接下令，否则麦克阿瑟是不会理睬这样的命令的。赫尔利对他的看法表示了赞同，并发回一封电报指出总统必须"明确下令让他让渡自己的指挥权"。同时，安排麦克阿瑟撤离的计划必须谨慎执行，不得威胁"他作为一名士兵的荣誉与履历"。

总统的新闻发布会上，麦克阿瑟的名字曾两度被人提起。第一次，富兰克林·罗斯福被问及将军和华盛顿方面就援军未到的问题是否存在摩擦。罗斯福一反常态地变得语无伦次起来："我不会做任何……嗯，我不会……我试着从自己的身上吸取经验。我觉得别人也应该这么做。我……对此知道得不多……我试着不去怀疑我自己。"第二次，一位记者问道："总统先生，您是否愿意谈谈有关下令让麦克阿瑟将军撤出菲律宾的争论以及赋予他整体指挥权的话题？"他回答："不，我不想谈这两件事情。我觉得这只不过是他们对情况不甚了解的情况下所说的话而已。"暂且不说其他的好处，把将军从菲律宾的困境中解脱出来的确能够为白宫减轻不少压力。

然而，要不是澳大利亚的介入，麦克阿瑟必然是要被丢在科雷希多岛上等死了。作为英联邦的成员国，澳大利亚的盎格鲁–撒克逊后裔将自己的年轻人送去北非沙漠与隆美尔作战。如今，他们的国家又正好位于日军的侵略路径上。澳大利亚总理约翰·科廷直言不讳地告诉丘吉尔，希望将自己的3支澳大利亚军团立刻调遣回国。丘吉尔在回复中表示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同盟国能将德国人阻挡在苏伊士运河以外。罗伯特·E. 舍伍德指出，"在此关键时刻，英国和澳大利亚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张"。要想平复这股蔓延整个西南太平洋地区的恐慌情绪，就必须采取某些措施，并且要尽快动手。

解决问题的关键落在了荷兰军队在爪哇沦陷那一天罗斯福与丘吉尔之间达成的一个共识上。在美—英—荷—澳联盟（ABDA）已然崩溃的情况下，根据一项新的约定，英国将承担保卫缅甸和印度的责任，而美国则负责保卫整个太平洋。这就将澳大利亚置于美国的管辖范围之内。收到这个信息，科廷召开了一次内阁特别会议。2月21日星期六，经过正式投票，他们修改了自己的要求，表示只要委派一位美军将领担任他们战区的最高指挥官便可收回撤军的要求，同时还要求这位将领携美军部队一同赴澳。新西兰也对此表示赞同。于是，丘吉尔便将整件事都摊在了罗斯福面前。即将展开的阿拉曼战役结果悬而未决。失去澳大利亚

军队，蒙哥马利元帅必输无疑。只要美军向澳新地区做出郑重承诺，他就可以保有这支军队，进而取得战役的胜利。

2月22日星期日下午，总统坐在白宫二楼的书房里权衡起了这几个选项各自的利弊。他知道丘吉尔心中想的是哪一位将军。“1941年12月下旬，我拜访白宫时曾从总统和史汀生先生口中获悉了麦克阿瑟将军和科雷希多岛上的美国卫戍部队的命运。”这位英国首相在回忆录《最光辉的时刻》中写道，“我觉得应该向他们展示一下我们的总指挥在面临自己原先的部队兵力缩水这一处境时所采取的方法。”他向他们展示了自己要求戈特勋爵从敦刻尔克撤退时下发的那道命令。当时，同盟国在法国以及低地国家的处境十分绝望，因此大撤退剥夺了德军获得“不必要的胜利”的机会。据丘吉尔回忆：“总统和史汀生先生全神贯注地阅读了这封电报。他们的感想让我很受触动。那天晚些时候，史汀生先生前来找我索要一份电报的复印件。我当即便给了他一份。”在阴冷的乔治·华盛顿诞辰（2月22日）那一天，随着窗外暮色渐浓，罗斯福把这封电报摆在面前，心中暗自下了一个决定。如果有可能的话，他们必须要拯救麦克阿瑟。但他现在还不能告诉科廷，毕竟将军能够成功逃离菲律宾的概率并不高。知道的人越少，风险也就越小。

2月的第三周，对这一重大决定毫不知情的将军和塞尔一家、奎松一家道了别。在塞尔登上“剑鱼”号的甲板之前，麦克阿瑟对这位高级专员说道：“等你看到明天的太阳时，就说明你已经到了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了。”他和奎松的道别词则更加情绪化一些。麦克阿瑟半提着这位老人的胳膊，搀扶着他走上了“剑鱼”号的踏板。奎松将自己的图章戒指脱了下来，戴到了将军的手指上，断断续续地说道：“等他们找到你的尸体，我希望他们知道你是为我的国家战死的。”潜艇悄悄地开走了。和其他人一起留守小岛的罗慕洛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个一个全都抛下我们走了。”

潜艇的舱体内摆放着一个军用提箱。据箱子上的地址显示，这是寄

往华盛顿里格斯国家银行的，上面还明确标明，只有麦克阿瑟的合法继承人才能将它从保险箱里取出。箱子里装着他的奖章、结婚证书、遗嘱、一些股票和债券、不到100美元现金、小阿瑟的洗礼证明以及琼从杂志上剪下来的几篇有关将军的文章。

麦克阿瑟第一次模糊地感觉到自己还有可能活着取回这个提箱是在收到马歇尔发来的一封简短的电报时。马歇尔提醒他，总统也许会派他前往棉兰老岛组织菲律宾南部岛屿的防御工作。2月23日，马尼拉时间上午11点23分，由罗斯福、史汀生和马歇尔起草的总统令通过马林塔隧道的无线电被传送了过来。中午12点30分，解码后的电报内容被递交到了将军的手中，并指派将军前往棉兰老岛视察当地进行“长期防御”的可行性。不过，在那里停留不到一个星期之后，他还要继续前往墨尔本，并得知自己“将在那里就任美国全军指挥官”。

几分钟后，美联社的克拉克·李看到麦克阿瑟面对这一剧变感到十分惊讶的样子。他看上去一下子老了许多，而且满面病容，“一贯展示出来自信神采也都灰飞烟灭了”。在所有的参谋中打听了一番之后，李只知道将军刚刚收到了华盛顿方面发来的一封重要电报。据赫夫形容，将军“厉声”质问麦克阿瑟夫人在哪儿。在得知她正身处隧道的另一条支道中之后，他穿着高跟军靴和萨瑟兰一起迈着大步走了过去。萨瑟兰、琼和将军一同回到了灰色的茅草屋。据赫夫回忆，他们在那里待了“很长一段时间”。紧接着，麦克阿瑟吩咐萨瑟兰在马林塔隧道中召开一场参谋会议。所有军官到齐之后，将军向他们宣读了总统的电报，表示自己正面临让人难以忍受的两难境地。如果违背罗斯福的命令，他将被移交军事法庭受审。如果他遵从这条命令，就必须丢下自己的士兵。因此，他打算辞去自己的职务，返回巴丹半岛，应征成为“一名普通的志愿者”。

与会的人员纷纷表示反对。整整一周，岛上到处都充斥着流言，说

澳大利亚正在组织一支强大的救援远征军。他们认为，麦克阿瑟此行肯定是被派去领导这支远征军，以赶在卫戍部队弹尽粮绝之前回来营救他们。将军告诉大家，自己想要重新审视一遍华盛顿方面自平安夜以来发来的所有电报。结果似乎印证了参谋们的解读。事实上，在重新仔细研读这条命令之后，他们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据舍伍德说，电报的措辞之所以故意有些模棱两可是因为“罗斯福清楚要麦克阿瑟离开科雷希多岛，会在他指挥的英勇之师乃至整个美国引起强烈反响，如同是在命令船长第一个离开正在下沉的船只”。因此，富兰克林·罗斯福是在试图缓和这一冲击，不料麦克阿瑟将军却再一次误解了他的意思。

无论如何，麦克阿瑟还是通过口述草拟了一封辞职信。听从了萨瑟兰的建议，他同意等到明天早上起床之后再将信函发送出去。第二天一早，考虑到大规模反击的重要前景，他致电罗斯福表示自己同意离开。不过，基于对“菲律宾情况的了解”，麦克阿瑟在电报中要求获批由自己来选择合适的“心理时间”，因为“不恰当的时机很有可能导致如此精密的行动突然失控”。第二天，马歇尔给他发来了回电：“总统已经仔细考虑过了你的情况。考虑到这一行动事关吕宋岛能否得到牢固戍守，他指示由你自己来全权掌控出发时间和具体方式。”9天过去了，麦克阿瑟似乎有些摇摆不定。3月6日，华盛顿发来了另一封密电，可他还在犹豫。此时已经搬进麦克阿瑟隔壁那间小屋（也就是奎松原先居住的地方）的卡洛斯·罗慕洛认为，将军“发自心底地认为自己背弃了与岛上所有军民同生共死的誓言”。

3月9日，罗斯福再次催促他上路。当时，将军已在属下的一再要求下转变了心意，只是不知道该如何撤离。他在电报中写道，自己希望于3月15日离开科雷希多岛，预计于3月18日到达澳大利亚。某一刻，出于独裁的心境，他告诉属下：“我们要在月落之时行动，在3月15日前后启程。”他计划乘坐“鲹鱼”号离开，可这艘潜艇最早也要3月13日才能到达小岛，而他发现自己并没有那么多的时间。随着将军即将撤离的消息在总统新闻发布会和美国各大报纸、广播散播开来，日本人已经听到了一

些风声。在东京方面看来，他想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穿越日军控制的长达250英里的海域（其中有些在海图上有所标注，有些根本就无迹可寻），简直就是天方夜谭。科雷希多岛上的美国海军军官认为他顶多只有20%的胜算。“东京玫瑰”预测将军离岛不出一个月必被擒获，而日军则希望在那之前就能将他关进战俘营。菲律宾瞭望员通过电报给科雷希多岛发来战报，提示他们一支日军驱逐舰队正加速由北方向菲律宾南部靠近。每天早晨前来科雷希多岛巡逻的侦察队数量翻了3倍，位于巴丹半岛西北部苏比克湾海面的舰船活动也明显增多。“很显然，日本海军不仅期待麦克阿瑟将军离开科雷希多岛，还打算不顾一切将他拦截下来。”巴尔克利中尉后来写道。

留着一脸大胡子、看上去孔武有力的鱼雷快艇指挥官巴尔克利（麦克阿瑟称他为“巴克”或“长着冷峻绿色双眼的英勇牛仔约翰尼·巴尔克利”）的名字已经在将军的脑海中停留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了。巴尔克利的第三机动鱼雷快艇舰队正停靠在巴丹半岛斯斯曼海湾旁的一个小型的渔业码头旁。如今，这支舰队只剩下4艘由报废船只拆解下来的零件拼凑而成的破旧小船。不过，麦克阿瑟对于这些鱼雷快艇倒是格外有感情，因为它们不仅是由他亲自引进的，而且十分贴合他的冒险精神。3月1日，他命令在金德利机场上停靠的最后4架P–40战斗机竭尽全力在马尼拉湾上空4英里范围内掌握半小时的制空权。与此同时，巴尔克利从斯斯曼的高脚屋中将PT–41号快艇的17名水手从床铺上叫了起来，吩咐他们立即出发执行一项紧急任务。

水手们本以为自己要朝中国方向进发，结果却驶往了北码头迎接麦克阿瑟和琼。麦克阿瑟想让妻子体会一下乘鱼雷快艇出海是怎样一番感受，不料，平静的海湾却并没有展示出风大浪大的公海所具备的威力。然而，即便是如此温和的海浪仍让琼呕吐不已，她也还是坚持要按原计划出行。不过，返回到岛上后，麦克阿瑟在自己的地下战地指挥所里再一次召开了参谋会议。他表示，敌军加强海上活动频率的意图十分明显。如果他要走，就必须尽快行动。因此，他指定了新的出发时间——

3月11日星期三的日落时分。他说："巴克告诉我，我们还是有机会乘坐鱼雷快艇冲破封锁线的。虽然这并不容易，也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我们共有4艘船，且船上搭载的机关枪和鱼雷足够我们在必要时与敌军的战舰奋战一番。当然了，这些船也有足够的速度。如果我们能够乘船到达棉兰老岛，澳大利亚方面派出的轰炸机便可以在那里与我们会合，带领我们走完剩下的路。"

当晚，他通过电报通知布雷特，要求他调派3架B–17轰炸机前往棉兰老岛的德尔蒙特机场。在接下来的10天里，他每天早上都要与巴尔克利开会商议接下来的行程中的每一个细节。他嘱咐这位中尉，第三舰队在星期三的撤离行动之前不得参与进攻突袭，因为他们不能冒险损坏船只或浪费汽油。到了从马尼拉湾出发的那一刻，菲律宾的伪装猎潜船将从苏比克湾出发，造成鱼雷快艇在那里活动的假象。与此同时，巴尔克利的舰队将呈钻石队形行进，由PT–32号、PT–34号和PT–35号分别占据一垒、本垒和三垒的位置，而中尉的旗舰PT–41则带领它们占领二垒的位置。由于4艘船上都没有配备哑罗经刻度盘，船队的导航只能依靠指南针、不尽精准的海图和航位推测法。在萨瑟兰的陪同下，将军将偕家人搭乘PT–41号快艇，罗德威尔将军则乘坐PT–34号快艇。巴尔克利预计他们将于星期四黎明时分到达位于科雷希多岛以南250英里处、苏禄海北端的塔加瓦延岛。如果这支小型舰队遭到攻击，旗舰将趁其他3艘舰船与敌军交火之际掉转船头，试图逃脱。此外，他们还设计了备用的集合与藏身地点，以备几艘舰船在交火过程中或因其他原因走散时使用。

麦克阿瑟下达了口粮配给命令，以确保位于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上的卫戍部队能够维持到7月1日，也就是他预期可以返回的日子。他还起草了自己的乘客名单。尽管罗斯福只批准他一人离岛，尔后战争部又将琼和阿瑟囊括进来，但麦克阿瑟是不会让乔治·马歇尔或任何人来决定谁能够在这样的场合下陪伴他的。他已经准备好了要和自己的士兵共存亡。不过，他的参谋长可不是这么想的。虽然麦克阿瑟可以接受这样

的想法，但只要他还活着，就要活得风风光光。此外，如果他很快就要领导一场大规模反击的话，就需要自己的人手。而他现在对这场反击已经感觉很肯定了。因此，除了麦克阿瑟夫妇以及阿瑟的广东籍保姆之外，这一批名单中还包括了13名陆军军官、两名海军军官以及参谋军士（一名技术员）。直到整个行动结束，马歇尔才知道参与撤离的居然有这么多人。他表示自己“很震惊”，而这也恰好证明他是多么不了解专制独裁的麦克阿瑟。一行人中最受争议的自然是阿秋。将军之所以要带上她是怕她被日军当作他的家人，从而将她折磨致死。这些都是猜测。考虑到后来被敌人俘虏的那些人的命运和“巴丹死亡行军”等，较为合理的是他应该选择别人，比方说隧道里的一位护士。

麦克阿瑟将自己最重要的道别仪式留给了温赖特。萨瑟兰从巴丹半岛上将这位坚韧的老骑兵召唤了过来。在隧道中，参谋长嘱咐他，在麦克阿瑟不在的这段时间里，他将负责指挥吕宋岛上所有的部队，而且“如果有必要的话，琼斯（乔纳森）将升任一级将衔、接手军团”。之后，两人一同走向了灰色小屋。在那里，将军正穿着他们刚刚上岛时中国裁缝为他做的那件破旧的卡其色夹克等待着他。向来就骨瘦如柴的温赖特在口粮被减至原先的3/8之后更是瘦得只剩下皮包骨。他默默地站在那里，眼睛瞪得圆鼓鼓的，而麦克阿瑟则佯装欢快地拿出了一盒奎松留下的雪茄和两瓶剃须膏。他们在门廊上的沙发椅上面对面地坐了下来。将军开口说道：“乔纳森，我想让你清楚明白地理解我的处境。我是迫于总统反复下达的命令才不得不前往澳大利亚的。事情已经到了我必须逆来顺受、不然就会被军队开除的境地。我想让你告知手下的每一个小分队，我是在反复抗议无效的情况下才离开的。”

温赖特表示自己自然会转达。麦克阿瑟继续说道：“如果我能够抵达澳大利亚，你知道我是会尽快赶回来的。与此同时你要撑住。”温赖特回答，保卫巴丹是“我们人生的目标”。紧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你们会抵达的。”将军厉声纠正他：“——然后还会回来。”他站起身来握住了温赖特的手：“再见，乔纳森。等我回来的时候，如果你还在巴丹

半岛上，我就升你做中将。”温赖特回答：“只要我还活着，就一定不会离开巴丹半岛。”他巧妙地忽视了晋升的承诺，尽管这是另一个不幸的误会的关键。麦克阿瑟并没有告诉乔治·马歇尔自己计划坐镇澳大利亚协调菲律宾的防御行动。在这样的指挥结构下，让巴丹半岛停止抵抗将使群岛其他岛屿上的部队得以继续战斗。然而，马歇尔已经决定要升温赖特为中将，并将整个菲律宾部队的指挥权都交给他。这就意味着温赖特有权让群岛上的所有战士缴枪投降，如果日军意识到了这一点，便可威胁他屈服，否则就处决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上的每一个人——事实真的就是这样发展的。

由于巴尔克利早就警告过将军自己无法为他们提供任何食物，琼和赫夫一直都在默默地尽力收集口粮，其中多半是三文鱼罐头和橘子罐头。他们将这些食物塞进了4只旅行袋中，一只船上放一只。巴尔克利还说，自己不得不将每位乘客的行李数量限制为一只不超过35磅的手提箱。他亲自将麦克阿瑟的行李提上了PT–41号快艇。阿秋的随身物品少得用一块手帕就能包得住。琼带上了自己的小手提箱，里面装了一条连衣裙、一件大衣和一套裤装。按照巴尔克利后来的话来说，那套裤装“在旅行结束的时候已经破旧得无法修补了”。小阿瑟身上穿着一件蓝色的拉链夹克衫，一条卡其裤，头上还顶着他倍加珍视的船形帽。他手里抱着自己的玩具“老朋友”和一只6英寸长的玩具摩托车；他的三轮车不得不被留在了岛上。他的父亲（一如他生命中经历过的许多重要场合的打扮一样）身上并没有穿着军装。他的脚上套着平民的袜子和印着花俏格子图案的棕色便鞋（翼尖上还带着装饰性的小洞），身上一件行李也没有，连剃须刀都没有带，他打算借用巴尔克利的。

随着暮色缓缓降临在科雷希多岛上空，PT–41号快艇悄悄靠了岸。船上搭载的4 050马力的帕卡德三轴发动机尽可能安静地空转着。他们的身旁就是岛上拔地而起的陡峭悬崖，山顶上架着的几门美军大炮已然对准了马尼拉湾中的日军。巴尔克利待命的这片区域基本上已是一片荒芜。被炸弹炸毁了的南码头早已被废弃，原先郁郁葱葱的植被也已不复

存在。视线所及的每一座建筑、小屋和每一棵树木都残破不堪，被烧得面目全非。地面上随处可见硕大的裂缝，扭曲的岩石上还残留着大火烧尽后的黑色污痕。赫夫扶着琼和阿秋上了船，脚踩着烧焦的木头时还险些失足摔倒。小阿瑟紧紧地攥着“老朋友”，跟着跳上了船。天色很快便暗了下来。这是一个没有月亮的夜晚，汹涌的海浪似乎并不是什么吉兆。赫夫感觉：“巴丹半岛的命运已经注定，但我们心中还存有一丝期待，希望海面上会有什么幸运的事情在等待着我们。”

作为指挥官，将军是最后一个上船的。他在荒芜的码头上面对着科雷希多岛伫立了许久。穿着那条破旧的卡其裤，他的背影看上去既纤弱又绝望。他的脸色惨白，嘴角也有些抽搐。他举起了自己那顶装饰着金色穗带的帽子。头顶的悬崖上，炮兵队的指挥官名叫保罗·邦克，是麦克阿瑟任西点军校橄榄球队经理时的全美陆军代表队的中卫。美军的大炮开始发射牵制敌人火力的炮弹。伴随着炮口闪烁的红光，低沉的轰鸣声跟着响了起来，空气中飘荡着腥臭火药味的阴霾。将军重新戴上帽子，踏上了PT–41号的甲板。他开口吩咐道：“等你准备好就可以解开缆绳了，巴克。”巴尔克利驾船悄悄地朝着海湾内的转弯浮标驶去。晚上8点整，另外3艘鱼雷快艇从岛上其他位置以及巴丹半岛上的隐蔽水湾处接上其他乘客后赶来与他们会合。舵手们都很紧张。几架P–40战斗机在紧急关头进行航空侦察时发现日本的一艘驱逐舰和一艘巡洋舰正加速朝这片水域驶来。在海军布雷舰的带领下，巴尔克利率先驾驶着执行护送任务的小船呈两列纵队穿过了雷区。晚上9点15分，四位年轻的船长打开了各自船上的节流阀。船舷两边掀起的巨浪在他们的身后卷起了一串串湍急的白色泡沫。如庞然大物般的科雷希多岛从视野中渐渐退去了。船队恢复了钻石队形，朝着凝重的夜色向前驶去。

“二战”时期的鱼雷快艇体型矮胖、空间狭窄，船体由红木制成，长77英尺，宽20英尺。这些被日本人称为“绿龙”的小船一般在晚上出击，

船上搭载4支鱼雷发射管和4挺点50口径的机关枪——两边船舷各架两套，同时射击。按照巴尔克利的话来说，这些快艇的构造设计就是为了“咆哮着对敌人发起致命的一击，然后快速沿之字形路线撤离，躲避敌军的炮火”。据《简式战舰大全》记载，处于最佳状态时，这些快艇上的三个螺旋桨能够推动船身以45节（52英里/小时）的速度前进。不过，这些发动机每运行几百个小时就应该更换一次。在历经了三个月的战斗之后，在缺乏备用零件和必要保养的情况下，机动鱼雷快艇第三分队的船只发动机的工作时间已经超出了正常使用寿命的4倍。在碳粉和铁锈的阻塞下，发动机的最高时速只能限制在23节（26英里/小时）。敌军全速可达35节（38英里/小时）的“四烟囱”驱逐舰轻易便可以超过他们。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被零式战斗机、“贝蒂”轰炸机或“齐克”战斗机看到，就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就此终结；飞行员可向区域内的日军驱逐舰发出警示，过来围攻他们。在麦克阿瑟长途跋涉，最终安全到达目的地一年之后，时任海军中尉的约翰·F.　肯尼迪才发现他们当时毫无防备得就如一叶扁舟一样。其实早在将军第一次来视察这些小船时，巴尔克利就曾告诉过他船上没有携带任何的武器。“那些是什么？”麦克阿瑟边问边伸手指了指油门下方隆起的那些看上去像是钢盾一样的东西。巴尔克利解释道，那些只不过是3/8英寸厚的胶合板，起着避免水花干扰舵手视线的作用。

四溅的水花像漫天飞舞的纸屑一般抽打着水手们的脸庞。穿过汹涌澎湃的浪花，帕卡德发动机输出的1.2万马力导致整个船身都在颤抖。行驶在风大浪大的海面上时，船身的震颤感简直无以言表。在冲刺最高时速的过程中，船舷明显抬离了水面，滑行中的船身用力拍击着浪端的白色泡沫。据船上的一位乘客回忆，这次的航行“危险性极大”，船简直就是“一匹烈马和一个颠簸的浴盆的结合体”。星期三晚上的海面格外狂躁不安。民都洛海峡整个下午都阴云密布。据PT–34号快艇的船长R.　G.　凯利中尉回忆：“风暴和强劲的东风将泛着泡沫的海浪咆哮着卷到了座舱上空15英尺甚至20英尺的空中，打得船舱上所有的人都浑身湿透。此外，由于速度、水花和风力的原因，船上异常冰冷。我们的双筒望远镜

也灌满了水。咸湿的海水不断刺痛着我们的双眼，再加上周围漆黑一片，害得我们什么都看不见。”他们被迫不时猛然掉转船头避让暗礁，或是一起停下来晾干发动机里的磁电机。然而，停下来的那段时间往往是最危险的，因为一旦引擎关闭，船身便会剧烈地上下颠簸，似乎随时都有可能倾覆过去。

麦克阿瑟和他的儿子以及阿秋都痛苦不堪。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令将军最为担心的琼却成了这条船上最不让人操心的乘客。小阿瑟和他的保姆一起躺在两位军官的下层床铺上，而且小阿瑟还发着烧。就在他们旁边的地板上，麦克阿瑟伸展着四肢躺在一个床垫上，脸色惨白，双眼都已被黑眼圈所包围。尽管他的胃在第一次感到恶心痉挛时便已吐得空空如也，此刻还是会不断地干呕。战败的怒火以及被迫抛弃属下的屈辱感交织在了一起。这对此时正忍受着无以言表的肉体折磨的他来说简直就是雪上加霜。就一位62岁老人的身体来说，这很有可能是致命的。他的四肢都已经僵直，根本就无法移动。琼只好连续几个小时跪在他的身旁，为他擦热手脚。事后将军写道，自己就像是坐在“混凝土搅拌机里旅行似的”。

预计到前方可能会有惊涛骇浪，巴尔克利希望沿着风浪较小的左舷船首方向行进，绕过岛屿。卡夫拉岛和阿波岛的海岸上出现的篝火证明这一做法显然是愚昧的——这一历史悠久的信号表明敌军发现有人正试图趁着夜色穿越封锁线。显而易见，日军的海岸瞭望哨发现了他们的行踪，企图警示面积更大的吕宋岛和棉兰老岛上的日军哨兵。一旦这一信息被传递过去，侦察机便会在黎明时分前来搜寻，而炮艇也会紧随其后。后悔不已的巴尔克利赶紧向西掉转船头，消失在了地平线上。

夜里11点，在经过阿波岛模糊的海岸线过程中，4艘船上的海军军官一直都在努力保持着队形。凌晨3点30分，队形被打乱了。巴尔克利花了3个小时企图重整队伍，却遍寻不到它们的踪影，因而只好在星期四的破晓时分放弃了找寻，朝最近的备用藏身地点驶去。他们应该找一

处避风岸抛锚，然后将船身伪装起来，等待7点30分的日出。然而，这4艘船都没有按照计划行事。V. S. 舒马赫中尉坐镇的PT–32号快艇第一个接近库约群岛，不过比计划时间晚了两个小时。借着第一道曙光，舒马赫相信自己看到一艘敌军驱逐舰正在朝自己追近。于是，他抛弃了装载在甲板上的一些汽油——那本是供这艘快艇赶往棉兰老岛的必要燃料——拴紧节流阀，提高了些许船速。另一艘船不断缩短着与他之间的距离。做好战略部署之后，他掉转船头准备向对方发起攻击。千钧一发之际，一位陆军军官认出了那其实是巴尔克利的PT–41号快艇。原来是大雾将船身的影子莫名放大了好几倍。那位军官大声喊道："不要开火！"用威洛比的话来说："幸好有惊无险——简直就是'死里逃生'。"

在一个水湾处停靠下来之后，他们开始比对船体的伤痕。赫夫心想，他们看上去就像是一群"残兵败将"。显而易见，舒马赫的32号船不得不被抛弃了。除了损失的几只汽油桶之外，船上的两台引擎都已经彻底损坏，船身还因支柱松动的问题产生了裂痕。后来他们得知，A. B. 埃克斯少尉的PT–35号快艇也因汽油堵塞问题出了故障，船上的乘客不得不自己想办法完成前往墨尔本的后续旅程。凯利的PT–34号快艇两小时后也驶入了水湾之中，虽然有些狼狈但好在船身未受损伤。"我永远也忘不了你们当时的样子。"凯利后来告诉巴尔克利，"麦克阿瑟将军坐在一把柳条椅上，浑身上下湿漉漉的；坐在他身旁的麦克阿瑟夫人也被淋湿了，但脸上还挂着坚毅的微笑；中国保姆怀抱着阿瑟·麦克阿瑟，两人不仅浑身湿透而且还在晕船。可以看出，（阿瑟）心情非常不好却又不想承认，下巴绷得紧紧的——和他的父亲看上去一模一样。"

看到山洞前的海岸风景十分优美，这孩子便想在上面玩耍一会儿。不料，巴尔克利却抱歉地告诉他谁也不能上岸，因为那里实在是太危险了。为了补偿他，巴尔克利带他去认识了一下41号快艇上的厨师带来的一只名叫"东条将军"的猴子。阿瑟欢快地追着宠物猴钻进了船上的厨房。那时，麦克阿瑟已经站起身来，在小甲板上来回走动了起来，还不时停下与巴尔克利以及凯利船上的乘客洛克威尔上将攀谈。将军面临着

一个艰难的决定。按照原先的计划，他们星期四一整天都应停靠在林加延，等待于下午5点钟左右离开。“鲹鱼”号潜艇将在那里等待一行人，带他们通过水下继续接下来的旅程。麦克阿瑟对此很是心动。巴尔克利曾经警告过他们，余下的路途会比昨晚更加艰难。但由于遭遇了走散的状况，林加延还远在3个小时的行程之外。洛克威尔指出，潜艇可能永远都不会赶到。上将说：“我们最好赶紧离开这个鬼地方。”将军正在考虑白天出发的利弊。一方面，若是在海面上与日军战舰正面相会，发动机存在隐患的鱼雷快艇必定会陷入劫数难逃的危险处境。另一方面，若是他们选择留在这里，则很有可能被敌军的飞机发现。他们的计划又是另一回事了。驻守在棉兰老岛上的美国指挥官威廉·F. 夏普准将正等待着明天（也就是星期五）日出时到卡加延的港口去迎接他们。如果他们迟到了，布雷特的“空中堡垒”便会丢下他们返回澳大利亚，也许还会认为他们已无生还的可能。巴尔克利说他愿意冒险现在起航，而他的话也让麦克阿瑟坚定了决心。下午2点30分，他开口说道：“好吧，我们走。”

对原先乘坐32号快艇的乘客和船员进行重新分配之后，34号和41号快艇于星期四下午早些时候起锚上路了。这一次，巴尔克利的船走在了后面，好让麦克阿瑟一家能在另一艘快艇的尾波中坐得更安稳一些。出发15分钟之后，41号快艇的左舷瞭望水手喊道：“看见船了！好像是敌军的巡洋舰！”船长一把抓过双筒望远镜。不会错的。那是一艘拥有多层船面建筑的大船，船首左舷上还矗立着三个塔式舰桥。如果他们继续沿着当前的路线行驶，就一定会撞上日军战舰的左舷。巴尔克利很清楚这种等级的巡洋舰航速能够达到35节，而他自己的快艇航速仅仅18节多一点儿。于是，他灵敏地采取了闪避动作。“我觉得是浪端的白沫救了我们的命。”他说，“日本人没有注意到我们的尾波，即便我们当时正全速逃离。”当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又侥幸逃过了敌军驱逐舰的搜查，并在日落时分接近了内格罗斯岛。就在此时，日军某海岸炮兵团听到了他们船只的声响。幸运的是，观察员错将发动机的轰鸣声当成了美军战斗机的声音，从而将聚光灯打向了空中，使得这两艘缓慢移动的鱼雷快

艇得以逃脱。

在这几次与敌人擦肩而过的过程中，将军仅此一次是一直都在卧躺着的。他躺在41号快艇的底层卧室床垫上，再次病重，在妻子揉搓他的双手时咬紧了牙关。我们无从得知他是否清楚头顶的甲板上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琼（她也吐了好几次）却听说了所有的事情。一位水手回忆："她面不改色，毫不畏惧。"喧嚣过去之后，又到了夜幕降临的时候。赫夫突然感到筋疲力尽，于是设法在卧室上方的台阶上抱着腿蜷缩着躺了下来，沉沉地进入了梦乡。睡得正香时，他听到了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悉尼？悉尼？"那是已经痊愈、正处于警惕状态下的将军发出的声音。副官坐起身来答道："什么事，先生？"麦克阿瑟说他睡不着，想要找人说说话。"好的，先生。"他的这位副官答道，"聊点儿什么？"将军回答："哦，没什么。我只是想要说说话。"悉尼·赫夫事后回忆道："那就是我生命中最诡异的几个小时的开端。甲板上，巴尔克利正在黑暗中飞快地驾驶着鱼雷快艇，瞭望员也在警惕着敌军的舰船，而我们几个全身都被浸泡在咸咸的泡沫中……将军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自己在过去这4年中经历的种种。"麦克阿瑟一如既往地保留着高度选择性的记忆。他记得自己在菲律宾防御计划中设立的那些据点，却不记得自己决定在海滩上迎战敌人的悲剧。他记得奎松紧缩的军事预算，却不记得克拉克和伊巴机场将士的玩忽职守。他记得自己和华盛顿方面存在的分歧，却不记得自己忘记在巴丹半岛上储存足够的粮食。他的声音"缓慢而又从容，隔着发动机的高频呼啸声几乎听不清楚"。赫夫说："我很快就彻底醒了过来，特别是当他一边咳嗽一边表达自己对受命离开科雷希多岛的后悔之情时。"麦克阿瑟告诉赫夫，无论如何，他早晚都要收复菲律宾。赫夫意识到"将军是认真的，而且已经开始计划该怎么做了"。

船队日夜兼程地向东赶路，终于在星期五凌晨时分穿过了棉兰老岛海域，于早上6点30分望见了德尔蒙特菠萝种植园附近的陆地。很快，PT–34号快艇右舷上的瞭望员便看到了卡加延海角的灯光。在连续指挥操舵35小时、穿越了日军控制的560英里海域之后，筋疲力尽的巴尔克

利带领一行人准时到达了目的地。7点整，凯利离开了编队，好让搭载了航道图的旗舰先行进入海港。夏普准将手下的军官之一威廉·莫尔斯上校正在步兵团的护卫下伫立在岸上等待他们。看到站在船头的麦克阿瑟，上校仿佛回想起了《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的画面。那一刻，琼就站在丈夫的身后。途中，她的手提包不知道被丢在了哪里，于是只好用一条扎染印花大手帕包裹着自己的口红、梳子和粉盒，“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吉卜赛人”。将军甩掉了帽子上的盐水，重新把它歪戴在了头上，搀扶着妻子上了岸。他回头看了看快艇，开口说道：“巴尔克利，我要给船上的每一个人都颁发一枚银星奖章，表彰他们的勇气。你把我从鬼门关上救了出来，我不会忘记的。”说罢，他简洁地询问莫尔斯，哪里能够让他解手。

夏普是棉兰老岛上2.5万名士兵的指挥官。这位准将急匆匆地赶到了麦克阿瑟面前，敬了个礼报告说，德尔蒙特种植园的俱乐部会所和客房已经腾出来供将军一行人下榻。他还补充道，自己在通往那里的5公里道路上派驻了卫兵。这是十分不明智的。这样一来，本该保密的麦克阿瑟行踪就这样被传播到了偏远山村里。当巴尔克利等人刚一到达俱乐部会所、准备坐下来吃些菠萝当作早餐（这也是他们离开马尼拉之后吃到的第一顿水果）时，一位菲律宾妇女便找上门来，要求见一见麦克阿瑟夫人。她徒步赶了25英里路，就为了打听自己在吕宋岛上当兵的儿子的下落。然而，琼和其他人都无法为她提供任何信息。令这位妇女更加愤怒的是，她还遭到了临时逮捕。一切都已经太晚了。不久他们收到了一份报告，称日军已经听说了将军登陆棉兰老岛的消息，正从达沃市出发向北推进，准备占领德尔蒙特机场。尽管夏普增加了双倍的警戒力量，这一消息还是令现场的每一个人都感到战战兢兢。因德上尉在一行人乘坐鱼雷快艇还在海上赶路时便先行上了岛。行踪不定的他外出散步，在一个小丘上发现了两个诡秘的人影。他举起武器对准了其中个子较高的那一个人，这才发现对方原来是麦克阿瑟。他放低枪口大叫了起

来：“我差一点儿就把你的耳朵打掉了。”站在一旁的个子矮小的琼倒吸了一口冷气，而将军却咯咯地笑了起来，开口说道：“好了，你最好到这里来，我们好决定谁应该护送谁回到驻地里去。”

爱德华·哈格蒂神父是卡加延一座小型学院的院长。作为棉兰老岛上的居民，他从未听说过将军的大名。神父前去俱乐部会所与夏普商议疏散美国平民事宜时，发现准将不仅神色慌张、心不在焉，还急不可耐地想要把他轰走。他注意到，会客室里聚集了很多军队高官。专心于自己使命的神父当时并没有妄下判断。就在这时，尖利的防空警报声响了起来。一位佩戴四星肩章的将军从旁边的卧室里冲了出来，询问这是什么警报。只见他没有剃须，双眼充满了血丝，晒伤的皮肤上满是皱纹。尽管如此，他的英俊还是让第一次与他见面的神父吃惊不已。看到有人来访，将军马上穿过宽敞的房间，不等别人介绍便握住了他的手。神父这才认出对方正是麦克阿瑟，急忙表达了自己对他在巴丹半岛上顽强抵抗事迹的敬意。离开片刻之后，将军从隔壁的房间里招呼过来了琼、阿瑟和阿秋，并带领他们躲进了俱乐部会所外挖掘的一处战壕内。返回后，将军开口问道：“神父，你要不要也找个地方避一避？只来了两架飞机。我是从来不会在意这么点儿敌军势力的。”神父答道：“不用了。您的冷静让我感觉勇气倍增。”麦克阿瑟先是找了一把椅子坐下，然后又迈着大步走动起来，情不自禁地说起了自己丢下的指挥权：“只要口粮还可以维持，巴丹半岛是不会沦陷的……巴丹的士兵都很优秀……他们的英勇程度大大超出了我的预期——不仅超出了友军的预期，更是超出了敌军的预期……罗斯福总统命我退守澳大利亚，展开进攻行动……如果日本在复活节之前还无法攻占棉兰老岛，那么就只有吃枪子儿的份儿了。”5分钟之后，警报解除了。将军起身前去查看自己家人的情况，临走前并没有嘱咐哈格蒂要将这段对话保密。相比之下更为小心谨慎的夏普倒是在门口对他耳语了一句：“神父，我想你可能比我们很多人知道得都多。请保密——也不要泄露他住在这里的消息。”

对于前往达尔文的空运飞机来了又去的担忧是莫须有的。实际上，

将军一行人在卡加延度过了危机四伏的4天时间。据其中一人回忆，他们花了“很多白天的时间躲避日军的飞机”，而指挥官却利用搁置在当地的时间给奎松寄去了一封长信。菲律宾总统正在群岛的中部岛屿之间辗转，赶在日军之前每两天更换一次落脚点。不过，将军身边的菲律宾副官安德烈斯·索里亚诺知道如何才能找到他。麦克阿瑟在信中这样对自己的“至交”写道：

> 情况又有了全新的进展。美军正将兵力转移至南太平洋地区，注定会对日军发起大规模的进攻。部队将以澳大利亚为集结地，准备向菲律宾发起猛攻。罗斯福总统命我为进攻指挥官，并将我派往了澳大利亚。他相信这是保证行动成功的最好方法。我自然是不愿离开科雷希多岛的，但华盛顿方面态度很坚决，暗示如果我不亲自接过指挥权，美军的努力便有可能付之东流。事实上，面对罗斯福总统亲自下达的强制命令，我在这件事情上别无选择。我推断军队正在迅速集结，希望能够在巴丹－科雷希多局势到达高潮之前发起进攻。

当然，他的假设并未成真。重返马尼拉的征程依旧任重道远，比他想象得要困难许多。他对战争部意图的误解以及华盛顿方面赋予他的希望如今已没有任何关系。这封信已证明麦克阿瑟是真心相信自己在信中写下的每一个字。如果说向被他丢弃的劫数难逃的卫戍部队许下虚假承诺是一回事，那么对奎松许下同样的承诺就是另一回事了。这位菲律宾领导人正在奔赴自由的路上，并且一定会将自己的经历讲述给美国人民。将军不仅希望他启程，还在书信的结尾催促奎松跟随他的撤离路径，从德尔蒙特登上B–17轰炸机：“行程只需9个小时，入夜后出发，途中危险性不大，无论如何都不会危及你的健康。夜间飞行的海拔高度不会超过八九千英尺，且航空军医向我保证你不会感到任何的身体不适。”

最终，奎松听从了他的建议，并将与他在澳大利亚重新会合。与此

同时，麦克阿瑟的随从中有很多人都为从棉兰老岛出发的行程被搁置而感到十分愤怒。身处墨尔本的军官们似乎正在为他们的行程安排争论不休。德尔蒙特的战士本能地厌恶养尊处优的后勤士兵。他们的愤怒是毫无根据的。布雷特尽力了。没有属于自己的“空中堡垒”，他询问海军中将赫伯特·F.　利里能否借他4架。那时候，中将已经获悉驻守爪哇的2万名荷兰士兵投降，意味着日军入侵澳大利亚的天然屏障已被移除。中将在回复中表示：“我很愿意帮你，布雷特，但这是不可能的。我们这里需要这些飞机，无法把它们让出来执行空运任务，无论这个任务有多重要。”布雷特所能做的就是出动一架破旧的B–17轰炸机。地勤人员拖走了用来伪装德尔蒙特粗糙跑道的可移动树木，飞机吱嘎作响地降落在了歪歪斜斜的跑道上。将军看了一眼飞机，勃然大怒。他斩钉截铁地说，自己是绝对不会登上这种“极其危险破旧”的飞机的，也不会允许他人登机。那位可怜的飞行员只得蹒跚着从坑坑洼洼的跑道上起飞返航，而麦克阿瑟则给布雷特和乔治·马歇尔发去了一封措辞激烈的电报：“在缺乏必要设备的情况下试图执行如此重要而又孤掷一注的任务有可能会搭上所有人的性命。我承担不了这种责任。”他要求派来“美国本土或夏威夷最好的3架飞机”，配备“经验足够丰富的”飞行员。布雷特又一次找到了利里，本以为自己会再度遭到拒绝，不料那封发往华盛顿的电报起了作用——中将同意为他提供3架全新的B–17轰炸机，尽管史汀生还为此向罗斯福抱怨了将军的要求实在是有些“专横跋扈”。

1942年年初，即便是最好的美军飞机也不一定牢靠。3架飞往卡加延的“空中堡垒”中的一架因为发动机问题不得不掉头返航，飞回了澳大利亚沙漠，因此只有两架于星期一午夜到来之前摇摇摆摆地飞到了目的地上空。在进行了7个小时的飞行后，轰炸机在降落时依靠地面一头一尾两发信号弹才发现这里的跑道。为了打起精神继续返航，领头的飞行员弗兰克·P. 博斯特罗姆中尉趁机师们为他维修故障的增压器时喝下了8杯黑咖啡。博斯特罗姆告诉麦克阿瑟，尽管飞机存在超重的问题，但只要抛弃随身行李，所有人都能登上飞机。琼上飞机时就只带了一条淡紫色的丝巾和镶着皮毛领子的大衣。赫夫带上了自己从PT–41号快艇上扛

下来为阿瑟准备的床垫。这也就是后来太平洋上流传的那个讲述将军带着塞满了钱财的床垫逃离科雷希多岛的故事的由来。实际上，垫子里装的只有羽毛。旅程结束之后，将军还把这块垫子送给了博斯特罗姆。

轰炸机在德尔蒙特机场的跑道上滑行时，跑道两旁各点着一支忽明忽暗的火炬。阿瑟和阿秋伸展着四肢躺在火炮手的座位下面，琼则躺在了他们身旁冰冷的金属地板上，头枕着自己那件被卷成了一捆的大衣。将军坐在无线电话务员的座位上，其他人就只好将自己的身体勉强塞进余下的那点儿空间里。萨瑟兰和另一位军官挤进了炸弹舱里，赫夫坐在机首的投弹手座位上，迪克·马歇尔躺在了赫夫身旁的走道上。博斯特罗姆加大油门，使尽了包括肢体语言在内的浑身解数，赶在飞机碰到远端火炬之前把机身拉向了空中。飞机的一个引擎火光四溅、运转失灵。面对这样的危机，人们总是回想起一些琐碎的小事。坐在后面那架飞机上的洛克威尔上将就一直在琢磨两架飞机上的乘客“像沙丁鱼一样挤在罐头里”的画面。赫夫曾经形容巨浪中的PT–41号快艇就像一只翻来覆去的“软木塞”。如今他朝马歇尔喊道：“我们此刻的生命真的是一文不值了。”不久，那台颤抖的发动机被卡住了。在接下来的5个小时航程中（大约相当于从波士顿飞往新奥尔良的距离）他们一直都在破口大骂。第一架飞机起飞不久，第二架“空中堡垒”也跟了上来。

麦克阿瑟的儿子和保姆以前都没有坐过飞机，心情一度十分雀跃。然而，他们发现整个过程和乘坐PT–41号快艇没有什么区别。“西里伯斯海面”上猛烈的气流颠簸让他们有些晕机，而当飞机终于飞到陆地上空之后，飞行员又不得不一次次地采取闪避动作。飞机的下方便是日本在自己的新疆土（也就是被征服的东印度群岛、帝汶岛和新几内亚北部地区）上建立起来的据点。各种迹象表明，日军入侵澳大利亚的战役迫在眉睫。日军的零式战斗机已经停靠在了抢占来的机场上，海岸哨兵也在热带的天空中寻找着同盟国飞机的踪影。日出时分，日军战斗机还曾升空搜寻这两架B–17轰炸机；但擅长曲折前进和俯冲的美军飞行员总是有办法躲开他们。对于博斯特罗姆来说，最糟糕的还在后面。他通过无线

电收到了一条警告：由于敌军正在突袭，他们不能在达尔文降落，只能转而降落在50英里以外的巴彻勒机场的一处紧急跑道上。上午9点，当一行人终于走下飞机时，大部分人都已经不会走路了。只有将军一个人看上去激动不已。“太惊险了。”他对萨瑟兰说，“不过身处战争之中就是这个样子的。有赢就有输，有生就有死——差异只在一线之间。”他叫来一位美军军官，向他询问重夺菲律宾的准备工作进展如何。那位军官看上去十分困惑，开口答道：“先生，据我所知，这里没有多少兵力。”麦克阿瑟看上去很震惊，转过头去看了看萨瑟兰说道：“他肯定是搞错了。”

一行人在一个小棚屋里坐了下来，吃了些桃子罐头和烤豆子作为早饭。琼愤慨地对赫夫说道：“我永远、永远也不会让任何人再把我弄上飞机了！什么理由都不行！赫夫，请想个办法让我们不用起飞也能到达墨尔本。”布雷特从一家商业航空公司借来了两架DC–3客机，本打算用它们载着一行人跨越炎热的澳大利亚灌木丛和沙漠，向南飞往墨尔本。不料，为了声援妻子的恳求，麦克阿瑟也表示自己连看都不想看到这两架飞机，决心乘坐汽车赶路。代表布雷特前来迎接麦克阿瑟的拉尔夫·罗伊斯准将认为这是个很糟糕的主意。一场争论就此开始。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直到作为军医一路从科雷希多岛陪伴一行人至此的查尔斯·H.莫尔豪斯中校听说了此事。莫尔豪斯直接来到了基地指挥官的办公室。只见身上只穿了背心的将军愤怒地踱着步，身旁还围绕着一群焦虑的军官。“出什么事了？”医生问道。“他们实在是太懒了，不愿意按我的要求去做。”麦克阿瑟火冒三丈。他说他想要车队载着他们前往最近的火车站——澳大利亚中央铁路的北部终点站爱丽丝泉。他知道爱丽丝泉距离这里有约1 000英里远，差不多是波士顿到芝加哥之间的距离，但他依旧表示：“麦克阿瑟夫人已经厌倦了飞行。”医生直言不讳地指出，将军和夫人都错了。他们的儿子自从离开科雷希多岛之后就一直在生病。莫尔豪斯现在只能通过静脉注射来为他补充营养。他说自己不能保证“小阿瑟能在没有住所和食物的情况下禁受得住长途跋涉穿越沙漠的旅程”。将军停下了脚步，开口问道：“医生，你说的是真的吗？”“字字

属实。”医生回答。将军立即下令让大家乘坐DC–3离开。

在向跑道走去的路上，琼一直都阴着脸。萨瑟兰将赫夫拉到了一边，压低了嗓门悄悄告诉他，一批三菱轰炸机正朝达尔文飞来；他希望妇女和孩子能够立即登机。在没有透露这个消息的情况下，赫夫迅速将他们带上了登机的舷梯。就在舱门关闭的同时，坐在驾驶舱里的理查德·H. 卡迈克尔中校的耳边响起了空袭警报的第一声尖叫。他推动油门杆，松开制动，害得机上的乘客全都从座位上摔了下来。将军怒吼道："赫夫，把飞行员的名字给我记下来！"飞机起飞后，听了赫夫对于这个紧急情况的解释，将军的心情才缓和下来，默不作声地点了点头。过了一会儿，看着脚下荒凉的地面，他用一只胳膊搂住了莫尔豪斯的肩膀，开口说道："要不是你，我们就撑不过来了。谢谢你。"

与此同时，按照乔治·马歇尔的指示，布雷特于圣帕特里克节当天给科廷总理打了一个电话，正式通知他："美国总统委派我代他向您问好，并通知您，美国陆军将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已于近日从菲律宾群岛抵达澳大利亚。"他继续说道，罗斯福"表示他和美国人民欣然期待澳大利亚政府能够任命麦克阿瑟将军为盟军在南太平洋的最高司令"。他还表达了总统为"不能尽早将麦克阿瑟将军的到达告知澳大利亚表示歉意，但（他）相信你们能够理解此次从菲律宾群岛出发的旅程属于最高等级的机密"。当科廷问及麦克阿瑟现在到底在哪儿时，布雷特表示自己并不清楚。直到卡迈克尔取消无线电静默发来第一条消息，布雷特才第一次得知麦克阿瑟所在的确切位置——将军已偕一行人降落在了爱丽丝泉。电报内容显示，麦克阿瑟将军和他的家人打算等到地面交通恢复之后再继续上路。尽管一个星期只有一趟火车从爱丽丝泉发出（本周的火车已经在前天离开了车站），将军却并不打算改变心意。"DC–3客机有什么问题吗？"布雷特问道。"没有任何问题。它们很好。我猜他只不过是厌倦了飞机，感觉不太舒服罢了。"飞行员回答。布雷特叹了一口气，表示自己会安排一趟专列。当一位副官兴高采烈地把这个消息转告给将军时，将军看上去很惊讶，嘴上却还是说道："这是当然的了。"

就像当地人所说的那样，爱丽丝泉位于“无比偏僻的内陆”。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的父亲肯定会对这个地方赞赏有加，而怀亚特·厄普则会在这里感觉如归故里。除了拥有一家露天电影院之外，整个小镇简直和19世纪80年代的美国西部没什么区别。两条尘土飞扬的街道两旁铺设着原始的木板路，路边立着摇摇欲坠的木头门脸、一家酒吧和一间歪七扭八的客栈，天空中还飞舞着一群又一群的黑苍蝇。夏末的热气让整个镇子闷热难耐。据一位军官回忆：“那里的昆虫对水十分着迷，就连从你脸上冒出的汗珠也不放过……我们刚一下飞机，身边就聚集了上百只昆虫。只要你稍不注意，它们就会钻进你的鼻子或嘴巴里。不出几分钟的时间，汗水就会浸湿你后背的衬衣，而寻找湿气的苍蝇们便会成群地落在你的后背上，看上去就像毯子一样。”

到达酒店之后，一位副官说道：“将军，镇上会放电影。你今晚想去看吗？”麦克阿瑟回答：“我觉得我应该会去吧。自从离开马尼拉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看过电影了。”电影是两片连映的，不过据副官回忆，首先放映的那部西部片“难看得令人难以置信，片子一结束，将军便带着余下的人返回客栈去了”。所有空着的地方都被人搭上了简易小床，就连阳台也不例外。第二天一早，赫尔利坐着飞机赶到了这里。赫尔利告诉将军，每一代美国人的心中都有一位英雄——杜威、潘兴、林德伯格都是这样的人物，而如今生活在美国本土的这一代人已经将麦克阿瑟奉为了心目中的英雄。他本以为麦克阿瑟一家会和他一起乘飞机离开，不料琼却猛地摇了摇头，开口说道：“不用了，谢谢。我们会坐火车过去。”大部分的同行人员都随着赫尔利乘机前往了墨尔本，余下的人则在午饭后步行前往火车站。和爱丽丝泉一样，这辆专列就像是从过去驶来的古董一样，排障器的个头和火车头差不多大，顶上还竖着一个别致的漏斗形烟囱。车身由两节三等车厢组成，尾部还拽着一节专供列车员使用的车厢。麦克阿瑟注意到，这里的单线铁路规格都是3英尺宽的窄轨。而他却听说澳大利亚大部分的铁轨都是5英尺宽的标准轨道。他意识到，要想为北上的进攻计划运送物资，就不得不经过如此狭窄的轨道——轨道宽度上的差异将会成为后勤运输行动的噩梦。他瞥了瞥第

一节车厢，看到里面摆着两条纵向的硬木座椅；乘客必须面对面坐着。第二节车厢是餐车，里面摆着一张长长的木桌，洗手池里放满了冰块，旁边还立着澳大利亚军队用的炉灶。车厢里有两位为他们提供用餐服务的澳大利亚中士，还有一位负责起居杂事的军队护士。要想到达餐车或是在下一站时会被加挂进来的卧铺车厢，乘客必须先等待司机停车，然后再下车往回走。这就是即将载着他们历经1 028英里路程赶往阿德莱德的古董级交通工具。麦克阿瑟一脸渴望地看了看天空。琼赶紧机敏地把他的注意力吸引到了别的地方。

在萨瑟兰、赫夫、莫尔豪斯、阿秋以及几千只黑苍蝇的陪伴下，这个小家庭坐上叮当作响的火车离开了爱丽丝泉，踏上了长达70个小时的铁路旅程。一上路，将军的情绪就放松了下来。坐在座席车厢中，他开始谈论起正在等待他的部队以及重返马尼拉的反攻行动。不过，没过几分钟，他便瞌睡着点起头来，微微倚在了长凳上，靠着妻子的肩头睡着了。琼示意赫夫取来了一个枕头，然后轻声说道："我就知道坐火车是最好的。珍珠港事件爆发以来，这是我第一次看到他睡得这么香。"就这样，他在没有理睬飞虫困扰的情况下倒头大睡了4个小时，醒来时晚饭已经上桌了。琼在餐车里落了座，张开嘴一小口一小口地吃着东西。一只苍蝇嗡嗡地飞进了她的嘴里。她一巴掌捂住了自己的嘴巴，一脸惊慌地看着桌子对面的丈夫。将军露齿一笑。"没关系的，琼妮（琼）。"他说道，"吞下去吧。一只苍蝇是不会要了你的命的。"那天晚上，护士、琼和阿秋在卧铺车厢里铺好了床铺。整个晚上，在小火车咔嗒咔嗒地穿过白色沙漠的过程中，将军打着呼噜养精蓄锐起来。

火车头的速度出奇缓慢，昆虫仍旧在不间断地骚扰着人们，车厢里闷热得让人难以忍受。鉴于铁轨只有一条车道，专列时不时便会停靠在侧轨上，好让货运火车通行——旅途似乎永无止境。一次，司机停下车来看了看前面，汇报说示意他们停下的是一群牧羊人。麦克阿瑟以为这些人是在听说他的到来之后前来迎接他的，立即排演着装腔作势起来。牧羊人的确知道他在火车上，却并不是来见他的。原来其中的一位牧羊

人眼睛里扎入了一个金属碎片，是听闻将军一行人中有一位医生才跑来拦下火车的。莫尔豪斯动作敏捷地取出了伤员眼中的银色碎片。麦克阿瑟的脸上挂满了失望之情，可火车一离开车站继续赶路，他的精神便再次振作了起来。

异常严峻的考验正在等待着他们。上路后的第三天下午，迪克·马歇尔在位于阿德莱德东北80英里处的小镇库林加登上了火车。只见这位副参谋长一上车便拉着脸，嘴角也很僵硬。他刚刚从墨尔本回来，发现麦克阿瑟期待的那支军队根本就不存在。细数一下，澳大利亚境内的盟军人数还不到3.2万人，其中大部分都是非武装人员——就连麦克阿瑟留在巴丹半岛上的军队人数都比这要多。爪哇战役摧毁了利里的海军。国内没有坦克，而可用的飞机也不到100架，其中还包括澳大利亚“舞毒蛾”。这种过时的飞机机翼由织物覆盖，螺旋桨还需手动上弦。不仅军队的人数少得可怜，无法满足麦克阿瑟尽快反攻菲律宾的愿望，就连盟军的兵力能否守住澳大利亚都存在着严重的疑问。光靠澳大利亚人肯定是做不到的。除了第6师的一个旅之外，澳大利亚所有的部队都在别处驻守。墨尔本到处流传着撤除“布里斯班防线”、退居南部和东部海岸、将北部港口拱手让给日本人的消息。总而言之，情况极端危急，而且还将持续一段时间。其余地方的同盟国补给线都很长。盟军首先击垮德国的承诺意味着将军在未来几个月内都等不到美国派来的大批护航舰。“愿上帝怜悯我们。”麦克阿瑟低语道。他转过身去，紧紧地咬着牙关，以至于下巴都变成了白色。他又开始面肌痉挛了。他事后写道：“这是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最震惊、最诧异的一段经历了。”

到达阿德莱德后，他离开了小火车，转乘澳大利亚铁路专员为他准备的奢华私人列车。火车站聚集着等待的人群——这一次他们真的是为他而来的。几个小时之前，他到来的消息就通过电波广泛传播开来。其实，早在三天前的下午4点15分（也就是澳大利亚的早上7点15分），罗斯福总统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了将军如今已经撤离科雷希多岛、远赴澳洲的消息。罗斯福表示，他认为“每一个美国人都和我一样钦佩麦克

阿瑟将军誓与菲律宾驻军同生共死的决心”。与此同时，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对他表示了肯定，“如果有人询问我个人认为麦克阿瑟将军在哪里才能更好地报效祖国”，所有的答案“都只有一个”，那就是“相比留在巴丹半岛上，出任整个西南太平洋的最高司令能使他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天，3月18日星期三，《纽约时报》的通栏大标题这样写道：“麦克阿瑟赴澳大利亚任盟军司令/该行动被誉为扭转战事的先兆”。

星期五这一天，麦克阿瑟到达了阿德莱德车站。在得知会有记者到场听取他的声明之后，他在一个信封的背面潦草地写下了几行字：“美国总统命我冲破日军的封锁线……就我的理解而言，这一行动的目的是为了组织美军抵御日军的进攻，从而达到为菲律宾解围的初级目标。我出来了，但是我会回来的。”他一遍又一遍地修改着第一句话，希望自己的措辞能够引导美国人民的发问，促使白宫和战争部赋予这一战区更高的优先权。然而，抓住民众注意力的却是声明中的最后一句话——它成了战时太平洋地区最著名的一句口头禅，但同时也是最具争论性的一句话。战时情报局意识到了这句话的影响力，要求将军把它改成“我们会回来的”，却遭到了麦克阿瑟的拒绝。那些批评他的人还引用这一事件作为批判他狂妄自大的证据。在《将军与总统》一书中，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写道，他那“充满恺撒风格的言辞在那些先他一步知道他会被召回的人嘴里”留下了“苍白的味道”。有人指出，奥利弗·佩里曾经说过：“我们已经遇到了敌人，而且他（们）已是我们的俘虏。”另一位第16军团的上校（并非大家熟知的潘兴）也曾在1917年说过：“拉斐特，我们来了。”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的同学约瑟夫·史迪威从缅甸撤出来时说道：“我们被痛打得一塌糊涂。”弗兰克·凯利和科尼利厄斯·瑞安写道，用“西方的标准”来衡量，“我会回来的”这句话似乎“既荒谬又浮华，而且还十分的愚蠢”。

将军的维护者们则表示，他的这句话不是说给美国人而是说给菲律宾人听的。菲律宾人比他的同胞还要相信他的誓言。实际上，这句话的起源是卡洛斯·罗慕洛。在科雷希多岛上，萨瑟兰曾经告诉过一位菲律

宾记者，盟军在岛上的口号应该是“我们会回来的”——正如战时情报局后来所提议的那样。罗慕洛对此表示反对：“美国已经让我们失望了。他们是不能被信任的。”他说，“但人们对麦克阿瑟还是有信心的。如果他说他会回来，大家就一定会相信他。”萨瑟兰将这条建议转告给了将军，并得到了将军的采纳。作为自己永久的、最荒谬的支持者，麦克阿瑟后来写道：“‘我会回来的’对于菲律宾人来说似乎是个神奇的承诺。它点燃了象征着这个国家不屈不挠意志的火焰，仿佛胜利最终会再次降临这片圣地，为它带来自由。这句话被铭刻在了海边的沙滩上，涂抹在了居民区的墙壁上，粘贴在了信件的邮票上，回荡在教堂的礼拜堂里，成了日本人的刺刀无法遏制的蓬勃地下组织的战斗呼号。”这句话是否真能带来如此重大的影响的确存疑，而它为何会被写在沙滩上的原因也尚不清楚，但它毫无疑问得到了单纯善良的东方人的认同。纵观战争始末，美国的潜艇一直都在成箱地向菲律宾游击队提供印有这句话的纽扣、口香糖、纸牌和火柴盒，使它们广为流传开来。就连日军的档案里都夹着从这些东西上撕下来的写有“我会回来的”字样的小纸片。此外，民间还流传着一个故事（即便它是虚构的，也起到了有效的宣传作用）：日军某炮台在战斗过程中打开了一箱弹药，发现里面的每一颗炸弹上都整整齐齐地刻着“我会回来的”的字样。罗慕洛至今仍相信这句话“对菲律宾人起到了承诺和命令的作用。他们知道他是不会出尔反尔的”。

在乘坐宽轨阿德莱德特派列车火速赶往墨尔本的那个幽暗的夜晚，麦克阿瑟是否能够信守这一句诺言实在是让人有些怀疑。就在同盟国欢庆他成功逃离科雷希多岛的同时，他却在特派列车漆黑的车厢里来回踱了好几个小时步。他告诉琼，他打算在安排好交通工具后立刻返回自己受困的卫戍部队身边。这话虽不是认真的，但也说明他的确感觉自己遭到了华盛顿方面的背叛，迫使他在不知不觉之中欺骗了自己在菲律宾的士兵们。与此同时，他也为澳大利亚的不堪一击感到十分的惊骇。已经把爪牙伸向新几内亚剩余区域以及澳大利亚东北部地区关键岛屿（萨摩亚、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日本似乎已经下定决心要进行进一步的侵

略；显然，在将墨尔本、悉尼和布里斯班归入大东亚共荣圈之前，他们是不会善罢甘休的。麦克阿瑟在来回踱步、自言自语时也曾提到过这一点。他说，自己不知为何总是注定要为一些倒霉的事业服务。他听上去就像是一个绝望、潦倒的男人，身旁只有妻子能够分担他的苦痛。她一直陪他跨着大步，直到筋疲力尽地累瘫在座位上。可即便如此，她还是保持着警醒的头脑，充满同情心地倾听着他的话语。事后她告诉一位朋友，正是那个漫长的夜晚让她决心放弃自己的私生活，全心全意地为丈夫和儿子而活，因为“孤独而又愤怒的”将军“前所未有地”需要她的陪伴。

第二天一早将军便恢复了自制力。上午9点50分，当火车停靠在墨尔本的斯潘塞街火车站时，他又成了那个爱出风头的麦克阿瑟，漫不经心地坐在火车观测平台上。车站里熙熙攘攘地聚集了近6 000名前来欢迎他的群众。现场还出动了55名维多利亚州的警员来维持秩序。布雷特召集了一支由360名美军组成的仪仗队——步兵不够用，他不得不抽派了几个支队的信号兵和工程兵。将军仔仔细细地检阅了一遍这支头戴白色头盔、手举闪亮兵器的队伍。那是一个艳阳高照的星期六。一大群无忧无虑、毫无秩序可言的围观群众簇拥着由政府官员、高级军官组成的欢迎代表团。据当时在场的约翰·赫西回忆，“在挂着饰带的马匹和顶着大礼帽的士兵的围绕下”，穿着未戴绶带的衬衫式夹克衫、卡其裤和休闲格纹袜的麦克阿瑟“看上去就像是一个商人”。

现场没有乐队（他早就发话说自己不想让乐队出场），只有一辆前面飘动着印有四星图案的细长三角旗的沃尔斯利牌的豪华轿车。除了到场的60名报社记者之外，澳大利亚广播公司还安排了一只对麦克阿瑟来说极具诱惑力的麦克风。他小心翼翼地掏出了一张皱巴巴的纸，他说自己很荣幸曾在“一战”中与澳大利亚士兵们同生共死，并为能够再一次与他们并肩作战而感到骄傲。紧接着，他把目光再一次转向华盛顿，开口补充道：“现代战争的胜利意味着配备足以抵抗潜在敌人已知实力的军队和军需。无米难为炊。我的成败首先取决于各方政府供我调遣的资

源。但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我所能、守护作为一个士兵的信仰。”

人群中最不安的观众便是乔治·H. 布雷特。赫尔利从爱丽丝泉回来之后告诉布雷特，将军对布雷特“很抵触”。当布雷特问起其中的原因时，赫尔利答道：“我也不知道。我实在是想不出任何特别的理由，但就是感觉不大对劲儿。”焦虑不安的布雷特答道：“不可能光是因为我们把他从菲律宾调出来这个原因吧？”“等麦克阿瑟到了之后，你很快就能找出其中的原因了。”此时此刻，这位陆军航空兵团的将军正在等待这个原因。趁着麦克阿瑟坐进豪华轿车的工夫，布雷特开口问道：“您要不要让我陪您，长官？”将军冷冷地回望了他一眼，直截了当地答道：“不用了。”

不知是何原因，被分配过来引导将军一家三口所乘轿车的摩托车径自开走了。一位尴尬的澳大利亚军官将这个荒谬的错误汇报给了麦克阿瑟。将军开口答道：“这还用说嘛。”无论如何，他并没有打消对布雷特的敌意。一行人在老旧的孟席斯酒店下榻后——他们礼貌地拒绝了富有的墨尔本人为他们提供的几栋豪宅，他通过无线电告知战争部，“最基本、最首要的必需步骤便是解雇布雷特”。与此同时，对自己的使命即将结束毫不知情的布雷特还到酒店来登门表达自己的问候。和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另一位后方指挥所的军官拉尔夫·罗伊斯准将。麦克阿瑟不愿接待他们。就在他们沮丧地离开之际，罗伊斯咆哮了起来：“这是什么意思？难道我们只不过是勤务兵，连军人都算不上吗？”

罗伊斯并不知道自己只说中了其中的一部分原因。乔治·马歇尔、艾森豪威尔——他们并非同是军人。这件事与性格、能力甚至是工作表现都没有关系。对麦克阿瑟而言，他们全都是远离火线、坐在办公桌后面参战的军官，因此根本就不知道战争到底是什么样子的——用美军嘲弄的词汇来说就是“坐办公室的”。另一部分原因则更加复杂，甚至有些病态。将军的妄想症总是潜伏在他思想的土壤下面。“他们”曾经密谋反对过他的父亲，曾在麦克阿瑟前去韦拉克鲁斯侦察之后，拒绝为他授

勋，1918年趁他在法国时削弱他的力量，并强迫他于1937年退伍。“他们”不仅拒绝增援科雷希多岛和巴丹半岛上的军队，还派了一架残次的B–17轰炸机到卡加延接他，现在又想要伺机再次挫败他。

诚然，麦克阿瑟也知道自己不乏同盟。那些和他一起从科雷希多岛出发，共同经历了长达11天、跨越3 000英里旅程的人肯定会一心一意地效忠他——这些历经磨难的人有时候还会不公地被冠以“巴丹党”的名号（尽管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被围攻期间一直留守科雷希多岛，根本就没有踏足过半岛一步）。直到战争后期，这些人仍旧充当着将军与新进入太平洋战区的人之间一道不可逾越的屏障。当然，他最亲近的红颜知己一直都是他的妻子，就连他深爱的母亲也相形见绌。到达墨尔本后不久，他便送了一只铂金钻石腕表给琼，上面还刻着“致最勇敢的人，巴丹–科雷希多，1942，麦克阿瑟”的字样。由于他和其他军官不同，身边总有妻子能够常伴左右，华盛顿方面有许多人都对此表示怨愤。但乔治·马歇尔的一位属下（号称比麦克阿瑟还了解他自己）则表示：“如果女性的陪伴能以某种方式对麦克阿瑟起到辅助作用，那就让她留在那里吧。他已经不是个年轻人了。也许他需要自己的妻子。”

意识到澳大利亚人对他们所经历的一切知之甚少，身处墨尔本的琼和将军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了。入住酒店之后，琼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去给将军、阿瑟、阿秋以及她自己买些衣服，还因此遭遇了一段发人深省的经历。由于商店周六下午关门，她只好请来一位裁缝到套房里来为她量体裁衣，为她周一一早出门购物准备了一条连衣裙。在玛雅百货商场里，她看上了几件喜欢的衣服，可女店员在打量了她一圈之后遗憾地摇了摇头：“S.S.W.，好吧，我不知道我们还有没有货。”“S.S.W.是什么？”她追问道。女店员解释：“噢，当然就是‘小个子女士’的意思啦。她们很难穿得合身。”另一位顾客认出了琼，深表同情地问了一句：“你的衣服不是很快就能从马尼拉运过来了吗？”

柏林的戈培尔将麦克阿瑟称为“逃跑将军”，罗马的墨索里尼也指责他是个“懦夫”，而东京《日本时报广告报》则给他扣上了“逃兵”的帽子，并认为此举“承认了巴丹半岛南端进一步抵抗日军势力的努力都是徒劳”。马歇尔认为，最好的宣传反击方式便是授予将军“荣誉勋章”。尽管这一决定遭到了如今正朝着战争部一把手职务迅速晋升的艾森豪威尔的反对，马歇尔还是不顾一切地将这一建议提交到了总统的手中，并指出勋章的历届获得者并非都是在前线获得过卓越战功的人。比方说，林德伯格就曾于1927年因驾驶飞机横跨大西洋而获得过勋章。总统批准了这一建议。3月26日，将军在澳大利亚总理为他准备的晚宴上接受了这一荣誉。由美国驻堪培拉公使宣读的嘉奖令中提到将军的“勇气与无畏远远超越了战斗使命的召唤”，表彰了他的“英雄行为”以及“遭遇危机时的冷静判断”和“在猛烈的炮火和空袭炸弹面前全然不顾个人安危”的表现。

接受这项荣誉之后，将军告诉在场的澳大利亚领导人：“作为一个军人，我长途跋涉到这里是为了每个人的解放而不是永久的奴役。我对最终胜利的信念是不可战胜的。今晚，我为你们带来的是一个自由人不屈的斗志以及适用于我们共同目标的作战方法。”一位澳大利亚记者写道，他不疾不徐、感情充沛地给出了一个“极好”的结论：“我们不能妥协。如果不能获胜，就只有死路一条。为此，我承诺我的国家将倾尽全力调用一切资源，而我的同胞也将为此洒下热血。”他表示，他认为这枚奖章“并不是用来嘉奖他个人的，而是对他有幸指挥的那支不屈不挠的勇武之师的认可”。拯救自己的士兵、将日军赶出菲律宾已经成为他生命中最大的执念。尽管那些安然栖身在阿灵顿新近完工的五角大楼中的人们并不认同他的看法，但他夺回群岛的决心在未来的岁月中却不会衰退。

---

1. 与此相似，麦克阿瑟后来也没有将自己打算在平安夜撤离马尼拉的消息告知海军。
2. 蒲式耳：谷物的容量单位，在美国相当于35.238升。——译者注

3. 1盎司≈ 28.35克。——编者注

4. 可憎的考特尼·惠特尼写道：“麦克阿瑟用一场反击来庆祝自己的生日——这种方式也让手下人很开心。”

5. 另有2万名菲律宾士兵驻守在米沙鄢群岛（菲律宾中部）。如果巴丹半岛沦陷，麦克阿瑟计划在游击战中将这些部队全部利用起来。华盛顿方面任命温赖特为菲律宾总司令的决定导致部队被日军所擒获。

第六章
雨林战争
1942~1944

AMERICAN CAESAR
Douglas MacArthur
1880~1964

生活在本土的美国人很难密切关注太平洋战争，其中一个原因便是他们对于地理的无知。对此，他们的教育系统应该承担责任。上学时，他们会从老师的口中得知文明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的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然后一直平稳地向西传播，并在美国发展到顶峰。每个人的头脑中都有一张粗略的欧洲地图。当电台播音员播报纳粹纵队正长驱直入波兰、斯堪的纳维亚、比利时、荷兰和法国时，听众们大致都能了解发生了什么。不过，却很少有教室会挂上几幅亚洲和大洋洲的地图，因而在那里打响的战争难免让人感到无法理解、备感困惑。早在美西战争期间，杜利先生就曾指出，普通的美国人连菲律宾到底是“群岛”还是“罐装食品”都分不清。20世纪40年代早期，到了他的孙辈们开始研究地球仪时，这些群岛看上去依旧和罗夏墨迹检测中那些令人困惑、无从辨认的墨迹没什么两样。

大洋洲的环礁、水域和大陆在他们看来就更加陌生了。尽管其中的许多地名都是以发现它们的欧洲探险家的家乡命名的——例如莫尔兹比港、芬什港、荷兰迪亚、俾斯麦群岛和金银岛——它们对后来生活在所谓文明世界里的人来说一概都是闻所未闻的。美国人会把新加坡误认作上海，以为它是一座中国城市。大部分人也不知道夏威夷其实和日本距离较近，和菲律宾距离较远。驻守在硫磺岛上的士兵在收到亲戚发来的缩印邮件后，发现对方以为自己是在“南太平洋”上作战，而这个岛的实际位置却在赤道以北1 700英里处。如果说埃及和阿尔及尔还能唤起人们学生时代的记忆的话，那么谁又曾听说过雅浦群岛或约里拜瓦村的名字呢？而新喀里多尼亚、新几内亚岛、新爱尔兰岛、新乔治亚群岛、新汉诺威岛和新赫布里底群岛之间又有什么区别？

遗憾的是，这些问题就连社会科学课的老师们都回答不上来。航空时代到来之前，诸如威克岛和中途岛这样的岛屿几乎是没有价值的。而在1941年以前，整个菲律宾群岛也只能引起商人、石油勘探家和肥皂公司的兴趣。通常情况下，麦克阿瑟手下的士兵们只能通过从敌军手中截获的地图了解到自己正身处地球上的哪个位置。战争爆发时，美国海军手里用的还是18世纪绘制的海图，而船舰之所以会在海战中偏离航向也是因为船长根本就不知道自己身在何方。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的第一次冲突发生在了错误的河流上——海军陆战队本以为自己身处泰纳鲁河，后来才发现这里是伊鲁河——而珊瑚海战役的实际战场其实是所罗门海。就连面对着敌人尖利刺刀的澳大利亚人也对国土北部的岛屿一无所知。和美国人一样，基于自己所知的那一点点地理知识，他们满心只顾着应付希特勒。就在麦克阿瑟在新几内亚岛的艾塔佩大获全胜的第二天，布里斯班《信使邮报》的头版报道的却全都是从法国、苏联和意大利发回来的战况——整整占用了5栏的位置。只有一栏总结了太平洋的战事，其中1/3的内容还是关于关岛的，对于艾塔佩的事情却只字未提。

美国和澳大利亚民众对于西南太平洋群岛的印象大多来源于电影编

剧的创作。正如吉尔伯特和萨利文的戏剧将日本人塑造成了眨着眼睛、龇着龅牙的民族那样，南太平洋也被描绘成了一个充满异国风情的世界：慵懒的微风轻抚着棕榈树的枝叶，“军中红粉”诱惑着传教士，当地的女孩们像多萝西·拉摩一样穿着合身的莎笼裙跳进海水里采撷珍珠。现实中，那里的女性身材比例和行李袋差不多。在许多太平洋老兵的回忆中，那里的确拥有美丽的自然景观——巴布亚岛（新几内亚岛）的茂密雨林中有着雪白的蝴蝶兰和嗓门尖利的凤头鹦鹉，布干维尔岛的奥古斯塔皇后湾坐拥冒烟的火山，而塞班岛上则长满美艳的凤凰木。但他们并不是去参观游览的，而是去参与战斗的。哪里的植被越茂密，那里的两栖战就越惨烈。毫不夸张地说，有些岛屿根本就不适宜人类居住（被派往圣克鲁斯群岛调查飞机跑道适建性的陆军工程兵就因感染脑型疟疾全部阵亡），每一场战役都是在令人不可思议的情况下进行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和莱特岛遭遇地震后，火山蒸汽一直飘散到了硫磺岛的山区。布干维尔岛上，推土机会陷入松软的无底沼泽之中。贝里琉岛战役的顶峰时期，就连树荫下的气温都高达115华氏度（约46摄氏度）。新不列颠岛上一天的降水就能达到16英寸（约406毫米）。1944年11月，莱特岛战役因三股台风而中止，一个月后，另一场风暴又导致3艘美军驱逐舰沉没。骇人听闻的恶劣环境制造了离奇的伤亡。25位海军陆战队队员在格洛斯特角被倒塌的大树砸死。遭遇海难的水手丧生鲨口。俾斯麦海战后游泳登陆新几内亚的日本士兵遭猎头族分尸，而登陆瓜达尔卡纳尔岛的其他人则被食人族捕食。对于战败的士兵来说——随着战争的进展，尤其是对日本的败兵来说，雨林是残酷的，一旦被包围，周围就只有蕨类植物、蛇蟒、鳄鱼和食人族。

查尔斯·威洛比称太平洋战争为“差异战”，也就是说战役的进展方式多种多样。比方说，头脑发热的麦克阿瑟准备防御的区域面积就和美国国土面积相近，连海岸线的长度也相差无几（1.2万英里）。换句话说，身处墨尔本的麦克阿瑟就如同一位被派往新奥尔良赴任的外国将

军，却要阻击远至美加边境的敌人随时入侵。再举个例子，鉴于他的战区面积是得克萨斯州的25倍，因而要想从巴彻勒机场赶到孟席斯，需要横跨的距离就相当于从加拿大温尼伯前往迈阿密。总的来说，在接下来的战役中，他即将走过的路程总和相当于英吉利海峡到波斯湾之间的距离——比亚历山大、恺撒或拿破仑分别经历过的最远征战还要长两倍。

麦克阿瑟坚持要建设一间完备的地图资料室。新到任的军官都会被带到这里研读一张巨幅的西南太平洋海图以及后来叠加上去的一张美国地图。正如威洛比所指出的那样："对比地理背景隐约可见，战时的西南太平洋战区在后勤方面遇到的困难将是巨大的……美国与战场之间的补给线不仅长度在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见，且整条线路都为水路，其间还有战无不胜的日本海军恣意在太平洋上畅游。"

如果要把将军叠加进去的范围扩大到整个西半球乃至大西洋区域，可以先把地图上的东京放在加拿大北部的位置，那么硫磺岛就在哈德孙湾附近，而仰光则靠近西雅图；塞班岛和关岛在魁北克，曼谷在华盛顿州，而新加坡的相对位置就是犹他州；塔拉瓦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位于大西洋中间，马尼拉位于北达科他州，而卡加延就在明尼苏达州；中加里曼丹省处于堪萨斯附近，苏门答腊岛中央处于亚利桑那州，而爪哇岛中央则落在了得克萨斯。莫尔兹比港和新几内亚的相对位置在百慕大附近，达尔文则在佛罗里达州的坦帕市。爱丽丝泉的相对位置在牙买加，阿德莱德、墨尔本和布里斯班分别位于哥伦比亚、巴西和巴巴多斯。阿德默勒尔蒂群岛位于新泽西对岸，新喀里多尼亚处在波多黎各和佛得角群岛连线中点，中途岛位于格陵兰岛和冰岛的中间，而夏威夷则和苏格兰隔海相望。

若换作是别的指挥官，肯定会被太平洋的广袤浩瀚所吓倒，但不敢忘怀1918年两军血战时的恐怖画面的麦克阿瑟将军却将墨尔本与东京之间遥远的距离视为一种机遇。尽管不信任海军，但他还是很快意识到陆

军士兵和水手们对于水的态度存在着差异，开始宣布支持海军上将。在西点军校上学时，他被教导要把河流和大海当作建设和固守抵抗战线的屏障。他听说，安纳波利斯海军军校的学员们则把这些水体视为高速公路。通过采用这一概念，他在太平洋战区拉开了战争史上最令人瞠目结舌的战役的序幕。

在这里，他对过去军事战绩的经年研究即将收获丰盛的果实。总体说来，他将发起87次两栖登陆行动，并大获全胜，切断了日军的撤离和运输线路。杰出的军事分析家马克·S. 沃森将它们称为“巧妙新颖、夺目惊人的一连串将日军置于死地的攻势”。大英帝国总参谋长、元帅阿兰布鲁克子爵在日记里写道，麦克阿瑟“让包括马歇尔、艾森豪威尔在内的美国将领以及包括蒙哥马利在内的英国将领都相形见绌”。B. H. 利德尔·哈特也赞同这个看法：“麦克阿瑟在将领中的地位是至高无上的。他是坚毅人格、战略理解、战术能力、行动灵活性和长远目光的结合体，其将才远超所有战区内的任何一位盟军指挥官。”沃森、阿兰布鲁克和利德尔·哈特认可这位在西南太平洋战役中久经沙场的老手所发挥的作用。麦克阿瑟在坚持军队流动性方面学习的楷模是成吉思汗。他曾经利用出色的运动战从两翼和后方围攻敌人，因而常被人拿来与曾在弗里德兰、耶拿、埃劳、乌尔姆、马伦戈和巴萨诺实施流动战术的拿破仑相比较。尽管如此，麦克阿瑟还拥有一样成吉思汗和拿破仑都不曾拥有的战术武器：空军。他的轰炸机和战斗机允许他实施三重包围行动，或借用丘吉尔的巧妙措辞来说，即“陆海空三栖立体战争”。这种作战方式大大缩短了太平洋战争的进程，同时也挽救了无数士兵的生命。约翰·冈瑟写道：“自大流士大帝以来，麦克阿瑟在使用更少的兵力占领更多领土方面的战果超越了任何一位军事指挥官。”

到达墨尔本后的那一周，他每晚都长时间地逗留在地图资料室里。考虑到自己的首要责任是保卫澳大利亚，他开始致力于细致研究澳洲大

陆长达2　900英里的东部海岸线——要知道，整个春季这里都会暴露在入侵者的视野之内。之后他又熟悉了一下这里的海滩、海湾、小型港口以及菲律宾等太平洋海岛之间海域的潮汐。他一直都在回想自己长期研究日本人所学到的那些教训。和其他期盼日本人很快就能败在盟军手下的美国高级军官不同，如今的麦克阿瑟十分尊敬自己的敌人。“日本人——”他说道，“在利用处于劣势的部队方面获得了前所未见的成就。”他清楚，他们根本就不弱。和德国人一样，他们的步兵堪称精英。（从另一方面来讲，美国的步兵部队全由陆军航空兵和海军陆战队挑拣剩下的人员组成，而海军更是将精英中的精英留给了自己。）在残忍的神道教人生观影响下，所有衔级的日本将士都相信自己是战无不胜的。他们的心中没有“战败”这个词，而这一自杀式的思维在战歌《海行兮》中得到了很好的体现。歌词大意如下：

若我往海边去，

愿为水中浮尸；

若我往山上去，

愿为草下腐尸；

若为天皇殉国，

我亦死而无憾。

“永远也别让日本鬼子来袭击你。”麦克阿瑟告诉自己的属下，“只要日军士兵有了协同袭击计划，就会顺利贯彻下去。”另一方面，他又补充道：“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在他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的时候），情况就截然不同了。”那时的日本人会因为刚直不屈的特性变得不堪一击。他们从未设想过自己有可能会被人征服，因此从未计划过该如何应对类似的危机。麦克阿瑟将他们的固执死板比作一个一旦抓住些什么就不会松开的拳头。“在战斗转变为自由式摔跤时，一只合上了就不会再

张开的手是派不上任何用场的。”他说。

在亚洲的盟军指挥官中，只有麦克阿瑟和路易斯·蒙巴顿勋爵领会了日本人的“泛亚主义”对东方民众具有怎样的吸引力。在美国，“大东亚共荣圈”被当作一个笑话。事实上，这一构想自1938年秋季诞生于近卫文麿口中之后便被日本帝国主义者滥用。但正如赛珍珠妄图向任何一个愿意听她讲话的美国人解释的那样，中国、缅甸、越南、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劳苦大众已经开始活跃起来，他们的领导人决心摆脱白人统治的束缚。麦克阿瑟十分理解这一点。虽然他的政治意识被很多人视为使他走向失败的悲剧性缺陷，但这也不乏颇具吸引力的一面。

如果说他的这一面只不过是幻想，那么他将自己视为战士的思想就还停留在中世纪。其他盟军指挥官都将战争视为两种敌对的意识形态（轴心国的“极权主义”和同盟国的“民主主义”）错综复杂的对抗。而在麦克阿瑟眼中，事情却分外的简单。如果非要说出这两者有些什么区别的话，他倒是更能够认可日本的武士道精神而不是五角大楼里泛滥的世故心理。这也解释了他决意要和妻儿在科雷希多岛上同生共死的原因。我们无法想象麦克阿瑟扛起白旗的画面，也无法想象他对菲律宾人民宣称：“我们会回来的。”对他来说，太平洋战争是一场只有两个对手——即他和日本鬼子（通常被他用单数人称代词来形容）——的决斗。说起敌军，麦克阿瑟总是会说“只要他跳进我准备好的陷阱，我就会把他歼灭在沙滩上”“他不会知道我准备实施什么计划”或是“他永远也不相信我会这么做”之类的话，吓得阿诺德和乔治·马歇尔等来访者目瞪口呆。与之相似，他还将美国第五航空军称为“我的空军”，并将盟军布置在西南太平洋的驱逐舰队称为“我的海军”，惹得许多美国海军上将都怒不可遏。当身处堪培拉、华盛顿和伦敦的其他人都在苦恼1942年日军会有怎样的图谋时，麦克阿瑟根本就不需要苦思冥想。他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抓他的。

经过了在孟席斯酒店一天的休整之后（其间他将自己的新址寄往了密尔沃基县第四征兵局），他在几条街区以外的柯林斯街401号老保险大楼里设立了自己的临时总部。在那里，他发现自己这个所谓的最高统帅手下其实什么也没有：既没有联席参谋长们下达的指令，也没有华盛顿方面发来的赞许回音——来认可他在阿德莱德发表的承认他被调离菲律宾、前来领导“美国反击日本”行动的声明。几天过去了，紧接着一个星期、两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收到任何的指示。从不会随遇而安的他告诉副官，他是在“别人的引导下相信”自己此行是来统领太平洋上所有盟军力量的，现在才意识到此举不过是想“诱骗”他离开科雷希多岛。4月1日，他通过电报告诉乔治·马歇尔，自己设计了一套孤注一掷的方案，有望突破巴丹半岛，在山区展开游击战争。他总结道：“我很愿意亲自归队，临时指挥和负责这一行动。”第二天，马歇尔驳回了这项建议，并向他保证自己马上就会给他下达命令。尽管这些命令早就应该被送到，却迟迟没有消息传来。困难在于，华盛顿方面无法抉择该怎样组织太平洋的指挥权。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五角大楼内的联席参谋长们竟然花了5个星期的时间才设计出了一套各军间的相互协定——在之后的战役中，盟军为耽搁下来的这几个星期付出了血的代价，因为敌人利用这些时间抢夺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所罗门群岛中的布卡岛和布干维尔岛以及新几内亚北岸的莱城和萨拉马瓦，并加强了这些区域的防御。

麦克阿瑟喜欢说：“我是一个士兵，只要接到命令便会立刻勒马。”这些显然都是胡话。他十分清楚自己是美国最具天赋的部队指挥官，因而也期待自己能够得到相应的待遇。驻扎在墨尔本的美国记者们意识到了他的沮丧，想要把这些故事通过电报发回美国本土。起初他还告诫自己的首席新闻官勒格朗德·迪勒要审核类似的报道，可在被五角大楼的再三拖延激怒之后，他取消了禁令。《时代周刊》刊登的一篇名为“被搁置的英雄”的文章便是这一决定的成果之一。然而，此举却招致华盛顿方面当即提出了一条诡异的提议。某陆军航空兵团准将建议派遣将军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一直警觉地提防着自己会遭人背叛的麦克阿

瑟谴责了“新政阴谋”和“海军阴谋”，还一度在电报中向马歇尔提起了自己10年前出任参谋长时“意外发现”的另一个阴谋：有人意图“将整个国防职责全权交由海军负责”——他隐晦地暗示这一阴谋也许正是当下令人恼火的拖延时局背后真正的原因。他似乎从没有想过，那年春天盟军阵营里的官僚纠纷和杂乱无章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反而坚信是那些仇恨自己的人在背后不知疲倦地实施着挫败他的计划。

这一次，他的疑虑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听信了将军在马尼拉怠慢哈特的流言，海军上将们及其属下全都对他产生了盲目的厌恶感。史汀生在自己的日记中承认：“（尽管）将军横溢的才华和他的辨别力不成正比，但海军在对待他时所表现出来的令人惊讶的仇恨未免也太孩子气了。”马歇尔的传记作家威廉·弗赖伊发现了“一种奇怪的想法”：有人认为“这场对日战争是专属于海军的”。在太平洋上巡回的阿诺德注意到，“海军继续在这一战区发动战役的决心不容置疑，且决意尽可能少借助陆军的力量”。斯塔克的继任者、新任海军作战部部长欧内斯特·J.金上将指出，既然对日战争大部分是海军的任务，那么任命一位陆军将军作为总指挥官就毫无意义。何况他根本就不放心把自己珍贵的航空母舰托付给麦克阿瑟。他推荐切斯特·W. 尼米兹来出任这一职务。但尼米兹比将军年轻许多，且对除海军事务之外的其他领域一无所知。因此，参谋长们经过妥协创建了两个战区，打破了所有的传统军事戒律。令所有人都感到惊奇的是，这一决定在未来被证明是行之有效的。麦克阿瑟的阻击部队成了美军巨螯的左钳，对敌人形成了双重包围攻势，而尼米兹随后从中太平洋塔拉瓦岛派出的远征军则充当了右钳的角色。一旦将军保住澳大利亚和打开向北发动反击的通路，积攒一定的攻势，接下来重返菲律宾的征程只要够B–17轰炸机的925英里航程就可以了——飞越这段距离，战斗机即可进入敌军领地、丢下炸弹，然后返回美军机场加油。

4月18日，也就是在到达澳大利亚一个月零一天后，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西南太平洋战区最高司令，而尼米兹则成了太平洋战区司令。尼米

兹的手下还安排了一名上将（先后是罗伯特·L. 戈姆利和威廉·F. 哈尔西）负责指挥南太平洋的海军。西南太平洋和南太平洋两个战区的分界就是东经160度经线。很快，这条界线就被向西推至159度经线，将海军陆战队的战场瓜达尔卡纳尔岛划入了海军的南太平洋战区。那里是太平洋地区唯一发生重大陆路战役的地方，却不在麦克阿瑟的管辖范围之内。除此之外，海军战区内的大部分区域都被海水覆盖。小E. J. 卡恩是第一批随军南下的士兵之一。据他回忆："南太平洋战区是一片包括瓜达尔卡纳尔岛和新喀里多尼亚、新西兰之类的众多僻静而又不知名的小岛组成的区域，由哈尔西上将指挥。西南太平洋战区包括澳大利亚、新几内亚以及其他一些岛屿，指挥权归属麦克阿瑟将军。登陆澳大利亚之后，我们感到有些困惑，不知道自己应该归属哪个战区，但我们知道麦克阿瑟将军将会是我们的上司。"

如今的麦克阿瑟终于接到了命令。他所管辖的区域中所有的舰船、飞机和同盟国军队都将听命于他。这样的特权不禁让两边的其他指挥官分外眼红。为了保护自己的权力，他已经准备好与其他领导人做斗争，包括屡次与温斯顿·丘吉尔作对。丘吉尔曾不情愿地同意将派驻中东的三支澳大利亚部队送上回家的路，却在部队行至印度洋时产生了犹豫，认真考虑要将其改派至缅甸。麦克阿瑟对此提出了严正抗议。丘吉尔首相在向罗斯福解释时提到，英国情报官员相信日军会停止入侵澳大利亚的脚步，转而进攻印度。总统对此未加评论，而是直接把消息转递给了墨尔本方面。麦克阿瑟反唇相讥，表示自己的情报人员得出了相反的结论，而新几内亚近期遭遇敌军进犯的事情也证明他的看法是对的。后来，麦克阿瑟在发往华盛顿的一封电报中表示自己害怕征战缅甸的蒙巴顿会侵占他所管辖的战区。在没有表态的情况下，罗斯福又把这封信转寄到了英国的契克斯首相别墅。那时候，一位名叫大卫·华莱士的英国外交官正在那里拜访丘吉尔。只见首相走到房间另一头的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前，拿起了地球仪旁立着的玻璃量具，仔细地计算了一下缅甸和澳大利亚之间的距离，然后抬起头来看了看华莱士，说："6 660英里。"他还挖苦地补充了一句："你觉得这还不够远吗？"

在这一点上，将军的多疑显然有些荒谬，而他不管在哪儿都过度敏感的特性也成了五角大楼里的一个笑话。官员们纷纷表示同意，在所有的战区指挥官当中，就数他在关注自己战区局势时所表现出的“局部利益症”最为严重。毫无疑问，他对待这种事的确要比其他人吝啬许多。1942年，联席参谋长们为他设立了几个令人震惊的目标——夺取俾斯麦群岛以及日本人在新不列颠岛上建立起来的拥有10万卫戍部队的大型基地拉包尔，却并没有拨给他足以达成目标的资源。西南太平洋战区所分配到的资源永远不及美国战争供给的15%。要知道，艾森豪威尔在进军北非时所获的军火量是人均15吨。而麾下指挥着美国海外部队12%兵力的麦克阿瑟却只能按照人均5吨的标准领取军火配给。诚然，被称为“火炬行动”的北非战役和为诺曼底登陆造势的“波列罗行动”值得获得优先权。可即便是在太平洋范围之内，尼米兹手握的战争关键资源也比麦克阿瑟要多。此外，据美国国务院第239号广播新闻公报公布，美国在加入盟军赴意大利作战的第一年给意大利难民运去的必需品数量（230万长吨[注]）就和同年运送给麦克阿瑟的军需物资数量差不多。国务院对自己的人道主义表示十分骄傲，但西南太平洋战区在听到这则广播后备感心凉。

有时，就连将军也会感到绝望。他告诉属下，自己就是“吝啬后勤”的受害者。在写给罗伯特·E. 伍德的信中，他提到自己的供应情况“还有许多亟待改进的地方”。在寄给乔治·范霍恩·莫斯利的信中，他写道：“在这里，我一直都忙于利用手头仅有的资源做我力所能及的事情。就因为兵力不足的问题，我错过了很多有利的机遇。这里真的是个让我‘丧失良机’的地方。”在给另一位官员乔治·B. 邓肯的信中他写道：“我们从一开始便步履维艰。缺乏资源和供给让局势从起始阶段起就岌岌可危。我已经尽我所能利用所有的资源，但美国历史上没有哪位指挥官的资源和我这里一样匮乏。”就在他不公地将这些全都怪罪于联席参谋长们的同时，这些决策者反而对他的处境表示同情。1942年6月，厌倦了英军指挥官坚持把所有军备物资都运往欧洲和中东的主张，参谋长们威胁要转换优先权，把打击希特勒的事情留到日本战败之后再

说。英国人认为美国人这是在虚张声势。“在我看来——”列席旁听了这场激烈的英美对话的罗伯特·舍伍德写道，“马歇尔将军和金上将心中的这个计划绝不是在吓唬对方。其实，计划的第一步（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是在6月25日，也就是在丘吉尔短暂访问华盛顿的最后一天被批准的。我们可以尽情地大胆推测，如果计划顺利实施结果会怎样——第一颗原子弹也许不会落在广岛，而是会落在柏林。”

在这一重大战略转折问题上，罗斯福自然是那个手握最终决定权的人。毋庸置疑，他打算遵从“彩虹5号计划”，先打败纳粹再向西调转矛头歼灭日军。他在于5月6日给麦克阿瑟写去的一封信中提到，尽管他理解将军的沮丧之情，但召集足以在欧洲打开第二战场的兵力才是第一要务。总统补充道：“我知道你会受到这一决定的影响……我也充分意识到了你的困难。你既要执行大使的职责，又要充当最高指挥官的角色。”这句话堪称对当时堪培拉政局的精妙总结。据舍伍德回忆，罗斯福之所以派将军南下，其中一个原因便是担心那里士气低落。考虑到澳洲大陆独特的地理位置，这片土地在战略上仅对澳大利亚人自己拥有一定的重要性。正如澳大利亚的一位军队高官对克拉克·李所说的那样：“在全球战略中，澳大利亚和菲律宾一样是可以被牺牲的。”麦克阿瑟的出现意在安慰那里的人民，他们不会被抛弃。在将军接受这一任职时，罗斯福和伦敦方面都推测他会继续保持战略防御方针。谁知麦克阿瑟早已决意夺回菲律宾，从而改变了太平洋战争的轨迹。

自从前一年秋天出任总理以来，约翰·科廷便一直在公然批评英国政府忽视澳大利亚的国防问题。以往，每当他的选民不满澳大利亚作为大英帝国属地地位时，伦敦方面都会提醒他们，无敌的英国舰队会保证他们的安全。如今，在澳洲绝望地需要这些战舰前来帮忙时，它们却在其他地方忙碌着，无暇前来救援。就像帝国的其他国民一样，一代又一代的澳大利亚人只好用谚语来安慰自己：战争中的英格兰除了最后一场

战役之外，场场皆输。1942年的春天，他们突然意识到最终的战役即将到来，而他们幸存的希望并不能寄托在英国人身上，而是要依靠美国人。因此，麦克阿瑟在堪培拉获得了各党派的帮助。在无人提出异议的情况下，政府废除了军事委员会，并将其权力全都授予了将军。澳大利亚人称他为“巧克道格”——“巧克”是澳大利亚俚语，意指巧克力士兵，也就是澳大利亚预备兵，上战场就会像巧克力一样化掉。和美国士兵口中的“防空洞里的道格”不同，这是一个亲切的昵称。他在澳大利亚人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从没有动摇过。不仅他的要求全部得到了堪培拉政府的应允，而且只要他还住在孟席斯酒店里，怀着崇敬的心情前来围观的人群每天都会在他离开前往柯林斯街时聚集在对面的街道上，只为了一睹他胸前佩戴着13条勋带的风采。即便他拒绝了罗斯福安排澳大利亚和荷兰士兵担任他的参谋的提议（他身边的三名军官全都是“巴丹党”的成员），也没有减损他受欢迎的程度。

当年4月，堪培拉议会打破先例，投票赋予了他议会发言权。“你会喜欢这个的，道格！”一位工人阶级的国会议员在进门时朝他喊道。将军瞪了他一眼——自从他的母亲去世之后就没有人可以这么叫他了，但他显然很享受自己作为特使的角色。他错以为科廷是他登上新指挥岗位的原因，而科廷似乎也没有否认，于是两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尽管事实上科廷的政治主张比将军，甚至比富兰克林·罗斯福还要激进。3月26日，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麦克阿瑟将军用一只手搭着科廷的肩膀说道：“总理先生，你和我会一起走到最后的。”事后他还告诉报社记者，科廷是“澳大利亚的心灵和灵魂”。由于参与了澳大利亚政治，即便是在敌人的战争威胁消除之后，他仍多次到访澳大利亚。在曼努埃尔·奎松从墨尔本启程前往美国（他准备在美国筹建自己的流亡政府）之前，他问将军：“告诉我实话，你能不能解放我的国家和人民？”麦克阿瑟马上答道：“我是打算这么做的。当我站在马尼拉的大门前时，我希望总统你能够站在我的右手边，澳大利亚总理能够站在我的左手边。”

事实证明，奎松和科廷都没有活到战争结束的那一天，但将军在澳

大利亚的地位堪比他在菲律宾人中间的受欢迎程度足以表明他和总理之间的友谊进展神速。也许这暗示着他的新朋友代表了他对未来的希望，而他患了结核病的老朋友奎松则代表了他过去的失败。将军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自己在吕宋岛上的失败的。他要求总部接线员用简明扼要的话语作为来电问候："你好，这里是巴丹。"除此之外，按照将军的要求，由琼出席命名仪式的最新澳大利亚驱逐舰也被冠以了"女王陛下的巴丹号"的名称。不过，如果回想起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那100天生活丝毫不会让他感到畏缩的话，那也未免太不人性化了。这是需要时间的。起初，在伤疤结痂之前，他身边的每一个人都能看出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一位记者回忆道："在初到澳大利亚的那段日子里，麦克阿瑟表现得很难与人亲近。他很急躁，嗓门尖利，还总是辱骂那些曾让他在菲律宾感到失望的人，尤其蔑视海军和空军。"尚未遭到解职但已感受到将军满腔怒火的布雷特认为，麦克阿瑟"因为自己在这场无望战争中最关键的时刻抛下了自己的士兵而感到愧疚，内心遭受着折磨"。将军渴望寻找某种方式对入侵菲律宾的人发起反击。3月29日，萨瑟兰走进了布雷特的办公室，告诉他麦克阿瑟想要立即派遣一支队伍飞往群岛执行轰炸任务。布雷特提出了抗议，他表示，菲律宾已经沦陷了，将他的飞机派往那么遥远的北方将给飞行员的生命带来不必要的威胁。萨瑟兰用尖锐的语气答道："麦克阿瑟将军向菲律宾人民承诺过，他会回去。如果我们前去执行轰炸任务，就能证明他们还没有被遗忘。"火冒三丈的布雷特只好将手头仅有的飞机资源召集起来——10架B–25轰炸机和3架B–17轰炸机。尽管它们全都安全返回，但这也是菲律宾解放前美军发动的最后一次突袭，而且其效果几乎微不足道。

卡洛斯·罗慕洛是最后一批从巴丹半岛逃出来的军官之一。4月25日，不修边幅的他走进了麦克阿瑟位于墨尔本的总部，身上穿着一件松垮的制服，体重比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时又瘦了29磅。将军拥抱了他，用嘶哑的声音说道："卡洛斯，我的孩子！我都不忍心看你了！"卡洛斯带来的消息让人不忍耳闻。科雷希多岛眼看就要投降了。在听说麦克阿瑟撤离至澳大利亚的消息之后，美、菲军队十分震惊，因而听信了东京广

播电台的宣传言论，相信将军变成了“一个精神脆弱的人”。口粮已经被消耗得一干二净了。留守隧道的温赖特认命地告诉罗慕洛：“告诉奎松和麦克阿瑟，我们已经尽力了。”将军立即给科雷希多岛发去了电报，称自己“在任何情形之下都坚决反对彻底投降”。他还劝诫温赖特在饥饿摧毁一切强劲推进的可能性之前“准备对敌军发起进攻”。紧接着，他又将粮食配给的情况通过电报通报给了乔治·马歇尔，同时怒不可遏地写道：“随着我的离去，防御的专注程度自然有可能被放松了。”

虽说麦克阿瑟这样措辞显然有些可鄙，对被他抛在身后的那些勇士们来说也是不公平的，但也完全无益于改变菲律宾战局的结果。4月8日，巴丹半岛沦陷。正打包准备登上“柯立芝总统”号前往加利福尼亚的奎松表示，战争的溃败“为菲律宾人民英勇奋战的（即便不是最英勇的）历史篇章画上了句号”。麦克阿瑟摘掉了自己的钢笔笔帽，下笔写道：“巴丹军队不负所望，一直奋战到了只有孤注一掷的隐约希望的最后一刻。没有哪支军队曾在资源如此紧缺的情况下获得过这么多的成就，而没有这最后一刻的磨砺与挣扎，任何军队也只是无名之辈。面对那些因丧子之痛而哭泣的母亲们，我只能说救世主的牺牲和光环将会降临到她们的儿子身上。上帝会把他们带上天堂。”

马克·沃森在《星期六评论》中写道，麦克阿瑟“相信正是巴丹半岛旷日持久的抵抗打乱了日军的时间表，拯救了澳大利亚及其人民”。乔治·肯尼也有类似的看法：“我们很难估算日军在菲律宾消耗了多少额外的努力，从而减损了他们原先计划用来夺取新喀里多尼亚和斐济的实力，切断了通往澳大利亚的通路。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菲律宾，就没有珊瑚海战役，那么莫尔兹比港就有沦陷的可能，然后日本鬼子也就得以实施下一步计划——进攻澳大利亚本土。”

当耀眼的旭日光芒穿透大洋洲的雨林、朝着澳大利亚步步逼近时，麦克阿瑟对自己狠下了心。时间是他的敌人。在和时间对抗的过程中，他在墨尔本独一无二的地位给他带来的无尽指责已然成了他的累赘。理

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写道："如今的将军必须身兼外交官、政府官员、勤勉的政客、运输系统独裁者和公关专家数职——此外还要具备战略家和谋士的能力。"麦克阿瑟不得不与美国驻堪培拉的租借法案专员商讨，征用英国的弹药以供澳大利亚的武器使用，批准建造强大的新型澳大利亚军舰的计划，并为科廷的飞机生产部门提供建议，告知当地军备实业家该生产哪一种飞机。尽管他厌恶在平民人群面前露面，却还是不得不屡次跟随总理出面呼吁大家支持战争债券，并且两次都是自己出钱买下最大额的债券。

如果说扮演这些角色还实属必需的话，那么麦克阿瑟在澳大利亚的某些行为就很难说得过去了。他收到的很多书信都只能用"怪异"这个词来形容。成千的美国人和美国机构都曾给他在澳大利亚的地址（军队邮箱500号）寄过信。每一天，他都能上收到100~150封来信。尽管他不能一一回复，却还是尽力给其中的不少来信者写去了回信，有些信的内容还十分详尽。一次，在入夜后只能睡上几个小时的情况下，他还是坚持写信安抚一个来自纽约州尤蒂卡市的10岁小男孩。这个男孩从学校同学的口中得知夏威夷已经落入了敌人之手。将军向他保证："日本鬼子还没有得到'珍珠港'，也不会得到它。"那些写信前来索要签名的孩子都能够如愿以偿。他还用自己夸张豪迈、棱角分明的字体给许多组织写去过回信，例如布鲁克林红十字协会、美国全国制造商协会、美国劳工联合会、产业工会联合会、威斯康星大学、I. J. 福克斯步兵委员会、泽西城慈善互助会、阿肯色州小石城基督主教教堂（"站在我第一次加入神的圣所的祭坛前，我央求你在未来的伟大斗争中为我寻求神的指引"）、将他选为"酋长首领"并寄给他一顶战冠的西南印第安部落（"我不会拿战冠和我获得过的任何奖牌或勋章交换，他们是我的老朋友，我童年时期在西部边境的伴侣"[注]）以及得克萨斯州阿尔文的国家父亲节委员会。

给上述最后一个组织的回信为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结果。该委员会赋予了他1942年"年度父亲"的称号。那一周，日本今村均中将的第17军

和第18军正穿过新几内亚岛和所罗门群岛的雨林向南进军，很快就能进入可以用轰炸机袭击布里斯班的范围，而麦克阿瑟手下那些缺乏训练的澳大利亚民兵操练时用的还都是木枪。在这种情况下，想必委员会的人顶多只能收到将军的参谋发回来的简短感谢信。然而，他们却收到了这样的一封亲笔信："没有什么能比国家父亲节委员会此举更让我感动。作为一名职业军人，我为自己感到万分骄傲，但让我更感骄傲的无疑是自己作为父亲的角色。军人破坏是为了建造，而父亲则只会建造，从来不会破坏。军人时刻面对着死亡的可能性，而父亲则象征着创造与生命。虽然死亡的势力是强大的，但生命之军比它更胜一筹。我希望我的儿子在我离世后想起我时不会想起战争，而是会想起我和他在家重复着最简单的每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啊'时的画面。"生活中，他在表现自己对爱的渴望时总是有些矫揉造作，就连那些他想要讨好的人也会为此讥笑他。

虽说人们后来会铭记他的多愁善感，忘记他的军事才华，但在那段黑暗的岁月里，他的战斗技巧还是赢得了包括自由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在内的所有美国人的尊敬。1942年年初，他以疯狂的速度发起了对日战役，并且每天都有大量的增援部队到达。澳大利亚步兵师的大部队和从北非、希腊半岛以及克里特岛赶来的老兵们一下船便开始了丛林训练。虽然缺乏后勤部队、饮用水运输和空中编队，但这些人力和物资全都已在被送往这里的路上。4月6日，美军第41师在阿德莱德港登陆。9天之后，美军第32师也踏上了这片国土。麦克阿瑟手下的兵力如今已经可以与今村抗衡，只要他愿意撤掉大洋洲其他的防御，毫无保留地派兵出征。他已经下定了决心，事实上，他没有太多的选择，因为眼下最紧急的需求便是战斗机和轰炸机。名义上，他的空军已经增加到了517架美军飞机和250架澳大利亚皇家空军飞机，可其中大部分都刚被抢救出来，或是面临大修。也就是说，他的实际空军只有220架形态各异的战斗机。62架"空中堡垒"中，只有6架完好无损，可以起飞。当身处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海军陆战队要求他派遣6架P–38出手相救时，他无能为力。即便他心里知道此举会招致他们的怨恨，也实在是无法匀出一架飞

机。

5月6日，可怖的寂静降临在了科雷希多岛上空。每一个还能站住的旗手都举起了白旗。得意扬扬的日本人将自己捕获的1.1万名俘虏全都运到了巴丹半岛上。第二天，这些战俘开始了惨无人道的“死亡行军”——在向北跋涉的漫长过程中，共有7 000~10 000名美、菲士兵因为疾病、饥饿、虐待性殴打和直接处决而丧生。听闻岛屿投降时，奎松所乘坐的“柯立芝总统”号正驶入旧金山湾。他一下子就被这个消息给击垮了。罗慕洛也感到无比震惊，“离开巴丹时，我还以为沦陷的会是半岛而不是科雷希多岛。”他回忆道。“我相信自己在一个月之内就会回去。”麦克阿瑟告诉媒体，“科雷希多岛不需要我的任何评论。它已经用枪口讲出了自己的故事，将墓志铭镌刻在了敌人的墓碑上。然而，透过最后一声枪声后鲜血淋漓的混沌画面，我总是能够看到一群形容枯槁却坚定不屈、毫不畏惧的人的身影。”和他在巴丹半岛上所发表的颂词不同，这一篇是提前准备好的，否则也不会如此精雕细琢。事实上，在听闻科雷希多岛投降的消息时，他正在关注另一场战役——在他的战区里发生的海战：珊瑚海战役。

当月，罗斯福给麦克阿瑟发去了一封电报。“此时此刻，看起来日军舰队似乎是朝着阿留申群岛或中途岛和夏威夷方向行进的，不太可能从空中袭击南加利福尼亚或西雅图。”5月8日将军在给总统的回电中写道：“盘踞在菲律宾的敌军中至少有两个师（陆军）加上全部的空军都将被调离，前去执行其他任务……当下的初步行动可能是先进攻新几内亚和美澳之间的交通线……如果澳大利亚遭遇强大的敌军势力……情况将极端危险。由于我方需要防御的领土范围太广，交通设施又过于破旧，借由水路自由前行的敌人将获得压倒性的优势。”麦克阿瑟告诉阿诺德，日军夺取新几内亚几乎是囊中取物。尽管夏威夷的处境也许是安全的，但他相信敌军已经准备要入侵阿拉斯加。

事实上，那一年的盟军战线上没有一个人知道大日本帝国指挥官们的长期目标是什么。回顾自身明显的位置弱点，日军发现自己其实和德军一样正在进行两线作战（第二战线位于中国），但即便他们肆无忌惮的入侵行动即将到达巅峰，他们的战斗力似乎仍旧所向披靡。海军中将南云忠一的特遣部队已然在锡兰附近海域击沉两艘英国重型巡洋舰和“赫尔墨斯”号航母。约瑟夫·史迪威将军在狼狈逃往印度时嘟囔着：“我们被从缅甸驱逐出来了。这简直和下地狱一样令人耻辱。”6月9日，菲律宾的最后一支美、菲部队也缴械投降了。群岛上只剩下游击队还在负隅顽抗。位于阿拉斯加阿留申群岛的两座岛屿（阿图岛和基斯卡岛）也于同一周落入了敌军之手。一艘日军潜艇袭击了俄勒冈海岸的斯蒂文斯堡；某日军战机还在俄勒冈海岸南部丢下了数枚燃烧弹；加州防御站支起了防空大炮，升起了防空气球屏障。随着隆美尔向苏伊士运河挺进、希特勒军团深入高加索，日、德两军将于年底在印度会合的流言广泛传播开来。

澳洲大陆上的人们情绪低落，几近绝望。据罗伯特·L.　艾克尔伯格回忆：“虽然我们的战斗机已开始随船到达，但敌军的零式战斗机在机动性方面显然更胜一筹，且当时的日本飞行员都受过良好的训练，技艺高超。我们的澳北雷达几乎毫无价值……兵力只有敌人的五分之一。补充兵源对敌军来说易如反掌，对我们来说却是难上加难。”联席参谋长们对于澳洲大陆的幸存概率表示堪忧，因而下令将新近派来的美军部队在新赫布里底群岛、斐济和新喀里多尼亚而不是阿德莱德登陆。“仲夏来临之前，”赫夫写道，“似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挡日军在澳大利亚登陆。”麦克阿瑟也写道：“当前我面对的不可回避的问题便是澳大利亚本土的防御。日本侵略军随时都可能到来。”按照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的话来说：“印度和澳大利亚正暴露在侵略军的枪口之下。”直到10月中旬，在与海军陆战队开始并肩向北挺进时，将军还曾向总统发出过警示：“如果我们在所罗门群岛战败，整个西南太平洋都将陷入严重的危机之中。”因此，他要求将美国的“全部资源”都转运至南太平洋。

事实上，就连日本人也不确定自己下一步应该走向何方，因为他们也从未期许过自己会获得如此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们本以为自己会在第一次进攻中损失1/4的海军力量。然而，在成功成为新帝国的同时，他们只损失了不到2.5万吨的弹药，且被击沉的最大的日本战舰只不过是区区一艘驱逐舰。历史上从没有哪支军队能够凭借这样的技能、速度和胆量获得如此多的成就。天皇部队不仅得到了足够的石油和能够无限满足他们需求的其他原材料，同时得以将盟军拒之门外。英美两国的战时经济面临这样的掠夺能否长时间存活着实存疑。日本人相信，战争实际上已经结束。据身处日军驻上海办公室、负责掠夺这些原材料的日本行政官员儿玉誉士夫回忆："每次传来日军在炎热的南方地区获胜的喜讯，日本陆海军将领都会在上海举办宴会，庆祝胜利。我相信日本本土的情况也是如此。在大量日本人冒着生命危险于前线出生入死的同时，大后方的日本人只顾着为了暂时的胜利豪饮，却全然忘记了这些胜利中所包含的重大牺牲。"

儿玉还记得，这些暴徒们在"愚蠢地消磨时光"时，嘴里还不住地叫嚣着"东条万岁"，完全没有意识到日军的关键人物其实并不是首相东条英机，而是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这位哈佛毕业生拥有聪慧的头脑和强大的意志，在大日本帝国的海军顾问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山本在美国时学会了打扑克和玩轮盘赌，并从那时起成为一名赌鬼，无论是金钱还是人力都可以成为他的赌注。3月1日，盟军舰队在爪哇岛战役中被摧毁。山本和其他海军顾问据此判定日军在战争爆发之初设定的目标过于谨慎。他们打算先征服澳大利亚，绕过大堡礁，派驻5个师的力量在澳大利亚人口密集的东部沿海登陆。在澳大利亚屈服之后，他们计划占领夏威夷、入侵印度。东条对这一计划中的第一步很感兴趣，因为他早就对麦克阿瑟从菲律宾出逃一事记恨于心，并且十分清楚将军打算利用澳大利亚作为跳板发起反击。然而，东条和日本陆军方面都感觉山本那些毫无节制的计划有些不计后果。也就是说，日本将军之间的矛盾比美军内部还要激烈。东条相信，一旦他获得优先的目标（他从不怀疑自己可以得手），日本将军们便会同意更加大胆地放手一搏。

手握实力强大的无敌舰队，他计划发起两次毁灭性的进攻行动。在爪哇岛战役中获胜的海军中将高木武雄将入侵澳大利亚东北范围内的岛屿。紧接着山本也将亲自出征占领中途岛，把握进攻夏威夷的垫脚石，从而打通进一步进军加利福尼亚沿海的通路。高木的第一个主要计划“莫尔兹比港行动”意在占领位于珊瑚海新几内亚的莫尔兹比港。一旦攻下莫尔兹比港，整个新几内亚就将不可避免地全部沦陷。以这里为起点，日军两栖部队即可潜入澳大利亚北部，而把占领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任务留给日本潜艇。这样一来，澳洲大陆就会陷入封锁状态。澳大利亚人要么就会在战斗中落败，要么就会在饥饿中投降。作为这一行动的序幕，高木的属下于5月3日占领了图拉吉岛——所罗门群岛的小岛之一，位于面积较大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以北20英里处。当工程师们在图拉吉岛上开始修建水上飞机基地时（有关这一行动的消息被应征入伍担任海岸哨兵、隐蔽在雨林中的英国椰子种植园主通过电报通报给了澳大利亚方面），高木的主力部队从拉包尔市新建的大型日军基地乘船踏上了前往莫尔兹比港的征程（拉包尔市坐落在俾斯麦群岛中面积最大的新不列颠岛上），船上满载着日军步兵。

任何人若想在西南太平洋作战都必须从新几内亚入手。作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岛屿（仅次于格陵兰岛），新几内亚是一座没有道路且大部分地区都人迹罕至的堡垒，东西长1 500英里，正好处于澳大利亚上方。从地图上看，它很像是一只肥胖的巨型秃鹰：左边的头部直指印度尼西亚，而对1942年交战双方都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尾部则是名叫巴布亚的半岛。巴布亚半岛的东端位于米尔恩湾，在瓜达尔卡纳尔西边约600英里。半岛的北部分布着名为布纳和戈纳的两个小村庄，而前往澳大利亚的起点莫尔兹比港就位于半岛的南部。

如果在高木舰队横越的所罗门海海面上放置一块钟面，那么巴布亚半岛就应该位于8点钟方向，拉包尔在11点钟方向。所罗门群岛的位置从1点钟方向（布干维尔岛）一直延伸至4点钟方向（瓜达尔卡纳尔岛）。新喀里多尼亚位于5点钟方向，但距离钟面所在位置较远。珊瑚

海位于6点钟方向，左下方就是大堡礁和澳大利亚东部沿海。

观察地图可以猜测，攻占莫尔兹比港最容易的方法便是下令让部队在布纳登陆，然后率兵穿越巴布亚半岛向目标前进。然而地图并没有显示一条名为欧文·斯坦利的山脉。这座山上拥有全世界海拔最高、气候最潮湿的雨林，且纵贯整座半岛。这也是高木部队为什么要从海路进军的原因。只要他能让部队在莫尔兹比港成功登陆，就能获得巨大的胜利，因为那时的莫尔兹比港警戒部队还全都是弱不禁风、心怀恐惧而又缺乏经验的澳大利亚民兵。只要征服他们，日军就可以越过珊瑚海、进攻这些民兵的老家。

然而，高木并没有成功。多亏了美国的密码破译员，敌军的密电被成功解读了出来。许多年之后，麦克阿瑟仍旧会津津乐道地讲起自己的飞机是如何首先发现日军舰船上的塔式舰桥的。鉴于1942年5月7日~ 8日发生的珊瑚海战役归属他的战区，他发布的公报内容让许多美国本土人都以为这一切全是他一手策划的。事实上，他手下的那些陆基轰炸机只扮演了微不足道的角色，毕竟这场战役主要是海军实力的展示。第一则令人振奋的战报是指挥官罗伯特·狄克逊中尉通过电报发来的。作为侦察轰炸机编队的长机驾驶员，他在自己的座舱里喊道：“命中一艘航母！狄克逊命中一艘航母！命中一艘航母！”原来，狄克逊率领属下击沉了日军轻型航母“祥凤”号。在接下来的混战中，双方舰队在第一轮海上交战中都没有发现彼此，（美军战机致使）另外两艘敌军航母受损。而日军战机击沉了更多的美军舰船（“列克星敦”号、一艘油轮和一艘驱逐舰），获得了战术胜利，但美军却因高木将军掉头返回拉包尔而获得了战略胜利。敌军入侵莫尔兹比的首役就此失败。

三周之后，山本五十六进军中途岛的尝试也在一场更加重要的交战过程中遭遇了挫败。这一次，又是功不可没的美军密码破译员为部队提供了无价的信息。历史学家后来指出，这一战役就是太平洋战争的转折点，而当时的交战双方对此却还浑然不知。日本人的自信并没有被削

弱；儿玉回忆，“即便是在日本海军的联合舰队被摧毁之后”，他的“大部分”同胞们“仍轻率地继续保持着愚蠢的自信”。而这些盲从者包括自信能够掌控珊瑚海并将麦克阿瑟挡在新几内亚以外的裕仁天皇、山本和东条。诚然，在中途岛战役4天之后，日军大本营的确下达过将入侵斐济、萨摩亚和新喀里多尼亚的计划推迟两个月的命令，但据斯坦利·L.福尔克记录：“截至目前，西南太平洋大部分地区都已落入日军之手，从新加坡到南亚和东南亚、所罗门群岛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下。而且，他们还在继续向前推进。其海军和空军势力在珊瑚海战役中遭到驱逐以及一个月后的中途岛战役惨败并没有阻止他们入侵的脚步。他们准备赶在夏天之前在所罗门群岛南部建立空军基地，同时向与澳大利亚隔珊瑚海相望、距离澳大利亚300英里处的莫尔兹比港挺进。”

在盟军的心中，敌人的攻势显然一如既往的不可阻挡。作为第一个惨遭日军轰炸、同时可能也是第一个遭遇海上敌军入侵的澳大利亚城镇，达尔文仍处在生死绝境的边缘。早在3月，新几内亚沿海村庄布纳和戈纳西北方的战略海港城市莱城和萨拉马瓦便已被敌军占领，并被派驻了重兵把守。日军还在布干维尔岛上建起了战斗机跑道。如今已成为日军最南端前哨基地的瓜达尔卡纳尔岛也正在建设跑道。敌军的战略模式不言而喻：他们打算沿着位于拉包尔东南方向的所罗门群岛岛屿链建设一系列的机场。这些机场可以被用作零式战斗机的垫脚石，护送“贝蒂”和“齐克”战机对美澳补给线进行轰炸袭击。与此同时，聚集起来的登陆舰也在为进军澳大利亚本土做准备。唯一的问题就在于日军是打算直接进军西南方向的达尔文，还是通过对东南方向的莫尔兹比港发起新的进攻来首先保护自己的侧翼。麦克阿瑟推测他们会再次夺取莫尔兹比港，而他的想法是正确的。

麦克阿瑟不得不说服很多人。华盛顿方面，联席参谋长们的乐观情绪实在有些荒谬。7月2日，他们下令夺回所罗门群岛、新西兰和包括拉包尔在内的新不列颠岛。然而，这几个目标对那一年的战地指挥官们来说就像夺取柏林郊区一样不可企及。与他们相反，科廷的军事顾问则是

一群失败主义者。他们继续固执于坚守布里斯班战线，也就是正好穿过布里斯班的南回归线一侧。这样一来，澳洲大陆西北部大片土地就将成为这一计划的牺牲品。有人提议烧焦那里的土地——摧毁军事设施，炸毁发电厂，焚烧码头。执着于采取攻势的麦克阿瑟告诉他们，消极反抗将会导致战争的失败，且只要布里斯班战线的观念不能得以废除，他便会提出辞职。科廷屈服了，但他的许多副手都陷入了绝望的情绪之中，认为挽救人口密集的澳大利亚东部沿海的最后机遇就这样成了泡影。

正当日军和盟军在没有地图的热带丛林中摸索着寻找对方的踪迹时，麦克阿瑟于7月20日将自己的总部从墨尔本搬到了布里斯班。从此，他与日军之间的距离又缩短了1 185英里。他当晚带着家人和下属包下了风景如画的整座伦农酒店，第二天一早就坐在了9层安保集团大厦中第8层的办公桌前——这座保险大楼的担保人已经被疏散去了南方。他刚一坐定，威洛比就发来了报告，称一架侦察机发现一支大型日军运兵护卫舰队正准备离开拉包尔。麦克阿瑟强烈怀疑这些舰船是朝着两军都没有派驻部队的布纳和戈纳方向驶去的。由于缺乏相关的证据来证明，威洛比否认了这种可能性。即便如此，将军还是下令派出一支盟军部队去占领这两个村庄，并在布纳建设一个大型机场。然而，一切为时已晚，敌军护卫舰队已经先行赶到，将当地的1 000名澳大利亚民兵驱赶到了山区中。夺回布纳和戈纳需要花费6个月的时间，但盟军漫长的撤退计划已经接近尾声。8月7日，海军陆战队第1师在图拉吉岛和瓜达尔卡纳尔岛涉水登陆。当敌军于18天后在米尔恩湾上岸时，麦克阿瑟已经做好了回击的准备。预料到敌军此次绕行是冲着莫尔兹比港而来，他早就在那里设下了陷阱，并派曾在中东作战的澳大利亚第7师老兵们驻守在那里。在惨烈的米尔恩湾战役中，日军的数艘登陆船被摧毁，一艘运兵船被击沉，步兵被迫撤离。这也是太平洋战争中敌军两栖部队第一次在建立起滩头阵地之后被迫折返。这场苦战持续了10天的时间。当战斗终于结束之后，胜利者发现战友们的尸体在反复的拉锯战中已被折磨得残缺不全。

由于入侵莫尔兹比港的其他方法也纷纷落败，日军如今只好尝试进军令人难以置信的欧文·斯坦利山脉。起初，直至8月8日都一直藏身于山脉中的后方民兵部队在看到有敌军朝他们所在的方向攀爬过来时，还以为那只不过是一支巡逻队。令他们备感惊讶的是，大量的步兵、迫击炮、机关枪和野战炮正在100英里长的泥泞曲折的科科达小径上缓慢爬升。4周之内，堀井富太郎少将手下的1.4万名士兵便在钢索桥村跨过了奔腾的库穆西河，艰难地走过了1.3万英尺长的科科达山口。5支接受过丛林训练的部队交替前进，来到了距离起点55英里处的伊苏拉瓦村，然后沿着险峻的南坡向离莫尔兹比港只有20英里的伊米塔山村和约里拜瓦村迈进。我们可能永远都无从得知到底有多少人在这次英勇的尝试中丧命。很多人都死在了库穆西河，其他人则消失在流沙之中或坠落谷底。在某些地方，最多只有1英尺宽的蜿蜒小径还会凭空消失，而要想走出一片只有几米长密林也要花上一个小时的时间。列队中的第一个人需要手持大砍刀开路，直到筋疲力尽地倒下，才会有第二个人接过砍刀继续前进，以此循环往复。在当时的气候条件下，因为失去意识而被扔下的人只能再活几分钟。

麦克阿瑟也派出了自己最优秀的两名准将（“帕特”·凯西和哈罗德·乔治）前去调查巴布亚的地形。返回布里斯班时，他们两人都浑身颤抖。如果他们在此之前一直以为巴丹半岛和萨马岛上覆盖着全世界最茂密的丛林的话，那么新几内亚的茂密情况简直就令人难以置信。他们告诉将军，自己不知道人类如何能够在那种地方生存下去，就更别提作战了。在第一次空中观测时，展现在他们眼前的巴布亚最引人瞩目的地方便是那条尖削的山脊。它如同某种史前怪兽的脊椎骨一样横贯了整座半岛，顶峰钻进了一团黑压压的雨云之中。不过，直到降落之后冒险踏上陡峭湿滑、充满盘根错节的雨林小径时，他们才真正感受到人生中莫大的恐惧。高达7英尺的杂草叶片锋利得如同手术刀一般，可以轻易地划开一个人的手掌。丛林里随处可见红树林沼泽和茂密的竹林、棕榈林。

不仅如此，小径上还不时出现漫过腰部的泥潭。空气中飘荡着阵阵恶臭——那是腐烂的灌木丛和散发着臭气的花朵的味道。在头顶密密麻麻的藤本植物的遮蔽下，很少有阳光能够透射进来。雨过天晴时，从潮湿的沼泽里蒸腾起来的阵阵蒸汽简直令人窒息。

这就是雨林战争的背景：绿色的烂泥和植被，绿色的坏疽和痢疾，还有穿着绿色军服的敌军。敌军军官还会在手上涂抹黄绿色的发光微生物，以便入夜后查看地图。如今也深入雨林的澳、美士兵将自己称为“沼泽鼠”，将生长在他们的双脚、手臂、肚子、胸口和腋窝上的溃烂病称为“热带溃疡”，而挥手驱散如云朵般聚集在野战炊具旁的苍蝇和蚊子的动作则是“新几内亚敬礼”。到处都是虫子：咬人的蚂蚁、跳蚤、恙螨、有毒的蜘蛛以及会落在熟睡的人身上吸血的色彩鲜艳的巨型昆虫。扭曲的藤蔓植物之间云集着色彩艳丽的鸟儿和貌似巨型老鼠般、长着大翅和尖牙的生物。巨蟒和鳄鱼在泥沼与泥塘中潜伏着，等待着有人从肮脏的小径上跌跌撞撞地闯入它们的领地。入夜后，士兵们还可能从自己的外阴和直肠里拽出血糊糊的水蛭。虫咬的痕迹一旦被经过抓挠就会引起化脓，留下脓水直淌的溃疡。由于当地的搬运工都不愿意帮助他们——尤其是在靠近前线的地区，所以所有普通士兵不得不背上100磅重的东西，而有些人还总是发着烧。很少有人没有被雅司病、恙虫病、黑水热、癣菌病、疟疾、阿米巴痢疾或细菌性痢疾感染过。相比所有身负枪伤的人，5倍数量的人是因为疾病无法得到医治而倒下，而且只有发烧超过102华氏度（38.9摄氏度）时才能够就医。

身处布里斯班办公室的麦克阿瑟一边聆听着这些汇报，一边来回地踱步。听罢，他停下脚步，转身用低沉而又颤抖的声音对萨瑟兰和迪克·马歇尔说道：“我们要在新几内亚保卫澳大利亚。”他召集了一场非正式新闻发布会，给战地记者们未来的报道提供背景信息。据加文·M. 朗回忆：“将军器宇轩昂地进场时，30多名记者和军官全都站起身来——只见他没有戴帽子，表情严肃，风度高雅，衣着笔挺无暇。他举起右手敬了一个礼，除此之外再没有别的开场白，只是来回地踱着步……麦克

阿瑟开门见山地叙述了目前的军事状况。他的措辞堪称完美，语气清晰连贯，只有在着重强调时才会偶尔停顿一下。记者们记着笔记，却没有人打断他。会议室变成了舞台，麦克阿瑟就是艺术名家，其他军官则是阵容里的‘临时演员’，而记者们就是观众。整个场面充满了戏剧性。”一位名为乔治·H. 约翰斯顿的澳大利亚记者回忆，他们就这样出神地听将军讲了两个小时。其间，将军根本就不需要思索任何一句措辞，展现出了“亨利·欧文爵士般的戏剧天分”。将军告诉他们，巴布亚可以拯救澳大利亚，也只有巴布亚才能拯救澳大利亚。他说：“我们必须进攻，进攻，进攻！”会后加文·朗写道：“将军再一次举起右手敬了一个礼，迈着大步走出了房间，后面还跟着一两位参谋。会议结束了。只有一个人开口说过话——那就是这位最高指挥官。没有人提问，没有机会澄清讲话内容的意思。每一个字眼都是直接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的唇齿间直接倾泻而出的，没有异议，一清二楚，毋庸置疑。”

开朗大方、脸色红润、身材短粗的澳大利亚人托马斯·布莱米爵士是麦克阿瑟的地面部队指挥官。他也是不相信日军能把盟军踢出新几内亚的少数几位军官之一。与他相反，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人都感到很震惊，并表示进攻新几内亚的决定有些出人意料。可麦克阿瑟却表示，这也正是他下此决心的原因之一，如果连他们都没有想到，那么日本人就更不可能料到了。事实上，敌军也正在摇摆之中。战后，曾任大日本帝国东南亚舰队驻拉包尔高级参谋的海军大佐大前俊一告诉审问他的军官：“日本人没有想到麦克阿瑟将军会在新几内亚安顿下来，从那里保卫澳大利亚。他们也不相信他能够利用新几内亚作为对日行动的根据地。日本人认为，麦克阿瑟将军是无法在莫尔兹比港安身的，因为他根本就没有足以供他自立的部队。”

麦克阿瑟的兵力必然是贫乏的，但他相信只要日军对澳大利亚发起一次抢滩行动，那么澳洲大陆就必将失守；一支勇气足以跨越欧文·斯坦利山脉的敌军部队很快便能横扫澳洲平原，而当时的麦克阿瑟并没有足够的后备力量包抄他们。正如他后来所写的那样，如果雨林“和日本

敌军一样顽强坚韧”，那么就可以把雨林视为敌人的敌人。他推论，在巴布亚迎头血战日军总比等到没有多余的军队时成为强弩之末要好得多。与此同时，瓜达尔卡纳尔岛也在他的考虑范围之内。那里的问题尚不可知。他相信自己猛攻新几内亚能够为那座被围困的岛屿减轻一些压力。事实上，从战后其他审讯内容中可知，他一改变进攻目标，日军便立即决定优先进攻瓜达尔卡纳尔岛。堀井接到命令，要求他将夺取莫尔兹比港的行动延迟至潜艇入海之后。尽管如此，将军不顾下属意见的这一举动可谓有勇有谋。用乔治·肯尼的话来说：“不惧批评的麦克阿瑟可能会决定维持守势，直到手头有足够的军队可供调动……没有足以保障沟通新几内亚补给线的海军力量，空军势力又与敌人差距甚远，同时面临澳洲人民忧惧敌军入侵的心理，若是将军的胸怀不够广大，甚至可能会考虑放弃莫尔兹比港（也就是他在新几内亚唯一的基地）。”

作为比麦克阿瑟麾下任何人都对他青睐有加的军官，乔治·肯尼同样也为他捍卫莫尔兹比港的决定做出了辩护。肯尼刚刚到任西南太平洋战区空军司令时，盟军的运气正处于最低点。那年夏天，麦克阿瑟曾给自己后来在华盛顿任职的老朋友达德利·W.　诺克斯海军上校写过一封信，提到：“这里的路还很长、很艰辛，我几乎看不到道路的尽头。在我暮年的军旅生涯中强为无米之炊似乎成了我的命运。我已经领导了一次注定要失败的行动，正绝望地试图不要重蹈覆辙。”5周之后乘机前来探望他的阿诺德（他也是联席参谋长中第一个前往太平洋战区的人）当晚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仔细考虑一下，麦克阿瑟的两小时讲话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展示了他敏锐的头脑——不过他被自己没有实施的计划困扰着，灰心丧气，极端的戏剧化，比我之前认识他的时候还要神经质。交织在一起的双手颤抖着——似乎心有余悸。”

乍看之下，52岁的乔治·丘吉尔·肯尼并不像是能够改变这一切的人。他个子矮小，皮肤黝黑，身材壮实，伤痕累累，性格外向，从很多

方面看，都与他的新指挥官迥然不同。麦克阿瑟冷淡严肃，肯尼则爱好交际。将军办事有一股冲劲，新空军司令做起事来却不慌不忙、低调朴素。肯尼是来替代自己的朋友乔治·布雷特的。肯尼认为布雷特在萨瑟兰的默认下遭到了迫害。若不是萨瑟兰的纵容，布雷特也许早就当上了战区的空军司令。和大多数陆军航空兵一样，肯尼也将比利·米切尔视为殉道者，并且和他的飞行员及机组成员一样无法忘怀麦克阿瑟曾是审问米切尔的军事法庭成员之一。最终，阿诺德警告他，他的第一项任务便是忍受将军的怒火。麦克阿瑟认为，海军和空军都没有为他提供足够的帮助，所以阿诺德预言肯尼在布里斯班可能会遭受冷遇。

事实的确如此。7月28日星期二晚，他住进了伦农酒店二层的第12号公寓，第二天一早便驱车赶到了位于安保集团大厦5层的盟军总部。在那里，他遇到了为自己所受的不公待遇而心情沮丧、满腹牢骚的布雷特。到8层报到时，肯尼的心中充满了不安和忧惧。萨瑟兰绷着脸叫他直接进来，将军正在等他。麦克阿瑟挥了挥手，示意他在一个巨大的黑色皮沙发上坐下，然后就开始踱步。在肯尼的印象中："将军看上去有些疲惫，形容枯槁，神色紧张。作为一个62岁的男人，他的身体很健康。虽然发量比我6年前遇到他时少了一些，但仍是一头乌发。他的身材依旧苗条，踱步的样子也还是那样的高雅。他的眼神很迫切。你仿佛能够感觉到他那聪明老到的大脑时刻都在运转。"当时，他的情绪显然十分激动。"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伴着他在屋子里来回踱步的画面，我听到了空军的许多弱点……不能执行轰炸任务，飞行员能力又差，指挥官还缺乏领导力……从下到上，他不喜欢空军机构里的任何一个人……最后他表示，不只是这些飞行员对他的总部有敌意，他也开始怀疑他们的忠诚度。他要求我和空军的每一个人都要对他效忠，不然他就要动手处理掉他们。"

在此期间，肯尼一直在试图揣测麦克阿瑟的潜在情绪，探究他口中那些尖酸字眼背后的情感——想彻底了解它们的真实意义。他这才意识到："将军并没有看起来那么愤怒。事情不是表面看起来的那么简单。

他是不是在分析我，想看看对我施压之后我会作何反应？也许这番激辩正是他试探我的方法。”趁将军停顿下来喘气的机会，肯尼站起身来，表示自己知道该如何指挥空军。毫无疑问，空军中存在着很多问题，肯尼打算“纠正这些问题，做点儿实事”——让他“看到成果”。至于忠诚的问题，肯尼表示：“我在军中也曾多次陷入困境，（但）从没有背叛过自己的上司。我会效忠于他，也要求自己的属下和我一样。如果在任何时候我无法维持自己的忠诚，都会直言不讳地告诉他，同时收拾好自己的行李，等待他下达将我遣送回国的命令。”

麦克阿瑟站得笔直，无动于衷地听着。肯尼记得：“麦克阿瑟的眼睛在审视、分析和品定（着我）”。紧接着将军走了过来，用一只手臂搂住了肯尼的双肩。“乔治，”他说道，“我觉得我们会相处得很好。”他将海军陆战队即将在所罗门群岛登陆的事情告诉了肯尼。两人都认为，阿诺德有关“暂时维持（空军）战略防御”的指令是不现实的。如果敌机的数量继续以5∶1的攻势超越守军，并且可以从拉包尔派出25~40架轰炸机南下，并派战斗机护航，那么莫尔兹比港即将沦陷的局面将不可挽回。肯尼手中最紧急的任务便是夺取新几内亚的制空权。要想完成这一任务，就必须依靠对盟军战机的熟练调配。不过，空军士兵们才刚刚把这些战机的零件从板条箱里取出来，正在布里斯班加班加点地进行组装。麦克阿瑟承诺，自己会为他提供手头所有的一切资源。这位新近走马上任的空军司令这才回到了自己位于5层的办公室里。

然而，布雷特却给满怀热情的他泼了一盆冷水。布雷特冷冷地表示，麦克阿瑟是个善变的人，他热情洋溢的承诺可能会遭遇萨瑟兰从中作梗。布雷特预测肯尼肯定会和参谋长——“将军身边的拉斯普京”起冲突。果真，没过几天，这位新空军司令就发现布雷特的敌手正通过筹划轰炸任务和分配目标来篡夺自己的特权。肯尼火冒三丈地大步走进萨瑟兰的办公室，坐在他的办公桌旁，拾起一支铅笔，在一张白纸的中央画了一个黑色的小点。“这个，”他指着小点语气坚定地说道，“你对空军的了解就只有这么一点儿，而我对空军的了解就好比这张纸上剩余的部

分。”面对暴跳如雷的萨瑟兰，肯尼冷冷地应了一句：“不如我们到隔壁房间去找麦克阿瑟将军吧，把话说明白。我想知道到底谁才是空军负责人。”

听罢，参谋长退缩了。和麦克阿瑟手下的大部分人一样，肯尼既不喜欢也不信任萨瑟兰。在他的回忆中：“萨瑟兰是个孤傲、武断而又野心勃勃的家伙……我甚至觉得他对麦克阿瑟的忠诚也是个问题。他只不过是装作一副忠心耿耿的样子罢了。虽然麦克阿瑟从不曾怀疑过他，但我就是不信任他。”为了使盟军能够获得出色的战果，肯尼一直和将军保持着默契。在克拉克·李看来：“麦克阿瑟完全康复和恢复活力大概就是从肯尼走进他在布里斯班的总部那一天开始的。他静静地坐在那里听完将军有关飞机和飞行员的冗长申斥之后，不寻常地允诺了当时麦克阿瑟要求所有‘局外人’给予他的忠诚，决心帮助他的新指挥官赢得战争。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肯尼对于麦克阿瑟的重要性是不容低估的。”

第二个月，肯尼就派出17架B–17轰炸机，在拉包尔发动了一次空袭，破坏了敌军将用来对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巴布亚发起两次大规模进攻的基地。不过，肯尼那一年最卓越的贡献还是他对C–47运输机的妙用。在筹谋巴布亚的防御计划时，麦克阿瑟对横亘在莫尔兹比港和他的军需仓库澳大利亚之间宽达600英里的珊瑚海“护城河”感到十分头疼。如今，他手中已有3支步兵师准备投入战斗，但在日军舰队于海面上来回巡视的情况下，通过运输船将他们运往北方所冒的风险让人无法接受。作为空军的狂热鼓吹者，肯尼建议改用飞机作为运输工具。他表示自己可以将2.6万名步兵运送到莫尔兹比港的5座新机场，并为他们提供将敌人击退至布纳的所有军需用品和武器设备。“但没有卡车。”一位参谋说。“不，包括卡车。”肯尼反驳道，“我们可以用乙炔炬将车架锯成两半，装上C–47运输机，到达之后再把它们重新焊接起来。”在发表了一段慷慨陈词之后，他又补充道：“给我5天的时间，我可以通过空运把整支美军部队都送到新几内亚去。”

在将麦克阿瑟的轰炸机战线从布里斯班向北推进了1 500英里之后，肯尼将莫尔兹比港从一个被围困的要塞转变成了盟军在西南太平洋的主要基地。心怀感激、欣喜若狂的麦克阿瑟对他说道：“乔治，你晚出生了300年，要不然简直就是个天生的海盗。”他不仅改称肯尼为“海盗”，还充满喜爱之情地当着众人的面拥抱了这位空军司令。“这个小家伙就如同给了我一杯新鲜而又浓烈的白兰地一样。我喜欢这东西。它对我有好处。我打算继续喝下去！”听闻肯尼手下的一位年轻军官晋升为准将的消息，“巴丹党”中一位满头灰发的成员嘟囔了一句：“那个小子。好吧，我希望他满21岁了。”麦克阿瑟冷冰冰地答道：“我们因为他们的效率而晋升他们，不是年纪。”一天，一位战地记者向将军提问：“空军今天情况如何？”麦克阿瑟开玩笑地回答：“我不知道。去问肯尼将军吧。”记者又追问道：“将军，你的意思是说你不知道炸弹会落在哪里吗？”麦克阿瑟露齿一笑答道：“我当然知道它们会落在哪里。它们会落在正确的地方。去问肯尼将军那是哪里吧。”还有一次，听闻几位战斗机飞行员因行为不检点而在悉尼被捕的事情，麦克阿瑟宽容地表示：“别管肯尼手下的那些孩子们了。我也不想看到他们长大。”当肯尼和萨瑟兰就美国是否需要建立空军部的问题争论不休时，将军插进话来，对肯尼的观点表示了赞同。肯尼的话让他想起自己一定是从1932年起就对这一问题有了改观。那时候，国会正在权衡是否要迈出这一步。麦克阿瑟罕见地承认了自己的错误，答道：“是的，没错。那时候我动用了手头的一切资源反对这个提议。那是我职业生涯中犯下的最大的一个错误。”

在第一批得知麦克阿瑟要将自己派往新几内亚的士兵中，有一个人名叫小E. J. 卡恩。在对部队训话时，将军鄙弃了信号兵团准备好的话筒，而是直接对他们喊起话来。据卡恩回忆：“虽然他的讲话是即席发挥，内容却充满了丰富多彩、错综复杂、符合他出众散文风格的句子。不过，他在表达主旨时却还是一样干净利落、直截了当。他说我们很快就要行动起来了。‘我要你们每个人都为我杀掉一个日本鬼子。’他补充道。那一刻，我们中间还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很快就要踏上战场并兑现

这一诺言。不到一个月后，我们第一分遣队就踏上了前往新几内亚的旅途。”

那时已经是9月中旬。东边的潜艇正挣扎着守护瓜达尔卡纳尔岛亨德森机场周围的防线。麦克阿瑟预测，这场战役的惨烈程度将和莫尔兹比一役不相上下；堀井手下的士兵就驻扎在距离海港不远处，入夜后甚至还能看到他们打向天空的探照灯光。然而，9月17日星期四，就在日军向约里拜瓦西南跃进、发动最后攻势的企图遭到澳大利亚人强势阻截之后，堀井给自己焦躁不安、瘦弱憔悴的士兵们分发了最后一份口粮。3天之后，他下达了撤回部队的决定。（“无法用任何言语形容我们所遭遇的困难。”他表示，“我们从心底里钦佩这些牺牲，也深深地同情大批被杀和受伤的士兵。”）4天之后，他开始率领部队离开伊米塔北麓，交替撤退。

返回的路途同样充满了艰辛，其中最不利的条件当属澳大利亚人所说的“雨天”——也就是降临在他们头顶上的雨季。10月1日，麦克阿瑟下令让战地指挥官们把被疾病缠身的敌军赶到库穆西河对岸，但这其实并没有必要，敌军的撤退行动已经演变成了一场暴动。在急不可耐地赶往布纳和戈纳的途中，日军士兵们一心惦念着在山下等待自己的那些粮食，以至于不惜将别人踩在脚下。战争还未结束，他们就已经失去了一万名士兵，且连堀井本人也淹死在了河里。（“死得真是太不光彩了。”麦克阿瑟心满意足地评论道。）在岛上的其他地方，第7师的澳大利亚士兵和第41师、第32师的美国士兵也可能都已裹足不前。但盟军停歇的意愿显然不如饥饿的日军高，而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峭壁也使得想象中的迂回突击策略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当地人认为交战双方都疯了。在他们看来，新几内亚就是“Dehori之岛”。Dehori是莫托语中最常见的词汇之一，大约等同于西班牙语的“mañana”、马来语的“ti d’ apa”和中文的“别担心”，意思是“等一会儿”，最好是等上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在雨季。如果有人想要用小装

饰品（小钱）来交换当地人强壮的劳动力，他们便会（理都不理地）消失在灌木丛中。因此，和此前的日本士兵一样，科科达小径上的盟军步兵们也都背着沉重的包袱。“在这种情况下，”乔治·H. 约翰斯顿写道，“你的心智只允许你清醒地思考一件事情——‘眼前的小路’或是他们所说的‘血路’。在攀爬几乎垂直的山崖的过程中，2 000多步都是踩在泥潭里的，里面还掺杂着倒塌的树苗，泥巴的颜色也因为时间久远而变成了深蓝色。每迈一步就要陷入两英尺深的泥巴中，而且走三步就要摔一跤，根本就没有让人歇脚的地方。攀登这座山对于思想和精神来说都是极其痛苦的。士兵们都戏谑地将这座山称为‘（升天）金色台阶’。”

处于这番境地中的部队需要为自己的沮丧情绪找一个靶子，而麦克阿瑟大言不惭的公报、故作姿态的架势和包着金色外壳的帽子显然就是最好的选择。正如去年冬天驻守在巴丹半岛上的部队士兵所做的那样，这里的士兵中也流传着麦克阿瑟在战线后面过着极尽奢华生活的虚构故事。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也是他自己的错。他允许阿谀奉承的勒格德·迪勒把自己和艾克尔伯格同乘一辆吉普车的照片交给了记者，上面还写着这样的标题：“麦克阿瑟将军与艾克尔伯格在新几内亚前线”。然而，这张照片实际上是在澳大利亚的罗克汉普顿训练营里拍摄的。（照片的一角隐约还能够看到帕卡德轿车的鼻翼。正如艾克尔伯格在写给妻子“埃玛小姐”的信中冷淡地指出的那样，科科达小径上可没有帕卡德轿车。）麦克阿瑟还允许迪勒发布了自己亲自率兵征战巴布亚的报道。实际上，他直到秋季过半才到访莫尔兹比港。那时候敌军早就已经开始撤退了。

这样的报道是令人鄙夷且多此一举的，还助长了许多不公的诽谤和中伤。比方说，有人说他帽子上的饰带多得和海军将领军帽不相上下了。还有人怀疑他仍在把自己的功勋与父亲当年冲上传教士山的壮举相比较，而这也解释了他为什么会允许身边那些阿谀奉承之人授予他诸如“铜星勋章”及箭头纹章和空军奖章之类的零星荣誉。一位军事历史学家刻薄地写道：“也许没有哪位最高司令会允许自己的属下这样推荐自

己获奖，或在领取奖章时展现出如此孩子般的兴奋劲头。”这话可能并没有错，但试想一下，又有几位伟大的将领是不渴望荣誉的呢？

和步兵们一样，陆军航空兵团的士兵中间也飞速流传着不少诋毁将军的故事。其中一则还提到了麦克阿瑟害怕飞行的事情。肯尼也听说了这一流言，于是决定试探一下它的真实性。事后他这样讲道：“9月的一天晚上，我在他（将军）位于布里斯班的家中时随口提到自己很快还要到新几内亚去视察空军部队，并邀请他同去。他立刻答道，‘没问题。我们明天就走。你来带路。’”飞机飞出100英里之后在珊瑚海上空出现了一个引擎停运的故障，于是飞行员只好返航进行维修。当时，将军睡着了。肯尼推了推他的膝盖，惊得他的双眼一下子就睁开了。他说：“我一定是打瞌睡了。有事吗？”肯尼回答：“我就是想告诉你，这是一架很不错的飞机。事实上，它在只有3个引擎的时候也能飞得和有4个引擎时一样平稳。”麦克阿瑟说：“我就喜欢听你们这些热情高涨的飞行员讲话，即便有一点儿夸张。”肯尼答道：“好吧。我们在过去的20分钟里一直都是依靠3个引擎飞行的。可你并不知情。事实上，你连醒都没有醒过来。如果你望向窗外，就会看到2号引擎的螺旋桨已经不转了。”将军探头望了望，笑着回答：“这种感觉还挺舒服的，不是吗？”肯尼回忆：“他比我第一次遭遇引擎罢工时的反应冷静多了。”第二天早上，他们再次登上了B–17轰炸机，开始进行跨海飞行。6个小时的航程中，麦克阿瑟足足睡了3个小时。

11月6日，将军把自己的前进基地搬到了莫尔兹比港，其后又频繁地在相隔1 500英里的布里斯班和新几内亚之间往返，以至于两边都要为他准备午餐。虽然战地记者书写的有关他的报道电头仍标注着“澳大利亚某处”，但在艾森豪威尔于11月8日登陆北非之前，在上千万美国人的心中，这一短语所蕴含的意义比任何其他战区传来的消息都更加光辉可贵。对于麦克阿瑟的仰慕者来说，肯尼的故事并没有什么好令人意外

的，某些人说不定还在狐疑将军为什么没能自己长出翅膀独自飞去呢。在将军刚刚南下的那段日子里，澳大利亚记者们总是小心翼翼地不在报道中提及他的名字，以免把他的行踪暴露给敌人。如果不得不提到麦克阿瑟，他们也会被告知用着重表示的一个“他”字来进行指代，仿佛他是何方神圣似的。当然，这在他看来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如今，令人感到奇怪的是，美国各党派人士以及所有英联邦国家的人民都把颂扬麦克阿瑟的话当作是某种启示。更有趣的是，他受到推崇的直接原因竟是他在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上的抗争——也就是他唯一失手的一场战役。同时也是美国军事史上最惨烈的一次失败。

这其中的一部分原因在于那一年的美国军事圣坛上缺乏偶像人物。而另一个原因则在于这一战区对他具有非凡的意义。自我膨胀时的他倒是和约翰·L.　刘易斯有几分相似——这一比较可能会让两人都大发雷霆。刘易斯曾经说过：“人不要自吹自擂。”麦克阿瑟上台后曾有很长一段时间都面临无人喝彩，尔后又人去楼空的局面。如今，台下却挤满了热情高涨的观众。用约翰·赫西的话来说，每个人“都想要抓住自己的英雄，把他高高举起来，用青铜为他铭刻一篇优美的史诗”。

早在1月13日，约瑟夫·梅迪尔·帕特森就曾在《纽约每日新闻》上呼吁“拯救”麦克阿瑟，并在华盛顿为他大力进言。很快，帕特森在《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工作的妹妹茜茜和在《芝加哥论坛报》工作的表弟罗伯特·R. 麦考密克上校，以及和他在同一报业下工作的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与弗兰克·甘尼特也加入了他的阵营。在麦克阿瑟的支持者中，最能畅所欲言的当属杰拉德·L. K. 史密斯、威廉·达德利·佩里和查尔斯·E. 库格林神父。这些人指责政府密谋将他“抛弃”。熟识麦克阿瑟与艾森豪威尔的乔治·范霍恩·莫斯利（艾森豪威尔晚年形容他是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军官，“总是在钻研新点子”）曾于1942年11月10日给将军写去过一封信，称“颠覆分子”对麦克阿瑟的名气感到十分害怕。莫斯利预言，那些因为移民和新政拥护者渗透进这个国家而感到义愤填膺的美国人将会推翻政府并推举将军作为独裁统治者。他还预测：“那时你可能会遭

到非议，但最终你将在历史上占有只有第一任总统才能与之媲美的位置。”

富兰克林·罗斯福敏锐地察觉到，麦克阿瑟的名声已经被他的敌人所利用了。帕特森承认“共和党人正在讨论有朝一日推举他为总统”的事情，而国会山上的记者们也注意到有权有势的参议员阿瑟·H. 范登堡正在到处散播同一个论调：“这个军人不简单。”史汀生草草地在日记里写道：“麦克阿瑟，这个自私自利、如女高音一样爱表现的人，通过默许对外透露（自己具有候选人资格的）一些故事……来操纵想要让他参选的人。”史汀生认为，他华而不实的公报和在新闻发布会上高傲的态度“推动了这些故事的继续传播”。

不过，这也有可能是对于这些事件的过度解读。值得注意的是，莫斯利古怪的提议正是被将军完全忽视的声音之一。虽说他从未反驳过反政府报纸控诉太平洋战区之所以被一分为二就是为了阻碍他竞选总统的野心，但他坚信这里需要统一指挥权的信念的确和政治没有半点儿关系。诚然，《美国信使》杂志在报道中描述“将军从未参加过任何比天气更加富有争议的非军事话题”未免有些言过其实。他对公众议题抱有强烈的信念。1944年即将到来之际，他对参选总统确实产生了强烈的兴趣。虽然他的观点和那些保守的支持者相比更加激进，但他想要入主白宫的愿望却并没有超越艾森豪威尔。也许《时代周刊》于1942年夏天刊登的一篇文章对他的评价最为中肯：他是一位“聪慧、勇敢的英雄，是士兵们的伟大领袖，只不过野心太大，还有几分自鸣得意和张扬浮夸”。

宾州大道1600号的时任主人在关注有关麦克阿瑟的政治威信短暂提高的新闻时，可是抱着巨大的职业兴趣的。他告诉助手，他预计这一势头还会滋长下去。事实的确如此。自从将军撤往墨尔本之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寄来的书信就越积越多——作为将军的信件审查员，迪勒是不允许记者们把这次突围称为逃跑或战败的，当然实际情况就是如此。大

部分记者都很令人满意，而批评言论多半都来自被丢下的士兵的家人。一位名为约瑟夫·P.　萨维奇的芝加哥共和党律师已经开始为麦克阿瑟组织基层选举。尽管富兰克林·罗斯福并没有把将军视为威胁，但罗珀民意测试公布在《财富》杂志上的公众人物民调结果显示，将军的支持率为57.3%，相当于温德尔·L.　　威尔基（35.8%）和托马斯·E.　　杜威（24.7%）的支持率之和。在布里斯班，“麦克阿瑟身边亲近的人告诉记者，将军‘没有政治野心，更愿意作为菲律宾的解放者而不是美国总统被历史铭记’”——这正好是人们期望的消息来源。战后不久，艾森豪威尔到东京拜访了将军，并急迫地告诉他自己无论如何也没有兴趣参选。麦克阿瑟点了点头，说道：“这就是游戏规则，艾克。”

1942年的圣帕特里克节当天，就在美国人惊闻将军成功冲破日军封锁的消息时，罗斯福通过助手之口表达了对于麦克阿瑟的“真挚敬仰”，说他“读到将军发来的辞藻华美的报告还会时而露出微笑”，而且总是“称赞他是个能在令人心碎的局面下创造奇迹的军事天才”。其实这也是游戏规则。那一年，与麦克阿瑟反目无疑是在政治上“切腹”。面对自己有可能惨遭将军支持者挫败的局面，共和党名义上的领袖温德尔·威尔基提议：“把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召回吧。赋予他最高的权力，不要让他饱受官僚政治之苦。把责任和指挥美国全军的权力都交到他手里，让他发挥最大的效力。晋升他为总统手下军队的最高统帅。”曾预言将军永远也不会抛下吕宋岛官兵的休·S.　约翰逊也赞同这一想法。参议员小罗伯特·M.　　拉福莱特提出了一项国会决议案，将（1942年）6月13日（也就是将军作为新生入学西点军校的周年纪念日）设为“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日”。美国国会图书馆发布了一本列有253条文献介绍将军生平的书目，而此前还没有人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包括总统在内）接受过这种荣誉。当罗斯福任命威廉·D.　莱希为自己的首席军事顾问时，《时代周刊》写道：“威尔基的选择（也许也是人民的选择）正是道格拉斯·麦克阿瑟。”

当时少有热情言论的《纽约时报》发表了这样的评语：“就连他的

名字也充满了魅力——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好莱坞理想的士兵形象与纯粹的理查德·哈丁·戴维斯精神结合在了一起。”《国家》杂志写道，整个国家都为能够拥有将军这样具备“战斗特质”的领导人而从“心理上”感到欣慰。沃尔特·李普曼形容他是“一位伟大的指挥官”，拥有“广博深远的设想”，“知道如何寻找合适的人”来领导自己的士兵。开明的费城“钢笔与铅笔俱乐部”以及报业协会纽约分会都代表美国为他在科雷希多岛做出的解放努力表达了感激之情。

其他同盟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苏联《真理报》和《消息报》大力宣传将军的勇猛堪比苏联士兵。一家墨尔本报纸还在首页刊登了将军的照片，标题为“时代人物”。“麦克阿瑟日”成了澳大利亚的国家假日，而布里斯班人还会特意拨打他的办公室电话“B–3211”，只为了听接线员说上一句“你好，这里是巴丹”。纽约《太阳报》驻伦敦记者发回报道称，自瓦伦蒂诺以来，伦敦人仅对麦克阿瑟的“外貌与个性”反响强烈。英国报纸将他拿来和纳尔逊及德雷克相媲美，而英国人甘愿排着队站出好几条街，只为了一睹有关他到达墨尔本斯潘塞街火车站的新闻影片。

一周之内，曼哈顿的牧师们在洗礼中依据将军的名字给无数个新生儿取名：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坎帕尼亚、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弗鲁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萨拉韦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利普卡、道格拉斯·麦克阿瑟·米拉和道格拉斯·麦克阿瑟·麦克维。为了纪念巴丹半岛战役，印第安纳州的一位农夫还给自己晚出生了两个月的小马取名“麦克将军”，因为它“拖了很长时间”。餐厅主厨们也开始用将军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菜品。一时间，人人都在午餐时吃起了麦克阿瑟三明治。好莱坞的小明星们还为一款名为“麦克阿瑟短裙”的苏格兰花格呢服饰做起了模特。在堪萨斯城一年一度的美术舞会中胜出的最美女孩会被加冕为“麦克阿瑟小姐”。将军的出生地小石城也成了爱国者朝拜的圣地。密歇根州的苏圣玛丽运河还用他的名字命名了一座新的水闸，而底特律、田纳西、纽约的锡拉丘兹、华盛顿特区、波多黎各的圣胡安以及密西西比的杰克逊也有他的同名大桥、水库、棒球场、大道和街道。在某州级园艺

学会命名了一种名为“麦克阿瑟水仙花”的植物之后，“麦克阿瑟山茶花”和“麦克阿瑟夫人豌豆花”也很快先后出现在了帕萨迪纳花展和纽约花市上。某舞蹈大师委员会引入了一种新的舞步，并取名为“麦克阿瑟滑步”。佐治亚州的人们在“麦克阿瑟日”当天收集了4 000吨废铁，而亚拉巴马州则把全州范围内的第一次灯火管制献给了“巴丹的英雄”。北卡罗来纳州的麦克阿瑟小镇在经历多年尝试之后终于获批建立了一所邮局，而在那里盖上邮戳的第一封信正是史汀生和诺克斯发给将军的一则消息。当被老师问及美国在远东最重要的财产是什么时，亚特兰大某初级中学的一名女学生脱口而出：“麦克阿瑟将军。”第二天一早，这则故事便出现在了全国各大报刊的头版上。

每一天，每家报社似乎都必须报道一则有关麦克阿瑟的新闻，且最好是从当地视角报道的。一位华盛顿记者找到了路易丝·克伦威尔，听她抱怨了两件事情：首先，她认为情报部门应该保卫她的安全，防止她遭到日本机关的报复；其次，她提到自己曾经收到过一个女人的恐吓信，称路易丝的前夫“有意参选总统，而一个人不能在当选总统的同时还有两位在世的妻子，因此其中一个人不得不被干掉”——也就是路易丝。蒙大拿州的黑脚族印第安人将麦克阿瑟纳入了自己的部落中，为他取名“莫–卡其–皮塔”，也就是“智鹰首领”的意思。芝加哥联赛俱乐部和曼哈顿坦慕尼协会将他选举为他们组织的会员。比尤特《蒙大拿标准报》、《芝加哥论坛报》和《纽约时报》都报道了这一消息。5名澳大利亚人在接受悉尼某报社记者采访时都说到了同样一句话：将军“会解决一切的”。旧金山的一位名为V. E. 胡德的干洗店工人说：“我认识的所有人都认为上帝是第一位的，将军紧随其后。”明尼阿波利斯市的铁路工人卡尔·约翰逊说：“麦克阿瑟应该被任命为全军最高司令——统领陆军、海军和空军。”迈阿密的话务员埃玛·魏克特说：“我甚至不再从格雷厄姆乳品店买牛奶，转而光顾一家名为麦克阿瑟的乳品店了。”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托皮卡市保险工作人员说：“麦克阿瑟是自‘约克军士’以来最伟大的将领。”

一时间，“麦克阿瑟产业”蓬勃发展起来，让那些为生产麦克阿瑟纽扣、麦克阿瑟细长三角旗和麦克阿瑟照片的制造商赚得盆满钵满。城堡影业制作了一部名为“美国第一士兵”的自制影片；《华盛顿时代先驱报》的弗兰克·沃尔德罗普编辑了一部名为“麦克阿瑟论战争”的演讲合集；赫斯特公司的鲍勃·康西丁书写了一本充满敬仰之情的传记《杰出的麦克阿瑟》。1942年秋，所有人都知道不管麦克阿瑟愿意与否，他终有一天是要回来的——不是返回菲律宾，而是入主白宫。乔治·马歇尔最博学的传记作家福里斯特·C. 波格写道：“华盛顿方面对麦克阿瑟参与政治活动的恼怒，不管是真有其事还是凭空想象，并没有减少战争部对他将才的仰慕之情。”不过，海军部倒是没有抱同样的看法。海军上将们知道，尽管麦克阿瑟将军准许记者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但迪勒在审核他们的报道中所有的批评言论，不允许他们挑剔任何事情——战略、战术、士气、食物、军需或最重要的，战区的最高司令。

海军方面相信，麦克阿瑟正视图控制自己战区里的新闻传播。他们的猜测并没有错。迪勒会保证那些采纳他的建议和用华丽的辞藻来赞颂最高司令的记者优先获得专访的机会，或是指点他们在未来的行动中应该观察些什么。结果，从“澳大利亚某处”发回的报道重复引用“权威军界人士和平民阶层”的话，仿佛是在暗示只要军需设备能够从尼米兹手中转送到澳大利亚，对日战争就能更快结束似的。和那位明尼阿波利斯的铁路工人一样，大部分海军官员都猜测将军认为自己应该被任命为“全军首领”。在任何话题上都很健谈的麦克阿瑟很少提及自己的政治抱负，就连身边的人也无从知晓。直至今日，他们中的某些人仍旧相信将军并没有打算在政治上有所成就。他们错了。早在下一次总统初选开始之前，麦克阿瑟就一直在和范登堡（他的办公桌上永远摆着一本《杰出的麦克阿瑟》）保持书信往来。

如果麦克阿瑟的第一位妻子想要的不过就是引人注目的护送随从的

话，那么她现在一定十分嫉妒将军。前往莫尔兹比港时，他的身边跟随了一支飞机编队——他乘坐领头的战斗机，头顶上还有多架P–38战斗机呈V字形为他护航。就算是在澳大利亚，他的身后也总是跟着两个肩扛冲锋枪的保镖。在一个连警察都不带警棍的国家里，这不免会引人注目，但他所做的一切又何尝不是如此呢？遵其意旨，伦农酒店客房部的入口至服务门之间支起了一种凡布篷，好让围观的人一眼就能认出这是什么地方。他的黑色豪华轿车前保险杠上挂着四颗星章，后杠上则悬挂着写有“USA–1”的号牌。（琼的豪华轿车号码是“USA–2”。）他把所有的奖章都挂在了身上，从荣誉勋章到杰出步枪兵徽章，一样都不少。直到看到布里斯班《信使邮报》刊登了一张艾森豪威尔身上什么也没有佩戴的照片，他才意识到这才是更加行之有效的方法，从而把身上的东西统统都摘掉了。莫尔兹比港的士兵们会看到他穿着背后绣有黑龙的粉红色丝绸便袍在总部的门廊前闲逛，一只手捧着一叠战报，另一只手举着一棵生菜，不时地咬上一口。据他们观察，将军从没有注意过他们。但事情显然并非如此，毕竟一场没有观众的表演是没有意义的。

然而，这确实是一场表演。如果一个角色对他的目标没有促进作用，他便不会去演它。他拒绝被墨尔本、堪培拉和布里斯班的女主人们奉为名人。尽管他偶尔也会在伦农酒店招待重要的客人，但在收到其他地方发来的请柬时总是会一并拒绝。在他和妻子刚到澳大利亚的前6个月中，他只参加过一场招待会。他们在门口附近逗留了20分钟，和大家握了握手便离开了。而他收到的礼物也往往会被手下的士兵瓜分。据他的医生回忆，他在整个战争中只喝过一杯酒，还没有把它喝完。

不过，若是他认为虚张声势能够加强他的指挥有效性的话，怎样的骚乱和浮华都不会显得过于卖弄。在某一场合下，他曾经这样形容巴丹半岛：“我们的旗帜皱皱巴巴地躺在地上，骄傲的碎片在排水沟里吐着泡沫；我们忠诚的菲律宾卫士们的病躯，1　600万个灵魂，喘着粗气遭受着缺乏骑士精神的敌军的奴役。我曾是这项注定要失败的事业的领导者。在我千疮百孔的心里，我发自心底地祈祷仁慈的上帝能够早点儿拯

救他们，这样他们就不会距离救赎之日太远，一切也就不会太迟。”几周之后，他又提起了科雷希多岛：“从本质上来说，这里只不过是一片贫瘠、被战争蹂躏过的岛屿，却和许多地方一样，因为死亡和灾难而被视为神圣。然而，它本身也象征着某种无价的、充满生机的东西，一个国家的荣誉。从尘埃中拾起旗帜之前，我们还未兑现对人类的诺言。而在再次宣布自己已经捕获了他们可怕部队最后一批残兵败将之前，我们只能如同谦逊的恳求者一般站在全能的上帝面前。那里摆放着我们的圣杯（比喻胜利终会来临）。”这些话和他的手势、保镖、便袍以及风度一样让他魅力倍增，从而也为他铺就了通往胜利终点的途径。他之所以回避那些有可能让琼玩得十分开心的鸡尾酒会正是因为它们与击败日军没有半点儿关系。当然，他拒绝的理由也包括不想在众人面前抛头露面。

他每日的作息自从他出任西点军校校长以来就几乎没有改变过。早上7点30分，一家三口会坐下来吃早餐。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里，他会阅读报纸和前一夜的报告。上午10点，确定自己的参谋已经在等待他之后，他便会乘坐USA–1号豪华轿车前往办公室。一路上，他总是会回敬他们的敬礼，然后轻轻甩开手，用低沉的声音说道：“早安，先生们。”和“一战”时的霞飞将军一样，他也拒绝在办公室里安装电话，只有在伦农酒店里接听萨瑟兰、肯尼或战区登陆艇指挥官丹尼尔·E. 巴贝夜里打来汇报紧急情况的来电时才会拿起听筒。他没有秘书，而是从总部召来了几位速记员做听写的工作。他的大部分书信都是用速记或打字的方式回复的。如果他想要和某一名军官说话，便会溜达到对方的办公室里，坐在他的桌旁说道：“拿笔记下来。”下午2点，他会乘车回家吃午饭，再睡个午觉，待下午4点再回办公室一直工作到晚上八九点的时候，会见宾客、签发命令。琼永远都不知道该几点等他回来吃晚饭。不过，这样的焦虑之情很快就在赫夫开始每天打电话通知她将军已经准备回家之后逐渐消失了。

据肯尼回忆，“将军是个很难伺候的人”。他很快就厌倦了酒店的饮

食，毕竟曾经只是为来城里停留几天的牧羊人准备饮食的伦农酒店厨房的菜品的确缺少多样性。“不要再做菜花了！”一天晚上，将军下了命令。几天之后，“不要再放球芽甘蓝了！”这样的情况持续发展下去，直到酒店的菜单里已经没有任何不曾被他挑剔的食材了。从那以后，琼便开始在当地的杂货店里采购，然后和阿秋一起为他准备饭菜。300名属下挤在酒店狭小的房间里时，麦克阿瑟一家却独占着4层的三间相邻套房。餐厅位于琼所在的套房中。除非麦克阿瑟身在新几内亚，否则她每天晚上都会等他，无论他多晚回来都会和他一起享用晚餐。可就算他进了家门，她也还是不得不多等一会儿，因为若是儿子已经上床睡觉了，麦克阿瑟还要默默地站在床边看儿子一会儿。

一天晚饭过后，他为阿瑟写了一篇祈祷词：

> 主啊，恳请你塑造我的儿子，让他在软弱时能够坚强不屈，在畏惧时能勇敢自持、在坦诚的失败中能够骄傲不屈，在胜利时能够谦逊有礼。
>
> 恳请你塑造我的儿子，不让他因空有幻想而缺乏行动；让他认识你——知道自知之明才是一切知识的基石。
>
> 我祈求你，不要引领他走上安逸、舒适的路途，求你将他至于压力之下、困难与挑战的尖刺之中。让他学习在暴风雨中挺立，学习同情那些跌倒的人。
>
> 恳请你塑造我的儿子，让他拥有一颗纯洁的心灵和一个崇高的目标。让他在指挥别人之前懂得如何驾驭自己；让他在迈入未来之际，永不忘记过去。
>
> 在他拥有这些之后，我还要祈求你赐予他足够的幽默感，让他在严肃的同时不要对自己过于苛刻。赐予他谦逊，让他永远记住真正的伟大是单纯，真正的指挥是坦诚，真正的力量是温和。
>
> 如此，我这做父亲的才敢低声说上一句：“我总算没有虚度这一生！”

麦克阿瑟一周7天都要工作，有时候也会放弃睡午觉的时间，带阿瑟去布里斯班动物园，或是到附近的公园中推他荡秋千。这个孩子身上的一点一滴没有什么能够逃过他警惕的眼睛。一天晚上，他发现儿子剪了头发，从而预言他会感冒。（阿瑟第二天就感冒了。）科廷的副总理和陆军部部长的小儿子吉拉德·福德和小阿瑟吵得不可开交，并狠狠地把他一拳打昏在地，将军得知后简直是怒不可遏——此举也着实让澳大利亚政府感到十分尴尬。自从有人拍到了将军夫妇守在孩子床边的照片之后，可以说将军很少离开阿瑟的视线，不过这孩子在麦克阿瑟身处巴布亚时倒是许久没有见到父亲，因此很难说两人到底谁更想念谁。意识到自己应该会在新几内亚度过整个12月，他通过电报转告儿子："非常抱歉，因为'圣诞老人'要在新几内亚停留几日。"似乎没有人意识到在麦克阿瑟不在的时候还能庆祝圣诞节——考特尼·惠特尼说，这位挂念爱子的父亲竟让一屋子的将军们等了半个多小时，就为了给儿子写去一封长信，说自己收到了他从布里斯班寄来的那颗掉落的乳牙，安慰他不要难过。与此同时，阿瑟也很想念自己的父亲，只不过全然是因为麦克阿瑟在家的时候总是对他百依百顺。

琼对此感到十分担忧，不时劝说自己的丈夫，说他应该比任何人都清楚纪律的重要性，但他很少能够坚持下去。有关"惊喜"的问题越来越严重。住在孟席斯酒店时，麦克阿瑟忙得除了一点零星的小物件之外（铅笔、剪刀、曲别针）什么也给不了儿子——如今，他似乎是在试图弥补在科雷希多岛上失去的那三个月的时光，下令让副官们把布里斯班所有的玩具都买回来。"快看我爸爸给我买的这个惊喜！"兴高采烈的阿瑟对自己的玩伴尼尔（伦农酒店经理的儿子）喊道。虽然阿瑟十分乐意分享自己的礼物——比方说，他允许自己的朋友举着一面迷你美国国旗在房间里跑来跑去，而这一国家象征两人都没有想过，这对于尼尔来说也着实有些残忍。琼劝说将军限制自己每天只能送一份礼物，除非是在儿子过生日的时候才能每隔15分钟送一件，并且直到他长大为止。

即便是这样，"惊喜"有时候也会遭遇没有东西可送的局面。卡洛斯

·罗慕洛从华盛顿回来的时候就曾帮忙带回过一包飞机模型。后来，麦克阿瑟在西点军校时的同学罗伯特·E.　伍德（他在重返军队之后仍是西尔斯罗巴克百货公司名义上的负责人）在执行军队的一项特殊任务期间曾在伦农酒店小住过几天。他说："我要送阿瑟一本西尔斯罗巴克百货的目录，让他在里面挑选任何他想要的东西。我保证全都送给他。"将军回答："那你可要小心了。他没准会想要一台拖拉机。"伍德回答："如果他真是这么想的，那他就能得到一台拖拉机。"不料，在收到目录之后，这孩子却只要了一包价值55美分的冰激凌汽水吸管，因为这种东西在战时货源短缺的澳大利亚是买不到的。不过，此时麦克阿瑟却得意扬扬地告诉忧虑的妻子，自己想到了尼尔问题的解决方法：将来每一样东西他都会买两份，这样阿瑟就能分一份给自己的好朋友了。邂逅了一位在圣迭戈经营玩具和运动用品批发公司的海军老朋友后，悉尼·赫夫形容了自己当前面临的绝望情景。据赫夫回忆，这位朋友当时告诉他，别管了，他会打理好一切的。"他的确做到了。不久我便收到了两大箱玩具，从玩具飞机到气球再到拳击手套，应有尽有。而且每一样都有10份。"

惊呆了的琼告诉赫夫："我们不能让将军知道这件事情，不然他明天一早就会把它们全都送给阿瑟的。"他们在公寓里四处寻找能够藏匿这些东西的地方，最终选定了被麦克阿瑟当作办公室的房间门口的一个衣橱，理由是离他越近的地方越有可能被他忽视。可他最终还是打开柜门看到了里面的东西，不过在妻子的劝说下同意把这里当作"秘密衣橱"。也就是说，他和儿子都不能翻阅这里的东西。原则被采纳之后，她又坚称要在以后的每一处住所里都遵守同样的规矩。这一次将军信守了自己的诺言，但生日惊喜的传统一直延续到了阿瑟长大之后很久。

在朋友面前，琼试图冷静地解释战争给儿子带来的影响。"如果他的年纪再大一些，也会感到害怕的。"她说，"但如果他再小一些，这可能会影响他一辈子。"不过她却从来都没有提及战争对于她自己的影响。她心里清楚，在战时与丈夫分离的上百万女性应该都会甘愿与她交

换位置。然而，她所面临的考验却是她们不曾经历的。被困科雷希多岛的最后那段时光里，她那些狂乱的亲友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里都不知道她是死是活，而且至今还处于忧虑和不安之中。还有她在这座酒店里的独特处境。一天晚上，当麦克阿瑟远在莫尔兹比港时，两名以酒壮胆的美国水手就给她送来了一把枯萎的花束，向她表达爱意。然而她最大的担忧还是自己的儿子。尽管她吹嘘危险和困难从不曾接近过阿瑟——事实显然并非如此——不过她还是决定尽可能少让他离开自己的视线，以免他缺乏安全感。她只在“巴丹”号命名仪式时离开过他一次，而且很快就赶回来了。（她的丈夫说：“琼妮，你需要做的只是站上船头砸碎一瓶香槟，然后说上一句，‘我命名你为巴丹，愿上帝保佑你。’这就够了。”当船厂经理递给她一份打字稿，请她宣读时，她推了回去，答道：“我只打算说将军让我说的话。”她真的是这么做的。）住在伦农酒店里的那些年，阿瑟只离开过布里斯班一天。那一天，琼趁着将军远赴莫尔兹比港的工夫带着他去了城南60英里外的库伦加塔海滩。她原本计划在海边过夜，不料儿子再一次患上了感冒。此外，她的心里一直都在惦记丈夫是否要与她取得联系。

在战事方面，他对她无话不说：战略、密电、对日军实力和意图的揣测、他与下属的纠纷、他与华盛顿方面的矛盾。虽说她是个很擅长聆听的人，但也需要寻找一个知己。她选择了赫夫。她每天早上都会和他通话，以至于他从她的语调中就能分辨出前线传回来的消息是好是坏。随着两人之间的友谊不断加深，他们每天都会沿着布里斯班河的堤岸步行2英里，穿过格雷街桥。据赫夫回忆，这些对话的大部分内容透露出的并非是什么秘密，而是她对丈夫不变的敬仰。尽管她很少提及自己，说起将军时也总是实事求是，但依旧带着浓重的乡音。一次，她倚靠在大桥的栏杆上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然后乡音不改地开口说道：“你知道吗，我觉得自己已经完全没有口音了。”

她渴望回到战前的马尼拉，因此总是时不时便会反复把行李装进那个军用小手提箱，以备某天启程返回。她心中的渴望情绪很容易便传染

给了其他人，阿瑟开始告诉父母他想回到顶层套房，还说自己希望“我们不用再坐鱼雷快艇了”。当然，以他的年纪来说，脑海中对菲律宾的印象应该十分模糊。他真正了解的生活就是现在的这段茁壮成长的日子。每天早晨的时光，他都是在幼儿园里度过的。后来，他们又为他请了一位温柔的家庭教师。上课的过程中只有一次短暂的休息机会。这时，阿瑟会用在“剑鱼”号潜艇离开科雷希多岛时幸存下来的一只银杯装一杯橙汁喝。杯子上刻着“阿瑟·麦克阿瑟·芬斯顿，阿瑟·麦克阿瑟赠，1902年”的字样，是小阿瑟的祖父很早以前送给弗雷德里克·芬斯顿的小儿子的礼物。下午，他会骑上新的三轮自行车出去玩，或是在街对面一棵蓝花楹树下的沙坑里打造隧道和堡垒，抑或是和尼尔到附近的最高法院去，在长长的走廊和法庭里玩捉迷藏。有时候他的母亲也会给他1美分，让他去街角的体重计上去称体重。他发现自己已经48磅重了。若是他的父亲也在布里斯班，还会允许他不用太早上床睡觉，而是等他回家，通常他和“老朋友”总是早早地就被抱上床。

在琼还没有来得及改掉自己的口音之前，阿瑟便已经好奇地学起了她慢条斯理的语调、阿秋的蹩脚英语和澳大利亚土话。麦克阿瑟是在和儿子一起唱歌时开始注意到这一点的。也许是每天早上都要和父亲一起二重唱的结果，这个4岁的男孩对音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主日学校里，他在某些方面只不过是个平庸的学生。当老师教导他上帝创造了一切时，他还曾开口问道：“那他为什么要创造日本鬼子？”——他为自己的老师会用女高音演唱《耶稣爱我》感到很开心。和母亲一起听完音乐会回家，他坐在公寓的钢琴旁轻快地弹出了自己刚刚听过的《牧场是我家》这首歌曲。据在场的一位朋友回忆，他甚至还加上了“某种布吉伍吉风格的低音调子”。很快，他只需听上几遍就能模仿着弹出吉尔伯特与萨利文的作品，可见他的确是个易受影响的孩子。在看完一段芭蕾舞演出之后，他告诉阿秋自己想要成为一名芭蕾舞演员。她给他做了一身带有芭蕾舞裙的衣服，他欢喜得穿上它跳了好几个星期的舞。战争并没有打消布里斯班人举办婚礼的热情，而他的母亲就曾带他出席过好几场。在参加完一场婚礼之后，他告诉自己的家庭教师，他想要做新娘。

这一次，他的保姆再一次用自己的针线功夫大显身手。当天晚上，麦克阿瑟回到伦农酒店时，发现迎面跑来的儿子正穿着婚纱、戴着头巾、拖着长尾礼服，还朝他扔来了一束雏菊。将军接过花大笑了起来。

莫尔兹比港位于布里斯班北部，其遥远堪比费城和南部的哈瓦那之间的距离，只是相应的气候不太一样。莫尔兹比港的生活更加朴素原始，同时也充满了异国情调。虽说居住在预制活动板房里的大部分军官都没有隐私可言，但最高司令能够得到完全供他一人独处的空间。居住在伦农酒店里时，只要肯尼愿意，晚上随时都可以走上两层楼，花上一两个小时和麦克阿瑟一家聊天。在巴布亚，作为一名将官，虽然他也和自己的上司住在同一座建筑里，却从没有在未经召唤的情况下走进过他的房门。身处新几内亚的将军一直都隐藏在神秘的氛围之中。

在一群身着蓝星红条图案点缀的短裙式白色服饰的赤脚当地人的服侍下，麦克阿瑟像19世纪的“一等移民”一样居住在政府大楼里——这座建筑也免不了被他改名为“巴丹”。作为前任澳大利亚殖民官的官邸，这座建筑耸立在一座能俯瞰珊瑚礁的小丘上，周围环绕着莫尔兹比海湾。为了试图讨好迪勒，记者们将建筑形容为一座“小屋”，可它实际上却是一座巨大的白色别墅，里面不仅拥有精美的热带风格家具和硬木地板，还有宽敞的观景阳台、铁质瓦楞房顶以及为将军单独开辟的一间厕所。任何吉普车、卡车若是胆敢接近这里，都会被披裹着红色围裙的当地警察驱赶出去。可供麦克阿瑟踱步的花园似乎正合他意。园中生长着茂盛的凤凰木、芙蓉花、猩红色金凤花、棕榈树、粉红色赤素馨花以及会爬满屋檐的九重葛。在令人头晕的浓郁香气围绕下，他咀嚼着生菜，研究地图，谋划着在大洋洲的海岸上痛击日军的方法。

曾在麦克阿瑟身边工作过的人留下的日记、回忆录和记忆为我们拼凑出了那时将军的完整形象。时年62岁的他身体状况堪比一个只有52岁的人。宽阔的肩膀、平坦的臀部，瘦削的身形微微有些驼背。他依旧保

留着军人的风采，脚步轻快稳健，脸庞轮廓清晰，只有眼周和唇边长有几丝皱纹，浑身散发着健康的活力和刚健的能量。作为一个爱慕虚荣的人，他对自己稀疏的黑发十分敏感，总是小心翼翼地梳理发丝，遮盖住裸露的头皮。他会定期修剪指甲，还会在平常穿的卡其裤上打上褶子，以遮盖自己微微凸起的肚腩。他之所以讨厌领带也许是因为他喜欢展示自己强壮年轻的脖颈。坐飞机时或是在布里斯班时，他还会穿上肯尼送给他的一件胸口挂着名牌、两肩各顶着四颗白色五角星的飞行员皮夹克。开会的时候，他总是举着一只大口径烟斗或是一根雪茄作为道具。小E. J. 卡恩提到，各个军阶的士兵都爱不厌其烦地看他那“夸张挥舞的手杖”“软帽上堆积的金色穗带”以及“散步时无法效仿的豪气”。

那顶曾在PT–41号鱼雷快艇上被反复浸泡过的帽子已经缩水了。将军让悉尼·赫夫为他找一个帽子撑具。可赫夫找遍了整个澳大利亚也没有找到出售这种东西的地方。最后，他决定做一个撑具，同时还说服一位墨尔本男装经销商借给他一个撑具。从那以后的每天晚上，只要麦克阿瑟当天穿的是军装，便会趁睡觉的工夫把帽子整晚都套在撑具上。虽说这从某些角度展示了他的虚荣心，但也反映出了他的领导风格。和支持平等主义精神的另一位伟人艾森豪威尔不同，麦克阿瑟热衷于能够展示他权威的各种随身行头，并把自己看作在早先那个更加浮华的年代里坐镇的指挥官。对他来说，每一场战役都被赋予了极具戏剧性的道德剧气息。某一战役结束后，他心满意足地说道：“巴丹的亡魂们今晚可以安息了。”在美国战斗机于拉包尔上空伏击了山本的三菱轰炸机、击毙了这名海军大将之后，麦克阿瑟想象自己“几乎能够听到珍珠港海底上千具耀眼的白骨发出的越来越强的声音”。一次，当他的军医用“GI”（美国兵）来指代美国部队时，麦克阿瑟转过头来横眉冷对地看着他发起火来：“不要再当着我的面那么说。他们才是能把我们送往日本的人。”军医声辩说这个词是步兵们对于自己的称呼，而且算得上是一种昵称。麦克阿瑟摇了摇头，说道：“‘GI’也是‘普遍性问题’的意思。要称他们为士兵、战士或军人。”后来他虽然接受了“GI”这个称呼，却还是经常称呼他的属下为“战友”。这个称呼更温暖、更光辉，也不至于

丧失人性。丘吉尔曾经评论道："战争曾经的残酷与光荣已经演变成了残酷与卑劣。"然而对将军来说，战争永远都笼罩在荣誉的光环之中。他的批评者认为这样的想法实属荒谬，而他的仰慕者却相信这正是使得他成为一位高效将领的原因。其实，这两者的看法都是对的。

赫夫又给他买了一顶帽子。这是一顶平民用的小礼帽，供他在布里斯班看电影时佩戴。然而，麦克阿瑟甚至连试都没有试过这顶帽子。战争期间他就没怎么看过电影，极少数的几部还是在战舰上观看的。如果说穿着便服出现有可能会玷污他的形象的话，他是绝不愿意冒这个险的。他更喜欢入夜后在莫尔兹比豪宅的走廊上低着头踱步。看着深夜通明的灯火将他的影子映照在窗户上，他的一位下属告诉自己的同事："老家伙又在'狂舞'了。"有一次参谋会议，他的情绪变幻莫测，一会儿低声细语，一会儿高声呼号，一会儿又走神似的一言不发。新闻摄影记者发现，他喜欢以一幅装裱着林肯名言的画框为背景拍照，从而引发了许多有趣的对比。(注)杂志写手们从新几内亚发出的许多文章的内容听上去都像是戏剧布告。《生活》杂志的一位编辑在提到他的自言自语时写道，他能够"讲上好几个小时都不用停下来（思考）措辞"。这样的表现也给《纽约时报杂志》的弗兰克·L. 克拉克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认为："将军的性格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样化的。他既有军事家的冷血，又有强迫性、喜欢争辩的个性。在他的身上，强烈的自信与谦逊相交织，不寻常的镇定与对不公批评的职业敏感相交融。"《科利尔》杂志的一位记者注意到："麦克阿瑟是个天生的演员，这一点似乎毋庸置疑。他那顶著名的金饰带软帽，大言不惭的公报，精心打理的装扮——都是一个把自己当作是天之骄子的人身上应有的特质。它们就像聚光灯一样引人注目，也让人感到不安。"

艾克尔伯格就是其中一个深感不安的人。他本身也是一个喜欢站在镁光灯下的人。在给妻子的信中，他提到"萨拉"正"主导着舞台，同时竭力排斥一大堆（在他看来）与他结仇的人，这些人既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且都和我们的天敌日本人没有关联"。艾克尔伯格把将军的属

下之间耍手段图谋权力的情况与上海的一种扑克游戏拿来作对比：“（这种游戏）会把痰盂放在桌子中间，因为谁都不敢为了吐痰而把眼神移开。”最后，他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只要麦克阿瑟还在舞台上，就不会允许任何人“起身介入他和他的历史地位”。尽管艾克尔伯格也很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头条之后，却告诉一位陆军公关：“我宁愿你往我的口袋里塞上一条响尾蛇，也不愿意让你为我做宣传。”有一次，听说有关艾克尔伯格的文章登上了《生活》杂志和《星期六晚邮报》，将军把他召了过来问道：“你有没有意识到我明天就能把你降为上校，然后再把你送回家去？”他并没有那么做，但任何下属若是盖过了他的名声，即便只是短暂的一瞬间，他的心里都会蒙上一层阴影。将军对战地记者们描写他的报道从来都是兴趣不减。《纽约时报》的迪尔曼·德丁提到“他用自己的方式告诉记者们，他对他们机构的了解并不见得比他们少”。在莫尔兹比，乔治·H. 约翰逊发现最高司令会逐行研读自己的报道，有时还会发回审批意见：“当我写到‘麦克阿瑟和他在澳大利亚时一样冷漠而又神秘’时，他建议我用‘疏离’这个词来代替‘冷漠’。我修改了那一段。‘疏离’这个词的确更好一些。”

在写给埃玛小姐的信中，艾克尔伯格向她倾诉：“‘萨拉’……对自己的伶俐、圆滑、狡诈（或者无论你怎么说），甚感骄傲。在把其他人都当成骗子的情况下，她（他）很容易就能为自己同样的装腔作势的行为找理由开脱。”另一位名为克洛维斯·拜尔斯的军官也发现，麦克阿瑟决意信守诺言时都会通过握手来作为保证。“握个手吧，将军。”拜尔斯边说边伸出手来。有的时候，麦克阿瑟会退却。如果事后他偶尔违背了自己的诺言，受约人会很失望。他对五角大楼方面不变的疑心离间了他和别人之间的关系。一位海军军官震惊地从将军口中得知：“华盛顿方面宁愿美国输掉战争，也不愿意看到麦克阿瑟打胜仗。”阿诺德认为，麦克阿瑟在菲律宾苦战时留下的心理创伤至今还没有痊愈：“在我的印象中……他已经厌倦了打仗。他都没有机会疗伤和了解世界全景，就连其他战区的细节也不清楚……我敢说，他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对我讲述的那些话和他6个月后会说的绝对是不一样的。”

不过，只要他想守约，就无人可以阻挠他。巴贝回想起自己第一天出任将军手下高级海军官员的经历，写道：“听麦克阿瑟说话是一种享受。他有着演说家的嗓音和风度。即便只有我一个听众，他说话的时候还是有些刻意，仿佛是要把这些字眼都录下来留给子孙后代似的。他的话很有说服力，也很让人愉快。”哈尔西上将第一次在布里斯班见到他时，也同样被他迷住了：“就算他穿的是平民的服装，我还是能一眼看出他是个军人……我在脑海里想象……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几乎就快在他那张空空的巨大办公桌和面前的乔治·华盛顿画像之间磨出一个凹洞来；他的手中举着玉米烟斗（我很少看他抽烟），用我从没有听过的措辞证明着自己的论点。”

和其他人一样，巴贝和哈尔西都对将军出色的记忆力印象深刻。《新闻周刊》的评论指出：“麦克阿瑟在每个人的姓名和与他只是点头之交的一些人的细节上都拥有极其难得的记忆力。”接见查尔斯·林德伯格时，麦克阿瑟立即就投入了有关P–38战斗机技术问题的讨论，滔滔不绝地说起了这款飞机如何在加装了机腹副油箱后可根据情况将飞行范围从400英里扩大到600英里。在莫尔兹比港时，他是通过电传打字机和电话与堪培拉方面保持联系的，其通信内容揭示了他对澳大利亚政治的浓厚兴趣。在战斗前线上他从不会错失任何一个机会。他不仅清楚盟军的部队身在何处，还能准确地知道他们正在做些什么。除此之外，他对敌军的了解也令人备感震惊。据时任麦克阿瑟参谋团海军情报官的怀曼·W. 帕克回忆，将军曾经纠正过他的一篇报告，告诉他某支日本部队不可能驻扎在香港，因为它已被从上海调派去了新加坡。此外，对于这支部队的实力、指挥官的姓名、参与过的战役以及战斗表现，他都如数家珍。迪尔曼·德丁写道：“西南太平洋战区的确是麦克阿瑟的。师队的迁移、机场的建设、空中编队的运行——一切都是按照麦克阿瑟的意愿进行的。凡事都能够高效、直接、有把握地完成，其果断反映了强有力的领导能力。”与此同时，将军也知道该如何授权。萨瑟兰告诉克拉克洪：“总司令喜欢闲坐在那里思考。他……会勾勒出自己的计划，（然后）做出必要的决定，把下面的事情留给我们。不过要是出了什么事

情，我们就只能祈求老天保佑了。”

在走廊上，他会一边溜达一边为萨瑟兰等人概述即将到来的行动，并用烟斗柄指着每一位军官，干净利落地分配个人任务。然后他还会起草一份详细的计划。据其中一人回忆，“计划书通常会有1英寸厚，每位指挥官都需要彻底熟悉有关自己的那一部分，由麦克阿瑟来掌握大局”。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只有在回答问题和接受命令时才能够联系他。这既是他的意图，也是他实现“疏离”的方法。不过，乔治·肯尼是个例外，因而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将军难得轻松的一面。从澳大利亚返回莫尔兹比一周后，肯尼被将军挡住了去路。麦克阿瑟严肃地对他说道：“乔治，我有些坏消息要告诉你。你不在的时候，我偷用了你的房间。我的房间太热了，所以某天晚上我试了试睡在你的房间里。那里凉快多了，所以我就搬了进去。但是现在你的东西都已经原封不动地归位了。我把那个女人的照片也挂了回去，这样你就能和以前一样从同一个角度看到她了。”那个女人名叫蒂达·巴拉，是一位默片女演员。在接下来的一周里，肯尼每每在那张照片底下时都会不禁流汗。随着雨季的到来，新几内亚的盛行风掉转了方向。他再一次占据了巴布亚最凉爽的房间，而将军则住在最闷热的一间里。“不过，”他回忆道，“将军连提都没有再提起过这个话题。我不相信这是因为他已经习惯了炎热。”

由于失眠和想念自己的小家庭的原因，麦克阿瑟经常会在“小屋”的图书馆里度过漫长的夜晚。宅邸的前任主人是个文化水平很高的人，书架上塞满了各种语言的书籍。除非有大量的战报需要阅读，否则将军总是会花上几个小时在图书馆里踱步，左手摊开一卷书，阅读有关巴布亚土著居民、当地传说和人类学的内容。或者，如果他有心情阅读欧洲文学的话，也会翻看左拉、萧伯纳、易卜生等人的作品。从这些“文化大杂烩”中挑选出来的词汇、短语常会出现在将军每天早上口述给迪勒的辞藻华丽的官报中。德丁写道：“他可以在阐述一个意见时同时引用莎士比亚、《圣经》、拿破仑、马克·吐温和林肯的名言。”据约翰斯顿记述，将军还会从“自己25年前在纽约看过的一部情节剧中……引用排比

句和比喻……或是借用柏拉图的名言，有时候也会引用《圣经》中的段落”。令人备感好奇的是，并没有哪位记者提到将军最喜欢的一本书：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小说中的关键张力在于警官波尔菲里和杀人犯拉斯柯尔尼科夫之间的关系。波尔菲里理解拉斯柯尔尼科夫头脑中的矛盾与思维模式，而最终这也是这个罪犯毁灭的原因。与此相似，麦克阿瑟也试着从思想上跳过高耸的欧文·斯坦利山脉的绿色地狱，到达那个椰林环绕、只有3座房子和5座小棚的叫作布纳的地方。在那里，日本指挥官安达二十三正注视着一张和麦克阿瑟的一样的巴布亚地图，给身处重峦叠嶂中紧张忙乱的部队下达着指令。在这样的地形条件下，陷入对立的僵局是不太可能的。前线的战况总在持续变动中，最终总有一方不得不放弃。将军相信，在经历一年的征战之后，安达如今终于应该可以意识到，情况已经超出了日军的掌控。通过正面进攻来夺取布纳必将经历一场惨痛的战斗，可一旦它落入麦克阿瑟手中，整个西南太平洋战区就将为盟军的策略和包围行动敞开。

于是，麦克阿瑟命令手下的美、澳两国士兵用砍刀在巴布亚茂密的雨林中开路，涉水渡河，爬上菩提树成为狙击兵，攀登陡峭的悬崖，滑下山麓另一边的斜坡，跳上平缓海岸平原，那里有椰子种植园、传教士定居点以及三三两两的高脚茅草屋。他们的目标是布纳、戈纳以及两村之间的萨南南达点。麦克阿瑟的情报人员满怀信心地预测能够“轻而易举地夺取”这三个目标，因为驻守在那里的“只有一班敢死队”。让将军备感欣喜的是，在报道此次的行动时，战时报纸刊登的地图上第一次出现了指向日本而非澳大利亚的箭头。

不幸的是，这样的箭头并没有移动。情报人员的消息是错误的。光是布纳一处就驻扎着7 500名日军士兵，训练有素的丛林战士藏匿在用椰子木搭建的掩体中，手握着能够发射连环炮火的南部机关枪。由于双

向交通通畅，他们很容易便可以通过夜行驱逐舰队从拉包尔获取援兵。如今，肯尼已经取得了莫尔兹比的制空权，并最终顺利搭载着100万吨军需用品飞越了欧文·斯坦利山脉。然而，在战争刚刚打响的那几周，他们却被山中突如其来的大暴雨拦住了去路。日本飞行员并没有面临这样的阻碍，他们从物产丰富的拉包尔倾巢而出，让已然被大雨淋透了的盟军士兵的日子更加苦不堪言。同样可气的是，被罗伯特·E. 舍伍德称为“绝望的防御心态”的因素也成了阻碍美军的不利条件。最终，当领导地面力量的澳大利亚军官以澳洲士兵的战斗力显然比美国兵更强为由，劝最高司令从澳大利亚预备队中调派新兵奔赴前线时，着实让将军感到有些羞愧。

麦克阿瑟简直怒不可遏，其中多半是因为他知道针对美国士兵的批评言论并非空穴来风。11月30日，他指挥萨瑟兰从澳大利亚召来了自己属下最有闯劲的战地指挥官艾克尔伯格。刚一到达，艾克尔伯格就感觉大事不妙。据他事后回忆，一向以“刻意无礼”、用“对待中尉而非一名中将”的态度来对待他的参谋长竟然变得彬彬有礼。到达最高司令的小屋时，他发现麦克阿瑟和所有参谋都在装有纱窗的走廊上等待着他。只有肯尼气定神闲地微笑着，其他人则都板着脸，而将军正是其中最严肃的那一个。在向他解释了布纳地区的僵局之后，麦克阿瑟摊开双手，仰望着天空，悲惨地问道：“难道我势必永远都要领导一支敢死队吗？”他命令艾克尔伯格解除美军第32步兵师指挥官以及他手下那些胆小之辈的职务。“要不然我亲自去解雇他们，还有你。”在走廊上踱了几步之后，他停顿了一下，将烟斗柄指向艾克尔伯格，用颤抖的男中音说道：“如果你能占领布纳，我就颁发服役优异十字勋章给你，并推荐你获得一枚高级英国勋章（最大的奖励还在后面），我还会允许报纸提起你的名字。”他再一次踱起了步，然后又停了下来，厉声说道：“鲍勃（艾克尔伯格的昵称），拿下布纳，否则就别活着回来见我。”他是认真的。那个星期晚些时候，莫尔兹比方面收到消息，和“一战”中的麦克阿瑟一样，艾克尔伯格也戴着袖章冲上了战场。一位焦虑的澳大利亚军官要求将军制止他的行为，禁止他亲自领兵，否则——那个澳大利亚人说——

他会没命的。麦克阿瑟冷冷地答道："如果他拿不下布纳，我也不打算让他活下去了。"

艾克尔伯格在给妻子寄去的信中表达了自己对这位最高司令格外错综复杂的感情。他告诉妻子："他无疑是个令人神魂颠倒、备感振奋的领袖。"上前线之后的两周，他又热情洋溢地写道："我从'大司令'那里收到了一封重要的来信。"然而，10天之后，他和属下就被麦克阿瑟发来的一封充满虔诚敬神意味的公报给吓呆了："圣诞节那一天，我们的行动仅限于日常的安全预防措施，并举办礼拜仪式。"事实上，前线并没有什么仪式，倒是当天的战况令人备感绝望、前途渺茫。艾克尔伯格事后将这一天称为"我人生的低点"，还说他当时在猜想布纳会不会成为"美国军队的灾难"。将军宣称日军"被困布纳滩头"，可实际上这片滩头足有50英里宽。1月8日，在澳大利亚人攻下了戈纳，而美军又攻破了布纳火车站的情况下，麦克阿瑟和肯尼飞回了布里斯班，并在记者们面前宣布："巴布亚战役正处于最终的收尾阶段。萨南南达点如今已经被完全包围。敌军的残部仍在壕沟中负隅顽抗，必然会遭到毁灭……我们可以当作这一任务已经完成。"

实际上，艾克尔伯格还提到："（前线的）每一个人都觉得，相比布纳战役，萨南南达战役只会难上加难。"他在之后写给埃玛小姐的信中还提到："麦克阿瑟将军在宣布返回澳大利亚时表示，除了萨南南达还亟待'肃清'之外，巴布亚已经被肃清得一干二净。这只不过是一个回家的借口，因为当时驻守在萨南南达的日军并没有即将被击垮的迹象。"在另一封信中，艾克尔伯格抱怨将军"并没有批准太多的援助——他的办公室里存有不少高清的航空照片……是12月初拍摄的，上面详尽显示了日军的位置。它们后来出现在一份报告中。尽管我们在战争过程中多次申请，这些照片都没有被交到过我们手里"。诚然，艾克尔伯格指出："最高司令对细节有着错误的认识，以至于他给我下达的命令（比方说12月24日谈及以千人团而不是百人连的形式发起进攻的那封信），说明他对雨林和雨林战一无所知，也不清楚我们的部队为什么会

因为沼泽的阻挡而被分散开来。”

尽管麦克阿瑟信守了自己给予艾克尔伯格的承诺，且将军之后的战略壮举也让他感到无比敬仰，但艾克尔伯格当时对布纳充满了怨恨。1月13日，他谨慎地在信中告诉妻子：“我永远都是山麓北边美军最高的指挥官，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简而言之，麦克阿瑟从没有亲临过这里的战场。6天之后，战地指挥官坦率地在信中指出，最高司令从没有来过前线一次，“亲眼看一看我们的部队所面临的难题”，尔后他又哀怨地写道：“伟大的英雄在回家之前从没有看过布纳一眼，却在战时和战后坐在最高司令部里允许报纸刊文说他率兵在战场上征战。麦克阿瑟……只是待在40分钟车程外的莫尔兹比港来回踱步。这一点我心里清楚。”战后，李将军的传记作者道格拉斯·索撒尔·弗里曼问艾克尔伯格：“麦克阿瑟将军是什么时候把总部迁去布纳的？”艾克尔伯格回避了这个问题，于是将军开口问道：“鲍勃，你我并肩在布纳作战的那段日子真是一段光辉岁月，是不是？”说罢笑了起来。艾克尔伯格明白，这话就是在“暗示我不要透露他没有去过布纳的事情”。

麦克阿瑟为什么没有去过那一战场的确令人感到困惑。在布里斯班，他告诉菲利普·拉福莱特，自己永远也不会像那些“一战”指挥官一样留守在后方的堡垒中，任由“上百万名士兵在愚蠢的堑壕战中任人宰杀”。然而他在巴布亚的所作所为与此并没有什么区别。战争临近尾声时，当雨势终于减弱，肯尼用飞机将两个师的步兵和轻型火炮运送到了欧文·斯坦利山脉的另一边。就像他所说的那样，“这并不是历史上的第一次空中包围行动”——德军早在1941年春天就曾派伞兵入侵了克里特岛——这意味着他们有可能提前几分钟收到最高司令莅临前线的消息。事实上，早在1月的第一周，艾克尔伯格便已趁扫清萨南南达的1.5万日本守军之际火中取栗。战后，艾森豪威尔和一批曾在新几内亚服役的老兵谈论时说，他从没有听说过萨南南达。这也难怪，麦克阿瑟的公报中只不过随意地把它称作是一次“肃清行动”而已。艾克尔伯格写道：“在经历了无以言表的厌烦、危险而又充满困苦的前线战争之后，（怨声载

道的美军士兵）期待自己回归后能够得到奖励，却不安地发现自己参与的只不过是一场'肃清行动'。难道这就是他的队伍伤亡的原因吗？如果还有另外一场战争，我建议军队、记者以及所有相关人士不要再使用'肃清行动'这个短语。这是不值得人们为之献出生命的。"

麦克阿瑟是幸运的：这不仅是因为战争在他返回布里斯班时还远没有结束；如果敌人选择与他们争夺每一寸土地的话，战事还有可能拖延好几个星期。然而，裕仁天皇的参谋长却已然决定放弃巴布亚和瓜达尔卡纳尔岛。鉴于日本派驻瓜达尔卡纳尔岛的部队在2月第一周时还没有撤离，麦克阿瑟利用艾克尔伯格及其属下对日军发起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挫败行动。将军随后发表的一篇战报让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将士们目瞪口呆："我们尽全力保全了自己的部队。历史上，面对精心准备、训练有素的敌军，也许没有哪支部队能在低伤亡、低消耗的情况下取得如此完整的决定性战果。"事实上，巴布亚早已血流成河。瓜达尔卡纳尔岛上的美军遭受了1 100死、4 350伤的重创，而在布纳—戈纳—萨南南达战役中也付出了3 300死、5 500伤的代价。如果把进攻部队规模的不同也考虑进去，那么在巴布亚牺牲的美军士兵人数应该是瓜达尔卡纳尔岛的3倍之多。虽说在今后的战争中麦克阿瑟出色的战术将创造这场战争中伤亡最少的纪录，但除却巴丹和科雷希多岛战役，这一役应该是他职业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光。

东京方面，天皇告诉自己的陆军大臣杉山元："布纳的失守令人感到遗憾，但将士们作战很英勇。"他还补充道："好好考虑一下你的计划，不要让莱城或萨拉马瓦成为另一个瓜达尔卡纳尔岛。"莱城和萨拉马瓦的港口距离布纳150英里远，位于新不列颠岛的西边，是进攻格洛斯特角的显要起点港口。而位于新不列颠岛东端、丹皮尔海峡和勇士号海峡另一头的拉包尔也是双方那一年争夺的焦点。麦克阿瑟已经下定决心要夺取这一目标，并已命令自己的工程师在布纳铺设飞机跑道，支持

盟军针对莱城上游的纳扎布港和位于新几内亚休恩半岛的芬什港发动突袭。如今，将军不仅不再受巴布亚地形所困，而且还操控着西南和南部太平洋地区的所有盟军部队。随着瓜达尔卡纳尔岛的攻陷，哈尔西余下的目标全都处于麦克阿瑟的战区之内。得知自己被联席参谋长们安置在将军的战略司令部之中，哈尔西表示自己很荣幸能为将军效劳。实际上，这位上将和他的部队已经成为麦克阿瑟的右翼。2月21日，哈尔西占领了所罗门群岛的一部分——无人守卫的拉塞尔群岛。这也成了上将踏上从所罗门群岛通往拉包尔的漫长征程的序曲。这样一来，身处东部的哈尔西和身处西部的麦克阿瑟就对拉包尔形成了包夹态势。

意识到莱城和萨拉马瓦正处于危险之中，杉山元决定增援3 000兵力前往萨拉马瓦西南32英里处的瓦乌，通过固守这一多山腹地的飞机跑道来增强自己的战略地位。麦克阿瑟早就为杉山做好了准备，他空运来了一支澳大利亚部队，在距离机场400码的地方拦截住敌人。紧接着，天皇的最高司令部又命一支舰队搭载大量援兵从拉包尔启程前往莱城。麦克阿瑟也预料到了这一点。他告诉自己的属下，如果能够控制新几内亚北部海面，就不需要费力穿越横亘在他与集结区之间的1 500英里雨林了。那个集结区是成功反攻菲律宾的必要保证。因此，他决定利用战争中的最新武器——飞机，并沿用最古老的法则：战场遮断。他命肯尼等候下一次恶劣气候的到来，并预测敌人届时定会试图从拉包尔派遣一支大型护航队穿越俾斯麦海和丹皮尔海峡前往莱城。3月1日下午，一架执行侦察任务的B–24飞机发现几艘舰船正在驱逐舰的护卫下从新不列颠岛北部向西行进。在接下来的两天内，运用新型的超低空轰炸战术（类似“打水漂”的原理），几波B–25轰炸机击沉了敌军至少8艘舰船和4艘护航船——除4艘驱逐舰之外，舰队被全部击沉。到达新几内亚的少数日军士兵不得不从沉没的舰船附近游泳上岸。从此以后，日军若想派兵增援与麦克阿瑟对峙的卫戍部队，就只能通过驳船或潜艇来运输援兵。

俾斯麦海战期间，将军一直都待在伦农酒店。肯尼随时都有可能叫醒他，通过轰炸机为他传送战报。战后肯尼回忆道：“我还从没有看到

他这么得意过。”将军一遍又一遍地称赞道：“干得好，‘海盗’。”他随后发表了一份耀武扬威的公报，并召开新闻发布会宣布对海洋的控制“不再仅仅或主要依赖海军力量，而是可以仰仗由陆军坚守的岸基战机……澳大利亚的第一条防线就是我们的轰炸机防线。”这话深深地冒犯了曾经战斗过、现在也依旧战斗在布纳东部海域的美国海军。五角大楼展开了一项调查，质疑麦克阿瑟宣称的大规模歼敌成果。肯尼明智地评论道：“我们也许永远也无法得知到底有多少艘船在俾斯麦海战中沉没……我个人对于二十多艘这个数字已经很满意了，毕竟准确的数字并不重要，而针对这个问题产生的争论就更加荒谬了。重要的是，日军试图加强莱城关键位置的防御并进行重新补给的尝试以完全失败告终了。”

这一次的胜利是关键性的（麦克阿瑟后来将它称为自己战区中“决定性的空中会战”），在那些赏识这一胜利重要性的人之中，温斯顿·丘吉尔给将军发来了电报：“谨向你此次歼灭日军舰队致以最热情的祝贺……盟国应该为你在这段艰难岁月中所展现出来的杰出领导力表示深深的谢意。”将军还会不时从英国首相那里收到类似的信件。对方总是不忘在信中提醒他，西南太平洋上的战役是全球战争计划中的一部分。将军的确需要这样的提醒，这是所有战区指挥官的共同需要，只不过他比别人更需要提醒而已。

在全球范围内，美、英两国在兵力和原材料方面的优先权都是由盟军联合参谋长在丘吉尔和罗斯福的监督下决定的。为此两人经常见面商讨。约翰·托兰指出，如果说1943年是日本的羊年的话，那么这一年对它的对手们来说就是“会议之年”。为了商讨对日策略，盟国还在未来安排了更多的会议。在卡萨布兰卡、开罗、德黑兰和魁北克的会议中，丘吉尔分配了一项又一项有着宏伟代号名称——“三叉戟”“四分仪”和“六分仪”。政治领袖们也纷纷举杯，期待着首相口中所说的“胜利的微光”。而此时，海陆军将领们正在巨大的墙面地图上移动图钉、交换情报、争论谁该对谁做些什么或是何时动手。

这些会议的纪要反复讨论着同样的话题。英国人希望美国人能在击垮德军之前限制自己在太平洋上的目标，同时将可供调遣的每一支步枪和每一名战士全都送往欧洲。乔治·马歇尔和金上将认为英国人低估了日本，他们希望美英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投入能够加倍，从盟军总兵力的15%提高到30%。美国提议对大日本帝国发起双重攻势，由尼米兹率领海军陆战队横越太平洋中部，先夺取吉尔伯特群岛的塔拉瓦，再向西跃进攻占夸贾林环礁、埃内韦塔克环礁、关岛、塞班岛和贝里琉，而麦克阿瑟则负责攻占俾斯麦群岛和新几内亚的大陆桥。两支进攻队伍将在菲律宾汇合；关于是否要进攻吕宋岛或台湾岛的问题则以后再商议。英国不情愿地表示了赞同。紧接着，美国人又祸起萧墙。金上将想要强调尼米兹的中央太平洋战区的重要性，而马歇尔则认为麦克阿瑟的西南太平洋战区才是重点。为了解决这一争端，双方的参谋长被邀请来代表两位太平洋总司令发表意见。尼米兹的代表指出，新几内亚周围水域太过拥挤，会导致美军日益充实的航母舰队暴露在日军岸基轰炸机的攻击范围之内。（尽管尼米兹没有表态，但所有人都知道他另有图谋：不让将军触及他的航空母舰。）轮到萨瑟兰了。他声辩西南太平洋战线能够剥夺敌人的原材料，且麦克阿瑟相信攻下尼米兹路线上那些由日军重兵把守的岛屿将是一场血战。后来发生的事件证明麦克阿瑟是对的，只不过他派出的代言人实在是有些差劲。萨瑟兰在得罪人方面具有很高的天赋，就连马歇尔都称他是“海军的主要攻击者”。听闻与会者的意见纷纷倒向中央太平洋战区的消息，将军备受打击。但即便如此，尼米兹依旧不满意自己的所得，因为对抗日本的战争最终沦为了参谋长联席会议清单中最底端角落中的一项计划，被排在了在英国建立第二战线、战略轰炸德国、为苏联提供援助、参与地中海地区战争以及反抗纳粹U型潜艇的任务之后。

实际上，这两股太平洋上的强大军事攻势是呈相互支持态势的，每一方都在保护另一方的侧翼：比方说，被尼米兹牵制住注意力的敌军海军原本就是打算从东边突袭麦克阿瑟。不过，两方的战略倒是不尽相同——麦克阿瑟计划利用岸基轰炸机依次向前推进，以取得当地的制空

权，而尼米兹则以航母舰载机护送两栖部队在关键岛屿登陆为基础，使这些岛屿成为后来穿越敌军防线的跳板——不过这也是因为他们面对的是不同的地形和海域。

两位战区总司令的表现都十分惊人，而证明他们成果的最好证据就是战后缴获的敌军文件。日军最后一次尝试纳入帝国版图的也就只是瓦乌。尽管日军的攻势已经退去，但还是有些人对此表示怀疑。巴布亚、瓜达尔卡纳尔岛、瓦乌以及俾斯麦海的几场战争失败让日军相信自己的扩张的确有些过分了。帝国最高司令部的指挥官们表示要在1944年春天之前誓守自己现有的阵地，好让日军舰队得以恢复到战前的实力，同时生产出较之原先3倍数量的战斗机。在此之前，他们不得不妥协着打起退堂鼓，最终通过放弃新几内亚东部大部分地区、俾斯麦群岛、所罗门群岛、吉尔伯特群岛和马绍尔群岛（夸贾林环礁和埃内韦塔克环礁）来缩小自己的防御范围。在“新作战政策”的指导下，这样做将创造实现日本战争目标所必要的“绝对国防圈”。1943年，他们的西南太平洋防御带已经从帝汶岛扩展到了莱城、新不列颠岛、所罗门群岛中央的圣伊莎贝尔岛和新乔治亚岛。他们相信自己的多层防御是固若金汤的，实际上却处于被攻击状态，主动出击的精神显然已经转移到了美、澳两国身上。尼米兹率领的高速航母和麦克阿瑟率领的海、陆、空三军势力将一前一后向前推进，撕毁敌人的阵线，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对方的主要基地。

截至1943年春末，麦克阿瑟将军对新几内亚、俾斯麦群岛和所罗门群岛地理的了解可能已经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无论是这片区域里的珊瑚礁位置、潮汐表，还是峡湾、水道、隘口、雨季，他都熟记于心；他能够认出P–38和P–40战斗机以及B–17轰炸机航程范围内的所有目标（在加满一箱油的情况下，前两种机型分别能够飞行2 260英里和2 800英里，而B–17轰炸机在搭载满舱3 000磅炸弹时可以飞行1 850英里）。除此之外，麦克阿瑟对自己的敌人也同样了若指掌，清楚他们的实力和

部署、补给线、增援能力、军备质量（很高）、军队士气（高涨）以及战斗勇气（这几项中水平最高）。日本人的7.7毫米口径有坂步枪枪口初速可达每秒2 500英尺，是一种杰出的步兵武器。而他们手中口径分别为50毫米和81毫米的迫击炮、6.5毫米口径南部轻机枪和7.7毫米口径重机枪（改造后的致命法国霍奇基斯机枪）也都是高精尖的武器。另一方面，日军无法充分利用被占岛屿的经济却让美国人感到十分困惑，更让身处上海办公室里的儿玉誉士夫恼火不已。而且他们都无法看穿麦克阿瑟。布纳之役后的几场战役中，他们根本就无法应付麦克阿瑟的多变和灵活——他声东击西、左闪右躲、变幻莫测，总是能够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发起进攻。在巴布亚，他将全部注意力都投入到战争的具体细节之中：替换部队、拓展交通、调运长射程大炮，其运筹帷幄的能力不亚于像艾克尔伯格这样老练的战术策略家。将军拥有军事家和军事设计者的天赋。坦率地说，在这一点上，“二战”战区内没有哪支军队的领导人能够与他相提并论。

在麦克阿瑟看来，这场战争就是在空军掩护下的补给战。“胜利，”他告诉自己的属下，“取决于轰炸机战线的向前推进。”对他来说，战斗机只不过是炮火射程的延伸。他总是在寻找能够建设机场的岛屿，一旦夺取其中的一个，便下令让“帕特”·凯西的工程师前去铺设跑道。在短程战斗机掩护下发射弹幕拦阻网的B–24轰炸机是他发动陆地攻势的必要先导。在崎岖不平的郊野乡间铺设好战斗机跑道之后，他会缓慢地朝目标挺进，还总是不忘警示肯尼牢记克拉克机场的教训，让后备的驱逐机编队随时待命，以防敌军突然向西进攻，破坏麦克阿瑟自己的补给线。

1943年年初，他的目标仍是夺取拉包尔，占领那里资源充足的弹药库、海军锚地以及4座大机场，并俘获日军卫戍部队的10万精兵，占领其在附近的新爱尔兰岛上建设的卡维恩大型中转仓库。拉包尔是俾斯麦群岛屏障的关键。占领新几内亚的休恩半岛相当于在这一屏障上撕开一个大洞，而夺取格洛斯特角和拉包尔则可以打开新不列颠岛和休恩之间

的勇士号海峡，允许他突破俾斯麦海域，长驱直入，反攻菲律宾。当时这还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要想达成这一目标，还要依赖美、澳两国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员攻破敌人防线上的重要衔接点，以便让凯西的推土机和肯尼的飞行员鱼贯而入，各自开工。哈尔西夺取拉塞尔群岛的目的是占领轰炸机基地，而刚刚被将军纳入麾下的沃尔特·克鲁格也收到命令，准备在新几内亚海岸执行类似的任务。在麦克阿瑟任参谋长时，克鲁格曾是陆军作战计划方面的参谋长，他将和艾克尔伯格成为将军手下两大战地指挥官。

1943年4月15日，哈尔西飞抵布里斯班，和最高司令展开了为期三天的商讨。他尤其希望麦克阿瑟能够批准他攻占新乔治亚岛，使之成为未来前往布干维尔岛的跳板。将军当下便表示同意，他早已计划好了要发起这一攻势。他十分欣赏哈尔西粗野无畏的态度。他拍了拍哈尔西的后背，对他说道："如果你跟着我干，我会把你塑造成一个纳尔逊做梦都不敢想象的伟大人物。"后来，将军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到哈尔西时这样写道："他和约翰·保罗·琼斯、戴维·法拉格特和乔治·杜威一样属于好斗、有闯劲的人，一门心思想着接近敌人、与之决一生死。在他对海上行动的设想当中，完全没有许多水手心目中对船只沉没常有的无端恐惧。"就哈尔西本人而言，这段会面的经历在他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记载的："向他报到5分钟之后，我就感觉我们已经是一辈子的朋友了。我很少遇到能够在短时间之内给我留下深刻好印象的人。"他认为将军战区内的指挥系统"很明智、相当令人满意"，而他也很高兴自己能够成为其中的一部分，即便只是充当一个小配角。

6月末，麦克阿瑟发动了三次进攻：哈尔西率领海军陆战队攻占了新乔治亚岛，克鲁格率领美军占领了巴布亚东边的基里维纳群岛和伍德拉克岛，而澳大利亚指挥官艾德蒙德·F.　赫林则率领澳军在萨拉马瓦南部的新几内亚拿骚湾实施了登陆。9月初，他派出一个师在休恩半岛登陆，第二天又指挥美军伞兵团在莱城东北部被废弃的纳扎布跑道实施了盟军在太平洋的第一次空降突袭。基里维纳群岛和伍德拉克岛为肯尼提

供了机场，可供突袭拉包尔所需的高空掩护短程战斗机起降。如今他还打算占领半岛附近几座没有敌军聚集驻守的机场，以便利用“空中堡垒”和“解放者”（B–24）轰炸机从南部和西部交叉突袭敌军的大型基地。

空降纳扎布机场的前一夜，肯尼在莫尔兹比港告知将军，自己打算和伞兵们一起行动。“他们都是我的孩子。”肯尼说，“我想要亲眼看着他们上战场。”麦克阿瑟沉思许久之后答道：“你说得对，乔治。我们都应该去。他们也是我的孩子。”惊讶的肯尼对此表示抗议，说让一个“月俸只有5美元的日军飞行员”在美军最高司令的身上“射穿一个洞”简直是再愚蠢不过的事情了，不值得他为此冒险。麦克阿瑟摇了摇头说道：“我不担心自己会被击中。老实说，唯一困扰我的是在穿越山区上空颠簸气流的过程中，我有可能会反胃。我不想吐出来，在孩子们面前丢脸。”他表示，这是这些伞兵们第一次参战，他想要“通过自己亲临战场带给他们某些安慰”。肯尼事后回忆，在伞兵们排好队列准备登机时，将军也“站到了队列之中，还不时停下脚步与其中的一些人交谈，祝愿他们好运。他们都很高兴能够看到他，还莫名意识到了将军会监督他们执行这次‘空降’任务”。登上B–17轰炸机长机之后，他不仅没有呕吐，而且当这架“空中堡垒”的一个引擎损坏时，拒绝了飞行员掉头的建议。“继续飞。”他命令道，“我曾经和肯尼将军也坐过一架坏了一个引擎的飞机，所以我知道B–17仅靠3个引擎也能够飞得很好。”伞兵团完成跳伞任务之后，他返回了总部，给留守在伦农酒店里的琼发去了一封电报：“真是一次令人愉悦的旅程。”

9月12日，他的士兵攻占了萨拉马瓦；4天之后，莱城也落入了盟军之手。10月2日，位于休恩半岛顶端处的芬什港被攻陷，为将军提供了一处进攻海峡对岸新不列颠岛的坚固基地。与此同时，从敌军手中夺取了瓦乌的澳大利亚士兵正沿着内陆的雨林小路朝莱城西北160英里处的一座新几内亚港口马当推进，而100多架美军轰炸机正在袭击莱城以西200英里处的韦瓦克日军第18军总部，摧毁了停留在地面上的日本战斗

机和轰炸机。华盛顿方面，潘兴告诉媒体记者：“并非所有的指挥官都能够成就每一位将军的梦想——包围和歼灭自己的敌人。然而，在过去的18个月中，麦克阿瑟在缺乏精兵强将的情况下已经三次成就了这一目标：科科达和米尔恩湾战役、俾斯麦海战和现在的莱城、萨拉马瓦战役。”

如今，他已经将自己的战线推进到了新几内亚漫长北部海岸线的中间区域，距离菲律宾和拉包尔也更近了一步。哈尔西再一次行动了起来，而麦克阿瑟的运气也开始好转：11月，克鲁格成功登陆阿拉韦——新不列颠岛西南海岸上的一个村庄。盟军现在已经到达了拉包尔所在的岛屿，而急着想要把美军推回海中的日军纵队也汇集在了阿拉韦。日军此举对麦克阿瑟来说可谓正中下怀。克鲁格的行动目的在于分散敌人的注意力。圣诞节过后的那一天，在敌人全神贯注地参与滩头反击战的同时，将军把第1海军陆战师派往了新不列颠岛海岸的格洛斯特角。[注]四周之后，他们占领了那里的机场。如今，敌人已经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境遇。从布干维尔和格洛斯特飞来的轰炸机从早到晚地炮轰着拉包尔，不仅破坏了日军的装置设施，还切断了他们的补给线。敌军在西南太平洋设立的最引以为傲的堡垒很快便转变成了一种负担。日本人已经开始把舰船和飞机转移到加罗林群岛的特鲁克群岛。在麦克阿瑟占领了格洛斯特角及其到拉包尔的中点塔拉塞亚之后，裕仁天皇驻守在拉包尔的10万步兵也开始挖掘新的战壕，戴上敢死队的头带，发誓在美军到来之际战斗至最后一人。

然而美军并没有到来。他们是永远也不会来的。几个月过去了，严阵以待的日本卫戍部队等来的只是一场空。消息传开之后，他们才惊觉大规模的战役已在别处打响——海军陆战队在登陆吉尔伯特群岛、马绍尔群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之后发起了猛攻，而麦克阿瑟也在其他地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加速获得了一场又一场的两栖作战行动的胜利。然而，拉包尔附近却并没有出现任何一艘船。日本帝国的士兵们不禁为自己单方面的参战热情感到极其失望和痛心。1944年年初，就连B–17和B–24

轰炸机也停止了对他们的空袭。特鲁克群岛已被尼米兹航母上的飞机炸得面目全非，可拉包尔上空却一派平静。就连从格洛斯特角和阿拉韦出发前来的盟军巡逻队也只是充满嘲笑意味地凝视着这片寂静的雨林。日本士兵只想在自己死前让对方也付出高昂的代价，或是干脆带着荣誉切腹自杀。他们相信自己死后有资格升入日本的“天堂”，可麦克阿瑟却拒绝给他们提供赴死的机会，让他们在心理上陷入焦灼状态之中。

从那些日本军官的战时日记内容可以看出，他们认为自己成了可怕的不公待遇的受害者。他们手下指挥的是一支比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或李将军在葛底斯堡战役中统领过的规模还要大的军队（其实也远远超过了惠灵顿和米德将军的兵力），因此一心只想参战。他们的工兵匆匆搭建起了壁垒、护坡、矮护墙、碉堡和半月堡。荷枪实弹的坦克已经隐蔽就位。地雷也已经埋好。霍奇基斯机枪和南部轻机枪早已被架起或是巧妙地伪装起来。迫击炮手也算好了精确的射击范围。受命发起反击的精锐部队潜伏在蛇腹形铁丝网围绕的掩体中。在战争余下的日子里，日军士兵就这样怀着愤怒的受挫之情留守在那里。在终于接到裕仁天皇命令他们投降的布告之后，感觉丢尽了颜面的士兵中很多人都自觉无法忍受这份屈辱，跑进了新不列颠的雨林之中，像热带动物一样度过了自己的余生。日语中有一句谚语，其意与“不雨则已，一雨倾盆”颇为相近。在帝国漫长的军事史上（大日本帝国自1598年以来从没有打过败仗），还从没有如此多的战士曾在战争中受过这番折磨。

虽说这一现象不仅限于拉包尔，但这里确实是遭麦克阿瑟忽视的敌军中遭遇最富有戏剧性的一处。到底是谁最先提出这一计谋已经不得而知了。不过将军自己倒是通过引用自己和身边人的回忆大方地包揽了这一荣誉。在回忆录中，他这样写道：

> 要想推回日本人的环形侵略带，对他们占领的众多岛屿直接施压是一个漫长而又代价高昂的过程。我的属下担心拉包尔和其他据点……我打算包围他们，耗到他们弹尽粮绝，采取“攻其不备——

扼杀希望”的理念。我声辩这与所谓的“越岛作战”（蛙跳战术）理念正好相反。后者是通过正面直接施压来逐渐推后敌军的战线，其结果必然是惨重的伤亡。其实，我们没有必要重创敌军掌握的众多岛屿。“越岛作战，”我说，“不仅损失巨大，进展也很缓慢，并不符合我速战速决、尽可能减少军费开支的想法。新的情况和新的武器需要充满想象力的新解决方法和新的勇气。战争是永远不能靠过去的老方法取得胜利的。”

1950年，将军在接受《科利尔》杂志编辑的采访时表示：“日本不明白自己所面对的战争新概念，其中就包括绕过重兵把守的据点，结合海、陆、空三军力量，切断必要运输线路，借以让这些防御阵地在战略上失去用途，最终被我方夺回。”

他不仅在战后提及过这一推论，在战时也曾多次说起同样的话题。他告诉赫夫，如果他遵从布纳战役的先例，那么反攻菲律宾、攻打东京的计划可能就要花上10年的时间。与此同时，《纽约时报》的一名记者还引用了他的另一句话：“如果你把日本鬼子逼入绝境，他们就会恶狠狠地奋起反抗，死不罢休。依靠一点点口粮和很少的补给，他们就能存活很长时间。从侧面攻击他们，给他们留出撤退的地带，即便那里通向一片荒芜，你也能够主导他们。”据赫夫、威洛比和肯尼回忆，将军是在哈尔西、克鲁格以及澳大利亚方面的托马斯·布莱米爵士共同出席的一场军事会议上第一次提出这个概念的。一位与会军官指着地图说道：“我看不出来我们如何才能凭借有限的兵力夺取这些据点。”麦克阿瑟在烟灰缸里敲了敲自己的香烟，用缓慢而又随性的声音答道：“嗯，这么说吧，我们不需要去夺取它们。事实上，先生们，我根本就不打算夺取它们。”他转过头来对肯尼说道：“你要剥夺他们的行为能力。”事后，他一边在莫尔兹比的走廊上踱着长长的步子，一边告诉肯尼：“让他们在拉包尔挨饿！雨林！饥饿！它们都是我的盟友。”

这种把戏竟然能够说服肯尼这样的人显然证明了将军出色的戏剧天

赋，因为事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多年以后，据麦克阿瑟自己回忆，“蛙跳战术”（他对这一战术的命名）“实际上是对一种有战争以来就存在的理念的现代化应用……即经典的包围战略”。首先在太平洋战区使用蛙跳战术的其实是日本人。他们的部队先是绕过了吕宋岛，然后包抄爪哇群岛，最后才入侵菲律宾。美国人随后朦朦胧胧地在阿留申群岛战役中无意发现了这一阉割战术。敌军把守着基斯卡岛和阿图岛。基斯卡岛更靠近美国，却被日本人重兵把守。1943年5月11日，一支美国军队夺回了阿图岛，正准备转向基斯卡岛时却发现日军已经撤离。尔后，在麦克阿瑟的战略监督下，手握战术指挥权的哈尔西在新乔治亚岛的沼泽中陷入了困境。至此，他和将军两人都开始认真地重新考虑是否应该明智地采取按部就班地进攻策略。他们意识到这样做不仅会为日军加强防御提供时间，还无法利用美军的空中和海军优势。所罗门群岛链上的下一个岛屿名叫科隆邦阿拉，岛上驻守着1万日军士兵。哈尔西上将越过它，占领了仅有250人驻军的韦拉拉韦拉岛。和基斯卡岛的情况一样，科隆邦阿拉岛上的日军后来也撤离了。

虽说哈尔西是在将军的首肯下采取行动的，但要说孤立拉包尔完全是将军的主意也缺乏说服力。显然，类似的战术第一次被提及应该是在1943年3月举办的那次军事会议上。将军的参谋萨瑟兰、肯尼以及史蒂芬·J.　张伯伦都出席了那次会议。即便他们散会后曾经向麦克阿瑟提起过这种战术，也并没有引起他的重视。早在8个月以前，联席参谋长们就曾命他夺取拉包尔和卡维恩。和现在一样，他当时并没有提出异议。事实上，在6月，参谋长们试探他的意向，告知他五角大楼里某些军官认为美国可以切断拉包尔的供给、让它自生自灭，这时，将军表示了反对。他说，他在那里需要“一个合适的前沿海军基地”，以保护自己的右翼；没有了拉包尔，他沿新几内亚“秃鹰”崎岖不平的背部发起的西进攻势“本就不明朗的胜利前景将会遭遇更多障碍”。

到了8月，问题在魁北克“四分仪”会议上得到了解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太平洋战争中最大胆的一项策略并不是靠实力胜出的，而是源

于英、美联席参谋长们想要寻找一种妥协的方法。英国希望美国能够派驻更多的兵力和登陆艇到欧洲战区。他们不明白美国的对日行动为什么不能只依赖一条战线——也就是尼米兹的中央太平洋战线，美国的海军上将们也倾向于他们的看法。然而，罗斯福和他的政治顾问们提出了异议，因为他们不得不应付麦克阿瑟在美国本土的人气问题。《时代周刊》已经预知麦克阿瑟“指挥的是一个二线战区……显而易见，事态与他受命离开科雷希多岛、抛却巴丹半岛上的将士们时所期待的正好相反。更加显而易见的是，这与美国人民的期待也相距甚远”。最终富兰克林·罗斯福站到了乔治·马歇尔（会议中最支持麦克阿瑟的人）那一边。麦克阿瑟从未承认马歇尔曾在魁北克会议等其他地方强烈支持过自己，这有可能是因为他对此从不知情。无论如何，这一决定都是至关重要的。结果，魁北克“四分仪”会议最终第35点命令“夺取或中立化新几内亚东部至韦瓦克……拉包尔只能中立化，无须夺取”。

关于绕过拉包尔是麦克阿瑟的主意这一话题到此为止。不过，如果这一结论仍旧站不住脚，至少他的绕道行动转变了战争中最重要的战略概念。对于这一点，日本人的证词反而令人印象最为深刻。战后，负责破解将军意图的高级情报官员饭野松一大佐在受审时表示，麦克阿瑟突袭包围日军防御工事的战术是：“我们最憎恨的战略类型。”他说：“麦克阿瑟反复地用最少的损失进攻和夺取防守相对薄弱的地区，建设机场并进一步切断（我军）部队在那片区域的补给线……我们的据点逐渐因为饥饿而屈服。日本军队更愿意像德国人那样迎接直接的（正面）袭击，而不是任由美军涌入我们的薄弱点，把我们淹死，就像水流总是会寻找最薄弱的入口使船沉没一样。我们尊重这种战略……因为它在效果最大化的同时将付出降到了最低水平。”

麦克阿瑟的士兵们对于这一战略就不是那么赏识了。这些成长于经济大萧条时期的年轻人不相信装腔作势的豪言壮语，对将军公报中使用的那种语气（言之无物的风格）更是表示漠然。听闻从西南太平洋战场上负伤回国的士兵们中间广泛流传的有关将军的批评言论，范登堡还怀

疑这是白宫方面施展的阴谋。他致信罗伯特·E. 伍德："有一件令我费解的事情让我心烦意乱。我不断地从西南太平洋返家的老兵们那里听说对我们的朋友不利的言论。一位怀疑论记者甚至还暗示是恶魔在作祟，因而只有那些反对麦克阿瑟的老兵才能够获准回家。"

正如每一位在西南太平洋服役的将士所知，这其中根本就没有什么阴谋。尽管他们对自己身为麦克阿瑟部队一员的事实感到十分骄傲，却总是毁谤自己的最高司令，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蔑视他为自己创造的形象。伟大的指挥官往往不得人心的事情并不稀奇：英军士兵对惠灵顿就十分厌恶，而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正如戈尔·维达尔指出的那样，"列兵们对华盛顿的嫌恶之情和他对他们的鄙弃之意相差无几"。然而，就麦克阿瑟的案例来说，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那些对他颇有微词的人能够理解将军的战略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肯定会对他另眼相看。日本人每杀害一个盟军士兵，将军就会以十倍奉还。约翰·冈瑟写道，历史上还从没有哪位指挥官如此爱惜自己手下士卒的鲜血。从这个角度来讲，欧洲战区的战况实在是令人惊愕。光是安齐奥一役，就有72 306名美军士兵阵亡。而在诺曼底战役中，艾森豪威尔则失去了28 366名官兵。在麦克阿瑟抵达澳大利亚到重返菲律宾水域的这两年多时间里，他的部队伤亡数字仅为27 684人——其中还包括了布纳战役的伤亡。

1943年，轴心国的战线在麦克阿瑟的猛攻下已然北移。然而，随着新一年的到来，他们的势力又猛然向西扭转。当时他正朝"秃鹰"的头部（多贝拉伊半岛）进军，目标是可以作为反攻菲律宾跳板的摩鹿加群岛。他需要在俾斯麦海再建立一个基地，才能将这里变成盟军的海域和封锁拉包尔的坟墓。他事后写道："俾斯麦群岛中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正好符合要求。"

他至少还有另外两个动机，其中一个说明了他性格中常见的一个缺点，而另一个则是他的过人之处。这个缺点就是他一如往常地相信日本

人并不是他唯一的敌人，他还必须与华盛顿和伦敦方面，尤其是美国海军中那些不知廉耻的人做斗争。尽管他偶尔也会从尼米兹那里借用几艘舰船，或是不时将岸基飞机借给他使用，但他还是将这位坐镇火奴鲁鲁的指挥官视为自己的竞争对手。他心里清楚，尼米兹2月就能夺取罗伊岛、夸贾林环礁和埃内韦塔克环礁。将军决定不去抢他的风头，而是希望全世界能把关注的目光都集中在自己那柄闪亮的宝剑上。他也知道，除非发生不可预见的逆转，否则这位上将的海军陆战队员4个月之内就能登陆塞班岛——这也是太平洋战场上最早居住着日本平民的岛屿。如果该岛落入美军手中，那么东条英机的政府就会垮台。麦克阿瑟当然并非真心希望尼米兹输掉这场战斗，而是想要近距离为他提供帮助，好让报刊头条中能够出现麦克阿瑟的军事基地、空军，以及螺丝上的最后一环——麦克阿瑟的海军鼎力相助海军陆战队的报道。

如此琐碎小事模糊了他的天赋。此时此刻，他本该清醒地认识到阿德默勒尔蒂群岛在下一个阶段的新几内亚战役中会充当何种角色。如果把俾斯麦海想象成一个天然的葡萄酒酒囊，巴布亚和新爱尔兰岛为两侧，新不列颠岛为囊底，那么位于南纬2度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正好就是酒囊的壶口。用他的话来说，夺取这个群岛就能够“盖住酒囊”。在此过程中，入侵群岛第二大岛洛斯内格罗斯岛的战役最具决定性——只要攻下它，第一大岛马努斯岛就是他的囊中之物，正如国际象棋的将军过程中，击败王后就可以围捕国王一样。一旦他控制了马努斯岛，就能够封锁自己的右翼。这样，汉萨海湾等被日军重兵把守的区域都可以忽略不计。除此之外，这座岛屿也能为他提供无价的机场和一个足以容纳他的两栖突击部队的大型海港。事后他表示：“态势呈现出了发动奇袭的理想机遇。”

他的属下对此感到十分愕然，纷纷声辩这一行动风险巨大。他们是对的。据一支情报小分队汇报，洛斯内格罗斯岛上“满是日本鬼子”。将军再一次选择了相信自己的直觉。他认为情报小分队的信息未免有些夸大其词。参谋们坚称，即便事实的确如此，这样的风险也是不能接受

的，因为距离最近的盟军补给站位于南边300英里外遥远的芬什港，无法为滩头提供援助。他在回复时提出了通过空中途径来补充援兵的方法。可参谋们却表示这样做的前提是跑道必须掌握在美军的手中。他说，他也意识到了这一点，跑道是不会落入他人之手的。可参谋们还是不愿放弃，指出即便他们可以接受敌军的抵抗力量有可能十分薄弱的情况，日本人在岛上还拥有充足的兵源，足以反抗入侵者。麦克阿瑟严肃地答道，自己了解这些东方将领的逻辑，他相信日军指挥官会把自己的军队分为几个部分发起零散的进攻行动，因此是可以被各个击破的。

肯尼评论道，尽管将军“驳斥了我们有关供给系统已无能为力的一切论证”，但他心里清楚洛斯内格罗斯岛战役将面临千钧一发的局面。他模棱两可地将这一赌局称为“武力侦察”，并决定跟随任务部队一同前往，以便在遭遇不测时现场指挥撤退行动。1944年2月27日星期日，将军悄悄离开了伦农酒店，飞抵米尔恩湾，趾高气扬地走上了“凤凰”号巡洋舰的甲板。这也是他登陆棉兰老岛、离开巴尔克利的PT–41号鱼雷快艇之后登上的第一艘海军舰船。星期一一早，克鲁格也登上了巡洋舰，递给了他一捆情报部门发来的针对洛斯内格罗斯岛敌军卫戍部队实力的最新报告。威洛比现在估计（事实也将证明他是对的），他们将遭遇超过4　000名日军士兵。麦克阿瑟把报告递了回去，转过头去对着焦急等待他做出决定的军官们，用平静的语气说道：“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行动，先生们。”停顿片刻之后，他补充道自己打算和部队一起登陆。克鲁格惊恐万分。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他明令禁止我和突击部队一起执行登陆任务，现在却承诺要亲临战场。我声辩他这样暴露自己既无必要也十分不明智，且如果他遭遇了什么不测，必将酿成灾难。他认真地听完了我的话，对我表示了感谢，然后补充道：‘我不得不去。’他已经下定了决心——就这样了。”

将军在接下来的大半个夜里都独自站在“凤凰”号的船舷栏杆旁，凝视着漆黑中闪烁着磷光的大海。黎明时分，就在他们于洛斯内格罗斯岛附近的雅尼海湾抛下船锚的同时，日军的海岸炮台向他们发动了攻势。

在场的一名《生活》杂志记者写道："一发炮弹从船身上空飞了过去。第二发也很快落了下来。甲板上的将士们以为第三发炮弹一定会正中目标，纷纷准备寻找便捷的藏身之地。当时，麦克阿瑟的兴致一下就高昂了起来，笔直地站在舰桥上观测起了周围的情景，一边还不忘和自己的属下攀谈。幸运的是，他观测到了日军的炮台位置——而他所站的地方恰好在炮台的射程范围内。"

6个小时以后他冒着瓢泼大雨登上了海岸。战事十分激烈。第1骑兵师的美军士兵全都头戴钢盔，身披野战迷彩服，俯卧在地上，而穿着军用防水短上衣、头戴军帽的将军刚刚为一个率领第一队士兵出击的队长授予完服役优异十字勋章，此刻正在岸上闲庭信步，吓得他身边的人都吃惊不已。苦恼的副官们试图劝说他不要暴露自己。一位高级军官甚至还警告他，他正处于"切身的危险之中"。麦克阿瑟点燃了自己的玉米烟斗，挥手扔掉了火柴，解释道自己只是想"感受一下情势"。一名中尉碰了碰他的袖子，指着一条小路说道："抱歉，长官，但我们几分钟前刚刚在那里击毙了一名日军狙击手。"将军赞许地点了点头。"很好。"他说，"这就是处置他们的最好方法。"说罢便朝着所指的那个方向走去。他跌跌撞撞地跨过两具几分钟前刚被击毙的敌军士兵的尸体——他们的身体还是热的，继续向前行进，嘴里仅仅嘟囔了一句："我就喜欢看到他们这个样子。"一位美军士兵喊道："长官，您跨出防御带了！"麦克阿瑟礼貌地对他的提醒表示了感谢，却并没有停下脚步，而是走到了一位受伤的美国步兵身旁。他蹲在他的身旁，握住他的手问道："孩子，发生了什么事情？"

约翰·冈瑟写道："他在前线漫步的样子简直不像是人类，不仅高傲而且还有些慵懒。"与冈瑟有着相同感受的人还有陪同将军一同登陆洛斯内格罗斯岛的罗杰·O. 埃格伯格医生。他是将军的新军医，一个月前才加入他的队伍。作为一名知识分子，埃格伯格是带着疑虑接受这份任命的。他说道："我不会是个不切实际地崇拜偶像的人。"他本以为自己会和将军产生政治上的分歧，却惊喜地发现这个话题从未被提起过。不

过，身处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埃格伯格却在为另一个原因苦恼。据他回忆，其他副官早就告诉过他，如果有可能的话，一定要在陪伴麦克阿瑟的时候避免进入敌军步枪兵的射击范围。如今，这位军医感到有些害怕。他回忆道："我想起了家中的孩子们。也许如果我'不小心'把什么东西掉在地上，就可以伏在地上。但我怀疑我是否还能重新站起来……麦克阿瑟身边的所有军官在洛斯内格罗斯岛上都显得十分不安——他们不仅在担忧麦克阿瑟的安全，更重要的是，他们也在担忧自己的安全。"

岛上最危险的地方是飞机跑道。肯尼曾经告诉将军，这条跑道将会成为"战区内最重要的一块不动产"。此时此刻，他却万分希望自己从没有说过这样的话，因为将军正径直朝那里走去。据肯尼回忆，军官们通过后来清算出来的尸体数量估计，就在"麦克阿瑟将军在跑道上走来走去……认真考察那里的珊瑚路面质量如何"时，大约有800双日军士兵的眼睛正在窥视着他。一位随行的《星期六晚邮报》记者写道："麦克阿瑟的黄色军用防水短上衣两摆向后支着，烟斗里还冒着烟气。他亲自用脚丈量着泥泞的珊瑚跑道。先是宽度，然后是长度，远远地待在我们的防御带外面。"一位吓得目瞪口呆的骑兵事后说道："我不知道他们为何没有杀了他。"埃格伯格给出了这样的结论："麦克阿瑟想要体验火药的味道以及战斗的画面与声响。身处或接近战争似乎能鼓舞他的士气……就好像战役能够'供养'他的身体似的……不过相比留守在总部钻研地图和行动报告，亲身感受战斗过程确实能让他更好地理解自己的指挥官和士兵们面临的问题。"

两小时后，浑身湿透、沾满泥土的将军重新登上了"凤凰"号，为无须撤离感到心满意足。正如他所预测的那样，敌军在反击时发动的都是效率极低的小型进攻。那天晚上，他乘船返回了芬什港，然后又乘机抵达了莫尔兹比港。就在他于星期四返回伦农酒店公寓的三天之后，美军已牢牢掌控洛斯内格罗斯岛和马努斯岛的消息传到了他的耳边。有些海军官员认为他出奇幸运，觉得这场胜利只不过是一次侥幸的成功。巴贝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回顾过去，我想知道麦克阿瑟是否曾经怀疑

过自己对这件事情的判断力。”而巴贝的副手威廉·M. 费克特勒则表示：“实际上，我们没有被人从岛上赶走已经足够幸运了。”

也许就连将军也会赞同费克特勒的看法——他向新加入自己部队的人提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一个幸运的士兵吗？”——但几乎不用指望他会承认这种赞同。约翰·肯尼迪曾经评论道：“胜利有1 000个父亲，而战败却是一个孤儿。”不过，假若如此，责任显然就会落在一个人的肩膀上，可他却不能与别人分担。如果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行动成为一场惨败，那么就可能意味着他的军旅生涯也随之走向终结。联席参谋长们必定会命他采取防御姿态，将太平洋战区未来的所有攻击行动全都留给尼米兹来指挥。

因此，麦克阿瑟会接受盟军领导人在这次新的征服战之后所表达的赞许之情，甚至引以为豪也是可以谅解的。乔治·马歇尔给布里斯班发去了他对此次交战“在技巧和成功方面的祝贺”，并补充道：“请接受我对整个事件处理方式的景仰之情。”军事历史学家小约翰·米勒写道，麦克阿瑟“永远都是一个拥有信念、自信和开朗乐观的人”，能在“别人只能看到问题与困难时”看到“机遇”。他继续写道，将军在洛斯内格罗斯岛上的决绝“在加速胜利的同时减少了伤亡”，展现了他的“高尚品德”。就连参谋长联席会议中时常诟病他的金上将也承认这是“出色的一役”。温斯顿·丘吉尔在发往伦农酒店的电报中写道：“我要为你能如此迅速地从首次进入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行动中获益送去我最热情的祝贺。我期待这能帮助你更快地完成自己原本的计划。”

正如丘吉尔在这封电报所暗示的那样，他是少有的几个意识到麦克阿瑟宏伟计划的人之一。尽管他知道的也算不上是很多。“四分仪”会议上第36点指令授权他“利用按部就班的空降方式沿新几内亚北岸向多贝拉伊半岛推进”。但这就像是指挥艾森豪威尔从诺曼底开进布拉格一样（距离相等），具体细节全都取决于他。简而言之，这一命令的内容极

其模糊。将军收到的都是最广义的授权，而“四分仪”会议的性质（支持“继韦瓦克–卡维恩行动之后在新几内亚采取的后续行动”）随着他占领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而被淘汰了。他现在已经不再需要韦瓦克或卡维恩了，而是下令通过一系列精密的行动来让敌军失去平衡。他在马尼拉的日军敌手寺内寿一将军认为，麦克阿瑟此举表明他打算缓慢前进，攻下一个又一个村落。然而，将军的心里还酝酿着一个更加伟大的计划：发动一次跃进至400英里外的荷兰迪亚的大型战役，在敌人的补给仓库后200英里的地方落脚。荷兰迪亚战役非凡的设想及其宏伟的实施过程证明，历史上少有将领能与将军的才华比肩。回顾过去，这一军事经典堪与汉尼拔的坎尼会战和拿破仑的奥斯特利茨战役相提并论。

当然，荷兰迪亚战役并未名声大噪。这其中的原因就与大型战役历史书写过程中一项古怪的原则拖不了干系。战役的伤亡数字越高（被鲜血染红的面积越广）就越有必要为其正言。也就是说，作者们更愿意通过把那些战争亡灵倒下的地方神圣化来祭奠他们。因此，凡尔登、帕斯尚尔、塔拉瓦和敦刻尔克就成了他们笔下的圣坛，而那些牺牲人数少却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战役则会被他们忽视。17、18世纪之交，在惨遭政敌追击流放之前，马尔伯勒公爵就曾在欧洲大陆上领导过10场以胜利告终却相对不那么血腥的战役。“一战”中，道格拉斯·黑格将众多年轻的英国士兵送入了死地，却没有赢得一场胜利，可还是获得了爵位，并从感恩戴德的英国议会手中接过了10万英镑的奖金。每一个美国人读书的时候都曾学过杰克逊的“石墙旅”是如何在牛奔河的杀戮中屹立不倒的，但只有最资深的内战史爱好者才知晓1862年时杰克逊是如何节约军队实力，运用声东击西的精妙战术在谢南多厄河谷中行踪诡秘地阻止麦克莱伦的援军，避免了里士满的沦陷。与此相似，“二战”中的萨莱诺战役和贝里琉战役也被神话了——尽管两者对于盟军战胜日德两军没有任何的贡献——而对攻打冲绳群岛十分必要的夺取乌利西环礁（太平洋上最好的锚地之一）的战役却鲜为人知，因为敌军的撤离让这里成为无人之境。

话又说回荷兰迪亚战役。麦克阿瑟再次忽视了下属们的意见。据一位副官回忆："我们不得不沿着海岸前进，不得不确保新几内亚整体或大部分地区的安全；要知道，这座岛屿从一头到另一头几乎横跨了1 400~1 500英里。当时，参谋认为我们是不可能通过空中掩护来压制荷兰迪亚的，因此应该在韦瓦克登陆。麦克阿瑟却越加感觉日军已经转战韦瓦克，因而荷兰迪亚才是其防守的弱点。"据此，"麦克阿瑟力排众议，决意要在荷兰迪亚登陆……我们在空空荡荡，不过设施齐备的荷兰迪亚后方总部落了脚"，而"仅仅一两个星期之后，我们就建起了牢固的防御带，以至于驻守韦瓦克的日军不得不缓慢而又困难地穿越我们伟大的盟友雨林，数周之后才得以对我们发起攻击——届时，他们已经被痢疾、饥饿和疟疾折磨得士气低落了。麦克阿瑟这一招（跳过我们所有人都认为应该先掌控的中间区域）似乎十分容易，事后看来也十分符合逻辑，因此根本就不值得我们大惊小怪。"

第一个略知将军真实想法的参谋是威洛比。麦克阿瑟命他监控日军电报，搜集一切提及荷兰迪亚的信息。情报小组发现，那里的基地被用作一个集结待命的区域，但所有的作战部队都已被抽调前去加强韦瓦克的防守。和麦克阿瑟的参谋一样，日本人也认为那里才应该是美方的下一次进攻目标。紧接着，肯尼被召集了过来。将军询问他是否可以夺取荷兰迪亚附近的3座机场。肯尼点了点头。他的新型远程P–39战斗机已经组装完毕，可供往返飞行。此外，通过在老式战斗机上安装机腹油箱，他也能保证在轰炸机执行任务的时候提供保护。事情就这样决定了。萨瑟兰飞往华盛顿向联席参谋长们解释了这一计划。从理论上说，参谋长们是麦克阿瑟的上级，但随着他手握越来越多的胜利，他的权力也似乎开始凌驾于他们之上。于是他们只好给他开了绿灯。

4月的第三个星期，就在肯尼的战斗机摧毁敌军留在荷兰迪亚的300架飞机的同时，巴贝的77特遣部队（代号"鲁莽"）踏上了前往新目标的

长达数千英里的征程。4月21日星期五，部队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西面秘密集合，向北行进以诱骗敌人的侦察机，然后，在转瞬即逝的热带日落之后，护航船掉转船头，朝西南方向驶去。将军把自己的旗帜悬挂在轻型巡洋舰“纳什维尔”号上，下令佯攻韦瓦克和汉萨湾——如今参谋们把这样的策略称为“麦克阿瑟手法”。布纳之役以来，他已经学会了在行动开启时就收拾好自己所有的情感。事实上，被他任命为地面部队指挥官的布莱米能做的很少。将军的直接引导不仅触及了师长，有时还会涉及团长和连长。这样一来，他便能在短时间内自由发挥。那个炎热潮湿的星期六早上，他在位于荷兰迪亚两侧、相距30英里的洪堡湾和塔纳默拉湾同时实施了登陆行动。第三支美军部队登上了荷兰迪亚与韦瓦克之间的艾塔佩海岸，占领了那里的机场。惊呆的日本守军逃进了雨林之中。4天之内，肯尼便将这些机场作为了自己的主要基地。在战后的审讯过程中，负责指挥守军的饭村穰提道：“盟军进攻荷兰迪亚和艾塔佩让我们着实感到有些意外。回想敌人过去的行动战术……我们相信他们会试图占领艾塔佩东部某处的重要位置……由于我们判断失误……我们既无法加派援兵，也不能给那里的守军运送战争补给。”

麦克阿瑟后来是这样描写这次行动的：“正如一棵树的树枝会从树干向天空伸展一样，进攻的登陆舰队的触角也会向广泛分布在目标区域内的几座海滩伸展。”他站在“纳什维尔”号的舰桥上观摩了洪堡湾美丽的海港遭遇轰炸的过程。上午11点，在海滩遭受完第一波进攻的4小时之后，他带领艾克尔伯格、克鲁格和三名副官上了岸。在视察完滩头，并与登陆指挥官交谈过后，他要求巴贝把他和一行人护送至塔纳默拉湾。那里的登陆行动也没有遭遇抵抗。事实上，如此大奖在只有几人被子弹擦伤的情况下就落入了他的手中。虽然七八月份20多万日军将以韦瓦克为基地反击艾塔佩，那时美军必定会经历一场苦战，但在攻下荷兰迪亚的整个过程中，包括后续的肃清工作，美军只付出了150名士兵的生命。

与在洛斯内格罗斯岛上一样，将军在这里也险些受伤。他不顾巴贝

的抗议，坚持要带领自己的一队随从乘坐未经武装的希金斯登陆艇往返于两个海湾的岸边。上将的担忧在塔纳默拉湾成了现实。巡洋舰通过电报向他们汇报，一架敌军战斗机正在低空扫射小船。巴贝写道：“我命令舵手朝最近的驱逐舰驶去，以借用其炮火作为掩护。一艘毫无保护的敞舱船似乎不适合在一架日军飞机四处乱跑时，搭载着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大部分高级军官出行。然而麦克阿瑟却不以为意，让我指引船只继续向海滩行进。我只好照做。几分钟之后，一架形单影只的飞机从我们的头顶呼啸而过，继续朝着荷兰迪亚的方向飞去。回想起这次事件以及其他的类似经历，我从不会感觉这是麦克阿瑟虚张声势的表现，而是感觉他就是命运使者，因此从不需要未雨绸缪。”

三名副官之中，其中一名蜷缩在小船甲板上的人便是埃格伯格医生。他可不认为自己是什么命运使者，所以急需采取防御措施。不过，一到洪堡湾海岸，出于对自己负责照顾的这个“病人”身体情况的担忧，他的不安很快就烟消云散了。当时，作为一行人中年纪最大的成员，64岁的将军已经精神抖擞地徒步走了3个小时。军医注意到，虽然紧跟在他身后的其他人已经“气喘吁吁”了，但将军不仅没有气短，甚至在赤道地区的高温下连汗都没怎么出。后来麦克阿瑟也曾谈起过新几内亚“炙热的太阳和瓢泼的大雨”，以及“错综复杂的雨林和无法通行的山中小径”，但他描述的都是摆在他人面前的困难。他本人似乎就没怎么受到天气的影响。返回“纳什维尔”号之后，艾克尔伯格注意到：“我的制服已经湿透了，上面满是深色的水渍。我记得自己惊讶地发现将军在闷热的天气和剧烈的运动中竟然一点儿汗都没有出。”作为来自俄亥俄州一个小镇的男孩，艾克尔伯格对冰激凌有着抑制不住的喜爱，就连成年后也念念不忘。让他备感欣喜的时，麦克阿瑟为了庆祝一行人返回巡洋舰，从船上的锁柜中取出了一个装满巧克力冰激凌汽水的托盘。“在我风卷残云般地喝完自己那一份后，”艾克尔伯格写道，“这位盟军指挥官露齿一笑，把自己手中没有动过的冰杯也递到了我的手中。我便把那一杯汽水也一饮而尽了。”

喝到最后一口时，他差一点儿就要呛出来了。将军已经开始口若悬河地对着参谋讲了起来，说荷兰迪亚只不过是他打算划出来的几块地界中的第一个目标。他大声地自言自语道，既然敌军如今已经乱了阵脚，为什么不再向西跃进120英里，占领敌人在瓦克德岛上建立的机场，然后再继续跃进至海尔芬克湾，也就是新几内亚最大的入海口所在地比亚克岛呢？肯尼兴致高昂——他写道："菲律宾几个月前还远在天边。"不过他是"纳什维尔"号的军官室里唯一一个听得入迷的人。据巴贝回忆，克鲁格"态度并不明朗"，而艾克尔伯格则"竭尽全力地反对这个主意"。不过，那时他们已经知道自己的反对会遭到无视了，克鲁格和艾克尔伯格在绘图板上展开新的地图时，将军已经返回莫尔兹比港，在走廊上来回踱步，计划着应该期待从两个人身上分别得到些什么。

将军不在的这段时间里，荷兰迪亚被改建成了一座主要的基地，而工兵们建起的一座建筑也成了麦克阿瑟传奇的一部分。据肯尼回忆，自己吩咐副官"给我建几座楼出来，因为我打算等通信和房屋都齐备之后尽快把整个总部都从布里斯班迁过来"。与此同时，艾克尔伯格也注意到，"最高司令部的高级军官们一个接一个地从布里斯班飞抵这里，安顿了下来"。他们声称，如果麦克阿瑟的空军司令有权入住新房的话，那么最高司令麦克阿瑟也应该在荷兰迪亚拥有一个与他的军阶相称的家。于是他们下令建起了三座用木瓦和纤维板建筑的连体预制板房，并把它们全都刷成了白色。随后，几位副官在里面装饰了从澳大利亚运来的地毯和家具。

完工后的官邸十分引人注目。艾克尔伯格在视察过后用嫉妒的语气写道："我真希望他会喜欢自己的新家。"如果麦克阿瑟不喜欢这座官邸，那他也未免太难取悦了。房子坐落在森塔尼湖畔一座海拔6 000英尺的山的斜坡上，可以俯瞰碧蓝的湖水。肯尼回忆："新几内亚中部茂密的绿色山林在其背后形成了坐拥山峰、沟谷和雨林的背景，看上去甚

至有几分不真实的感觉。圆锥形的绿色小岛点缀着湖面，当地居民的高脚住宅紧贴着湖岸。营地的正后方2英里处还流淌着一帘500英尺高的瀑布，更增加了画面的完整性，看上去就像是从漆黑幽静的库克罗普斯山中央直接喷涌出来似的，山顶总是被乌黑的雨云覆盖。我在新几内亚住过的众多地方中，荷兰迪亚是我最喜欢的。”

美军士兵们也很喜欢这里，而这就是问题所在。一位军官回忆：“坐落在美丽的山坡上，那座白色的建筑看上去就像是湖岸边最美好的事物，战地记者们都拿它来大做文章。”西南太平洋到处都流传着有关这座官邸的故事，且情节随之演变成了“防空洞里的道格的白宫”和他“俯瞰梦幻森塔尼的华丽别墅”，大大挫伤了人们购买战争债券的欲望。流言传到布里斯班后，琼给丈夫写去了一封信：“等我到了马尼拉，我想要看一看你为我建造的那座房子——那座应该给我居住的豪宅！”没有记录显示他回复了这封来信，也没有史料记载他是否知道传闻中提到服侍他的都是一群穿着制服的步兵。事实上，没有证据证明他对这座预制板房有过任何的想法。他的办公室日记显示他只在这里住过四个晚上。如果说建造这样的住宅是件伤风败俗之事，那么罪责就应该归咎于他的属下，而不是他。

与此同时，有关他的参谋长与墨尔本的一位美丽情妇私通的传言也闹得沸沸扬扬。这话并不假。她的丈夫是一位澳大利亚军官，此时正在中东参战。据埃格伯格医生回忆，她“一路睡到了顶层”。她从没有和任何一位列兵有过私情，而是从初级军官开始下手，沿着军阶向上爬，直到引诱到萨瑟兰，从他手中获得了陆军妇女队上尉一职。她并不是荷兰迪亚的唯一一个女子——肯尼和迪克·马歇尔在澳大利亚也有秘书——但和其他人不一样的是，她并没有办公室工作的技能。她既不会打字，也不会听写，甚至连提交报告都不会。“萨瑟兰每晚都要和她享鱼水之欢。”他的一位属下说，“我们不知道还能怎么安置她，就给了她一份接待员的工作。”一天早上，麦克阿瑟惊讶地看到她端着一个小托盘分发果汁。当他开口询问一个解释时，有人告诉他这个澳大利亚女孩可以被

模糊地形容为“代理女服务员”——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此话并不假。他看上去更加目瞪口呆了，好像马上就要脱口而出下达指令。可他克制住了自己，也许是因为他知道他们很快就要迁移到赤道北边的地区了，而他和堪培拉方面早已协商好，澳大利亚女子或士兵都不能随行前往那里。他从未想过自己的参谋长会蔑视自己与科廷之间的协议。不过他没有发表任何评论，从此没有再提起这件事情。

他之所以对在自己眼皮底下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视而不见，还有三个原因。首先，他认为自己的属下对他足够忠诚，就像他一心为他们着想一样。其次，他的属下都是真心地害怕萨瑟兰，其畏惧之心就像是尼克松的雇员们畏惧幕僚长H. R. 海德曼那样，何况萨瑟兰和海德曼还颇有几分相似。两人都称自己为“老头的小王八羔子”，对待任何招惹他们的人从来不留情面，而且——这话可以被他们用来为自己辩护——都为力避与人正面交锋的上司充当着避雷针的角色。

而第三个原因是，麦克阿瑟这几个月来一直都在全神贯注地钻研如何歼灭或围剿挡在他与自己最宝贵的目标（菲律宾）之间的日本卫戍部队这件事情上。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他不得不创造兵法中前所未见的新型攻击理念。如果真有“战争艺术”这种东西的话（他对此从不怀疑），他如今的表现已然堪称一位艺术大师了。运用20世纪技术的最新发展，他熟练地以一座岛屿或海岸基地为轴，躲避敌军集结的区域，从一座机场弹跳到另一座机场，利用日本人的固执与刻板来扰乱他们的防御，掩护自己的侧翼，避免遭遇和布纳战役、塔拉瓦战役一样的血战。

绕过汉萨海湾的行动于6月15日上演。7月底，当驻守在新几内亚“秃鹰”头部多贝拉伊半岛靠西的桑萨波的敌军惊觉自己也遭到了忽视时，以保卫莫尔兹比为开端的这场战役应该说到此就结束了。虽然将军是这样宣布的，但他对此的看法并不正确。正如艾克尔伯格所预言的那样，比亚克岛的战况异常艰难。麦克阿瑟曾在6月1日发布的官报中声称，驻守该岛的敌军已然“瓦解”。两天后，他又宣布“肃清行动”已经排

上日程。事实上，那里的战役当时已经陷入僵局。日军卫戍部队的指挥官葛目直幸大佐手下有1万精兵，是威洛比预期的5倍。而且，葛目还发现了这场战争中最势不可当的一件事。在比亚克岛战役之前，日军指挥官试图在海滩上击败盟军突袭部队，但那里的守军很难抵挡美国海军的炮火。于是葛目命自己的属下藏进了山区和河谷的山洞中。结果，比亚克岛上的日军就这样负隅抵抗，一直坚持到了8月初，而身处塞班岛、贝里琉岛、硫磺岛和冲绳岛上的日军指挥官也纷纷效仿这位大佐的做法。

麦克阿瑟本希望能将比亚克的机场跑道借给尼米兹发动塞班计划。为此，他对这一想法的搁置感到格外恼怒。菲律宾海战让日军在塞班岛附近损失了480架飞机，不过这是在没有他参与的情况下打响的。在海军陆战队占领岛屿之后，东条政府不出意料地轰然倒台，然而将军却没有为此取得获得任何战功，尽管后来缴获的记录显示，让东京方面更为忧心的是麦克阿瑟的攻势而非尼米兹的炮火。即便如此，西南太平洋战区的功绩依旧十分卓越。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将军向前推进了接近2 000英里的距离，其中有1 100英里都是在刚刚过去的两个月中向前迈进的。在胜利似乎遥遥无期的时候，他在芬什港策划了这一宏伟蓝图，而这一蓝图最后几乎是分毫不差、按部就班地展开的。如今，他的下属们都怀疑他是否拥有超能力，而关于这一点他自然也不曾否认。海军中将A. W. 菲奇回忆起在荷兰迪亚时一段醍醐灌顶的经历。麦克阿瑟坐在活动板房的小平台一侧，对着好似在教室里围坐成半圆的属下做简报。突然间，他们听到了熟悉的零式战斗机扫射的声音。所有人都以为将军会趴倒在地板上。但就在飞机呼啸而过后，他们抬起头来观察四周时，却发现将军如同正在赐福的教皇一样稳坐在那里。“还没到时候，先生们。”他严肃地说道，“还没到时候。”

将军直到1944年8月30日才将自己的总部迁到荷兰迪亚。在此之

前，他在伦农酒店或莫尔兹比港小屋里接待过各种各样的贵宾。不过，乔治·马歇尔在这两处都不太受欢迎。开罗“六分仪”会议过后，马歇尔飞往了澳大利亚。用福里斯特·波格的话来说，他“认为亲眼看一看太平洋的局势十分重要”，并且“想要向麦克阿瑟展示一下，他并没有被人遗忘”。在马歇尔看来，这可不是一个小的举动。这位参谋长甚至都没有告诉罗斯福自己计划前往澳大利亚，因为总统肯定会以情势过于危险为由禁止他过去。除此之外，在喷气式飞机问世之前的那段日子里，长时间乘坐C–54运输机是一件很累人的事情——其中从锡兰岛出发的最后一程就要跨越3 400英里的距离，耗时15小时。等他到达澳大利亚时才发现，已经在布里斯班停留了6周的麦克阿瑟居然选在这个时间飞去了新几内亚。将军手下的一位副官劳埃德·A. “拉里”·莱尔巴斯上校前来迎接马歇尔乘坐的C–54运输机，带领这位尊贵的客人冲浪，然后又徒劳地开着吉普车追赶袋鼠。

在古迪纳夫岛上，两名四星上将终于像谈判调停的对手一样坐下来吃了顿午饭。古迪纳夫岛位于布纳和米尔恩湾中间，邻近巴布亚海岸。马歇尔认为冲浪游泳和追捕袋鼠都是在浪费他的时间，心情极其不悦，而招待他的主人表情也很呆板。因此，没有任何文献资料记录了两人在“二战”中唯一见面的这场午餐会。麦克阿瑟告诉自己的一位参谋：“他是永远也不肯单独见我的，总是想方设法让别人也在场。”尽管我们很难弄明白两人为何要对这种事情如此上心，但是事实的确如此。虽然麦克阿瑟从未信任过这个曾任自己属下的男人，但还是在读到史汀生的一段日记时大吃一惊。其中提到，在一次联席参谋长的会议中，听到金上将猛烈抨击麦克阿瑟的言论，“马歇尔终于拍着桌子开口对他说道：‘我是不会允许会议带着这样仇恨的情绪继续下去的。’金这才闭上了嘴”。

波格记得马歇尔参谋长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战场上有陈纳德，西南太平洋战场上有麦克阿瑟，我的这两员大将脾气都有些喜怒无常。”不过，马歇尔此话可能会惹得麦克阿瑟感觉对方就是无法与他相

容。在古迪纳夫岛享用完这顿午餐之后，这位主人一度开口说道："我的参谋——"马歇尔打断了他的话："你没有参谋，将军。你有的是宠臣。"这话没有错，同样没错的是，参谋长在日军进攻珍珠港的时候去了马场骑马，而老练的军官们却从来没有提醒他。

考虑到将军对于海军的憎恶，除却金之外的大部分海军上将都和将军意气相投的事实不禁让人感觉有些古怪。1944年10月的《新共和》杂志刊文提到，"哈尔西和尼米兹在对待变化莫测的将军时都表现出了无尽的耐心"。作为太平洋上的另一位最高司令，尼米兹有时也会引起将军的愤慨。（每逢这个时候，将军都会拖着长音把他的名字念作"尼—米兹"。）和马歇尔不同，他没有自愿去过澳大利亚。尽管如此，当国务卿诺克斯告诉他，如果他能够和将军见上一面，自己将"非常高兴"时，他还是在荷兰迪亚进攻行动启动的4周之前飞了过去，和将军进行了一次顺利的会晤。给两位参谋开会时，尼米兹谈及自己和将军时这样说道："那个情形让我想起了两个陷入疯狂忧虑的男人在酒店走廊上踱步的故事。其中一人转过头来对另一人说道，'你在担心些什么？'另一人回答，'我是个医生。我的房间里有个戴木腿的病人。我把那木腿拆了下来，却再也装不回去了。'提问的人回应道，'啊，好家伙。我真希望那也是我所担心的一切。我的房间里有一个劈开双腿的女孩，可我却想不起房间号了。'"麦克阿瑟大笑起来。

不过，将军最喜欢的海军上将还是哈尔西，毕竟他成就了马歇尔和尼米兹从未做到过的一些事情。他经受住了麦克阿瑟严厉的意志测试，获得了成功，从而保住了他的尊重。事情发生在阿德默勒尔蒂群岛的锚地马努斯岛。海军计划在那里实施一次基地扩张行动。工程营的士兵们修建好基地之后，海军方面想要进行一次测试。麦克阿瑟愤怒得脸发红，这座岛屿处于他的战区之内，而且是他的士兵们夺取下来的。哈尔西在应他的要求赶过来之后发现，他的身边围绕着一群紧张兮兮的参谋。"还没等他开口说出一个字，"上将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我就看出麦克阿瑟正努力压抑着心中的怒火。"他继续写道："和我不一样，

强烈的情感并没有让他破口大骂。”注他无须这么做，咒骂只会玷污他的口才。将军表示，他“不打算顺从地屈服于这样的干涉行动”。等他说完，上将紧张地答复道：“如果将军占领这条战线，将会妨碍战争时期的努力。”哈尔西事后回忆道，自己发现那群参谋“倒吸了一口冷气”。“我猜想他们可能从未听到过有人站在‘审判宝座’的对面用这样的语气和他说过话。争执就这样延续到了第二天，直到麦克阿瑟突然给了我一个充满魅力的微笑，并开口说了一句：‘你赢了，比尔（威廉·哈尔西）。’”

麦克阿瑟在莫尔兹比接待的大部分客人都是盟军军官，但有时也会有政客贵宾光临。随着1944年总统竞选的临近，一些政客也纷至沓来。1943年9月的第二周，他和5位美国参议员共进了一顿晚餐。要不是他拒绝了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在同一个月前来拜访莫尔兹比的要求，这一事件可能也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总统夫人正在美国各大医院、部队、红十字兵舍巡回视察。8月初，将军曾收到过富兰克林·罗斯福寄来的一封私人信件，信中提道：“如你所知，罗斯福夫人即将启程前往西南太平洋。我很高兴她能够前去探望你。当然，她也迫不及待地想要看看一切……我认为罗斯福太太若是能前去探访陆、海军全体人员，将有助于提高部队的士气。”但麦克阿瑟并不开心。第二天，艾克尔伯格在给妻子写去的信中提道：“我感到很意外。当时我正坐在总部的大飞机上赶往城里（布里斯班）……昨天正午时分，小鸟（萨瑟兰）打电话来说最高司令想要见我。乍一听这个消息，我整个人都兴奋起来……可是提问之后我才发现……这一切都和某位贵宾的到访有关。”这位贵宾就是第一夫人，艾克尔伯格被选中作为她的主要接待人，而他们派他此次前去就是为了让他接受充分训练，了解各项礼仪和旅行安排，熟记各类应该避免的话题。

身穿红十字制服的第一夫人乘坐的“太平洋231航班”到达之后，哈尔西和琼·麦克阿瑟为了表达对她的敬意分别举办了两次晚宴，进展都十分顺利。一些佩戴着“麦克阿瑟参选总统”徽章的观众也被说服摘掉了

徽章。身为共和党人并对富兰克林·罗斯福颇有微词的艾克尔伯格却被第一夫人深深迷住了。他记录下了罗斯福夫人某一时刻是如何“从吉普车上走下来，走到每一辆卡车边和闷闷不乐的士兵们交谈。她介绍了自己，还询问她可以为他们捎些什么口信回家。我猜……很多人都很难理解，每一位身在异乡的士兵无论是生病、受伤还是身体健康，在看到美国总统的妻子与自己近在咫尺时，心中是怎样一番暖洋洋的感受。这能让早已远离童年的他们在面临未来无法预知的危险时，莫名感觉自己还是有人惦念而分外安心的。也许，从某些神秘的角度来看（我不想让自己听上去太过于情绪化），罗斯福太太充当了他母亲的角色”。

为丈夫担任代理的琼彬彬有礼地表达了他对自己无法从莫尔兹比港抽身前来的歉意。尽管如此，他的缺席还是有些惹眼，为他招致了许多非议。火上浇油的是，在一场午宴的过程中，一位澳大利亚外交官的妻子竟然毫不婉转地脱口而出：“是不是很棒？我听说麦克阿瑟将军要参选美国总统了。”琼事后告诉厄尔·H.　　布莱克，她当时“真的打了个哆嗦”，但“身经百战的勇者罗斯福太太只字未提，继续和他们聊了起来，好像她根本就没有听到这句话似的”。要是麦克阿瑟在场，肯定有办法为妻子化解尴尬。麦克阿瑟晚年时解释此事的理由未免有些牵强：“我身在前线，派遣艾克尔伯格将军在澳大利亚接待罗斯福夫人。她想要到新几内亚来，但我认为这太过于危险。我们都是老朋友了。因而她也欣然接受了我的拒绝。”这都是些搪塞之词。那时的布里斯班其实不比莫尔兹比安全多少。最有可能的解释是——诚然，这也是唯一解释得通的理由——将军并不希望和她出现在同一张照片里，因为他的名字很有可能会出现在与她丈夫下一年竞选的选票上。

乔治·埃内斯特·让·马里·布朗热是19世纪80年代的一位怀有政治野心的法国将军。在公共场合出现时，他总是骑着一匹高头大马。尽管他的野心从未实现过，却留下了一个名词，被用来形容那些想要取得政府

控制权的军官——“军事独裁者”。鉴于麦克阿瑟从未梦想过要用计谋在选举过程中取胜，将这个名词用在他身上可谓是既不公平，也不准确。但就像布朗热一样，他是一位颇受欢迎的英雄，拥有无可挑剔的军事成就，一心想要领导自己的国家。和这位法国将领相似，他也是个蹩脚的政治家。除此之外，他在笼络支持者方面也十分不走运。也就是说，错的人总是为了错的理由支持着他。

不过，将军的第一位支持者范登堡并没有做错什么。彼时这位参议员在国会山上可谓一号大人物。作为一位真正的保守党人，在战争打响之前，他还曾凭借自身实力成为总统候选人。然而，在珍珠港事件爆发之前，他一直都是位激进的孤立主义者。深知自己永远也无法打败罗斯福，他便开始四处寻找能够与对方匹敌的人选。就在一位名叫汉密尔顿·菲什的纽约共和党国会议员发文谴责战争部禁止军官竞选公职时，他开始认真考虑推举将军为共和党的领袖。范登堡告诉一位记者，他相信这项规定用意就在将麦克阿瑟“排除在总统竞选之外”。这是反对党领导人对政府使的小把戏。他还没有认真考虑过这件事情，但就在他快要把它忘记的时候却收到了将军的一封来信。信中写道：“我万分感激你的友好态度。我只希望自己某一天能够报答你的好意。我有很多话想要对你说，却在这种情势下无法开口。”他还意味深长地补充了一句：“与此同时，我想让你知道，在你熟稔的明智指导下，我感觉信心十足。”

简而言之，“巴吉斯愿意”（《大卫·科波菲尔》中的一句表白台词）。参议员范登堡意识到了他也患上了“波托马克热”（喻指华盛顿的竞选疯狂），于是便着手行动起来。1943年6月，他和前来华盛顿与五角大楼方面交换意见的威洛比吃了一顿饭。威洛比帮他联系上了萨瑟兰、莱尔巴斯以及莫尔兹比参谋中的两名新成员——出身于威斯康星政客家庭的菲利普·拉福莱特中校和20世纪30年代末之前一直都在马尼拉担任律师的考特尼·惠特尼上校。参议员为《科利尔》杂志书写了一篇文章，题为“我为什么要支持麦克阿瑟”，并列举出了一长串欣赏将军政治潜能的共和党人名单——罗伯特·伍德、约翰·D. M. 汉密尔顿、凯尔·

帕尔梅、罗伊·霍华德、小约瑟夫·N. 皮尤、弗兰克·甘尼特、威廉·伦道夫·赫斯特、伯蒂·麦考密克以及茜茜和约瑟夫·M. 帕特森。众议员菲什也在拉拢其他议员。将军最坚定的支持者是农业区的战前中立主义者。他们厌恶欧洲，尤其是英国，并把日本人视为比德国人更加危险的民族。他们曾是伍德的“美国至上”运动组织的热心成员，被他拥护麦克阿瑟参选的行为深深打动。正如理查德·H. 罗维尔和小阿瑟·M. 施莱辛格颇有见解的评论中所提到的那样：“几片大洋之中，太平洋一直都是美国孤立主义者的最爱：其中一部分原因很简单，太平洋不是大西洋……太平洋在这个世纪已经变成了共和党的大洋，而大西洋则是民主党的大洋。”

1943年6月13日，艾克尔伯格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最高司令和我谈起了共和党提名的事情——我能看出他期望得到提名，而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这样想的。”与此同时，华盛顿方面，莱希上将焦急地注意到，“只要麦克阿瑟将军获得提名，就势必会成为所有人危险的敌手，包括罗斯福在内”。纵然此事只不过是一小撮得势派在叫嚣，但已有不少人在试着涌上去了，其中有些人的身份还很特殊。正如阿瑟·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撰文告诉读者的那样，麦考密克的《芝加哥论坛报》的认可是伊利诺伊州的不负责任。欧内斯特·K. 林德利在《新闻周刊》中写道：“麦克阿瑟已经成了共和党内的极端反动分子、孤立主义者或极端民族主义领导人的政治聚焦点。”而约翰·麦卡顿也在《美国信使》杂志中评论道：“这也许不是麦克阿瑟的错，但无疑是他太不走运，才会让政治右翼以及其中最厚颜无耻的极端分子全都跑来为他捧场。”

诚然，正如《时代周刊》所指出的那样，这些人当中也有不少左翼的极端分子，其发言人攻击将军是一个“法西斯主义者”，是“极端种族主义顽固分子的工具”，甚至莫名其妙地把他和血汗工厂、雇用童工、佛朗哥以及德美联盟联系在一起。知识界的许多人都把他视为真正的威胁。《信使》撰文预测，一场风暴即将到来。艾克尔伯格在给埃玛小姐的信中也提到，将军说自己“从没有读到过这种谎言和失实的陈述”，并

将其视为“自己必须承受的一种磨难”。后来，范登堡发现军队图书馆中一些没脑筋的官僚推荐士兵们阅读麦卡顿的文章。他严厉批判了战争部纵容这种“诽谤”这位最伟大的军队领导人的行为，而麦克阿瑟本人也要求不让士兵们接触这份杂志。于是五角大楼方面又倒向了另一个极端：伦敦《每日快报》的沃尔特·卢卡斯针对麦克阿瑟参选一事为《哈珀斯杂志》撰写的深入分析文章也被军队图书馆以“安全”为理由压制了下来。

罗斯福带着一贯的讽刺超然态度观察着这一切。他身边的人向他报告，每一家书店都有一座小小的“圣坛”，用来摆放麦克阿瑟的自传，且阻止军官参与公共选举的禁令也十分不得人心——富兰克林·罗斯福立即废除了这条禁令。民意测验专家发现，如今的选民对麦克阿瑟的看法分为两派，用埃尔莫·罗珀的话来说，“大部分人都很敬仰他，把他视为一位伟大的将军，但只有一小部分人对他作为政坛领袖的能力怀有信念”。鉴于自己也下了同样的结论，总统对这样的结果表示十分高兴。除此之外，总统还告诉一位助理，他已经不再把麦克阿瑟视为国家的危险人物了。尽管如此，将军对他来说还是不容小觑的。他预测，如果将军赢得了提名，势必会提出以太平洋为先的政纲。因此，罗斯福吩咐自己的海军副官复制了几份麦克阿瑟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天提交的报告。将军在报告中重申了万一日军发起进攻、自己能够守住菲律宾的信念，并补充提到自己的估计是基于“敌人无力在我们的群岛上发起空袭”这一情况之上的。

既然双方都已经装备好了弹药，这场罗斯福–麦克阿瑟竞选必定会充满艰难险阻，甚至有可能变得肮脏无比。然而，罗斯福却确信事情不会发展到那一步。坐在扶手椅上，他像往常一样忖度着自己访客的心态。是乔治·肯尼来了。他希望能够找出些迹象，看清政坛的主流风势正在往哪个方向吹。不过，富兰克林·罗斯福知道他对将军的忠心，于是就太平洋地理的话题为他做了一番演讲——肯尼惊讶地发现，他说得十分准确。总统还询问了麦克阿瑟的健康情况。肯尼评论道：“他无疑

十分敬佩将军的所作所为，还在对话中几次着重强调了这一点。”在白宫发出一条增加发往西南太平洋的供应物资的命令后，麦克阿瑟向总统发去了越来越多的安抚。这一点直到科廷向总统本人致电时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位澳大利亚总理说道：“总统先生，这诚然不关我的事，而我可能也不该这么说，但我可以向你完全诚实地保证……麦克阿瑟将军想要和你争夺总统职位的野心还不及我强烈。他已经跟我说过不下十几次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飞快地转过身来，一边抛撒着手中的文件一边尖叫道：“史蒂夫！史蒂夫！”史蒂夫·厄尔利急匆匆地走了进来。总统让科廷再重复一遍他所说的话。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总理告诉麦克阿瑟：“我相信总统每晚上床睡觉之前肯定都会查看自己的床下，确认你不在那里。”

正如罗斯福所想的那样，将军对此感到很高兴。他从未梦想过自己能通过科廷、肯尼以及运往澳大利亚方向的货船来操控时局。但即便是一个不如麦克阿瑟那样自负的人也会为此感到受宠若惊。战时的总统竟然会担心将军的身体健康，还决意要为他提供所需的一切设备。在听说他对自己的职位没有兴趣之后，总统如释重负的心情简直是无以言表。当然了，富兰克林·罗斯福从没有一刻相信麦克阿瑟对总统之位没有觊觎之心。但他知道，在静候他的同时，满足他的虚荣心或是假装成他的一个支持者不会让自己损失什么，也不至于让自己犯下什么大错。

范登堡向麦克阿瑟提议，最明智的路线是采取“让我们继续战争”的立场。他的确是这么做的，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就。科廷倒是真的相信他对入主白宫没有兴趣。1944年年初的一个晚上，住在伦农酒店里的肯尼也相信了将军的话。他对将军说，他希望自己某天能和将军一起走在东京的主干道上，而“不愿苦想一个在1944年输给了罗斯福的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情”。将军笑着答道：“别担心。我不想掺和政治的事情。我心中的首要任务就是解放菲律宾人民，践行美国对那里的人民许下的誓言。”和他关系很亲近的记者弗雷泽·“斯派克”·亨特也相信，升任总统的话题对他来说是“不请自来”且“十分尴尬”的。就连他和范登堡之间的中

间人后来也试图自圆其说："整件事情都是一场误会。"惠特尼写道，最高司令"从未认真地考虑过"自己的仕途，而威洛比也说将军关心的只有"军人的身份"。

在自己的回忆录中，麦克阿瑟只是轻描淡写地写了一句："大约这个时候，我才意识到自己的名字被随随便便地列在了美国潜在的总统候选人名单中。"他在和艾克尔伯格交谈时倒是相对诚实一些。后者事后这样写道："他和我谈起过好几次参选总统的事情，但在承认自己的渴望时总是会说，如果不是出于仇恨或对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厌恶之情，他是不会想要那个职位的。"还有其他的证据能够证明他当时真实的态度。雷蒙德·克拉珀在采访他后，通过电报发回了一篇报道，其中提到将军愿意接受共和党的提名，麦克阿瑟对此并没有表示否认。后来，《纽约时报》的特纳·卡特利奇还"发现他有些嫉妒罗斯福"。将军和每一位为他大肆宣传的公众人物都保持着频繁的书信往来，就连小城镇的共和党俱乐部也不例外。不过，埃格伯格医生的继任者莫尔豪斯医生的命运倒是有些奇妙。正如悉尼·赫夫所说的那样："莫尔豪斯少校回美国探望自己生病的母亲……当一位报纸记者向他询问麦克阿瑟是否有意愿入主白宫时，他回答的大意是这样的：'不，他是一名军人，还想要在东京的街头游行呢。'"虽说莫尔豪斯也是个自命不凡的军人，而且从科雷希多岛以来一直跟随麦克阿瑟，但他很快就被撵出了他的办公室，并被切断了与麦克阿瑟之间的联系。赫夫总结道，竞选总统的"主意并没有让麦克阿瑟感到不开心"，而他目前又有了新的证据。这不过是件小事。赫夫想要短暂回国一趟。"你回国之后，"将军嘱咐他，"可要听仔细了。"这位副官猜测将军的意思是让他打听自己参选总统的威望如何。回来后他向将军汇报道："大家问我的一件事情是：'麦克阿瑟为什么总是拿着那支手杖？他的身体是不是很虚弱？'"事后赫夫评论道："也许当时我的汇报比自己想象的还要有用一些，因为将军再也没有拿过那支手杖。"

如果说没了手杖让他看起来缺乏了几分虚张声势的气势的话，那么

还有几样随身物品能够供他保留自己的戏剧化作风。这其中最特别的就是他手中越变越大的玉米烟斗和戴上之后显得高深莫测、劲头十足的墨镜。他鼓励报纸为他拍照；报纸的发行量越大，他就越愿意配合。迪勒和曾任报社记者的莱尔巴斯成了他属下中最繁忙的两个人，不仅要举办新闻发布会、安排采访，最具争议的是——还要变本加厉地严格审查记者们的发稿内容。他们鼓励记者们以麦克阿瑟的官报为蓝本进行创作，而随着美国总统初选的临近，这些官报的内容也开始如同新几内亚的雨林一般繁茂丰富。其中有些内容深深地冒犯了澳大利亚人。他们注意到，不管美国士兵什么时候上战场，其部队都会被称为“美军”，而只要有澳大利亚士兵参与战斗，部队就只会被称为“盟军”。海军陆战队利用《共和国战歌》编排的一个插科打诨的拙劣段子，其开头这样唱道：

我的眼睛看到麦克阿瑟的膝头摆着一本圣经。他正在为你我这样的人敲打着公报。

段子的结尾写道：

尽管这如今可能只是一则流言，

但有一天它会成为事实。

上帝会听到一个低沉的声音说道：

“让开，上帝，我是麦克。”

一天，将军告诉艾克尔伯格，他不明白艾森豪威尔手下将军们的照片为什么能够登上《时代周刊》和《生活》的封面，而他自己的战地指挥官却从来也没有在上面出现过。艾克尔伯格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这话逗得我笑了起来。”当然，正如美国读者对澳大利亚的布莱米的熟悉程度没有理由比对英国的蒙哥马利更胜一筹一样，他和克鲁格没有理由比布莱德雷和巴顿出名。然而，除了极少的几次例外，麦克阿瑟

的官报提及的全都是与麦克阿瑟有关的内容。在给埃玛小姐的信中，艾克尔伯格机灵地解释道：“将军不仅想成为一位伟大的战区指挥官，也想成为一位家喻户晓的著名前线战斗统帅。如果他手下的那些杰出战地指挥官得到了大肆宣传，这一点就很难做到了。”于是，他继续写道：“他让美国人民以为自己一直都在前线战斗。虽说这并不意味着他不赞许我的所作所为，或是没有给过我许多精神上的安慰。他只不过想要一个人独揽这些荣誉。除非有人能够理解他想要成为伟人……以及前线领袖的双重感受，否则是无法理解这种体制的。”

“他们害怕我，鲍勃（艾克尔伯格）。”麦克阿瑟对艾克尔伯格说，“因为他们知道我会在报纸上和他们做斗争。”所谓“他们”在他看来正是那些长久以来密谋在背后暗算他的一帮敌手。如今，这群密谋者中又加入了新的成员，托马斯·E. 杜威、温德尔·L. 威尔基和哈罗德·E. 史塔生——他们是他获取共和党提名过程中的主要竞争对手。他相信自己比他们要强得多，因为他把自己视为把控新闻方面的奇才。他之所以会这么认为，主要是基于自己在“一战”胜利前夕出任陆军最受欢迎公关人员时的表现。但当时的情形与现在完全不同，那时他刚刚开始向那些愿意相信他的华盛顿记者宣传征兵法。如今的他则是在向厌倦了迪勒与莱尔巴斯笨拙伎俩的战地记者们自荐。

就连麦克阿瑟的仰慕者也饱受审查制度之苦。肯尼写道，对上述的这两位“盲目崇拜麦克阿瑟到极点”的副官来说，“除非一篇新闻报道的内容能为将军的形象戴上一圈神圣的光环，送他坐上宇宙中最崇高的宝座，否则就必须被‘枪毙’。如果报道不是在全篇夸赞麦克阿瑟一贯正确的利好消息，那么就没有什么能够通过他们的审核……他们不信任记者能够正确解读麦克阿瑟的意图”。艾克尔伯格说自己“从来都不理解将军和他的副官创立的这套公关政策”。巴贝认为，“西南太平洋容不下两位杰出的军人”，因而媒体被要求只能把注意力集中在最高司令的身上，

而不许关注别人。一次，当将军大肆抱怨罗斯福是在“假装指挥陆海军首领”时，哈尔西评论道：“麦克阿瑟似乎患上了伟大幻想症。在哈尔西上将看来，这一弱点正好解释了将军与大多数媒体记者争执不断的原因。

诚然，试图操纵记者的计谋是无法奏效的。肯尼表示，“麦克阿瑟的宣传效果通常都不太好”。而埃格伯格也认为，“麦克阿瑟在媒体那里不太吃香”。记者和编辑们拒绝胡说八道，而读者们也感觉到自己被蒙蔽了。对将军来说，用钢铁般的意志来统领西南太平洋是一回事——这对他的祖国的奋斗目标和那些因他的才华而保住了性命的士兵来说是一大幸事，但拉拢选民就是另一回事了。他借口说，“麦克阿瑟竞选总统”行动完全是别人的意图，他自己完全没有兴趣放下指挥权，而这最终必定是要暴露的。正如詹姆斯·麦格雷戈·伯恩斯指出的那样，一切都仰仗支持者们“控制自己对将军的热情，让他的名字置身于总统初选之外，为他的每一步安排好时间，好让共和党大会召唤他前去执行更高的任务”。这一计划遭到了伊利诺伊州某个特别组织（由麦克阿瑟业余狂热支持者组成）的破坏——担任该组织领袖的一位杰出芝加哥律师将将军的名字推上了总统候选人名单的首位。沮丧的伍德给将军发去了一份声明，要求他签字申请把自己的名字撤出。但麦克阿瑟深信自己在祖国人民心目中的受欢迎程度，所以他是不会签字的。这样一来，所有人就都会知道将军首肯了自己参选的意愿。

很快，他的名字被印在了威斯康星的选票上。选票在到达伊利诺伊州之前，会先行在那里发放。此举被视为当年的关键初选，而那里同时也是麦克阿瑟的家乡。尽管其他候选人也加大了自己在那里的宣传力度，但将军认为凭借自身宣传政策所建立起来的高姿态，他势必会胜出。然而他输了。杜威一举夺魁，紧接着是史塔生，他和威尔基则仅仅分列第三、四名。相信自己扶持的候选人唯一的机会在于与对手打成平局的范登堡在看到杜威于威斯康星的领先态势后认输了。“胜负已定。”他说，“我已给澳大利亚方面写去了一封信，诚实地描述了这里的

情况。”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伊利诺伊州倒是给了将军一个获胜的机会。在初选投票过程中，他获得了76%的选票。《时代周刊》写道：“麦克阿瑟将军击败了一个在政治上默默无闻的人。”但这的确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对手是芝加哥的一位房地产商，其姓名除了被客户所知之外没有任何的意义，因而他可谓是政坛中的无名之辈。而同在初选名单中的杜威4年前也曾参选，并获得了86%的支持率。

那一刻，将军可能已经保住了自己的候选资格。在那个季度中，他赢得了一场又一场的军事胜利，而且杜威和很多共和党领导人都存在分歧。就在结果悬而未决之际，罗斯福的期望没有落空：麦克阿瑟的从政道路开始走向下坡。这都要归咎于将军频繁与别人保持书信往来的习惯。他的收信人之一是内布拉斯加州一名名为A. L. 米勒的古怪众议员。米勒还曾是狮子会的领袖。米勒在给他的信中写道：“除非能够废除新政，否则我们的美国式生活永远在劫难逃。”麦克阿瑟答复道：“我毫无保留地赞同你这些至理箴言及言语之中所展现的政治才华。”他还补充道，自己深受“当下混乱与混沌的丑恶情景”困扰。在另外一次的往来书信中，这位议员言语犀利地抨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并预言这样的“君主政体”若是再持续4年，定将“摧毁平民的权利”。将军对此也公开表示赞同。当米勒写信提出他需要“摧毁这一正在吞噬国家、摧毁自由企业和个人所有权利的暴政”时，麦克阿瑟对他寄来这封“颇有学者风度的书信”表示了感谢，补充道：“你对美国国情的描述有着真正清醒的认识，能够引起每一位真正爱国者的深思。”最后，将军又在这段高度盲目的对话中引入了另一个对参战国来说应该超越两党之争的话题。“在这里，我们正在利用手头仅有的资源做着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他写道，“不过，若是能有更多的军队供我调配，我将十分荣幸。”

4月14日，在没有事先征询麦克阿瑟或任何人的情况下，众议员米勒将所有的书信全都转交给了媒体。显然，他相信此举能够帮助他，不料反而揭穿了将军的真正意图。范登堡将这次的曝光称为一个“愚蠢而

又悲剧性的错误”；他表示，此举导致将军的候选人地位“无法站住脚跟”。身处澳大利亚的麦克阿瑟绝望地进行了反击，发表声明澄清他“从未打算公开”这些书信——这话无疑并不虚假。但他随即又稍显狡诈地补充了一句：“任何没有偏见的人在细读这些书信后都会明白，它们既没有政治意图，也没有对议员的观点表示全面认可。我完全否认有人把它们当作对某种政治理念或某位高层人物的批判的恶意解读……任何其他的解释都是对我本身意图的曲解。”

范登堡轻声告诉他，这样还不够好。他说，这件事并不是任何人的错——尽管他悲哀地和一位朋友评论道：“如果他没有写过这些书信，众议员米勒也就没得可用了。”但鉴于将军当时的声望，这一篇章势必会翻过去。4月30日，在占领荷兰迪亚之后，将军起草了一份庄重的声明，并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我要求不要以任何方式把我的名字与提名联系在一起。我既不觊觎也不接受提名。”在6月举行的共和党代表大会上，范登堡听说一位威斯康星州代表还是打算不顾一切地提出将军的名字。按照参议员的话来说，想到“只能得到一两票”将给美国最著名的军人带来“无法承受的羞辱”，他选择了说服代表大会的主席约瑟夫·W.“乔”·马丁在计票时强行跳过威斯康星州。但麦克阿瑟依旧没能逃过一劫，因为另一位代表为表示自己对马丁战术的厌恶和抗议投了将军一票。于是，最终的结果出来了：杜威获得1 056票，而麦克阿瑟却只获得了1票。

麦克阿瑟深感耻辱，却对范登堡的所作所为心怀感激，并原谅了那位内布拉斯加州众议员的行为，尽管并没有写信告诉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身边的一些人感觉将军不知为何认定罗斯福应该为这次不幸遭遇负责。他和总统之间的关系一直都错综复杂。在相距半个地球的情况下，误解也是不可避免的。总之，想让他们对彼此心存好感是不太可能的；他们都是自负之人，因而是不会为了真诚的友谊而屈服的。但他们

又彼此需要——作为两者中较为灵活变通的那一个，罗斯福总统对此表示认可。他决定在麦克阿瑟退出总统竞选之后到夏威夷与他会面。让联席参谋长们备感挫败的是，作为总统的军事顾问，他们在此期间只能留守华盛顿。尼米兹会代表海军出席这一次会面。作为权力掮客，这三个人将苦心想出击败日本人最明智的方法。毕竟，尽管政坛的波澜每4年就要起伏一次，日本人才是他们真正的敌人。

1944年7月21日星期五，就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于芝加哥决选投票中提名哈里·S.　杜鲁门为副总统候选人的那一天，罗斯福总统在圣迭戈登上了重型巡洋舰“巴尔的摩”号，在6艘驱逐舰和一支空中编队的护卫下向西驶去。经历了一天的航行之后，巡洋舰到达了珍珠港，而麦克阿瑟的B–17轰炸机也从4个时区之外的布里斯班起飞，朝着夏威夷的希卡姆机场飞去。在历时26个小时的飞行中，将军大部分时间都在走道里踱步，抱怨着：“为了政治合影和公费旅游的事情强迫我放下指挥棒简直是一种羞辱。”他说：“‘一战’时，我一刻都没有离开过自己的部队，就算被毒气所伤也会在医院里下达指令。我还从没有彻底丢下过自己的任务呢。”他只带了三名随行的军官，没有带上任何的文件，因为他说没有人告诉过他这次会议的目的，而且他甚至连其他与会者是谁都不清楚。事后他告诉布莱克，他其实“事先通过电报询问过会议的目的”和他所需携带的同行人员。答复很简洁：这次的会议属于“绝对机密，因而无法事先提供任何信息”，且他不需要携带任何属下。他表示，自己仅仅在两周前从乔治·马歇尔那里听说自己将受命到火奴鲁鲁会见“大人物先生”。

他早就应该猜出这位“大人物先生”是谁——在麦克阿瑟的眼中，还能有谁比他更重要呢？他会提到“政治……公费旅游”这样的话，也意味着他早就对眼下的时局和即将讨论的话题心知肚明。美国军事家们那年夏天在太平洋上面临的大问题就是，下一步打击的目标。麦克阿瑟想要

夺回菲律宾，可金却建议绕过菲律宾群岛，转而进攻台湾——他认为没有理由冒深陷群岛陆地的风险。这样的争执已经酝酿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年10月，艾克尔伯格就曾在夏威夷听说，一旦麦克阿瑟到达赤道地区，上将们就打算让这场对日战争成为“他们独一无二的表演”。这一决定已经不能再拖延了。对于即将到来的这场会面，麦克阿瑟也并非一直都在抱怨，他早些时候就曾申请飞往华盛顿为自己辩护。

颇具个性的将军将这次会面视为是自己与其他所有人之间的一场对抗。早在派遣他前往瓦胡岛的两周之前，马歇尔的话就曾指出“绕道和放弃并不是同义词”，并告诫他不要让“个人情感与菲律宾的政治考量”蒙蔽了他的判断，从而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念。事实上，罗斯福的军事顾问在这一话题上的分歧也十分严重。麦克阿瑟处于天平的一端，金则在另一端。太平洋三军的所有战地指挥官都倾向于站在将军这一边，而马歇尔和阿诺德则偏向于金——只不过个人的想法每周都在变化。火奴鲁鲁会议那一周，马歇尔开始转而支持麦克阿瑟。一心渴望占领台湾岛B–29轰炸机基地的阿诺德还在继续支持金的主张。尼米兹有些左右摇摆，于是指挥自己的下属为所有可能的目标（包括日本本土）一并做好突袭计划；在哈尔西的劝说下，他开始接受占领吕宋岛、跳过台湾岛、跃进至冲绳的计划。联席参谋长们的看法也反映了众人意见的混乱。4个月前，他们赞成于11月入侵棉兰老岛，如今又倾向于相信他们并不需要棉兰老岛。1945年2月，麦克阿瑟接到命令要为进攻吕宋岛做好准备，而尼米兹却在同一个月接到了登陆台湾岛的命令。

虽说罗斯福是个很有耐心的人，但这样的情形也不能无休止地发展下去。他对史汀生和诺克斯表示，自己知道五角大楼方面的看法，打算让自己的两位太平洋最高司令面对面地把问题说清楚。除了他们之外，出席夏威夷会议的唯一一位高级军官便是莱希。尽管参谋长们对此并不满意，却也无可非议。让总统与丘吉尔和斯大林商议、引诱他们采取这样或那样的行动是一回事，而让他和领命的美国军官讨论美国大陆的事情则是另一回事。如果他早已熟知五角大楼的看法，并和他们一样优柔

寡断，那么他也应该知道麦克阿瑟和尼米兹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将军事后告诉艾克尔伯格，他相信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动机是“纯粹政治性的”。哈里·霍普金斯和罗伯特·舍伍德同意他的看法，但大部分史学家都表示反对。塞缪尔·埃利奥特·莫里森是个例外。他写道，罗斯福希望“和太平洋陆、海军指挥官交换意见，如果有可能的话，还想与他们达成共识”。我们还是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总统在“巴尔的摩”号离开圣迭戈时便已经做好了决定。其实这已经是他第四次参选总统了。相比在民主党全国大会上高谈阔论政治话题的照片，同麦克阿瑟与尼米兹合影能给选民们留下更好的印象。尽管将军也许并不是共和党总统初选选民的第一选择，但他仍是一位民族英雄。如果在利用将军的知名度时临阵退缩，那么他就算不上一位出色的政治家。

罗斯福知道该如何器宇轩昂地出场。7月26日星期三下午3点，巡洋舰靠岸时，一大批早已得知他要到来的夏威夷民众已经聚集在了港口旁。尼米兹及其地面部队指挥官罗伯特·C. 理查德森中将率领50位高级军官登上了跳板。然而，麦克阿瑟的出场却更为戏剧化。尽管他的B–17轰炸机只不过早一个小时降落，但他还是去了一趟本该接待他却已经离家的理查德森的官邸，放下自己的野战背包，然后如他事后对布莱克所说的那样，舒舒服服地洗了个澡。当然，他的行李本该是由到场的勤务兵领取的，而这个澡也完全可以稍后再洗。但此举让他成了最后一个登上巡洋舰的军官。据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同行人员之一塞缪尔·I. 罗森曼回忆，罗斯福刚向尼米兹问完他是否知道将军身在何处，“耳边就传来了震耳欲聋的汽车鸣笛声”。“伴随摩托车疾驰至港口停下时发出的刺耳刹车声，我的眼前出现了生平见过最长的一辆敞篷汽车……只见汽车在空地上绕了一段路，停在了跳板前面。掌声停下之后，将军一个人迈着大步快速走向了跳板。他快步走上前来，半路还停下脚步回应再一次响起的喝彩声，然后迅速迈上甲板与总统打招呼。”

麦克阿瑟穿着肯尼送给他的那件飞行员皮夹克。莱希在《我在场》中写道：“我打趣地问他，‘道格拉斯，你来见我们的时候怎么不好好穿

衣服？’‘哦，你没看见我是从哪里来的。天上可冷了。’麦克阿瑟答道。”总统也加入了他们友善的玩笑中。大家一起走上岸，约定第二天早上花6个小时的时间视察瓦胡岛的防御。富兰克林·罗斯福说他想要一辆活动敞篷汽车，而且要亮红色的。尼米兹发现岛上只有两辆这样的汽车，其中一辆属于岛上的消防队队长，而另一辆则属于火奴鲁鲁最大妓院的女主人。这位女主人央求军官们征用她的汽车，但由于她的车会被旁观者认出来，所以他们最终还是选用了另一辆车。莱希坐在副驾驶座上，尼米兹则和罗斯福、麦克阿瑟一起挤在了后座上。总统和将军滔滔不绝地谈起话来。他们简要地讨论了一下“荷属东印度群岛”的问题。已经有好几位英国军官联系过将军，要求美军把夺回的印度群岛所有权移交给他们。他并不想那么做，因为正如莱希事后所写的那样，他相信“英国人一旦掌控了这些领土就很难再松口了”。罗斯福赞同了他的看法，并表示自己相信丘吉尔也会这么想的。随后，英国首相在电报中向麦克阿瑟证实了这一想法。㊟

当天和第二天下午，在将军应富兰克林·罗斯福的要求，陪同他率车队穿过火奴鲁鲁挤满热情群众的闹市区街道时，总统选举的话题不可避免地被提起来。麦克阿瑟首先说起了这个话题，询问罗斯福认为杜威在11月胜出的概率有多大。总统表示自己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考虑政治的事情。麦克阿瑟仰头笑了起来。过了一会儿，罗斯福也跟着笑了起来。他开口说道：“如果对抗德国的战争在选举前结束，我就不会再连任了。”说罢他似乎又改变了主意，继续说道：“如果这是我做的最后一件事的话，我会在奥尔巴尼击败那个浑蛋。”将军表示，自己虽不了解家乡的政治局面，但罗斯福“在军队中的受欢迎程度是势不可当的”。事后麦克阿瑟回忆：“这话似乎让他感到格外欢欣鼓舞。”总统的随行人员听到这话也十分高兴。在视察一所军队医院的过程中，发生了一件事，消除了将军对秋季大选的成见。当时，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军事助理埃德温·“老爹”沃森把将军拉到一旁唐突地问了一句：“你是站在我们这一边的还是反对我们的？”麦克阿瑟推诿着答道：“‘老爹’，我一直都在试图做正确的事情。”沃森用逼迫的语气继续问道：“战后你想要什么？做

菲律宾的总督吗？”将军答道：“‘老爹’，那个职位10年前就不复存在了。”可沃森还是不放弃：“那战争部部长怎么样？”麦克阿瑟回答：“我们还是等战争结束再谈论这些吧。”沃森退了一步说道：“没错，我们也是这么打算的。”

私下里，麦克阿瑟认为这段对话没有任何意义，因为他相信罗斯福根本就活不到目睹敌军投降的时候。总统惨白、憔悴的脸色让他感到很震惊。回到伦农酒店，他打算告诉琼“他只是我认识的那个人的躯壳”，然后戏剧化地伸出一只食指戳一戳埃格伯格，用嘶哑的声音耳语道：“医生，他的身上有着死亡的烙印！他不出6个月就要进棺材了。”这话并不假，但将死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同样是个不容小觑的人物。那天晚上，罗斯福在一座奶油色的石灰宅邸中设晚宴招待了自己的随从和各位将领。这座宅邸是从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霍姆斯的百万富翁那里借来的，可以俯瞰威基基海滩边翻滚的海浪。晚宴后，他把麦克阿瑟、尼米兹和莱希带进了隔壁的房间。只见房间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张巨幅太平洋地图。总统拿起一根竹制的指示棒，指了指地图上的几座岛屿，然后突然转过轮椅面对着将军。“好了，道格拉斯，”他挑衅地问道，“我们从这里出发要去哪儿？”麦克阿瑟也毫不留情地厉声答道：“棉兰老岛，总统先生。然后是莱特岛——之后是吕宋岛。”

他和尼米兹轮流在地图前振振有词地陈述了自己的情况。总统认真地倾听着，不时提出一个问题或推荐另一条思路。莱希认为“他机智地引导讨论从一个点发展到另一个点，缩小了麦克阿瑟与尼米兹之间的分歧，状态非常好”。撇开自己先前的疑虑，将军发现自己十分享受这个过程。他事后评论道，总统扮演了“主席”的角色，一直保持“完全中立”，而尼米兹也表现出了“绝佳的公平竞争”姿态。三人的讨论一直持续到了午夜，约定第二天上午10点半再继续。莱希明显看出，爽快温驯的尼米兹身上有三个不利因素。他缺乏将军雄辩的口才，一直在为金而不是自己说话；在富兰克林·罗斯福老练的提问下，他不仅承认了马尼拉湾对他也有用处，还承认了放弃吕宋岛、进攻台湾岛的战术只有在菲

律宾中南部建好锚地和战斗机跑道的情况下才能获胜。最后，他也并没有准备好或不愿意讨论一旦群岛被绕过将引发怎样的政治纠纷的问题。

这一点也是麦克阿瑟最犀利的论据。他表示，菲律宾人早已在1942年时意识到自己遭到了背叛（虽然他并没有道出自己也深有同感，但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此心知肚明），因而他们是不会原谅第二次背叛的。“我们必须信守誓言。”他铿锵有力地说道，表明他相信自己许下的率领解放部队重返的誓言也是美国许下的承诺。他还颇具威胁性地提到，金所提出的封锁是个“不祥之兆”，日军会“偷窃食物、让百姓忍受痛苦和饥饿”。也就是说，“东方人的思维”是无法理解他们的意图的。菲律宾人将美国视为他们的“母国”。把他们送到来势汹汹的入侵军队的刺刀前无疑“有损于美国的荣誉”。在战后的世界里，所有亚洲人的眼睛都会盯住崛起的菲律宾共和国。如果它的人民认为自己遭到了出卖，美国的声誉就将遭到玷污，并且永远也无法洗白。

他一次又一次地用到了“道德”与“不道德”、“美德”与“耻辱”这样的词。正如巴贝后来所写到的那样，和联席参谋长们相比，“麦克阿瑟将军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这件事情的”；“他认为这不仅是一个军事问题，也是一个道德问题”。不过，除此之外，“他认为武力攻占菲律宾不及攻占台湾更加耗时耗财、困难重重，反而能够达成同样的军事目的”。总统要求在这一点上得到他的再三保证。那年夏天，伤亡名单上的人数还在不断攀升；在最近的战斗中牺牲的人包括飞行员小约瑟夫·P.肯尼迪（肯尼迪总统的哥哥）、总统顾问哈里·霍普金斯的儿子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的儿子，后两者都是海军陆战队队员。公众对越战的理解永远不及对这场战争这样深刻。正如总统点明的那样，他和麦克阿瑟、尼米兹做出的决定是攸关上千美国青年生死的大事。他说：“道格拉斯，夺取吕宋岛会让我们付出难以承受的沉重损失。”

将军强有力地回绝了他的说法。“总统先生，”他讲道，“我的损失绝不会比他们过去付出的更多。正面进攻的日子应该结束了。现代的步

兵武器太过危险，只有平庸的指挥官才会发起正面进攻。好的指挥官是不会付出重大伤亡的代价的。”他进一步争辩道，吕宋岛相比台湾岛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因为一旦美军能够将其夺回，就能够控制中国南海700英里的广袤海面，切断日军与其南征部队之间的补给线。他还补充道，和台湾人不一样，菲律宾人能为美军提供强有力的游击队支持。最后，吕宋岛是无法被包围的，因为它的面积实在是太大。莱希在听到这一点时感觉自己看到尼米兹也点了点头。拉包尔和韦瓦克之所以可以被跳过是因为其大陆块较小。试图绕过吕宋岛将把美军的侧翼暴露在驻守于此的轰炸机基地前，必会招来猛烈的袭击。

据麦克阿瑟所说，某一时刻（具体是何时已经无法说清了），他和富兰克林·罗斯福单独相处了10分钟，引用了一段开场白，就金上将绕过菲律宾北部的计划警告对方：“一旦该计划被采用，群情激奋的美国人民一定会把对你的彻底厌恶之情全都投入到今年秋天的大选投票之中。”也许他是在返回卧室的途中做出这番危言耸听的评论的，但我们所能确定的结论只有，总统在聆听了麦克阿瑟长达3个小时的慷慨演说之后已经筋疲力尽。就寝前他对自己的军医说道：“在我上床之前给我一片阿司匹林。”他停顿了一下接着说道：“老实说，给我一片留着明天早上吃吧。我这辈子都没有听过别人像麦克阿瑟这样对我说话。”尽管如此，在第二天的会面于正午时分结束时，罗斯福看上去却似乎精神焕发。和其他战区的指挥官不同，麦克阿瑟和尼米兹都没有向他索要援兵。用莱希的话来说，他们发誓要“朝着歼灭日军的共同目标通力合作”。罗斯福的情绪十分高涨，甚至还试图拿将军开起了小玩笑。他招来摄影师之后，发现麦克阿瑟的裤边没有熨平。“你有没有看到我所看到的？”他轻快地对其中的一个人耳语道，“快——拍下来！”摄影师调整焦距时，将军一脸鄙夷地冷冷瞟了他的双腿一眼。

海军安排了一场具有当地特色的晚会，邀请了一支管弦乐队、一位

歌手和一位颇有天赋的草裙舞演员。总统让将军留下来观看晚会，可麦克阿瑟却说自己不得不返回总部。分别时他们之间具体说了些什么我们不得而知。回到布里斯班后，将军在对下属和朋友们讲述这件事情时至少说过两个版本。在其中的一个版本中，罗斯福说道："我们是不会绕开菲律宾的。继续你现有的计划吧。愿上帝保佑你。"而在另一个更加戏剧化的版本中，麦克阿瑟本以为自己已经输了，打算黯然离开，却被罗斯福叫了回来。"好吧，道格拉斯，你赢了！我要和那个老家伙厄尼·金（金上将的昵称）就此鏖战一番了。"

第二个版本的接受度更高一些。在向克拉克·李详述这个故事时，将军还补充道："你知道的，总统是个有着远见卓识的人——只要你把事情向他解释清楚。"罗慕洛兴高采烈地把这些话转告给了自己的同胞，说麦克阿瑟摆脱了不幸。艾克尔伯格在家书中提及，"萨拉"已经拜访过了"弗兰克表兄"，并且"又一次占据了优势……即将夺回菲律宾"。据莱希自己说，在将军离开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他靠过去对将军耳语了一句："我赞同你，道格拉斯。"罗伯特·舍伍德在权衡利弊之后也给出了同样的结论，即总统决定菲律宾群岛"在政治上"比台湾岛"更具有吸引力"，而另一位历史学家则相信"夏威夷珍珠港会谈的胜利让麦克阿瑟对自身反驳总统质疑的能力感到更加自信了"。

那年夏天，报刊甚至是某些记者也都认为争端已经在威基基海滩的会谈中得到了解决。麦克阿瑟飞离希卡姆机场后，富兰克林·罗斯福告诉记者："我们要夺回菲律宾。毫无疑问，麦克阿瑟将军将在这一行动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返回美国之后，他再一次在广播讲话中提到，他和"他的老朋友麦克阿瑟将军"进行了"极为有趣而又有益的会谈"，发现两人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同一天，他在致麦克阿瑟的信中写道："终有一天，马尼拉会升起胜利的旗帜——毫无疑问的是，我希望这面旗帜将是由你升起来的。"

不过，事情远不止这么简单。根据宪法的规定，罗斯福拥有凌驾于

五角大楼之上的绝对权力，但在实际操作中若是缺少了未随他一同前往夏威夷的军事顾问们的支持，他是无法行使这一权力的。实际上，他、麦克阿瑟和莱希形成了一个联盟，目标是和联席参谋长们谈判。可想而知，将军在会上的讲话展示了他抑制不住的乐观情绪，推测一个好的开始就意味着将来会诸事顺利，只剩下肃清行动。然而，事情还存在另一种更为引人入胜、颇具争议的可能性。这位坐镇白宫的决策者已经和明智的将军达成了一项秘密协议：罗斯福选择支持攻打吕宋岛的决议，而麦克阿瑟则在官报中巧妙地利用前线发回来的利好消息在即将到来的竞选中为他助力。将军无意间曾向艾克尔伯格透露，“华盛顿方面还没有解决到底是要借道吕宋岛还是台湾岛”。在第二次魁北克会议（“八角会议”）时，罗斯福曾给布里斯班方面写过一封信，言语之间仿佛是在说他和麦克阿瑟是一对同谋：“我希望你也在这儿。正如你我曾经讨论过的那样，你对英军在西南太平洋上的计划知之甚多……至于我军部队，情形和我们离开夏威夷时没有任何变化，不过也曾有人就你所不赞许的绕过菲律宾的提议做出过努力。不过情况还在我的掌握之中。”大选开始9天前，将军竟然宣布了莱特岛战役已经接近尾声，着实惊得记者们目瞪口呆。当他们提出异议时，麦克阿瑟的一位新闻官却在私下里告诉他们“大选几天之内就要拉开帷幕，因此有关菲律宾的消息必须持续被刊登在美国本土的报纸首页上”。拼凑各方证据，D. 克莱顿·詹姆斯总结道：“‘一项非正式的交易’也许已在珍珠港达成。无需用言语清晰地表达，麦克阿瑟发布的官报描绘了一幅美国在获得华盛顿方面与日俱增的支持下连连获胜的图景。罗斯福和麦克阿瑟都是头等聪明的阴谋家，所以这样的解读即便无法得到证实也并非是难以置信的。”

联席参谋长们不顾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反对，继续于八九月份争论有关“吕宋岛还是台湾岛”的话题，这一事实巩固了此番推测。莱希在为参谋长们简述威基基海滩会谈的情况时告诉他们，自己和罗斯福都被麦克阿瑟的政治和道德言论所感动。但参谋长们不为所动，仍旧坚持全然以军事功绩为基础决定此事。他们同意发动莱特岛登陆，但补充声明“是否要在进攻台湾岛之前夺取吕宋岛还需稍后再做定夺”。金仍然希

望利用蒋介石的基地派遣美军飞机对台湾岛南部发动登陆战。他声辩，进攻吕宋岛将使海军速度最快的航母舰队停滞至少6个星期的时间。麦克阿瑟在回复中表示，他只需要借用一艘小型护航航母几天的时间，就能够为“帕特”·凯西的岸基飞机准备好跑道。金随后有所动摇，但直到9月的最后一个周末才在尼米兹的说服下妥协。在两位上将于旧金山的会面过程中，尼米兹向他指出了蒋介石部队最近在抗日战争中的失利，并表示蒋的机场已经不能成为美军的依靠。尼米兹表示，除非先行夺取吕宋岛，否则进攻台湾岛的目标就是不可能实现的。返回华盛顿之后，金撤回了自己对麦克阿瑟的菲律宾计划（代号分别为“火枪手一号”“火枪手二号”和“火枪手三号”）的反对意见。金冷冰冰地表示，将军“和他的三个火枪手”可以去实现他对菲律宾人许下的自己还会回来的誓言了。

与此同时，麦克阿瑟还在思忖继续向北稳定推进的计划。由于每一次的两栖登陆推进都能够为下一次的行动提供机场，海滩上空永远都少不了肯尼派来的友军战斗机和轰炸机。在此原则之下，他们的计划还需要跃进至莫罗泰岛（9月15日）、棉兰老岛（11月15日）和莱特岛（12月20日）。趁着夏季还未过去，而金也尚未妥协之际，哈尔西上将提出了一个令将军备感振奋的建议——打破这个时间表，采取更大胆的跃进行动。

哈尔西一直都在菲律宾附近航行，通过航母向日军基地发起进攻。其间，他手下的一名飞行员被击落到了位于群岛中间位置的莱特岛上。通过跳伞抵达安全地带后，这位飞行员得到了潜艇的营救，并报称驻守在莱特岛上的日军部队人数其实比美军设想的要少得多。回想这一整个星期，上将注意到自己的舰队的确很少遭到敌军岸基飞机的挑衅。而这位被营救回来的飞行员的话更证实了他的怀疑。用哈尔西的话来说：“菲律宾中部就是一个防御薄弱、设施不足的空壳。依我看来，这正是帝国巨龙最无助的腹部……我开始猜想自己是否有胆量推荐麦克阿

瑟把原本指向棉兰老岛的矛头转向莱特岛，并把进攻日期从计划中的11月15日向前推移……我坐在舰桥的一个角落仔细考虑了一下”。他越想越觉得这个计划更加完美。于是，1944年9月13日星期三，他通过电报联络到了身处珍珠港的尼米兹，建议他取消进攻塔劳群岛、棉兰老岛和帕劳群岛的计划，转而快速攻占莱特岛。

当时的海面上行驶着两支美国运兵舰队。麦克阿瑟乘坐的“纳什维尔”号目标是位于摩鹿加群岛最东北端的莫罗泰岛——那里是对菲律宾发起任何形式的进攻都必需的要地。另一支舰队正搭载着海军陆战队第1师朝帕劳群岛驶去。尼米兹判定，现在召回帕劳方向的军队为时已晚。9 171名美军士兵悲惨而又毫无意义地在那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哈尔西的另外一些提议被转达到了正应W. L. 麦肯齐·金总理邀请在魁北克出席正式晚宴的联席参谋长们手中。正如阿诺德事后所写的那样：“莱西上将、马歇尔将军、金上将和我都请求准予离开，以便细细阅读这条信息，并让参谋准备了一封表示赞同的回函。”这个过程只存在一个小困难，即他们也需要获得麦克阿瑟方面的赞同，然而他却无法表态；位于敌军水域中的“纳什维尔”号正保持无线电静默状态。结果，这一重要信息从加拿大发到了萨瑟兰手中。这位一向冷漠的军官双手颤抖了起来，据肯尼事后回忆，萨瑟兰“很担心自己冒用将军的名义或在没有征询他意见的前提下，做出如此重大的决定会招致他的痛斥”。在停顿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参谋长以麦克阿瑟的名义通过无线电对此给予了首肯。

第一波攻势上岸之后，将军靠近了莫罗泰岛的海岸。他的希金斯登陆艇在一块岩石旁搁浅了。跳下跳板之后，他发现周围的水位已经涌到了胸口。尽管周围的参谋们都感到很惊愕（在后来的登陆行动中，大家一致同意由埃格伯格医生先行下船测试水深），但麦克阿瑟从火奴鲁鲁返回之后就对这一次行动充满了热情，因此就算衣服已然湿透，他的情绪也不会受到丝毫的影响。登陆行动没有遭遇抵抗，在未损失一兵一卒的情况下，他将自己军队的右翼安置了下来，准备发动下一次两栖攻

势。截至当时，他已经逃脱了敌军22万兵力的截击，距离菲律宾也只剩下不到300英里的距离。一收到萨瑟兰的消息，他立刻就表示了赞同。踱步几分钟之后，他扭了扭腰，停下脚步，目光越过日本天皇的这个盗来帝国中的一座要塞，望向莱特岛、巴丹半岛和科雷希多岛的方向。一位副官走过来，毕恭毕敬地站在他的身旁，等候着他下达指令。这位年轻的军官听到将军轻声对自己说了一句："他们在那里等我呢。已经等了很长时间了。"

---

1. 长吨：英制吨，1长吨约为1.016吨。——译者注
2. 麦克阿瑟在这一点上似乎有些糊涂了。在他的童年时光中，印第安人显然是站在敌对的另一边的。
3. "我尽我所能做到最好……只要结局证明我是对的，那么反对我的言论就算不上什么。如果结局错了，就算是有天使发誓我是对的也不起作用。"很难找到和麦克阿瑟自己的人生观意见相左的段落。
4. 陆战师出海之前，将军告诫他们的指挥官："我知道海军陆战队是怎么看待我的。但我也知道，一旦投入战争，他们绝对是一支能够出色完成任务的靠得住的军队。好运！"讽刺的是，虽然双方是上下级关系，但麦克阿瑟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从来就不曾青睐彼此。他们都是自负、绚丽、骄傲而又杰出的战士。
5. 在处理萨瑟兰的情妇一事时，情况就不一样了。详见下文。
6. 有趣的是，面对英国派兵入驻西南太平洋的前景，澳大利亚人比美国人还要感到不安。